



朝鲜简史

朴真奭

姜孟山

朴文一

金光洙

高敬洙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7.6.3

93
K312.0
2
2

高等学校教材

朝鲜简史

朴真爽 姜孟山 朴文一
金光洙 高敬洙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7·延吉



3 0029 4332 6

责任编辑:马永林

封面设计:徐龙吉

责任校对:张宏飞

朝鲜简史

朴真爽 姜孟山 朴文一
金光洙 高敬洙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
延边新华印刷厂二厂印刷

555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875
字数:450千字 印数:1-2,000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34-0990-4/K·82(课)
定价:17.00元

目 录

再版说明

第一章 原始社会	(1)
第一节 原始人群	(1)
一、黑隅里遗址	(1)
二、力浦人、德川人和屈浦文化第一期层	(4)
第二节 母系氏族公社	(7)
一、屈浦文化第二期层和胜利山人 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	(7)
二、母系氏族公社的经济状况	(9)
三、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	(13)
第三节 父系氏族公社	(15)
一、青铜器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	(15)
二、父系氏族公社制度的确立	(18)
三、原始社会的解体	(20)
第四节 原始社会的宗教和信仰	(22)
第二章 朝鲜的奴隶制国家——古朝鲜和辰国	(25)
第一节 古朝鲜	(25)
一、古朝鲜国家的建立	(25)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家的统治机构	(28)
三、卫满朝鲜的建立 古朝鲜人民 反对汉征服者的斗争	(33)

第二节 辰国	(36)
一、辰国的建立及其社会经济和 国家机构	(36)
二 奴隶制社会的危机 辰国的分裂	(40)
第三节 古代朝鲜的文化	(42)
一、科学技术	(42)
二、宗教和哲学思想	(43)
三、文学和艺术	(45)
 第三章 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初步 发展——三国时期	(47)
第一节 三国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	(47)
一、高句丽国的建立和 封建制度的形成	(47)
二、百济国的建立和封建制度 的形成	(51)
三、新罗国的建立和封建制度 的形成	(52)
四、六伽倻	(54)
第二节 三国封建制度的初步发展	(55)
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	(55)
二、高句丽人民的反征服战争	(60)
三、百济国家的发展和南迁	(62)
四、新罗国家的发展	(65)
第三节 新罗统一三国	(69)
一、七世纪中叶三国的形势	(69)

二、罗唐联军征服百济和高句丽	(70)
三、安东都护府的撤离和 新罗统一国家的建立	(71)
第四节 三国时期的文化	(72)
一、吏读文的出现	(72)
二、科学的发展	(72)
三、哲学和宗教	(74)
四、文学与音乐舞蹈	(75)
五、建筑和美术	(76)
第四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 的建立——统一新罗	(78)
第一节 健全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78)
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政治措施	(78)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经济措施	(83)
第二节 统一新罗的社会经济状况	(87)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88)
二、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92)
三、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93)
第三节 九世纪的新罗农民战争 后三国的分裂	(97)
一、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和 社会危机的激化	(97)
二、九世纪后半期农民战争的高涨	(98)
三、后三国与高丽的统一	(103)
第四节 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化	(107)
一、宗教和哲学	(107)

二、文学和艺术·····	(109)
三、科学技术·····	(111)
第五章 高丽中央集权封建体制的加强	
高丽人民反对契丹统治阶级的入侵	
十一世纪后半期到十二世纪初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	(112)
第一节 高丽中央集权封建体制的加强 ·····	(112)
一、中央官制·····	(112)
二、地方官制·····	(113)
三、军事制度·····	(116)
四、土地制度·····	(117)
第二节 高丽人民反对契丹	
统治阶级的入侵·····	(121)
一、十世纪末高丽的内外形势·····	(121)
二、契丹军的第一次大规模	
入侵及其被击退·····	(122)
三、契丹军的第二次入侵及其被击退·····	(124)
四、契丹军的第三次入侵及其	
被击退 高丽人民胜利的原因·····	(126)
第三节 十一世纪后半期到十二世纪初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129)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129)
二、文化的发展·····	(136)
第六章 十二世纪社会矛盾的激化 十二世纪后	
半期到十三世纪初全国性农民战争·····	(145)

第一节 十二世纪社会矛盾的激化·····	(145)
一、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 封建剥削 的加强 人民生活的恶化·····	(145)
二、九城的构筑和它的弃置 统治阶级的内讧和武臣的掌权·····	(149)
第二节 十二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初 全国性农民战争·····	(158)
一、1176~1178 年的农民战争 ·····	(158)
二、1193~1194 年的农民战争 ·····	(165)
三、崔忠献执政时期的农民战争·····	(168)
第七章 高丽人民反对蒙古及其他入侵者的斗争 高丽的灭亡和李朝封建国家的建立 十三到十四世纪的高丽文化·····	(173)
第一节 高丽人民反对蒙古入侵者的斗争·····	(173)
一、1231 年高丽人民反对蒙古 统治阶级的入侵·····	(173)
二、1239~1259 年高丽人民反对蒙古统治 阶级继续入侵的斗争·····	(177)
三、三别抄军的抗战·····	(179)
第二节 十四世纪高丽人民反对 蒙古干涉和倭寇入侵的斗争·····	(183)
一、蒙古干涉下的高丽 驱逐 蒙古势力和收复失地·····	(183)
二、高丽人民反对倭寇入侵的斗争·····	(188)
第三节 高丽的灭亡和李朝封建国家的建立·····	(190)
一、十四世纪后半期大农庄的出现	

和人民生活的恶化·····	(190)
二、李成桂一派的掌权 科田法 的制定和李朝封建国家的建立·····	(194)
第四节 十三~十四世纪的高丽文化·····	(197)
一、科学技术·····	(197)
二、史学、文学和艺术·····	(203)
三、哲学思想·····	(206)
第八章 李朝前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加强和经济文化的繁荣·····	(211)
第一节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211)
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	(211)
二、中央集权体制的加强·····	(215)
第二节 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	(220)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220)
二、手工业的发展·····	(224)
三、商业的发展·····	(228)
四、四郡六镇的设置和对外关系·····	(230)
第三节 阶级矛盾的激化和 咸镜道农民战争·····	(233)
一、封建剥削的各种形式·····	(233)
二、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各地农民起义·····	(236)
三、咸镜道农民战争·····	(238)
第四节 十五世纪的文化·····	(242)
一、“训民正音”的创制·····	(243)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245)
三、社会思想·····	(248)

四、文学艺术的发展·····	(249)
五、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	(251)
第九章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削弱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253)
第一节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削弱 ·····	(253)
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253)
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	(255)
三、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农民起义·····	(258)
第二节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壬辰卫国战争 ·····	(263)
一、日本侵略者的突然入侵和朝鲜人民卫国战争的开始·····	(263)
二、战争初期朝鲜水军的胜利·····	(264)
三、朝鲜各地义兵斗争的兴起·····	(266)
四、朝鲜和明朝联合抗战的伟大胜利·····	(269)
五、日本侵略军的再次侵入和败退·····	(270)
第三节 十六世纪的思想和文化 ·····	(271)
一、哲学思想的发展·····	(271)
二、医学和语言学的发展·····	(273)
三、文学艺术的发展·····	(274)
第十章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扩大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276)
第一节 十七世纪前半期的内外形势 ·····	(276)
一、战后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276)

二、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党争·····	(280)
三、人民群众抗击后金(清)的斗争·····	(281)
第二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十八世纪初	
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288)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288)
二、手工业的发展·····	(290)
三、商业的发展·····	(292)
第三节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扩大	
大同法的实施·····	(297)
一、官房、衙门和官僚两班地主	
的土地兼并的盛行·····	(297)
二、大同法的实施·····	(300)
三、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农民的反抗斗争·····	(304)
第四节 文化·····	(309)
一、实学的产生及其发展·····	(309)
二、哲学思想·····	(313)
三、文学的发展·····	(315)
四、美术和建筑·····	(316)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封建制度的危机·····	(318)
第一节 城乡阶级关系的变化 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成长·····	(318)
一、城乡手工业的发展·····	(318)
二、商业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成长·····	(319)
三、城乡阶级关系变化·····	(323)
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	(327)

第二节 朝鲜封建制度的危机·····	(330)
一、封建身分制度的瓦解·····	(330)
二、势道政治和封建官吏的腐败·····	(332)
三、天主教和欧美船只的进犯·····	(334)
第三节 1811~1812年平安道农民战争·····	(335)
一、农民战争前夕的形势·····	(335)
二、农民战争的准备·····	(337)
三、农民战争的开始和发展·····	(338)
四、定州防御战和农民战争的失败·····	(340)
第四节 1862年晋州农民起义·····	(342)
一、封建剥削的加强·····	(342)
二、晋州农民起义·····	(343)
第五节 文化·····	(346)
一、兴盛时期的实学·····	(346)
二、哲学思想·····	(349)
三、文学艺术·····	(350)
四、美术 工艺 建筑·····	(352)
五、图书出版和奎章阁·····	(353)
第十二章 朝鲜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 侵略 《江华岛条约》的签订·····	(354)
第一节 十九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国内 外形势 大院君的“弊政革新”·····	(354)
一、欧美列强加紧侵略东方·····	(354)
二、大院君的“弊政革新”·····	(355)
第二节 朝鲜军民击退美法军事侵略·····	(359)
一、“舍门号事件”·····	(359)

二、“丙寅洋扰”	(360)
三、“辛未洋扰”	(362)
第三节 开化思想的兴起和开化派的形成	(364)
第四节 日本开始侵略朝鲜和商埠的开放	(368)
一、大院君的下台和“云扬号事件”	(368)
二、《江华岛条约》的签订	(369)
三、《通商章程》的签订和通商港口的开放	(371)
第十三章 开港后朝鲜的社会经济	
状况和改革运动	(373)
第一节 开港后朝鲜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	(373)
第二节 “壬午兵变”	(376)
一、兵变前夕的政治形势	(376)
二、“壬午兵变”的爆发	(378)
三、“壬午兵变”的失败	(380)
第三节 日本加强对朝鲜的侵略	
欧美列强的渗透	(381)
一、日本加强对朝鲜的侵略	(381)
二、欧美列强的渗透	(382)
第四节 开化派的改革活动和“甲申政变”	(384)
一、开化派的改革活动	(384)
二、“甲申政变”的爆发和新政府的建立	(388)
三、“甲申政变”的失败和历史意义	(394)
第五节 《汉城条约》和《天津条约》	(399)
第十四章 “甲申政变”后朝鲜社会经济的变化	
甲午农民战争和甲午改革	(401)

第一节	“甲申政变”后朝鲜社会经济的变化	(401)
一、	“甲申政变”后的朝鲜政局	(401)
二、	朝鲜经济的崩溃	(403)
三、	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	(404)
四、	反对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 的人民斗争	(406)
第二节	农民战争的爆发	(408)
一、	古阜农民起义	(408)
二、	农民军的发展和全州的占领	(412)
第三节	“全州协议”和执纲所的建立	(414)
一、	“全州协议”	(414)
二、	执纲所的建立和诸般改革	(418)
第四节	农民军的再起和失败	(420)
一、	清日两军出兵朝鲜 中日战争的爆发	(420)
二、	农民战争的再起和公州战斗	(422)
三、	农民战争的性质、失败原因 和历史意义	(425)
第五节	甲午改革	(428)
一、	改革的酝酿	(428)
二、	军国机务处和诸般改革	(430)
三、	改革的失败	(433)
第十五章	甲午农民战争后的朝鲜社会经济状况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吞并朝鲜的斗争	(436)
第一节	甲午农民战争后的朝鲜形势 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436)
一、	甲午农民战争后的朝鲜形势	(436)

二、反日义兵斗争的兴起·····	(437)
三、日俄在朝鲜矛盾的加剧 列强加紧掠夺经济权益·····	(443)
四、自主民权运动·····	(444)
五、活贫党的武装斗争·····	(447)
第二节 日本加紧吞并朝鲜 义兵斗争的再起·····	(449)
一、日本加紧吞并朝鲜·····	(449)
二、反日义兵斗争的再起·····	(453)
第三节 统监统治下的朝鲜 义兵 斗争的昂扬·····	(454)
一、日本统监统治下的朝鲜·····	(454)
二、义兵斗争的昂扬·····	(458)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爱国文化运动·····	(464)
第五节 日本吞并朝鲜·····	(471)
第十六章 日本殖民统治初期的宪警武断 统治和“三·一”人民起义·····	(473)
第一节 日本殖民统治初期的宪警武断统治·····	(473)
一、宪警武断统治和愚民政策·····	(473)
二、日本殖民经济体制的建立·····	(476)
三、朝鲜人民的生活处境·····	(479)
第二节 日本殖民统治初期的反日斗争·····	(481)
一、反日武装斗争·····	(481)
二、反日政治斗争·····	(483)
三、爱国文化运动·····	(484)
四、工人、农民的斗争·····	(486)

第三节	“三·一”人民起义	(487)
一	“三·一”人民起义的爆发	(487)
二	“三·一”人民起义的失败、意义和教训	(493)
第十七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和民族 解放运动 “八一五”解放和 国土的分裂	(496)
第一节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496)
第二节	二十世纪 20~3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	(500)
一	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统治”	(500)
二	枫梧洞战役和青山里大捷	(503)
三	国民府	(507)
第三节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510)
一	临时政府的活动	(510)
二	维护民族文化的运动	(513)
三	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抗日武装斗争	(515)
第四节	“八一五”解放和国土的分裂	(518)
一	“八一五”解放和“三八”线	(518)
二	美军政和反托管运动	(519)
三	北半部地区的民主改革和政权建设	(522)
四	南北单独政府的成立	(524)
附录一	高句丽、百济、新罗、高丽、李朝世系表	(526)
附录二	朝鲜史大事年表	(536)
附录三	朝鲜史主要参考书目录	(541)

第一章 原始社会

第一节 原始人群

原始社会史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起点，“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 朝鲜的原始社会开始于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大约从六十万至四十万年前开始，就有原始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

迄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北半部发现的原始群时期的人类遗址，主要有平壤市祥原郡的黑隅里遗址、平壤市力浦区大岬洞的“力浦人”、平安南道德川郡胜利山遗址的“德川人”和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的“屈浦文化”第一期层等。

此外，在朝鲜半岛南半部，如公州石壮里以及汉城以北五十公里的京畿道莲川郡全谷里，也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一、黑隅里遗址

1966年发现的平壤市祥原郡黑隅里遗址，是朝鲜迄今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黑隅里遗址，位于距祥原邑三公里多的石灰岩质山岗的南坡上，是个纵深约三十米的洞穴遗址，有二点五米厚的遗物层。遗物层中发现不少动物化石和极粗糙的打制石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57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黑隅里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中，大小兽骨计二十余种。其中有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出细部形态的鼠类小兽骨，又有大象或犀牛（大型双角犀）之类异常庞大的兽骨。^①

朝鲜考古学界认为，黑隅里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一半以上是很早以前就被淘汰了的灭绝种：其中湿地野鼠、祥原马等多是生长在地质时代第三纪末的古种，到第四纪中更新世以后就很难找到；大型双角犀是第四纪中更新世中期生存的典型动物。这说明，黑隅里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相，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哺乳动物。它可能属于地质时代第四纪中更新世中期（或第四纪早更新世末至中更新世初），相当于六十万至四十万年前。

黑隅里遗址出土的化石动物相，使我们知道距今六十万至四十万年前祥原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这里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水牛、猿猴、象、大型双角犀之类是生长在热带的典型动物；水牛、海狸、湿地野鼠之类是生活在江畔或沼边的动物；野猪、狼之类是生活在林木茂盛地区的动物。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朝鲜西部的气候比现在热得多，这里有广阔的湿地，草木繁茂，各种果树和动物甚多。这种自然环境给留在黑隅里遗址的原始人类带来较为有利的生活条件。

黑隅里遗址出土的石器，是人类文化初期常见的极为粗糙的东西，是用最原始的方法——“砸击法”^②和“打击法”^③制作的。

这些石器是把石头砸碎和锤击一次后不经加工，或再锤击一

① 《朝鲜考古学概要》第3页，1977年，平壤，科学与百科辞典出版社。

② 把准备打制的石块向置于地面的石块摔击，或指准备打制的石块放在平坦的石块上用另外的石块砸击的方法，称之为“砸击法”。

③ 把准备打制的石块，用石锤之类的东西锤击的方法，称为“打击法”。打击法和砸击法，是石器制作一开始就广泛使用的最原始的方法。

两次制成的。所以，该遗址出土的石器，在器形上找不到固定的统一性，很难同自然破碎者相区别。人们只根据石的形状分别称之为“手斧状石器”、“梯形石器”、“尖状石器”和“半月形石器”等。这些石器极为原始和粗糙，但它毕竟是劳动的产物，是人类有目的打制出来的劳动工具。当时，人们就是用这种极为原始的工具（包括木棒）摘野果、挖草根或捕获各种小动物。这样的劳动，一开始就使他们与动物区别开来。因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①

黑隅里遗址出土的石器，从加工方法和形状来看，即便在旧石器时代前期无疑也是属于早期的。因此说，留下这种遗址的居民是猿人阶段的人。他们是刚刚摆脱猿猴状态的最初人类。

上述事实使我们知道，朝鲜半岛从六十万至四十万年前就居住着最初的人类——猿人。猿人只会制作最原始的打制石器，征服自然的力量很微弱。每天的生活和饮食来源极为困难。猛兽成群，每走一步生命就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是无法生存的。当时的人类，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办法，就是结成许多小的群体，进行集体劳动，从事社会生活。

人类摆脱动物界，通过集体劳动组织起来的第一个社会集团，就是原始人群。

原始人群是人类在共同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但它的规模还不小，不过是数十人形成的小群体，他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很薄弱，还没有劳动分工，婚姻关系也不固定，是不严格和不成熟的集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09页。

二、力浦人、德川人和屈浦文化第一期层

1977年9月，朝鲜考古学工作者在平壤市力浦区大岬洞附近的一个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和各种哺乳动物化石。

头骨化石中有颅前骨、颅顶骨、颅侧骨，相当于一个人的颅骨。颅前骨是左侧的一部分，残留着眼眶和鼻骨。颅顶骨是左右完整的，颅侧骨是接近完整的右侧骨。这些头骨化石因为出土在平壤市力浦区，所以称此为“力浦人”。朝鲜史学界认为，从力浦人遗骨的发育程度和大小来看，可能是七至十岁（或七至八岁）小孩的遗骨。

力浦人的头骨，具有明显的原始特征。它的眉骨相当发达，粗大的眉骨左右相连，象房檐一样遮着双眼；前额低平，向后倾斜；颅侧骨不发达；鼻子宽扁。但力浦人具有比猿人发达的各种特征。前骨和颅顶骨向上鼓起，颅前骨高，左右眉骨连接处稍低。这说明力浦人虽然很原始，但已是摆脱了猿人阶段的人。

遗址中除人类头骨化石外，还出土了近三十种动物的七百多件骨化石。这些骨化石相当于九十五个动物的完整骨骼。通过这些动物化石的鉴定可以看到：第一，地球上已经灭绝的古动物（灭绝种）化石的出土比例，比黑隅里遗址少，比德川人遗址多^①；第二，此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相中奇蹄类所占比例比德川遗址多，几乎接近黑隅里遗址。奇蹄类比偶蹄类多，是地质时代第三纪动物相中所常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相中奇蹄类占多数，这就说明该遗址历史悠久。

^① 灭绝种在黑隅里遗址出土的全部兽骨化石中所占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二，力浦人为百分之四十九点八，德川人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三。

力浦人遗址中还出土了三十多种粗糙的骨器。这些骨器都有用过的痕迹。

朝鲜考古学界据上述各种情况认为：力浦人是早期的古人，是介于黑隅里时代的猿人和德川人（古人）之间的人类。

1972~1973年，在平安南道德川郡胜利山洞穴中，于“胜利山人”遗址的下层发现了人的肩胛骨化石和两颗牙齿化石（一颗是右侧第一下颌臼齿，另一颗是左侧第二下颌臼齿），称此为“德川人”。这种臼齿具有比猿人臼齿发达，而有新人臼齿原始的特点。他的“第一下颌臼齿齿冠的后部比前部稍宽，这是古人下颌臼齿中常见的特点”。^① 朝鲜考古学界认为：从牙齿所表现的特点来看，德川人属于古人，他们大约生活在十万年至四万年以前。

在胜利山洞穴中，与德川人的臼齿一起出土的还有多达三十种的动物化石。这里的化石动物相比前期有颇大的变化。一方面，在该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中，地球上已灭绝的古动物种类显然减少，只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这同黑隅里遗址相比大不一样，而接近于现代动物群；另一方面，从这里出土的哺乳动物来看，偶蹄类多，奇蹄类少，在偶蹄类中鹿类尤占多数。鹿科动物在朝鲜原始社会遗址中，大多出土于晚更新世末以后的全新世。这表明，德川人时代的动物群与前一时期比较，有颇大的变化，更多地接近于全新世的动物群。这对考证德川人所生存的地质时代、当时的自然环境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德川人是比力浦人更晚的古人阶段的人类。

1963年，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发掘出屈浦文化第一期层，是相当于十余万年前的文化层，对了解上述古人（力浦人和德川

^① 朝鲜《历史科学》，1978年，第三期，第46页。

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在屈浦文化第一期层中，发现了当时人类建造和居住的地穴式房屋遗址，也发现了用石英制作的打制石器。

房屋遗址的屋顶已腐烂无存，只剩下压棚边的石块和石堆。从石堆置放的情况推测，穴屋的大小可能有三十至四十平方公尺。屋内东北角有大石块，估计是制作石器用的石砧，其周围散布着石英石片和石英石器。这里可能是制作石器的作坊。

屈浦里文化第一期层出土的石器，有砍伐器和刀刃之类的东西，此外还有石核^①。

这里的石器，是用砸击法和打击法制作的，仍较拙劣。但比黑隅里时期有所进步，比黑隅里遗址的石器小巧，刃更锋利。

屈浦文化第一期层出土的石核表明，此时期的人类在制造打制石器时，已经采用比较发达的打击法。他们从一块石头上打下许多石片之后，用这些石片制作既锋利又好使的石器，而打下石片后剩下的石核，很少当做石器使用。这意味着打击法的发展。屈浦文化第一期层发现石核一事，说明当时人类已经掌握了用打下的石片制作石器的方法，是比较发达的打击法。

朝鲜史学界认为，屈浦文化第一期层的人们已经知道人工取火。恩格斯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② 火的使用和发明，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征服自然界的重要成果之一。火对人类有重要作用，不仅能照明、防寒，还可用以与野兽作斗争；有了火，人类可以熟食，熟食能缩短消化过程，对人体更好地吸收食物的养分，促进体质的增强，特别是促进脑的发达，有重大意义。屈浦文化第一期层

① 制作石器时，打下石片和碎屑之后剩下下来的石心，叫做石核。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54页。

的人们与力浦人和德川人一样，已经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他们的脑髓容积比猿人大得多，体质结构也有了变化，这种人叫做“古人”。

由古人形成的社会集团，并未超越原始群阶段。但古人的社会集团与猿人相比却是巩固和发展了。屈浦文化第一期层的半穴居址表明，同住在洞穴或岩荫之下相比，这时的生活已开始具有一定的秩序。当时的人类，在居址内的一角放置一块大石作为固定的工作台——石砧，用以制造石器。他们生活面貌上显示出来的这种秩序，说明由古人组成的原始人群，是有较为固定组织的社会集团。

第二节 母系氏族公社

一、屈浦文化第二期层和胜利山人 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

咸镜北道屈浦里的屈浦文化第二期层，是大约四万至三万年前的文化层，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其中大部分是用黑绿坚硬的角页岩制成的，有的则是大理石或其它石头制成的。石器种类有：砍伐器、刮削器、尖状器、刀刃般的石片等。从该文化层里还出土了制造石器后剩下的石核。

屈浦文化第二期层出土的石器，比屈浦文化第一期层的石器有所进步。这里出土的石器和石核，使人们看到在制作打制石器时采用了旧石器时代后期才开始使用的方法——“间接打击法”^①

^① 用类似凿子的物体，对准备打制的石块进行打击，把石头劈开的方法，称之为“间接打击法”。

和“压削法”^①。

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一般先用间接打击法劈开石片，然后再把劈开的石片用压削法进行修整，从而制造出有用的石器。

朝鲜考古学界认为，屈浦文化第二期层出土的尖状器中的一种，就是用间接打击法打出石片后，再用压削法进行修整的。并且，在该文化层出土的石核上也能看到用间接打击法打制的痕迹；从某些石器上还会看到有许多是用压削法进行修整的。^②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当时人类在制作打制石器时，已经使用相当进步的手法；说明留在屈浦文化第二期层的人类已经进入旧石器时代的后期。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体质结构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在头骨或下颌骨以及胳膊和腿的形态方面，即在整个体质结构方面，与古人有明显的区别，已经变成与现代人同一类型的“新人”。

1972年，朝鲜考古学工作者在平安南道德川郡胜利山洞穴遗址上层，发现了比较完整的下颌骨人类化石，化石还残留着右侧的第一臼齿后部。朝鲜考古学界称此为“胜利山人”。胜利山人的下颌骨，从形态特征或层位关系来看，属于新人化石。但在下颌骨的宽度、高度和厚度等体质结构上还残存着古人特征，这说明他们处于新人的初期阶段。

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新人，依靠改进了生产工具，日益扩大生产活动。他们在进行采集的同时，开辟了狩猎和捕鱼等生产领域。这时，人类已摆脱原始群状态，形成更加巩固而有组织的社

^① 用坚硬的物体挤压石片或石块的表面，削出小片的方法。用这种“压削法”进行加工，叫做“修整”。

^② 《朝鲜考古学概要》，第11页。

会集团——氏族。

人类最初形成的氏族是母系氏族，是“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① 旧石器时代后期，妇女是管理生产的主人，在群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血缘只能从母亲方面计算。这样，就形成了母系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与原始人群不同，它是完全摆脱动物本能的社会性集团。胜利山人或屈浦文化第二期层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就是组成这种母系氏族公社而从事生产活动的。

二、母系氏族公社的经济状况

母系氏族公社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形成，在新石器时代得到发展。

朝鲜新石器时代大约从公元前五千纪开始，延续到公元前二千纪初。主要遗址有：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西浦项、鲇浦里德山、游仙郡黑狗峰、茂山郡虎谷洞、清津市农浦里、慈江道中江郡土城里、长城里、平安北道宁边郡细竹里、龙川郡新岩里青岗、龙渊里、双鹤里、定州郡堂山、盐州郡道峰、义州郡美松里、平壤市寺洞区金滩里、平安南道温泉郡云下里弓山、黄海北道凤山郡智塔里、黄海南道银泉郡鹤月里、海州市龙塘浦、京畿道广州郡岩寺里、庆尚南道釜山市东三洞遗址等多处。

当时，在经济方面比以前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养畜、农耕、制陶等新的经济部门，说明当时人类不只采集现成的天然物产，而且能利用各种自然条件从事宿舍生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发展到这一时期，“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37 页。

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①

人们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在中石器时代^②发明了弓箭。弓箭在这个时期发明，正如“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③。新石器时代，弓箭得到广泛的普及。弓箭的制造和使用，必然导致狩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及其范围的扩大。从朝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见到各种骨角器和兽骨，就能反映出这种情况。出土物中骨角器较多；兽骨中除各种鹿科动物外，还有猪、牛、山羊、虎、熊、狼、狐狸、獾、狸等多种，根据这些，能考察出当时猎获的动物种类。

在这大量的兽骨中，既看不到曾在旧石器时代前期遗址中出土的大型双角犀、猿、猴等高温地区的动物，又看不到在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出土的猛马象之类的酷寒地区的动物。这说明在朝鲜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有过多次变化。朝鲜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各种兽骨表明，当时的动物群基本上与现代的动物群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猎获的动物中，猪、牛、鹿等偶蹄类特别多，而在偶蹄类中更多的则是鹿，它在朝鲜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全部兽骨中常占一半左右，在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三分之二以上，这说明鹿与当时居民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这无疑是朝鲜新石器时代遗址所表现出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狩猎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人们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认识到饲养家畜能够给人提供比狩猎更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当时饲养的家畜，种类还不多，至今知道的只有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页。

② 朝鲜中石器时代，相当于距今一万五千年到公元前六千年之间的时期。见《朝鲜全史》卷一，第57页，1979年，平壤，科学与百科辞典出版社。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页。

和猪。据统计，在朝鲜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全部动物遗骨中，狗和猪等家畜所占比例还很低，具体情况如下表：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兽骨中
家畜所占比例统计表^①

家畜 名称 遗址名称	狗 (%)	猪 (%)	家畜合计 (%)	野兽合计 (%)
弓山遗址	1. 4		1. 4	98. 6
西浦项遗址	7. 96	0. 63	8. 59	91. 41
虎谷遗址一期层	7. 4	3. 7	11. 1	88. 9
农浦遗址	8. 33		8. 33	91. 67

从上述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第一，当时畜牧业处于初期阶段，它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所处的地位还很低；第二，狩猎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仍占重要地位；第三，在饲养的家畜中，狗比猪普及。正如统计表所表示的，狗在各地都饲养，猪只是一些地区饲养，而另一些地区根本没有饲养，这说明猪的饲养更处于初期阶段。

农业，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公元前五千纪至公元前四千纪）还处于，“锄耕农业”阶段，使用的农具和耕作方法都非常原始。至今，朝鲜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出土的工具还不多，只发现石铲、骨铲、角尖棒和磨谷盘等几种，还未发现谷粒的痕迹。

^① 据《朝鲜全史》卷一，第94页作表。

新石器时代后期（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前二千纪初），农业在人们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显著提高，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当时，在前期农具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农具，经营方法也得到改善，如在西浦项遗址四期层、虎谷遗址一期层、金滩里遗址二期层等许多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中，都出土了不少有肩石铲。这种新出现的农具，形态上比过去的石铲（形状似鞋底）有所改进，柄部和刃部有明显区别，即柄比刃窄，便于安把，刃部相当宽扁，提高了翻地能力。尤其在智塔里遗址第二地区，出土了多达数十件的石犁及其碎片，其中有的甚至长达五十至六十厘米的大型石犁。犁虽是石制的，但它与有肩石铲的使用，充分表明新石器时代后期农业技术的巨大发展。半月刀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到青铜器时代成为广泛普及的收割谷物的农具。其形状一般呈半月形，因此被称为半月刀。半月刀的形状不限于半月形一种，此外还有多种。但它在一边有刃、对面为背的这一点上却有其共同特点。另外，所有的半月刀无例外地都有一至三个孔，可能是为穿绳之用。上述这些情况，可说明半月刀用途的共同性。史学界一般认为，半月刀是用来刈割谷穗的收割农具。这种新农具对当时的谷物收割无疑起过积极作用。

如上所述，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们，使用新的农具和新的经营方法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采用犁耕法，从而使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产品也有所增加。在智塔里第二区遗址，不仅发现石镰和石犁，还发现满盛于陶器中的炭化谷粒（可能是稗或粟之类）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一般情况。

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主要是制造陶器、石器、骨器，从事纺织等。

制陶业是此时期新出现的生产部门，也是当时颇有特色的一种重要手工业。当时的陶器制造全用手制，普遍采用泥条盘筑

法，小型陶器则直接用手捏成。器形可分平底、圆底尖底、有足、无足、有肩、无肩、深腹、浅腹；大小也不相同。大小和形态的如此多样，说明朝鲜新石器时代居民曾经制作和使用过各式各样的陶器。

装饰陶器表面的手法也多样化。朝鲜新石器时代的居民虽然也部分地使用无纹陶器，但更多的则是制作和使用以各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有纹陶器。其中最常见的是刻划纹器。所谓刻划纹，是用尖部由单股或多股组成的施纹具，按压或刻划器物表面而显出的纹饰。施纹具还以尖部呈细、粗、圆、方、扁等形而分为多种。用这样的施纹具压出的点或划出的线，称作点线纹、纵叶纹、斜线带纹、篦齿纹等。这些纹饰到一定时期又同螺旋纹、点线波浪纹、雷纹结合起来，更加提高纹饰的艺术价值。迄今发现的朝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无例外地都出土了刻划纹器物及其碎片。这充分说明在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朝鲜半岛的居民最喜欢使用刻划纹器物，它是朝鲜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主流。

石器制作以磨制为主，这是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是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当时有石斧、石刀、石镞等。骨器制作，有骨针、骨制鱼钩、鱼叉等。纺织方面，发现了当时的陶纺轮、石纺轮等工具。

尽管如此，当时的手工业尚未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与农业混在一起，在农事和其它生产的空隙中进行。

三、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后期即胜利山人时期就已出现的母系氏族公社制度，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新石器时代，家务仍由妇女承担，在整个生产活动中，妇女的作用仍旧很大。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前期还处于锄耕农业阶

段，这样的农业主要由妇女担当。当时，刚刚开始陶器制作，主要由妇女从事。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写道：“有一个时期，即母权制时期，妇女被认为是生产的主人。……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原始农业中，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他们担负着主要的职能”^①。

另一方面，经过漫长岁月，婚姻形态虽在变化，但血统仍只能从母系确认，这一点是没有变化的。当时，已禁止族内婚，而实行族外婚，即同一氏族内的男女不能通婚，只能在不同氏族的男女之间通婚，不过他们之间仍实行群婚，所生子女，必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排除了确切认知父亲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世系只能依女系——母权制来算，……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②。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受到尊敬，这是它的基本特点。这种特点在朝鲜的原始社会里也有所表现。朝鲜古代的一些神话传说，如“太阳神孕胎说”和“卵生说”，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公社残余的反映。在考古发掘中也能看到这种情况。如清津市农浦里遗址里，除飞禽、狗头等动物雕塑品外，还发现人像雕塑品。这是以公式化手法用泥土塑造和烧成的，从细腰宽臂可看出是女人形象。在雄基郡西浦项遗址里，还发现象征女人的用兽骨和鹿角雕刻成的雕塑品。所有这些，无疑地反映了对女性崇拜和母系氏族社会的存在。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生产资料公有，氏族是当时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通过自然繁殖产生子氏族，从同一氏族中分离出去的许多氏族又形成胞族。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10页，1953年，人民出版社。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页。

据传说，新罗的六部以母、父、子、女等为各部的名称，他们每年都挑选善于捻线织布的妇女，分两组进行织麻布竞赛。这些都是母系氏族制度留下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有了显著增长，在同一地区居住着从一个祖先派生出的许多氏族和胞族。他们通常生活在一个组织之中，即由氏族和胞族组成的更大组织——部落。几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首领，重大事情由氏族（或部落）议事会决定。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并不是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下，劳动条件也异常艰苦。然而，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只有氏族制度才能够把个体社会成员的微弱力量汇合成集体的洪流，冲破自然界的各种障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第三节 父系氏族公社

一、青铜器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的决定因素。当时，生产力发展中最突出的是青铜器的制造。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只会制作磨制石器、陶器和骨角器等。但是，他们经过长期的生产活动，不断提高对自然界的认识，终于发现了金属，掌握了冶炼金属的技术。人类最初发明的是冶炼红铜，不久就发明了冶炼铜锡合金的青铜。从人类利用青铜制造工具直到发明铁器以前，史称青铜器时代。

朝鲜史学界认为，朝鲜青铜器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二千纪

前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一千纪初^①。朝鲜青铜器遗址主要有：咸镜北道会宁五洞^②、茂山郡虎谷洞、雄基郡西浦项、罗津草岛、慈江道江界市公贵里、中江郡土城里、平安北道宁边郡细竹里、龙川郡细川里、平壤市寺洞区金滩里、西城区蛙山洞、力浦区戊辰里、平安南道江西郡台城里、黄海北道凤山郡新兴洞、黄州郡沈村里、黄海南道龙渊郡石桥里、安岳郡伏狮里、锦江流域的公州、庆州附近入室里等多处。

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制品有斧、凿、短剑、矛、镞等生产工具和武器，另外还有铃、扣、戒指等装饰品和生活用品。铸造青铜的铸范，也在各地出土。但是，迄今在朝鲜青铜器时代遗址中常见的却多为石器，而青铜制品则很少。这是因为：第一，当时不易得到制造青铜的原料铜和锡，制造技术也有限；第二，当时的居民特别珍惜难得的青铜器，每当用坏后，不象石器那样轻易扔掉，而是重新回炉制成新品。

人们虽然用青铜制工具，但在整个青铜器时代仍广泛使用石器。正如恩格斯指出：“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③。这时的石器比以前更加发展，其中有些是模仿青铜器制造的。种类有：石斧、半月刀、有肩石铲、有段铍、短剑、石锥、棍棒头、有茎两翼镞等。

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活

① 《朝鲜通史》上，第20页，1977年，平壤，科学与百科辞典出版社，《朝鲜全史》卷一，第188~190页。

② 朝鲜著名历史学家朴时亨曾说，会宁五洞遗址，是朝鲜青铜器时代前期（时间为公元前二千纪前期）的代表性遗址，出土的“遗物是青铜制造的普通的刀子、凿子、锥子等工具和装饰品。”见《朝鲜史学界在朝鲜史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载《朝鲜史通讯》，1981年，3期，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7、158页。

动和整个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与新石器相比有很大发展。

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初步发展，到青铜器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遗址中常发现石斧、有肩石铲、半月刀、石镰、磨谷石等农用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大型石斧相当多，有的甚至长达二十八点五厘米，这可能与农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有关。半月刀显然增加，一个遗址有时可以发现十把，个别地方甚至发现六十把之多。

当时遗址中发现的谷物，有谷子、黍、高粱、稗子、大豆、蚕豆等，与新石器相比，谷物种类显著增加。

上述事实可说明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尤其在平安北道盐州郡周义里泥炭层中发现了公元前八世纪至七世纪古朝鲜时期的椴木犁。还发现了车轮碎片，将其复原，直径可达一点六米，构成二十四根辐条的大车轮。另外，在平壤市胜湖区立石里、会宁五洞、茂山虎谷、罗津草岛等青铜器时代的遗址里，还发现了牛等大牲畜的骨骸，由此可以推测出他们已经从事规模更大的犁耕农业，甚至用牛拉犁种地。

畜牧业也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朝鲜青铜器时代遗址中，常能见到猪、牛、马、狗等家畜的骨骸。其中最多的是猪的骨骸。在罗津郡草岛遗址里出土的兽骨中，家猪骨骸占三分之一，而茂山郡虎谷遗址第四期层（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里出土的家猪在当时畜牧业（包括狩猎）中的重要地位。牛骨，在公元前二千纪前期的虎谷、五洞等青铜器时代前期遗址的房址里已有出土，这说明公元二千纪已经开始养牛；而马骨只在虎谷遗址铁器时代初期文化层房址里才有出土，说明马比牛的饲养稍晚一些。

狩猎和捕捞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地位虽有所降低，但狩猎在青铜器时代仍然盛行，它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依然保持重要地

位。捕捞也有发展，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巨大贝丘，在他们遗留的贝壳和鱼骨中，有不少是只有去深海才能捕到的鱼类和贝类，这证明他们已经到较远的深海进行捕捞活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居民的生活也有显著变化。他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虽然还是挖坑筑房，但深度浅于前一时期，有的已经不是地穴式房屋。

使用的陶器比以前显著增加，出现了各种有颈陶器、陀螺形陶器和附有把手的陶器。纹饰方面也有很大变化。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刻划纹陶器占主要地位，但到了青铜器时代则显著减少，只剩下残余形态，逐步过渡到无纹丹陶磨研陶器。

埋葬方法也与前不同。他们已经能用巨石构筑坟墓，有支石墓、石箱坟、土圪墓等。其中，支石墓尤为著名，形式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一人多高的宽大板石竖为两面或三面、四面，上面盖以大岩石；另一种是用扁石在地面并成箱形或砌成井形，上盖厚大岩石。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异，是朝鲜原始社会末期的主要墓葬形式。

二、父系氏族公社制度的确立

到青铜器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进，特别是青铜器的出现，带来整个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以致改变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

农业和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沿海地区捕捞活动的有组织进行，终于使男子在生产活动中居于统治地位。对此恩斯特曾指出：“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

的附属品。”^①

生产中男女地位的变化，把以前的家庭关系颠倒了过来。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确立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妇女被排挤到第二位。于是，父系制代替了母系制，这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

朝鲜史学界认为，朝鲜的父系制社会在公元前二千纪前期开始，一直继续到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长达一千数百年，它在朝鲜古代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父系制的确立与新的婚姻形态密切相联，并借助新的婚姻形态发展起来。随着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男子凭借自己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打破母系制社会时期的婚姻秩序，把妻子带回来住在自己家中，从而实现了到夫方居住的过渡，建立了男女双方比较牢固持久的结合，从此对偶婚逐渐被一夫一妻制所代替。

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女子结婚后，要搬到男方氏族里去生活，死后往往同墓合葬。因此，这个时期出现了新的埋葬制度——夫妻合葬墓。朝鲜西海岸巨石文化系统的支石墓，或者咸镜北道的原始坟墓，都有夫妻合葬的现象。这种葬式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出现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状态。在雄基郡西浦项遗址和茂山郡虎谷遗址的青铜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男子泥塑像，这象征着男子的权威和父系制的存在。

随着计算血统世系和婚姻关系的改变，家庭形态也发生变化，母系大家族让位给父系大家族。父系大家族的主要成员由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人组成，这就是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长制大家族。后来，它又发展成为以一对夫妇及其子女为成员的家长制小家族。朝鲜考古学发掘表明，在公元前二千纪（父系制社会初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7、158页。

期) 遗址里发现的房屋面积都比较大, 多数在六十到七十平方米之间; 而公元前二千纪末到一千纪前半期(父系制社会末期) 遗址里发现的房屋, 面积明显变小, 只有二十平方米多一点。^①

上述两种不同时期, 房屋面积的明显变化, 有可能反映了由家长制大家族过渡到家长制小家族的历史过程。

此后, 生产和社会的单位, 已不是原来的氏族公社; 而是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庭。这时, 已经产生私有财产, 为原始公社的解体打开了缺口。

三、原始社会的解体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亦即原始公社的解体时期。这一时期, 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 产生私有制和阶级, 从而使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并逐步过渡到奴隶制社会。

青铜器的普及, 尤其是后来铁器的使用, 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 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 成为可能; 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税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当的工具”。^②

据朝鲜考古发掘, 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 朝鲜已出现铁器。朴时亨先生曾指出, 咸镜北道茂山郡虎谷洞遗址“青铜器时代层的上边, 出土了铁斧、铁渣等。分析铁斧的结果判明, 是使用现今茂山铁矿的铁矿石, 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七~五世纪。”^③ 到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期, 尤其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以后, 铁器进一步

① 《朝鲜全史》卷一, 第 299--30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59 页。

③ 朴时亨:《朝鲜史学界在朝鲜历史研究中的新成果》, 载《朝鲜史通讯》1981 年, 3 期,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

得到发展。

金属工具，尤其是铁制工具的使用，对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和巩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时，在家长制大家族构成的父系氏族制度下，由于金属工具，尤其是铁制工具的出现和劳动技术的改进，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原来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生产，逐步分解成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生产由公共的事情变成各家的私事，生产资料和产品也随之变成私有财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出现剩余产品的可能性，以家长制家庭为中心而积累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这样，在原始公社社会内部产生了私有制。

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出现了商品交换。交换的发展，逐渐破坏了氏族的集体生产和共同占有，促进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发展，为原始公社社会的解体“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在氏族成员之间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现象。父系大家族中的家长、部落首领等人，凭借自己的权力，掌握越来越多的财产而成为富人，一般的氏族成员则变成毫无权力的穷人。这种情况从当时的墓葬中可以反映出来。从朝鲜原始社会末期的坟墓中可以看到，有的坟墓随葬品多，有的就少或没有。这说明私有制的产生和贫富差别的存在。而当时的支石墓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黄海北道燕滩郡五德里和黄海南道殷栗郡冠山里的支石墓极为出名，有的甚至在上面盖以长八点五米、宽六米多、重三十至四十吨的大石板。这种大规模的支石墓只能是富者或有权势的酋长们才修得起。尤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修这种大规模的支石墓，无疑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说明当时已经出现奴隶制。

“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是后来在氏族部落内部也

产生阶级分化和奴隶。贫穷的氏族成员因债务等原因，逐渐被迫沦为奴隶。而富有家族的家长则成为氏族显贵，拥有大量财富和众多奴隶，他们剥削一般氏族成员，构成奴隶主阶级。恩格斯把这一社会大变革称为“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①

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阶级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促进了脱离人民群众的公共权力机关的产生。转化为奴隶主的氏族部落首领，为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为镇压成为自己剥削对象的奴隶们的反抗，设立了军队、监狱等暴力机关。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转变为脱离人民的压迫机关。于是，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便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产生出来。

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在朝鲜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古朝鲜；不久，在朝鲜半岛中南部又出现了奴隶制国家——辰国。从此以后，朝鲜社会结束了原始公社制度，进入了奴隶制度时期。

第四节 原始社会的宗教和信仰

原始信仰和宗教，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同自然界的斗争能力极其微弱的情况下产生的。原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后期，亦即“胜利山人”时期可能就已经有了原始宗教观念。

最初产生的原始宗教观念的特点，是没有把人类本身和自然现象区分开来。这种原始宗教的一种形态是，认为人同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一定关联的图腾崇拜，即认为一定氏族集团的成员出生于他们固有的动物、植物等图腾，而图腾又在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7页。

护他们。因此，对这些固有的动植物表示崇拜，就形成“图腾崇拜”。

在朝鲜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原始时代各部落图腾崇拜的痕迹：“檀君神话”中的檀君，托生于熊；新罗传说中的“始祖母”长着鸡嘴出生，由鸡保护他们“始祖”的诞生；涉族信虎为神等等。这些传说都反映“图腾崇拜”的长期传统。

原始宗教的另一种形态是，认为万物有灵物活论。原始时代的居民，同自然界斗争的能力极其微弱，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往往使他们恐惧。对他们来说，自然界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十分神秘的东西。这就产生了崇拜自然的观念。他们崇拜那些与自己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自然现象和力量，于是江河、岩石、树木等都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

朝鲜常见的支石、立石等巨石文化，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实例。立石，就是把巨大的岩石（一般有二~三米高）作为自然崇拜的对象用人工竖立起来的。支石则如前所述，是以数枚巨大岩石支成的石墓。这种支石也来自对自然崇拜的观念，可以认为与当时对灵魂的观念、对死的恐惧和对死者的关怀有关。

物活论使原始人对死的看法发生变化。人虽死掉灵魂却继续生活在另一世界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他们认为，另一世界的生活，不论肉体和精神都同人世一样。于是，对死者感到恐惧的原始人，又对死者给予很大关怀。家有死者“辄捐弃旧宅，更作新居”涉貂族风俗，说明人们对死者的恐怖，而支石墓、石箱坟等原始时代坟墓则又说明人们对死者的深切关怀。随葬在这些坟墓里的，有各种生产工具、武器、装饰品和陶器等，因为他们认为，人死后在另一世界仍过着与人世间同样的生活。

除图腾崇拜、物活论等宗教观念外，在原始居民中还有另一种萌芽状态的信仰。他们认为人可以把自已的意志传给天，并利

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为自己服务。这就是巫术。后来，在巫术的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专门从事巫术活动的人——巫师。巫师专门为人们占卜，进行各种巫术活动。在茂山郡虎谷遗址里出土的野兽肩甲骨上发现多处火烙的痕迹。它的模样与我国殷墟出土的卜骨颇相一致。这无疑是视烙痕占卜的“卜骨”，与巫师的宗教活动有关。

原始时代的巫师具有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对自然的观察也有不少体会，因而在原始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很受人们的尊重。在马韩的历史上，长期设有祭天的神官，称之为“天君”，而某些部落的首长则兼任巫师，都可证明这一点。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同自然界斗争的力量极其微弱，从而产生上述宗教信仰。到了阶级社会，就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变成麻痹人民的斗争意识、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和剥削制度的工具。

第二章 朝鲜的奴隶制国家 ——古朝鲜和辰国

第一节 古 朝 鲜

一、古朝鲜国家的建立

古朝鲜是朝鲜历史上最初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它的原名是“朝鲜”，为了同后世的“朝鲜”区别开来，一般叫“古朝鲜”。

古朝鲜居民主要由涉族构成，其中也包含着貊族的一部分。涉族和貊族，在古文献中说法不一，有时分开来作为两个族——涉族和貊族，有时合起来作为一个族——涉貊族。这说明涉族与貊族有密切关系，它们是同属一族两个支系^①。古朝鲜的活动地区，大致包括现今朝鲜半岛西北部的一些地区。

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古朝鲜就已建立了国家。朝鲜史学界认为，古朝鲜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已经比较广泛地普及了青铜器，铁器也开始出现。古朝鲜很早就存在反映阶级分化情况的“犯禁八条”法律。这说明古朝鲜已经具备建立国家的物质和阶级基础。

古朝鲜与我国各王朝之间的关系，也可说明古朝鲜国家的建立过程。公元前七世纪，“朝鲜”一名已传到我国，古朝鲜的“文皮”等商品在齐国很受重视。公元前四世纪古朝鲜曾准备“逆击燕”。这时，古朝鲜的最高统治者已经称“王”，其下有相

^① 据古文献记载，当时由涉貊族构成的国家还有扶余，以今我国吉林省农安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最后（公元494年）被高句丽灭亡。

应的官僚机构和相当数量的武装部队。对此，《三国志》引《魏略》写道：“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部礼谏之，乃止。使社西说燕，燕止之不攻。”^① 当时的燕国，是个“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一年”^② 的发达的阶级国家。古朝鲜能同这样发达的燕国对峙，甚至要动员军队进行反击（后派使节，和平解决），就充分说明公元前四世纪古朝鲜的国家机构（包括军队）已经相当发展。至于古朝鲜建立国家的最初时期，无疑要上溯到比它更早的时期，可能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或前半期。

关于古朝鲜的建国问题，曾存在“檀君神话”，流传至今，影响较深。

檀君神话载于《三国遗事》、《帝王韵记》、《东国李相国集》东明王篇、《世宗实录》地理志等，材料中记述内容大同小异。这里仅以《三国遗事》中有关记载为例，摘录如下：“古记云：昔有桓因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神檀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

①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引《魏略》。

② 《战国策》卷二十九，燕一。

寅，都平壤城，始称朝鲜”。^①

古朝鲜的檀君神话，自古以来口碑相传，各时代都加以润色，最后载于十三世纪《三国遗事》等著作中，流传到今。因此，我们对檀君神话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做一简单分析。

第一，朝鲜史学界有人认为，“桓因”是佛语，它意味着“天”。这个词是佛教传入朝鲜后，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在神话中，“桓雄”和“檀君”都与“桓因”（天）联系起来，他们都是“桓因”（天）的子孙，这是神化自己祖先的手段，是一种敬天思想的反映。

第二，“天王”、“风伯”、“雨师”、“云师”等名称，反映当时已经出现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力机构。天的儿子“桓雄天王”是古朝鲜的最高统治者，“风伯”、“雨师”、“云师”是“天王”下边的官吏或权力机构的名称。

第三，“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反映了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阶级分化的情况下，为维持社会秩序而采取的措施。但是这里并未提及军事和奴隶等字样。

第四，“天王”下边的官吏或权力机构名称，都与天文气候中的风、雨、云有关，它们在管理对象中又首选提出“主谷”（管理农业），在神话中还出现谷物、艾蒿、大蒜等农作物，这都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的较高发展水平，说明农业在人们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第五，“时有一熊一虎”，应是当时的两个氏族，这里加上动物名称，是图腾制度的反映。神话中出现的“桓雄天王”，“檀君王俭”等都系男性，充分反映男权制已经确立。神话中还出现“太伯山”、“平壤”、“朝鲜”等名称，这对了解古朝鲜的地理历

^①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古朝鲜。

史有重要意义。

第六，“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唐高”指的中国传说中的唐尧，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

尧王“即位五十年庚寅”，大致相当于公元前二千三百三十三年，距今四千三百多年前，反映出檀君神话历史的悠久。

檀君神话的内容比较丰富，历史亦颇悠久，它对了解古朝鲜历史提供了比较重要的资料。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神话中人格化了的所谓檀君并非真实的具体人物，他只反映古朝鲜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走过的一定阶段，即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

然而，历来统治阶级却认为檀君实有其人，把它当作古朝鲜的初代国王，有的甚至使用所谓“檀君纪年”，这是极其荒谬的。

朝鲜历史上，关于古朝鲜的建国问题，除檀君神话以外还有箕子朝鲜传说：公元前十二世纪末或十一世纪前半期，我国殷朝贵族箕子，逃到朝鲜，建国称王，周武王胜殷后，承认既成事实，“封箕子于朝鲜”，为朝鲜开国之始。

长期以来，箕子朝鲜传说流传广泛，影响较深。今天，中外史学界仍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承认它的存在；另一种是否认它的存在。

笔者认为：箕子朝鲜传说不可靠，叙述上存在严重矛盾，缺乏科学根据，不便轻信。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家的统治机构

公元前一千纪，古朝鲜的社会生产力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青铜器广泛普及，出现青铜器文化的繁荣时期。

更重要的是铁的出现。铁在朝鲜出现于公元前七世纪前后，

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后广泛普及，质量也大为提高。朝鲜半岛西北部，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古朝鲜遗址中，经常发现较多的各种铁器。平安北道宁边郡细竹里的房屋遗址里，发现过铁斧、铁凿、铁铤、铁锹、铁镰刀、铁小刀、铁匕首、铁镞片、铁戈等各种铁制生产工具和武器，却很少发现青铜制品，甚至未发现以青铜短剑为中心的具有朝鲜青铜器时代特征的典型遗物。这说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以来，古朝鲜已经广泛使用铁器，而且能用铁器代替青铜器。特别是当时古朝鲜人民已经懂得炼钢技术，并且制造一些钢铁工具。

铁制工具的广泛普及，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分工，更大地增加了积累剩余产品的可能性。

农业，在古朝鲜早已成为基本生产部门。朝鲜史学界认为，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古朝鲜已经用牛或马从事犁耕农业。另外，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古朝鲜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铁制农具，这些铁制农具在当时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据《史记》记载，公元前二世纪末，古朝鲜右渠王“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遂不渡溟水，复引归。”^①古朝鲜准备一次送给我国西汉王朝五千匹马和大量军粮，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当时的农业和畜牧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与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有了发展。公元前一千纪，古朝鲜人民已经从事冶金（包括青铜和铁）、金属加工、武器制造、造车、造船、纺织、皮革、陶器、砖瓦、木工等各种手工业生产活动。

古朝鲜人民通过上述各种手工业生产活动，制造了相当精美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

的手工业制品。其中，最出名的是琵琶型铜短剑和继而发展的细型铜短剑，它们构成朝鲜青铜器文化的特点，是朝鲜青铜器文化的典型代表。又据文献记载：“其田民饮食以笏豆，都邑颇仿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①，从这一文可以看出古朝鲜的木器制造业已相当发展，而且形成了城市。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古朝鲜与我国各王朝有较多的贸易往来。

古朝鲜在公元前七世纪时，已与我国春秋时期的齐国进行贸易。他们以文皮（虎皮）、貔皮、赤豹皮、黄熊皮和毳服（内外用毛制作的一种衣服）同齐国进行交易。这些物品，尤其是古朝鲜的文皮，在齐国引起重视。我国《管子》等书，一再提及这种物品，而齐国的“斥山”（今山东省荣城县海岸），则以朝鲜文皮的集散地而知名，因此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②这句话，说明当时齐国和古朝鲜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古朝鲜与燕、西汉等王朝之间的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今天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我国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明刀钱，它成为当时燕国与古朝鲜贸易往来的有力物证。西汉王朝也重视与古朝鲜的贸易。《史记》写道：“东馆涉貂、朝鲜、真番之利。”^③尤其是公元前128年，涉君南闾归化西汉，西汉政府投入巨大人力和财力设置了沧海郡，以致“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其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开拓通往朝鲜的商路。^④

①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乐浪郡条。

② 《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第9页，开明书店1951年版。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④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

生产力的新发展，带来私有制和奴隶制经营的不断扩大。作为古朝鲜的古老法律而闻名于世的“犯禁八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奴隶制经济和阶级分化情况。这八条法律是一个成文法，但流传至今只剩下三条。值得注意的是，约在两千年前撰写《汉书》的我国史学家，也不知道“犯禁八条”的全部内容，而只知道其中三条，并把“犯禁八条”与上古时期的箕子联系在一起，这就说明“犯禁八条”是从遥远的古代开始流传下来的。

关于犯禁八条的内容，我国《汉书》记载：“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欲犹羞之，嫁取无所讎……妇人贞信，不淫辟”。^①

从这残缺不全仅剩三条的古代法律，可看出古朝鲜私有制的发展，阶级矛盾的尖锐，它是一种完全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法律规定。“相伤以谷偿”，证明私有制有了发展，并用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富人利益。“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的规定，不仅说明当时存在奴隶制度，也说明奴隶买卖的存在，用“五十万钱”可以买卖一个奴隶。“相杀以当时偿杀”的规定，无疑反映了阶级出现后阶级矛盾的尖锐，使得必须提出维护统治秩序的措施。“妇人贞信，不淫辟”，能使我们看出当时已严格强调女子贞操，反映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

可见，“犯禁八条”比较清楚地说明古朝鲜的私有制和阶级分化情况，可以说实行“犯禁八条”的古朝鲜就是奴隶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国家。可惜的是“八条不具见”而只剩三条，如果全部存在，无疑能进一步说明古朝鲜社会的阶级矛盾以及形成国家的具体情况。

^①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奴隶制经济的不断扩大，奴隶制国家的统治机构逐步完备。

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在有关古朝鲜的文献记载上，公元前四世纪时出现“王”的称号，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时见到王位世袭制度。如公元前三世纪末，否王去世，他的儿子准继承王位，史称准王；公元前三世纪初，卫满经过政变夺得国王宝座，他死后王位传给儿子和孙子。实际上古朝鲜的王位世袭应该更早。

国王的下边有“裨王”、“相”、“大夫”、“博士”、“将军”等官职，分管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事务。在这些国家最高官职的下边，可能还有各级官吏和官僚机构，国王通过他们对全国施行统治。

地方，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一种是国王的直辖区，另一种是设在各地的侯国。古鲜把国家的中心地区和其它一些地方划为国王的直辖区，通过有关官僚机构，由国王直接统治。此外，古朝鲜还有不少侯国。如在准王时期，卫满曾是古朝鲜西部边境的侯国王；南闾是古朝鲜涉族地区的君王，也可算是一种侯国王。古朝鲜通过征服战争吞并涉族地区后，并不直接统治该地，而是在那里设一侯国，任涉君南闾为侯国王，通过他统治这个地区。

侯国王作为古朝鲜国王的臣下，从属于古朝鲜国王，负有各种义务，但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各侯国都有自己范围内的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行政单位，这说明古朝鲜的中央集权尚未得到加强。

公元前二世纪以来，由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衰弱，各侯国迅速扩大势力，加强独立性，有时直接反对国王，甚至把它推翻，夺取国家政权。公元前二世纪初，卫满推翻准王政权，建立卫满

朝鲜，就充分表明这一点。

三、卫满朝鲜的建立 古朝鲜人民反对汉征服者的斗争

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古朝鲜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但是，在奴隶制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要增长奴隶主阶级对财富的掠夺欲望。他们进一步加强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压迫。广大的奴隶和平民被迫起来反对残酷的奴隶制剥削，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奴隶制度遇到严重危机。而在统治阶级内部，随着奴隶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为掠夺奴隶和土地而进行的战争也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各侯国的地方贵族，便在这种兼并战争过程中日益扩大自己的势力，有些侯国甚至直接反对古朝鲜的中央统治。公元前 218 年“涉君南闾畔（叛）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① 可反映当时古朝鲜内部的矛盾情况。

在对外方面，古朝鲜与燕国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当时，古朝鲜统治阶级“稍骄虐”。公元前三世纪初“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②

中国秦末汉初，战乱频繁，北方“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其中也有卫满等人。公元前 195 年，燕人卫满带领千余难民归化古朝鲜。古朝鲜王准“信宠之，拜以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③

卫满初到古朝鲜时，只带领一批难民，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后来，“满诱亡党（西汉难民），众稍多”，^④ 并利用古朝鲜奴隶

① 《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五，东夷传，涉条。

②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条，韩引《魏略》。

③ 《史记·朝鲜列传》卷一百一十五；《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引《魏略》。

④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条，韩引《魏略》。

制社会的内部矛盾，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公元前194年，卫满联合反对国王的政治势力，举行政变，“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为借口进攻首都王俭城^①。准王遭到突然袭击，从海上亡命辰国的马韩地区。卫满继王位，国号仍叫朝鲜，史称“卫满朝鲜”。古朝鲜政权归属于以卫满为首的新的统治阶级。但是，卫满不能破坏古朝鲜原有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反而因袭了它。他本人也穿上古朝鲜的衣服，编了“魁结”。同卫满妥协的原古朝鲜统治者，被封为稗王、相、大臣、将军等称号，加入新的统治阶层，保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卫满等新统治者在巩固自己政权的基础上，进行了征服四邻诸侯国的战争、并将真番、临屯等诸侯领土并入自己版图。于是，卫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其疆域“方数千里”。到古朝鲜右渠王（卫满之孙）时，因与汉王朝发生矛盾，卫满朝鲜竟能切断汉与“东方各国”的通路。

汉朝政府为了确保与“东方各国”的商路，企图吞并古朝鲜，终于在公元前109年，发动了征服古朝鲜的战争。汉朝军队从海陆两路进攻古朝鲜。古朝鲜军队奋战汉的五万大军坚守边境，保卫国家，给汉军很大打击。但是，由于古朝鲜统治阶级对战争胜利缺乏信心加上内部分裂，战况日益恶化，汉军终于包围了京都王俭城。

古朝鲜人民为保卫王俭城动员起来继续战斗，打击了汉入侵军，使其不敢轻易入城。王俭城被围数月之久，城内情况异常严重，人民虽然进行殊死战斗，统治集团却发生了动摇。

公元前108年夏，由于部分统治者的叛变投降，古朝鲜京都

^① 关于王俭城的位置，中外史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认为为今朝鲜平壤，另一种认为今中国辽河流域。

王俭城的防御陷入混乱状态，面临危机。这时，古朝鲜右渠王被投降分子所杀害。但是，人民在大臣成已的领导下，继续固守王俭城，进行了决死的战斗。不久，成已也被叛徒最等人杀害，王俭城终于陷落，古朝鲜遂灭亡。

公元前 108 年，汉王朝在古朝鲜领域及其附近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等四郡。其中，玄菟郡是公元前 107 年设置的。^①

四郡设有汉的太守及其他官吏。郡下设县（如乐浪郡有二十五县）。各县不仅有汉人官吏，而且有古朝鲜出身的官吏，他们被汉政权封为“侯”爵，参与了统治。四郡中，乐浪郡是汉统治者掠夺古朝鲜人民的政治经济中心。汉朝征服者和同它勾结的古朝鲜贵族，对四郡居民的剥削极为残酷，社会矛盾逐日扩大。古老的“犯禁八条”废除后，人民又受到了六十多条新法律的束缚。广大人民遭受重重剥削，变得日益贫困。

古朝鲜人民坚决反对汉统治阶级的征服，他们在反对同征服者妥协的古朝鲜统治者的同时，也和汉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于是，自汉设四郡以后仅仅过了二十七年，就不得不撤消真番郡和临屯郡，玄菟郡被挤到西北方。这些都说明古朝鲜人民反征服

① 关于汉四郡的位置，中外史学界有多种不同看法。今介绍其大致情况如下：

乐浪郡：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认为今朝鲜大同江流域，第二种认为今中国辽河流域；

真番郡：主要有五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认为今中国辽东半岛，第二种认为今鸭绿江中游地区，第三种认为今朝鲜黄海南北道，第四种认为今朝鲜江原道地方，第五种认为今朝鲜忠清南北道地方；

临屯郡：主要有四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认为今鸭绿江下游地方，第二种认为今朝鲜咸镜南道地方，第三种认为今朝鲜江原道地方，第四种认为今朝鲜京畿道地方；

玄菟郡：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认为今鸭绿江中游，第二种认为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地方。

斗争的巨大胜利。

到公元初，在乐浪郡爆发当地居民王调领导的武装起义。这支起义军处决了汉人太守，由王调任“大将军乐浪太守”，为驱逐汉势力进行了近十年的斗争。这支起义军最后由于政治上没有建立牢固的基础而失败，但它打击了汉的郡县统治，打击了古朝鲜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

汉四郡的设立，客观上密切了古代中朝两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文化交流。各郡县，不仅有汉的官吏，而且从汉来的商人频繁进出，通过乐浪郡，同朝鲜各地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因而使汉朝先进的封建文化大量传入古朝鲜，对促进古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节 辰 国

一、辰国的建立及其社会经济和国家机构

辰国是建立于现今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古代国家，由马韩、辰韩、弁韩等三韩族形成，大约是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奴隶制国家。

辰国的中心地区是“月支国”，约在今朝鲜忠清南道的稷山；它的末期，国都南迁至“国邑”，即今锦江以南的益山附近。

朝鲜半岛中南部，气候温暖，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它成为朝鲜古代文化发祥地的一个中心。同时，这个地方很早以前就与古朝鲜、中国和日本等国有一定往来和文化交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公元前四、三世纪以后，辰国已较普遍地使用了金属工具，

其中包括青铜器和铁器^①。据古文献：“国出铁，韩、涉、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②这当然是描写公元以后时期的情况。但考虑到文献中所描写的铁的普及程度、尤其在公元前后的金海贝塚中发现了铁器、铁块等，可以推测弁辰地区的铁不仅在公元后才成为国际性商品，有可能在公元前就已供应日本和汉乐浪郡等地，这种铁曾通过“拘邪韩国”（今朝鲜半岛南端的金海）输往各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迅速得到发展。据《三国志》记载，弁辰地区“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后形成的金海贝塚中，与铁器、铁块一起出土了炭化了的大米粒，这表明辰国时期已经种稻。至于种稻的开始，则可上溯到更早的古代。据了解，近年来在朝鲜京畿道骊州郡占东面欣岩里的青铜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到目前为止最早的、公元前五六世纪的、一把炭化了的大米”^③。据发掘人员说，这里出土的大米，是朝鲜历史上最古老的大米，“大米的品种是小粒的（长四毫米，宽二点五毫米）尚不发达的北方扎波尼卡种”，“比日本的……要早三二百年左右。”^④可见，辰国马韩地区早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时就已种稻；而到公元前后，水稻在弁韩地区也得到普及。《三国史记》写道：公元33年2月，百济多婁王“下令国南

① 《朝鲜通史》上，第43~44页，1977年版；《朝鲜全史》卷二，第186~198页。

②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弁辰条。

③ 韩国《东亚日报》，1977年2月15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77年3月23日。

④ 韩国《东亚日报》，1977年2月15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77年3月23日。

州郡，始作稻田。”^①但这并不是指朝鲜种稻历史的开始，而只能说明是百济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种稻措施。

辰国不仅种水稻，而且还种稗子、大麦、大豆、谷子等，此外，还生产蔬菜和水果。这个地区五月播种，十月收获。播种和收获和季节都是人们的节日。古文献写道：“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②。

手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其中青铜制造业尤显著。迄今出土的当时青铜器有：细型铜短剑、铜戈、铜枪、铜铃、细纹铜镜等，还有各种青铜器的铸范。养蚕和织布也很发展。马韩的“绵布”（用蚕丝织的）、弁辰的“缣布”都闻名国外。公元前一世纪前半期，一次就向汉乐浪郡送“布万五千匹”，说明当时织布业已有较大规模的发展。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据古文献，辰国弁辰地区“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说明已经出现铁货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辰国边远地区的市场上都已出现货币，那就更不用说它的中心部马韩地区的情况了。铁货币的出现，充分说明辰国商业有较程度的发展。辰国的对外贸易也有相当的发展。公元前二世纪，辰国商人同汉的贸易较为活跃；公元前后，又同汉乐浪郡频繁来往，进行较大规模的贸易。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明刀钱和货泉等我国战国时期的燕国和公元初的新王朝货币，都可反映当时辰国与我国各王朝之间的贸易情况。

在辰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很早就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奴隶制度日益发展。据《三国志》，公元一世纪前半

^① 《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多婁王6年条。

^②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条，韩引《魏略》、辰韩条。

期，辰国将抓来的一千五百名汉人俘虏“皆断发为奴”，强迫他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三年过后，一千五百名奴隶中死掉五百名^①。这个史料反映的虽是辰国末期情况，但通过它可推知奴隶制在辰国早已有了较大发展。

在现存历史文献中，辰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明显出现，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这从辰国与古朝鲜、汉朝的通商或人民往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公元前三世纪末，我国秦朝时期的被压迫人民“避秦役来适韩（辰）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②公元前二世纪末，辰国国王派使臣带国书前往汉朝，欲与之建交，但因古朝鲜右渠王的阻挠而未达到目的^③。

上述事实可说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已由马韩贵族即由辰王支配了整个三韩地区，表明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辰国，已经建立起来。古代我国的史学家在叙述三韩的历史时也曾说，三韩“皆古之辰国也”，并给我们留下有关辰国国家官僚机构等方面的片断记载。

辰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国王下边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等官吏。其中“中郎将”是国王的最高警官，“都尉是最高武官。辰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常备军队。

地方有许多“小国”。辰国原由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部分组成。马韩在西边，“凡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辰国王兼任马韩王，在他的下边有“臣智”和“邑

①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条，韩引《魏略》、辰韩条。

②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条，韩引《魏略》、辰韩条。

③ 《史记》卷一百十五，朝鲜列传；《汉书》卷，朝鲜传；《朝鲜全史》卷二，第158～159页。

借”，是管理马韩各“小国”的地方官吏。辰韩在马韩之东“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弁韩“亦十二国”。“弁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辰韩和弁韩，各有侯王（辰韩王和弁韩王），由马韩贵族担任，从属于辰国王。在辰韩和弁韩王的下边各有：臣智、险侧、樊涉、杀奚、邑借等各地方官吏。

在辰国，各小国尤其是辰韩和弁韩以及它们管辖的小国都有相对独立性。小国各级官吏中，势大者治万余户，势小者治六七百户。作为这些小国统一体的国家，设有以辰王为最高统治者的辰国统治机构，以剥削和压迫人民。

二、奴隶制社会的危机 辰国的分裂

公元前二世纪，是辰国奴隶制有所发展和国家比较强盛时期。这时，北方的古朝鲜及其周围的各阶层人民不断南下，迁入辰国。公元前194年，古朝鲜准王被卫满赶走，带领一批人亡命到辰国。辰王收容了他，将其安置在一定的地方。准王在辰国的边远地区成立一个小国，号“韩王”。他死后，这个地区并入辰国。公元前二世纪末，在古朝鲜右渠王统治时期，又有古朝鲜大臣历谿卿带二千余户居民亡命辰国。据《三国史记》，“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是为辰韩六部。”^① 上述事实证明，大量的古朝鲜人民曾迁入辰国。

于是，每当北方发生政治事变时，都有大批的古朝鲜各阶层人民（包括从河北、山东等地移来的中国难民）不断移入辰国。这些移民集团虽然隶属于辰王，但他们形成一种地方势力，促进了辰国社会的内部变化。

^① 《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始祖即位年条。

公元前二世纪，辰国的经济有较快的发展，社会的阶级矛盾随之日趋尖锐，使辰国在政治上发生动荡。广大的奴隶们用怠工、逃跑、起义等各种方式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反对反动的奴隶制度。《三国志》记载：“诸国（地方）各有别邑，名之为苏涂。立大木，悬铃鼓，事鬼神。诸亡逃至其中，皆不还之，好作贼。”^① 这一方面表示“苏涂”不可侵犯的宗教权力，另一方面也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一个侧面。这些所谓“好作贼”的罪犯，就是反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而逃出来的奴隶，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

当时，在辰国的奴隶制社会内部，生产力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而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有些小国在征服战争过程中改变过去的奴隶制剥削方式，采用新的收租税的剥削方式。于是，辰国奴隶制社会内部开始产生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据《三国志》，马韩“下户诣郡（乐浪郡等）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余人”^②，这可说明马韩的“下户”已经不是奴隶，而是处于农奴地位的农民，这是阶级关系改变的一种反映。

公元前后，由于地方（小国）封建势力的抬头，辰国的政治危机加剧，统治机构逐渐瓦解。

公元前后，在辰国马韩地区的汉江下流，形成了一个封建势力的政治中心——百济国；在辰韩地区即今庆州地方和洛东江下游，分别形成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中心——新罗和伽倻。

辰国终于分裂。辰国的原统治集团迁都到全罗北道益山地区，企图收拾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但是，旧的奴隶制国家的辰国急剧衰落下去，终于变成一个小国，公元一世纪中叶为百济所

^①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条。

^②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条。

并。

第三节 古代朝鲜的文化

一、科学技术

古代朝鲜的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是冶金技术。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古代朝鲜的青铜器文化已达到繁荣时期。考古发掘表明，代表朝鲜青铜器文化发展水平的文物，主要为青铜短剑。

青铜短剑可分两种：一种是较早时期的琵琶型短剑，另一种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短剑特点的细型铜短剑。

琵琶型短剑，形状近似古代乐器琵琶，因此叫作琵琶型短剑。这种青铜短剑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出土。朝鲜史学界认为，使用琵琶型短剑的时期，是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或公元前八至四世纪）。

琵琶型短剑的主要特征是，剑身、剑柄头分别制作，然后装配起来。短剑由形如琵琶的剑身、倒丁字形的剑柄以及插或绑在剑柄头上的剑柄组成。剑柄上精巧地浮刻着几何纹和闪电纹等。

琵琶型短剑以其精巧的结构、朴素的纹样以及优美的造型，不愧为一种青铜工艺品。

细型铜短剑继承和发展了琵琶型短剑的形状和结构。细型铜短剑与琵琶型短剑一样，剑身和剑柄、剑柄和柄头都是装配式的；而剑身则比琵琶型短剑窄，两刃凹陷部分，这是它的特点。

细型铜短剑至今已出土数百柄，除朝鲜北部部分地区外，几乎所有地区都曾出土。细型铜短剑从形状和质量来看，比琵琶型短剑更为精致。朝鲜史学界认为，使用这种细型铜短剑的时期是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期（或公元前三至一世纪）。

琵琶型短剑和细型铜短剑，构成朝鲜青铜器文化的特点，是它的典型代表。此外，朝鲜青铜器文物还有各种车辆零件，形状多样、花纹奇特的虎形和马形带钩，各种形状的铜铃（如八手形铜铃）、铜铎、细纹铜镜等，均为当时艺术品的代表作。

当时，天文学也有较高发展。公元前三世纪末，古朝鲜已设有博士官职，古朝鲜准王曾任命卫满为博士，这说明古朝鲜在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已有一定的制度。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古朝鲜就有博士这类官员专门研究天文历学等科学技术。

二、宗教和哲学思想

古代朝鲜宗教，与其它所有古代国家宗教一样，也同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残余结合在一起。奴隶主阶级对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宗教和迷信思想进行加工，制造出符合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各种宗教，来神化国王权威，维护剥削制度，其核心则是敬天思想。“檀君神话”即是原始图腾、祖先崇拜和敬天思想相结合的典型一例。神话中说，檀君的母亲是熊的化身。又说檀君的父亲是天帝桓因的儿子桓雄。古代朝鲜诸族每年都有祭天仪式，叫作“舞天”，这说明敬天思想相当盛行。作为古代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敬天思想，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过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进一步向反动的方向发展。

朝鲜史学界认为，古朝鲜时期已经产生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它将世界看成阳气和阴气的对立统一，并依据阴阳的对立统一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后来，这一进步思想丰富了“五行”思想的唯物部分，使古代朝鲜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

证法得到进一步发展。^①

还有一种进步思想，就是“仙”。仙的思想认为；人的生命不存在于天，而在于人的肉体的健康与否，服用良药就可以使身体健康，延年益寿。

在仙的思想中多少包含着无神论的因素，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它促进了古代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思想在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进一步得到发展，据说它曾传到中国，因此古代中国人称朝鲜为“长生不老之国”。古代朝鲜与中国之间，很早就开始了贸易和人民往来。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以来，这种关系更加活跃，促进了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朝鲜境内曾发现过大量明刀钱和安阳布等中国战国时期的货币和各种金属工具。据称，朝鲜西北部六个地方出土的明刀钱约有数千枚，这些明刀钱上铸有“左”、“右”、“行”、“匕（化）”等很多汉字^②。各种布钱和其它钱币上也铸有一些汉字。此外，大同江流域平壤附近曾发现铸有二十多个秦篆体汉字的中国秦王朝时期铸造的铁戈（秦戈），还发现了公元前41年西汉元帝时铸造的“汉孝文庙铜钟”，上面铸有近二十个汉字。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汉字同各种金属器具一起，早在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已经传入朝鲜。

随着汉字的传入，儒家思想也传入朝鲜。

“早在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一些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

^① 《朝鲜通史》上，第二章，第四节，1962年，朝鲜科学院出版社；《朝鲜哲学史》上，第2~3页，1962年，朝鲜科学院出版社。

^② 《朝鲜考古学研究》，第101~102页、196~211页，日本京都高桐书院1918年版。

和《春秋》等”。这说明当时朝鲜已有不少专学儒家经书的学者。汉字和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对古代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朝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曾起过促进作用。

三、文学和艺术

古代朝鲜人民的文学遗产传到今天的，除檀君神话等口头文学外，还有一首诗。这是一位无名妇女的作品。这首诗由一个名叫丽玉的妇女谱以箜篌曲（箜篌是乐器名），以“箜篌引”的曲名载于我国的《古今注》。诗的全文是：“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或淹）河而死，当奈公何？”^①

这首诗以四言诗的形式记载于古书中，它类似我国古代《诗经》中的短篇。它的产生经过是：“箜篌引”谱曲者丽玉的丈夫艚工霍里子高，一日清晨，到渡口划渡，见一老者，披头散发、手持一瓶，疯疯颠颠，涉河横渡。其妻紧紧赶来，劝阻不及，夫已堕河而死。老人死后，妻乃弹箜篌以歌，表达内心悲痛，随后也跳河自杀了。她唱的歌就是这首诗。霍里子高回家后，把目睹的惨状告诉妻子丽玉，丽玉用箜篌为老妇的诗歌配以乐曲，即“箜篌引”。

这是一首古代的抒情歌曲，以在冷酷的阶级社会饱受剥削之苦终遭悲惨命运的一家人的生活体验为题材。从这里可看出，歌曲、乐器已同古代朝鲜人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他们抒发的情感，虽还比较单纯朴素，但已达到相当水平。

古代朝鲜的民间音乐和舞蹈也很发展。歌舞一般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大体上都带有宗教仪式的形式。古朝鲜每年十月秋收后，都隆重举行舞天的宗教仪式，人们“昼夜饮食歌舞”。辰

^① 《古今注》卷中，音乐第三；《朝鲜通史》上，第二章，第四节，1962年版。

国每年都在五月播种和十月秋收之后，举国上下举行祭天仪式。人们载歌载舞，共同欢乐，充满节日气氛。《三国志》描述辰国的这种群众性舞蹈时说：“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奏节，有似铎舞”^①。看来，这近似今天的农乐舞。可见，朝鲜固有的民族舞蹈其历史是多么悠久。

^①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条。

第三章 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三国时期

第一节 三国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

朝鲜奴隶制国家古朝鲜和辰国灭亡之后，先后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史称“三国”。三国时期是朝鲜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虽仍存在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但封建制度已占统治地位。

一、高句丽国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

高句丽本是貊族的一支。《三国志》记载，高句丽为扶余别种，语言多与扶余同，说明高句丽与扶余有密切关系。

据传，高句丽创始人朱蒙是扶余的贵族。他在扶余王室受到排斥，同乌伊、摩离、陔父等人一起南下，到卒本地区（今我国辽宁省桓仁县）同土著势力结合，于公元前三十七年，建立高句丽国家^①。高句丽建国的过程，也是征服战争的过程，尤其是第二代王琉璃王迁都国内城（今我国吉林省集安）后，战争更为频繁，先后征服了邻近的沸流、盖马、荇人、曷思、梁、貊、东沃沮、句茶、朱那等地方势力。到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其势力扩

^① 《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东明王。

展到清川江一带，成为较大的国家。

高句丽建国时期，逐步形成封建制度，这种封建制度基本上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句丽建国前后时期，生产力有显著发展。考古资料证明，公元前一世纪，高句丽人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制造出各种工具和武器。慈江道时中郡鲁南里和中江郡土城里发现高句丽初期的两处铁场遗迹。这两处遗址中都有冶铁炉的遗迹和各种冶铁的遗迹，还出土不少铁渣。这说明高句丽建国初期就冶炼大量的铁，制造了各种生产工具。这时期的铁器遗物出土于慈江道时中郡和中江郡一带的高句丽古坟中。主要遗物有铁斧、铁矛、铁绊钉、腰带扣等。据朝鲜考古学者化验，这些铁制品大多数是锻铁或钢铁的。古朝鲜的铁器以铸造为主，到高句丽时，冶炼技术进一步提高，制造出大量的锻铁制品和钢铁制品。公元后，更加广泛地使用铁制生产工具。慈江道满浦郡一带和其他各地还出土了铁犁、铁斧、铁锄、铁刀等生产工具。铁制生产工具的大量制造和广泛使用，标志着高句丽生产力的显著发展。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高句丽封建制逐步形成。

高句丽建国前夕，已有新兴封建地主的私有土地。在高句丽建国过程中国王以“食邑”或“赐给”等形式把土地分给功臣和贵族，促进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三国史记》中屡有封赐“食邑”的记载。琉璃王十一年（公元前九年）王用扶芬奴之计攻破鲜卑后，“王念扶芬奴功，赏以食邑。”扶芬奴辞而不受，“王乃赐黄金三十斤，良马十匹。”^①新大王八年（公元172年）王用明临答夫之计，大败汉兵；“王大悦，赐答夫坐原及质山，

^① 《三国史记·高句丽史记》卷十三，琉璃王。

为食邑。”^① 东川王二十年（公元246年），魏遣幽州史毋丘俭进攻丸都城，东川王败退南沃沮，其将密友、纽由、刘屋句保卫国王，击退魏兵，“王复国，论功，以密友、纽由为第一，赐密友巨谷、青木谷，赐屋句鸭绿、杜纳河原，以为食邑。追赠纽由为九使者，又以其子多优为大使者。”^② 可见，高句丽前期，曾多次封赐食邑。食邑虽是赐以土地的受租权，但逐步变为私有地。与此同时，国王还直接赐田。琉璃王三十七年（公元19年），“王子如津溺水死，王哀恻，使人求尸，不得。后沸流人祭须得之，以闻，遂以礼葬于王骨岭。赐祭须金十斤，田十顷。”^③ 新大王二年（公元166年），国王将狗山濼、娄豆谷二地赐给前王子邹案。^④ 这些受食邑者和受田者，无疑占有了大片土地，以收租形式剥削农民。这些贵族和功臣不仅占有大片土地，还为扩大自己的土地，不断进行土地兼并。故国川王二十年（公元190年），“中畏大夫沛者于畀留、评者左可虑，皆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其子弟并恃势骄侈，掠人子女，夺人田宅，国人怨愤。”^⑤ 这种土地兼并现象说明高句丽国的贵族官僚占有大量私有地，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私有地。据上述史实可窥见高句丽的土地私有制。

同时，高句丽还有自耕农的私有地，但其数量不太多。《三国志》记载：高句丽国“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⑥ 通过这一记载，可了解到，高句丽国确实存在着以一家

①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卷十六，新大王。

②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卷十七，东川王。

③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卷十三，琉璃王。

④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卷十六，新大王。

⑤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卷十六，故国川王。

⑥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高句丽传。

一户为单位进行生产、把自己的产品收藏在“桴京”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有少量的私有地。故国川王曾任用乙巴素，乙巴素被任用前，在西鸭绿谷左勿村“力田自给”^① 所谓力田自给，就是占有少量土地、自给自足的自耕农。

此外，高句丽国家还有国有土地。国有土地由国王直接管辖，直接收地税。

综上所述，高句丽国家存在着封建地主的私有土地，自耕农的私有土地和国家的国有土地，其中，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

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引起阶级结构的变化。我国古书记载：高句丽国内“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提米粮鱼盐供给之”。^② “大家”显然是指占有土地的封建地主，“下户”则为缴纳实物地租的封建依附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可见，高句丽国内有两大阶级，即“大家”和“下户”。“大家”是占有大片土地并将土地租给农民、收取田租的封建贵族官僚等统治阶级。“下户”是无地的依附农民，他们租种“大家”的土地，缴纳地租，遭受“大家”的残酷剥削。

高句丽还有数量不少的奴婢。奴婢分两部分：一是同主人别居，从事生产劳动的别居奴婢；一是与主人同居，充当仆人的率居奴婢。他们都是社会最下层人，受到最残酷的剥削。

此外，高句丽国内还有自耕农，手工业等良人阶层。他们具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劳动，向国家缴纳田税、贡物、承担徭役、兵役等义务，受到封建国家的剥削。

高句丽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以国王为首的“大家”等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为了统治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封建统治体系。高句

^①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卷十六，故国川王。

^②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高句丽传。

丽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建国初期，国王之下设置辅佐国王的最高官职——大辅。不久，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把大辅分为左辅和右辅，他们掌握国家的政权和军权。

高句丽建国初期，把以国内城为中心的地区，划分为桂娄、涓奴、顺奴、绝奴、灌奴五部。国王直辖桂娄部，并拥有控制其他四部的权力。

综上所述，高句丽建国时期，逐步形成封建制度。虽仍存在着奴隶制度残余，但封建制度已占统治地位，有力地推动了高句丽社会的发展。

二、百济国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

据传，建立百济国的温祚王是高句丽朱蒙王的儿子。在辰国处于分裂状态时，温祚同一部分高句丽人一起南下，到汉江下游地区定居，在那里同当地新兴封建势力结合，形成一支新的封建政治势力。他们由于带来了北方的先进文化，又继承了辰国的文化，因而迅速发展起来。到公元前后，百济迅速壮大，不断向南发展，占据锦江以北地方，经过征服战争，又占领马韩地区。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百济已成为较大的封建国家。

百济建国前后，汉江下游地区生产力相当发展。今京畿道杨州郡曾发现炼铁手工业的者的房址，出土了铁斧、铁小刀、铁镞和铁渣。京畿道加平郡也发现房址，在这里挖掘出两件铁块以及冶铁炉遗迹。这些考古资料说明，百济建国前后时期已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加之先进的高句丽生产工具和技术传入汉江流域，尤其是由于温祚等高句丽人南下，带来北方的先进文化，因此，使百济建国前夕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百济国在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了封建生产关系。

百济国土地所有制包括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

所有制和自耕农私有土地制。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最基本的。百济建国初期就存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在建国和扩大领土的过程中，国王又以赐田和食邑的形式，把土地分给贵族和功臣，从而助长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百济建国初期，就存在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叫做“民”、“人”、“庶”、“百姓”的农民阶级。为了和奴婢相区别，称农民为良人。良人是百济本部的农民和征服地区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地主阶级主要剥削对象。在良人中，一部分是占有少量土地和简单生产工具的自耕农，另一部分则是自己无地，租种地主土地和国家土地的依附农民。他们受封建国家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向封建国家缴纳田税和贡物，并向地主缴地租。封建国家把农民作为徭役劳力的来源。据《三国史记》，国家的大规模工程都依靠十五岁以上的劳力来完成。除良人外，还有不少奴婢。当时奴婢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和破产的良人。奴婢中的一部分是在主人家里当仆人的率居奴婢，多数则与主人别居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生产品全被主人掠夺。主人把奴婢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进行买卖。百济的统治阶级是南下的高句丽系统势力和土著封建势力，他们掌握国家大权，残酷地剥削人民。

公元一世纪中叶，百济基本上具备了封建国家体制。中央有左辅、右辅大臣和高级官僚，按照封建等级制组成。地方行政制度，起初只分南北两部，两部之下设置许多城邑，由南北两部管辖。

三、新罗国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

新罗国的中心地区是现在的庆州。庆州地区是韩族早就定居的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该地区原有六个村庄，六村贵族是建立新罗国的骨干。据传说，六村村长共推朴赫居世为居西干，建

立了小国。公元二世纪初，以六村为中心的封建势力开始扩张，向北开辟了尚州以北的鸟岭地区，西渡洛东江上游，扩张新的领土。公元二世纪前半期，新罗已经建成封建国家。

新罗建国前后，庆州地区的生产力相当发展，已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考古资料证明了这一点。从庆州地区的古坟中出土了铁耙、小铁锄。从庆尚南道昌宁地区的古坟中出土了铁锹。此外，其它各地还出土了铁镰等生产工具。这就说明当时已经广泛使用各种铁制生产工具。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说明新罗的生产力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新罗建国初期，并存三种土地所有制，即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自耕农的私有土地和国家的直属地。其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是最基本的所有制形式。新罗建国前夕，就已存在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建国和扩大领土的过程中，国王以赐田或食邑形式把土地分给功臣和贵族，从而加强了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现在找不到新罗建国初期的赐田和赐食邑的记载，但到六至七世纪时，国王曾多次赐田和赐食邑。新罗法兴王十九年（公元532年）冬，“驾洛国王金仇衡降于新罗王，授位上等，以其国为食邑。”^① 真兴王二十三年（公元562年），国王把良田和战俘二百名赐给镇压大伽倻“叛乱”的将军^② 这些资料虽都是六世纪的，但通过这些资料，不难看出在新罗盛兴食邑制度和赐田制度，可能是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的。食邑虽不是土地的完全私有，但这些食邑逐步变成私有土地。另一方面，受食邑者以食邑为基础，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遂占有大片私有地。此外，还有自耕农的私有土地，但由于它不断被地主兼并，因而这种私有土

^① 《东国通鉴》卷五，三国纪，法兴王。

^② 《三国史记》卷三十八，杂志，第七。

地越来越少。新罗还有国家的直属地，国王和各级官厅直接收取地租。

新罗的被统治阶级中有良人、奴婢、部曲民。古书记载，称良人为“百姓”或“民”。良人中，一部分是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无地的佃农，他们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统治阶级剥削的主要对象。奴婢是最受剥削和身分最低的阶层。主人把奴婢当作财产，可随意买卖。部曲民是近似奴婢的贱民。新罗统治阶级在进行征服战争中，对不投降的地方以武力征服后，设置特殊的行政机构一部曲、乡、所，把当地人民变为部曲民，对他们进行更残酷的剥削。

新罗的统治阶级，是以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官僚和地主。新罗贵族实行骨品制把贵族分为圣骨、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五个等级，根据不同等级分别订出担任官职的最高限度。

新罗在建国初期实行贵族民主的政治制度，王位由朴、昔、金三姓交替继承，经“和白”会议一致同意才能成为国王。新罗把中央地区分为六部，地方分成五十二个城邑，六世纪以开始实行郡县制度。

四、六伽倻

三国各自形成国家以后的若干年代，在洛东江流域还有一些不属于高句丽、新罗、百济而保持独立的地方势力，这就是以金海地区为中心的六伽倻。根据伽倻国始祖传说，六伽倻起源于金官伽倻，以金官伽倻为中心形成各部落间的巩固联盟。伽倻各国成立年代，可能与新罗建国同时。

六伽倻：金官伽倻	庆尚南道	金海
阿罗伽倻	庆尚南道	咸安
古宁伽倻	庆尚北道	咸昌

大伽倻	庆尚北道	高灵
星山伽倻	庆尚北道	星州
小伽倻	庆尚南道	固城

四世纪末，外部形势日趋复杂。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互相进行战争，威胁着伽倻的存亡。特别是伽倻介于百济和新罗之间，在同这两国进行的频繁战争中，便逐步衰弱，最后分别被百济和新罗吞并。

第二节 三国封建制度的初步发展

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

高句丽建国后，不断进行征服战争，扩大了领土。早在二世纪中叶，高句丽在向辽河沿岸进攻的同时，也向西南扩张，南达清川江和大同江流域。

高句丽从四世纪中叶起不断向南扩展，尤其是广开土王时期，占领了南方的大片土地。公元 392 年攻占了汉江以北的十座城，公元 395 年又占领了百济的五十八座城和七百余村庄。四世纪末，高句丽协同新罗出兵伽倻，给侵入这一地区的倭寇以沉重打击。从四世纪到五世纪，高句丽不断南进，其领土扩大到大同江、载宁江、临津江、汉江沿岸。由于高句丽南进政策的巨大胜利，获得了肥沃的农业地区，高句丽的经济中心逐步移到大同江沿岸。公元 427 年，长寿王迁都平壤。高句丽迁都平壤，不仅为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迁都后，长寿王为加强国力，治理新区，一度停止南进。但是半个世纪以后，又大力推行南进政策，到公元 475 年，占领了

位于汉江流域的百济京都。到长寿王末年，高句丽的领土空前扩大，西南达京畿道南端，东南到江原道三陟地区，成为强大的封建国家。

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和领土的扩大，高句丽的封建官僚机构逐步完善起来。从二世纪后半期到三世纪中叶，高句丽调整和改革了中央官职和贵族的等级。中央设置了国相、中畏大夫、评者等三大官职。国相是国王下的最高官职，掌握一切行政权和军权。第一代国相是明临答夫，他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国相下有中畏大夫，其下还有评者，他们都掌握中央的很大权力，处理国家的重要事务。这时期，贵族分为古邹加、沛者、大主簿、大使者、大右台、皂衣、主簿、使者、大兄、小兄等十级。从五世纪到七世纪中叶，高句丽国家的封建官僚机构进一步完善，取消了过去国相官职，新设了大对卢官职。大对卢是国王之下掌握一切权力的最高官职。到七世纪，渊盖苏文取消大对卢官职，设置莫离支官职，自任莫离支，莫离支是能够世袭的官职，他掌握中央和地方一切最高行政权和军权。在大对卢下，中央有内评和外评，内评是辅佐和保卫国王的官职，外评是处理国家政务的官职。此外，中央还有处理各部门事务的官职，如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指挥军事、任免官吏、处理外交事务的官职等等。这时期，封建贵族分为十八个等级，每个等级担任官职的最高限度都有规定。高句丽的地方行政区域也随之变化。到五六世纪，高句丽实行了五部三京的地方行政制度，即把全国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国王直接派官治理。同时，把国内城和汉城称做别都，与平壤城一起统称三京。五部之下设置许多城邑。城邑是行政机构和军事防御相结合的地方区域。据资料，五六世纪时高句丽有二百个城邑。

高句丽中后期，生产力显著发展。高句丽制造了大量各种铁

制生产工具和武器。《三国史记》记载的“铁骑五千”，说明它产生了大量铁，制造了铠甲、长矛、铁刀等。与此同时，还制造出了大量的铁犁、铁锄、铁斧等生产工具。尤其是通过在四世纪中叶构筑的安岳第三号古坟和平壤城营建规模，能够看出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加工精细的石材、坚固的城墙和房屋、秩序井然的街道，若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从三世纪开始，高句丽广泛普及了牛耕，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农业和畜牧业得到显著发展。特别是迁都平壤后，高句丽获得了广大的肥沃土地，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非常有利。以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为基础，开垦了土地，扩大了稻田的耕种面积，提高了农业产量。广开土王碑记载的“国富民殷，五谷丰熟”，虽是歌颂封建帝王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畜牧业中较突出的是养马。《三国史记》记载的“精骑五千”、“数千骑”、“步骑二万人”等，说明高句丽军队大量使用了军马，如果没有兴旺的养马业，这是不可能的。

高句丽手工业也很发展。中央设有工匠府，专门管理手工业。¹³当时已有专门从事冶炼的冶匠和制造各种铁器的铁匠，他们制造出各种铁制生产工具和武器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特别是炼铁技术显著提高，使高句丽制造出各种锻铁制品和钢铁制品。同时，高句丽生产出优良的青铜奢侈品和金制装饰品，供封建贵族享用。由于纺织业的发展，当时还生产出各种绸缎和纺织品。高句丽的古坟壁画中，贵族穿着各种颜色的华丽长袍。据古书记载，这种长袍都是用佩带金银装饰品的绸缎制成的。^①高句丽的窑业亦颇发展，能生产各种砖瓦。从砖瓦遗物看，其硬度很高，

^① 《三国志·魏志》卷三十，高句丽传。

形状、色彩和花纹既有艺术性，又很实用。

对外贸易也很活跃。高句丽与新罗、百济，经常进行贸易往来。尤其是同我国的北朝、隋、唐进行了频繁的贸易，几乎每年都有使臣往来，虽然在王室之间以交换奢侈品为目的，但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高句丽，促进了高句丽经济文化的发展，高句丽的音乐等文化成果传播到我国，丰富了我国的音乐舞蹈内容。高句丽和日本也有贸易往来，经常互派使节，交换奢侈品。高句丽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日本，促进了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

高句丽封建统治阶级从建国初期开始，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封建统治阶级主要以地租、贡物、徭役、人税、赈贷等方式剥削人民。

地租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向地主缴纳地租，自耕农则向国家缴纳田税。据《隋书》记载，高句丽“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①，就是说，高句丽国家的田税，以户为单位缴纳，每户一石或七斗或五斗。这种剥削对农民来说相当沉重的，一到灾年不少农民，因无法缴租而破产，成为流民。

高句丽的徭役剥削更为残酷。统治阶级为修筑宫室、城墙、寺院等，不顾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强迫动员十五岁以上的农民。广大农民无法保证务农时间，难以维持生活，许多农民在徭役期间劳累而死。如公元300年，全国遭受旱灾，不少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但封建统治级不顾农民的死活，强迫动员十五岁以上的男女劳动力，修筑宫室，不少人在工地上饿死，累死。

^①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高丽。

贡物就是强迫农民缴纳当地的土产品。主要征收布、鱼、盐、各种手工业品等。农民除缴地税外，还要纳贡物，负担非常重。

人税是每人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隋书》记载，“人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税布一匹。”^①这可能是十五岁以上的壮丁缴纳的赋税，如一户有三名壮丁，就得缴纳十五匹和十五石谷，这是极为沉重的负担。即使是离开土地到处流浪的“游人”也要缴纳人税。从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高句丽统治阶级从建国初年开始实行了“赈贷法”。所谓“赈贷法”也是统治阶级剥削农民的一种方式，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种手段。灾年和每年青黄不接时，国家以“赈救”或“抚恤”为名，把国库粮食贷给农民，到秋天加利征收。从故国川王十三年（公元191年）开始，赈贷法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每年都要实行。^②

除这些剥削外，封建统治阶级还以野蛮手段直接掠夺农民的财产。尤其是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掠夺，给农民带来极大灾难。故国川王十二年（公元190年）“中畏大夫沛者于畀留、评者左可虑皆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其子弟并恃势骄侈，掠人子女，夺人田宅，国人怨愤。”^③大武神王十五年（公元22年），大臣仇都、逸苟、焚求等三人“资贪鄙，夺人妻妾、牛马、财货，姿其所欲，有不与者即鞭之，人皆忿怨”^④ 这些事实都说明

①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高丽。

② 《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

③ 《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

④ 《三国史记》卷十四，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

了高句丽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职权随意掠夺农民的情况。

封建统治阶级极其残酷的剥削，使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自耕农往往破产，丧失土地，变为佃农或流民；佃农则无法缴租，变成奴婢或流民。他们的生活极为困苦，无法维持。故国川王十六年（公元194年），“冬十日，王畋于质阳，路见坐而哭者，问：‘何以哭为？’对曰：‘臣贫穷，常以佣作，今岁不登，无所佣力养母，不能得升斗之食，是以哭耳。’”^① 这种事实反映广大农民破产后“无所佣作”，得不到“升斗之食”的悲惨处境。

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必然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封建史学家所写的史书虽找不到人民起义的史料，但通过《三国史记》中的“国人怨愤”、“人皆忿怨”等片断记载，也可看到当时阶级矛盾的激化和人民的反抗。

二、高句丽人民的反征服战争

589年，我国隋朝建立，这对高句丽是个很大的威胁。高句丽针对这一威胁，全力以赴地加强国防，储备军粮，准备迎接新的变故。

598年，隋文帝企图一举征服高句丽，动员三十万军，从陆海两路侵入高句丽。陆军刚一侵入高句丽境内，就遭到高句丽人民的顽强的抵抗。当隋军停滞不前时，泛期到来，军粮继绝，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士气低落。横渡黄海直奔平壤的水军，也在海上遭遇风暴，战船冲毁或沉没，完全丧失战斗力。文帝不得不下令全军退却。在这次战争中，隋军兵力丧失百分之八九十。

612年1月，炀帝杨广借口高句丽王不修藩礼，以百万大军远征高句丽（据《隋书》炀帝纪大业八年条载，侵丽隋军“士卒

^① 《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

总一百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馈动者倍之”）。隋军从涿郡（今北京附近）出发，向高句丽进发。

高句丽任命大臣乙支文德为总司令，为歼灭隋军做好一切准备。他把三十万精锐部队分别布置在各条防线，制定了守城和清野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举国上下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

首战在辽东城进行。在炀帝的亲自指挥下，隋军重重包围了辽东城。但由于高句丽军队的英勇抵抗，隋军无法攻入城内，激战持续了五个月之久。以三百艘战舰组成的隋水军从山东出发虽抵平壤附近，但陆军未到，粮食缺乏，陷入困境。炀帝为挽回这种局面，避开辽东城，以三十万兵力直扑平壤城。乙支文德采取了诱敌战术和清野战术。隋军经过的一切地方，人民早已疏散，高句丽军为诱敌深入，边战边退。隋军得不到一粒粮食，又遭到高句丽军民的反击。到达平壤附近时，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乙支文德将军估计到隋军必将退却，于是赋诗一首，送给隋军将领。诗曰：

神策究天文，
妙算穷地理；
战胜功既高，
知足愿云止。

处于困境的隋军有了退却的借口，终于开始撤退。这时，乙支文德将军有计划地进行袭击，最后，在萨水（今清川江）展开了大歼灭战。隋军渡江将及一半，遂被四面包围，遭到了歼灭。这次战斗中，三十万隋军几乎全部被俘或伤亡，侥幸回来的不过二千七百人。丽军的这次胜利，史称“萨水大捷”。

在征服高句丽战争中遭到失败的隋炀帝，为挽回自己的威信，于613年4月，率领强行征募的军队，不顾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再次侵入高句丽。战斗在辽东城进行，持续二十多天，隋

军无法攻入城内。这时国内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受到内外夹攻被迫退却。不甘心失败的隋炀帝，不久又侵入了高句丽，隋军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战斗在卑奢城。这时，隋国内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战争无法继续进行，隋军终于以失败而归。

隋朝灭亡，唐朝继立。唐初立国，与高句丽和平相处，双方都注意调整关系。642年11月，高句丽国内发生武装政变。西部大人渊盖苏文以进行军事检阅为名，拥兵杀掉大臣等文武官员百余人，自立为莫离支，掌握了政权。他在国内实行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对外实行联合百济进攻新罗的政策。于是新罗遣使向唐求援。唐派使臣劝高丽“勿攻新罗”，而渊盖苏文对唐表示强硬态度。645年3月，唐太宗从陆海两路进攻高句丽，经十余天战斗，唐军占领辽东城。辽东城战斗结束后，战斗中心转移到安市城。安市城的高句丽军民在城主杨万春的指挥下，英勇抵抗，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唐军资储将尽，日久天寒，被迫撤兵。此后，647年和648年，唐太宗又曾两次侵入高句丽。由于高句丽军民的英勇反击，终以失败而归。

在长期艰苦的反征战争中，高句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勇敢地进行抗战，终于取得胜利。

三、百济国家的发展和南迁

百济在公元前后，已占据以汉江下游为中心的地区，二世纪后，百济主要向南方马韩地区扩张领域。到三世纪，完全占据朝鲜半岛的西南部。

自三世纪开始，百济的封建统治机构逐步完备。260年，实行六佐平和十六等级官制。六佐平是：内臣佐平、内头佐平、内法佐平、卫士佐平、朝廷佐平、兵官佐平等六大臣。他们在国王下面分别掌管六个部门的国家行政事务。内臣佐平专管下达国王

旨令，上传贵族，宫吏奏折；内头佐平掌管国库，即管理财政；内法佐平掌管礼议，即管理外交以及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文化事业；卫士佐平指挥宿卫兵，即负责守卫王宫和国都的军队；朝廷佐平掌管刑狱，即负责司法等事务；兵官佐平指挥外兵马，即指挥地方军队。与此同时，制定了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等级，系统地分为一品到十六品，并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吏穿戴不同颜色的衣帽。到408年，在六佐平上边设置了上佐平官职，上佐平是总管六佐平的最高官吏，他掌握中央和地方的一切权力。在制定中央官职和官品的同时，还设置了处理日常事务的中央官厅。中央官厅有内官和外官及其所属二十一官厅。内官主要管理宫内事务，外官主要管理国内国外事务，二十一官厅是内外两官下边的具体办事机构。

百济的地方统治机构是五部五方制。把国都附近的京畿分为五部，地方分为五方。五方是行政机构同军事防御相结合的机构，每方都有方城，每方城驻有七百至一千二百名军队。五方下有郡和城。百济后期，全国有三十七郡和二百个城。

百济国家的中后期，生产力进一步得到发展，全国普及了牛耕，较前普及了铁犁、铁锄、铁镰等铁制生产工具，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农业生产显著发展。在耕作法方面，土地肥沃的地区取消了轮休耕地的易田法，实行了年年照常耕种的不易田法，但此法只在一定地区实行，并未全面普及。与此同时，国家重视兴修水利。330年修筑了大水库，510年修筑了堤坝。百济的主要农作物有稻子、大麦、黄豆等五谷和麻、桑等经济作物以及蔬菜、水果。

百济中央专设管理手工业的官厅，其下有各种手工业工场，生产各种金银品、纺织品和各种铁制生产工具和武器。其中较突出的，是在公州附近古坟中出土的金冠、金簪、金银耳环等奢侈

品和剑、长矛等武器。尤其剑和长矛质地优良，驰名国外。此外，民间手工业也有所发展，生产了各种麻布、生产工具等。

百济的对外贸易很活跃。它不仅同高句丽、新罗进行贸易，而且同中国的南朝各国进行贸易。百济在三国中海上交通发展最早，百济商人通过黄海经常来往于中国，进行了频繁的贸易。贸易的主要目的，在于交换两国王室间所需的奢侈品，但通过贸易也促进了两国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日本的贸易也很频繁。通过贸易，也促进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尤其是百济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传到日本，对日本的发展起到过一定作用。

百济封建统治阶级以租税、贡物和徭役等方式剥削农民。封建国家以租税和贡物等方式从农民那里征收各种谷物、麻布、丝绸、手工业品等。徭役负担最为沉重。统治阶级每年动员农民，修筑宫室、寺院等，并在采矿、冶炼、运输等方面都使用徭役劳动。此外，频繁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更加剧了农民的痛苦。广大农民不断破产，成为流民或奴婢。有剥削和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百济人民进行反抗的一种形式，是逃往新罗和高句丽。这种现象四世纪前也曾有过，到五六世纪则规模更大，次数更频繁。491年百济人民六百多户逃到新罗，499年百济二千余名农民逃到高句丽，521年又有九百多户逃到新罗。农民的这种反抗斗争打击了百济封建统治阶级，动摇了百济国家的封建经济基础。

从四世纪末开始，百济遇到高句丽的南侵。为了牵制高句丽的南进，百济试图利用日本势力扭转不利局势，但未收到任何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百济试图暂同新罗结盟，以摆脱困境。但新罗对此并不积极。因为对新罗来说，当时同高句丽的关系尚未成为重要问题。

高句丽长寿王于475年大举进攻百济。三万高句丽军包围了百济的京都汉城。城陷，王被俘。百济在这次战争中丧失了全部

汉江流域，因而不得不迁都锦江流域的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南迁后，百济的经济基础大为削弱，政治混乱。当时，兵官佐平解仇把持政权，为争夺王位发动政变。平定解仇叛乱后，卫士佐平菑加又发动叛乱，杀死东城王。

在此情况下继位的武宁王镇压了菑加的叛乱，接着又实行了恢复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一系列政策，并极力加强军事力量，采取了联合新罗的对外政策。圣王即位后，更致力于加强国力，百济这才进入南迁后的复兴时期。圣王为了国防安全，于538年迁都泗泚（今忠清南道扶余），并将国号一时改为南扶余。

六世纪中叶，三国间的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增强了国力的新罗，这时开始积极策划对外扩张。新罗为使丽济关系对己有利，虽一度联合百济，但也从未放松过对百济的进攻。551年，百济联合新罗夺回被高句丽占领的汉江流域，但两年后，又被新罗夺去。新罗进入汉江流域，对百济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百济不能不对新罗采取强大攻势。554年，圣王率兵三万攻打新罗的管山城（今忠清北道沃川）。但遭到新罗的毁灭性打击，圣王战死，三万军队也几乎全部战死或被俘。此后，百济逐步衰弱下去，在三国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新罗国家的发展

五至六世纪，新罗国迅速发展，领土日益扩大，中央集权制初步确立，封建经济得到发展。新罗建国后一直在较为安定的形势下发展。四世纪末以后，百济和高句丽之间的战争，使朝鲜半岛的形势极为紧张。但由于高句丽进攻的矛头指向百济，对新罗无大威胁。新罗则利用这种形势，未经多大武装冲突，到四世纪末就把自己领土扩大到洛东江流域，并经海路开拓了东海岸中部

的不少地区。到六世纪真兴王时期，新罗进一步扩大领土，占领了汉江流域和洛东江流域的全部地区以及东海岸地区。

由于汉江流域是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因此三国激烈争夺该地。汉江流域曾是百济的领土。475年，高句丽的长寿王打败百济，占领了这一地区。551年，百济联合新罗收复了汉江流域。552年，新罗进攻汉江流域，打败百济，夺取了这一地区。新罗在汉江流域设置新州，继续扩大其领土，终于完全占领汉江流域南北地区。

同时，新罗积极向洛东江流域扩展。532年，征服金官伽倻，占领洛东江下游地区。此后，不断进攻洛东江中游地区，征服了大伽倻，占领了整个洛东江流域。

新罗又不断沿东海岸扩张，占领现今咸镜北道的利原、端川一带。

领土的扩大对新罗的强盛具有重大意义。在经济方面，由于占据汉江流域的肥沃土地和洛东江沿岸的肥沃土地，显著地增强了其经济实力；军事方面，由于占据汉江流域，断绝了高句丽与百济联合的通路，打开了有利的局面；对外关系方面，新罗占据汉江口，便于通过海路与我国来往。

进入六世纪后，新罗封建统治体系日趋完备，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随着封建制的发展，中央逐步设置了新的机构。517年设专管军事的兵部，544年设监督官吏的司正府，581年设任免官吏的位和府，584年设专管租税的租和部，585年设专管王室财政的三宫，586年设专管外交和礼仪的礼部，591年设接待外国使臣的领客府，651年设掌管国王机密事务的执事部和专管国家仓库的仓部等等，明显地加强了中央统治机构。

从505年起，新罗实行州郡县制，进一步完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各州郡县的官吏，由国王从中央贵族中选任派出。州的长

官称军主，郡的长官称太守，县的长官称县令，他们是掌有各地行政和军事大权的最高地方官吏，他们以国家名义征收租税、贡物，保卫地方安全，执行国王命令。

可见，新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是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初步确立，对新罗的强盛起了重大作用。

新罗为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骨干，建立了花郎徒组织。花郎徒组织是新罗特有的贵族出身的青少年团体。六世纪真兴王时，他们活动最为活跃。这个组织在称作花郎的勇敢有为的青年首领周围集结了许多花郎。花郎的活动，主要进行以当时服务于新罗社会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学、佛教、仙教等原理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教育，以武术锻炼身体，以歌舞陶冶情操。他们在加强新罗国家中央集权和扩大领土中，在政治军事上都起了先锋作用。新罗还通过花郎制度选拔人材。

新的封建制度的形成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五至六世纪，新罗经济发展较快。

农业方面，铁制农具和牛耕已全面普及，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封建国家把兴修水利看作是国家事业，不断修筑大型水库，维修已有的灌溉设施。特别是429年，修筑了长达二千一百七十步的矢堤。531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修筑堤坝。因此，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据《隋书》记载，新罗“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① 这说明了当时新罗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

新罗的手工业也颇发展。尤其是五至六世纪，新罗的手工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铁制农具和各种金属制品的制造技术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庆州的壶榆冢和金冠冢出土的金冠、耳环、曲玉

^①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新罗。

等都是精巧华丽的手工业品，这些充分证明当时新罗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新罗生产优质的武器，如仇珍川制造的千步弩是当时最有威力的阻击武器，驰名于中国和日本。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新罗京都设有两大市场，全国各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在这里交换。五世纪末，新罗已在全国各地修通官道，到处设有邮驿。这是封建政府为加强地方统治而采取的措施，但它对商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五至六世纪，新罗的对外贸易也很活跃。除同高句丽和百济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外，主要和我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六世纪中叶新罗占领汉江流域后，通过海路和我国往来。新罗与我国贸易主要是以王室之间交换礼物形式进行的。新罗同我国的贸易，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我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有力地促进了新罗的发展。

新罗封建统治阶级以租税、贡物、徭役等形式剥削劳动人民。租税是主要的剥削方式，但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各种徭役也很沉重。国家为修建宫室、陵墓、寺院、兴筑长城，经常征调国内劳动力，人数很多，时间较长。据《三国史记》记载，474年一年间兴筑六条长城，504年一年间，修筑十二条长城，在当时生产力不发展的情况下，一年期间要完成这么多的工程，当然需要很多的劳动力。封建国家强迫动员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年年进行巨大的工程，给广大人民造成极大灾难。农村出现土地荒废、农民破产的悲惨情况。破产农民为寻求生路，到处流浪，用树皮、草根充饥，最后被迫成为佃农或奴婢。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成群结队，揭竿而起，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在封建史学家撰写的古代史书中，虽找不到农民起义的事实，但从“盗贼多起”等记载和封建统治阶级被迫实行所谓

“赈救”政策中，可以看到广大人民的斗争。这种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第三节 新罗统一三国

一、七世纪中叶三国的形势

进入七世纪中叶，由于三国间的矛盾激化，再也无法维持以前的那种鼎立状态。

新罗扩大领土之后，为吞并高句丽和百济，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不断发动进攻，同时，与唐朝建立了紧密的军事联盟。

高句丽胜利击退隋军大举进犯之后，赢得了一定的歇息时间，恢复了国力。当时掌权的莫离支渊盖苏文企图向半岛南部迅速推进，以便压制新罗，实现其长期推行的统一半岛的政策。但666年渊盖苏文去世，国内的形势急剧恶化。高句丽内部大贵族和将军势力强大，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裂。渊盖苏文的三个儿子男生、男建和男产为争夺莫离支地位发生内讧。男生率所辖不少城邑和军民向唐投降。渊盖苏文的去世和随后的贵族内讧，大大削弱了高句丽的国防力量。

百济南迁后，大体站在高句丽同盟者立场上，不断进攻新罗。在长期战争中，百济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国内的统治也大为削弱。同时，在封建朝廷内部，官僚贵族势力逐渐强大，互相掠夺土地，残酷剥削人民。广大人民群众为反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长期战争，不断起来斗争或迁往别国。百济宫廷骄奢淫逸的生活，更使国家陷于灾难的深渊。

唐朝统治阶级应新罗统治阶级的要求，同新罗结成军事同盟，进攻百济和高句丽。

二、罗唐联军征服百济和高句丽

660年，新罗太宗武烈王金春秋利用百济国力极度衰弱的机会，联合唐军发动了进攻百济的战争。太宗同金庚信将军一起率领五万军队进攻百济，唐水陆军十三万从西进攻百济，新罗军队首先越过百济东部边境炭岬（今大田东）向黄山（今连山五里地）平原进军。炭岬是战略要地，但因百济内部军事上的不统一，丧失防守机会。黄山平原的战斗是决定百济命运的战斗。百济军虽英勇抵抗，但在力量对比上百济军处于劣势。新罗军突破黄山防线，向西逼进泗沘城。这时，唐水军经白江（今锦江下游）逆水而上，同新罗军会师。白江也是战略上的重要地方，由于百济朝廷意见不一，争论不休，也没有采取防守措施。此后，罗唐联军包围了泗沘城，百济的义慈王逃至熊津城，王子扶余隆投降新罗，义慈王也回到泗沘投降。战争不到十天，百济王朝宣告灭亡。但百济人民却坚定不屈，坚持抗战。广大人民在扶余福信等人的领导下，推戴王子扶余丰为国王，继续坚持斗争。他们收复了以周留城（今韩山）为中心的锦江以西的辽阔地区，连续展开攻势，袭击泗沘城。扶余福信等人为恢复百济贵族的统治，引进倭军。罗唐联军在白江口将倭军全歼。此后，百济军丧失周留城，遭到失败。百济人民的抗战持续到663年。

罗唐利用高句丽朝廷发生内讧的机会，又进攻了高句丽。667年9月，唐军向东侵入高句丽，水军横渡黄海直奔平壤。高句丽军民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但由于贵族的投降，城池陆续陷落，唐军一直进犯到平壤附近。668年7月，新罗军参战，进攻高句丽。当时，高句丽的作战计划是，先把主力转到南部，粉碎新罗军，以保障后方安全，而后再转向北部驱逐唐军。但在蛇川平原（今平壤大城区）战斗中，新罗军战败高句丽军。罗唐联

军包围平壤城一个多月。九月中旬，罗唐军攻入城内，高句丽王向唐投降，高句丽王朝灭亡。

三、安东都护府的撤离和新罗统一国家的建立

罗唐联军征服百济之后，新罗和唐朝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原来新罗引进唐军的目的，在于先征服百济和高句丽，然后驱逐唐军，最后完全兼并两国。但唐军征服百济后，却在百济旧地分置五都督府。新罗由于力量弱小，不得不采取慎重态度，在与唐军不发生冲突的条件下占据百济城池，以便逐步占领百济旧地。唐虽觉察到新罗的想法，但为征服高句丽，暂时未同新罗发生冲突。

征服高句丽后，罗唐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唐朝在高句丽旧地分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新罗为统一半岛，决心驱逐唐军。于是，发生了新罗和唐朝之间的战争，新罗自 670 年开始在南北广大地区发动驱逐唐军的全面进攻。在北方，新罗积极支持和援助高句丽遗民的反唐斗争，派将军沙餐薛乌儒和高句丽太大兄高延武各率精兵万人渡大同江向北推进。这支部队在大同江以北，同唐朝军队进行激战，消灭了唐军的一部分部队，并同唐军的后续部队相峙一个时期。高句丽大兄牟岑组织遗民进行反唐斗争，同年 6 月率大批军民渡过大同江，处决驻在当地的唐朝官吏后，奔向新罗。他在途中遇到高句丽宝藏王的庶子安胜，把他迎进汉城，推为国王，并向新罗要求支援，新罗封安胜为高句丽王，后改为报德王，以此鼓励高句丽人的反唐斗争。

在南方，新罗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政策。670 年 7 月，新罗将军品日、文忠等人的部队进攻原百济地区，击败唐军，占领了六十三座城。新罗将军天存、竹旨等人攻克七座城，将军文颖部队

攻克十二座城。

经过同唐军的多次激战，新罗终于占领了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大部分。676年，唐被迫将安东都护府撤到了辽东（今辽阳）。从此，新罗在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统一国家。

第四节 三国时期的文化

一、吏读文的出现

三国都使用汉字。由于汉字是外国文字，因而表达自己的语言很不方便。于是，三国都把汉字作为吏读文字使用，并创造出具有特殊含意的各种成语，即吏读语。吏读文是用汉字的音和意表达朝鲜语的方法。

如：为古：하교

为也：하여

置古：농고

吏读文的创制，对朝鲜语言和朝鲜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罗的吏读文很发展，用吏读记录诗歌。七世纪中叶的大学者薛聪将吏读文加以整理，用来翻译儒教经典。

二、科学的发展

三国时期冶金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高句丽已生产钢铁，用来制造农具、武器等。高句丽的铸铁技术亦很发展，能够铸造精致的铁制日常用品。如平安道云山郡龙湖里第一号古坟中出土的火盆，就是个精致的铸造品。

青铜冶炼技术也很发展，铸造出大量结构复杂的青铜制品。代表性的遗物有：平壤大圣山出土的佛像和平壤青岩洞土城中出

土的镀金铜冠。

三国时期的金制装饰也很精制，具有代表性的遗物有新罗的金冠、耳环等。

三国的窑业技术也相当发展，制造了优质的陶器和砖瓦。尤其百济的砖，确有异彩，砖上雕刻风景纹、凤凰纹等各种花纹。这些砖，不仅制造技术高，并在花纹雕刻上也表现出熟练的技巧。

三国都把天文气象的研究作为国家副业来创办，设置了专门机构。高句丽有日者，百济有日官部，新罗有天文博士和司天博士，这都是研究天文气象或制定历书的机关和学者的名称。三国在这方面都有科学成果：高句丽绘制了天文图，刻在石头上；百济使用过“元嘉历”；新罗于七世纪初修建了瞻星台。新罗瞻星台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天文台建筑遗迹。《三国史记》中有关天文气象的观测记录就达四百一十九条，有关日蚀的记录有五十五条，观测慧星的记录有四十条。这些研究成果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为朝鲜天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期，地理学也有较大发展。628年高句丽有了“封域图”；百济又制成图籍和地理志；据说新罗也有过地理书籍。

在医学方面，三国都有进展。这时期进一步发展了民间疗法和草药，国家也对此加以鼓励，如新罗开设医学堂传授各门医学。三国时期的医学成就，有高句丽的《老师方》，百济的医药制造，新罗的《新罗法师方》等。高句丽的名医德来去日本，为日本的医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国时期，把编写史书作为国家事业，组织学者进行编撰。高句丽编有史书《留记》一百卷。600年太学博士李文真将其改编成《新集》五卷。百济于375年由博士高兴编撰了《书记》。新罗于545年由居柴夫等多名学者编撰了《国史》。

三、哲学和宗教

三国时期的哲学，有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认为构成世界的最初元素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其基础是气，气是细微的物质或类似空气的物质。气又分为阴气和阳气两种，阴气是消极的或阴暗的，阳气是积极的或光明的。这种思想认为，在阴气和阳气的对立斗争中产生五行，五行结合而产生天地万物。这种阴阳五行思想是朴素的唯物论，是自发的辩证法，与儒学、佛教的唯心主义思想相对立。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自然科学尚未发展，这种思想不可能发展成唯物论世界观。后来这种思想被统治阶级神秘化，变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儒学是我国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后来，我国封建统治阶级把它改造成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儒学认为天是具有最高意志的主宰者，所有一切都以天的意志为转移。儒学特别重视孝的思想，认为孝是先天的，是人人都要遵守的普遍准则。其目的就在于把封建剥削制度说成是不可更改的天的法则，忠于国王孝于父母是先天的准则。儒学传入朝鲜后，三国的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把它作为维护封建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措施加以推广，由国家设置有关机构积极提倡。高句丽于 372 年建立儒学的最高学府太学，传授五经三史。百济到四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得到广泛传播是六世纪。新罗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和研究儒学，因而，在新罗出现了著名的儒学者金大问、强首、薛聪等。

道家是我国老子创立的一种哲学思想派别。它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气或作为其规律的道而构成的。它主张事物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向对立物转化的，这里包含着辩证法因素。道家思想传入朝鲜后，对反对唯心论思想，起到一定作用。

东汉时期，张道陵创立道教，盛行于南北朝时。道教神化老子，对道家思想作宗教式的歪曲。道教奉道家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后来道教传入朝鲜。七世纪初，高句丽的道教成为新兴贵族反对保守的当权贵族的的思想武器。在新罗，道教对花郎风流思想的形成有不少影响。

佛教是通过我国传入朝鲜三国的。传入时间，高句丽为 372 年，百济为 384 年，新罗为 518 年。佛教教义把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看成虚无的、不真实的幻影。它宣扬只有宗教式的精神修养才能使人摆脱现实世界的痛苦，得到永久的幸福。因此，佛教是逃避现实，麻痹阶级意识的反动的唯心论思想。佛教的这种本质符合三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他们都致力于佛教的普及。372 年以后，高句丽相继兴建寺院，尤其在不壤同时兴建了九座寺院。新罗也兴建了皇龙寺、芬皇寺等规模宏伟的寺院。新罗出现了慈藏、元晓、义相、惠亮等高僧。百济也兴建了许多寺院，广泛传播佛教。

三国都把自己最初的国王作为最高的祖先崇拜，企图以此神化王权，培植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三国在建国初期就各自兴建始祖庙，把国王的始祖规定为国神加以崇拜。高句丽最初崇拜的最高神，是作为部落神的扶余神和高登神，到公元 24 年修建供奉东明王母的太后庙，而后又修建供奉东明王的祖始庙。百济在国都修建供奉神的“仇台庙”，新罗也从建国初期开始，作为国家仪式举行始祖庙的祭典。

四、文学与音乐舞蹈

三国时期的文学有诗歌和散文。诗歌有两种：一是用吏读文记载的歌谣，一是汉诗。歌谣有：兜率歌、慧星歌、譬童谣、来如歌等。估计慧星歌是七世纪初的作品。据传，三名花郎要去金

刚山游览，看到慧星出现，这时融天师作“慧星歌”，亲自朗诵，慧星熄灭了，正要侵犯新罗的倭寇也退去了。这首诗反映了人民反对倭寇侵略的爱国心情。汉诗有：高句丽的四言诗“黄鸟歌”、乙支文德的五言诗、定法师的“孤石诗”等。

散文主要见之于史书。三国时期的许多散文，转载于《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檀君传说》反映人民对祖国悠久历史的自豪；《乙支文德传》、《渊盖苏文传》、《明临答夫传》、《朴堤上传》等，都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温达传》、《薯童传》《嘉实传》、《都弥传》，都很好地表现出了劳动人民的英勇形象；《王子好童》、《乐浪公主》、《金春秋和文姬》、《皇龙寺九重塔》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三国的社会风貌。还有《兔子传》、《射琴匣》、《延乌郎和细乌女》等民间故事。

三国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为朝鲜民族的艺术奠定了基础。通过史书记载和古坟壁画，可以了解到三国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当时已有军乐、进行曲等各种鼓吹乐，在国家仪式上进行演奏。三国时期，高句丽的王山岳创制了玄琴，伽倻人于勒创制了伽倻琴。《三国史记》中记载的舞蹈，有“四人舞”、“思内舞”、“胡旋舞”（双人舞）等，还盛行傀儡舞、假面舞。

五、建筑和美术

三国时期的建筑技术相当发展。通过建筑遗址、古坟的构造，可以看到当时建筑技术发展的概貌。高句丽建筑遗址，有平壤市安鹤宫大建筑群遗址、青岩洞土城内的金刚寺遗址等。这些建筑的特点是规模庞大，布局均衡。如安鹤宫，由许多长达五十米的大建筑物秩序井然地排成方形。在高句丽古坟中，集安将军墓、安岳第三号坟和江西的三个古坟，都是构造复杂，设计精

密，较为坚固的古坟。新罗的瞻星台、芬皇寺九层塔，百济的弥勒寺遗址，都反映了新罗和百济的建筑技术的发展。三国的建筑技术，尤其是百济的建筑技术，对日本影响大。百济曾多次派遣佛工和寺院建筑工去日本建筑寺院。

三国时期的绘画，有代表性的是高句丽古坟壁画。安岳第三号坟壁画描绘了死者生前的家庭生活、出行和娱乐情况。江西三坟的壁画中，四神图最为有名，四神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幻想动物。壁画的题材虽系幻想，但却富有生动性。百济绘画也很出名，如 597 年去日本的阿佐太子所画的“圣德太子像”是远近闻名的杰作。新罗画家率居所画皇龙寺壁画的故事，足以说明新罗绘画的发展。

第四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统一新罗

第一节 健全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公元六、七世纪以来，新罗封建国家日益兴盛，对外矛盾不断激化。在此形势下，新罗统治集团对内为镇压人民群众，限制日渐膨胀的门阀贵族势力，对外为对付高句丽、百济等国，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尤其在战后，随着疆域的迅速扩大，新罗的掌权者更加感到加强统治的迫切性。为此，他们采取种种措施，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

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政治措施

新罗统治集团实行的各项制度，基本上继承了前期新罗的制度，但略有变更。

他们调整和充实了中央统治机构，其核心是进一步加强国王的绝对权威，保证国王的“制”、“诏”顺利地贯彻到全国各地。其主要措施是：

1. 提高执事部^①的地位，限制上大等的权力。

过去，国家的重要政策性问题，原则上都在六部门阀贵族的协商机关——和白会上讨论决定，因此和白的首席官上大等的权

^① 掌管国王机密事务。公元651年（真德王5年设置），公元829年改为执事省。

力是很大的。公元654年，新贵族势力的代表金春秋登上太宗王宝座，660年新贵族势力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金庾信又就任上大等。这样便树立了新贵族势力对六部门阀贵族的优势，和白会变为从属于王权的国王咨询机关。随着王权的加强，执事部的地位也有显著的提高。其长官“中侍”（后改为“侍中”），均由显贵担任。太宗王的庶子文王、文武王之弟池卿等先后被任命为中侍。由于执事部的权限和作用越来越大，它的官员数目也日益增多，原有中侍、典大、大舍、史等官员共十九名，后来经文武王到神文王时便增为二十七名。

2. 新设和扩充中央机构

公元七世纪中叶以后，充实和提高了位和部（掌管官吏选拔事务）的地位，使它变为重要的中央机关。这里原有大舍二名、史八名，神文王时增加了衿荷臣（后改为令）三名上堂二名。国王通过位和部直接掌握官吏的任免大权，于是和白会在官吏选拔方面失去了实权。此外，还新设和扩充了左右理方府（掌管司法，667年）、司正府（掌管官吏的纪律，659年）、船府（掌管舰船和水军，678年）、左司禄馆（掌管官吏的禄俸，677年）、右司禄馆（681年）、供奉部（掌管丧事和祭品事务，682年）、例作府（掌管土木，686年）等中央机关。这些措施对加强王权起了一定的作用。

3. 控制门阀贵族势力

国王为保证王权的加强，采取措施控制了过分强大的门阀贵族势力。公元662年8月，国王以贻误国事为名杀了大幢总管（国都驻军主力军团的司令官）真珠和南川州（今利川）总管真钦等人，“并夷其族”^①。他们是在百济战争中立过军功的六部门

^① 《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文武王。

阀贵族中有很大影响的实力派人物。公元 670 年 7 月，国王又以战场上临阵脱逃为由罢免了六部门阀贵族义官、达官、兴元等大臣。此外，公元 746 年增设内司正典，置议司一人，侦察二人，史四人，公元 748 年又增加了侦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官吏的考察。特别是公元 788 年，制定《读书三品科》，实行对读完儒学五经考试合格者才得授与官职的选官制度。这些措施都对适当控制门阀贵族势力的膨胀，加强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有积极意义。

随着领土的扩大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新罗统治集团对地方统治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扩充。它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和分散六部门阀贵族势力，积极拉拢地方新兴势力，扩大王权在地方的地盘，达到加强王权的总目的。其主要措施是：

1. 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督

公元 673 年（文武王十三年）新设外司正官职，每州、郡各置二名或一名官员，专门监视地方各级官吏的动向。同时，采取州吏上守制度，把地方的实力派人物直接拉到朝廷旁边进行面对面的监视。此外，国王随时指派自己的亲信秘密巡视各地，监视地方贵族、豪强势力的动态和各级官吏执行职责的情况，并了解民间动向等。例如，文武王派自己的庶弟车得公到各地了解“民间徭役之劳逸、租赋之轻重、官吏之清浊”。车乔装成和尚出京，经由阿瑟罗州、牛首州、北原京到武珍州（今全罗南道光州），然后归京。

2. 完备九州五小京制和郡县制

这是七世纪中期以后在加强地方统治体制方面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州是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又是中央统治地方的中心据点。新罗把全国划分成九个地区，确立了九州地方统治体制：沙伐州（尚州，今庆尚北道尚州）、歃良州（良州，今庆尚南道

梁山)、青州(康州,今庆尚南道晋州)、武珍州(武州,今全罗南道光州)、完山州(全州,今全罗北道全州)、熊川州(熊州,今忠清南道公州)、汉山州(汉州,今京畿道广州)、首若州(朔州,今江原道春川)、河西州(溟州,今江原道江陵)^① 全国九个州共设郡一百十七个,县二百九十三个。每州一般设郡十个左右,最多为二十七个(汉山州),最少为九个(河西州);设县三十个左右,最多为四十六个(汉山州),最少为二十五个(河西州)。州有都督^②,郡有太守,县有少守或县令。州、郡、县的主要职能是行使行政和军事警察职能,处理一般行政事务,特别是收税,推行劝农政策和镇压人民反抗。

小京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域,是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新罗早在统一战争前已开始实行小京制度,即公元557年设中原小京(今忠清北道忠州)。在统一战争后相继设立北原小京(今江原道原州,678年)金官小京(今庆尚南道金海,680年)、西原小京(今忠清北道清州,685年)和南原小京(今全罗北道南元,685年),从而使五小京制度臻于完备^③。小京长官有仕臣(或称仕大等),次官有仕大舍(或称少尹),由国王指派。

3. 迁豪

公元674年,文武王制定了奖励京都贵族和豪族移居州和小京的政策。新罗政权于公元680年代末到690年代初进一步积极推行这一迁豪措施,动员京师的真骨贵族和豪族迁移到九州和五

① 公元757年,景德王将原来州的名称全部改为汉式名称,括号里的州名是改后的名称。前三州设在原新罗境内,中间三个州设在原百济境内,后三个州设在原高句丽境内。

② 最初设军主,公元661年改为总管,785年又改为都督。

③ 公元757年,景德王把小京也都改称为京。

小京等重要地区。为此，政府对迁移者给予荒地开垦权等种种特殊待遇。这种豪迁措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京都豪族势力为扩大自己的经济地盘向外扩张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家开发地方等经济目的。但更重要的则在于政治方面：一是使他们成为在地方落实王权的政治支柱，二是分散和削弱京师的门阀豪族势力，三是利用他们拉拢地方豪族地主势力，并适当控制他们的过分膨胀。总之，统一新罗在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建立了较严密的统治网，进一步健全了地主阶级的各级政权，加强了对农民阶级的专政。

新罗封建政权随着领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相应地扩充了兵力，调整了它的布局 and 体制。它的主要目的在于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同时对付中央和地方门阀豪族势力对王权的对抗，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

全国军队由中央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兵部统管。军队主要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有侍卫府所属的九誓幢、六停、鬮衿幢、百官幢、京余甲幢、四设幢等^①。它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王和中央统治机构的集居地京师。侍卫府是国王的近卫兵，置将军六名、大监六名，普通士兵也都是大舍（12级）以上官职，他们是由国王的亲信贵族子弟编成的贵族兵。九誓幢是国王直属的京师主力防卫兵。六停是有特殊任务的兵种，是配置在以京师为中心的六个最重要地方的中央卫戍部队，肩负着既防卫地方又监视地方武装力的双重任务。地方军一般受州都督的指挥。其中主要有十停、五州誓、九州万步幢、小京余甲幢、外余甲幢、二鬮幢、二弓、三边守幢新三千幢等。从这些地方军的具体布局来

^① 《三国史记》卷四十，杂志，职官下注：“罗人谓营为停”。停为军营之意，幢原意为旗帜，亦指军队。停与幢通用。

看，它们除有一般的地方卫戍任务外，主要承担监视与镇压原高句丽和百济地区以及偏僻山区人民的反抗斗争的任务。当时，各级军官有将军大官大监以及队大监、弟监、少监、幢主等二十多个等级。其中三十六名将军和六十二名大官大监是真骨贵族出身的高级军官，队大监以下是普通军官，但只有地主出身的人才能担任。普通士兵，由一般平民服强制义务兵役，费用自负，这给劳动人民增加沉重负担。总之，统一新罗的兵制在過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起来，对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起了保证作用。

统一新罗政权也调整了骨品制。首先，最显贵的骨品圣骨体系被打破。真骨出身的金春秋登上王位后，圣骨出身的旧贵族完全丧失王位继承特权，由金春秋一家的新贵族势力垄断了王权，从而保证了王权的加强。同时，大赐京位、外位。京位原只赐予京师六部内的门阀贵族，对地方贵族豪族只能赐予外位，但金春秋、金庾信等却对地方豪族大赐京位，裂起、白城郡蛇山人素那、大耶州人竹竹等都因军功而受京位。对来投的高句丽、百济贵族官吏也大赐京位和外位。这样，到七世纪末外位制事实上已进入消灭阶段，京位和外位已无严格区别。这就不难看出金春秋等调整骨品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积极拉拢地方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地盘，加强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经济措施

从统一战争以后，新罗政权在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期为加强中央集权打好物质基础，巩固封建制度。

新罗政权，自七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领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施行了户籍登记和丈量田亩，这是进行封建剥削的基本依据。这次登记测量进行得比较仔细，使政府更为具体地掌握了户籍和土地情况。《新罗帐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里详细地

分别统计了公元816年西原京（清州）附近四个村庄的户数和人口数。这些人口又细分为丁男、丁女、助子、助女子、追子、追女子、小子、小女子以及三年期间出生的小子和小女子的数字。还具体记载着自公元813年到815年三年间各村庄的居民变动情况，其中有迁出的户数、人口以及死亡人数和迁入户数、人口以及出生人数。《新罗帐籍》对每个村庄的水田、旱田的面积以及每一个人的平均面积等也记载得很具体，尤其是分别统计了官谟番、内视令番^①、烟受有番、麻田的面积数。由此可见，政府对上地和户口的控制是很严密的。这反映了封建政府的贵族豪族地主势力之间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的矛盾。封建政府进行这些登记和测量，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劳动力和土地，扩大剥削来源，充实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中央集权。

经过统一战争，封建政府的国有地迅速扩大，原百济、高句丽的政府直属地和在战争中获得的大量土地，都转为新罗政府的直属地或王室直辖地。同时，在长期的战乱中，户口流徙，田园荒芜，出现大量的无人耕种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新罗统治集团于公元722年“（圣德王二十一年）秋八月，始给百姓丁田”^②即实行了丁田制：按丁分田，由封建国家对丁男、丁女分给一定数量的耕地。据《新罗帐籍》记载四个村庄二百三十四名丁男、丁女的水旱田总面积达五百六十四结零八负五束，每人平均为二结四十一负一束^③。当然，各地的公有地和人口的比例不同，实际受田数也不同。丁田制只在政府控制下的国有地上实行，解决

① 番，即水田。官谟番是官有番，与后来的公须田同样。内视令番是王室所有番，与后来的庄处（内庄田）同样。

②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圣德王。

③ 参看《朝鲜全史》卷五，第236页。

财政来源，又防止农民流散，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对土地和劳动力的相互结合，适当控制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丁田制的实质是把扩大农民变为封建国家的依附农。所以丁田制的实行不仅促使农民与封建政府之间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也滋长了封建政府与贵族豪族地主之间的内部矛盾。这样，丁田制的实行一开始就不可能按原规定计划进行，尤其在贵族豪族地主土地兼并的冲击下，它遭到了破坏，逐渐名存实亡。

丁田制下的农民受着封建政府压迫和经济剥削，承担着沉重的田租、贡赋、徭役等负担。田租，主要是缴纳谷物。在《三国史记》中，可处处看到封建政府经常严重浪费谷物的情况。如“（元圣王元年三月）出前妃具足王后于外宫，赐租三万四千石”^①等。这些谷物是靠田租从农民身上掠夺来的。又据《三国史记》中记载，掌管田租和财政的仓部原业务官吏置史八名，后来到惠恭王时增加到三十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政府缴收田租量的增加。调，即缴纳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布，当时封建政府还强迫农民用贡赋形式向国家缴纳大量的地方土特产品。《新罗帐籍》里详细记载公元816年四个村庄的户数、人数以及马、牛、海松、胡桃树、桑木等家畜和一些珍贵植物的数量，甚至某村庄在内视令监督下所种的海松死了十三棵，活了四十二棵的情况^②。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封建政府对赋的重视以及为此而采取的严密措施。新罗农民的徭役负担也非常繁重。尤其是当时大兴筑城工程，带给农民的灾难更为突出。据文献记载。孝成王时为防御日

① 《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元圣王。

② 参看《朝鲜全史》卷五，第246-247页。

倭的侵入，修筑毛火郡城，“周回六千七百九十二步五尺，役徒三万九千二百六十二人”^①。当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壮丁自带衣粮远离家乡，挣扎在筑城和各种劳役之中。

新罗封建统治集团，在租调制方面，为保障对农民的长期掠夺，又为适当缓和农民的反抗情绪，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期间，几次采取减免租税，进行赈济，并贷予种子、耕牛等措施。例如，文武王实行“薄赋省徭”^②，圣德王四、五、六年连续三年“发使赈恤”、“发仓廩赈之”、“给粟”^③等。

新罗政权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对文武官吏实行了食邑制和禄邑制度。有关食邑制的最早文献记载是公元532年（法兴王十九年）“金官国主金仇亥，与妃及三子……以国帑宝物来降，王礼待之，授位上等，以一国为食邑”^④。食邑制在战争期间广泛实行，战后则更加扩大其范围。金庾信、金仁问、张保皋、朴纽、金周元等先后都受过食邑。食邑制是封建国家对有功官吏赐给一定地区农户的田租、贡赋、徭役等支配权的制度。但食邑原则上限于本人当代，若受封者本人死亡或犯罪就由政府收回。“文武大王以仁问英略勇功特异常伦，赐故大琢角干朴纽食邑五百户”^⑤的史实就说明这个问题。食邑不是按土地面积而是按户数授与的。

禄邑制是根据官位向文武官员赐予一定地区的农村或村庄的

-
- ① 《三国遗事》卷二，纪异，孝成王。
 - ② 《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文武王条。
 - ③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圣德王条。
 - ④ 《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法兴王条。
 - ⑤ 《三国史记》卷四十四，金仁问传。

收租权的制度，始于公元 687 年（神文王 7 年）。^① 但它经过两年，到公元 689 年便停止实行，以逐年给粮谷的禄俸代之（后变为逐月发放月俸），到公元 757 年（景德王十六年）又重新恢复禄邑。此后又实行了很长时期。新罗政权之所以实行禄邑制，最初主要是在领土扩大，国家收租地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想通过禄邑这种形式进一步促进地方的开发，改善经济体制。在实施过程中由禄邑到禄俸，又由禄俸到禄邑的反复变化，反映了中央集权与贵族豪族地主势力之间争夺经济特权的矛盾斗争。

食邑制和禄邑制，尽管处于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但是它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贵族豪族地主势力，尤其是地方豪族地主势力逐步地利用它，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充实了自己的地盘。到新罗末期它成了从内部瓦解中央集权体制、产生封建割据的祸根。

总之，新罗掌权者在统一新罗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它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其积极意义。

第二节 统一新罗的社会经济状况

三国的统一不仅带来一百多年的和平环境，也打破了过去三国之间的封锁，从而促进了文化技术的广泛交流。经过统一新罗的一系列措施，封建国家的统治机构和生产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调整和改善；封建政权又采取了奖励生产的各项措施，所有这些都

^①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神文王条载：“七年五月，教赐文武官俸田有差。”

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统一新罗的社会生产迅速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所谓“圣代”^①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长期战乱的结束，保证了农业劳力和畜力的迅速增加和大量铸造铁农具的可能性。公元681年（文武王二十一年）封建政府采取了“铸兵戈为农器”^②的措施。当时，天文历算也有显著发展，为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提供了有利条件。

统一新罗的水利灌溉事业有很大发展。从七世纪后期到八世纪间，新罗劳动人民兴修了许多规模远远超过三国时期的水利灌溉工程。尤其在大的江河流域以及西部和南部平原地区更有显著发展。最有名的是碧骨堤水利扩建工程。这是公元790年（元圣王六年）动员全州等七个郡县的农民，以公元330年百济人民兴修的水库为基础扩建的，能灌溉湖南平原一万四千多结水田的全国最大的水库^③。水利灌溉事业一直为封建政府所重视。公元810年“发使修葺国内堤防”^④。公元859年“教修完堤防劝农”^⑤。

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出现了所谓“家给人民，民间安堵，域内无虞，仓廩积于丘山”^⑥的局面。当然这些史料出于封建史学家对王权的歌功颂德，语言不免夸张，但它毕竟反映了当

①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太宗春秋公。

② 《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文武王下。

③ 该水库作为全国最大水库继续用到李朝时期。

④ 《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世，宪德王条。

⑤ 《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宪安王条。

⑥ 《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文武王下。

时农业发展的一些侧面。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七世纪中期以后新罗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同唐朝的密切经济交流对统一新罗的手工业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

在手工业发展中，重要的部门是采矿和冶炼手工业。其中有铁、金、银、铜等金属的开采业和制造业。这些手工业到八世纪后有了飞跃的发展。铁主要用于农业和打仗，制造农具和兵器；而金、银、铜则主要用于手工业，制造贵族用的奢侈品以及佛象、梵钟等佛具。据《三国遗事》记载：公元754年“铸皇龙寺钟，长一丈三寸，厚九寸，重四十九万七千五百八十一斤”，翌年“铸芬皇药师铜像，重三十万六千七百斤”，公元771年“又舍黄铜一十二万斤”铸造了奉德寺钟^①。其中保存到现在的只有奉德寺钟，据鉴定，它的音质很好。这不仅证明当时采矿冶炼铸造技术已具有较高水平，也标志着当时工艺美术的发展。

造船业也发展显著。据日本文献记载，当时日本向新罗订做新罗船，新罗商船往往成为日本的商人、留学生和僧侣渡海往来唐朝的重要交通工具，因为新罗船比日本船更能经受风浪。公元894年，新罗商人二千五百名分乘大小一百艘船曾去日本对马岛^②。可见，无论在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中新罗造船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丝织业也相当发展。鱼牙绸、朝霞绸、三十升布、四十升布等，因其质量精致而闻名国外，被大量用于国内外贸易。兵器制造业也是手工业中较发达的部门，有些武器的制造技术更为突出。如，弩炮、千步弩、车弩等，由于性能良好而驰名国外，千

^① 《三国遗事》卷三，塔像、皇龙寺钟、芬皇药师、奉德寺钟条。

^② 《日本纪略》前篇二十，关平6年。

步孛的射程据说可达千步。此外，装饰品、家具、皮革、陶瓷、文具等其它手工业部门也有很大发展。

统一新罗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手工业部门的细分化和专门化。从官营手工业来看，在《内省》管下设了很多的典、房、宫、监、局、宅等管理专门化的手工业部门。《三国史记》记载了三十多个专门化的手工业管理机构。如黑铠监、朝霞房、锦典、梁宫、红典、苏芳典、漆典、杨典、毛典、皮典、靴典、麻典、席典、瓦器典、祭典、药典、肉典等等^①。手工业部门按品种的仔细分工和专门制作，说明当时手工业具有较高发展水平。

在整个手工业领域中，发展最快的是中央官营手工业。它控制着全国丰富的原料，集中了全国的“材力强壮，技能工巧”的匠人，还占有大量的奴婢。私营手工业也有新的发展，贵族地主在城镇开办了许多手工业作坊。《三国遗事》记载的皇龙寺钟的铸造者是“匠人里上宅下典”，芬皇寺药师铜像铸造者是“匠人本彼部强古乃未”^②等史实，都是很好的证明。

领土的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从京都庆州到五小京、九州和在郡县的首邑以及贸易要地都发展成商业中心。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京都庆州。三国时期，庆州只有京师市和东师市两处。到统一战争后的公元695年，又增设了西市和南市。这样，共开四市，并置西市典和南市典，专门管理交易事务。这是随着庆州城内商业的迅速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据《三国史记》记载，统一新罗的“王都，长三千七

① 《三国史记》卷三十九，杂志，职官中。

② 《三国遗事》卷三，塔像，皇龙寺钟、芬皇药师、奉德寺钟。

十五步，广三千一十八步，三十五里，六部”^①，“新罗全盛之时，京中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六户，一千三百六十坊，五十五里，三十五金人宅”^②。如果每户平均按五口计算，庆州人口达八十九万多^③。可见，庆州已成为比较繁盛的中世纪城市，是全国大商人的荟萃之处。《三国遗事》记载着九世纪中叶宪康王时期的京都景象：“城中无一草屋，接角连墙，歌吹满路，昼夜不绝”^④。虽然这个记录有夸张之处，反映的是庆州中心区大贵族地主们的养尊处优、穷奢极欲的寄生生活，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庆州的繁荣面貌。

总之，从统一新罗到八世纪中叶，即从文武王到景德王大约一个世纪期间，经过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社会经济显著发展，出现了所谓“圣代”。但这个“圣代”，是建立在贵族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和压迫之上的，劳动人民的膏血养肥了贵族地主阶级，使他们过着吸血鬼生活。封建史学家描绘的“仓廩积于丘山”，指的只是政府的官仓和贵族地主的私囤，饥寒交迫的农民在存粮上是无份的。所谓“圣代”就是贵族地主阶级的天堂，它必然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到人间地狱，所以，从文武王到景德王时期的发展，包含着不可摆脱的矛盾——日益滋长着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① 《三国史记》卷三十四，杂志，地理。

② 《三国遗事》卷一，辰韩条。“金人宅”，指大富豪的住宅。《三国遗事》实际上记载了三十九个大富豪的住宅名称。

③ 李朝汉城人口约只二十万，比较起来庆州人口过多。对此，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是误记，也有人认为如果这个数字不错，它可能包括王畿在内的比较广阔的地区。

④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又四节游宅。

二、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统一新罗的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国力强盛以及对外交通的畅达，促进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

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同我国唐朝的关系居主要地位。进入七世纪末罗唐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恢复了外交贸易文化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公元699年以后，新罗几乎年年有时甚至一年两三次遣使入唐。到八世纪中期，两国政府间的经济交流达到高潮。新罗主要输出药材（牛黄、人参）、高级绸缎（朝缎、鱼牙绉）、高级麻布（三十升布）、金、银、马匹、毛皮类和工艺品等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品和书籍。民间的私人贸易也很活跃。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新罗商人活动在唐朝广阔地方，尤其从山东半岛到长江江口的许多主要港城，几乎都有以商人为主的新罗人聚居区——“新罗坊”。其中著名的有楚州、泗州涟水乡、登州文登县等处的新罗坊。据九世纪留唐日本僧人圆仁的回忆，有的新罗坊有自己寺庙，甚至有的寺庙里有上百名僧侣，他们还有自己的墓地。住在新罗坊的商人，不仅从事新罗同唐朝的贸易，还参加了唐朝的各项活动，甚至以唐为据点开展同别国的国际贸易。

新罗封建政府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对唐贸易的需要，于公元828年设置清海镇（今全罗南道莞岛），任命经营国内外贸易而致富的大商贾张保皋为清海镇大使。当时，渡唐的海上交通线主要有两路：一路是从统一前开航的西海岸唐恩浦（南阳湾）、穴口镇（汉江口）等地出发，到达山东半岛登州；另一路是西南海岸灵岩郡出发，经黑山岛横渡黄海到达长江江口附近。在这些交通线上，罗、唐、日的外交使节、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员络绎不绝。

随着外交贸易关系的发展，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公元840年学成回国的新罗留唐学生（包括质子）一次就达一百零五人^①。这些留学生在中朝文化交流上起了很大作用。唐代文人张鷟、白居易的著作在新罗很受欢迎。唐末新罗留学生崔致远曾做过唐的翰林学士，他擅长文辞和诗歌，著有《四六集》、《桂苑笔耕》，后者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在文化交流中有很多是为学习佛教思想而入唐的僧人，也有经唐人印度深造的僧侣。例如高僧阿离耶跋摩、惠叶、玄泰、求本、玄恪、惠轮、玄游、慧超等。他们都在中朝印三国古代文化的交流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罗同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政府间的交流几乎没有开展，但民间私人来往却较频繁。公元738年到774年期间，新罗商人往来日本的，除公元750年只有九十一名外，每年都达二百名左右。这同以前每年三、四十名的情况比较，是很大的发展^②。当时新罗商人主要在日本的对马、壶岐、下关等地活动。清海镇在对日贸易中也起了积极作用，公元840年以后清海镇商队经常往来日本。

三、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伴随新罗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通过封建政府推行的迁豪、食邑、禄邑等培植地主阶级势力的措施，七世纪中期以后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显著发展，进入八九世纪大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这与该时期封建势力发展的明显特点，即官僚、地主、商

^① 《唐会要》卷九十五，新罗传；《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文圣王2年。

^② 《朝鲜全史》卷五，第322页。

人合流过程的进展密切相关。

大贵族官僚很快发展成大地主，他们大肆兼并土地。金庾信、金仁问等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既是高官显贵，又是拥有许多田庄的大庄园主。公元662年（文武王二年）他们两人分得了本彼官财货田庄奴仆各半。金庾信于公元663年又受土地五百结，公元668年受食邑五百户，公元669年受六所牧场。金仁问也先后受食邑三千二百户和五所牧场。著名的大商贾清海镇大使张保皋也成为拥有二千户食邑的大地主。《三国遗事》里记载的庆州城内三十五处“金人宅”就是这些大贵族地主。他们利用接受“投托”、放高利贷、强占等手段，大搞土地兼并。八世纪以后，他们的土地兼并迅速升级，把大片大片国有地变为私有地，有的高级将领甚至把屯田也并为“私领”。

地方豪族地主势力的土地兼并也在疯狂地进行。当时，在火王郡（今昌宁邑）有一个身为阿餐^①的姓金的豪族地主，他自公元771年到810年的四十年间，向寺院共献粮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五石，仅802年一年就献了二千七百十三石。可见他们占有的土地是很大的。有人估算他的土地面积远远超出四百结^②。后来高丽太祖的松岳郡（今开城）豪族王建，他的土地也分布在松岳、盐州（今黄海南道延安）、白川等广阔地方。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地方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很明显的。

随着佛教的盛行，佛教寺院也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财产，成为与世俗地主并立的僧侣地主或寺院地主。新罗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把佛教奉为国教，大建佛寺，积极扶植和扩大寺院。当时，国王和各级贵族官僚把田产施舍给寺院的活动成风。公元

① “阿餐”为新罗十七级官职级别中的第六级官职，属一般贵族。

② 《朝鲜全史》卷五，第267页、268页。

693年，孝昭王向柏粟寺施舍田一万顷，铸金银五器二副各重五十两，摩衲袈裟五领，大绢三千匹。公元719年，重阿沧金志诚施舍给庆州东南约二十里处的甘山田庄，修建伽蓝，造石弥陀一躯。这样，寺院的僧侣和少数高僧迅速变成大地主。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还有森林、果园、盐田。据大安寺（规模不大，属一般寺院）的资产籍记载，僧侣只有四十名，却有米二千九百三十九石，水田四百九十四结，森林一百四十三结，盐田四十三结，奴婢二十三名^①。他们在院内残酷剥削下层僧众和奴婢，在院外以高利贷、“施一得万倍”^②等欺骗手段积极进行土地兼并，不断扩大地盘。

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统一新罗时期，开始形成世族地主（亦称门阀地主）。他们是从三国以来的豪族地主、食封贵族地主和权势商人地主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在政治上有特权地位，世代为官，是所谓“贵骨有势”的六部贵族出身；在经济上拥有比一般豪族地主更大的经济实力，控制着大量的依附农民和奴婢，占有巨量的社会物质财富。统一新罗时期，世族地主虽然还只是刚刚形成，但它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成为地主阶级中最有实力的一个阶层，是豪中之豪。他们同其他豪族地主一起控制整个社会，是农民的凶恶敌人。

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地主，特别是豪族地主和世族地主处处经营地主庄园，役使农民从事生产，形成他们进行罪恶统治的独立王国。这些庄园到八、九世纪迅速扩大和发展起来。大庄园的庄园主实行多种经营，自给自足，不仅有农田，还经营森林、果园、牧场，甚至有盐田乃至私兵。“（新罗）

^① 《朝鲜全史》卷五，第267页、268页。

^② 《三国遗事》卷五，大城孝二世父母，神文代。

宰相家不绝禄，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马猪称之，畜牧海中山，须食乃射，息谷米于人，偿不满庸为奴婢”^①。这段记载很好地说明统一新罗时期大地主庄园的规模、性质、经营内容、经营方法、阶级关系等基本情况。

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膨胀，进一步加剧封建依附关系。大贵族地主进行疯狂的土地兼并，必然造成丁田制的衰亡，使原来占有小块土地的丁田农民，受地主兼并之害，丧失土地，成批地沦为大地主庄园的农奴或奴婢，或者成为流民。地主庄园的主要生产者就是农民，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都被地主强占，受着庄园主的极端残暴的掠夺和夺迫。隶属于庄园主的这些农民很少有自由，甚至不能随便离开自己的主人，有时跟主人一起迁徙，实际上成为农奴。奴婢的地位更低，他们受着惨无人道的压榨和欺凌。不仅如此，随着丁田制的破坏而引起的国家收租地的严重减少，必然使束缚于国家收租地的农民负担更为加重。日益增涨的田租、贡赋、徭役等封建负担全部落在为数不多的公田农民身上。这样，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膨胀迅速地把广大农民推到生灵涂炭的境地。《三国遗事》和《三国史记》里记载着当时广泛流传的真定其人“部役之余，佣作受粟，以养孀母，家中计产，唯折脚一铛而已”，农民金大城受寺院的“施一得万倍”的欺骗而彻底破产，向得“割股供亲”，孙顺“埋儿”^②等故事，都反映当时广大农民陷入严重的破产和生死困境的真实情况。

总之，上述所有事实，说明八世纪后期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膨胀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同时冲击或动摇了中央集权统治体制的基础，为地方势力的

① 《新唐书》，新罗传。

② 《三国遗事》卷五，孝善；《三国史记》卷九，新罗本纪，景德王条。

成长和割据局面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第三节 九世纪的新罗农民战争 后三国的分裂

一、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和社会危机的激化

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恶性膨胀，不仅激化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社会基本矛盾，而且引起中央集权与豪族地主势力之间的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到八世纪中期开始加剧，公元765年惠恭王上台后完全公开化。于是公元768年秋7月出现了“……吉餐大恭与弟阿餐大廉叛，集众围王宫三十三日，王军讨平之，诛九族”^①的事件。这是一次以王都为中心的一小京、九州的九十六名角干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大事件。惠恭王在位期间，这种叛乱一直是此起彼伏，甚至在公元775年6月和8月相继出现伊餐金隐居和伊餐廉相、侍中正门的两次叛乱。公元780年惠恭王在叛乱中被杀后，宣德王即位。宣德王即位后，对叛乱势力采取妥协政策，封叛乱共谋者伊餐金敬信为上大等。公元785年宣德王死，金敬信乘机击败对手金周元，夺取王权登上宝座，（他即元圣王）。从此，新罗王权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经常出现内讧、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其集中反映是金宪昌叛乱。

金宪昌是宣德王的继承者之一、金周元的儿子。他公元821年任熊川州都督。在这以前长期任武珍州都督和菁州都督。金周元在争夺王权斗争中失败后被封为“溟州郡王”，在地方上拥有雄厚势力。在此情况下，金宪昌于公元822年3月利用农民起

^① 《三国史记》卷九，新罗本纪，惠恭王条。对此《三国遗事》卷二则记载为：“（766年）大恭角干贼起乱弥三朔乃息。”

义，扬言推翻新罗王朝，以熊川州为据点，宣布割据，成立“长安国”，定年号为庆云。这在企图摆脱新罗中央集权的控制而进行割据的地方豪族势力当中产生很大反响。武珍州、完山州、菁州、沙伐州等四个州的都督和中原京、西原京、金官京等三个小京及其周边的许多郡县守令也纷纷起兵呼应。政府军在各地镇压叛乱后，金宪昌自缢，叛乱平息。朝廷诛金宪昌家属及其共谋者二百三十九人。

九世纪中期前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到80年代，先后发生过弘弼、张保皋、良顺、兴宗、金式、大昕、允兴、金锐、近宗、信弘、金尧等叛乱。在这期间，宫廷内部近亲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也从未间断过。

延续一百余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公开内讧，其实质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王权和争夺土地劳力的支配权的斗争。所以，不管那一派取胜，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都是有害的。它必然带来新罗中央政权的衰弱，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尤其是使广大农民陷入战争漩涡，加重了他们的痛苦。不断增多的贡物和筑城等各种徭役强加在农民身上，使他们不堪承受。这就激化了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

二、九世纪后半期农民战争的高涨

八世纪末期，新罗社会已经面临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但新罗统治集团却一味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在王宫临海殿前挖雁鸭池，造石假山，养珍禽异兽，又修筑鲍石亭，日夜饮酒作乐。惠恭王“幼少即位，及壮淫于声色”^①，对政事不闻不问，宪康王经常“燕群臣于临海殿，酒酣，上鼓琴，左右各进

^① 《三国史记》卷九，新罗本纪，惠恭王条。

欺词，极欢而罢”^①。“三十五金入宅”的生活也不亚于王宫，他们过着“四节游宅”的生活，即“春，东野宅；夏，谷良宅；秋，仇知宅；冬，加伊宅”^②。《三国遗事》所记载的“宪康大王代，城中无一草屋，接角连墙，歌吹满路，昼夜不绝”，就是反映这些富豪大族们的腐朽生活。追求奢侈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中不可制止的恶习。当时连兴德王也承认：“俗渐浇薄，民竞奢华，只尚异物之珍奇，却嫌土产之鄙野”^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加剧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尽灾难。广大劳动人民纷纷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

《三国遗事》记载的：“（惠恭王）幼冲故太后临朝，政条不理，盗贼蜂起”^④，说明公元765年前后各地人民已经纷纷起来进行斗争。公元788年西部地区出现旱灾、蝗灾，许多地方爆发农民起义。元圣王时，大岬岭等山区也出现起义。

九世纪前半期，农民起义迅速发展。公元815年，西部地区出现大饥荒，8月各州郡农民起义声势很大，朝廷直接出军镇压。公元819年，农民起义发展到全国更多州郡，严重威胁新罗统治政权，朝廷紧急下令诸州郡都督太守参加镇压。特别是825年春正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寿神起义。他们以高达山（今京畿道境内）为据点。进攻新罗西北地区中心要塞北汉山州（今汉城），准备成立农民起义政权，“欲立都于平壤（今杨州）”^⑤。这次起义后来虽被都督聪明直接率领的官军所镇压。但它表现了九世纪前半期农民起义的新发展，为其后农民起义的全国性发展准

① 《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宪康王条。

②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又四节游宅。

③ 《三国史记》卷三十三，杂志二。

④ 《三国遗事》卷二，纪异，赞耆婆郎歌口。

⑤ 《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宪德王条。

备了条件。

九世纪中期以后，尤其到九世纪末真圣王统治时期（公元887—897年）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地主庄园显著发展，中央集权急剧削弱，出现“诸州郡不输贡赋，府库虚竭，国用穷乏”^①的局面。于是，真圣王遂派大批官吏到各地“督促”租税。这些官吏下去“督促”的主要是那些无力负担租税的饥寒交迫的农民，从而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更加激化了阶级矛盾。在这时期，统治阶级的腐化也日益升级。真圣女王“潜引少年美丈夫两三人淫乱，仍授其人以要职，委以国政”，所以“贿赂公行，赏罚不公，纪纲坏弛”^②。就在这时，公元888年于庆州朝路大街出现用陞罗尼隐语写的诽谤时政的标语，内容是“南无亡国，刹尼那帝，判尼判尼苏判尼，于于三阿干，鳧伊袞婆诃”^③。时人解释说，“刹尼那帝”指女王也；“叛尼判尼苏判尼”是指任苏判之官的女王的两位宠臣，“于于三阿干”是指三个阿餐；“鳧伊”是指鳧好夫人（真圣女王的乳母）。总的是说，这些家伙将要亡国。这反映了举国上下愤怒声讨以国王为首的新罗统治集团罪行的浪潮即将到来。

在这种形势下，九世纪后半期爆发了全国性农民战争。据历史文献记载，农民军活动在全国近二十个地方。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几支农民起义军。

沙伐州地区农民起义军。公元889年，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掀起反对朝廷“督促”租税的斗争。元宗、哀奴等组织农民起义，以沙伐州（今庆尚北道尚州）作根据地，在其附近展开英勇

① 《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真圣王条。

② 《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真圣王条。

③ 《三国遗事》卷二，纪异，真圣女大王、居陀知。

斗争。真圣女王惊慌失措，忙令奈麻令奇率官军镇压。但奈麻令奇被起义军的强大威力吓倒，不敢进军，遭到惨败，国王斩令奇。

北原地区农民起义军。当元宗起义军蓬勃发展时，北原地区出现由梁吉领导的规模很大的农民起义。这支起义军发展很快，梁吉在群众中具有很高威望，被称为“帅”^①。

在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新罗政权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地主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大部分豪族地主“作营堑以自守”，割据称雄，与农民军对抗；极个别的新兴地主、没落贵族以及军官钻进农民革命阵营，妄图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俟机夺取革命果实，建立地主阶级的统治。弓裔，甄萱等便是后一类的主要代表人物。弓裔原是没落的新罗宗室，后来“祝发为僧，自号善宗，隐居寺院”。公元891年投入箕萱领导的竹州（今忠清北道竹山）起义军。但因与箕萱不合，公元892年投入梁吉起义军。其目的就是“乘乱聚众，可以得志”^②。这些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农民军，特别是他们窃取领导权后，对农民革命破坏性很大。

随着起义军队伍的迅速壮大，梁吉起义军分两路进军。一路由梁吉亲自率领，继续以北原为根据地在其周边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向南发展。他们到公元879年占领了北原南部的国原等三十余城，取得重大成果，梁吉任命起义军指挥官为各城城主，继续发展力量。另一路是梁吉任命弓裔为“佐”，派他率骑兵百余，主要向东北方向发展，攻占北原东北村庄及溟州（今江原道南江陵）、管内酒泉等十余个郡县。公元894年攻入溟州时，其力量

① 《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真圣女条。

② 《三国史记》卷五十，弓裔传。

达三千五百人，分十四个队。这时，金大黔、毛昕、长贵平、张一等为舍上（部队长），弓裔为将军。从此弓裔原形毕露，“自以为众大，可以开国称君，始设内外官职”^①，背叛起义军，走上新的封建君主的道路。梁吉等农民起义军领袖跟弓裔的破坏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但弓裔越走越远，公开向梁吉起义军发动袭击。公元899年，梁吉联合国原等十余城的起义军向弓裔叛军进攻，但起义军遭到失败。从此农民军衰落，长达十年左右的梁吉农民军终以失败告终。

西南地区农民起义军。西南地区是具有农民斗争传统的地方。公元892年，这里的农民又掀起农民起义高潮。但斗争一开始就被甄萱等人所利用。甄萱是尚州加恩县人，“父阿慈介，以农自活”^②，他本人当兵出身，任过西南海防军裨将（参谋）。他乘农民起义的烈火发动兵变，进攻庆州西南地区的各州县，周围农民积极响应，“旬月之间，众到五千人”^③。他们攻占武珍州后，继续向完山州（今全州）方向发展。甄萱后来以完山州为据点，利用当地（三国时期百济故地）群众的反新罗情绪，“自称后百济王，设官分职”^④。于是，甄萱等夺取了农民起义军的斗争果实，建立了西南地区封建割据政权。

“赤裤军”农民起义。九世纪末，农民战争在全国范围形成高潮时，公元896年西南地区百济故地出现^⑤一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他们穿红布裤子以示团结和勇敢，人们称之为“赤裤军”。他们起义后，痛击了州县官吏和豪族地主，后来甚至打到

① 《三国史记》卷五十，弓裔传。

② 《三国史记》卷五十，甄萱传。

③ 《三国史记》卷五十，甄萱传。

④ 《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真圣王条。

⑤ 《三国史记》卷二，纪异，真圣女大王、尼陀知。

国都庆州西部牟梁里，袭击兴孝寺等佛教寺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京师内外统治阶级惊慌失措，怕得要死，不敢应战。这充分显示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勇敢和强大。

此外，全国各地还有几支比较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如平壤地区黔用、明遗等领导的起义军，盐州地区的起义军等等。总之，九世纪后半期到十世纪初，农民战争的烽火燃遍全国，构成“所在‘盗贼’蜂起”^①的形势。

这次农民起义，其范围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它已远远超出各自村庄的范围，在广大地区流动作战。他们还普遍建立了根据地，有的起义军已经考虑到农民政权的建设。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也比从前有明显的增强。这次农民斗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新罗封建统治，惩罚了豪强官吏、豪族地主、不法高僧等，严重地动摇了新罗封建统治政权，冲击了新罗传统的骨品制，为适当调整封建生产关系准备了条件。

三、后三国与高丽的统一

在九世纪后半期全国性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下，新罗王朝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通过农民战争形成的各豪族军事势力，他们各霸一方实行军阀割据。这就是甄萱的后百济、弓裔的泰封和无数的“城主”、“将军”的封建割据。结果，在原新罗疆域内形成后百济、泰封国、新罗三国鼎立局面，史称后三国。

公元900年，甄萱利用西南人民反对新罗虐政的斗争，逐步脱离新罗而独立，宣布成立后百济国，并自封为王，定都于完山。他模仿新罗制定官制，整顿政权，积极争取地方官僚、豪族

① 《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真圣王条。

势力来支援。同时，为迅速扩大范围，先后攻占了大耶州（今庆尚南道陕川）和一善郡（今庆尚北道善山）以南十余座城。这样，后百济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控制了现在的全罗道地区和庆尚北道的部分地区。

没落贵族弓裔利用梁吉农民军的力量，不断壮大队伍，逐渐成为强大的军阀势力。大同江下游地区的豪族以及松岳郡豪族将军王建等许多地方势力纷纷归附弓裔。公元898年，弓裔彻底背叛梁吉起义军，攻占北原以南的国原等三十余城，从而势力扩大到汉江流域一带，定都松岳郡后，继续向现今京畿道南部和忠清道一带扩大势力范围，很快成为控制新罗北部、中部广大地区的强大封建割据势力。公元901年，弓裔自称为王，立国号为“高丽”（后高句丽）。公元904年，改国号为“摩震”^①，年号为“武泰”，同时，迁都铁原。其后，多次改变年号，又将国号改为泰封（911年）。弓裔不断采取措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封建统治地盘。他设广评省和兵部等文武官僚机构，加强统治机器，广泛招揽各方面人材，加以提拔重用，因而“来降者众多”^②。他对来投的大商人、新兴大地主王建，授与铁园部太守和精骑大监等军政要职。他采纳王建的建议，积极设海兵根据地，控制了西南海上权。同时在大同江流域新设滨西十三镇，并努力怀柔和争取那里的豪族势力，加强对滨西地区的控制。于是，摩震势力控制了北至清川江流域南达庆尚道全境的广阔地区。但是，弓裔“入新京，修葺观阙楼台，穷奢极侈”^③，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穿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季子为“神光菩萨”，出

① “摩震”是强大的东方之国的意思。

② 《三国史记》卷五十，弓裔传。

③ 《三国史记》卷五十，弓裔传。

门常骑白马，用彩布装饰鬃毛，令童男童女奉幡盖香花响导，又令女僧二百余名唱梵歌随后^①。他还“令国人呼新罗为灭都，凡自新罗来者，尽诛杀之”^②。这样，弓裔政权不仅激起劳动人民的反抗，而且引起封建官僚的严重不满。公元918年6月，侍中王建经过长期准备，联合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卜知谦等，动员一万兵力举行宫廷政变，自立为王，国号高丽。弓裔在仓惶逃跑中于斧壤被当地群众所杀。王建为摆脱弓裔势力的影响，充实自己的政权基盘，于公元919年1月，把京都迁回松岳，改称开州（开城）。

这时，新罗政权北受高丽的压力，西遇后百济的攻击，领土和人口越来越小。然而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集团仍然热衷于内讧，竟日云集鲍石亭游宴。它是根据高丽和后百济激烈的统一战争中双方的特殊需要而苟延残喘的政权。

王建建立高丽后，新罗王室于公元920年派使节同高丽建交。高丽认为新罗虽然没有什么力量，但它有悠久的历史 and 权威，在部分地主、城主、将军中仍有一定影响，暂时利用新罗王室，有助于对付后百济。于是，在三国鼎立过程中，高丽和新罗王室往往采取联合行动对付后百济。

在此形势下，甄萱的后百济于公元927年11月向新罗王室发动突然袭击。这时新罗景哀王依旧与妃嫔宗戚醉倒在鲍石亭的游宴中，甚至不觉后百济大兵已至。甄萱处杀景哀王，立王族金傅为敬顺王，虏获部分王族、宰相和著名工匠，剽掠王室珍宝兵仗而归。甄萱对新罗王室的这次袭击，使新罗王朝事实上灭亡。但甄萱认为新罗王室作为傀儡还有一些用处，因此形式上保留了

① 《三国史记》卷五十，弓裔传。

② 《三国史记》卷五十，弓裔传。

新罗王室。可见甄萱突然袭击新罗的主要目的，是想在高丽和后百济的对立过程中，把新罗王室拽到自己一边，以便利用它的残存影响。

这时，王建率领五千骑兵于公山（今大邱东北）与甄萱接战，但遭到惨败。从此高丽和后百济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

甄萱对新罗王室的突然袭击，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使新罗王室把自己的命运更加寄托在高丽一边。王建继续注意怀柔新罗贵族，留意巩固后方，抓紧进行统一战争的准备。在此基础上，王建于公元934年向运州（今洪城）地区发动总进攻，杀后百济军三千多，甄萱的名将尚达、崔弼等纷纷投降，王建攻占了熊津（今公州）以北三十余城，全面威胁着后百济。

在这紧急关头，公元935年，后百济政权内部以甄萱的儿子神剑、良剑、龙剑、金刚等为中心，发生了争权夺利的内讧。春三月，神剑在新德、英顺等人的支持下，软禁甄萱于金山佛寺，派人杀弟金刚，自立为大王。三个月后，甄萱乘机逃出金佛寺，派人向王建致意。王建马上派将军黔弼、万岁等迎来甄萱，“尊为尚父，受馆以南宫，位在百官之上，赐扬州为食邑，兼赐金帛藩缙”^①。

这一事件震动了新罗王室，敬顺王于11月正式投降高丽。据《三国史记》，高丽王建对新罗王金傅的来降不仅给予“厚礼”，进而联姻。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加强统治阶级间的政治勾结，而且企图通过它进一步加强对新罗贵族地主势力和人民群众的控制。

甄萱的来降，进一步促进后百济的灭亡。公元936年9月，高丽动员八万七千五百兵力向后百济发动总攻。神剑率文武官来

^① 《三国史记》卷五十，甄萱传。

降。从此，高丽重新统一了朝鲜半岛。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所决定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有利于把朝鲜历史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节 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化

统一新罗时期，由于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和统一安定环境的出现，由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继承三国时期的优秀文化和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朝鲜民族的文化取得丰硕成果，出现古典文化的开化盛况。

一、宗教和哲学

统一新罗时期，宗教和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佛教及其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和研究。这时期，在整个社会生活尤其在文化思想领域中，佛教已占统治地位。佛教宣传“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其目的在于欺骗和麻痹人民，要人民安于现状，甘心忍受现世苦难，把希望寄托于来生，而放弃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因此，新罗统治阶级热心提倡佛教，论证它的“合理性”，把它定为国教。佛寺的营建，佛经的翻译研究，出家僧尼的数量，达到空前地步。在七世纪中期前后，新罗佛教形成五个教派——五教。八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禅宗的传播，逐渐形成禅宗系统的九派——九山。当时，伴随佛教的盛行，新罗僧侣往来唐朝，甚至到印度和印度以西地方去取经。

统一新罗时期有代表性的佛教哲学思想家是元晓（公元617—686年）。他是新罗封建贵族出身的有名的学僧，是海东宗的创始人，兼通八宗。他著有《大涅槃经宗要》、《法华经宗要》、

《金刚三昧经论》、《大乘起信论疏记》等九十九部二百四十余卷的著作。我国佛学家称他为“海东华严宗主”。他主张绝对精神的“一心”。在他看来，世上所有的东西都由“一心”所支配并发生、发展的，一旦离开它，世界和人本身都不能存在。所以他说，世界只有“一心”，它是永恒的，是既不发展又不消灭的永远的绝对存在。可见，他说的“一心”，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心，即人的主观意识，而是超越自然和社会以及人们的那种世界的源始，是能够支配世界的唯一的绝对精神实在。这是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他的社会观是反动的。他极力宣扬佛教的理想社会“极乐世界”。同时，他忠实地为新罗贵族地主政权效劳，赞颂新罗统治政权是什么“极乐社会”。虽然如此，他的哲学思想理论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他在逻辑思想上对概念、范畴的理解有一些辩证法的东西。

这一时期，义湘（公元625～702年）也是有影响力的佛教哲学思想家。他是朝鲜华严宗的开祖，他的主要著作有：《一乘法界图》、《千戴龟鉴图》等多种。他从哲学角度阐明现实世界个别现象的互相关系，比前人进步。当时，还有唯识宗佛教观念论哲学的代表人物大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九世纪出现了代表地方势力和下层僧侣利益的禅宗佛教哲学思想。

儒教与儒学思想的传播和研究在统一新罗继续发展。公元682年6月，新罗在中央设立国学，到公元747年春正月，置诸业（专业）博士、助教，招十五岁到三十岁的贵族子弟，用九年的学习研究儒教经典，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骨干。公元788年春，设读书三品科。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幸国学听讲”。公元八世纪末到九世纪期间，许多贵族子弟留唐研究儒学，其中考中唐朝状元的达五十八名。于是，统一新罗时期，儒教进一步广泛传播，出现强首、薛聪、金大问、金云卿、金可

纪、崔致远等许多儒学家。

在统一新罗末期哲学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汉学家崔致远（公元857—十世纪初）。他是贵族出身的大儒学家，也曾做过官。在新罗封建统治的腐败性日益暴露并面临总危机的情况下，崔致远对上层贵族的腐败做了一定的批评，提出一些进步的哲学思想。崔致远提出了世界始源于“太极”的观点，反对佛学家的“一心”说。他指出，宇宙当初处于“太极”的混杂状态，从中产生了天与地、阴与阳，以后在阴与阳的互相作用下产生了人间世界的万物。他反对“心”说，指出尽管心支配身，但终究是身造心。可见，他在宇宙观上有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崔致远在认识论方面反对生而知之，指出在人认识客观事物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后天的经验、知识，知识是经过后天的学习取得的。尤其其他主张人在认识真理面前没有贵贱之分，强调聪明人如不学习也无法认识真理。在社会观方面，他站在新兴地主势力一边，揭露了反动贵族的罪行。但他总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儒教理论上的，他坚持唯心主义观念论，为封建地主统治的总利益服务。他没有否定“天命”，承认“圣王”、“圣王”的意志支配人类社会发展，鼓吹封建儒教道德，指出当今新罗社会出现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遵守“三纲五常”，特别是他对农民起义采取敌视的态度。

在统一新罗时期，道教也继续传播，但未盛行。

二、文学和艺术

统一新罗的文学，继承和发展了三国以来的优秀文学传统，进入他的全盛时期。

新罗的歌谣，是采用乡札式标记法的朝鲜语抒情诗，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相当发展，到八世纪达到高峰。新罗歌谣，由于它固

有的特点，为人们普遍喜爱。新罗人认为他们的歌谣不仅能以崇高的感情教育人，而且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但这些作品几乎全部失传，保存至今的只有《三国遗事》中收录的十一首。元晓、得乌谷、永才、邀元郎、誉昕郎、桂元、叔宗郎、纯义等都是此时期产生的著名新罗歌谣作家。他们为发展新罗歌谣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学也同儒学一起得到很大发展。七世纪末的强首、薛聪等人既是大儒学家又是有名的汉文作家。八至九世纪又出现了金大问、崔致远等著名文学家。金大问有《高僧传》、《花郎世纪》、《乐本》、《汉山记》等。崔致远著有《四六集》、《桂苑笔耕》、《文集》等许多著作。

音乐、舞蹈也很发展。伽倻琴、玄琴和琵琶作为新罗乐器中的三弦得到很大发展。新罗独特的大琴、中琴和小琴也有显著的发展。音乐发展中又一重要成果是弹奏这些三弦的名手辈出。新罗的玉宝高，在智异山云上院经过五十年的修炼，创造了《上院曲》等三十首乐曲。后来，克宗又创造了七首乐曲。歌舞乐的发展也很明显，内容更为丰富，并因地区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新罗的音乐和舞蹈所取得的成就，为高丽以后朝鲜音乐和舞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它又给我国唐朝和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的音乐、舞蹈以一定的影响。

统一新罗的美术，同大兴佛教寺院的建筑结合在一起，进入黄金时代，创建了体现民族特点的优秀作品。佛国寺的建筑物、石窟庵的雕刻、奉德寺的铜钟、皇龙寺的铜钟、芬皇寺的铜像和万佛山等等，都是反映在建筑、雕刻、工艺等美术创作的各个部门中的高水平新罗美术作品。这时期出现的著名艺术大家，有雕刻家良志、工艺家朴韩味、书法家金生、画家率居和靖和等。当时，新罗的这些美术创作深受邻国的称赞，唐朝的代宗叹曰：

“新罗之巧，天造非〔人〕巧也”^①。

三、科学技术

统一新罗时期，科学技术方面有不少进步。

天文历算。公元717年，在国学设算学博士讲缀经三开九章六章，翌年在漏刻典置博士六名和史一名，其后到公元749年又增设天文博士一名。这是政府为适应当时天文历算事业的迅速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新罗的天文观测是比较发达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有不少天文气象观测记录，这些记录一般较详细，记载了日期与时表，气象天文变化的规模、过程与特点等。这两种文献反映的有关慧星的观测记录（大约二百七十年期间）有十九条，说明了新罗时期在天文观测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地理学也有显著成果，尤其在地理志、地图的编纂方面取得可喜成就。八世纪的著名佛僧、古代大陆旅行家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三卷就是其中的一例，为研究南亚和中东各国历史地理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外，医药、土木建筑、冶金铸造等各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少成就。

^① 《三国遗事》卷三，塔像，万佛山条。

第五章 高丽中央集权封建体制的加强 高丽人民反对契丹统治阶级的 入侵 十一世纪后半期到十二 世纪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高丽中央集权封建体制的加强

公元十世纪时，高丽统治阶级不仅统一了后三国的分裂局面，而且整顿了后三国以来极为紊乱的封建统治机构，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一、中央官制

高丽王朝建立后，王建等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迫切需要重新整顿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国家机构。

918年，高丽建国，参照统一新罗和泰封国的统治制度，虽然设置了一些迫切需要的官僚机构，分担各项政务，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官制一直不健全。

直到十世纪末，中央官制才有所齐备。从那以后，虽然多少有过变迁，但当时确定的中央官制，则成为整个高丽王朝官制的基础。

中央机关的核心是三省，即：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和三司。

内史门下省统管国家全盘事务，也有进谏国王和充当顾问的职责。长官为内史令，是文班的最高官吏，下有门下侍中及其以

下的高级官吏。

尚书都省管理文武百官，长官为尚书令，下有侍中及其以下的官吏。

三司是总管国家财政的机关，长官称判事（判三司事）。

尚书都省下设六部，各部分别负责有关事宜。六部是最高的行政执行机关。具体分工如下：

吏部——负责文武官僚的人事；

兵部——负责军事、邮驿以及武班官僚等的人事；

户部——负责有关全国户籍和租税事务；

刑部——负责有关刑罚和奴婢事务；

礼部——负责祭祀、外交和教育；

工部——负责有关国家建筑事业和手工业事务。

中央机关除三省六部外，还有负责司法监察的御史台、拟订国家重要文书的翰林院、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监（大学）等重要机关。在这些中央上级机关之下，还有各种官僚机构几十个，分掌一般庶务。

二、地方官制

高丽王朝建立初期，中央集权还很薄弱，国内各地仍然是城主、将军等地方封建势力掌握大权的分权统治局面。

但是建国后数十年间，采取了加强主权的措施，尤其是实行了田柴科制度，掌握了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从而奠定了对地方行政实行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

983年，高丽政府根据国家元老崔承老的建议，在扬州、海州、忠州、清州、公州、全州、尚州、晋州、罗州、升州、黄州、广州等十二个主要地区建立了牧，并指派地方官。

995年，划分全国为关内、中原、河南、澳西等十个道，下

设府、郡、县，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地方统治体系。同时，把地处中心地区的十二个牧改为州，并在这里设十二个军，如扬州设左神策军，海州设右神策军，黄州设天德军，由节度使掌管这些军队并兼任地方监察。这是在中央对地方控制尚较薄弱的情况下，为了加强统治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直到 1012 年，中央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地方统治秩序得到安定后，才废除了这种节度使制度。

十道和十二州（牧）^①

十 道	现代地区	十 二 州
关内道	京畿、黄海道	扬州、广州、黄州、海州
中原道	忠清北道	忠州、清州
河南道	忠清南道	公州
江南道	全罗北道	全州
海阳道	全罗南道	罗州、升州（现全南顺天）
岭南道	庆尚北道一部	尚州
岭东道	庆尚南北道一部	
山南道	庆尚南道一部	晋州
朔方道	江原、咸南各一部	
溟西道	平安道	

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高丽人民一方面有效地击退了契丹统治阶级的入侵，另一方面在西北向鸭绿江流域，在东北向现今咸镜道南部不断开拓经营。于是，到 1018 年以后，行政区划又发生变化。除新设的京畿外，将全国划分为五道和两界，在重要地

^① 《朝鲜史》（二），第 84、85 页，朝鲜教育图书出版社 1958 年版。

区设立四都护府和八牧，并任命按察使为各道长官。五道两界制度几乎存在于整个高丽时代。

五道两界^①

区分	道界	现在地区	四大都护	八牧
京畿	京畿	现在京畿的赤县和畿县		清州、忠州、广州
五道	杨广道	除赤县和畿县外的现在的京畿、忠清		
	庆尚道	同现在		晋州、尚州
	全罗道	同现在	安南	全州、罗州
	交州道	江原道一部		
两界	西海道	黄海道	安西	黄州
	东界面 (东北面)	现在的江原和咸南的一部	安边	
	西界面 (西北面)	平安道	安北	

由于地方统治体系的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更加密切，而保障和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则是邮驿制度。

983年，在联结首都开京和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重要地点设置了驿（当时全国主要交通线有二十二条，设驿五百二十五处，992年后又增设若干驿），配备了驿卒和马匹，并修建了供来往官吏食宿的客店。同时，还在主要渡口和浦口设置了通渡设备。此外，在各较大的山峰设烽燧，负责向开京传达边防和沿海地区的军事情报。这些设备，对中央同地方的联系，对租税的运送以及军事动员等等，都起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央集权统治的动脉。

① 《朝鲜史》（二），第84、85页，朝鲜教育图书出版社1958年版。

三、军事制度

高丽统治者为用武力确保自己的统治，建立了军事制度。高丽的军制，是由二十岁到六十岁的良人壮丁义务服役的府兵制^①。府兵制的实行，意味着国家对全国良人壮丁的统治权已经树立。

穆宗统治时期（998～1009年），中央军由二军六卫四十五领组成，总兵力达四万五千名^②。其编制情况如下：

一军	鹰扬军	一领
	龙虎军	二领
六卫	左右卫	十三领
	神虎卫	七领
	兴威卫	十二领
	金吾卫	七领
	千牛卫	二领
	监门卫	一领

除中央正规军外，地方各主要地区还有由节度使（或兵马使）掌握的地方军，总数约为十万。可见，高丽曾经掌握约达十五万多人的中央和地方的常备军。这支庞大常备军的最高统率权，直接属于国王，下设高级文官组成的中枢院为国王的辅佐，而军事行政则由兵部担任。

武班官僚虽系两班之一，但较文班官僚待遇低，即对武班官僚不授与足以左右整个国家局势的职位和权势，这是高丽以来朝

^① 史学界对高丽的军制还未得到一致意见，需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② 每个领有正军一千名和望军六百名，因此，当时高丽的中央军除正军四万五千名外，还有望军二万七千名。

鲜中央集权统治机构的特点，这种文尊武卑的倾向越到后期越为严重，它成为十二世纪武臣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高丽王朝的武班，比起李朝时期，还是有相当实权的，他们不仅经常领有一定数量的军人，并拥有全由武官组成的重房、将军房和郎将房等自己的官僚机构。

总数约达十五万多人的庞大常备兵力和重房、将军房等武班官僚组织，是十世纪后半期以后使高丽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保证。

四、土地制度

高丽封建国家一开始就很重视土地问题。土地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生产手段，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

全国土地，无论归谁所有，原则上都由国家控制，征收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田租”（实为田税，《高丽史》没有明确区分田租和田税）。高丽王朝一方面尽量限制不断扩展的封建土地私有的无限扩大，另一方面通过收租（税）加强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与此同时，高丽王朝从建国伊始，就向支持它的开国功臣和封建地主以禄邑、赐田等名义授田。所谓授田并非授予土地的所有权，只是授予对该土地的收租（税）权，当然，这项土地属于私田。到940年，又制定了役分田制。据《高丽史》：“太祖二十三年（940年），初定役分田，统合时，朝臣、军士，勿论官阶，视人性行善恶，功劳大小，给之有差。”^①

有关役分田制的内容，迄今尚未见到更详细的记载。然而，这个制度是对统一有功的一切文武官僚以至部分上层军人，据其社会身分和功劳大小，分别授予一定数量的公田收租（税）权，

^①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

以求得他们对国家的更加忠诚。这是对过去实行的赐田、禄邑制的进一步推广，也是后来实行的田柴科制的雏形。

976年，高丽封建国家终于颁布了田柴科制度，统一规定了封建官僚和其他吏役的收租（税）权。

国家将全部土地和山林登记造册，将一部分土地的收租（税）权按等级分给文武百官、府兵和闲人，并按等级分给烧柴林。对此，《高丽史》写道：“景宗元年（976年）十一月，始定职散官各品田柴科，勿论官品高低，但以人品定之。紫衫以上作十八品……文班丹衫以上作十品……绯衫（以上）作八品……绿衫以上作十品……殿中、司天、延寿、尚膳院等杂业丹衫以上作十品……绯衫以上作八品……绿衫以上作十品……武班丹衫以上作五品……以下杂吏各以人品支給不同，其未给此年科等者，一切给田十五结”^①。

可见，田柴科的规定异常烦琐复杂，授田对象不按“官品高低”而按“人品”，按对国家的忠诚程度，等级共分七十九等，最高者得田柴各一百一十结，最低者田二十二结柴十结^②。这些土地（实为收租即收税权）和烧柴林，原则上只限一代，本人死后便归还国家。

其后，田柴科制度经过了多次调整。即，998年把原先的“职散官各品田柴科”改定为“文武两班及军人田柴科”；1034年又“改定两班及军闲人田柴科”；1076年“更定两班田柴科”等。每次调整田柴科时都表现出一种特点，即不但授田面积大

①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田柴科条。

② 据918年规定的“田租”推算，当时一结土地的产量可达二十石（一石为十五斗）。现在朝鲜史学界的一些人认为这个产量不符实际，实际产量要比它低得多。

减，而且授田对象也大为减少。

高丽王朝在田柴科的基础上实行了“府兵制”，授给府兵以“军人田柴”作为服役的报酬。据《高丽史》载，府兵“满二十岁始受（田十五结），六十而还。有子孙亲戚，则递田丁，无者籍监门衙。七十后给口分田，收余田。无后身死者及战亡者妻亦皆给口分田”^①。府兵从国家那里得到一定的土地收租（税）权利，而且以“递田丁”或以“口分田”名义，世袭其一部分土地的收租（税）权利；但实际上只有少部分人，即府兵中之上层，能够享有这份权利。尽管如此，府兵制实施的结果，加强了高丽王朝的军事力量。闲人（亦称闲良，一般指农村富有者）也与府兵一样，享有一定的土地收租（税）权。

1049年5月，高丽国家颁布了“功荫田柴”，对一品至五品的高级官吏，分别赐予自“田二十五结，柴十五结”至“田十五结，柴五结”的土地收租（税）权。这类田柴可以世袭，为后来的土地兼并，脱离中央控制，提供了方便条件。

983年和993年，又分别颁布了公廨田柴制度，国家各机关（包括中央和地方机关，但《高丽史》食货志却只有关于地方公廨田柴的规定）都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收租（税）权，用作机关经费。

通过上述一些措施，高丽王朝的土地制度，到公元十世纪末前后，基本上确定下来。

国家实行田柴科等土地制度，通过收租（税）权支配了全国的土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罗末期以来大贵族和各地封建势力的无限权力。封建国家虽把一部分土地的收租（税）权转让给贵族、官僚和地主，但仅仅是国家掌握的土地的一少部分，

^①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条。

其余的大量的土地仍直接掌握在国家手里，从而使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隶属于国家，向国家缴纳田租（税）。因此，田柴科等土地制度的实施，是高丽封建国家借以发展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础。

田柴科等土地制度的实施，本质上是重新确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绝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仍在封建地主（包括上层良人农民）手中，国家只是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通过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收租（税）权支配全国土地，把它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广大农民仍然遭受残酷剥削。农民名义上向国家或受田者缴纳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田租（税），实际上却受到更多的剥削。无地农民还得向地主缴纳二分之一以上的地租。此外，农民还要向国家和贵族缴纳各种贡物，服徭役和兵役。农民还遭受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剥削。因此，田柴科等土地制度的实施，并未解决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依旧存在，而且继续发展，终于爆发了公元十二世纪的全国性农民战争。

田柴科等土地制度的实施，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支配，防止公田化为私有土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力满足文武官僚和封建地主对土地的欲望，用这种手段笼络他们，以加强自己的统治。高丽王朝所追求的这一目的，显然存在着矛盾。田柴科基本上是把重点放在对现职官僚的授田上，但它也向退職官僚授田，还按“人品”授田，所以有些贵族不是官僚，也可以受田，尤其是存在着对土地（如功荫田柴）继承的规定，这些都构成削弱中央集权制度的潜在因素。

因此，田柴科等土地制度从实施的那一天起，就包含着矛盾。主要表现为官僚贵族不断兼并公田，化公为私；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则脱离了土地（公田）。因此，国家支配的公田日益减少，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到公元十二世纪以后，尤其到公元十三—

十四世纪，高丽的田柴科制度受到彻底破坏，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终于出现了土地面积“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的大农庄主，丧失了高丽中央集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最后导致了它的灭亡。

第二节 高丽人民反对契丹统治阶级的入侵

一、十世纪末高丽的内外形势

十世纪三十年代高丽统一后三国之后，由于新王朝施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新罗末期那种极度混乱的社会状况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扭转。

人民生活安定下来，积极从事生产，肥沃平原垦为大量农田，使当时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有了显著发展。到十世纪末，剪除全国各地的诸小封建割据势力，并通过收租（税）权，国家对全国土地确立了支配权。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各种统治机构亦基本完备。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能够行使权力，多少控制了当时的贵族、大地主和封建官吏，使他们不能象新罗末期那样肆无忌惮地盘剥国家和掠夺人民。如980年，国家规定高利贷的利率，禁止利息高于本金的盘剥，以免人民生活遭致破产。987年，收回各州郡的武器，铸造农具，还规定不得在春季繁殖期间屠宰母畜，禁止滥伐森林。988年，国王谕告全国：除有关防御外敌的工事外，不得大批动员农民，以免影响农业生产。

上述一系列改革政策，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国家积蓄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到十世纪末，高丽封建国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整个国家生活的稳定，保障了高丽王朝对外防务的不断加强。

公元十世纪初，居住在我国东北和内蒙一带的契丹族在阿保机的领导下建立了辽王朝，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辽王朝在自身成长过程中不断进行征服战争，扩大领土。926年，契丹统治阶级灭亡渤海后，改辽阳为东京，严重威胁高丽的独立和安全；936年，辽又灭后唐，占领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和山西北部）。

契丹在进入公元十世纪后半期后，进一步扩大对邻近各族的征服战争。在西南方面继续占有燕云十六州一带，加紧威胁宋朝。要宋朝每年缴纳大批岁贡；在东南方面则以他们的东京为中心，进一步加紧对女真族的征服。他们在983年、985年和989年，接连进攻高丽西北方的女真族，并逐渐逼近鸭绿江北岸。991年，终于在鸭绿江北岸（现在的义州对面）修筑了威寇、振化、米远等三要塞。

高丽与契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王朝为加强对西北方的防守，积极开拓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终于在992年前后，将鸭绿江下游南岸的女真族驱逐到长白山北部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威远镇（位于义州南二十五里）。

高丽一方面全力加强防守，在西北部修筑许多山城，另一方面尽量同与契丹关系利害一致的宋朝加强联系，以牵制契丹的后方。但高丽却极力避免与契丹的直接武装冲突。

二、契丹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入侵及其被击退

契丹统治阶级早已推进到鸭绿江北岸，企图征服高丽。993年10月，契丹的东京留守肖遂宁率领八十万大军侵入高丽北境。强大的契丹军在蓬山郡（今平安北道龟城西南约三十里）战役中突破高丽防线，继续南进，直抵清川江北岸，肖遂宁派使节劝高丽投降，提出所谓的“议和”条件，要求高丽割让西北部领土。

高丽早已把西京作为北方的主要据点，修筑很多城堡，加强了国防力量。尤其是高丽人民，充分发扬了爱国精神，与契丹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因此，契丹军虽在蓬山郡战役中取得胜利，但却遇到高丽人民的顽强反抗。然而，一些妥协怯懦的高丽统治者（包括国王），被契丹的声势所吓倒，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主张投降，企图无条件地割让西京以北地方。

但是，实际上指挥这场战争的徐熙将军和爱国将领们则坚决反对那些统治者的怯懦态度，与热情高涨的抗战人民相呼应，指出，“割地与敌，万世之耻也”。^①

当高丽朝廷围绕“议和条件”进行争论时，契丹军加紧策划谈判，并为迫使高丽政府早日屈服，决定采取新的军事步骤，向安戎镇（现安州以西六十五里处）发动进攻。

防守安戎镇的高丽军民，在中郎将大道秀和郎将庾方指挥下，勇敢战斗，击退来犯的契丹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契丹军在安戎镇战斗中尝到高丽人民顽强战斗的厉害后，再也不敢进行军事冒险，只好急忙派出使臣前来“议和”。这样，高丽和契丹进行了谈判。高丽全权代表中军使徐熙将军和契丹军总指挥肖逊宁开始谈判，肖逊宁提出割让领土等要求，妄图通过谈判得到在军事冒险中未能得到的东西。但是，高丽人民在安戎镇战斗中的胜利，大大有利于谈判中的高丽方面，使徐熙将军能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痛斥肖逊宁的荒唐要求，并在谈判过程中宣布：高丽今后将驱逐西北地区的女真，进一步扩大西北部领土。高丽在对敌作战和谈判中都取得胜利。而契丹统治阶级在这次入侵过程中却毫无所得，被迫撤走。

高丽的徐熙将军是一位军事战略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外交

^① 《高丽史》卷九十四，徐熙传。

家。他不仅在指挥反对契丹军的战斗中建立了伟大功勋，而且在与肖逊宁的谈判中，也充分显示了高丽人民刚毅不屈的气概。徐熙将军所以能在谈判桌上制服敌人，主要是高丽军民在安戎镇防御战中取得胜利的结果，也是高丽人民具有不屈斗志和高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结果。

三、契丹军的第二次入侵及其被击退

高丽人民击退契丹统治阶级的第一次入侵后，两国保持了短时的和平关系。但是，契丹并未放弃入侵高丽的野心，而高丽政府也进一步加强北方的防御，促进北方的开发。高丽于994年至996年期间，在驱逐女真的同时，开辟了长兴镇（今泰川）、归化镇（今龟城和泰川之间或龟城和云山之间的某地）、郭州（今郭山）、龟州（今龟城）、安义镇（今龟城西北七十里）、兴化镇（今义州东南二十五里）、宣州（今宣川）和孟州（今孟山）等地，并在这些地方筑起城堡。这样，高丽便扩大了西北领土，更加强了西北部的边防。

同时，高丽政府也努力整顿和加强国内秩序，继续实行劝农政策，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高丽还恢复了一度中断了的与宋的关系，努力加强同它的联系。高丽的国力日益强大。

但到1009年2月，高丽王室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出现复杂局面。这时，西北面都巡检使康兆发动政变，率领所部西北地区军队打到开京，杀死穆宗，拥显宗为新王。这一事件在高丽统治者内部一度引起混乱，西北地区的防御也松弛下来，它成了契丹统治阶级第二次入侵的绝好机会。

1010年11月，契丹皇帝圣宗以“问前王之故”为借口，亲率四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首先进入兴化镇。但是以杨规将军

为首的全体高丽军民，始终死守该城，顽强战斗，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企图速战速决的契丹军被迫放弃兴化镇，把二十万军队留在兴化镇附近，其余的二十万军队继续南下，进犯通州。这时，率领几十万军队在通州迎战的康兆将军战败，契丹军暂时包围了西京（今平壤）。然而，西京军民在统军录事赵元指挥下，处死了投降派官吏，焚烧了他们起草的投降书，发扬爱国精神，固守城池，勇敢奋战，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契丹军不得不放弃进攻西京的计划。但契丹军利令智昏，妄想占领首都开京，迫使国王投降，以实现其征服高丽的野心，而终于走上更加冒险的道路。

随着契丹军的进一步入侵，高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情绪更加高昂，直接与敌对峙的西北各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也日益壮大。兴化镇和西京仍在固守。而在敌人后方，杨规将军统率的高丽军队，歼灭了驻在郭州城（今平安北道郭山）的六千余敌人，夺回城池，救出人民，切断了敌人与后方的联系。

继续入侵的契丹军，不顾伤亡重大，直逼开京。这时，高丽王室内部一时发生动摇，两班统治者们大部分主张投降。但人民群众却毫不动摇，英勇抗击，从南北两方夹击敌人。当时，礼部侍郎姜邯瓚将军等爱国大臣则与人民同仇敌忾，积极配合抗战。姜邯瓚将军驳斥了亡国投降论，坚决主张持久抗战。他指出：“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寡不敌众，当避其锋，徐图兴复耳。”^①为此，他主张国王应暂时向南撤退。

姜邯瓚将军等依靠人民不屈的抗战意志，正确判断形势，提出爱国主张，克服了王庭内部一度产生的动摇。高丽政府采纳姜邯瓚的建议，在1010年12月28日，撤离开京，南退罗州。第二年1月1日，敌人窜入开京，残酷地进行掠夺、破坏、纵火，

^① 《高丽史》卷九十四，姜邯瓚传。

屠杀了无数的和平居民。

但是，契丹军在开京一带未能达到任何预期目的。高丽人民的抗战情绪日益高涨。高丽军民实行传统的坚壁清野战术，契丹军无法得到一粒粮食。契丹军内部深感粮食不足，军队士气逐日低落。这一切，使契丹全军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

惊惶失措的契丹入侵者，不得不以高丽上朝“亲朝”为借口，从1月11日开始撤退。

高丽军民趁契丹军撤退之机，再一次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在敌人后方活动的杨规、金叔兴等人，率所属高丽军在龟州等地给撤退之敌军以沉重打击，并一直追击到鸭绿江边。杨规、金叔兴等人在这次驱逐契丹军的最后斗争中壮烈牺牲。

这样，契丹统治阶级的第二次入侵又被英勇的高丽爱国人民所击退。

四、契丹军的第三次入侵及其被击退 高丽人民胜利的原因

高丽人民以再度胜利结束了同契丹军的第二次战争，它大大提高了高丽的威信。但契丹统治阶级自夸为雄强大国，继续威胁高丽，强硬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不但督促高丽王朝“亲朝”，而且要求割让清川江以北的六镇^①。当这些无理要求被拒绝时，契丹统治阶级又想以武力征服高丽。1013年、1014年、1015年、1017年，契丹连续进犯高丽北境，但每一次的入侵，都遭到可耻的失败。

^① 六镇是兴化镇、通州、龙州（今龙川）、铁州（今铁山）、鄆州和龟州等六城。

1018年12月，契丹以肖排押为都统，率十万大军对高丽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高丽以西北面行营都统使姜邯瓚为上元帅、大将军姜民瞻为副元帅率领二十万八千三百名的防御军，妥善地布置在第一线，本部则设在宁州（今安州）。姜邯瓚将军依据同契丹军两次作战的经验，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以便正确发挥高丽军山地作战的长处，一旦与敌交锋，立即给以迎头痛击。他选拔精锐骑兵一万二千名，埋伏在第一线要塞兴化镇附近的山谷，又在城东大川（今三桥川）用数百张牛皮袋截住江流。不了解姜邯瓚将军这一战术的契丹军队，强渡鸭绿江，攻打兴化镇。这时，高丽军队把截住的江水放开，敌人遂被洪水淹没，加上一万二千名伏兵的奇袭，使契丹军大败。敌人虽遭受重大打击，但仍然继续南下开京。高丽军队到处阻截或迎击契丹军。副元帅姜民瞻部队在慈州来口山（今平安南道舍人场附近）再次重创敌人，西京防御军在马滩（大同江渡口，今平壤美林里）歼灭万余名敌人，获得辉煌战果。契丹军遭到沉重打击，却从不考虑与后方的联系，继续南下。翌年（1019年）1月初，到达离开京不远的新恩县（今黄海北道新溪）。

姜邯瓚将军鉴于敌人已向开京疯狂扑来，便特别加强对开京的防卫。他命判官金宗铉“领兵一万倍道入卫（开京），东北面兵马使亦遣兵三千三百入援（开京）”^①，使开京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高丽军还采取传统的坚壁清野战术，将开京周围一百里内外的居民全部迁入城内，城外不留一粒粮食，使开京周围完全变成无人区。

肖排押部队逼近开京附近以后，不但遭到顽强的抵抗，而且后方被切断，得不到一粒粮食，士气日益低落，陷入严重的困

^① 《高丽史》卷九十四，姜邯瓚传。

境。敌人到新恩县后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只好等待进攻的时机。他们一方面致函高丽军队，表示“撤军”，另一方面又派遣三百名骑兵到开京附近进行侦察，妄图奇袭开京。然而，这支骑兵部队也被高丽开京防御军全部歼灭，无一生还。惊惶失措的敌人，终于不得不开始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又遭到不断打击。

高丽军在漣州（今价川）和渭州（今宁边）一带袭击逃敌，打死击伤五百余名。当退军到龟州时，正好姜邯瓚将军把大军集结在龟州城，等待敌人，同时与追击敌人的金宗铉部队汇合，南北夹攻，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从石川（今平安北道龟城前皇华）到盘岭（距今龟城西北三十里的八营岭）的三十里地带，敌人“僵尸蔽野”，高丽军还“俘获人口、马驼、甲冑、兵仗，不可胜数，生还者仅数千人，契丹之败未有如此之甚”^①，史称此为“龟州大捷”。契丹统治阶级对高丽的入侵彻底被粉碎，此后契丹再也不敢妄想征服高丽了。

高丽人民反对契丹统治阶级入侵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敌人入侵过程中，高丽人民为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发扬了无比的英雄主义气概，进行了忘我的勇敢斗争。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最根本保证。

第二，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对比和朝鲜自然条件的姜邯瓚将军的天才战略，以及杨规等军的正确指挥，使高丽人民充分发挥了爱国精神和无穷的战斗力量。正象金日成同志指出的那样：“当几十万契丹军打进来的时候，高丽人民在名将姜邯瓚将军的指挥

^① 《高丽史》卷九十四，姜邯瓚传

下，在鸭绿江和龟城，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保卫了国家。”^①

第三，高丽人民的胜利，与高丽封建国家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不无关联，它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动员数十万军队，并保障了这些军队所需武器和粮食等物资。

第四，契丹统治阶级虽然前后三次动员了一百数十万的大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入侵，但他们的士兵是被迫打仗的，他们的战斗目标不明确，士气低落，这在客观上为高丽人民的反入侵斗争造成有利条件。

这次战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高丽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而且保证了其后较长时期的和平生活，使高丽国家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带来战后文化的繁荣昌盛，使高丽的国际威信更加提高。

第三节 十一世纪后半期到十二 世纪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1. 农业生产的发展

公元十一世纪中期以后，高丽的社会经济得到较为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是由于：第一，击退了契丹统治阶级多次的大规模入侵，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使人民能在安定的环境下积极从事生产；第二，随着和平的到来，高丽封建国家为安定人民生活，推动了各项改革政策（如劝农政策），努力医治战争的创伤。

^① 《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第一卷，中文版，第74页，朝鲜平壤外国文出版社出版。

1019年4月，刚刚击退契丹的第三次大举入侵，国家就把粮食和种子分给备受掠夺的“遂安、象山、峡溪、新恩等县”^①人民，从而保障了当年的农业生产。11月，又“徙江南州县丁户，以实象山、伊川、遂安、新恩、峡溪、牛峰等县”^②，使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

1021年，对安州人民自契丹第二次入侵后一直未交的租税，减免一半，并免除了此后两年的租税。

为使战祸惨重的地区得以迅速恢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特别措施。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劝农政策：农忙季节禁止任意动员农民，尤其在立春以后不许地方官吏随意逮捕和拘禁农民；积极采取措施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对残酷剥削农民的高利贷给以一定限制。1028年又命令各地，每户每年植桑树十五至二十株，以发展养蚕业。

这样，封建政府为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增加租税来源，采取了各项劝农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广大的人民则以辛勤的劳动开垦了大量荒地，制造优良农具，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据《高丽史》记载，1054年，国家颁布了田品和租税规定，“凡田品，不易之地为上；一易之地为中；再易之地为下。不易山田一结，准平田一结；一易田二结”。^③ 这比以前更为详细明确地规定了按土质肥瘠来划分田品，交纳租税。它不仅肯定了平田，而且对山田也作了细致的规定。当然，这种规定反映了封建剥削的残酷性，但另一方面，它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垦荒事业的

① 《高丽史节要》卷三，显示宗10年4月条。

② 《高丽史》卷四，显示宗10年11月条。

③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三，田制，经理条。

进展情况。公元十二世纪初到高丽的宋人徐兢曾写道：“高丽，多大山深谷……而少平地，故治田多于山间，田其高下，耕垦甚力，远望如梯磴”^①。这充分说明当时高丽人民不仅开垦了平地，而且开垦了大量的山坡地，证明高丽开垦事业的发展情况。

高丽还制造了大量的优良农具。1018年，高丽在反对契丹统治阶级入侵的斗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已能帮助“于山国（今朝鲜郁陵岛）……遣李元龟赐农器”^②，从而可以推测出，战争结束后高丽有足够能力集中力量制造更多的优良铁农具。因此，徐兢才在《高丽图经》中说，高丽农具与宋朝“农具大同小异”^③，说明公元十二世纪初高丽农具已达到宋朝农具的发展水平。当时，大量优秀农具的制造与开垦事业的扩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增加了国家的租税收入。

大量的谷物租税集中到首都开京，各地的漕仓都积存着不少粮食。为将各地漕仓的税谷运往开京，靖宗（1035至1046年）时期，对各漕仓漕运船只数目作了新的规定，如1046年，对石头（今马浦）、河阳（今牙山）等十个漕仓，安排了能装载千石的大漕运船各六艘；对兴元（今元州）、德兴（今忠州）等主要利用河川的漕仓，安排了能装载二百石的漕运船各二十艘。当时，尽管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能在较短的数十年内医好严重的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都是高丽人民坚持不懈努力劳作的结果，也是由于朝鲜封建制度还在向前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2. 手工业的发展

① 《高丽图经》卷二十三，杂俗二，种艺。

② 《高丽史》卷四，显宗9年11月条。

③ 《高丽图经》卷第二十三，杂俗二，种艺。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也发展起来。

在首都开京，就设有制造武器的军器监、制造王室装饰品的中尚署、制造各种金属制品的掌冶署、专门染色和制造各种染料的都染署等许多手工业管理机关，它管辖皮甲匠、漆匠、小木匠、雕刻匠、银匠、白铜匠、生铁匠、罗匠、石匠、靴匠和螺钿匠等数十种专门手工业部门。在中央官府手工业部门里，有专门手工业匠人和由各地临时动员服役的匠人，从事各种手工业品的生产。

各地方，纸、毛笔、墨等各种文具和铁器、输器、陶器、食盐等各种手工业部门都有很大发展。他们把自己制造出来的一部分产品以常贡或别贡的名目向国家纳贡，有时还要向中央或地方官厅上番立役。

作为农民副业的家庭手工业也比以前大有发展，在这些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各种衣料。

高丽的手工业技术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甚至闻名国外；北宋人徐兢在他的见闻录中指出：“高丽工技至巧”^①，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3. 商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使商业发展。1040年，高丽政府采取措施，制定度量衡，统一升斗。度量衡的制定和整顿，是使封建剥削更加合理化的一种措施，但也反映国内商品流通的日益活跃，并进一步促进商品流通。

中央和个别地区的城市设有集市，买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统治阶级的奢侈用品。首都开京发展成高丽最大的市场。这里挂着“永通”、“广德”、“兴善”等招牌的特权商人店铺鳞次栉比，人

^① 《高丽图经》卷十九，工技条。

们称它为长行廊或长屋。这里进行买卖的主要是各种绸缎、工艺品和其它手工业产品以及各地的各种土特产。各地的行政中心也设有乡市。开京市场受京市署的监督，地方市场受地方官厅的监督，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统治，它阻碍了商人阶层的自由发展。

市场的扩大是以商品流通的发展为前提的。当时，商品流通的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虽然是在自然经济的范畴内进行的，但它却促进了金属货币的出现。

早在十世纪末，高丽就使用过国家铸造的金属货币，但不久就停止使用了。1097年，封建政府设铸钱官，又铸造了金属货币，并开始通用。政府铸造了三韩通宝、东国通宝、海东通宝等金属货币，使之在开京市内酒店和店铺通用。又命令各州、县以国家资财设置酒店，使人民用金属货币进行买卖。此外，以一斤重的银，仿高丽地形，制造了银瓶（俗称阔口），当作货币使用。但是，也有一些贵族和商人在制造银瓶时掺铜牟利。金属货币虽在公元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时多少得到流通，但流通的时间并不太长，其后又以米和布作为交换媒介。这就说明当时货币的流通还未冲破自然经济的牢固束缚。

4. 对外贸易的发展

从公元十一世纪中叶以后，高丽国内的各项生产和商业都有新的发展，同邻近各国的贸易也空前活跃起来。

高丽对外贸易的最大对象是宋朝。两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使节往来进行的国家贸易，另一种是民间贸易。

两国早已建立友好关系，交换使节，每逢有使节往来便进行国家贸易。

高丽胜利击退契丹统治阶级入侵以后，尤其在十一世纪后半期到十二世纪前半期的一段时间，同宋的使节往来特别繁繁，国

家贸易也空前活跃。据《高丽史》统计，自1071至1136年间，高丽使节去宋二十六次（其中一次中途返回），宋使到高丽二十二次（其中，中央派遣的十五次，明州等地方派遣的七次）。两国使节除完成政治任务外，还要完成贸易任务。双方通过使节以“朝贡”，“赐物”或互换“礼物”，进行商品交换。此外，两国政府都允许使节团的成员进行个人交易，并从各方面予以方便。

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高丽同宋朝的民间贸易也有很大发展。据《高丽史》统计，1012至1192年的一百八十一年间，宋商人到高丽活动的，有一百一十七次，其中能知道具体人数的七十七次，每次为数名，数十名乃至三百多名不等，计四千五百四十八人次。平时，住在高丽的宋朝人也很多。《宋史》写道：高丽“王城（开京）有华人数百，多闽人”^①。

在两国的贸易中，高丽对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金、银、铜、人参、茯苓、松子、毛皮、黄漆、硫黄、绫罗、苧布、麻布、马匹、鞍具、袍、褥、香油、金银铜器、螺钿器具、文席、扇子、毛笔、墨等。这些商品中，人参、松子、文席、白纸、毛笔、墨和扇子等，更受宋人的喜爱和赞赏。

高丽从宋朝输入的商品大约有：绫绢、锦罗、白绢、金银器、礼服、瓷器、宝玉、马匹、鞍具、玳瑁、药材、茶、酒、书籍、乐器、蜡烛、孔雀、鹦鹉等。这些商品通过两国商人（包括使节）的往来大量流入高丽。它首先满足高丽国王和高级贵族的奢侈淫欲，同时也对高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高丽同宋朝之间的贸易航路相当发达。当时，高丽商人（包括国家使节）主要由现今开城附近的礼成江口出航，沿西海岸北上，经瓮津半岛抵大同江口的草岛（或云椒岛），再转向西南，

^①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

直达山东半岛的登州，称此路为北路；或者沿西海岸南下，经古群山群岛抵黑山岛，转向西南，直达今浙江省的明州，称此为南路。

两国航路，以1074年为界，前后有显著改变：其前，主要利用北路；其后，主要利用南路。此后，明州成为两国航路中宋朝一侧的主要港口。高丽礼成江口的碧澜渡也一直很繁荣。

高丽与契丹、女真以及日本，甚至远与阿拉伯商人之间，也进行了贸易。

1019年，高丽与契丹恢复和平邦交。从此以后，两国几乎每年有一次或数次互派使节。每当使节往来时，两国以互换礼物的形式进行国家贸易。高丽向契丹输出金吸瓶、夏布、墨等奢侈品，从契丹输入马、羊、车辆和大藏经等。除国家贸易外，边境地区的私商也进行日用品的交易。在高丽同契丹的贸易中，国家贸易虽占优势，但因双方暗中牵制，故不十分活跃。

这时期，同女真的贸易颇为活跃。从事交易的女真人几乎每月都来高丽，人数也很多。他们以马、各种皮革和箭簇等特产品，换回粮食、衣料等生活必需品。

十一世纪后半期，日本商人的来往也比较频繁。日本商人主要以硫磺、铜、橘子、海产品、竹制品以及水银等进行交易，换取高丽的各种特产品。高丽也在宋朝和日本之间从事中转贸易。如日本的硫磺和铜，经过高丽输出到宋朝。

高丽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它的名声远扬到阿拉伯。据《高丽史》记载，公元十一世纪前半期数以百计的大食国商人先后三次来高丽进行交易，他们运来“水银、龙齿、占城香、没药、大苏木”等特产品，换回高丽的“金帛”（高级绸缎）等物品^①，加

^① 《高丽史》卷五，显示宗15、16年条；卷六，靖宗6年条。

强了中东地区同朝鲜半岛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当时，通过水陆两路同高丽进行交易的国家和地区相当多，高丽的国际威望也很高。高丽为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在首都开京按不同国家设立了“客馆”，一次能容纳数百人，不少外商经常在此逗留。据《高丽史》记载，1055年二月“寒食日”，高丽政府在开京各“客馆”，一次就招待三百九十八名外商^①。这说明当时住在开京各“客馆”的外商总数之多达到惊人的程度。

这样，公元十一世纪后半期以来，高丽首都开京和礼成江口的碧澜渡，以国际贸易尤其以与宋朝贸易的中心地而著名。公元十三世纪，高丽著名文学家李奎报曾吟诗赞颂礼成江：“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指中国南部）”，^②它反映了礼成江口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和与宋朝贸易的空前盛况。

二、文化的发展

公元十一世纪后半期到十二世纪初，中间大约六七十年，即文宗统治时期前后，是高丽封建国家的文化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高丽文化所以达到繁荣阶段，主要原因是：第一，从高丽建国以后，中央集权的确立和疆域的扩张，使国家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第二，高丽人民在击退契丹入侵、捍卫自己国家的斗争中，提高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第三，在击退契丹统治阶级入侵后，内外安定，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盛行，进一步加强了同邻近各国的文化联系。

^① 《高丽史》卷七，文宗9年2月条。

^② 《朝鲜古典文学选集》（七），《李奎报作品选集》（1），第254～255页，朝鲜国立文学艺术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

1. 燃灯会和八关会

新罗时期传下来的燃灯会和八关会，到高丽时期更为盛行。这是朝鲜固有宗教和外来宗教混合而成的一种宗教仪式，同时也是国家的祭典^①，全国性的民俗节日。

高丽太祖王建，把燃灯会和八关会作为一种收揽民心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十训要》中嘱咐子孙说：这些仪式是“君臣同乐，宜当敬依行之。”^②

燃灯会与八关会，在仪式上实际无多大区别。燃灯会是在阴历二月十五日（有时是一月十五日，后来是释迦牟尼的生日四月八日）举行，八关会则在十一月（西京是在十月）某日举行。燃灯会是在王宫、开京直到乡邑各地广泛举行，而八关会则只在开京和西京举行。它们都是悬挂灯笼，光照如同白昼，以饮酒、歌舞、伎乐及百戏为内容，宴会通宵。八关会比燃灯会更受重视，仪式也较为复杂。八关会时，国王率领群臣外出观赏，整个开京百姓也都走出街头游观，这就是所谓“君臣同乐”。这时，驻在首都的宋、日、女真及耽罗（今济州岛）使节，也都来访致贺。在京的各国商人大都参加，并向国王奉献礼品，使这一仪式更加多彩。

无论是燃灯会或八关会，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它借口“君臣同乐”，祈求封建国家和王室的幸福，以麻痹人民的阶级反抗意识。不仅如此，为了进行祭典，还从人民那里掠取庞大费用。甚至为此而设置“燃灯都监”和“八关宝”等国家机关，以勒索人民。这些，都增加人民的负担和痛苦。

① 燃灯是拜佛像，八关是祭“天灵”、“五岳”、“名山”、“大江”、“龙神”等土俗神。

② 《高丽史》卷二，太祖26年4月条。

2. 佛教

佛教自传入朝鲜以后，宣传护国护王思想，麻痹人民的斗争意识，忠实地为统治阶级服务。进入高丽时期后，它作为封建统治思想，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自新罗末期以来，社会陷入极大混乱，人民痛苦不堪。王建就把佛教作为“收拾”人心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十训要”中首先指出：“我国家（高丽）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①。于是他大力扶植佛教，兴建大批寺院。比如，王建定都松岳后，在立宗庙和社稷之前，就已建造了法王寺等十所寺院。据《宋史》记载：太祖以后仅高丽“王城（开京），有佛寺七十区”^②，可以说当时的开京是一座佛教城市。

高丽历代国王均笃信佛教，甚至王子和国王的直系亲属就有不少出家为僧的。高丽时代最有名的僧侣学者大觉国师义天就是文宗王的四子。

国家对佛教特别加以保护，并在各方面予以扶植。公元十世纪后半期，设立了僧科，由国家授予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以上不分教派）、首座（教宗系统的职称）、僧统（教宗系统的积称）、禅师（禅宗系统的职称）、大禅师（禅宗系统的职称）等称号，使其职位法制化，同时还给予相应的田柴。他们之中有不少名僧甚至得到王师、国师的称号，作为国家顾问直接参与政事。

国王经常到寺院做佛事，并由国家财政支付巨款，经常赐食招待成千上万的僧侣，甚至有时多达三万、五万、十万，即所谓饭僧。据朝鲜史学界统计，仅十一世纪末的大约五十年间，饭僧

① 《高丽史》卷二，太祖26年4月条。

② 《宗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

竟多达二十五万三千余人次。

佛教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在国家的特别庇护下，得到很大的发展。寺院和僧侣免除纳税义务，以施纳和投托形成的寺院土地和寺院奴婢日益集中，因而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财富也愈益集中。佛教寺院不仅宣扬护国护王思想，且是直接“君临”人民之上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甚至逐渐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重要因素。

3. 儒学教育和私学的兴盛

儒学思想同佛教一样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武器的一翼而得到更高的发展。封建官僚从儒学摄取了统治国家所必要的一切实际知识和封建道德标准。因此，想要做官就必须攻读儒家经典。封建国家兴办的学校，其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学。

930年，高丽在统一后三国之前就已在西京“创置学校”，设“书学博士”，招收贵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992年，在首都开京创设了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了乡校，并派经学博士教育贵族子弟。958年，高丽政府“始置科举”，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从而刺激了儒学的迅速发展。

由于国家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到十世纪后半期，儒学教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由于993年开始历时三十年的契丹统治阶级的三次入侵，极大地阻碍了修业年限九年的官方儒学教育的正常发展。战争消耗了国家的巨大财力，西京和开京的主要儒学教育设施和各地的教育设施悉遭破坏。战争结束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未能关心学校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儒学教育的发展出现一种新的倾向——私学。即在文宗王时期，一些优秀学者先后开办了私学，贵族子弟集中于私学，于是高丽的私学便兴盛起来。

首次举办私学的是崔冲。他在穆宗时，参加科举考试，考中

了“甲科第一”。文宗即位后，得门下侍中职位。他不仅是当时儒学界中最有权威的人，也是政界的元老。他在1055年（七十岁时）退職后开办私学，专心儒学教育。由于他声望颇高，两班贵族子弟争先进入他的学校，作他的学生。他的私学有九个班级，故称“九斋学堂”。当时，大部分科举考中者，均系“九斋学堂”出身，且都占据较高职位。因此人们称崔冲为“海东孔子”，称他的学生为“侍中崔公徒”，或在他死后按他的溢号称“文宪公徒”。

当时在开京，除崔冲的私学外，还有“弘文公徒”（又称熊川徒）、“匡宪公徒”、“南山徒”、“西园徒”、“文忠公徒”、“良慎公徒”、“贞教公徒”、“忠平公徒”、“贞宪公徒”、“徐侍公徒”、“龟山徒”等十一所有名望的私学。当时在这十二所私学学习的学生，称为“十二徒”，其中最有名势的是崔冲的私学。“文宪公徒”出了不少高级官僚。“文宪公徒”及其他公徒出身的官僚以“君师父一体”的封建观念相互结合，形成一种学派，这个学派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私学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十二徒”往往独占科场，竞争激烈，因此，它成为导致封建派争的因素之一。公元十一世纪后半期是中央集权的高丽封建国家的全盛期，文化繁荣昌盛，但其内部却开始滋长着反对它的因素。

4. 文学工艺美术

高丽初期的文学，继承了新罗时期的文学传统和遗产，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基础。但到这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比起前一时期，汉诗和汉文学占了统治地位。

诗歌方面。早在新罗时期就已兴盛发展的乡歌文学仍占主要地位，并继续向前发展。

诗人崔行归按中国汉诗形式翻译了不少乡歌作品，并介绍到

国外。但他的功绩是，对乡歌进行了理论概括。这时期的乡歌作品传至今日的，有均如（917～973年）的《普贤十种愿歌》共十一首和睿宗的《悼二将歌》一首。均如的诗歌内容都是宣传佛教思想的；《悼二将歌》则是鼓吹“忠君爱国”的作品。

除乡歌外，汉诗在此时期的诗歌中占有很大比重，并相对地占有重要地位。汉诗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郑知常。他留下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大同江诗》、《西都诗》等，迄今仍深为朝鲜人民喜爱。

这时期，散文、传记等文学也有所发展。《驾洛国记》和《三国史记》中的人物传记都是当时散文文学的代表作。《金庾信传》、《乙支文德传》等英雄传记和《薛氏女传》、《都弥传》等人物传记，为最优秀者。但是，此时期的文学只不过为高丽后期的文学发展作了准备，尚未达到繁荣阶段。

从高丽文化开化时期的十一世纪中叶以后，美术、工艺也有很大发展，如贵金属工艺、染织工艺、螺钿工艺、漆工艺、镂金细工以及文具等工艺部门，均有很大进步，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陶瓷制造技术。金日成同志曾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的瓷器就享有盛名。我们的祖先生产过很好的瓷器。”^①

高丽前期的陶瓷工业，继承新罗以来黄、绿色釉的陶瓷工艺传统，并吸收宋朝越、汝等窑的先进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到公元十二世纪初，出现所谓翡色青瓷时代。

陶瓷工匠早就致力于探索朝鲜固有而美丽的色彩。他们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成功地创造出被称为翡色的明朗深彻的色彩，似乎象征着朝鲜清朗深邃的蓝天。据传，除高丽陶工以外，世人不

^① 《金日成著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369页，朝鲜平壤外文出版社出版。

知其中奥妙，故又称秘色。

高丽青瓷的高度艺术性，不只在它的色彩优美，还在于款式的多样大方。高丽人依据瓷器的用途而决定其式样如何，并把它同工艺美术配合起来，创造了新奇多样的瓷器。他们烧造了春笋、石榴、葫芦、甜瓜等模样的各种水壶和其他器皿，还烧造了鸽形砚滴、跪麒麟形香炉、龙头形笔筒、荷花形香炉等。这些变化多端的器皿形制显示了高丽陶瓷匠师的创造才能。

他们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继承和发扬新罗白陶镶嵌技术，成功地装饰了器皿表面阴刻各种纹样，而后精巧地填上白土、红土或黑土，最后上釉烧制，以美丽的翡色为底，再用白、红、黑等颜色画出各种花纹，与瓷器式样谐调一致，更加突出高丽瓷器清新雅致之美。

用镶嵌手法刻画的纹样图案，种类繁多，花样奇特，诸如江边的袅袅垂柳、江中喜游的鸳鸯或鸭群，芦苇和鸿雁，云彩和山鹤，花朵和蝴蝶，菊花、莲花、葡萄和石榴等。各种纹样图案和翡色底色，与器皿开头和谐衬托，充分显示风光如画的朝鲜山河的优美情趣，更加提高了高丽瓷器的装饰效果。

高丽青瓷，实用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色彩、形状和纹饰有机结合，蜚声东方，闻名世界，是朝鲜人民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宋人徐兢曾在自己的见闻记《高丽图经》中，高度赞扬了高丽青瓷：“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优佳。”^①

高丽时期，绘画也有很大发展。国家设有画院与画局，有工匠从事绘画创作。高丽和以前不同，除画院工匠外，在国王和高级官僚中还有业余画家。但因战乱频繁，作品大多湮没，传存至

^① 《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三，陶尊。

今的极为稀少。

高丽时期的绘画，多以宗教画特别是佛教画为主，但也有风景画和动物、花卉、树木等画。李宁是公元十二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画家，闻名国外。1124年，李宁“随枢密使李资德入宋”。当时，宋朝有名的帝王画家徽宗，对李宁的绘画极为钦佩，并拜他为师，令许多宋人画家向他学画。特别是看过李宁的《礼成江图》后，“徽宗嗟赏曰：比来高丽画工随使至者多矣，唯宁为妙手。”^① 可惜的是，这幅《礼成江图》未曾传世。

此外，留下姓名的名画家还有郑得恭、李琪、李全、丁鸿进、安置民、慧虚等。当时，中国绘画评论家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中，对高丽的绘画极为赞扬：“高丽国颇崇尚文艺，其技巧之精密，他国无与伦比。其丹青之妙，为该国所固有。”^② 这时期，有不少佛像画传到日本，慧虚的《观音菩萨像》就是其一，它在技巧方面博得很高声誉。

上述事实可充分说明，高丽前期绘画技术的高度发展，曾得到国外的一致好评。

公元十一世纪，高丽的雕版印刷术已有较高发展，刻出相当数量的各种书籍。高丽王朝建立后，在整顿统治机构的同时，设置了担任缮写、出版各种书籍的秘书省，用雕版出版了大量的儒教经典、历史和医书等。除秘书省外，京山府、忠州牧、安西都护府、南原府等重要地方机关，也用雕版印刷了各种书籍。因此，公元十一世纪中叶（1056年），中央秘阁已藏有“九经、汉晋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等各

^① 《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二，李宁传。

^②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转引自《朝鲜通史》第十章，第二节，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62年版。

种书籍^①。但这种出版，印数极为有限，加之断续进行，因此，未能使印刷技术得到很大发展。

大藏经的出版，在公元十一世纪高丽的雕版印刷业中占有最重要地位。高丽同新罗一样，将佛教作为国教。因此，集佛教经书之大成的大藏经，在高丽受到很大重视，曾从我国宋辽等朝先后数次输入，仍满足不了国内日益增加的需要。于是，显宗二年（1011年，或云显宗十二年，即1021年）在所谓“丹寇祈禳”的荒唐口号下开始雕刻大藏经（共六千余卷），作为全国性事业，历经七十余年（或云六十余年），终于在1087年宣宗王时完成，刻成以后板藏符仁寺，称为高丽之“大宝”。

当时，佛教经书的另一巨大出版事业，是由朝鲜天台宗创始人义天主持的佛教经书雕刻事业。1085年，义天为完成刻藏事业到宋朝游历十四个月（或云一年四个月），广泛搜集佛教书籍。归国后，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②，出版佛教书籍一千余种共四千余卷，称之为义天的续藏。这样，高丽在公元十一世纪通过先后两次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共一万多卷书、十万多块雕版的空前大规模的刻藏事业。可惜，后来被蒙古入侵烧毁，失传。

高丽在公元十一世纪出版的空前规模的《大藏经》和《续藏经》，充分反映当时高丽雕版印刷业的高度发展，是当时劳动人民创造性劳动的光辉成就。它进一步促进高丽印刷术的发展，为在世界上最初创造金属活字提供了前提。

① 《高丽史》卷七，文宗10年8月条。

② 《高丽史》卷九十，宗室一。

第六章 十二世纪社会矛盾的激化 及其后半期全国性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 十二世纪社会矛盾的激化

一、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 封建剥削的加强 人民生活的恶化

十一世纪，尤其十一世纪中叶以后，高丽国力大为增强，是高丽封建国家的全盛时期。主要表现为：西北疆域的扩大，击退契丹统治阶级的入侵，文宗前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到公元十二世纪，社会矛盾逐渐加剧。已经确立的中央集权，开始走向日益削弱的道路。

作为中央集权物质基础的土地收租（税）权，逐渐集中到贵族手里，原先的田柴科制度趋向紊乱。以王室为首的贵族阶级不断扩大私有地。王室和国家的财政从未有过明确界限，由全国各地征收来的租税和贡物，其相当数量为王室消费，但王室还在国家财政之外，从建国伊始就握有广大的私有地。

据《高丽史》记载，1022年2月，“户部奏，泗州（今庆尚南道泗川）是丰沛之地，前此抽减民田，属之宫庄，民不堪征税，乞于州境内”^①。后来，高丽王朝约有360个“庄”或“处”等名称的王室直属地，分布在全国各地。这样，王室本身首先破坏了属于国家的公田。

^①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经理条。

国王的族人和亲戚也是大片土地的私有者，他们分享公、侯、伯等爵位，因之可占有大量土地，并享受其他封建特权；他们享有名誉上的高官显位，可根据田柴科得到封地；他们被封为功臣，可根据功荫田柴科得到功臣田，并做为世袭田。这样，他们通过各种“合法手续”扩大了私田。例如，文宗之子朝鲜公焘，享“公爵”爵位，又被封为“崇仁广义功臣”和被任为名誉上的“尚书令”等职务，先后得到“食邑二千户”、“食邑三千户”等；后来“肃宗（1096～1105年）立，增封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五百户”^①。这些食邑是扩大私有土地的有利条件。不仅如此，国王的亲戚族人还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掠夺民田，扩大私有土地。

国王的外戚也尽力扩大自己的土地。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外戚中权力最大的大土地所有者是仁川李氏李子渊一家。李子渊到文宗时任“门下侍郎”高职，他的三个女儿皆为文宗王妃，生顺宗、宣宗和献宗。其后李子渊被赐为“推诚佐世保社功臣”和“庆源郡开国公”，在官职方面提升到“中书令”，因此受“食邑三千户”。其后，李子渊的子孙均居高官显职，并继续同国王结成婚姻关系，在王廷拥有很大势力，形成空前庞大的门阀和大土地所有者。

大土地所有者，不仅是王室及其亲族，两班贵族们除继承祖先封地外，也以田柴科、功荫田柴科以及其他名义，占有土地和掠夺土地。

寺院也是不亚于两班贵族的大土地所有者。由于高丽王朝的崇佛政策，寺院势力迅速成长起来。国家对寺院免除一切负担，并根据僧侣田柴科授田。尤其是国王、王室和贵族们，为祈求来

^① 《高丽史》卷九十，宗室一，朝鲜公焘。

世的冥福，大量寄进土地。1020年，显宗王“以安西道屯田一千二百四十结施纳于玄化寺”^①；1058年，文宗王“以景昌院所属田柴移属兴王寺”^②；1064年，文宗王对大云寺以“先王…所给公田地瘠税少，斋供不周”为理由“加赐良田一百顷”^③。而寺院以做买卖，放高利贷等方法，不断兼并民田，接受很多没落农民的投托，于是，寺院终于成了大土地所有者。

王室、贵戚、两班贵族和寺院，凭借“合法”和非法手段，不断扩大所有地，从而使国家支配下的公田和公民相应地减少。随着租税来源的缩小，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

公民、公田的减少和中央集权的衰弱，进一步加强了两班贵族和封建地主对人民的掠夺。法律规定：公民要向国家缴纳收成的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田租（税）。但多数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只好租种封建地主的土地，因此，至少还得向地主缴纳收成的二分之一为地租。而且由于两班官僚和封建地主施展各种诡计，原先的田柴科制度遭到破坏，到十二世纪末，在一般情况下，在同一土地上收租的所谓“田主”竟有二、三人之多，“民不堪苦，赴诉无处”^④，因而使农民受到两重或三重剥削。

农民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附加税，而其数量日趋增长。例如，农民缴纳田租（税）时，还须缴纳附加税——耗米（为补充从各地仓库运往首都开京时的耗损而对农民征收的额外负担）。这种耗米在文宗（1047～1083年）初期，每石田租（税）只交七升，后来逐渐增加，到明宗时（1171～1197年）竟增至二斗

① 《高丽史节要》卷三，显宗11年8月条。

② 《高丽史》卷八，文宗12年7月、18年4月条。

③ 《高丽史》卷八，文宗12年7月、18年4月条。

④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田柴科条。

多。结果，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田租（税）实际上大大超过规定数量。

农民因受自然灾害而未获收成时，也要缴纳田租（税）。如果本人实在不能缴纳，或者本人已经逃跑，国家就要他的亲属或邻里代缴，这叫作“族征”或“邻征”。到十二世纪初，这种“族征”和“邻征”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农民除租税外，还要负担各种贡纳和徭役，遭受苛酷的剥削。《高丽史》写到：“睿宗三年（1108年）二月，判京畿州县，常贡外徭役烦重，百姓苦之，日渐逃流。……铜、铁、瓷器、纸、墨、杂所别贡物色，征求过极，匠人艰苦而逃避”。^①

这一史料可充分证明十二世纪初，京畿人民（农民、手工业者）所负担的纳贡和徭役是极为沉重的。人民被迫流散各地。当然，这种情况不限于京畿，全国范围都是如此。

国家通过租税和贡纳进行的剥削，由于封建官僚们的中饱而更为加重。到十二世纪初，这种现象极为严重。1105年12月，国王在诏书中谈到：“今诸道州郡司牧清廉忧恤者十无一二。慕利钓名，有伤大体，好贿营私，残害生民，流亡相继，十室九空。”^② 这反映十二世纪初高丽的社会矛盾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

高利贷剥削，使农民进一步陷入贫困之中。封建国家通过“常平仓”和“义仓”放高利贷。地方土豪则利用所谓“契”（“契”在初期，本是遭遇天灾人祸时，村落之间的互助组织，后来变成地方土豪的剥削机构）放高利贷而盘剥农民。在高利贷方面，封建国家在立国之初为了保证农民的再生产和国家的租税收

①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贡赋条。

② 《高丽史》卷十二，睿宗一。

人，制定了利息增加到本金时就不能再增的“子母法”制度。但后来“子母法”制度逐渐丧失其效力，到十一世纪后半期，利息往往相当于本金，有的甚至高于本金二倍。这样，高利贷剥削迫使农民纷纷破产。

频繁的自然灾害（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末的一百年间，曾发生六十次旱灾，六次大涝）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使农民贫困不堪。

处于极端贫困境地的农民，被迫将土地投托给地主、富豪、寺院，成为他们的奴婢农民，以避免苛酷的国家负担。这样，逃亡异乡的人民日益增多，国家支配下的公民、公田大为减少。但是，国家的开支并未缩减，反而增加，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穷奢极侈漫无止境，促使国家对人民的剥削日益增大。国家对留在田地上的农民（公民）进行更多的榨取，以此巩固自己统治。

随着国家对人民剥削的加强，地方、官僚、贵族和寺院对人民的剥削也更为加强。他们又乘中央集权衰弱的机会，加紧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对外关系方面，高丽与女真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也逐日紧张起来。

贫困不堪的农民，不是被迫离乡背井，便是积极起来反对封建剥削。于是，封建剥削者和广大人民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高丽封建社会动荡不安。

二、九城的构筑和它的弃置 统治阶级的内讧和武臣的掌权

1. 九城的构筑和它的弃置

十二世纪初，高丽由于田柴科制度的紊乱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大以及人民生活的日益破产，已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中央集权，而且降低了国家的防御能力。

这一时期，位于高丽东北方的女真族开始强大起来。其中，

位于今哈尔滨附近的完颜部势力更是迅速壮大，不断地扩大地盘，大大削弱了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到十二世纪初，完颜部贵族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今朝鲜两江道和咸镜北道一带。1104年，完颜部军队征服居住在高丽定州（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定平）城外的女真人，威胁着高丽的安全。

从1107年10月到翌年3月，高丽将领尹瓘率领十七万军队多次同女真部军队进行激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高丽在占领地区构筑了咸州、英州、雄州、福州、吉州、宣州、通泰镇、公嶮镇、平戎镇等九城，将大约六千五百户高丽人民移居该地，使其在开垦土地的同时，警戒女真贵族的进攻。这样，今天的咸镜南道和两江道一带就归入了高丽版图。但是尹瓘部队凯旋归来后，九城又遭到女真统治阶级的猛烈进攻，经常使九城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同后方的联系濒于断绝。女真统治阶级不断地对九城进行进攻的同时，还多次派遣使臣要求索回九城。1109年6月，女真统治者向高丽要求归还九城，并保证不再侵犯边境一带。于是，高丽决定从九城撤回，弃置九城一带的开拓。高丽统治者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巩固东北部的防御，以便加强中央集权，曾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试图开拓九城，但未收到应有效果。这说明高丽的中央集权已开始削弱。此后，国内形势更为恶化。

2. 李资谦的叛乱

伴随高丽社会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利用中央集权削弱的机会，疯狂地展开占据土地、掠夺财物的争权夺势的斗争。

十一世纪后半期以来，仁州李氏是高丽王廷中以外戚身份拥有很大势力的门阀大地主。十二世纪初，仁州李氏一门中势力最大的是李子渊的孙子李资谦。当时，睿宗王“纳资谦第二女为妃”，由此李资谦官至“平章事”，并成为“推诚佐理功臣”，受

到“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诸子并进爵”^①的待遇。1122年，睿宗去世，太子年幼，睿宗王诸弟争夺王位。这时，李资谦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王位竞争者，拥立自己女儿所生之子为王（仁宗）。因此，李资谦被封为“协谋安社功臣”，官至中书令，“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七百户”。1124年，仁宗王“又遣使册为……朝鲜国公，食邑八千户，食实封二千户，府号崇德，置僚属”，进一步扩大了其土地和权力，甚至设立称作“崇德府”的专门机关，管理财产，掠夺人民的土地和财物。李资谦为了独占一切权利，“强请纳第三女于王（仁宗），王不得已从之……又纳其第四女”。这样，李资谦不仅是仁宗王的外祖父，而且成为仁宗王的岳父。李资谦“权宠日盛，有不附己者百计中伤”，杀害和流刑者竟达五十余人，并“以其族属布列要职，卖官鬻爵，多树党与，号其生日仁寿节，内外贺谢称笺，……贿赂公行四方，馈遗辐凑，腐肉数万斤，强夺人土田，纵其仆隶，掠车马输已物，小民（人民）皆毁车卖牛马，道路骚然”。^②从此，李资谦的权力无限扩大，最后竟想自立为王，散布“十八子”当国王（即“龙孙十二尽，更有十八子”）的讖说，多次阴谋杀害国王。李资谦一派势力的出现，说明中央集权已经削弱。这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仁宗王遂与近臣相商，图谋翦除李资谦，但为李资谦所察觉。李早已与武臣拓俊京相勾结。于1126年1月，他们调兵包围并火焚王宫，杀死了许多国王的亲信，把国王劫往李资谦家，限制其行动自由，并企图随时杀害。仁宗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曾一度表示“禅位于资谦”，可以说李资谦独霸了高丽全国。

① 《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七，李资谦传。

② 《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七，李资谦传。

这时，高丽与女真的关系又紧张起来，使局势变得错综复杂。1115年女真完颜部尊长阿骨打建国称帝，国号为金。他企图征服辽和宋，进而把势力扩张到高丽。1125年，金军终于灭辽，并继续南下，直逼宋朝的京都汴京（今开封）。同时阿骨打要求高丽王把以前的“兄弟”关系改为“君臣”关系，也就是要高丽王以“事大”的形式对待金皇帝。1126年3月，高丽仁宗王“召百官议事金可否，皆言不可。独李资谦、拓俊京曰，……以小事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从之。”^①李资谦一伙在叛乱成功之后，之所以接受金统治阶级的无理要求，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李资谦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这种屈从态度，在高丽统治阶级内部引起很大不满，给王廷内部反对他的人提供了有利条件。仁宗王看出朝内的人心所向，遂于同年5月，拉拢原为李资谦心腹的拓俊京，一举清除了李资谦及其同党。1127年3月仁宗借“幸西京”机会，依靠西京的两班们“流拓俊京于岩堕岛”。这样，拓俊京也被驱出王宫。

3. 妙清的叛乱和西京军民的斗争

李资谦一伙叛乱失败后，高丽王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对以妙清和郑知常为首领的西京两班有利。妙清、郑知常等人利用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散布风水迷信思想，同开京对立。例如，妙清利用李资谦烧毁王宫的机会，说什么开京地德已衰，西京王气正盛，国王应迁都西京。他们还主张，为了免除宫阙被焚之类的灾难和女真要求“事大”等的欺辱行为，必须在西京林原驿（今平安南道大同郡新宫洞）重建宫阙，这是因为，那里地形属大华，建造宫阙能够永享幸福。妙清一伙的风水迷信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能迷惑国王、群臣和一部分人民。当时，国王就

^① 《高丽史》卷十五，仁宗4年3月条。

经常来往于西京，支持他们，赞同在那里修建大华宫。1129年2月，西京林原驿王宫终于落成。

妙清一派的西京迁都说，原是西京两班企图拉拢和讨好国王，压制开京两班，进而掌握政权的诡计。但在业已强大的开京两班的强烈反对下，西京迁都说和其他一系列主张均遭失败。于是，妙清一派在1135年1月，同赵匡等人发动叛乱，“凡上京人（开京人）在西都者，无贵贱、僧俗，皆拘之”^①，又派军队切断崑岭（今黄海北道慈悲岭）以北的道路，以抵御讨伐军。西京叛军还建立了所谓的国家机构，“国号‘大为’，建元‘天开’，号其军曰‘天遣忠义’，署官属自两府至州郡守，并以西人（西京人）为之”^②，以满足他们的权欲。他们还派人到开京向国王仁宗建议，赴西京当大为国的皇帝。但是，此时国王早已同开京两班势力结合，因此未采纳妙清一伙的建议。

西京叛乱之后，开京王廷任命金富弼为元帅，他统率左、中、右三军两万余名出师征讨。讨伐军出征前，一方面处决了当时在开京的郑知常等西京出身的两班，以此巩固后方；另一方面，派五千兵士到东北地方，截断这一地方与西京的联系。同时，讨伐军为避免正面冲突，未向崑岭进发，而采取迂回战术，经今天的新溪、遂安、成川和价川直抵安州。官军通过以上的大规模行军，显示了军威，切断了各地方对西京的援助，宣传了讨伐军的意图。

讨伐军在安州整顿（原先的三军改编为五军）之后，南下包围西京，再三向叛军劝降。开京方面另派近二百艘战舰封锁了大同江水路。西京被围后，惊慌失措的叛军上层即行分裂，赵匡杀

① 《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七，妙清传。

② 《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七，妙清传。

掉妙清，派尹瞻到开京认罪。但是，带去妙清首级的尹瞻不仅未受到欢迎，反而被监禁于狱中。于是，赵匡等知道开京两班不会饶恕自己的叛乱罪行，因此，决心抵抗到底。讨伐军和西京叛军之间展开了猛烈的攻防战。这时，西京人民同叛军一道参加了反对官军的斗争。1135年闰2月西京军民动员起来，“自宣耀门至多景楼，缘江（沿大同江）筑城一千七百三十间”^①，加强了西京的防御能力。

士气旺盛的西京人民勇敢迎战，多次击退了官军的进攻。甚至妇女、儿童都纷纷助战，用砖头、瓦块打击敌人，使战斗持续一年之久。为此，官军总指挥金富轼在向国王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西都天设险固，未易攻拔，况城中甲兵多而守备严，每壮士先登，仅至城下，未有逾城超堞者。云梯冲车皆无所用，童稚妇女，掷砖投瓦，犹为勍敌。设使五军传城而攻，不出数日，骁将锐士，尽毙于矢石矣。贱（西京军民）知力屈，鼓噪而出，锋不可当。”^②

西京人民不仅击败攻城之敌，还常常出城攻打敌人。尽管占据该叛乱指挥部的西京两班居心险恶，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贪婪地争权夺势，但西京军民却为反对以开京为象征的统治阶级，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腐败无能的西京两班，动机不纯，内部争吵不休，他们不懂得如何扩大战果、进攻敌人；不懂得如何对付对方的持久战术、解决粮食困难。因此，西京守军无法克服严重的粮食困难，不能阻挡众多官军的总攻。1136年2月，西京军民在粮源断绝，城墙一角被突破，大量官军涌入城内，发生严重混乱，西京终被占领，战斗以西京军的

① 《高丽史节要》卷十、仁宗13年2月条。

② 《高丽史》卷九十八、金富轼传。

失败而告终。

官兵占领西京之后，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大量屠杀人民；对未死的人民也刺以“西京逆贼”、“西京”等字样，押送海岛，并有不少人民被迁往各地贱民部落……“乡”、“部曲”等地方。这些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极其野蛮和反动的本性。

妙清之乱是以西京两班反对开京两班的政权之争开始的，而西京两班始终占据指挥地位，这是这次斗争的最大弱点，极大地限制了斗争的人民性。从这一点来看，它与李资谦的叛乱无不同之处，同样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争。但是这次斗争中动员起来的多数群众都是西北地区的农民和其他广大被压迫人民。人民虽未能摆脱西京两班的控制，但他们始终反对开京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并在斗争中，充分发扬了英雄主义精神，给高丽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正因为如此，妙清之乱才有别于十年前的李资谦叛乱。

妙清之乱表明：自十二世纪初李资谦叛乱以来，潜在于高丽社会内部的矛盾，其不断爆发逐渐带有人民起义的性质。因此，妙清之乱具有的人民起义的内容，为即将到来的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先决条件。

4. 1170年的武臣政变和武臣政权的出现

1136年2月，妙清之乱和西京人民的反政府斗争被镇压之后，仁宗王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挽回并加强衰弱的中央集权，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例如，1136年宣布，凡被动员参加筑城的军人，免除其作为农民所应负租税的一半。1142年，派官吏到各地采取措施，禁止地方官员对农民进行非法的盘剥。1145年又发布旨令，奖励种植桑树、漆树、楮树和栗树，并修筑了有名的碧骨堤等。但这些均有名无实，收效甚微。

1146年仁宗死后，其子毅宗即位。毅宗在位二十五年，一

直过着荒淫无耻、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墅，同群臣（文臣）一起，吃喝玩乐，尽情享受，耗尽国家财产。他沉溺于佛教、道教和各种迷信活动，多次举行“饭僧”，参加者每次竟达数万人。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亦皆对他阿谀奉承，纷纷举行祈祷国王长寿的所谓法会。这一切费用均由各地官衙直接向人民征收。毅宗为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需要，凡民间出现好的东西即行抢夺，甚至设立“威仪色”、“祈恩色”等专门机构搜刮人民，又随时派遣别贡使到地方进行劫掠。

毅宗的骄奢淫逸生活，不仅使妙清之乱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权宜之策全部落空，而且使中央集权更加混乱衰退，使封建剥削进一步加重。国王的近臣，即文臣及有地位的佛教僧侣，便乘机大饱私囊，作威作福，而武臣却受到极大的蔑视。

每次游乐，武臣只是国王威仪的“装饰品”，他们不得就席，仅能肃立门外恭候。而文臣则以歌颂国王的“太平盛世”、“治国有方”、“恩德无量”、“国泰民安”等媚词来博得国王的欢心。

武臣的不满日益增长，他们在寻找机会企图打倒国王和文臣。武臣大体上以中小封建地主为其阶级基础，他们指挥的军人就是农民。毅宗和文臣肆无忌惮的搜刮不但引起了中小地主阶层的不满，而且，更加引起了农民阶级的忿恨。农民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已酝酿成熟，其表现形式是文臣与武臣的对立。

于是，武臣以自己的不满和兵士的不满情绪为基础，暗地里酝酿政变。1170年8月，毅宗照例同近臣到开京近郊寺庙“普贤院”宴会行乐。这天，国王近臣乘兴打了护卫国王的一名武臣的耳光，将他打倒在台阶之下。这时，早已伺机待动的武臣头目郑仲夫、李高、李义方等人便动员自己的部下，当夜包围了普贤院，将那里的文臣全部杀死。回开京后，他们又杀掉文臣五十

名。同年9月，废毅宗，流放于巨济岛，立其胞弟为王，即明宗。明宗完全成为武臣的傀儡，实权掌握在郑仲夫等武臣手中。

这次政变称为郑仲夫之乱。它本质上是争夺土地、权力和奴婢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掌握了政权的郑仲夫一派，以功臣自居，瓜分了毅宗和文臣以及大寺院的巨额资产，取得了高官显位，并把自己的军令机关——“重房”置于三省六部之上，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以前文臣系统的国家机构虽仍存在，但已不能行使职权。

武臣对文臣头目及佛教大寺院虽予以一定打击，并一度压制他们，但却未能收拾混乱不堪的局面。特别是武臣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和知识，“重房制事，将军房沮之，将军出议，郎将房沮之，互相矛盾。”^① 不仅如此，武臣竟然担任过去只有文官才能充任的高官显职，企图以刀枪和命令代替政治。他们为抢夺更多的田产和权力，钩心斗角，纷争不已。这样，封建统治秩序极为混乱，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各地文臣和僧侣，乘此机会起来反对武臣政权。1173年，东北面兵马使金甫当（文官出身）策划清除郑仲夫等人，迎毅宗复位，恢复文臣的原有地位，史称“金甫当之乱”。1174年，开京附近各大寺院二千多名僧侣奋起袭击开京，打击武臣政权。这些企图虽均遭致失败，但反对武臣政权的斗争相继而起。1174年9月，西京留守赵位宠发动叛乱，他同妙清之乱一样，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制造开京两班企图杀害西京人的舆论，以煽动地方主义的复仇情绪。这时，不但西京人民，而且岳岭以北西北地区四十余城的人民也都起来响应，从而扩大了势力范围，并曾一度直逼开京。到1176年因叛乱指挥部的动摇，叛乱终遭失败。但当时形势与妙清之乱时已大为不同，

^① 《高丽史》卷一百零一，宋译传。

西北地区业已爆发的各地农民起义军，参加了赵位宠的叛乱，打击了开京武臣政权。叛乱失败后，他们并不解散，而是进入山中，继续坚持斗争，成为十二世纪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先驱。

第二节 十二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初 全国性农民战争

武臣政权的出现，非但没有减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反而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这一时期，不仅个别农民失去土地，甚至整州整郡的土地也都被统治者所强占。因此，农民遭受更大的痛苦，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更大破坏。因而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长期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为了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枷锁，在各地不断发动反封建起义，它最后发展成为历时三十年的全国性农民战争。

十二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初掀起的一连串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写下了中世纪朝鲜人民阶级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这一斗争，从斗争的目的和打击对象，从组织结构和基本动力以及规模之大和持续之久等方面看来，都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1176～1178年的农民战争

1. 南道农民军的起义

1176年1月，鸣鹤所农民在亡伊、亡所伊等人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起义。

据文献记载：“丽（高丽）时，未堪为县者，称所”^①。我们

^① 《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之七，邕州牧，古迹条。

虽无从知道鸣鹤所的更确切地点，但可以认为以亡伊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都是生活在比郡县更小的所谓“所”内的居民。他们比当时社会的一般良人农民遭受更多的歧视，是属于最下层的贱民。从起义军领导者，只传其名，而不传其姓来看，也可证明这一点。

他们早就“啸聚党与”形成一定的组织，起义时已组成战斗部队，以武力袭击邻近州邑。亡伊自称“山行兵马使”，领导起义军首先攻占直接压迫他们的老巢公州，肃清了官僚两班。当时的公州是辖有四郡八县的大州，相当于一个小的道，而公州城则是高丽在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地区之一。亡伊农民军占领公州后，扩充队伍，加强武装，成为南道农民起义军中实力最强的部队，给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开京的武人统治者接到农民军占领公州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他们为怀柔和收买农民军，决定派遣“宣谕使”，但农民军并未落入他们“宣谕”的圈套。2月，开京统治者下令丁黄载率兵三千，前往讨伐。讨伐军在亡伊农民军的英勇抗击下，被打得头破血流，惨败而逃。开京的两班焦躁不安，忧心忡忡。战败而归的丁黄载奏称：“与贱（亡伊农民军）战不利，士卒多亡，请募僧，以济师”，^①甚至要求募集僧军，前往镇压。但是开京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为当时西京的农民军也很活跃，需要将大部分官军投入西京方面从事讨伐。另一方面，武臣政权目击了三千“精税”被打得狼狈不堪，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因而再一次耍起欺骗的把戏，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6月，政府把亡伊的故乡鸣鹤所“升格”为“忠顺县”，并派遣县令和县尉。鸣鹤所升格为县，首先意味着该地的租税、徭

^① 《高丽史节要》卷十二，明宗6年。

役等国家赋课与一般郡县相同，农民的负担较前有所减轻；其次意味着这里的所谓贱民，集体提升到一般郡县良人身分。不难想象，县令、县尉被派往该地后进行了许多欺骗活动，以示国王的“仁政”。

亡伊农民军继续占据公州，同年9月又袭击礼山县，杀死监务，肃清其他两班官僚，掌握了礼山。但是，农民军却允许开京武臣政府所派官吏仍就前来农民军的根据地——鸣鹤所，施行“仁政”，收买人心，瓦解人民斗志。陶醉于部分成就的农民军，对此不加警惕，不但未乘胜前进，而且向统治阶级作了让步。这不仅不利于农民军的继续扩大，也挫伤了农民军的士气。相反，却给敌人以重整队伍准备反击的时间。这表现亡伊农民军阶级意识模糊，把希望寄托于国王施“仁政”的阶级局限性。1177年1月，当孙清、李光和其他农民军仍在南道各地活动时，亡伊和亡所伊竟被武臣欺骗，去开京向武臣投降（议和）。开京待他们甚厚，给以粮谷，而后又送其回乡（公州）^①。亡伊与敌人议和并回到公州以后，发觉自己受骗，再次展开了斗争，可是，这时敌人已事先调动军队，攻打亡伊的故乡，并卑鄙地劫走了他的母亲和妻子。农民军和政府间的和平就此破裂。1177年2月，农民军首先袭击现今忠清南道礼山郡的伽倻寺，肃清那里的僧侣，夺回了寺院掠自农民的大量财物。其后，农民军又占领了镇州（今忠清北道镇川）和骊州（今京畿道骊州郡）。当时，骊州设有漕仓，这对农民军解决军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农民军继续战斗。同年3月，“亡伊等焚弘庆院（忠清南道的寺院），杀居僧十余人，逼令住持僧赍书赴京略云：既升我乡为县，又置守以安抚，旋复发兵来讨，收击我母妻，其意安在？宁死于锋刃下，终不为

^① 《高丽史节要》卷十二，明宗，7年1月、3月条。

降虏，必至王京然后已”^①。它充分揭露了开京武臣政权的欺骗伎俩，也表明了农民军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这期间，佛教寺院之所以成为打击的对象，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农民的仇敌，而在这复杂多变的时期，他们又作为两班的走狗，对农民军肆意破坏，无恶不作。

亡伊领导下的农民军，展开积极攻势，其范围日益扩大。4月，占领“牙州（今忠清南道牙山）时，清州牧内郡县皆陷于贼（亡伊农民军），唯清州坚守”^②。当时的清州牧是管辖五十五个郡和县的大牧，在郡县下有数百个乡、所、部曲之类的村落。该地区包括现今忠清北道部分地区外的整个忠清南北道和京畿道一部。亡伊农民军不仅占据如此广大地区，而且其势力还伸展到不属清州牧管辖的骊州，从而取得了挺进开京的优势。

与此同时，开京统治者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由郑世猷、李夫等人率领的官军已经消灭了在南道活动的李光等其他农民军。因此，他们能够集中力量攻击亡伊的农民军。同时，国王命令“削忠顺县”，把它降低到原先鸣鹤所的地位，这就再一次暴露了统治阶级所玩弄的欺骗把戏。

农民军和武臣政府军之间的战斗虽进入高潮阶段，但亡伊农民军不仅未能继续扩大战果，而且亡伊本人又动摇起来，放弃了攻打开京的决定。他们不懂得农民阶级真正的敌人是国王和开京武臣集团，反而对他们抱有幻想，认为：只要国王施“仁政”，就能改变农民的处境。因此，他们的斗争只限于打击地方的贪官污吏和寺院僧侣，并在斗争中常常表现出动摇。同年6月，亡伊又派人向开京“请降”，要求议和。这时已经休整完毕、正准备

① 《高丽史节要》卷十二，明宗，7年1月、3月条。

② 《高丽史》卷十九，明宗7年4月、7月条。

各个击破农民军的开京官军，根本不理采亡伊等人的要求，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攻势。同年7月，“南贼（亡伊农民军和其他活动在南道地区的农民军的总称）处置兵马使郑世猷等，捕贼首（农民军领袖）亡伊、亡所伊等，囚清州狱”^①。亡伊农民起义军遂以失败而告终。

这时，活跃在南道地区的农民军，除亡伊农民军外还有以现今伽倻山为中心的孙清农民军，以弥勒山为中心的李光农民军等。他们的具体活动地区不详，但据《高丽史》记载，孙清部队到1176年11月还能“自称兵马使”，可见是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的，他一直活动到次年（1177年）2月。而李光部队则一直活动到1177年7月。这些农民军此起彼伏，分别活动。不仅孙清和李光的农民军互无联系，甚至同亡伊农民军也未有过联系。因此，这些农民军虽曾一度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但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和受到开京武臣政权的欺骗怀柔以及武装进击，都先后被击破而失败。

2. 西北地区农民军的英勇斗争

十二世纪七十年代初，即武臣掌权后不久，西北各地就已经发生农民起义。据《高丽史节要》：“自庚寅（1170年）之后，北人横恣。昌州（今平安北道昌城）人杀其守、爰妓置之衙门；成州（今平安南道成川）人议灭三登县，有不从者杀，至数十人；铁州（今平安北道铁山）人议杀其长，格斗而死。有仁（原西北面兵马使大将军宋有仁）不能制，攫害及己，称疾乞代；学儒（宋有仁的后任于学儒）亦不能制。”^②

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以赵位宠叛乱为契机而更加活跃起

^① 《高丽史》卷十九，明宗7年4月、7月条。

^② 《高丽史节要》卷六十二，明宗2年6月条。

来。这时，不仅西京人民，而且西北地区四十多城的各阶层人民也均响应叛乱，成为叛军的主力。他们的斗争不仅狠狠打击了开京武臣政权，而且给以亡伊农民军为首的南道地区农民军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176年，赵位宠叛乱失败后，西北地区的农民继续坚持了斗争。

从亡伊农民军还在南道进行活动的1177年5月到次年10月左右，西北地区已有四支农民起义军在活动。

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有：今天的平安南道和慈江道的部分地区，甚至一度包括黄海北道和咸镜南道的部分地区。这四支部队是《高丽史》所称“赵位宠余众”的农民军，以及分别由金旦、康畜、曹忠等人领导的部队。其中斗争最坚决的是“赵位宠余众”。

赵位宠叛乱被镇压之后，他们进入山中坚持斗争，组成五百余人的部队，于1177年5月重新举行大规模的起义。他们处决了以西京留守叛官朴宁为首的官僚和变节投敌的叛徒。直到同年9月，他们仍占领着西京，得到西京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力量。

这支起义军的核心是由赵位宠叛乱被镇压之后，仍不向敌人屈服的那些坚定分子所组成的。它的指挥部是由农民组成的，内部没有混入的两班贵族。此外，西北地区的农民也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他们的斗争。因此，当时的两班称他们为“赵位宠余众”，是与事实不符的。他们是一支坚强的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

西北地区的农民军占领西京期间，一次又一次胜利地击退了官军的进攻。

同年9月，农民军由于战术上的需要，把根据地从西京转移到妙香山。其后，农民军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农民军把自己的部队编成中、前、后三军。各军设有“行

首”（部队长）和“指谕”（参谋长）。中军是主力部队，特设三名“行首”（思进、轼端、进国）和一名“指谕”（戒训）。前军“行首”为金甫，后军“行首”为光秀。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拥有较高水平的组织机构。这些领导者大都无姓，说明他们都和亡伊一样，或是贱民或为奴婢。

由三军编成的农民军互相配合，出入于以妙香山为中心的嘉山、博川、泰川、价川、宁边和顺川等辽阔的山间地区，有时袭击慈山和肃川等平原地区，甚至进攻黄海道谷山、遂安等远地方。农民军所到之处烧毁官府和寺院，杀死两班和僧侣，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开京武臣政权首次派武臣中的一个头目李义旼进行讨伐，李失利后，被罢免。极度惊慌的开京两班，又任命凶狠的朴齐俭为西北面兵马使，并将其“讨伐”力量集中到西北地区。但农民军用巧妙的游击战术，扰乱敌军。各地农民积极动摇农民军，仔细侦察敌情，及时向农民军报告。农民军节节胜利，受到致命打击的朴齐俭“士卒气沮，逗留不进，裁留五百人为声援，引还。”^①朴齐俭的主力部队逃回开京以后，农民军的声势更加浩大。

随着战斗的长期化，农民军的粮食供应日益困难。政府军抓住这一弱点，一方面以粮食收买农民军，另一方面以低微的官职诱骗指挥部成员。农民军由于统治阶级的拉拢、欺骗，在其内部发生分袭，投降分子不断出现。1178年10月，西北地区农民军在西京起义一年半后终于被镇压。农民军中由进国率领的一百五十余人始终不屈，全体战死。

西北地区农民起义军的大部分被镇压，使农民起义一时处于低潮。但农民军的活动并未完全停止，农民军残余部队深入山

^① 《高丽史》卷一百，朴齐俭传。

村，继续进行活动。

翌年春，农民军在牛方田等人的领导下重新活跃起来。据《高丽史》，1179年2月，“西贼复起”；4月“西贼遗种乘间复起”，就足可说明这一点。当时西北地区农民军遗部坚决开展斗争，但不久粮食供应又发生困难。高丽西北面兵马使李富，乘农民军粮竭之机，“以某日授粮”等手段，诱骗农民军到城内，然后捕杀，“捕诛者凡五城，龟州所杀至三百余人”。嘉州，“引贼（农民军）百余人，入仓锁门”，农民军无法逃出仓库，他们在仓库内高喊：“吾宁自绝，岂可见制于人”^①，随后在仓库里放火，烧毁十余万石粮谷，他们自己也全部壮烈牺牲。

牛方田领导的农民军余部，在安州附近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地打击敌人。

西北地区的农民，从响应赵位宠之乱起，整整六年期间，连续不断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战斗。而人民组织自己的指挥部进行斗争，也达一年又六个月之久。这支农民军在六年间所表现的坚定性、组织性和灵活性为其他农民军所罕见，他们的辉煌战斗，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二、1193～1194年的农民战争

1176年至1178年，第一次农民战争的高潮结束后，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一度处于低潮。但是，各地农民仍不断起义，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这一时期的农民斗争一直延续到十二世纪八十年代，只是其规模较小，比较分散。

十二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即1193～1194年，农民斗争又掀起高潮。这是十二世纪高丽农民战争的第二次高潮。当时，以庆

^① 《高丽史》卷二十，明宗9年4月条。

尚道为中心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最为强大的是以庆尚北道清道郡云门山为中心的金沙弥部队，和以庆尚南道蔚山的草田为中心的孝心部队。当时，在庆尚道一带活动的其他农民军和流散各地的农民汇集到他们的根据地，这些力量聚集起来以后，开始攻打附近各邑，接连取得胜利。

1193年7月，开京统治者命令大将军全存杰及其麾下李之纯（当时武臣政权执政者李义旼之子）等数人，率大军出讨。但讨伐军一败再败。当时，农民军的力量十分强大；农民军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对立，狠狠地打击了讨伐军。

讨伐军将领之一的李之纯，暗中同农民军交易。他以官军的衣物和粮食换取农民军的金银财宝等战利品，并向农民军泄露机密。李之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他利欲薰心，另一方面也同他父亲李义旼的阴谋有关。

当时，高丽王室的威信已一落千丈，“王氏”气运殆尽，“李氏”将为王的讖语（即“龙孙十二尽，更有十八子之语，十八子乃李字也”^①）流传甚广。这种讖语从李资谦叛乱开始就已作为反对王室的呼声而出现。李义旼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企图在必要时利用农民军来削弱包括高丽王室在内的其他统治者。

讨伐军指挥部对李之纯的行为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敢揭发。因此，讨伐军与农民军交战经常失败，它迫使讨伐军司令全存杰自杀。同年11月，开京统治阶级重新组织指挥部，编成大军，以更大的军事力量前往讨伐，并先从诱骗和收买农民军着手。农民的弱点，使他们易于掉入敌人的陷阱。1194年2月，云门山起义军领导人金沙弥被敌骗至讨伐军本部惨遭杀害。从而金沙弥部队溃败而退，有些则参加了附近的孝心部队。

^① 《高丽史节要》卷十三，明宗23年7月条。

金沙弥部队因中敌人的奸计而溃灭，但孝心的部队还在顽强地坚持战斗。1194年2月，孝心部队与敌军交锋，杀死敌将史良柱，歼灭了敌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与此同时，在东海岸江陵地方活动的农民军同崔仁（讨伐军的总司令）率领的数千名官军互相对峙；英勇地打击敌人；致使崔仁被免除了讨伐军总司令的职位。

1194年4月孝心部队集中力量在密城（今庆尚南道密阳）楮田村与官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讨伐军也集中了大部分力量。对此，《高丽史节要》写道：“夏四月，南路兵马使击贱（孝心率领的农民军）于密城，斩获七千余级，器械、牛马称是”^①，由此可见这场战斗是一次大的战役。同年12月，孝心被俘牺牲，部队随之溃散。于是一年多来展开激烈战斗的庆尚道农民战争，再次失败，参加起义军的农民几乎全部被杀害，他们的家属被施以黥刑，发配到黄海道各地充当官奴婢。

1193至1194年庆尚道农民军的活动，是十二世纪后半期高丽农民大起义的第二次高潮。仅以密城楮田村战斗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从密城战斗可知农民军已达数万名，装备也不次于官军。农民军指挥部的战略战术已比较成熟，能指挥大规模战斗。

前后二十多年，在封建统治混乱时期掀起的大规模农民革命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镇压和屠杀终究遏制不了人民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人民的斗争仍在以不同的规模、不同的方式，继续开展着。只要封建剥削和压迫存在一天，农民的阶级斗争就决不会停息。

^① 《高丽史节要》卷十三，明宗21年4月条。

三、崔忠献执政时期的农民战争

1196年，武臣两班的第三代头目李义旼，被将军（正四品的武官）崔忠献及其弟开京东部录事（正八品的地方官吏）崔忠粹等人组成的暴力集团所打倒。

新上台的崔忠献是个比以前诸多武臣更狡诈，更干练，对当时国家局势和社会形势更善于判断的人物。他的政权较以前的任何武臣政权都稳定、巩固，前后持续四代约六十年。

崔忠献掌权和肃清反对派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便与其弟忠粹一起，在“革旧图新”、“光启中兴”的口号下，向国王（实为崔的傀儡）提出自己的施政方针，史称崔忠献“封事十条”。其主要内容是：为节约政府开支，要增强国力，裁减定员以外的官吏；限制大土地所有者占据公田，把掠夺的土地归还原主；为平息民愤，为百姓生计，限制不良官吏贪得无厌的掠夺；限制佛教寺院势力等等。

崔忠献提出“封事十条”的目的是：在中央和地方加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地盘；整顿紊乱了的统治机构和统治秩序，树立正常的剥削体系；平息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农民斗争，以便进一步剥削农民。

崔忠献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在高丽王廷内部驱逐了一切反对派势力，让自己的亲信把持各个政权机关。此外，他还私设了自己的统治机关，崔家一派实际上垄断了政权。崔忠献为保护自己，于1200年在国家统治机关外，还私设了称为“都房”的机关；1209年，又设置“教定都监”，国家一切重要事务均在此处理。其子又在教定都监下设私“政房”，专管官吏的任免事务。

教定都监向地方派遣官吏，在国家剥削体系外，另立名目剥削农民。教定都监犹如另一个朝廷，这就使高丽又出现另一个封

建中央集权的搜刮体系。先前的国家搜刮体系虽然已无实权，却依然存在，因而人民实际上负担着双重赋课。

崔忠献执政后，不几年就变成最高的独裁者和最大的农庄主，极为残酷地剥削农民，终于成为削弱和打乱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罪魁祸首。由此可见，崔忠献的所谓“封事十条”实是欺人之谈。不管他如何标榜自己，他总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人民为反对这个奸诈的敌人，再次举起了反抗的旗帜。

崔忠献执政初期，开京最先酝酿了官私奴起义的计划。开京的青年私奴，为了从痛苦不堪的处境中摆脱出来，曾计划谋杀崔忠献等人。以万积（崔忠献的私奴）为首的六名私奴，经常在松岳山聚会，准备起义。他们说：“将相宁有种乎？时来则可为也。吾辈安能劳筋骨困于捶楚之下？…吾徒蜂起城中，先杀崔忠献等，仍各格杀其主，焚贱籍，使三韩无贱人”。^① 无数奴婢纷纷响应，他们的组织不久就发展到数千人。他们确定了起义日期，同时“剪黄纸数千，皆钹丁字为识”。

万积等的起义计划，完全是由奴婢自己制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本阶级的解放，废除崔忠献等王侯将相，而由自己掌握政权。

但是，在预定的起义日期里，来到的人“不满数百”。因此，不得不拖延起义日期。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名叫顺贞的私奴被敌人用八十两“白金”收买，出卖了起义计划。崔忠献立即逮捕了万积等百余人，投入大江。这样，万积的起义，在行动之前就被扼杀。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崔忠献执政初期，即他提出欺骗性的施政方针，农民的反抗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处境最为悲惨的奴婢们却在高丽首都开京准备起义；第二，万积等人提出正确的斗争目标，主张打倒崔忠献等开京统

^① 《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九，崔忠献传。

治者，“使三韩无贱人”，充分表明了奴婢们顽强的战斗精神。

其后，1200年4月，庆尚道晋州发生了大规模的官私奴婢起义，他们袭击压迫他们的乡吏住宅，烧毁房屋五十余栋。他们同城内人民和附近的起义军汇合，将活动范围扩大到附近一带，一年之间起义军消灭敌人六千四百名，战果辉煌。但是，由于起义军领导者郑方义（乡吏出身）的妥协投降，起义军终归失败。

此外，1200年密城（今庆尚南道密阳）和金海（庆尚南道）也爆发了分散的起义。在密城，五十六名官奴袭击官府的仓库，搜获银制器皿，并和云门山的农民起义军合而为一。象云门山那样的地方，起义军的活动一直在进行着。

可见，崔忠献执政初期，已经多次发生私奴婢、官奴婢等最下层人民的起义。

农民起义继续高涨。1199年2月，溟州（江原道江陵）发生起义，攻“陷三陟、蔚珍二县”。这时，东京（今庆州）也发生起义。这两支起义军曾联合起来，一度占领东南沿海一带。崔忠献准备用怀柔方法进行镇压。为此，开京方面向东南沿海地区派遣了“招谕使”。当时，庆州起义军领导者金顺、蔚珍起义军领导者今草等人被开京花言巧语的“招谕”所欺骗，竟去开京投降。对此，高丽“王赐酒食衣服遣还”，起义军的力量大为削弱。

1202年，庆州人民反对开京统治者的斗争又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一年，庆州的别抄军（临时招募的军队）站在斗争的前头，袭击了永州（今永川）。他们吸收附近各地的农民军，并和云门山农民军合而为一，给庆尚道一带以很大影响。这支起义军的领导者是曾在云门山进行反抗活动的李佐。

崔忠献执政后，组织了大规划的“讨伐军”攻打起义军，他脱下了到昨天还披着的羊皮，凶相毕露。

李佐等农民领导人听到开京派遣讨伐军的消息后，把“募集

云门山及蔚珍、草田”等地的农民军部队，“分为三军，自称正国兵马”。次年，“正国兵马”横扫仇敌，席卷庆尚道一带。农民军不断给“讨伐军”以沉重打击，使战败的“讨伐军”指挥官被罢免。1203年1月和2月，农民军在基阳（今庆尚北道醴泉）和杞溪（庆州附近），与“讨伐军”进行一次大会战，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但农民军也受到很大损失。杞溪战斗后李佐率农民军重新进入云门山活动，同年7月被敌人杀害。8月，在太白山地区与“讨伐军”勇敢战斗的农民军领导者阿之也被逮捕，其后，庆尚道农民军，在金顺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204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以金顺为首的农民军领导者被捕，农民起义军终于失败。这样，开京统治者在庆尚道地区大体上恢复了他们的统治。

1202年前后的庆尚道地区的农民起义，是十二世纪后半期以来高丽农民起义的第三次大高潮。

从十三世纪一十年代开始，在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下，农民军的斗争对象和形式较前有所不同，逐渐带有反侵略斗争的性质。

十二世纪后半期以来，高丽的农民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其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是整个朝鲜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农民大众参加，而且还有城市手工业者和属于社会最下层的官、私奴婢也参加。起义不仅发生在离京都较远的南部和西北部一带，而且发生在敌人的统治中心——京都开京。他们之中有的有比较明确的斗争纲领，有自己的活动根据地。

但是，他们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未能克服运动的自发性、分散性和妥协性，因此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积极进攻敌人，而为统治阶级所欺骗、软化和收买，又被以后各个击破，终归失

败。

尽管如此，十二世纪高丽的全国性农民战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有力地打击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消灭了一部分反动的剥削阶级分子，迫使统治阶级做出一些让步。第二，农民，包括身分最低下的官、私奴婢在内，在斗争中多少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第三，它虽然未能推动社会发展到更高一级的阶段，但它却大大地摧毁了夹杂在高丽封建社会内部的奴隶剥削残余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丽封建社会的发展。第四，通过长期的斗争，高丽农民充分发扬了不屈不挠的爱国传统，积累了和敌人斗争的经验。它不仅打击了国内统治者，而且在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总之，十二世纪后半期以来的高丽农民战争，是朝鲜人民革命斗争史中的光辉一页。

第七章 高丽人民反对蒙古及其他人 侵者的斗争 高丽的灭亡和李朝封建国 家的建立 十三到十四世纪的高丽文化

第一节 高丽人民反对蒙古入侵者的斗争

一、1231年高丽人民反对蒙古统治阶级的入侵

到公元十三世纪初，崔氏的私人统治机构日益完善，对高丽人民的封建压榨也进一步加重，从而削弱了高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尤其是崔氏为了维护其私人统治机构，在都房之下设有数万人的强大的家兵组织。高丽军队虽均隶属崔氏麾下，但有别于家兵。而家兵的增强则削弱了中央和地方的府兵制。因此，当国家需要大量军事人员时，就得临时招募军队。当时把临时招募的军队叫做别武班，后称别抄军。崔氏置国家公兵即府兵和别抄军于不顾，首先组织起自己的精练的家兵。它削弱了府兵和别抄军制，削弱了国家的整个国防力量。

就在这时，中国北部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居住在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蒙古族迅速发展起来，到1206年，终于建立了强大的国家，铁木真即位，号称成吉思汗。蒙古统治者以强大的军队征服了邻近各部落。

1211年，蒙古统治阶级进攻金朝，金朝军队遭到严重打击而溃败。当时，位于金朝属地辽东地方的契丹族，趁势掀起反金，并脱离金朝建立了“大辽水国”。1214年，金朝派蒲鲜万奴率领四十万大军攻打“大辽水国”，但大败而归。于是蒲鲜万奴

趁机反金，在辽东地区建立起封建割据政权，称“大真国”。其后，东迁到今图们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绥芬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土”，并改国号为“东夏国”。

新出现的复杂形势，势必影响到高丽。当时，契丹族抵御不了蒙古入侵者的频繁进攻，一部分投降，另一部分则逐渐南下，于1216年9月大规模侵入高丽，到处掠夺。

高丽称他们为“丹贼”，并给予有力反击，将其赶至江东城。1218年12月，一万名蒙古军队联合二万名东夏国军，借口追击契丹，进入高丽，向江东扑来。在蒙古、东夏和高丽的联合攻击下，据守江东城的契丹人终于被歼灭，“其官人、军卒、妇女、并五万余人，开城门出降”^①。联合军处决了他们中的一百多个头目，其余的都给予宽大处理，即“以契丹俘虏送各道州县，择闲旷之地俾之聚居，量给土田，业农为民。俗呼契丹场者，是也”^②。

高丽与蒙古之间，借攻打江东城之机，建立了邦交。其后，蒙古经常派遣使节团到高丽访问，以其皇帝和贵族的要求为借口，屡次向高丽勒索巨额贡品，同时还以战争相威胁。高丽既要满足蒙古统治者贪得无厌的要求，又要花费巨额款项招待频繁来往的使节团，从而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起他们的憎恨。1225年，蒙古使节来高丽催贡，于回国途中，在鸭绿江边“为盗（人民）所杀”。蒙古与高丽之间的外交关系遂由此断绝。

1231年蒙古皇帝窝阔台（太宗）亲率大军攻打金国。同时遣撒礼塔入侵高丽。蒙古军队渡过鸭绿江后，攻陷咸新镇（今义州），继之攻打铁州（今铁山）。铁州守军和人民奋勇抗敌，但因

① 《高丽史节要》卷十五，高宗6年正月条。

② 《高丽史节要》卷十五，高宗6年正月条。

寡不敌众，守军全部壮烈牺牲。

蒙古军占领铁州以后，分兵两路：一路南下西京，一路围攻龟州（今龟城）。9月，蒙古军为攻打龟州调用了各种军需器材，不仅用大炮打城门和城楼，还用楼车和包上牛皮的木桌把士兵运到城下进行攻坚战。但是，龟州守军和人民在朴犀将军的指挥下，勇敢战斗，坚守城池。高丽军不仅防御城池，有时还出城袭敌，狠狠打击敌人。静州（义州附近）分道将军金庆孙曾率十二名“决死队”到来，和龟州人民一起保卫龟州。当高丽军出城攻击敌人时，金庆孙等十三勇士跑在最前，冲入敌阵，使敌阵混乱，高丽军士气为之大振。龟州人民在朴犀领导下团结一致，有力地击退了蒙古军的攻击。正如《高丽史》所描写的，蒙古军“围城三旬，百计攻之、犀（朴犀）辄乘机应变，以固守，蒙古不克而退^①。”

直到1232年1月蒙古军撤退时，龟州人民先后六次击退敌人大规模的进攻，守卫龟州五月之久，给敌人沉重打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后方。龟州之战，为朝鲜人民抗战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甚至连入侵者也不得不承认龟州军民的顽强。据传，龟州城攻守战事正酣时，蒙古军中有一名近七十岁的老将，“至城下环视城垒、器械，叹曰：吾结发从军，历观天下城池攻战之状，未尝见被攻如此而终不降者^②。”尽管如此，当时的执政者崔瑀，直至蒙古军渡过鸭绿江后，才仓皇地着手组织防御军，甚至在这时他还不把家兵编入防御军。但是，人民群众却为了保卫祖国，奋起抗战。特别是那些据守在深山僻壤为反对封建统治阶级而坚持斗争的起义军，主动要求站在战斗最前列。例如马山起义军得

① 《高丽史》卷一百零三，朴犀传。

② 《高丽史》卷一百零三，朴犀传。

知组织防御军的消息后，便派代表向崔瑀提议：以五千精兵参加防御军。冠岳山起义军、忠州“奴军”也自愿参加抗战。防御军由这些起义军和别抄军以及若干开京军人组成，指挥部为武臣所掌握。面临外来入侵者，高丽农民主动地与封建统治阶级组成联合战线。

为了攻打敌人，防御军开始北上。途中在洞仙驿（今黄海道凤山）遭到敌人袭击，一时大乱，由于原马山起义军勇士们立即敏捷而勇敢地组织了反击，队伍才得以重整。高丽北上军在安北都护府（今安州）与蒙古军主力遭遇，因上将军李子晟的战术笨拙，指挥无能，安州城外战斗失利。

1231年11月，南下的蒙古入侵军逼近开京，其一部经广州攻忠州。忠州是通往庆尚道和全罗道的交通要塞。因此，敌人企图先攻陷忠州而控制高丽南部地区，以便从南北双方威胁开京。当时忠州城内，有地方两班地主组织的两班别抄军，有由奴婢等被压迫人民组成的“奴军杂类”别抄军。战斗一开始，负责指挥两军的两班们都逃跑了，而留在忠州的“奴军杂类”别抄军继续抗战，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粉碎了敌人想要控制高丽南部地区的企图。蒙古军被击退后，两班们回来了，并诬称“奴军杂类”别抄军盗其财产，图谋杀害他们的领导者。愤怒的“奴军杂类”别抄军举行起义，处决了两班。此后忠州人民继续发扬光荣的爱国传统，阻止蒙古军的南下，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此外，慈州（今平安北道慈城）也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各地人民，在敌人所到之处，奋起抗战，沉重打击敌人。

由于高丽人民的英勇斗争，蒙古入侵军不得不放弃完全征服高丽的野心，同高丽缔结了和约。条件是：要求高丽提供大量物质，留下达鲁花赤（地方官）七十二名和若干守备队员干涉高丽

内政。蒙古军于1232年1月撤出高丽。

高丽人民在同敌人的斗争中从未屈服，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变，给高丽人民带来重大的损失和牺牲。

二、1232—1259年高丽人民反对蒙古统治 阶级继续入侵的斗争

蒙古军撤退后，事态的发展与崔瑀的预料相反。蒙古统治者把达鲁花赤派到开京和其他各地，横暴地干涉高丽内政，勒索大量财物，而且这种行为越来越露骨。

蒙古统治者的这种行为必然侵害以崔氏政权为首的高丽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担心蒙古的达鲁花赤将要完全掌握高丽大权，而自己则会丧失统治地位。高丽统治阶级又认为，如果达鲁花赤的搜刮体系得以建立，高丽就将同时并存二重三重的封建统治机构（即封建掠夺体系）。这不能不激起人民的更大反抗。此外，蒙古对高丽的贡物掠夺和达鲁花赤的干涉，不是依靠武臣政权，而是通过徒具虚名的国王。这就使崔氏政权更加陷入困境，因为这将会严重影响他对政权的把持。因而，崔瑀的武臣政权对蒙古入侵势力的扩张抱有不满意，进行了反抗。但他们不能，也不敢组织人民力量进行抵抗，而是利用蒙古军缺乏海上军事力量的弱点，决定避难岛屿，维持自己的统治，然后再和蒙古统治者议和。1232年7月，崔瑀处决驻西北地区的达鲁花赤后，强迫王室迁都江华岛。并向人民颁发“人保山城，人避海岛”的命令，以示抗战之意。崔瑀在江华岛围筑双重城墙，动员全部高丽海军保卫江华岛并确保江华岛与各地的海上运输。崔瑀的措施，虽基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为了维护他自身利益，并且有些是只说空话和限制人民，甚至欺骗人民的地方，但反对蒙古入侵军的一些措施，在客观上多少反映了高丽人民的要求。

王室迁到江华岛、达鲁花赤被处决以后，蒙古统治者借口高丽不履行和议条件，于1232年再度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直到1259年，前后总共发动了五次（包括1231年的人侵共六次）大规模的人侵。

在此期间，高丽统治阶级虽在人民面前提出一些抗战口号，但对入侵者却不战而和，轻易提出“和议”，始终在抗战和妥协两者之间摇摆不定。高丽统治者在蒙古人侵的整个时期，未曾组织过象样的国家规模防御军，以反抗入侵者。

蒙古军极尽破坏、掠夺、屠杀之能事，使高丽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不论敌人如何野蛮，也不能使高丽人民屈服，高丽人民广泛采用传统的守城、游击等战术，进行英勇斗争。1232年，蒙古军南下，直至龙仁城（今京畿道龙仁）。此时，金允侯勇敢射死敌将撒礼塔，敌军混乱，高丽人民利用这个机会杀伤和俘虏许多敌人，终于歼灭了蒙军。连续几次的蒙古军大规模入侵，均由于高丽人民的英勇奋战而遭到失败。1253年，蒙古统治阶级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入侵，猛攻忠州山城，企图控制高丽南部地区。当敌人第一次进攻时，英勇战斗，坚守城池的忠州人民，又一次发挥无比的英雄气概，成功地击退敌人历时七十多天的疯狂进攻，保卫了自己的家乡，阻止了入侵军的南下。

当时忠州城的“防护别监”是曾经射杀撒礼塔的金允侯。他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向士兵们说：“若能效力，无贵贱，悉除官爵，尔无不信。遂取官奴簿笈焚之，又分与所获牛马，人皆效死赴敌。蒙古兵稍挫，遂不复南。”^① 忠州人民的英勇战斗，挫败敌人的南侵计划。此后，忠州人民在1255年蒙古军第六次大举入侵时，也击毙千余名入侵军，英勇地保卫了自己的家乡。

^① 《高丽史》卷一百零三，金允侯传。

忠州和各地人民，虽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背信弃义和优柔寡断，1250年以后，蒙古入侵军继续深入，直至全罗道，并截断从全罗道到江都的海上联系。江华岛的生活补给线被切断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他们互相间的倾轧围绕着与蒙古的“和议”而表面化。崔氏一派反对“出陆亲朝”，而王室却认为“出陆亲朝”有利。1258年，以金仁俊为首的武臣与王室相勾结，杀死崔道，推翻历经四代的崔氏政权，实权落入金仁俊手中。

另一方面，在高丽人民强有力的斗争面前，蒙古入侵军不得不在“和议”条件上做些让步，改国王“亲朝”为太子“亲朝”。1259年3月，高宗太子佛带国书去蒙古。于是，高丽与蒙古之间的“和议”告成，翌年太子佛回高丽即王位（元宗王）。蒙古统治者承认它所征服国家的“王权”，并与之建立和平外交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实为高丽人民英勇抗战的结果。

但是，蒙古统治者仍怀有征服野心，继续要求“出陆”。然而1268年，林衍、林惟茂父子打倒金仁俊后，自任教定别监。他们采取了比金仁俊更为强硬的态度，派人到各地，号召陆地人民抗击蒙古入侵军。1270年4月，林惟茂被以国王为首的亲蒙派打倒，持续近百年的武臣政权告终，政权重新回到国王和文官手里，还都工作正式开始。

三、三别抄军的抗战

武臣政权被打倒后，重新执政的高丽王室与蒙古统治者相勾结，利用蒙古势力一味追求王室利益。1270年，国王根据蒙古统治者的要求硬是指令江华岛内两班和军队回归陆地，并拆毁江华岛的内城，不久又下令解散城内主力部队中具有强烈反蒙情绪的三别抄军。三别抄军是左别抄、右别抄、神义别抄的统称，他

他们是府兵制以外特别征募的军队。其基本队伍是农民。在神义别抄军中有很多曾被蒙古入侵军俘虏而受尽虐待的人民，因此反对蒙古入侵军的热情很高。当时，三别抄军几乎成为江华岛内唯一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高丽王室下令解散三别抄军，就意味着最大的反蒙抗战力量的解体，高丽王室的这一决定把其叛逆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正因为如此，解散令一传来，三别抄军当即予以拒绝，并奋起反对蒙古入侵军及与其勾结的高丽王室和两班。从此以后，以三别抄军为首的高丽人民便开展了反对外来入侵者和本国统治者的艰苦斗争。

1270年6月，三别抄军在裴仲孙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提出“蒙古兵大至，杀戮人民，凡欲辅国者，皆会球庭”^①的口号，用以聚集力量。这一口号，打动了江华岛全体人民的心弦，倾刻之间“国人”“大会”于城内广场。起义军砸开武器库，把武器分给参加起义的人民。他们和江华岛人民一起，处决了叛徒，进行抗战。三别抄军的抗战从一开始就具有反对卖国的全民起义性质。其中很多是身分低贱的奴婢。他们在参加起义军的“国人”中是斗争最坚决的阶层。

1270年8月，三别抄起义军集结力量，分乘一千艘舰船，开往全罗南道珍岛，以此岛作为抗战根据地。因为当时三南一带有英勇的农民军活动，同时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略意义上看，珍岛比江华岛更为有利。

三别抄军镇守珍岛，在南海一带开展活动，同时又向各地发送檄文，号召陆地人民积极投入战斗。人民纷纷响应，集合于珍岛，使抗战军的力量增强。同年9月初，抗战军开始攻占西南沿

①：《高丽史》卷一百三十，裴仲孙传。

海地区。三别抄军首先“入长兴府（全罗南道长兴郡），杀京卒二十余人，擒都领尹万藏”，并获得许多财物和粮食。抗战军继续扩大战绩，控制全罗道各邑，11月攻占南海岸的主要基地济州岛。12月，三别抄军在珍岛附近进行大海战，粉碎蒙古、高丽联合舰队，取得巨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蒙古军指挥“阿海恟下船，欲退屯罗州”^①，高丽军指挥金方庆也被三别抄军包围，勉强逃命。战后，敌人内部出现混乱，“帝（蒙古皇帝）命罢阿海，以忻都代之”^②。这样，三别抄军掌握了西南海一带的制海权，不断袭击敌人的海上运输和南道各地的造船厂，烧毁建造中的舰船；3月袭击合甫（今庆尚南道马山），处决该地的地方官，随即东进袭击东莱。4月，袭击金海（庆尚南道），破坏和烧毁官衙和造船厂。

三别抄军的活动极为活跃，它沉重地打击了蒙古统治者“东征”日本而建造船艘的计划；使三南地区向开京运送租税和贡物的海上交通陷于瘫痪，给敌人造成极大的困难。珍岛成为抗战的中心，极大地鼓舞了陆地人民的斗争。

1271年1月，密城郡（今庆尚南道密阳）人方甫、桂年、朴平、朴公、朴庆纯、庆棋等人聚集当地的人们与珍岛相呼应。他们处决密城的“员”，自称“攻国兵马使”，并向附近“郡县”发送檄文。有一支部队还处决了清道的“员”。这次起义虽然不久就失败了，但它积极配合珍岛起义军，反对屈从于蒙古入侵者的高丽统治阶级，具有重大意义。

① 《高丽史》卷一百零四，金方庆传；《高丽史节要》卷之十九，元宗12年1月条。

② 《高丽史》卷一百零四，金方庆传；《高丽史节要》卷之十九，元宗12年1月条。

同一时期，开京的官奴崇谦、功德等人，计划“聚其徒，谋杀达鲁花赤及国中在位者（高丽王廷官吏）”^①，而后去珍岛。但他们的计划在即将成功时不幸暴露。大部岛上人民也为开京官奴奋起的消息所鼓舞，消灭了侵入该地的残暴的蒙古兵。

三别抄军攻占西南海岸“诸岛三十余所，其力渐盛”，给陆地人民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在此情况下，蒙古入侵者和高丽王室惊恐不安，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于1271年5月先后动员四百多艘战船进攻珍岛。三别抄军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勇敢战斗的精神，使敌人胆战心惊。但由于指挥成员的叛变行为而遭到失败，裴仲孙被害。这对三别抄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宁死不屈坚持战斗的勇士们，在金通精的率领下分乘战船驶入济州岛，以该岛为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在该地筑起内外双城，并联合在南海县一带活动的另一支抗战力量，加强了队伍。从1272年春起，三别抄军在南海岸一带展开积极的游击战。他们挫败敌人的怀柔政策，继续扩大出击范围，远至中部海岸。据《高丽史节要》统计，三别抄军自1272年3月至11月间，先后夺取或焚烧敌人战船达四十六艘。此外，还夺取了大量的粮食。因而，使“滨海肃然”。1273年1月，三别抄军再度袭击“合浦，焚战舰三十二艘，擒杀蒙古兵十余人”^②。当时合浦是蒙古在南海岸一带入侵日本的最大根据地。三别抄军的力量虽有所减弱，但仍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摧毁敌人的据点，继续控制南海岸一带。

1273年4月，蒙古入侵者和高丽王室联合组成“讨伐军”，“金方庆与忻都等，以兵一万，战舰百六十艘”^③，袭击济州岛。

① 《高丽史节要》卷十九，元宗12年1月条。

② 《高丽史节要》卷十九，元宗14年1月、4月条。

③ 《高丽史节要》卷之十九，元宗14年1月、4月条。

三别抄军全体战士团结一致，给占优势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最后抵住敌人的进攻。“金通精率其徒七十余人，遁入山中”，坚持斗争，他们最后全部自尽，保持了高尚的爱国精神。三别抄军的抗战至此告终。

三别抄军历时将近三年的抗战，是十三世纪后半期高丽人民最大的反入侵和反封建斗争，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这一斗争给蒙古入侵者与其相勾结的高丽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第二，他们继承高丽人民的爱国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为后代树立了极为高尚的爱国主义典范。第三，三别抄军的抗战，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宋朝和日本人民反对蒙古入侵者的斗争给予帮助，使蒙古入侵者不得不拖延进攻日本的计划，这是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的。

第二节 十四世纪高丽人民反对蒙古干涉和倭寇入侵的斗争

一、蒙古干涉下的高丽 驱逐蒙古势力和收复失地

马克思曾指出：“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①。

1259年，蒙古统治阶级征服高丽，1273年，元朝（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下面为叙述方便，把蒙古一律改为元）与高丽的联合部队镇压三别抄军的抗战。元朝统治阶级征服高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0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后，就用马克思所说的第二种形态，即除割去部分高丽领土作为直辖地（高丽西北部的东宁府、东北部的双城总管府，此外，济州岛也成为元的直辖地）外，仍在形式上保存高丽王室，表面上承认高丽的独立，但是，在实际上完全控制了高丽，元朝主要通过干涉内政，“征收贡赋”的方法肆意掠夺高丽人民。

元朝向高丽开京和其他地方派遣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有权监督国王，干涉高丽内政，不需国王同意即可任意逮捕、拘禁和惩罚高丽人民。为了镇压高丽人民的反抗，元朝还派遣了很多屯田兵，驻扎在高丽各地。高丽政府将从人民手中夺取的广大土地献给元军，并向驻军缴纳大量的军粮、耕牛和农具等。

高丽王室和两班贵族积极与元朝统治阶级妥协，以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元朝也注意怀柔高丽王室，通过婚姻结成亲戚，标榜为“一家”。这样，自高丽忠烈王以后，直到恭愍王，凡七代国王中有四位国王被元王朝摺为驸马，其中三位国王是元公主所生的外甥。当然，元公主并不是单纯的王妃（或王母），她携带数百名蒙古人，行使凌驾于国王之上的权力，在宫廷中监督国王。作为驸马的高丽国王，为表示对元帝的忠诚，经常出入元朝首都。例如，忠烈王在位三十四年间，先后十四次往来于元首都（包括他在元首都即位和两次中途而返），其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都很惊人。例如：1284年4月“王（忠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费银六百三十余斤、苧布二千四百四十余匹、楮币一千八百余锭”^①；1296年9月“王（忠烈王）与公主如元，从臣二百四十三人，兼从五百九十人，马九百九十四匹”^②。高丽政府为解决这方面的

① 《高丽史》卷二十九，忠烈王10年4月条。

② 《高丽史》卷三十一，忠烈王22年9月条。

经费，设置了称为“盘缠都监”的专门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掠夺，给人民造成更加沉重的负担。

高丽人民被迫向元朝统治者缴纳大量的金、银、铁、人参、布帛、虎皮、鹰等各种贡物。特别是特殊贡物鹰的征收，是高丽人民的巨大痛苦之一。高丽王朝为此特别设立“鹰坊”，设置专门抓鹰的官吏和军役。政府给予他们各种特权，并免除其一般赋役。而他们除了抓鹰之外，依仗权势，横行于乡里，对百姓敲榨勒索，无恶不作。

元统治者又强征高丽“童女”。高丽王室为此特别设置了“结婚都监”，下令禁止“童女”随便结婚，甚至用搜宅的野蛮方式强征“童女”以进献蒙古统治者，使高丽社会大受“骚扰”，“哭声满路”。

在元朝干涉期间，高丽人民最大的负担是元朝两次“东征”（指1274年和1281年，元朝对日本的两次入侵”。第一次“东征”时，元要高丽建造大小九百艘船和供应士兵、水夫、军粮等。第二次“东征”时，高丽负担建造战舰九百艘，木工、船工一万五千名，士兵一万名，军粮二十二万石。高丽统治者将这笔沉重的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两次“东征”，均告失败。高丽人民在元同日本的两次可耻战争中，遭受极大损失，陷入更加悲惨境地。对此，连高丽国王也曾流露：“征讨倭民，修造战舰，丁壮悉赴工役，老弱仅得耕种，早早晚水，禾不登场。……民之凋弊莫甚此时”^②。

在元统治者的控制下，高丽人民遭受国内外统治者的空前掠夺，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严重地阻碍了高丽社会的发展。尽管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却不管外来入侵者和国内统治阶级怎样

② 《高丽史》卷二十八，忠烈王元年1月条。

凶恶，只要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就决心奋起反抗，而这种斗争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当时，高丽人民虽未能组成大军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元与高丽统治者的双重压迫，但斗争从未停止。人民反对压迫和剥削，反对被束缚于土地之上，不断地进行斗争。“逃散”，这是当时高丽人民进行斗争的主要表现之一。被迫逃散的人民中，有的投托于大农庄主，变成他们的奴婢农民；有的到处流浪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有的逃到山城、海岛，拿起武器进行小规模武装反抗；还有不少人流亡到包括元朝领域在内的国外。

人民的大规模“逃散”和流亡到国外，减少了高丽统治者的剥削对象，加深了他们的困境。因此，高丽政府曾反复施行“田民辨正”（查清“田民”的所有者，纠正非法占有的部分）、“安集”（将农民束缚于原地）、“推刷人物”（调查高丽流民迁入元朝情况，并请元政府把他们送回高丽）等。由于人民斗争的发展，高丽政府有时对元统治者过分干涉内政也提出异议，多少保持了自己的体面。例如，1278年，元朝根据高丽国王的强烈要求，曾一度招回元驻在开京的达鲁花赤，撤回“忻都、茶丘军、种田军、合浦镇戍军”等元驻高丽部队。这给高丽带来很大好处。对此，连元朝达鲁花赤张国纲在回国途中也承认说，这是“一国（指高丽）之福也”。高丽还先后收复了东宁府、济州岛等曾被元朝直接强占的领土。据《高丽史》记载，1278年8月，高丽派人到元“请归遂安、谷州”；同年10月，“元帝归我（高丽）谷州、遂安、殷粟”^①；1290年3月，元场“罢东宁府复归我（高丽）”^②。1294年5月，元朝根据高丽的要求把“耽罗（今济州

① 《高丽史》卷二十八，忠列王4年8月、10月条。

② 《高丽史》卷三十，忠列王16年3月条。

島) 还隶高丽”^①。

到十四纪后半期，元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元末农民大起义席卷全国，利用农民运动而登上政治舞台的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将元统治者驱逐到最初的蒙古地区。至此曾经强盛一时的元的统治面临总崩溃的危机，中国正处在元明交替之际。在这种形势下，一世纪以来，受尽元朝统治阶级压迫和掠夺的高丽人民，进一步展开了英勇的抗元斗争。

1355年2月，元顺帝的使节野思不花在高丽全州的暴行，引起群众的愤慨。全罗道安廉使郑之祥“遂率众，执不花（野思不花）……等囚之，夺不花所佩金牌”^②。这一事件，是高丽人民反元斗争情绪更加高昂的反映。

起初，高丽王室仍然站在元统治者一边，但当它感到国内外形势不利于元的时候，也开始驱逐元的势力。1356年，恭愍王首先消灭了高丽王庭内最大的亲元势力奇氏一族，这是高丽从多年来的亲元政策转变为反元政策的准备工作。其次，他命令东北面兵马使向永兴方面，西北面兵马使向鸭绿江以北追击元军，很快收复了双城总管府所占的地区，摧毁了鸭绿江以北元军的八处军事要地。高丽王朝还废除元朝封赐的年号，撤掉开京的“征东行省”^③，逐其官吏，恢复高丽的原有官制。从此以后，高丽虽然还没有完全断绝与元朝的关系，但它已经摆脱了元朝的控制，恢复了独立。

① 《高丽史》卷三十一，忠列王20年5月条。

② 《高丽史节要》卷二十六，恭愍王4年2月条。

③ 1280年，元朝以准备第二次“东征”日本为借口，在高丽设置的临时性行政机关，它主要以顺利进行“东征”为目的。但“东征”失败后，这一机构仍未取消，继续干涉高丽内政。

二、高丽人民反对倭寇入侵的斗争

十四世纪后半期，高丽与倭寇（古代日本海盗）的矛盾非常突出。倭寇第一次大规模入侵高丽是在1350年。对此《高丽史》写道：1350年2月，“倭寇（寇是动词——笔者）固城、竹株、巨济、合浦，……倭寇之侵始此”^①。从此以后，以数十艘，甚至数百艘组成的倭船经常入侵高丽，在庆尚道、全罗道等高丽南海岸地区大肆掠夺，严重阻碍高丽南部地区向开京运输租税和贡物的漕运。有时，倭船直接逼近首都开城附近，威胁首都开京的安全。

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倭寇对高丽的侵袭进一步升级。过去，倭寇的侵袭，主要局限于高丽南部沿海地区，目的主要袭击漕运船、掠夺漕仓米等；而此时它的侵袭范围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内陆地方，从海陆两方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掠夺。他们成群结队地侵袭各地，肆意杀掠人民，烧毁房屋，无恶不作，给高丽造成极为严重的灾难。

当时，高丽兵力已很衰弱，难于击退入侵者的屡次进攻。但是，高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设置防御都监；大量制造武器；向各道陆续派遣元帅和兵马使；组织和指挥防御军；派都巡问使、都体察使衔的大臣到各地妥善处理地方军政和一般行政事务等。高丽政府特别加强水军建设，准备在海上击退倭寇。

1373年，高丽政府为“扫清海寇”“大作战舰八百余艘”，同年10月，“观新造战舰，又试火箭、火筒”^②；1379年，当时的执政者崔莹又动员军队、僧徒等人“造巨舰百二十艘，分守要

① 《高丽史》卷三十七，忠定王2年2月条。

② 《高丽史》卷一百十三，崔莹，禘王8年条；卷四十四，恭愍王22年10月条。

害，自后倭寇稍息，民反喜之”^①。高丽水军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增加，在技术上也空前提高。当时，高丽的著名军事科学家崔茂宣从元朝商人李元那里学到火药知识，“使家僮数人，私习其效”，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试验成功，制造了近二十种火药武器。1377年10月，高丽政府“始设火燭都监，煎取焰硝，且募唐人（中国人之来寓，而打造战舰，公（崔茂宣）又监督”。^②这样，高丽建立了用“火器”武装起来的大舰队，成为迎来新的反倭寇胜利的转折。

1380年8月“舰（倭寇）五百艘入镇浦口维舶分兵守之，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尸蔽山野，转谷于其舶，米弃地厚尺”^③。高丽在三元帅沈德符、罗世（元末明初流亡到高丽的中国人）、崔茂宣等人的领导下，派遣用“火器”武装的一百艘战舰，并在敌我舰队相近以前，用“火器”猛烈射击，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对此，《高丽史》写道：“世（罗世）等至镇浦，用茂宣所制火炮，焚其船，烟焰涨天，贼守船者烧死殆尽，赴海死者亦众。”^④

这时，残敌数万，包括战斗开始之前“登岸散入州郡”的敌人，既被切断退路，又完全失去后援，便在高丽南部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最后（同年9月）在云峰（全罗南道南原）地区被李成桂部队消灭。

高丽水军继续打击倭寇。1383年5月，由郑地率领的高丽舰队（四十七艘）与一百二十艘组成的倭寇舰队在朴头洋（庆尚

① 《高丽史》卷一百十三，崔莹，禑王8年条

② 《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之二，京都下，军器寺条。

③ 《高丽史》卷一百十四，罗世传。

④ 《高丽史》卷一百十四，罗世传。

南道南海郡前面)海面作战。敌人“以大船二十艘为先锋，艘置劲卒百四十人。地(郑地)进攻，先败之，浮尸蔽海。又射余贼，应弦辄倒，遂大败之。发大炮，焚贼船十七艘”^①。

连续取胜的高丽水军，已经从过去的单纯防御转为主动攻击，努力从根本上消灭倭寇的入侵势力。1389年，朴葳率领一百艘高丽舰队主动攻击倭寇的巢穴对马岛，“烧倭船三百艘，及傍岸庐舍殆尽……搜本国(高丽)被虏男女百余人，以还。”^②。

十四世纪后半期，高丽在艰苦的环境里，同倭寇坚持斗争四十多年，并取得重大胜利。但倭寇的侵袭仍未停止。事实证明，只靠当时水军的力量不能确保高丽海防，完全制服敌人，还必须建设强大的水军和陆军。但是，当时高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衰落的中央集权，担当不了这一历史任务，这一任务要到十五世纪新兴的李朝封建政府时才能完成。

第三节 高丽的灭亡和李朝 封建国家的建立

一、十四世纪后半期大农庄的出现和人民生活的恶化

十三—十四世纪，随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大规模发展，小农经营的良人农民日趋破产，沦为大地所有者的奴婢农民，从而减少了国家掌握的公田和公民，进一步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机能。

早在十二世纪初，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控制和支配已经削弱，

① 《高丽史》卷一百十三，郑地传。

② 《高丽史》卷一百十六，朴葳传。

这时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开始发展，到十二世纪后半期，以武臣的掌权为契机进一步得到发展。武臣掌权以后，他们之间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其实质是夺取更多的土地和农奴。

到十四世纪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秩序的进一步紊乱，一些封建官僚和寺院更加紧了对土地的掠夺，因此，有很多土地集中到他们手里。

两班贵族扩大私有地有多种方法。例如：利用国家对土地支配权的削弱，把自己的受租地完全变成私有土地；掠夺良人农民的小块土地（这种土地向国家缴纳租税，叫做公田）；有些大官僚则掠夺其他两班贵族从国家领取的受租地等。这样，到高丽末期，不仅统治阶级掠夺良人农民的土地，而且也出现了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土地的现象，土地兼并空前激化。据《高丽史节要》记载，1285年1月。“权贵侵夺民田，奸氓附势多免赋役，凡诸征敛平民苦之”；1311年9月平阳君印候“凭籍势力，夺人土田、奴婢无极，人多怨之，及死至，有相贺者”^①。

土地不断集中，大土地所有者们横行霸道，国家掌握的公田、公田显著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恭愍王为了收拾残破的高丽社会，曾驱逐王廷内部的“世臣大族”，任用与“世臣大族”无任何关系、出身“卑贱”的辛旽，并授以很大权利。1365年，辛旽向国王提议设立“田民辨正都监”，自己充任判事，着手辨正工作。他曾宣布：“比来纪纲大坏，贪墨成风。宗庙、学校、仓库、寺社（指没有势力的佛教寺院）、禄转（官吏的薪俸）、军须田及国人世业田民（奴婢），豪强之家夺占几尽。或已决仍执，或以民为隶。州县驿吏、官奴、百姓之逃役者，悉皆漏隐，大置

^① 《高丽史节要》卷二十三，忠宣王3年9月条。

农庄，病民瘠国，感召水旱，疠疫不息”^①。

辛旽的辩正工作，在很多方面较前彻底得多。对此，《高丽史》曾描写：“令出（指都监关于辩正田民的命令），权豪多以所夺田民还其主，中外忻然。旽（辛旽）闻一日至都监，仁任（李仁任）、春富（李春富）以下所决焉。旽外假公义，欲市恩于人，凡贱隶（奴婢）诉良者，一皆良之。于是奴隶（奴隶农民和贱民等最下层人民）背主者峰起曰：‘圣人’出矣。”^②

辛旽的改革案限制了世臣大族的大土地所有制，照顾了中小地主和农民的利益，解放奴婢为良人，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但它却受到世臣大族的猛烈反对。王廷之内属于奇、权两族余党和“世臣大族”的统治者，逐渐纠集势力，起来反对辛旽，散布荒言，污蔑和打击辛旽。他们甚至向恭愍王告发辛旽，说他正在策划推翻国王，以便自己称王。于是，国王便倒向“世臣大族”一边，于1371年将辛旽以叛逆罪处决。辛旽死后，他的改革案完全失败，一切复旧。

清除辛旽一派以后，接着掌权的是李仁任、林坚味和廉兴邦等“世臣大族”。他们掌权后，在王廷内，首先将辛旽的一切政策全部推翻，并利用自己的权势，大肆兼并土地，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农庄。他们“纵其恶奴，有良田者率以水精木杖而夺之，其主虽有公家文券，莫敢与辩。时人谓之水精木公文”^③。

由于李仁任、林坚味、廉兴邦等“世臣大族”的横行霸道，属于国家机关的“田民”和其他向国家缴纳田税贡赋的农民，即公田和公民，都变成了他们大农庄主的私有地和私民，而且数量

① 《高丽史》卷一百三十二，辛旽传。

② 《高丽史》卷一百二十六，林坚味传。

③ 《高丽史》卷一百二十六，林坚味传。

与日俱增。

大农庄不只是“世臣大族”的领地，更多的还是佛教寺院。在高丽时期，佛教僧侣享有和两班同等的社会政治特权，佛教大寺院拥有的农庄，比“世臣大族”的农庄还要大。

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大农庄，规模相当大，往往以大山和大河为界，包括几个邑。大农庄主象以前的崔忠献那样，都拥有家臣团。家臣团有兵马使、判官等称号，是大农庄主残酷掠夺农民的工具。每当掠夺农民时，大农庄主就组织数十名爪牙骑马在农庄横冲直撞，向农民肆意征收地租（税），勒索“礼物”和贿赂。

这种大农庄，是继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初的大农庄，在十世纪后半期被封建中央集权体制并吞后，又一次出现的。它们都有家臣团，但它对中央集权的独立性和相互割据，与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初相比，却大为减弱。

大农庄的发展给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跨越几个邑的大农庄里，原来的中小地主并未完全清除。压在农民身上的地主，一层又一层。因此，土地兼并极端严重，封建土地所有关系非常混乱，农民受着二重三重的剥削。

据《高丽史》记载，1388年7月，赵浚曾向国王提出意见说：“祖宗授田、收田之法既坏，而兼并之门一开，为宰相而当受田三百结者，曾无立锥之可资；为宰相而受禄三百六十石者尚不满二十石”^①。他又说：“至于近年，兼并尤甚，奸凶之党，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皆指为祖业之田，相攘相夺。一亩之主过于五六，一年之租收至八九”^②。充分说明十四世纪末的高丽社会极端混乱，完全丧失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①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禄科田，E 14 年条。

②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禄科田，E 14 年条。

隶属于大农庄主或中小地主，成为他们私民的农民，在身份上就是他们的奴婢。奴婢处于这个社会的最下层，受尽种种折磨。一些还没有成为私民的农民即公民，不仅要受以大农庄主为首的地主阶级的各种剥削和压迫，还必须向封建国家缴纳租税和贡物，并服兵役和负担其他各种徭役。

大农庄越扩大，公民就越减少，这就加重了公民的负担。由于频繁战争和封建秩序的极端混乱，公民所承担的国家负担，迅速增加。因此，这个时期所谓公民的处境也非常困苦，从而加速了他们的破产。

无论是封建国家，或是大农庄主和中小封建地主，他们的剥削方法都是非常毒辣的。他们普遍采用所谓白骨征（生前没有还清债务，就要从他子孙那里收缴）、黄口征（新生婴儿也要负担父母的欠债）、邻征和族征（本人还不起，或逃跑，便向其邻居和亲戚收缴）等最残酷的剥削方法。贪得无厌的世臣大族和佛教寺院等压迫者犹嫌不足，竟强迫还不起所欠别人之债的人充当奴婢，迫使无力偿还父母所欠债务的儿童为奴婢。这时期，买卖奴婢也很盛行。

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社会上出现“父母冻馁而不能养，妻子离散而不能保，无告流亡，户口一空”^①的凄惨局面。

二、李成桂一派的掌权 科田法的制定和李朝封建国家的建立

1371年辛旽被清除之后，林坚味、廉兴邦一派掌权。他们对内实行保护大农庄主利益的反动政策，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则实行与北元（被驱逐到原蒙古发祥地的元朝，高丽叫做北元）修

^①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禄科田，赵仁沃上疏文。

好，与明疏远的保守政策。

1388年，崔莹与李成桂、郑道传等一派联合打倒了林、廉一派。此后，崔莹、李成桂、李穡、郑道传、赵浚、郑梦周等人掌握了政权。1388年春，高丽与明朝围绕着铁岭卫问题，关系紧张。高丽王朝经过争论，并根据门下侍中（当时，最高官职）崔莹的意见，组织近四万人的攻辽部队，总指挥由崔莹担任，左军都统使为曹敏修，右军都统使为李成桂。5月，攻辽部队到达鸭绿江。李成桂认为这是一种冒险，可能贻误大事，并以“前有大川，因雨水涨”等为理由，提议回师。但被国王和崔莹拒绝。李成桂一派便迫使曹敏修改变主张，并从威化岛断然回师。这样，回师就成了政变的契机。

李成桂一派驱走禑王，立其幼子（昌王）为王，并肃清了崔莹和其他反对派。1389年，又以昌王并非王姓为借口，驱逐昌王，立其远亲恭让王为王。这些国王都只不过是傀儡，实权完全掌握在李成桂及其一派手中。

1388年6月，李成桂一派从威化岛回师后，马上着手进行私田整理事业。例如，他们首先将“其料物库（管理王室财产的机关）属三百六十庄处之田，先代施纳寺院者悉还”^①；其次，在同年8月，决定以今后三年为限，暂时对全部公私田一律征收“田租”（实为田税）；10月，设置“给田都监”，并对京畿道等六道进行量田（即丈量土地），将所有土地登入国家册档。

1390年9月，量田工作暂告一段落，李成桂“焚公私田笈于市街，火数日不灭”。^②当时，李成桂一派通过量田事业新掌握的土地面积共有七十九万八千余结。这个数字与1430年代国

①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禄科田，王14年6月条。

② 《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一，田制，禄科田，恭让王2年9月条。

家所掌握的土地一百七十一万结相比较，还不到后者的一半，这说明当时还有很多土地仍处在国家支配之外（那时，对两界地方还没有进行量田）。

1391年5月，李成桂一派在基本结束私田整顿事业的基础上，实行给田制度，将这些收租（当时以十分之一为标准）土地分配给国家机关、两班官僚和其他李成桂一派的支持者，称此为“科田法”。

科田仅限于京畿之内施行。即在首都开京附近划出一定区域；称为京畿，授予两班官僚的土地限于京畿之内。这就使中央便于对授田者进行监视，防止给田的扩大，又便于把租税运到开京以供使用。授与的土地面积，按其官品高低而不同。相当于第一科（第一等）者，授一百五十结；第十八科（第十八等）的最下层官吏，授十结。这里所说的授与，即将那些土地所有者应向国家缴纳的田租（实为田税）改由官僚收缴。也就是说，将收租权转让给官僚两班。由于这样按等级（科）授与收租权，因而，把这些土地称为科田。

除科田外，还有军田，对那些虽非官吏但在各地方有一定势力者，则以军田名义授与五结至十结的收租权，并招至首都开京使其担负与其身分相应兵役。这些包括中小地主和部分上层农民。分得军田的人数大大超过分得科田的人数，很多情况是等于豁免他们所占有土地的田租（税）。

科田和军田的田租基本上归个人，不归国家，因此称之为私田。其余的土地为公田，其田租可由各机关分别进行搜刮，或者纳入国库。可以说公田比私田更多，它是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主要物质基础。对于成为私田的科田和军田，也规定要向国家缴纳相当于田租税的十分之一的“田税”。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私田还多少带有公田的性质。

科田法仍旧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只是改变了搜刮剩余产品的规定和搜刮者。它没有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所固有的矛盾。

但是，科田法的实行在当时条件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多少调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限制了大农庄的无限发展，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一亩之主过于五六，一年之租收至八九”的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时，它对加强李朝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巩固国防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

科田法实行后，接着提到日程上的就是推翻王氏高丽，李成桂登王位的问题。李成桂于1392年驱逐恭让王，自立为王。新建立的王朝称为朝鲜。

第四节 十三～十四世纪的高丽文化

连续不断的外敌入侵和本国统治阶级的重压，使高丽文化在十三～十四世纪遭到严重破坏。但是高丽人民在斗争中继承和吸收本民族和外国文化的优秀因素，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一、科学技术

十三～十四世纪，高丽的科学技术有显著发展，主要表现在印刷术的发展、火药的制造和棉花的栽培等几个方面。

在十三世纪高丽文化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印刷术的发展。保存至今的《八万大藏经》版本（八万六千六百张）是从1236年开始花费十六年的时间刻制出来的。十三世纪中叶，高

丽在旧的大藏经业已烧毁^①，蒙古统治阶级频繁入侵的情况下，仿效十一世纪的显宗，妄想依靠佛法击退蒙古兵。于是，高宗王便在“护国安民”的美名下再次发起雕藏事业，版藏江华岛，后来搬到庆尚道海印寺，保存到现在。这部大藏经是汉译佛经及其注释之集大成者，作为佛教丛书，其数量之多（约达六千七百八十卷）极为罕见。大藏经的版木，刻制精致，字体古朴有力。这说明当时雕刻的《大藏经》，其动机虽然是统治阶级的荒唐迷信，却反映了当时高丽雕版印刷业的高度发展，是当时劳动人民创造性劳动的光辉成就。

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布衣出身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法（用胶泥制造），它首先传入朝鲜（高丽），高丽人民在国内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吸取中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法，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推陈出新，终于在十三世纪初前后，发明了世界上最早金属活字，其根据如下。

十三世纪前半期，高丽李奎报代替当时的当权人晋阳侯崔怡所写的《详定礼文》（或云《古今详定礼文》）的序言中写到：“仁庙朝始敕平章事崔允仪等十七臣，集古今同异，商酌折中，成书五十卷，命之曰详定礼文……是书跨历年祀，简脱字缺，难于考审。予先公乃令补辑，遂成二本，一付礼官，一藏于家，其志远也。果遇迁都之际，礼官遑遽，未得赍来，则几若废，而家藏一本得存焉。予然后益谱先志，且行其不失，遂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分付诸司藏之。”^②

^① 高丽在十一世纪通过先后两次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时间完成了一万多卷、十万多块雕版的空前大规模的刻藏事业（大藏经和续藏经）。可惜，后来（1232年）被蒙古入侵军烧毁，现已失传。

^② 《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十一，新序详定礼文。

据记载可知,《祥定礼文》是一种在十二世纪前半期高丽仁宗王时编写的有关规定封建秩序的法律书籍,后来崔怡把它用铸字印成二十八本,分给各机关保管。

《详定礼文》序言虽然未指出写作的具体年代。但我们却知道序言由李奎报替晋阳侯崔怡写成。据《高丽史》记载,崔怡在公元1234年被封为晋阳侯,李奎报在1241年死亡。从中可知,由李奎报替晋阳侯崔怡所写的《详定礼文》序言无疑是在公元1234年到1241年的八年内写成。

文中的“铸字”,无疑指金属活字,因为金属才能熔铸。新罗“以铜铸百司及州郡印”^①,高丽“铸钱一万五千贯……钱文曰海东通宝”^②,它们指的都是用金属铸造有纹货币和印章,这在客观上已经提供了十三世纪初的高丽能够发明金属活字的可能性。

总之,高丽在公元1234年1241年的八年期间内,已经用金属活字印成《详定礼文》二十八本。

此外,高丽发明金属活字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的序文。其内容有:“夫南明证道歌者,实禅门之柜要也……于是募工重雕铸字本,以寿其传焉。时己亥九月上旬,中书令晋阳侯崔怡谨志。”^③

据《高丽史》记载,崔怡任为晋阳侯时期的己亥年相当于高丽高宗26年,即公元1239年。这就说明,高丽在公元1239年“募工重雕”原先做为“铸字本”的《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

上述两资料证明,高丽在十三世纪前半期,具体地说在

① 《三国史记》卷第七,新罗本纪第七,文武王15年条。

② 《高丽史》卷七十九,食货二,货币条。

③ 田中敬:《吸古随想》。转引自《历史研究》1957年3号,第66页。

1234年1241年间或1239年以前就已发明金属活字，并把它运用于印书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古文资料中，前者没有说明第一次用铸字印刷，后者却说“重雕铸字本”，这就表明高丽发明金属活字的年代至少可上溯到十三世纪初前后，比西欧德国人谷腾堡发明金属活字（公元十五世纪中叶）早二~三个世纪，正象金日成指出的那样：“高丽人在世界上最早发明金属活字，大大发展了出版事业”。^①

高丽的金属活字，虽未迅速普及，但它历代相传，活字印刷从未中断。如在十三世纪末，高丽用金属活字出版了一些书，1376年又用金属活字出版了《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节要》一书。十四世纪末，高丽政府采取措施，“置书笈院，掌铸字，印书笈，有令丞”^②，为十五世纪以后李朝时期印刷术的大规模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十四世纪后半期，高丽制造了火药和火药武器，这与当时高丽著名军事科学家崔茂宣直接联系在一起，崔茂宣成长和活动的时代，正是高丽社会内外交困的年代，是倭寇的侵袭日甚一日，高丽人民紧张进行反侵袭斗争的年代。他“尝患倭寇之陆梁难制，思水战火攻之策，求焰硝煎用之术”^③，决心在海上用“火器”击退倭寇的侵扰。为此，他经常到礼成江口“每见商客自江南（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来者，便问火药之法”^④，终在1372年于礼成江口找到粗知焰硝采取法经验的元朝商人李元。崔茂宣向李元“谘问，颇得要领”，学会了火药技术，“使家僮数人，私习

① 《朝鲜革命者要熟悉朝鲜》，第11页，朝鲜平壤，外国语文出版社1973年版。

② 《高丽史》卷七十七，百官二，诸司都监各色书籍店条。

③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二，京都下，军器寺条。

④ 《太祖实录》卷七，4年4月，壬午条。

其效”，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试验成功，并向政府多次提出制造火药和“火器”的要求。1377年10月，高丽王朝终于采纳崔茂宣的意见，在中央“始设火燭都监，煎取焰硝”^①，正式由国家制造火药。

崔茂宣被任命为火燭都监的提调官（或云判事），在他的主持下，不仅生产火药，又制造出不少新的“火器”。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等载，高丽在1373年至1395年间制造的“火器”有：火箭、火筒、火炮、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六花石炮、信炮、铁瓠箭、蒺藜炮、铁弹子、穿山五龙箭、流火、走火、触天火等，达十七种之多^②。它们的威力都很大，使“观者莫不惊叹”。高丽政府又采纳崔茂宣等人的意见，大力加强水军建设，用火药和“火器”武装舰队，为反倭寇斗争的胜利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十三至十四世纪，高丽的造船技术比较发达，主要表现在造船规模大、速度快、战斗能力强等几个方面。如据《元史》记载，1268年5月，元世祖接见高丽使节李藏用的时候，为“东征”日本，要求高丽“造船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元世祖又说：“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于宋得便风可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③；这就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高丽船不仅规模大，而且速度也相当快。

1256年6月，元朝“车罗大尝将舟师七十余艘盛陈旗帜，欲攻押海（高丽罗州附近的岛屿）……押海人置二炮于大舰待

① 《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二，京都下，军器寺条；《高丽史》卷八十一，兵部，五军，禑王3年10月条、卷一百三十三，禑王3年10月条。

② 《高丽史》卷四十四，恭愍王22年10月，丁丑条；《太祖实录》卷七，4年4月，壬午条；《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二，京都下，军器寺条。

③ 《元史》卷二百零八，高丽传。

之，两军相持未战，车罗大临岸望之，召椿（尹椿）等曰：我船受炮必糜碎，不可当也，更令移船攻之，押海人随处备炮，蒙古人逐罢水攻之具。”^①可见，高丽水军的战斗力也相当强。

1274年，元朝在“东征”日本时直接利用高丽的造船技术，按高丽的“船样”制造了大量的兵船。对此，《高丽史》写道：帝（元世祖）欲征日本，诏方庆（金方庆，高丽人）与茶丘（洪茶丘，高丽人）监造战舰。造船，若依蛮样工费多，将不及期，一国忧之。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用本国（高丽）船样督造”^②。高丽根据元朝的强迫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制造“战舰九百艘”。1281年的第二次“东征”时，高丽又强征“梢工、水手”一万五千多名，制造了九百艘兵船。据传，这些兵船在日本九州海岸遭到大风时，充分显示了它的坚固性，说明高丽已有了相当高的造船技术水平。

十四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棉花传入高丽，这与文益渐直接有关。

文益渐曾出使元朝，在南中国路过棉田时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弄到几粒棉子，将其密藏起来（当时，元朝统治者严禁向国外传播棉花种植技术）。十四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他回国时，把这几粒棉子带回高丽，交其舅舅郑天益试种。郑天益“初不晓培养之术，几稿止一茎，在北三年，遂大藩衍。其取子车，缫丝车，皆天益创之”^③。

据史学界一些人认为，郑天益在制造“取子车”和“缫丝车”方面，除本人长期刻苦钻研外，还得到印度、元朝等国一些

① 《高丽史节要》卷十七，高宗43年6月条。

② 《高丽史》卷一百零四，金方庆传。

③ 《高丽史》卷一百一十一，文益渐传。

人的帮助。

从此以后，高丽的棉花栽培和棉布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据《太祖实录》，早在1396年，朝鲜就已把棉布作为对外贸易品，供给我国的女真族^①。十五世纪以后，棉花栽培不仅在朝鲜半岛南部，而且逐步扩大到中部、西北部等广大地区；棉织品已经在整个手工业生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已经成为人民向国家缴纳的重要贡品之一，并同麻布和粮谷一起作为实物货币受到重视，在对外贸易方面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元朝棉的传入高丽，对解决朝鲜人民的穿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那以前，朝鲜人民主要穿麻布过冬，从这以后具备了能够穿棉布过冬的条件。这是朝鲜衣料发达史上的一种“革新”，是中朝两国人民在经济和科技交流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在这方面文益渐起了主要的媒介作用，对改善朝鲜人民的衣料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十六世纪朝鲜著名哲学家李栗谷曾作诗赞扬文益渐说：“神农教民耕，后稷教民稼；忠宣（文益渐）衣我民，丰功倍前者”。^②

二、史学、文学和艺术

十三世纪中叶持续三四十年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文化财富，许多自古流传的史书散失殆尽。

战争结束后，高丽王朝搜集和整理佚失的历史资料，着手编纂史书。

十三世纪末，僧人一然编纂了《三国遗事》，他在此书中补充了《三国史记》所遗漏的不少历史事实。《三国遗事》不按史

^① 《太祖实录》卷第十，5年10月，壬寅条。

^② 转引自《朝鲜之伟人》，第63页，大正11年（1922）年，开辟社出版部。

书体系编纂，而是分类收编一些史实片断。一然收编了新罗乡歌二十多首、民间故事数十篇和当时认为珍贵的一些古代文献。这些虽带有佛教色彩，但它们都是《三国史记》所没有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对研究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1278年，高丽的著名作家李承休编纂了《帝王韵记》。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是用七言诗的形式叙述中国历代王朝和帝王；下卷是以同样的形式叙述朝鲜历代王朝和国王，而对高丽王朝则采用了五言诗的形式。

《帝王韵记》的正文就是这些诗，并附有比较详细的注释。有史料价值的是下卷的注释部分。《帝王韵记》的这部分内容与《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具有同样的价值。可以说，《帝王韵记》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史书，是研究朝鲜古代史必需的宝贵资料。

十三—十四世纪，还编纂了高丽历代国王的实录，这是朝鲜文化史上的一大成就，是十五世纪编纂的篇幅宏大的《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的主要依据。

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前半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是李奎报。他创作了许多热爱祖国，反对外来入侵者的诗篇，他的主要作品收在《东国李相国集》中，其代表作是《东明王》篇。《东明王》篇是朝鲜现存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贯串着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艺术性很高，它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戏剧文学、时调和汉诗等，都有了相当高的发展。戏剧以假面舞剧为主。朝鲜假面舞剧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但从前只在民间和宫廷中以小规模的形式演出。到十四世纪则发展到大城市演出，没有舞台和座席，由专业演员在数千群众面前表演。这时，假面舞剧已将乐、舞、唱融合为一

体。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经过不断锤炼，到十五世纪有了更加辉煌的成就。时调的形式完成于十四世纪。如有《青丘永言》、《海东乐府》所载禹倬、李穡和郑梦周等人的时调文学。这时期的汉诗和汉文著作有李谷的《橡栗歌》、李齐贤的《益斋乱稿》、《栝翁稗说》等。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可举李谷（1298～1351年，为李穡之父）的《橡栗歌》。歌曰：

“试向村家问老农，老农丁宁为予说：
近来权势夺民田，标以山川作公案，
或于一田田主多，征后还征无间断；
或罹水旱年不登，场圃年深草萧索，
剥肤槌髓扫地空，官家租税奚由出？
壮者散之知几千，老弱独守悬磬室，
未忍将身转沟壑，空巷登山拾橡栗。”^①

这首抒情叙事诗的主人公老农说的话，是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和控诉，对时代的痛叹，是诅咒和血泪的恸哭。

这首诗，继老农话语之后，诗人用自己的语言揭露了与老农完全相反的贵族们的腐朽生活，并表示了愤怒和谴责：

“君不见侯家一日食万钱，珍羞星罗五鼎列，
馭吏沉酒吐锦茵，肥马厌谷鸣金埒。
焉知彼美盘上餐，尽是村翁眼底血！”^②

诗人本是两班出身，未能摆脱阶级局限，但他在这首诗中却比较真实地揭露了腐败的当时社会面貌，对农民的悲惨处境表示

① 《朝鲜古典文学选集》第四卷，《汉诗选集》（1），第118～119页，朝鲜国立文学艺术书籍出版社1960年版。

② 《朝鲜古典文学选集》第四卷，《汉诗选集》（1），第118～119页，朝鲜国立文学艺术书籍出版社1960年版。

了同情，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这首诗是非常进步的，是高丽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当时的艺术品中，可举出一些建筑物、雕刻品和绘画。这时期的一些木质结构建筑幸存至今，其中庆尚道荣州郡浮石寺无量寿殿，是朝鲜现有建筑中年代最早的建筑之一，它外形壮观，保存着朝鲜传统的建筑式样，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塔婆艺术上，高丽前半期沿袭新罗的形式，到后半期就逐渐形成高丽所独具的形式。一般看来，首先是塔层增多，塔身由方形变为多角形，或六角和八角形。1307年建筑五台山月精寺八角九层塔，1348年建筑的开京敬天寺大理石多层石塔等，都是高丽时期石塔中最出色的艺术杰作。

这时期的佛像雕塑，有浮石寺无量寿殿的阿弥陀如来座像，它是高丽时期唯一的塑佛像，是一个健美的作品。但从整个来看，佛像雕塑还谈不上有了什么新的发展。相反，新罗雕塑的那种朝气，尚未得到恢复，而纪念碑的装饰雕刻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恭愍王及其王妃鲁国公主的陵墓——玄陵和正陵，有许多装饰雕刻，整个布局和个体形象（如陵墓正面的四对文人石像和武人石像等）都继承了新罗的传统，开辟了新的境界，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这时期，绘画也有了发展。当时的绘画传存至今的代表作有：传为恭愍王所画的《天山大猎图》残片、浮石寺祖师堂菩萨像、智国天王像等重彩壁画和水落洞古坟、法堂古坟、恭愍王陵的壁画等。

三、哲学思想

十三至十四世纪，高丽封建制度陷入极为严重的危机，一些

文人开始从元朝引进并普及朱子学（朱子名熹，是十二世纪宋朝的著名儒学家），以图挽救国家危亡。最初引进朱子学的是安珣（1243～1306）和白颐正以及他人的弟子。安珣为传人程朱理学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在任赞成官职期间“忧学校日衰”，向政府建议努力恢复“国学”，并设置“贍学钱”作为学校基金，教授“诸生，横经受业者动以数百计”^①。他还派遣博士金文鼎等到元朝“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品、乐器、六经、诸子史”^②。安珣到“晚年常挂晦庵先生真，以致景慕，遂号晦轩”^③。可见，安珣对朱子学尊崇和研究的程度；他是朝鲜第一个朱子学的传播者。

白颐正，是安珣的后辈，也是他的学生。十四世纪初，他到元朝学习程朱理学，回国后向李齐贤、朴忠佐等人传授程朱理学。李齐贤曾在忠宣王于元大都举办的“万卷堂”，接触“元大儒阎复、姚燧、赵孟頫、虞集”等人，同他们广泛研究和交流了儒学经典、历史、文学和书法技艺等。“复等见齐贤述作，咸称叹不置”^④。李齐贤回国后，历任高丽各官职，对已传入高丽的朱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十四世纪，禹倬对朱子学造诣颇深，“倬通经史，尤深于易学卜筮无不中，程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⑤安珣的弟子权溥（1262～1346年）也对朱子学有很深的研究，他出版了朱子的书，培养了很多弟子。

① 《高丽史》卷一百零五，安珣传。

② 《高丽史》卷一百零五，安珣传。

③ 《高丽史》卷一百零五，安珣传。

④ 《东国历代史略》卷六，高丽纪，忠肃王元年条。

⑤ 《高丽史》卷一百零九，禹倬传。

李穡（1328～1396年），是高丽末期著名的朱子学者和政治家，曾官至宰相。他出身儒家家庭（李谷的儿子），曾到元朝国子监学习，以优异成绩登第。回国后，他成为高丽政界和学界的主要人物。他深入研究朱子学，并在成均馆正式讲授朱子学，培养了许多朱子学者，对高丽朱子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著作有《牧隐集》（五十五卷）。

李穡认为，理即精神实体，是万物之源。他把一切封建的社会道德秩序都看作是理或天理的表现。他试图重整高丽封建统治，重建他理想的王权统治，即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

朱子学最主要的思想是维护和加强封建等级制，在实践上要求三纲五常。同所有朱子学者一样，李穡也认为三纲五常是天定的秩序，为人的根本。因此他断言：这是不可违抗的天的秩序。他从这种立场出发，对田制的混乱，大农庄的发达和王权的削弱表示痛惜，并主张重整，而当郑道传、赵浚等人提倡“改革”田制时，他却倒退到反对“改革”的立场上去了。这就说明，他虽然承认高丽封建社会的腐败无能，但不同意对它的彻底改革。李穡对佛教也采取了极其温和和妥协的态度。他反对寺院的土地兼并，却不反对佛教教理。他说：“佛，大圣人也”、“佛者至圣至公，……其经中分明有说布施功德”^①。到1377年，他甚至亲自编纂了《大藏经》。

十四世纪朱子学思想家的另一卓越代表是郑道传（1337～1398年）。他是高丽末期到李朝初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为李朝封建国家的建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起了巨大作用。他作为哲学家，为拥护李氏王朝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朱子学和排斥佛教的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郑

^① 《高丽史》卷一百十五，李穡传。

道传的著作均收录在他的文集《三峰集》（十四卷）中。

郑道传的哲学世界观是在反对佛教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基本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他的思想包含着不少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分。他的哲学思想充分反映在他对佛教主观唯心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佛氏杂辨》中。从这本书的批判项目可看到：《佛氏轮回之辨》、《佛氏因果之辨》、《佛氏心性之辨》、《佛氏作用是性之辨》、《佛氏味于道器之辨》、《佛氏毁弃人伦之辨》、《佛氏慈悲之辨》、《佛氏真假之辨》、《佛氏地狱之辨》、《佛氏祸福之辨》、《佛氏乞食之辨》、《佛氏禅教之辨》、《儒释同异之辨》以及其它。该书在理论上比较全面、系统、彻底地批判了佛教的虚伪性。

他反对佛教的轮回说，主张人和一切事物都是要经过发生、发展和消灭的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

郑道传认为现实世界是由气即物质的变化而成。他说，不论是肉体和精神都是从同一物质始原即气产生的，“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① 根据他的说法，当气在凝聚成形体时，若聚合到足以发生精神现象之程度就会产生精神。因此，形体产生了，精神也随之产生和活动，气散形体消灭了，精神也随之化为乌有。肉体和精神不是相互分离，而是密切联系的。这是他的哲学思想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

他虽然承认天地万物形成以后的现实世界具有物质的客观性，但他却把抽象的绝对的规律性——太极即理，看作天地万物的始源。因而，他未能摆脱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

郑道传的哲学思想还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他反对佛教的世界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有既定的定数，只能依此循

^① 《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佛氏轮回之辨》。

环，绝无增减的理论，提出万物不断发生发展消灭的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已生者往而过，未生者来而续，其间不容一息之停也。”^①

他的伦理道德理论则同他的社会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他把封建等级制度和剥削制度加以合法化。郑道传把人分为“圣人”、“君子”、“众人”三个等级，并说：“上而公卿大夫，治民而食；下而农工商贾，勤力而食；中而为士者，人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食”^②。他还企图从理论上论证三纲五常的合法性与正确性：“道则理也……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无物不有，无时不然……近而即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远而即于天地万物，莫不各有其道”^③。

郑道传还在《朝鲜经国典》、《经济文鉴》等著作中主张实现儒学政治观念的理想——王道政治，以图国家的富强。为此，他要求建设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实行劝农政策。

郑道传的这种思想，对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重新整顿封建体制和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李朝封建国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① 《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佛氏轮回之辨》。

② 《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佛氏乞食之辨》，《佛氏昧于道器之辨》。

③ 《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佛氏乞食辨》，《佛氏昧于道器之辨》。

第八章 李朝前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经济文化的繁荣

第一节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

李朝建立后，封建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李朝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经济基础，首先抓住土地问题。高丽末期，由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土地制度混乱不堪。通过1391年实行的科田法，李朝统治者虽然掌握了土地的支配权，但不少土地没有登记在国家的田案上。两班地主为了不纳税或少纳税，隐报土地面积，从而相对地减少了国家的租税来源。李朝统治者为进一步掌握土地的支配权，扩大封建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建国初期，多次进行了土地丈量。

1401年以来，多次进行土地丈量的结果，查出了大量隐报的土地面积，使全国的土地面积激增。1404年，在江原、黄海、忠清、全罗、庆尚等五道进行土地丈量，五道土地面积竟达七十七万二千余结，再加上京畿道、咸镜道和平安道的土地，全国土地面积达九十三万余结^①，相当于高丽末期全国土地面积的两倍。1405年至1406年在京畿、忠清、庆尚、全罗、黄海和江原

^① 《太原实录》卷七、4年4月，乙未。

六道，重新进行土地丈量，又查出三十余万结土地^①。1413年在平安道和咸镜道进行土地丈量，土地面积又增加。

李朝统治者扩大土地支配权的另一措施，是没收和清理寺院的土地。高丽时期，佛教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积极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佛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是导致国家财政破产的重要因素之一。李朝封建统治者有鉴于此，从建国伊始就对佛教寺院采取了施加压力的措施。他们将朱子学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大肆宣扬，同时，排斥佛教，没收和清理佛教寺院的土地。1402年至1424年，先后三次大量没收寺院田，特别是1424年将复杂的佛教各派合并为禅宗和教宗两派，限定该两宗各留十八所大寺院作为本寺，只许本寺保留最多五百结、最少一百五十结的收税地和一定数量的奴婢，其余土地和奴婢则全部由国家没收。结果，寺院田大幅度减少，从科田法实行初期为四、五万结，到二十余年后则减至一万结以下。

李朝统治者多次进行土地丈量以及没收和清理寺院土地的结果，使李朝封建国家掌握的土地面积空前增加，1430年前后各道的土地面积如下：^②

京畿道：207, 119 结
忠清道：236, 117 结
全罗道：264, 268 结
庆尚道：261, 438 结
江原道：65, 998 结
黄海道：223, 770 结
平安道：311, 770 结

① 《太宗实录》卷十，5年9月，丁酉。卷十一，6年5月，壬辰。

② 《世宗实录》地理志。

咸镜道：149, 306 结

总计：1719, 806 结

通过这一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国家掌握的土地面积急剧增加，相当于高丽末期土地面积的三倍。土地面积之所以这样迅速增加，固然与这一时期大量开垦土地有关，但主要的还是由于查出田案上漏掉的大量土地以及没收寺院土地的结果。李朝封建国家掌握了这么多的土地，说明该中央集权威慑全国，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

李朝封建统治者在扩大了土地支配权的同时，为控制更多的剥削对象，有很多良人农民沦为私人奴婢或私民，不少公家奴婢变成私人奴婢。这些私人奴婢或私民不承受国家的兵役和徭役等各种负担，这就相对地减少了国家的剥削对象。李朝封建国家从建国初期就很重视奴婢问题，设置专门机构，清理奴婢。从1395年至1414年设置的都监，有百余名官员，处理了万余件奴婢案件。通过清理，将高丽末期大批被迫沦为奴婢的人改成良人，许多私人奴婢改为公家奴婢，使许多人在身份上变为良人和公奴婢，社会经济地位较前有所提高，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性，也使国家获得了大批纳税和服兵役与徭役的对象。

李朝封建国家掌握和控制国家搜刮对象的另一措施，是实行号牌法和五家作统法。所谓号牌法和五家作统法，是国家准确编制户籍，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掌握和控制徭役、兵役对象的一种手段。号牌法就是要十岁至七十岁的全国男壮丁佩带一定规格和式样的号牌，在发牌时登记户口。两班按官职等级分别佩带象牙牌、鹿角牌、黄杨木牌、桦木牌，牌上记载官职、姓名、住址；一般农民则佩带普通木牌，记载姓名、住址、脸色、有无胡须等；奴婢佩带的牌上记载主人姓名、本人年龄和身長。1413年开始实行号牌法后，查出了户籍中遗漏的许多人口。1406年

全国壮丁只有三十七万零三百六十五名，但是，大约三十年后，全国壮丁激增到七十万二千八百七十名^①。这期间人口增加两倍，当然这与人口的自然增殖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查出大量的户籍中遗漏的人口。

为进一步控制人民，李朝统治者又实行了邻保制和五家作统法。邻保制是以一定的户数组成一个邻保，由邻保的负责人掌握保内居民的动向和人口的变动，并以连环保的形式由邻保保证国家的各种负担。邻保制于1407年首次实行，后来改为五户为一邻保的五家作统法，并载入《经国大典》，它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束缚农民于土地上的一种手段。

封建统治者虽然采取了这些严格措施，企图控制人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但广大人民为逃避残酷的封建剥削，经常流离和逃散。如1451年，全罗道珍岛等一些岛屿上聚集了许多流民。1457年左右，江原道和黄海道等地有大批农民流亡。李朝统治者为防止人民的流离逃散，在全国各地设立防护所，还在重要渡口配备渡丞，严格控制人民的自由流动，凡流民一经查出，立即送回原地。

李朝建立初期，军队制度混乱，不仅存在私兵制度，而且军队组织也不健全，这对加强中央集权非常不利。李成桂等封建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体制，采取措施，改革了军制。鉴于私兵制是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武器，是削弱中央集权的主要根源，李成桂首先废除了私兵制。1393年，他首先将自己的私兵部队义兴亲军卫同高丽王朝遗留下来的三军总制府管辖的国家军队合并，并把它置于新的统率机关义兴三军府的管辖之下。从此以后，私兵制逐步削弱，国家军队逐渐得到加强。私兵制的

^① 《世宗实录》地理志。

最后废除，是通过王宫内部的政变实现的。1398年和1400年，围绕着王位的继承问题，发生了内讧。结果，李成桂的第五子李芳远夺取王位。芳远即王位后，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全面废除了私兵制。从此，国家掌握了军权，巩固了封建政权。

如上所述，李朝封建统治者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取得了全国的土地支配权，控制了全国人民，掌握了军权，这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二、中央集权体制的加强

李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李朝前期，虽然基本上沿袭高丽时期的统治体制，但其职能明显加强。

高丽时期，国王虽是绝对君主，但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李朝时期，国王的权力无限扩大，不受任何限制。高丽时期，国王任命九品以上官吏时，必须经过司宪府和司谏院的同意。但李朝时期的国王，任命四品以上官吏可不经任何机关的同意。又如高丽时期有裁推制度，设置都评议使司，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王的独裁。但李朝时期，取消了这些制度和机构。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李朝时期国王的权力已不受限制。

李朝时期，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一些调整，并加强了各机构的职能。中央最高统治机构是议政府。议政府有领议政、左议政和右议政三名丞相，辅佐国王掌管各项政治事务^①。重大问题的处理，一般在国王的参加下，由议政府高级官吏为中心的大官僚会议讨论决定。但是，不管官吏们的意见如何，国王的意见总是绝对的。

^① 《定宗实录》卷四，2年4月，辛丑。

在议政府之下有分管政府重要事务的吏曹、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等六曹。吏曹是管理官吏、任免官吏的机关。当然，任免官吏的最后决定权属于国王，吏曹只有推荐官吏、执行国王任免事务的权限。户曹是对国内人民直接进行搜刮的机关，它负责征收租税和管理户口等。礼曹掌管封建统治所必需的封建礼仪和教育，以及施行录用文官制度的科举和对外关系等事务。兵曹掌管全国军队，负责镇压人民，防御外敌入侵，并管理武官的人事。刑曹负责镇压反对封建政府的人民群众，保护封建两班的利益。工曹掌管官营手工业、国家的山林和河川湖泊等，并管理宫殿官府的修建。

除此之外，中央还有司谏院、司宪府、弘文馆三司。司谏院是对国王的过分粗暴行为提出“忠告”的机关，司宪府是监视官吏的机关，弘文馆则是王室图书馆，也是国王的政治、学术顾问机关。三司的官员地位虽不高，但却有很大权限。

李朝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调整和加强了地方行政机构。除京畿外，将全国分成忠清、全罗、庆尚、黄海、江原、平安和咸镜七道，道下设州、府、郡、县，分别配备牧使、府使、郡守、县令或县监，这些地方官统称为守令。各道的负责人观察使则称方伯。这些地方官吏都是由国王直接任命的，他们在地方掌有行政权、司法权、军权。他们直接搜刮租税贡赋，并强迫人民摊派中央和地方的徭役、兵役等任务。他们还掌管诉讼和刑罚，握有所辖地方的兵权。

李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行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身份制度。在封建官吏中实行官品制度，将全国的官吏分为正一品至从九品的十八官品。十八官品又被分为堂上官（正一品至三品）、参上官（正三品至从六品）、参下官（正七品至从九品）三等级。参上官和参下官统称为堂下官。这种官品制

度比高丽时期更为严格，特权阶层独占中央的高级官职，设置种种关卡，限制一般官僚的晋升。同时，李朝统治阶级在“文尊武卑”思想的指导下，实行以文官为中心的官职制度，包括军内官职的绝大多数官职都由文吏担任，虽有一些武官官职，但都有名无实，不起作用。

李朝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法律形式固定身分制度。那时社会上存在着对立的两大阶级：以国王为首的享有特权的两班是统治阶级；良人和贱人是被统治阶级。两班的绝大多数是封建地主，他们占有大量土地，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不承担或几乎不承担国家的各种义务。李朝封建国家的官吏只能由两班担任。两班内部虽有官品区分和门第差别，但都是统治阶级。

被统治阶级分为良人、身良役贱和贱人阶层。良人又称常民，是李朝封建国家的平民。他们是在封建国家中占绝大多数的阶层。是封建国家剥削的基本对象。良人比起奴婢有一些自由，不直接隶属于个别是两班地主和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自由民。但是他们必须向封建国家和地主缴纳租税，必须承担兵役和徭役等国家的一切负担。在良人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良人农民又可分为闲良、自耕农和佃农。闲良是良人中人上层，是地方的中小地主，他们在地方自称两班，压迫和剥削贫苦农民。不少良人是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但随着封建剥削的日益加重，他们不断丧失土地，沦为佃农。佃农租种国家公田和两班地主的土地，向国家和地主缴纳租税，受到残酷剥削。在良人中还有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阶层。商人在封建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只在狭小范围内进行商业活动，在经济上还不强大。商人中也有享受特权的封建御用商人即市廛商人和积累大量财富的富商大贾，但他们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商人受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和控制，仅能维持生活。良人手工业者经营为数不多的独立经济，向国家缴纳

匠税，还向国家无偿提供一定的手工业劳动，受到苛酷剥削。

身良役贱是身分上虽系良人但要服国家贱役的阶层。如陶瓷器所的陶瓷工、铁所和银所的锻工、鱼场的渔夫，盐场的盐工，牧场的牧子和漕卒等等。他们在法律上不隶属于任何人，从这点来看是良人，但他们的劳役同奴婢差不多，在社会上受歧视，从这种意义上看他们又是贱人。

贱人阶层主要是奴婢。奴婢的数量在被统治阶级中仅次于良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最卑贱，生活最苦，受着非人待遇，主人对他们就象对待财产一样，可以继承和随意买卖。奴婢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的公奴婢，另一种是隶属于两班个人的私奴婢。在私奴婢中，有和主人同居、服杂役的奴婢，也有和主人分居，向主人缴纳身贡和提供无偿劳动的奴婢。公奴婢也分为向国家缴纳身贡的纳贡奴婢和在国家机关直接服杂役的选上奴婢。

除此之外，还有介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称之为中人层。属于中人身分的有翻译人员、医生、天文地理学者、阴阳学者，律师等知识阶层和下级官吏——胥吏。他们的身分比两班低，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接近两班。

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划分出杂多的身分阶层，并以法律规定这种身分是世袭的。但是，同封建统治者的愿望相反，这种复杂的身分制度激起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灭亡。

李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加强中央集权，改革了军制，加强了武装力量。他们废除私兵制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并组织了中央军和地方军，规定了编制和具体制度。

义务兵役制规定从十六岁到六十岁的良人壮丁都有服兵役的

义务。服役时间，属中央的正兵每年要服役两个月，地方的留防军每年要服役三个月，水军则分两次，每次一个月。服役期间所需一切费用，均由军人自己负担。封建国家为保证军队的来源，在全国实行了军户制度，将直接履行兵役义务者定为户首，将其帮助者定为保人或奉足，以一名户首和几名保人组成一个军户，规定在户首兵役期间，保人每月交一匹棉布帮助户首。

李朝军制也按封建等级制度规定。中央正兵、地方留防军和水军，其成员必须是良人。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兵士，服兵役时，必须自备武装、衣服和粮食。两班阶层一般免服兵役，有时少数两班也服兵役，但他们服兵役和良人服兵役不同，他们主要承担侍卫国王和保卫王官的任务，这是一种荣誉职务。身良役贱和公奴婢也要服兵役，但他们不是国家的正式军队，称为杂色军。他们主要从事繁重的手工业劳动和在官衙当奴仆。

十五世纪，中央军编制由义兴卫、龙骧卫、虎贲卫、忠佐卫和忠武卫等五卫，即五个军团组成。从全国征集的军人，分别编入五卫。中央有五卫都总府、中枢府、训练院三个军务机关，均在兵曹直接指挥下处理军务。五卫都总府掌握实权，处理日常军务；中枢府是中央武官的最高机关，但实际上并没有分担什么特殊事务，只不过在形式上配备一些无所事事的高级文武官员；训练院担负军队训练和考试军人、承用军官的任务。在李朝军队下，掌握实权的是文官，武官经常处于次要地位，这是李朝军队制度的一个特点。

地方防卫组织，有地方的陆军和水军。地方陆军组织是镇管制。各道有主镇。主镇是统辖全道军队的机关，它能独立地指挥道内军队。主镇下有几个郡县的巨镇，巨镇下有以一个郡县为单位的诸镇。各道有一至三名兵马节度使（兵使），由各道的观察使兼任其中一个兵使，各巨镇和诸镇的将领由地方守令兼任。水

军也按地方陆军体制组织。各道有一至三名水军节度使（水使），由各道的观察使兼任其中的一个水使。水使管辖几个重要浦镇，重要浦镇有水军金节制使，浦镇下有各浦，各浦皆设有水军万户，负责有关军务。

总而言之，李朝前期，封建统治阶级以严格的封建等级关系为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它如实地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体制的空前加强和封建专制国家的真实的面貌。

第二节 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李朝前期，封建统治阶级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了高丽末期混乱的统治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部分地缓和了阻碍生产发展的社会经济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李朝统治者为加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发展，实行了劝农政策，如奖励开垦，防止荒弃耕地，重视水利建设，鼓励农业技术的改进等等。从客观条件看，这一时期是和平时期，农民在这样条件下，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展了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

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广大农民积极开垦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十四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倭寇的入侵，南部沿海地区的许多土地荒芜，到李朝前期，驱逐了倭寇，开垦了南部沿海地区的大量荒地，^①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1428年庆尚道安东地区已无荒地。全罗道的耕地也迅速扩大，特别是江原道流民迁到全罗道

^① 《太宗实录》卷二，元年7月，甲寅。

后，开垦了许多荒地^①。此外，平安道、江原道、黄海道和咸镜道地区也大量开垦了荒地。因此，李朝前期耕地面积激增，增加到高丽时期的三倍，达一百七十余万结。特别令人注目的是，稻田面积迅速增加。

在全国三百三十四个郡县中，二百七十七个郡县有稻田，稻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②。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各道的稻田面积及其比率如表：^③

15世纪20年代各道稻田面积及其比例

道 别	稻田面积 (结)	稻田占全道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京 畿	73,793	38%
庆 尚	94,004	39.8%
忠 清	102,135	39.1%
全 罗	123,087	46.6%
黄 海	35,292	15.8%
江 原	8,337	12.7%
平 安	31,341	10.1%
咸 镜	5,807	4%
计	473,796	28.1%

① 《世宗实录》卷四十，10年4月，壬辰。

② 《世宗实录》地理志。

③ 《世宗实录》地理志。

耕地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稻田面积的扩大，充分说明了李朝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与此同时，水利灌溉事业有很大发展。1414年，李朝封建国家向各道发出通令，要求各道调查和登记能够改良的土地和被破坏的堤坝，并要求加以修复。翌年，加修了著名的碧骨堤，使受益面积达九千八百四十结。1459年，专设堤堰堤调，掌管堰堤和河堤事宜。1465年，又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堤坝的管理。据《庆尚道续纂地理志》记载，庆尚道的六十六个郡县中，五十五个郡县有水库，共有七百二十三个大小水库，受益面积达二万零二百四十三结。全国各道大量修筑堤坝，到十五世纪中叶，全国的大小水库共有三千处。同时，为扩大灌溉面积，逐步推广了水车灌溉，当时，主要使用脚踏水车。

这一时期，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进了耕作法。这时已取消休闲耕地的易田法，广泛推行了每年照常耕种的不易田法。在不易田法普及的基础上，采用了轮种法，与轮种法相适应，为保障土地的肥力，推广了施肥法。据《矜阳杂录》，当时有多种施肥法，其中较先进的是绿肥法。绿肥法是先在地里种黄豆或绿豆，豆苗长出后进行翻地将其埋入地下当作肥料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推广了一年两熟法和两年三熟法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中部以南地区的旱田广泛采用收割大麦以后种黄豆的方法，南部地区广泛推广了在水田里先种大麦，收割大麦后栽稻苗的方法。

与此同时，为提高农业产量，还采用了秋耕、深耕、小株密植等先进的耕作法。这一时期还广泛普及插秧法。过去在水稻的种植方法上，曾使用水直播、旱直播和移苗法等多种方法。所谓水直播就是在平整好的水田里直接播种；旱直播则是将干燥的田地平整好后，直接播种，待种子发芽成长到一定程度再灌水成为

水田。这些种植法都不能提高产量，因而逐步被插秧法所代替。插秧是提高产量的一种先进的种植法。到十五世纪，这种方法在中部以南地区和黄海道的不少地区被广泛采用。

广大农民为培育出适应朝鲜自然条件的农作物品种，发挥积极的创造精神，培育出许多新品种，特别是在稻种的改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当时种植的耐风稻种有：著光、倭子、沙老里、黑沙老里、东谒老里、牛得山稻、白黔夫只，灵山狄所里、高沙伊眼检伊、所老粘、多多只粘、粘山稻和彝山稻等^①。畏风种只有所老狄所里、黄金子和牛狄所里等。当时还培育出了能够抵御旱灾、晚种早收的五十日租稻种，阴历五月插秧。五十天后便能收割。在其他农作物品种的改良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其中秬黍（糜子的一种）的发现是令人瞩目的。1424年，黄海道瓮津郡的一个名叫李哲的农民，他在自己的菜地里发现的高产量的秬黍，经多年试种，采集了相当多的种子，从中选出二十多穗上交政府。于是秬黍就在全国内广为种植。^②广大农民以辛勤的劳动，培育出各种农作物的许多品种。据《矜阳杂录》，仅京畿一带，稻种有二十七种，谷种十五种，豆种二十种，大麦六种，秬黍四种，稗种六种，高粱四种。农业品种改良方面的这些成就，能够说明李朝前期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年年增长。从当时国家储备量的增加就可看出粮食产量的增加情况。1413年国家粮食储备是三百五十六万八千七百石，到1417年则激增到四百一十五万五千四百零一石。

① 《矜阳杂录》谷品条。

② 《世宗实录》卷二十一，5年7月，壬寅。

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显著发展。棉花于十四世纪传入朝鲜。十四世纪中叶，文益渐从中国带回几粒棉花籽，先在庆尚道晋州地区的丹城种植，逐步普及到庆尚道和全罗道各地，以后进一步普及到中部朝鲜以南各地。其中主要的棉花产地是庆尚道的义城、礼安、安东等地。此外，经济作物还有大麻、苧麻、桑树、楮、莞草、竹以及漆树等。这些经济作物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同时，还兴办了许多牧场。牧场是国家直接管理的。国家牧场主要设在沿海地区的岬角和岛屿上。仅《世宗实录》地理志记载的国家牧场就达五十八处。为了经营牧场，国家配备了一百二十二名监牧官，下有牧子直接从事饲养。这些牧场主要饲养军马，也饲养牛羊等。

二、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相对安定，各种手工业也逐步得到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为得到穷奢极欲生活所必需的手工业品，对手工业的发展颇为关心。在这种条件下，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展了手工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李朝前期的手工业可分官营手工和民间手工业两大部分。官营手工业又分为中央官营手工业和地方官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也分为专业个体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当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农民家庭手工业占重要地位，但是官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也有显著的发展。

中央官营手工业，由工曹掌管经营。在工曹之下有尚衣院、缮工监、造纸署、司饗院、军器监、校书馆等三十多个机关，直接指挥生产。中央官营手工业有一百二十九种生产部门，二千八

百多名工匠从事生产，^①主要生产王室贵族的奢侈品和各种武器，如各种高级纺织品、陶瓷品、文具、金银装饰品、螺钿细工品、花文席和弓矢、铙筒、火药、枪剑等。地方官营手工业，由各种郡县的工房掌管经营，主要生产带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品。地方官营手工业有二十七种手工业部门、三千五百余名工匠从事生产。^②官营手工业的工匠不是固定的手工业工人，而是轮流服役的各地技工。中央对各地的优秀手工业者进行登记后，使他们轮流到中央和地方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役，服役期根据各部门的生产情况，分别为九个月、六个月、三个月。他们在服役期间，有少量的劳动报酬，这种劳动报酬，当时称作“料”，“料”的数量很少，仅能维持工匠生活。他们在服役期间之外，可独立经营自己的经济，并向封建国家缴纳一定的工匠税。

这时期的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的还是与农业密切结合的农民家庭手工业。主要的家庭手工业品有棉布、麻布、夏布、绢绸等纺织品；莞席等各种席子、木器、竹器和各种农具等。随着手工业的普遍发展，一直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部分手工业部门与农业分离，发展成独立的专业手工业。专业手工业的重要部门大致有：农具、锅、器皿等铁器和输器，金银细工品，纸、笔、墨、砚台等文具，漆器，纱帽、网巾、栉、针、香粉等的制造和修理部门。民间手工业受到封建国家的严格控制和残酷剥削。封建国家以工匠税、贡物、进上等形式经常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

李朝前期的手工业相当发展，尤其是纺织、造纸、印刷、火药制造、武器制造、采矿等手工业的发展相当迅速。

① 《经国大典》工典。

② 《经国大典》工典。

在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的是纺织手工业。随着棉花的广泛种植，棉织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它在纺织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庆尚、忠清、全罗三南地区是棉织手工业的中心。丝织手工业也有发展。封建政府在全国各地设蚕所，积极奖励养蚕。各地出现许多重要的养蚕区。具有代表性的为京畿道的加平，忠清道的清风，庆尚道的安东和义城，全罗道的泰仁以及黄海道的黄州、遂安、新恩、长渊、牛峰、枫川等地，而加平、清风、义城、泰仁和遂安等地又设有蚕所。特别是黄海道和平安道的丝织手工业很发展。纺织手工业的另一重要部门，是麻布和夏布的纺织。忠清道的林川、韩山、舒川和蓝浦等地是夏布纺织业的中心，特别是林川有不少居民从事苧麻的种植和夏布的纺织。至于麻布纺织业，则遍及全国各地，北部地区尤为普遍。

造纸业是手工业中最发达的部门之一。当时，造纸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434年刊印《资治通鉴》，用纸三十万卷；1458年刊印《大藏经》，用纸竟达四十六万零六百二十卷，可见当时纸张产量的庞大。同时，生产技术也有显著提高。造纸的原料，除先前用的楮外，还广泛利用稻草、柳木、柳叶、薏苡、麻秆和松叶的纤维等新原料。纸张种类很多，有书契纸、咨文纸、副本纸、白奏纸、油苳纸、画案纸、表纸等二十多种。1415年，封建政府在汉城藏义寺洞设置规模很大的造纸署，生产优质纸张。

活字铸造和印刷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1403年，政府设置铸字所，铸造了数十万活字，随后，又铸造了很多活字，出版了许多书。据《经国大典》记载，校书馆所属的印刷工有一百四十六名，印刷了各种书籍。

陶瓷器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李朝时期瓷器的特点是白瓷。在明亮的白瓷上用蓝色、青色或铁釉、辰砂釉画图案，相当美

观。当时的主要瓷器所有京畿道的伐乙川、庆尚道高灵的曳县里、尚州的楸县里和已未隈里等地的瓷器所。

这一时期，火药制造和火炮制造也相当发展。火药制造技术显著发展，从1434年开始，采用新的火药制造法，生产量提高两倍。火炮制造技术也提高了。到十五世纪，铸造了铁碗口（大炮）、天字火炮、地字火炮、玄字火炮、黄字火炮等各种火炮。同时，制造了各种銃筒，如二箭銃筒、三箭銃筒、四箭銃筒、八箭銃筒等。

此外，编席手工业也显著发展。编席手工业者的中心地区是庆尚道安东、尚州等地。这些地方生产了彩花席、满花席等十余种各类席子，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输出国外。

李朝前期，铁、铜、金等采矿业和冶炼业也很发展。这是为制造农具、武器、器皿和各种奢侈品所必要的。

在采矿冶炼部门中占重要地位的是铁矿业。铁矿业是由封建国家直接掌管和控制的。封建国家在铁产地设铁场，并直接掌管。许多工匠居住在铁场附近村庄，从事采矿和冶炼。每个铁场每年向国家贡纳一定数量的铁。仅据《世宗实录》地理志记载，当时全国铁场就有六十多所。铁的原料有“沙铁”和“石铁”，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还是以“沙铁”为主。“沙铁”产地有庆尚道的安东、蔚山、陕川、龙宫、金海、昌原、山阴、三嘉等地和咸镜道的洪原吉州、镜城等地，“石铁”的产地有价川、云山、北青、端川、利城、载宁、牛峰、殷栗、长渊、襄阳、洪原、金城等地。随着采矿业的发展，铁的产量不断增加，工匠们制造了各种武器和农具。

由于铜在制造器皿、武器、合金及其他方面被广泛利用，因此，其需要量很大，当时有名的铜产地有黄海道的长渊和庆尚道的灵山、昌原等地。但是，仅靠国内产的铜满足不了需要，所以

每年从日本输入大量的铜。

金是制造各种奢侈品所必需的。金的采集由于当时技术上的局限，以沙金的采集为主。当时的沙金产地有淮阳、金城、文川和安边等地。还有石金采矿，主要产地是端川、永兴、春川等地。当时还生产了银，代表性的银产地有黄海道的谷山、平安道的嘉山等地。

如上所述，李朝前期的手工业较之以前有明显的发展。但是，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封建国家的严格控制，它的发展不能不带有局限性。尤其是手工业者的社会身份低贱，受到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因此，手工业者难以扩大自己的生产。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条件下，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占主导地位。农民以自己的手工劳动解决了人们的穿衣问题，生产了各种生产工具。

三、商业的发展

李朝前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国内各地广泛交流了剩余粮食、手工业品、水产品、狩猎物和药材等。但是，封建国家对商业只允许在它需要的限度内发展，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严加控制。封建国家为满足封建贵族的需要，组织了直接为封建国家服务的御用商业，这就是市廛制度。

市廛是中世纪式的商人组织，是寄生于封建国家的御用商业。市廛商人首先承担国役，就是说，承担向国家提供各种必要物质，满足封建贵族需要的任务。与此同时封建国家对市廛商人赋予专卖权等各种商业特权。市廛制度只在汉城和几个大城市实行，尤其是汉城市廛最繁荣。1410年在汉城的长通坊、莲花洞口、薰陶坊、惠政桥、广通桥等街道就出现了市廛店铺。到

1412年封建政府为进一步发展市廛，在惠政桥至宗庙口的街道两侧修建了八百余间房屋^①，提供给市廛商人作店铺，1414年又在钟楼至南大门的街道两侧修建许多店铺^②。封建国家把这些房屋租给市廛商人作店铺，收公廛税。除汉城外，在开城、平壤、全州等地也有市廛。市廛经营的品种很多，凡是封建政府和封建贵族所需要的物品都作为经营品种，如粮食、各种布匹、绸缎和各种手工业品、牛、马等。

除市廛外，在汉城和各大城市还有个人小店铺，称坐商。他们在自家门前开设简陋的店铺进行买卖。当时，市廛称为大市，私商的这些小店铺称为小市。和大市相比，小市在商业规模和活动范围上都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还有流动各地做生意的小商小贩，当时称为裸负商。他们背着各种商品到各地销售，来往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小商小贩逐步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商人富裕起来，拥有大量资金，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这就是富商大贾。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富商大贾，有以汉城为中心经营商业的京商，开城的松商，平壤的柳商，义州的湾商。他们不仅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甚至去明朝进行商业活动。据《谗闻琐录》记载，商人沈今逊是个掌握五万匹棉布的富商大贾。

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各地出现了集市，当时称为场门。最初兴起集市的地方是全罗道，到十一世纪末已扩大到全罗道的整个地区和忠清道的不少地区。虽然封建国家残酷地压制集市，但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集市越来越大，到十六世纪末，集市发展到京畿、忠清、庆尚道等中部以南的整个地区。

① 《太宗实录》卷二十三，12年2月，乙丑。

② 《太宗实录》卷二十八，14年7月，壬辰。

当时，主要的流通手段是实物货币，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出现了货币。太宗时期（1401～1417年）曾印制建文楮货和永乐楮货等纸币，并采取措施使之流通，但未得到预期的效果。到1424年，铸造了金属货币——朝鲜通宝，世祖时期又铸造过弓矢形的箭货，但都未能维持多久。当时主要的流通手段还是米、布、金银等实物。

随着商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国内商业的中心。汉城、平壤、开城是商业的中心，各地的各种商品都集中在这里，商业颇为活跃。

李朝前期，商业虽有显著发展，但是仍以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为基础，交换一些剩余产品。封建国家对商业严加控制，残酷压制，因而阻碍了商业的迅速发展。

四、四郡六镇的设置和对外关系

李朝封建统治阶在极力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同时，很重视对外关系的调整。他们针对女真族的骚扰，在北方设置四郡六镇，加强北方的防卫；为消除倭患，进行征伐对马岛的战争。与此同时，李朝和明朝建立了睦邻关系，频繁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女真族居住在我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北部的庆源、稳城、会宁、甲山等地。李朝初期，女真族和李朝和平相处，经常进行和平贸易。1406年，李朝政府在庆源和镜城设置贸易所，和女真族进行贸易。同时，女真族也经常到汉城进行贸易。李朝政府对女真族给予优待，女真人的来往经费由朝方负责，并在汉城设置东平馆，专门接待女真人。但是，在北方地区，女真和李朝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女真人经常入侵和骚扰朝鲜北方地区。鉴于这种情况，李朝政府从十五世纪前半期开始，重视北方的开辟和防卫，先后设置了郡，修筑了镇堡，在西北鸭绿江南岸地区设置了

四郡。1416年李朝政府划出甲山府西北部分地区，设置间延郡，西南的部分地区设置了慈城郡，1440年间延郡的东南地区新设茂昌郡，1443年在间延郡西南和江界与楚山之间新设虞芮郡。新设的间延、慈城、茂昌、虞芮统称为四郡。同时，为了加强防卫，在西北边境地区修筑镇堡和长城。在西部从麟山到茂昌长达千余里的地区，设立了十六座大城和二十五座小堡，配备了常备军六、七千名，还修筑了连结大城小堡的长城。这一工程历时十年才竣工。至于对朝鲜东北部图们江下游地区的开辟事业，则是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正式开始的。李朝政府为开辟东北地区，加强防卫，在图们江下游地区设置六镇。1431年新设钟城郡，1434年设置会宁府，1435年设置庆兴郡，1441年设置稳城郡，1449年设置富宁郡。这新设的钟城、会宁、庆兴、稳城、富宁加上1392年设置的庆源府统称为六镇。为了进一步加强东北面的防卫，李朝政府在这些地区修筑了邑城，设置镇堡，并修筑了一条从会宁的秃山烟台沿图们江直至庆源训戎镇蜿蜒数百里的长城。此外，为了开辟这些地方，政府还动员南部地区的人民迁到六镇。李朝政府的这些措施，对开辟北方，加强防卫，都有积极的意义。

李朝建立后约二十年间，与日本维持了睦邻关系，使节来往频繁，经常进行贸易。不少日本商人到朝鲜沿海地区居住，进行商业活动。但是，李朝政府对日本商人严格进行监视和控制。在日本商人中有不少人违犯李朝政府的规定，进行走私活动和盗窃活动，甚至刺探朝鲜的机密。鉴于这种情况，1400年李朝政府将日本商人的活动地区限定釜山浦和马山的乃而浦，并严格监视他们的活动。到1407年，李朝政府又限制日本商人来朝数量，规定持有政府发的“路引”（许可证）者才有商业权。到1414年以后，将日商人数限定为十名左右。日本封建领主和商人对此表

示不满，不仅不遵守李朝政府的规定，而且进行海盗活动。1419年，日本船数百艘在前往明朝的途中，对朝鲜的忠清道庇仁县和黄海道延安地方进行野蛮抢掠。李朝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征伐对马岛，以期彻底清除高丽末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倭患。

高丽末期以来，倭寇入侵和骚扰，成为朝鲜的一个很大问题。李朝政府一方面和日本维持睦邻关系，另一方面为准备打击倭寇而加强了海军建设。李朝建立后，恢复和整顿了各道的骑船军，大力造船。到十五世纪初，水军总数达四万八千五百八十八人，兵船总数达六百一十三艘。同时，加强了海军装备，制造了大量的火药武器，增强了火燧军。1419年5月，对马岛远征军在三军都体察使李从茂的指挥下，从马山浦出发。这次远征军由大小二百二十七艘兵船和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五名士兵组成。朝鲜水军在对马岛豆知浦登陆，发动猛烈进攻，摧毁了海岸军事设施，烧毁了倭船一百四十四艘，杀伤和俘虏了日本人一百四十四名^①。对马岛封建领主不得不投降，朝鲜海军凯旋而归。从此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消除了倭患。1443年李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缔结了“癸亥条约”，进行了和平贸易。朝鲜从日本输入的主要商品，有铜、锡、硫磺、苏木、染料、象牙、胡椒、肉桂、樟脑、香数、调味料等。对日输出商品主要有，粮食、棉布、麻布、夏布、陶瓷器、花纹席、人参、毛皮、海松子、佛教经典、儒家经典、历史书、梵钟、佛像等。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

朝鲜和中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李朝时期，朝鲜始终和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没有发生过战争。十六世纪，日本侵

^① 《世宗实录》卷四，元年6年，癸巳。

入朝鲜时，明朝援军到朝鲜，和朝鲜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击败日本入侵者。李朝前期，两国间每年三次定期交换使节，还经常交换临时性使节。两国趁使节往来的机会进行经济交流。中国从朝鲜输入的主要商品有，金银、牛马、陶瓷、夏布、纹席、人参、毛皮、纸张等，朝鲜从中国输入的主要商品，有绸缎、药材、书籍、文具、陶瓷、宝石。明朝特许朝鲜购买严禁输出的火药和弓角。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双方都广泛交流了各种书籍和文化资料，尤其是中国的先进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很大。中朝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发展。

第三节 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咸镜道农民战争

一、封建剥削的各种形式

李朝前期，特别是十五世纪，是朝鲜封建社会繁荣时期，人民生活相对安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因此，封建统治阶级称之为“太平盛世”。但是这一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仍以各种形式残酷地剥削人民群众，人民生活仍旧痛苦不堪，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李朝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基本形式是租税，它的基础是科田法，而科田法本身就包含着各种矛盾。由于国家机构的膨胀，在职官僚激增，加上多次册封功臣，国家直接支配的公田不少以科田、功臣田、别赐田名义转为这些人的收税地，国家公田显著减少，国家收入也就越来越少。虽然国家为防止官僚两班侵占公田，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把分给科田的范围限定在京畿地区，但是这解决不了矛盾。李朝统治阶级为解决这些矛盾，在科田的基础上从1467年开始实行了职田法。职田法废除了退職官僚的散

职田和已故官僚妻子儿女的守信田和恤养田，只限定分期发给在职官僚一定数量的收税地。但这一制度只实行了几十年，由于它本身的矛盾无法继续实行，于1544年左右被废除。

李朝政府在这种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田税制度。科田法中规定的田税，原则上是水田每结收糙米三十斗，旱田每结收杂粮三十斗，根据每年收成好坏给予增减，此法称为损实踏验法。每年秋天，许多官吏下到农村调查年成，这些官吏弄虚作假，把官僚和地主两班的田税减到实际收成以下，把贫穷农民的田税提高到实际收成以上。同时，政府和地方守令以踏验为名，在农民的身上强加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农民实缴的田税远远超过规定额数。地方守令以损实踏验为借口，强迫农民缴纳各种杂税，这种苛捐杂税比田税还要多^①。1422年，平安道、黄海道、江原道、咸镜道地区遭到罕见的大灾害，但政府丝毫未减少这些地区的田税。这些事实说明封建统治阶级以田税形式残酷地剥削农民，这就必然引起农民的反抗。

封建统治阶级为缓和同农民的矛盾，为增加国库收入，到1444年制定了田品和年成相结合的田税制度，即贡法。贡法是根据土地的肥瘠，将田品分成六个等级，面积互不相同的一结地的最高收税额定为二十斗。同时，以每个面为单位，把年成分为九等，酌情予以适当减免。但是丈量土地的官吏用尽各种手段敲诈勒索，既多报农民的土地面积，又少报官僚两班的土地面积。定田品的官吏也把农民土地的田品提高，官僚两班的田品压低，把缴纳田税的重担转嫁给农民。同时，在收田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如耗米、落庭米、船价、草价、下陆价和入仓价等等。因此，农民所受的剥削更为残酷。

^① 《世宗实录》卷九十三，23年7月。

除田税外，贡物剥削也很残酷。封建统治阶级为满足他们奢侈的寄生生活，从各地方搜刮各种特产品和手工业品。贡物原则上是缴纳当地的特产品。贡物品种很多，京畿一百九十一种，忠清道二百二十九种，庆尚道二百八十三种，全罗道二百五十八种，黄海道二百七十二种，江原道二百二十八种，平安道一百三十八种，咸镜道一百三十一一种。缴纳的主要贡物有：棉布、麻布、绸缎、铁、金、银、木材、药材、纸张、花纹席、陶瓷器、水果、水产品、虎皮等等^①。贡物负担很沉重，不次于田税。由于中央和地方官吏的贪污，农民缴纳超过原定数量几倍或几十倍的贡物，从十五世纪末开始，封建政府不考虑各地区的户数和特产，任意征课，随意摊派，使得农民不得不到远地以高价购买超过原定额的贡物。如贡物在运输过程中破损或变质腐烂，农民还重新缴纳。可见，贡物剥削也非常残酷。

徭役也是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之一。李朝政府规定，十六岁至六十岁的良人农民和贱人男子都要承担国家的徭役。徭役名目繁多，如耕种国屯田、筑城、运输、修公路、采金、炼铁、制造火药、兴修水利等等。两班地主阶级不仅不承担徭役，而且凭借自己的权力，免除自己的率居奴婢、雇工、别居奴婢的徭役负担，这就使农民的徭役负担相对增加。《经国大典》规定，一年一人参加六天徭役劳动，但农民实际上却要服几个月或半年的徭役。在残酷的徭役煎熬下，不少农民破产，沦为奴婢。

除此之外，封建统治阶级还以进上、苛捐杂税、高利贷等形式搜刮人民，使得广大农民生活极为痛苦，一旦欠收，许多农民就无法维持生活，难免饿死。

^① 《世宗实录》地理志。

二、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各地农民起义

李朝封建统治阶级以各种形式残酷剥削人民，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不少农民离开土地逃亡各地。尤其是1422年前后，全国自然灾害严重，但封建统治者不仅不减免租税，反而更加苛酷地搜刮人民，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起来，展开了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1426年2月，咸镜道流民和汉城的奴婢在汉城展开了纵火斗争。咸镜道的不少农民反对沉重的徭役负担，逃亡到汉城，他们在李永生、张元万、陈乃、斤乃等人的领导下，和汉城奴婢一起，在汉城各处放火烧毁房屋，以此反抗封建统治阶级。1426年2月15日和16日两天，被烧毁的房屋共二千三百七十户，其中二千户是富户和官吏房屋。这一斗争是十五世纪农民起义的开端，它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①。

1428年4月，京畿地区白丁举行起义（在李朝封建社会把以宰杀为业的和用杞柳编器物为业的人称为白丁）。4月，黄海道和京畿地区，尤其开城地区的白丁为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举行了起义。他们集结在山谷里，和官军进行斗争，多次打败讨伐军，坚持一个多月，打击了封建统治者^②。

1446年，平安道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10月17日，平安道各地人民拿起武器奋起斗争，起义军以大城山为根据地与官军进行战斗^③。在几个月的斗争中，他们活动范围扩大到黄海道和京畿地区的部分地方。他们到处袭击地方官军，打开粮仓，

① 《世宗实录》卷三十一，8年2月、3月。

② 《世宗实录》卷四十，10年闰4月，甲辛。

③ 《世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四，28年10月。

救济人民。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1447年5月，起义军在大城山战争中失败。大城山起义是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坚持时间较长，活动范围较广，它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进入十五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国内形势越来越紧张。尤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和1455年的宫廷政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李成桂掌权的五十多年间，功臣及其子孙垄断了中央要职，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一部分未能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的官僚，则逐步形成与之对立的势力，世祖依靠这一势力以暴力夺得王位。世祖即位后，为巩固王位，大肆屠杀反对派，剥夺他们的权力和财产，并为牵制敌对势力，扶持佛教势力，分给寺庙许多收税地，他还在首都修建了豪华的大寺庙圆觉寺，出版庞大的佛经。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为筹划所需巨额经费，他还强征田税和贡物，残酷地强迫人民服徭役。世祖为增加田税收入，在三南地区进行土地丈量，并为扩大徭役对象，大力推行号牌法。结果，田税额增加，军额增加，这无疑给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这还不够，世祖为更多地搜刮人民，实行所谓“引纳”和度牒发给制度。所谓“引纳”，就是提前征收二、三年贡物；所谓度牒制度，就是凡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物品者，给予充当僧侣的特权。世祖年间，为了免除兵役、徭役，几万居民当了僧侣。世祖的这些措施，加重了人民负担。人民生活原本就极其困苦，这时又加上几倍的负担，因而，他们再也无法维持生产和生活，便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1467年咸镜道掀起的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咸镜道农民战争之后，各地农民不断起来展开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1469年，全罗道光州、罗州和灵岩地区的农民在张永基领导下起义。他们以光州和灵岩的山区为根据地，活动在全罗道各地和庆尚道部分地区。起义军袭击地方官衙，处决恶霸官僚地主，给统治阶级以沉重打

击。封建政府组织讨伐军进行了几次讨伐，但是起义军英勇斗争，击退了讨伐军。他们把根据地先后转移到庆尚道晋州地区和智异山，开展了有力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坚持到1470年2月，终于被镇压。1470年，黄海道地区农民起义兴起，起义军出没各地，不时袭击地方官衙，给封建统治阶级很大打击，这支起义军坚持到1471年5月左右。1483年，黄海道载宁地区的农民起义，长期活动在黄海道地区。1485年全罗道渔民起义，在海上展开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称为“太平盛世”的十五世纪，农民生活仍然痛苦不堪，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接连不断，给予封建统治阶级以很大打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三、咸镜道农民战争

在十五世纪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是咸镜道农民战争。咸镜道爆发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咸镜道是封建社会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这种尖锐矛盾便引起了巨大的农民战争。

咸镜道开发最晚，特别是镜城以北地区真正归李朝政府管辖是设置四郡六镇以后。这一地区比其它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居民在衣食上经常遇到困难。咸镜道的居民大部分是良人自耕农，他们开辟小片荒地，仅能维持穷苦的生活。开发初期，李朝政府考虑到上述原因，对咸镜道地区尽量用缓和的办法怀柔他们，如收田税实行日耕收税法（以一头牛一天耕种的面积为单位而收田税），在分配军队名额时也避免使其负担过重。但到世祖年间，在咸镜道加强了中央集权，同别的地方一样残酷地剥削当地人民，1465~1466年在咸镜道实行了土地丈量和扩充军队的政策。结果，田税负担增加，军额显著扩大，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与

此同时，咸镜道地区的穷苦农民还承担许多特殊的国家负担。李朝政府为加强国防，动员大量人力修筑镇堡和长城，这些任务都落到咸镜道农民身上，结果，徭役负担比别的地方要沉重得多。另一方面，女真人来往京城的费用和运输，都由咸镜道人民负责，这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额外负担。封建政府还强迫咸镜道人民缴纳特产品，如海产品、鹰、银等。咸镜道人民的另一种特殊负担则是缴纳神税布。神税布，原是向江原道和咸镜道的巫师征收的杂税，到世祖末年则向该地全体人民征收，要每年每户缴纳麻布一匹。这些沉重的负担给咸镜道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

李朝政府不仅从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咸镜道人民，而且从身份上加以蔑视。咸镜道的监司、节度使、守令等官吏都是中央派来的南道两班。这些南道两班非常瞧不起当地人，残酷地压榨当地人民，任意加刑惨杀。因此，咸镜道人民愤怒无比，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咸镜道人民特别仇恨那些南道官吏，认为自己的一切不幸和贫困，都是南道两班官吏造成的。

与此同时，咸镜道土豪和封建政府之间也有较深的矛盾。李朝政府蔑视咸镜道人，连咸镜道土豪地主也受到排斥，一切官职都由南道两班担任，咸镜道土豪得不到象样的官职。因此，他们对李朝政府异常不满。

由于这些矛盾的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咸镜道土豪李施爱早有反抗之意。他看到农民的不满达到顶点，就乘机散布流言说：政府动员地方的兵船从海路杀来，陆军也越过雪寒岭和铁岭进入咸镜道，要杀尽咸镜道人。听到这一流言的广大农民，急欲起来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李施爱散布这一流言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广大农民的斗争气势。1467年5月，正当咸镜道各地农民准备起来斗争时，李施爱同其弟李施合及妹夫李明孝等人首先发难，杀死吉州牧使薛澄新和咸镜道

节度使康孝文，占领吉州，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听到这一消息的各地农民几乎同时行动，英勇地袭击官衙，杀尽南道两班官吏。各郡县的农民在土豪组织留乡所的指挥下，不仅争先恐后地处决当地的官吏，而且凡是从汉城来的人，甚至连行商、僧侣也全部杀掉。广大农民这样同时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就是为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要和封建统治者进行生死斗争。李施爱占领吉州之后，立即自称“咸镜道节度使”，并给李施合、李明孝等人以相当的官职，同时整顿了起义队伍。洪原以北所有郡县的军民，在很短时间内，大都聚集在李施爱及其将领的部下，编成强大的农民军。当时，农民军已经占领了整个咸镜道地区。

李朝封建政府惊惶失措，急忙组织“讨伐军”。5月17日，以李浚为咸镜、江原、平安和黄海四道兵马都统使，率“讨伐军”于18日离开汉城，向咸镜道进发。但是，李浚被农民军高昂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越过铁岭，只是观望事态的发展，后来同增援的官军汇合，才于5月末进入咸兴。当时集结在咸兴的“讨伐军”兵力达三万。

6月末，农民军和“讨伐军”在北青进行一次激战^①。这时，李明孝率领的洪原、利城、三水、甲山方面的起义军和李施爱率领的端川以北各邑的部队以及李施合率领地农民军，都聚集在北青。战斗开始，农民军就猛烈进攻“讨伐军”的先锋部队，给以沉重打击，将其击退。农民军首战获胜，士气大振。但后来因农民军领导人的动摇和战术拙劣，未能继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胜利。农民军本应利用胜利之机，乘胜追击官军，给予应有的打击。但农民军的领导却企图与“讨伐军”妥协，采取拙劣的失败主义战术，只把部分农民军留在北青，而李施爱所部竟后退到端

^① 《世祖实录》卷四十二，13年6月。

川。在此期间，“讨伐军”重整旗鼓，于7月末再次攻打北青。农民军发扬最大的勇敢精神，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讨伐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均占优势，农民军终归失败，“讨伐军”占领了北青。

北青战斗后，李施爱重整兵力，想要在北青以东的蔓岭阻止“讨伐军”。李明孝等人率领的农民军和李施爱部队，全部集结到蔓岭，在长达十五里的地方摆开阵势，农民军兵力达五千余名。8月4日，“讨伐军”分五路向农民军进攻。农民军英勇抵御官军，杀死杀伤无数敌人。但“讨伐军”靠数量上的优势，不顾伤亡惨重，冲上山来。农民军据守的主峰和次峰相继被占。李施爱率领的二千名农民军在中峰坚持战斗。“讨伐军”集中全部兵力进攻中峰，一天发动数次冲锋，农民军发扬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击退了“讨伐军”的冲锋。日落后，官军的另一股强大部队，从海岸袭击中锋的后侧，农民军受到前后夹攻，被迫向东退却^①。这次战斗的失败，对农民军的打击很大，使农民军士气低落，队伍分散。“讨伐军”继续追击，农民军不断后退。这时，李施爱不去指挥战斗，却离开部队经端川到镜城。在镜城，李施爱被叛变的将领逮捕，落到官军手里。李施爱被捕后，残余部队也就解散，历经四个月的农民战争至此告终。

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首先，农民军的领导人李施爱等人，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而是想利用农民的斗争，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从战初开始，李施爱就向官军妥协，几次写信给李朝政府和“讨伐军”将领，要求和谈。所以，李施爱不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和官军进行决死斗争。其次，农民军将领在战术上犯了严重错误。北青战斗胜利之后，本应乘胜追击官军，巩固胜

^① 《世祖实录》卷四十三，13年8月。

利，但他们却采取了失败主义的措施，往后撤退。几次战斗中农民军没有主动进攻，总是被动地防守，这些都是农民军失败的原因。再次，广大农民虽然英勇斗争，但农民没有真正提出自己的要求，也没有提出战斗口号，只是跟随了李施爱等人。

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但其历史意义巨大。这次农民战争狠狠地打击了李朝封建统治阶级。李朝政府对农民深感恐惧，动员五万兵力（占全国军队总数十五万的三分之一），镇压了农民军。镇压农民军后，李朝政府被迫采取了一些让步。首先，政府免除了咸镜道当年的租税、徭役和一切贡物。不久，又废除了神税布。这些让步，是在农民力量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的，不过，对农民来说，这就是一种胜利果实。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但它在朝鲜农民反对封建剥削阶级的斗争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四节 十五世纪的文化

李朝前期，尤其十五世纪，是朝鲜封建社会文化繁荣时期，在朝鲜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十五世纪在文化发展上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是有充分客观条件的。

首先，这时期国内形势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农业和手工业等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对外方面，外族的人侵基本停止，同明朝等国建立了睦邻关系，频繁地进行了文化交流，吸收了外国的先进文化。这些条件是文化发展的社会前提。

其次，这一时期文化发展是以长期以来朝鲜人民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为基础的。特别是，十三、十四世纪创造的优秀文化，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这些条件外，这时期封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世宗年间，在中央设立集贤殿，抽调优秀学者研究

学问。这种措施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基于这些客观条件，朝鲜人民以自己的智慧与劳动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一时期在语文、哲学、科学技术等各方面都取得优异成绩，尤其是“训民正音”的问世，是朝鲜史上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

一、“训民正音”的创制

十五世纪，朝鲜创制了民族文字，即“训民正音”。这是朝鲜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十五世纪能够创造出朝鲜民族的文字，是有迫切的社会需要和充分的文化基础的。

创制“训民正音”之前，朝鲜一直使用汉字。但因汉字是象形、表意文字，掌握文字很难，表达朝鲜语更难。三国时期，曾创制了以汉字表达朝鲜语的吏读文，但它也很难懂，又不适合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不能准确标记朝鲜语。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殷切期望能有一种既适合朝鲜语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又通俗易懂的文字。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为便于在人民中贯彻自己的统治政策，也有必要创制人民群众容易学会的文字。这些迫切的社会需要，促进了“训民正音”的出现。

当时创制朝鲜文字有充分基础。朝鲜在长期使用汉字和吏读文的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以及音韵学的发展，为创制表音文字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与中国和蒙古等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对文字进行了研究，积累了知识。

世宗王为创制朝鲜文字，在宫中设正音厅，同成三问、郑麟趾、申叔舟、崔恒、朴彭年、姜希颜和李埏等优秀学者一起，多年深入研究朝鲜语的音韵和一些外国文字，到1444年1月终于创制了由二十八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即“训民正音”。

“训民正音”是一种具有科学性的优秀文字。“训民正音”具

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训民正音”的字形是象形发音器官的，笔划简洁，字母简单，易于掌握。

“训民正音……简而要，精而通，故智者不崇朝而会，愚者可浹旬而学……”^①，这绝非过实之言。

第二，“训民正音”是表音字母文字，共由十七个子音和十一个母音组成，拼音灵活，能够标记朝鲜语的一切发音，是一种优秀的文字。

第三，“训民正音”非常适合朝鲜语语音系统。“训民正音”把十七个子音，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成牙音、舌音、唇音、齿音、喉音、半齿音、斗舌音。又根据声音的清浊，把子音分成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母音以三个母音为基础，规定十一个母音。这都是在科学地分析朝鲜语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富有科学性的。

世宗王创制“训民正音”之后，采取措施普及了它。他为广泛宣传“训民正音”，责令要以训民正音创作《龙飞御天歌》，赞颂王朝的尊严及其“伟业”，同时，大力提倡在公文和个人书信中使用训民正音。世宗本人也用训民正音创作了《月印千江之曲》。不仅如此，一个时期训民正音在录用官吏的科举中也被列为必考科目。训民正音文字还被刻印在钱币上。

“训民正音”的创制，在朝鲜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训民正音”改变了以前的言语与文字不一致的现象，打破了汉文垄断朝鲜学问和文化的局面，创造了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学习文化，参与文化生活的条件。同时，为朝鲜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其次，“训民正音”的创制对朝鲜语言发展起到了

^① 《世宗实录》28年9月。

巨大的作用，为朝鲜书面语以及朝鲜语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再次，“训民正音”的创制，在朝鲜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也起了推动作用。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十五世纪，在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科学技术也得到显著发展。在天文学、农学、医学、印刷术、火药制造等方面，朝鲜都有发明创造，取得了新的成就。

天文历法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历法的研究。十五世纪，尤其世宗年间，许多学者深入研究了天文、历法，编出了新历书，制造了不少精巧的天文仪器。当时，朝鲜的历法有许多缺陷，对农业发展很不适应。世宗同郑钦之、郑招、郑麟趾等学者，将朝鲜的历来历书和中国历书进行对比研究，编纂了新历书《七政算内篇》。但这部历书仍有缺陷，世宗为了使其完善，又同李纯之、金淡等学者再次反复苦心研究，终于编出了内容更丰富，更准确的历书《七政算外篇》。《七政算》内外篇是在研究朝鲜历来历书和中国历书的基础上编纂的较完整的历书。同时，为计算时间制造了自击漏。自击漏是较准确的精制水漏，是由水运动器、转动器和自动报时器三部分组成。

此外，还制造了多种日晷。为观测天体，制造了各种天文仪器；如天球仪浑象、测定天体的浑仪、简仪、小简仪等。为综合研究天文历法，于1438年在景福宫内设立了钦敬阁，把测定时间的仪器和观测天体的仪器都集中在那里，对天文历法进行了研究。十五世纪取得的又一重大技术成就，是于1442年发明的精巧的测雨器。测雨器是用圆铁筒制成的，通过掉进圆筒内的雨水测定降雨量。当时，全国各地普及测雨器，政府责成各地，一旦下雨就按规定向中央报告降雨量。

十五世纪，朝鲜总结农业技术经验，编写了不少农书，推广了农业生产技术。1430年编纂了《农事直说》。它总结了南方农民的耕种法、适地轮作法等农业生产技术，并作了一定的科学理论概括。该书主要叙述了当时最被重视的水稻栽培法，具体说明平整土地、播种、移秧除草、施肥和灌溉等方法。姜希孟编纂了《衿阳杂录》。这部书共分五篇，其中《农家》篇阐述了水稻、大豆、大麦、谷子等农作物的品种及其播种期、收获期和特征等。《衿阳杂录》还收录了各种先进的耕作方法和有关气候同农业的关系等重要论述。此外，还有梁诚之等人编纂的《蚕书》，徐风等人编纂的《蚕书注解》，姜希颜编纂的《养花小录》等。这些农书科学地总结了朝鲜农业生产技术，对普及农业生产技术起了积极的作用。

医学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世宗年间的名医卢重礼编著了《乡药集成方》八十五卷。这是一部集医药之大成的书，它是在朝鲜原有医学和药学经验的基础上，补充新的研究成果写成的。这部书主要叙述了朝鲜出产的所有药材及其炮制法，以及各种处方和针灸法。金循义等人受世宗之命编纂了《医方类聚》三百六十五卷。这部书将自古以来的朝鲜和中国的医学成就加以整理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将医学各科分成九十五个部门按系统进行汇编。

印刷技术显著发展。为适应文化的发展，大量铸造了金属活字。1403年铸造了十万个铜活字，1420~1421年进行改铸，提高了活字质量，1434年又改铸二十万活字。十五世纪铸造活字共十二次。排版的方法也有所改进，从而提高了印刷效率。过去排版时，在印版上浇灌黄蜡，然后插以活字，待凝固后印刷。李穡改进排版方法，在底版上排好活字，仔细地匀字后，在活字中间塞进本片或废纸等物，使之固定后进行印刷，结果提高了印刷

效率，由过去每天只印几十张增加到每天印几百张，使印刷技术得到一大革新。

军事武器制造技术也有了相当提高。十五世纪，朝鲜各地设置了焰硝都会所，大量制造火药，火药的质量也大有提高。随着火药的增加，朝鲜大批地制造火药武器，并提高了火药武器的质量。以大炮为例，太宗年间，大炮射程不过二百步，到世宗年间，射程达八百至一千步。1409年制造了称为火车的新式武器。火车，就是在小车上装一个铜桶，里面装设数十枚铁翎箭，点爆火药即可发射。这种武器威力很大，效能很高。1413年创造了龟船，1423年又制造小而轻便的鼻居刀船，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水军战斗力。

这时期，史学家们研究了前代的历史，编写了历史书籍。十五世纪初开始编《高丽史》，经六十年编成。与此同时，还编写了《高丽史节要》。这两部书是研究高丽史的基本文献。1485年编纂了包括从三国到高丽时期的通史《东国通鉴》。李朝统治者还积极编写了《李朝实录》。按后代王编写前代王实录的惯例，编写了《太祖实录》、《定宗实录》、《太宗实录》等。《李朝实录》是记载李朝二十六代王的实录，共一千八百九十三卷，是研究李朝历史的珍贵文献。

十五世纪，地理学也取得巨大成就。李朝统治者十分关心地理书的编纂，从1424年至1425年搜集并整理了各道的历史沿革、山川、地势、土质、物产、风俗、户口和名胜等项调查资料，编写了各道地理志。1432年孟思诚、权軫等人编写了《八道地理志》，该书后来被收入《世宗实录》地理志。1477年完成了五十卷的《东国輿地胜览》。此后，这部书的内容得到增补，改称《新增东国輿地胜览》。这些书对研究朝鲜的地理、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同时，对军事学也进行了研究，编写了不少兵书。郑道传编写了《阵法书》。文宗年间编纂的《东国兵鉴》，是从兵学及战争史角度叙述从古朝鲜到高丽末期历次战争的兵书。同一时期编纂的《阵法》，是有关军事训练、布阵方法等方面的兵书，后改称为《兵将图说》，并广为利用。世祖年间编纂了《历代兵要》，又编写了注解中国兵书《武经七书》的《武经七书注解》。这些兵书都是深入研究军事学之后编写的军事科学专著，是朝鲜军事科学的宝贵遗产。

三、社会思想

李朝前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更为强化的时代，封建统治阶级除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外，还需要在思想上麻痹人民以维持其统治，程朱理学便是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理学是中国南宋朱熹创立的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理学传到朝鲜后，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极力推广，把它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李朝建立后，更为重视程朱理学，实行“斥佛扬儒”政策，排斥佛教，大力宣扬程朱理学。因此，程朱理学成为李朝时期的统治思想，在李朝的五百年间，它起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十五世纪，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是权近（1352～1408年）和郑汝昌（1450～1504年）。权近站在“斥佛扬儒”的立场上，积极支持李朝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主张，著有《入学图说》、《五经浅见录》等。他的哲学观点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世界的始源是精神的“理”，先有“理”后有“气”。在认识问题上，他认为具有认识能力和精神本身就具备万物之理，人的心所具备的理，是天之理。在实践问题上，他主张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他

认为，天地万物本为一体，因而人的精神正，自然运行也正；人的气顺，天地自然的气也顺。他以这些理论依据，宣扬封建秩序是天理，积极维护李朝封建统治，使封建等级制度合法化。

郑汝昌进一步整理了程朱理学，提出了更适合李朝封建统治的理论。他的哲学观点是理气说，他认为，理和气有密切的关系。他从这一观点出发，进一步论证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

十五世纪，出现了较先进的社会思想，与程朱理学进行斗争。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有金时习和南孝温。金时习批判程朱理学和宗教，提出了先进的理论。他认为，物质的气是世界的始源，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气的运动变化的结果。他在政治上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同情劳动人民。南孝温继承金时习的思想，提出无神论，反对宗教迷信。

四、文学艺术的发展

十五世纪是李朝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十五世纪在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赞颂李氏王朝的建立及其王道政治的作品。同时也出现不少反映人民生活 and 反对封建统治的作品。从形式上看，诗歌和稗说文学占绝大多数。随着“训民正音”的普及，出现一些用朝鲜文字书写的作品。

在诗歌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赞颂李朝的建立及其历代国王业绩的颂诗，有代表性的是《龙飞御天歌》、《新都歌》、《纳氏歌》、《靖东方曲》等，其中《龙飞御天歌》比较突出，它把李朝建国同王道政治结合起来加以颂扬，如实地反映了李朝封建国家的新兴景象。此外，还有高丽遗臣怀恋高丽王朝的怀古诗，代表性的有元天锡的《满月台》等。

十五世纪，稗说文学很盛兴。代表作品有徐居正的《笔苑杂

记》、《东人诗话》、姜希孟的《村谈解颐》，李陆的《青坡剧谈》，成规的《慵斋丛话》，南孝温的《秋江冷话》等。稗说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爱国主义思想，并程度不同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尤其是以幻想小说形式写的金时习的《金鳌新话》，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建筑、美术、工艺和绘画等艺术也有新的变化和发展。李朝统治阶级的排斥佛教提倡儒教的政策，对艺术的发展以极大影响，并赋予许多新特点。

建筑方面，高丽时期是以建筑雄伟华丽的寺院为主，而李朝时期则以建筑雄伟的王宫和城廓为主。李朝建筑的典型是崇礼门（汉城南门）。崇礼门于1448年竣工，城门匀称美观，是李朝城门建筑的新典型。此外，还通过昌庆宫弘化门、明政殿。昌德宫敦化门等建筑，也可看出十一世纪建筑的面貌。

在工艺方面，最具典型的是白瓷。李朝人喜爱洁净、朴素的白瓷。陶瓷工人创造了纯白、灰白、乳白、青白等多种美妙的色彩。这些白瓷质量坚固，形状多样，既有使用价值，又有艺术性。

十五世纪美术，在继承前代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代表作品有安坚的《梦游桃源图》、姜希颜的《山水人物图》和李上佐的《松下步月图》。这些画的特点是描绘了雄伟的大自然以及具有刚毅气魄和浪漫色彩的人物。

李朝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礼乐，特别是世宗年间创作了许多礼乐。代表性的音乐家是朴孺。世宗和朴孺创作了赞颂李朝国王业绩的“定大业”、“保太平”、“与民乐”等。这时期对乐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量制造了律管、编钟、编磬等乐器。世宗年间，将音乐理论加以系统化，收录在《世宗实录》乐志里。十五世纪

末，成倪编纂了《乐学轨范》九卷，这是宝贵的音乐遗产。

五、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

李朝统治阶级十分重视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封建官吏。但是，能够享受学校教育的只限两班子弟，而绝大多数的人民被斥诸教育门外。

李朝初期的教育，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学，一是私学。官学是国家创办的学校，用官费培养国家的统治骨干。官学系统，中央有成均馆，是最高学府，汉城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国家主要教育机关。每个道和邑设有乡校，作为地方教育机关。这些教育机关由国家给予土地和奴婢，用官费培养一定数量的学生。这些学校的课程，主要是儒学。《小学》是基本课程，还有《孝经》、《明心宝鉴》、《礼记浅见录》、《国朝五礼仪》、《三纲行实图》等。除儒学教育外，在中央和部分地区还设有武学、吏学、译学，阴阳风水学、医学、字学、律学、算学、乐学，讲授的课程有汉语、蒙古语、女真语、日本语等外国语，以及兵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命课学、算学、法律、绘画、音乐等。

私学的创始者是高丽遗臣吉再。高丽灭亡后，吉再回到故乡庆尚道善山，创办书堂，致力于教育后代的事业，成为私学教育的先驱。1407年经权近提倡后私学开始兴盛。各地的儒学者在地方创办私塾或书堂，主要讲授儒学。十五世纪，致力于私学的学者有金叔滋、金宗直等。私学日益兴盛，成为李朝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

李朝统治阶级为选拔人材，任用官吏，实行科举制度。科举分文科和武科。文科必经三次考试，第一次在地方，第二、三次在中央，三次考试合格者，大都被录用为相应的文官。文官考试

科目主要有儒教经典的解释、有关现行政策问题的论文以及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合格者当武官。武科考试科目有儒教经典的部分内容、兵学、弓学、骑术、骑枪、击球、枪剑术等。

第九章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削弱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第一节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削弱

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十五世纪末开始的土地兼并，到十六世纪更为严重。王公贵族、大官僚、内需司（国王的私人财政机关）以及地方两班地主，利用职权公然侵占公田，掠夺农民土地，扩大私人田地，到处建立私人农庄。因此，国家公田显著减少，广大农民中丧失土地者与日剧增。

国家公田迅速转为个人土地。李朝历代国王，多次册封许多功臣，授予大量的功臣田和别赐田。功臣田和别赐田实际上是私有土地。许多功臣不仅在京畿一带，而且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土地。例如，柳子光多次被册封为功臣，他的田地分布在从汉城到全罗南道的整个地区。不仅如此，内需司、贵族、官僚利用职权，公然占领国家公田，据为私有。内需司是最狂暴的土地掠夺者，王室指使内需司官吏，公然占领国家公田，使之转为王室的私有土地。内需司官吏还随意强占堤坝和土地，还抢占国家的山林、芦苇地等。中央官吏也施展一切手段，强占国家的公田。结果，国家公田越来越少，国家收入显著减少。

尤为严重的是，大封建贵族官僚疯狂掠夺农民的土地。他们

以廉价收买、强行掠夺、杀害农民、诱惑欺骗等手段，强占农民的土地。据《宣祖实录》二年闰六月条记载，勋旧大臣沈铨，“人有第宅，百计抑占，民有良田，公然劫夺，多占膏饶之地，聚为农庄，招纳良贱，萃为渊藪。……甚至抢捕盗贼，屠歼一村之民，没其田土，掠为己物。”^① 这一实例充分说明当时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与此同时，内需司和大官僚地主还以诱骗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当广大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下无法维持生产时，大地主乘机诱骗农民成为自己的私贱，并占领他们的土地。不少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把土地让给大地主，沦为私贱，此谓“投托”。全国各地被迫“投托”的农民越来越多。结果，广大农民丧失土地，大地主农庄迅速扩大。

封建大地主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土地，强迫广大农民开垦大量的荒地，以便据为己有。1565年，当时掌握中央实权的尹元衡强迫农民开垦西海岸的荒地，办起了农庄。十六世纪中叶，京畿道、忠清道、平安道等地开垦的许多荒地，都被内需司占有。

大地主所有制的发展，必然带来累累恶果。首先，广大农民破产，人民生活极为困苦，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其次，国家收入显著减少。许多公田变为私有地，国家田税减少。同时，不少农民沦为私贱，国家剥削对象减少。因此，国家毫无储备，一遇灾年，连官吏的俸禄也难以支付。相反，封建贵族官僚却占有许多土地，在各地设置私人农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种现象必然削弱中央集权。再次，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大官吏互相兼并土地，互相仇视，矛盾极为尖锐。尤其是中小地主和大地主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必然侵犯中小地主的利

^① 《宣祖实录》卷三，2年闰6月，乙巳。

益，因此，中小地主阶级强烈要求“限田”。总之，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中央集权显著削弱，各种矛盾迅速激化，李朝封建国家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

十五世纪末开始的大贵族和大官僚的土地兼并，侵犯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土地所有者和中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随着这一矛盾的尖锐化，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形成了两派政治势力，一派是占有大片土地、操纵政权的勋旧大臣，另一派是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政治势力，被称为士林。士林虽然没有掌握政权，但在地方有一定政治势力，他们反对勋旧大臣，保护中小地主利益，极力宣传程朱理学，主张以封建忠义思想事君，以清廉治民，提出所谓“均田论”、“限田论”，并责备勋旧大臣的土地兼并是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从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两派互相残杀，争权夺利，对人民，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成宗继位后，他感到勋旧大臣势力过分膨胀，威胁王权。于是，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牵制勋旧大臣，任用了士林派代表人物金宗直。金宗直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任命士林派人物为言官和弘文馆官吏，言官和弘文馆官吏作为国王近侍，可参与重大国事的商议。在成宗的庇护下，士林派在中央掌握的权力，逐步扩大和强大起来。在中央，两派斗争极为尖锐，士林派不断揭露和谴责勋旧大臣的卑劣行径，而勋旧大臣也在伺机进行报复。

1495年，成宗死，燕山君即位。在燕山君统治时期，士林势力继续发展，同勋旧大臣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士林派主张按儒家道德行事，并对燕山君的暴行采取批判态度。对此，燕山君不满。1498年，（戊午年）李克墩、柳子光等勋旧大臣，利用国

王对士林派的不满，怂恿燕山君屠杀士林派，并没收其财产，把牵连的人全部从宫廷驱逐出去，^① 这就是所谓“戊午士祸”。

“戊午士祸”后，燕山君和勋旧大臣更加肆无忌惮地沉湎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使国家财政发生严重困难。国王为挽救财政危机，加紧掠夺土地，大量增加贡纳，并打算没收勋旧大臣的土地。1504年（甲子年），燕山君屠杀了勋旧大臣（包括士林），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这便是“甲子士祸”。

“甲子士祸”后，燕山君的暴虐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燕山君的暴政不仅激起了人民的愤慨，也受到两班地主的反对。1506年，朴元宗等勋旧大臣动员军队逮捕并放逐了燕山君，拥其异母弟为国王，史称“中宗反正”。“中宗反正”后，勋旧大臣和士林一起被任用，在中央掌握政权，从此，在中央又发生两派的斗争。士林派为牵制勋旧大臣，提出“均田论”和“限田论”，他们把它标榜为“理想政治”。勋旧大臣和士林的对立日趋尖锐，南袞、沈贞等勋旧大臣于1519年（己卯年）诬害赵光祖等士林派，以“叛逆罪”将他们判处死刑或流放。这谓之“己卯士祸”。^②

“己卯士祸”后，勋旧大臣派迅速膨胀，中宗为钳制勋旧大臣，再次录用士林派。1545年（乙巳年）尹元衡一派又打击了士林派。这就是“乙巳士祸”。1565年尹元衡一派被逐，士林派重新上台。从此以后，士林派空前强大，掌握了中央的全部权力，政府变成清一色的士林派。

士林掌权后，为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各地设立书院。书院起源于书堂。书堂原是士林派学儒学、祭祀孔孟的地方，是士

^① 《燕山君日记》卷三十，4年7月，辛酉。

^② 《中宗实录》卷三十七，14年12月，丙子。

林派的地方组织。士林为加强自己的政治地盘，大力提倡书院。在地方，书院的士林派逐步成为实权派，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很大权势。士林为进一步加强书院组织，巩固政治地盘，制定了所谓“乡约”（又称约契），作为书院组织共同遵守的原则。“乡约”共有四项：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1573年，士林派决定在全国实行乡约，目的是：一，通过乡约的实行，扩大士林的势力，加强士林派政治地盘；二，以乡约束缚人民群众，巩固封建统治。

士林一派掌权后，通过书院和乡约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盘。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士林派内部又发生极为复杂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史称“党争”。士林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是早已担任高官显职，拥有大片土地的老士林派，称为西人；另一派是后起的少壮派，称为东人。两派围绕着录用官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各自利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书院，从中央到地方展开无原则的争斗。1591年，东人内部围绕着对待西人的态度问题发生分裂，主张对西人采取温和态度的称为南人，主张采取强硬态度的称为北人。此后约二百年间，党争继续激化，派别日趋错杂，造成极大危害。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首先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灾难。各派都为自己一派的利益，互相包庇，助长了私弊、贪污和浪费。各派又采取各种手段压迫和剥削人民，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次，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使封建国家处于危机状态。各派各自为政，极力扩大自己势力，疯狂掠夺土地，使国家处于混乱状态，丧失对土地的支配权，财政枯竭，后果极为严重。

三、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农民起义

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斗争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不少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沦为大地主的私贱。而封建国家却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激化，政府财政枯竭，但封建贵族却竞相奢侈，国家开支日益增多。封建国家为挽救这一局面，其唯一方法，就是进一步残酷地榨取人民的血汗。进入十六世纪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公然撕掉“仁政”的假面具，赤裸裸地暴露出吸血鬼的真面目，以极其卑鄙的手段残酷地剥削人民，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封建国家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仍是田税。十六世纪，名义上虽仍按贡法征收田税，但征收田税时，巧立名目，加收各种附加税，实际征收量达十五世纪田税量的几倍。封建国家为进一步榨取人民的血汗，摊派许多徭役，又以棉布代役，强迫农民缴纳棉布。

特别残酷的盘剥，则是高利贷剥削、纳贡剥削和军布剥削。十五世纪末以后，掌管王室财政的内需司为满足王室内日益豪华的奢侈生活和日益增多的王室开支，公然进行高利贷剥削。十五世纪末，内需司在全国各地设置五百六十个经营高利贷的长利所。内需司的官吏依仗王权横行霸道，强行摊派，强迫还债。如确属无力还债，就责令其亲属或邻居偿还。人民怨声载道，反对高利贷剥削的斗争越来越高涨。到1516年，在人民的怨声中，朝廷不得不撤销长利所。但两班地主仍私放高利贷，残酷地剥削人民。

对人民的另一残酷剥削，是纳贡和进上。封建官僚贵族的奢侈生活，需要各地的特产品和精制的手工业品，他们向各地无止

境地征收各种特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十六世纪以后，贡物和进上品成为封建贵族发财致富的主要来源。封建统治阶级以各种残暴手段强征贡物。首先，贡物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例如，十五世纪平壤地区的贡物有十七种，全罗道顺天地区贡物有四十九种，但到十六世纪末，平壤地区贡物多至四十种，顺天地区贡物多至八十种。当然，其他各地的贡物种类也成倍增加。因此，对农民来说，纳贡成为极其沉重的负担。其次，纳贡剥削的残酷性还表现在强征当地根本不出产的物品，或即使当地出产但很难按期按量缴纳的物品。例如，黄海道应上缴有白齿的老豹子、鹿舌、鹿尾等，但是即便狩猎一冬也难得到。农民为了进贡，不得不到京城高价购买封建贵族出售的贡品。再次，纳贡剥削的残酷性又表现在所谓“引纳”和“防纳”上。“引纳”，就是提前缴纳一两年的贡物，“防纳”，就是无条件地拒绝收纳农民缴纳的贡物，而叫农民以昂贵价格购买官吏事先准备好的物品。“引纳”和“防纳”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又一手段，是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手段。这种残酷的纳贡剥削，是造成农民破产和农村荒凉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六世纪的改革论者李珥说：“今则列邑所贡多非所产，有如缘木求鱼，乘船捕兽，未免转买他邑，或市于京。民费百倍，公用不裕，加以民户渐缩，田野渐荒。”^① 这充分说明当时纳贡剥削的残酷性。

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在查明军额时进行的剥削，也是使农民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六世纪以后，不少农民逃亡或沦为大地主的私贱，但他们的军籍没有取消，此兵役负担被强加在其余农民身上。因此，一个农民须负担几个人的兵役，在这种情况下，除农民自己服兵役外，还要雇人抵役，步兵每两月需付十

^① 《栗谷全书》卷五，疏札三，万言封事。

七、八匹棉布，水兵需付二十匹棉布。农民无法担负这么沉重的兵役负担，只好背井离乡逃避兵役。1537年，封建国家实行了“军籍收布法”，就是凡已登记军籍而不服役者要缴纳两匹布，即“军布”。政府用收缴的军布招募士兵，加强国防。但军布并未用于加强国防和征募士兵，一旦情况紧急，缴纳军布的农民，仍按军籍被任意动员服役，因此，“军布”实际上是一种苛捐杂税。

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迫使农民流离失所，村落荒凉，耕地荒芜。广大农民逃避封建剥削，或背井流离他乡，或隐居深山穷谷。十六世纪，农民的流离逃散，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现象。明宗九年（1554年），庆尚道一带的老百姓大多数流离逃散，饿死者的尸体盖满田野。^① 1561年（明宗十六年），江原道平昌郡守向明宗上书说：平昌邑原有户五百，现只剩四十。李珥说：百姓流离逃散，村落荒凉，耕地荒芜，百里之间无人踪影。^② 1576年（宣祖九年）5月，平安道地区病死者达一万余人^③。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十六世纪朝鲜人民的生活极为痛苦，阶级矛盾异常激化。广大农民纷纷起来，拿起武器，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十六世纪的农民起义军，大多数是分散的流民武装团。由于缺乏史料，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但从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些片断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农民起义军的斗争情况，流民武装团的活动从十五世纪中叶就已开始。1469年，全罗道一带有张永奇率领的流民武装团。这一武装团是流浪农民组成的农民起义军。他们以智异山为根据地，出没于全罗、庆尚道袭击官衙和

① 《明宗实录》卷十六，9年2月，庚辰。

② 《栗谷全书》卷三。

③ 《宣祖实录》卷十，9年8月，己酉。

土豪住宅，杀死贪官污吏和土豪。这个武装团战斗力很强，全罗兵使许琮率领的官军讨伐数月未能成功，封建政府不得不向全罗、庆尚道派遣得力的指挥官。但“讨伐军”还是到处被农民击溃。这支起义军一直坚持到1470年。1498年，反对燕山君暴政的流民，在汉城附近起义，威逼汉城，有时打入城内，袭击王宫附近的两班住宅，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十六世纪初，有代表性的农民起义军是洪吉童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洪吉童农民军活动始于1500年，活动地区大致是汉城附近。洪吉童率领农民起义军以奇妙的战术袭击官衙和官吏住宅，夺回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封建统治阶级对洪吉童部队神出鬼没的战术束手无策，惶恐不安。^①

1530年以顺石为首的农民武装团在京畿、全罗和忠清道一带活动。他的部队达数百人，他们曾闯进汉城，给封建统治阶级以一定的打击。

1557年，以吴连石为首领的规模较大的农民军活动在瑞兴、牛峰、兔山、新溪、伊川等黄海道各地，和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被封建统治阶级镇压。

十六世纪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是林巨正领导的农民起义。林巨正是扬州屠夫出身，1559年许，他组织了武装队伍，和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斗争。^②参加这支武装队伍的大多数是逃亡的奴婢和流浪的农民。他们以黄海道的九月山为根据地，在京畿、江原道一带频繁活动。起义军紧密联络各地武装袭击官衙，冲开监牢，袭击两班土豪住宅，夺回被掠财物，控制包括汉城至平壤的各条通路，劫夺驮运贡物和进上物品。林巨正部队的活动，得到

^① 《燕山君日记》卷三十九，6年12月，己酉。

^② 《明宗实录》卷二十五，14年3月。

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封建政府惊慌失措，组织“讨伐军”，企图一举歼灭起义军，但都遭到可耻的失败。1560年11月，封建政府委派得力武官，动员五百多名士兵，在平山北面御水洞包围了林巨正起义军。平山战斗是决定起义军命运的关键性战斗，起义军英勇奋战，取得了胜利，“讨伐军”遭到严重打击，仓惶败逃。^①平山战斗的胜利，给农民军打开有利局面。农民军在西北地区更广泛地开展斗争，使西北地区封建统治秩序陷于混乱。在此情况下，封建政府为笼络西北地区的民心，割断人民同起义军的联系，宣布免除黄海道的全部田税，平安道则减免一年；同时又派得力的军事指挥官南致勤率精锐部队，进行大规模讨伐。林巨正农民起义军历经三年如火如荼的斗争，给封建剥削阶级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本身的弱点和“讨伐军”的疯狂镇压，终于失败。

十六世纪的农民起义，都是分散的武装斗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起义队伍，没有提出明确的战斗口号，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农民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十六世纪的朝鲜农民起义在朝鲜农民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广大的朝鲜人民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正当这时，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勇敢斗争，狠狠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显示了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

^① 《明宗实录》卷二十六，15年12月。

第二节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壬辰卫国战争

一、日本侵略者的突然入侵和朝鲜人民卫国战争的开始

当十六世纪末朝鲜政治腐败、党争激烈时，日本关白（宰相）丰臣秀吉战胜国内其他诸侯，统一了日本。他为了满足封建主和商人的贪欲，妄图征服朝鲜和中国，悍然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朝鲜长期以来武备松弛，义务兵役多由苛刻的军布税代替，无论中央或地方，都无御敌之兵，更缺乏军器粮饷的储备。各地水陆军将领，也几乎全是怯懦之徒。

1592年（宣祖25年，壬辰）4月，做了多年战争准备的日本侵略者，以十七万陆军和三、四万海军的兵力入侵朝鲜。从此，朝鲜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壬辰卫国战争。

日军在釜山登陆，并围攻釜山，当地的朝鲜军民在佥使郑拨的指挥下英勇抗战，但优势的日军一举占领釜山，向东莱城进犯。东莱城的朝鲜军民在府使宋象贤的指挥下展开了英勇的防御战，但仍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庆尚道陆海将帅和地方官吏被日军气势所吓倒，仓惶逃跑。因此，庆尚道地区军民无法同大举入侵的日军进行有组织的战斗。占领釜山和东莱城的日本军分东、西、中三路向汉城逼进。东路经庆州、永川、闻庆、鸟岭直至汉城；西路经金海、圣山、锦山、秋风岭、清州直达汉城；中路经大丘、尚州、闻庆、鸟岭，忠州直进汉城。

国王和大臣得知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的消息后，急忙派几个将领到前线指挥，但日军已侵入到忠清道一带，朝鲜军队随即全

线崩溃，无法组织抗击。国王听到庆尚道和忠清道战局极端不利的消息，不但不采取任何有力措施，反而放弃汉城仓惶北逃，经开城、平壤，最后，逃至鸭绿江边的义州。日本入侵军进入朝鲜二十天后占领了汉城，不久又攻占了平壤。从咸镜道方面入侵的日军强占了吉州以南各邑。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朝鲜人民遭到极大灾难。日军的野蛮行为燃起朝鲜人民的愤怒之火。他们在民族的生死关头，挺身而出，争先恐后地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日军侵入尚州时，朝鲜军民在巡边使李镒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抗战；日军侵入忠州时，朝鲜军民在巡边使申砬的指挥下殊死抵抗；日军侵入平壤时，平壤军民依据平壤城墙，迎头痛击从大同江东岸入侵的敌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他们临战前才集中起来，缺乏训练，武器低劣，未能挫败入侵军。

二、战争初期朝鲜水军的胜利

日军入侵朝鲜时，曾制定过“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陆军分三路进攻，海军则绕南海岸和西海岸，配合陆军占领朝鲜海岸地区。日本水军入侵初期，庆尚左水使朴泓和庆尚右水使元均畏惧敌人不敢出海迎战，庆尚道战舰未经任何激战，全部被击沉。日本海军占领庆尚道海岸之后，继向全罗道海岸进攻。

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将军得知日本突然入侵消息后，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尤其是李舜臣将军利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发明了一种龟船。船头形似龟首，能吐浓烟为幕。甲板上有坚固的顶盖。顶盖以厚木制成，裹上铁板，可以掩护船上的水兵，避免敌人火器的投射。顶盖之上及甲板之旁装有很多尖锐的大钉和铁钩，使敌人不易攀登上船。前后左右有七十四个銃穴，射手伏在内部，安然施放火器。船的头尾皆有金属尖杆，以冲击

敌船之用。这种船进退自如，速率颇高，设计合理，结构精坚。1592年5月4日，李舜臣将军率领的舰队从丽水左水营出发，7日到达玉浦前海，发现五十艘敌舰，经数小时激战，击沉敌船二十六艘。^①当天下午，又在永登浦前海发现敌一列大兵船，旋即追击，终于在合浦前海将其全部击沉。8日，在赤珍浦又击沉敌大小战船十三艘。经过三次战斗击沉敌船四十四艘，杀伤许多日军。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一捷报极大地鼓舞了朝鲜人民。

5月29日，李舜臣将军率领船队到达泗川。日海军惧朝鲜海军，弃船上山布阵，形势对朝鲜水军不利。李舜臣将军为诱敌出海，佯装撤退，日海军上船追击，瞬时，朝鲜海军以龟船为先锋，拨转船头，猛攻敌船，击沉日船一百二十一艘，取得辉煌胜利。6月2日，在唐浦前海进行激战，击沉敌旗舰，杀伤无数日军。6月5日，李舜臣将军率舰队到达唐项浦，利用诱敌出海战术，击沉了二十五艘日海军战船。6月7日，朝鲜海军又在永登浦击沉七艘日船。朝鲜水军在第二次战斗中取得巨大胜利，打破了日本征服者“水陆并进”的计划。

日本海军的失败，对日本入侵者极为不利，日本入侵者将全部海军将帅纠集到釜山，动员全部舰队，从海上发动总攻，同时，日陆军进攻全罗道，扰乱朝鲜海军后方，企图挫败朝鲜水军。七月上旬，日本水军分三路向全罗道方面开始进犯。7月8日，朝鲜水军向见乃梁进发，发现日水军的七十三艘战船。见乃梁地势不利于作战，李舜臣将军再次采取诱敌出海战术。先派五、六艘战船袭击日本船队，日本水军一齐出动应战，李舜臣将军命令边战边退，将敌诱至闲山岛前海。朝鲜船队急转船头，布下鹤翼阵，由龟船发动进攻。经激烈交战，朝鲜水军击沉了日战

^① 《宣祖实录》卷二十七，25年6月，己酉。

船五十九艘，取得巨大胜利。这一胜利，史称“闲山大捷”。7月10日，朝鲜水军又在安骨浦发动进攻，给日水军沉重打击。

朝鲜水军的巨大胜利，在朝鲜人民的卫国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朝鲜水军掌握了制海权，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水陆并进”计划，使日军不敢向平壤以北地区进犯。

三、朝鲜各地义兵斗争的兴起

腐败无能的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既不组织抗战，反而为了自身的安全各自逃走。但是，广大朝鲜人民为了保卫祖国，却不畏强暴地、自发地组织武装队伍，同入侵者展开了英勇斗争。这种武装队伍就叫做义兵。各地的朝鲜人民争先恐后组织义兵队伍，处处阻击敌人，使其难于前进。义兵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逐步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部队，在反入侵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1592年4月，庆尚道宜宁人民在郭再祐的领导下组织了义兵。他们以鼎津为根据地点燃了义兵斗争的烈火。郭再祐义兵部队消灭了宜宁、三嘉、陕川等地的敌人，收复了这些地方。在人民的支持下，这支部队日益壮大，成为强大的战斗部队，远向灵山、昌原、玄风等地出击敌人，将敌人赶到尚州方面。7月以后，因这支义兵部队的灵活作战，日军不敢向尚州以南、洛东江以西地区前进一步，日军联结金海、灵山、昌宁、玄风、星州的一条重要供应线，也被切断^①。郭再祐义兵部队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庆尚道人民的爱国斗争，各地人民组织义兵，响应郭再祐义兵部队。陕川地区人民在郑仁弘领导下组织了义兵部队，奇袭洛东江沿岸的日军；高灵地区金沔指挥下的义兵则以居昌为根据地展开游击战；沉重打击了这一地区的人侵日军。

^① 《宣祖实录》卷二十七，25年6月，丙辰。

全罗道南原、玉果、潭阳等地人民得知日军入侵消息后，也聚结义兵部队，推高敬命为大将。7月初，高敬命义兵部队同官军协同作战，攻打锦山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日军为了侵入全罗道，企图围攻全州。7月8日，义兵将领黄璞率领的义兵和官兵协同作战，在全州附近的熊峙和梨峙，同日军展开激战，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取得很大胜利。

日军侵入忠清道以后，在忠清道内浦地区，灵圭组织了僧侣义兵部队。忠清道沃川、洪州地区人民在赵宪的领导下组织了义兵部队，8月1日，灵圭义兵部队和赵宪义兵部队协同作战，收复清州城。8月27日，赵宪和灵圭义兵部队攻打锦山，人数众多的日军猛扑过来，义兵部队虽英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京畿道水原、安城地区人民在洪彦秀、洪季男父子的指挥下拉起义兵部队，开展游击战，歼灭附近的敌人，并截断交通，粉碎了敌军的抢掠。原在全罗道罗州起义的金千镒义兵部队进入京畿道活动。他们经水原进江华岛，在京畿沿海开展游击战，对联络南北战线立下很大功劳。

平安道各地的义兵部队也很活跃。由林仲梁指挥的中和地区的义兵部队、由车殷轸指挥的中和东部的义兵部队和由金进寿指挥的中和西部的义兵部队互相呼应，同中和地区的日军展开英勇斗争，给入侵者以沉重打击。还有江东地方曹好益领导的义兵部队、杨德禄指挥的平壤义兵部队、妙香山普贤寺僧人休静（西山大师）组织的僧兵、金刚山表训寺僧人维政领导的义兵部队，在平壤附近同入侵军展开斗争，消灭入侵日军的有生力量，截断了交通线，取得了辉煌战果。在黄海道黄州地区，金万寿、黄河水率领的义兵部队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遇到外出抢掠的敌人，就地予以消灭，取得了很大战果。

日本军侵入咸镜道地区，到处屠杀人民，残暴至极。咸镜道人民组织义兵部队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9月，崔配天、池达源、姜文祐等人组织了以镜城人民为主的义兵部队，推荐郑文孚为大将。郑文孚义兵部队逐步发展成拥有三千将士的强大队伍。他们在长坪石岬（明川郡上加面石岬洞）歼灭了一支庞大入侵部队，还在飞山消灭了一支入侵日军；12月，在双浦（金策市）又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端川、北青、利原等地也相继组织了义兵部队。10月，柳应秀和李希祿在咸兴，李惟一等人在德山关各自组织义兵部队，给盘据在咸兴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几个月的战斗中，朝鲜人民的义兵部队逐渐壮大。与此同时，官军也逐步整编。从8月以后开始，官军和义兵协同作战，进行了较大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8月末以来，日军渡过临津江，强占海州，并在黄海道一带进行抢掠。这时，延安人民在宋德润、张应琪和赵光廷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义兵部队，和入侵日军展开了斗争。8月28日日军一支三千人部队，为强占延安城发动进攻。延安人民在优势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发挥创造精神和善战气概，英勇地消灭了来犯的日军，取得了胜利，史称延安大捷。9月，庆尚左兵使朴晋率领的万名官军和义兵部队同心协力收复了庆州城。10月，入侵日军为强占战略要地晋州城，重重包围了晋州。晋州牧使金时敏同城内士兵同甘共苦，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得知日军攻打晋州城的消息后，各地义兵部队，纷纷赶来晋州，郭再祐义兵部队，崔桐、李达的义兵部队，崔庆会、任启英、金俊民的义兵部队，都赶来参加了保卫晋州的战斗。官军和义兵部队，联合作战，胜利击退了来犯之敌。这一胜利，史称“晋州大捷”。

在朝鲜各地义兵斗争蓬勃兴起，取得辉煌胜利的时节，朝鲜水军密切配合陆军，进行了釜山海战。朝鲜水军舰队接到日军大

舰队停泊在釜山船埠的报告，立即向釜山镇船埠进发，击毁日军船一百多艘，杀伤无数敌人，取得了巨大胜利。

延安大捷、晋州大捷和釜山海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的巨大力量，粉碎了日本入侵者“水陆并进”的作战方案和速战速胜的征服计划。

四、朝明联合抗战的伟大胜利

日本侵略军突然侵入朝鲜，朝鲜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虽然朝鲜人民自发地组织义兵同敌人英勇斗争，但是抗战十分艰难。在此情况下，朝鲜派使臣向明朝求援。1592年7月，明朝派五千士兵赴朝参战。同年12月又派了以宋应昌为经略，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的四万三千名援军。

朝明两国军队的联合抗战，是从收复平壤的战斗开始的。平壤当时已被敌将小西行长占领近半年之久，成为他们的前线据点。1593年1月，朝明联合军包围了平壤城，8日晨，总攻打响了，炮声震耳欲聋，朝明联合军破城而入，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最终收复了平壤。平壤之捷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扩张的阴谋，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收复平壤之后，朝明两国军队并肩作战，向开城和汉城方面进发。日军全线崩溃，黄海道，江原道等地的日军全部龟缩在汉城。与此同时南方的朝鲜官军和义兵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在各地围攻日军。为收复汉城，朝明两军从北面攻打汉城的日军，权栗指挥的南方朝鲜官军和义兵转移到汉城西南，包围了汉城。

入侵日军总大将浮田秀家和小西行长企图从西南突破包围圈，向离汉城四十里的幸州山城发动了进攻。当时幸州山城只有权栗指挥的二万三千名朝鲜官军。入侵日军动员三万兵力猛扑幸州山城，坚守城池的朝鲜官兵，英勇战斗，连续击退侵略军，并

出城追击敌人，杀伤许多日军，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史称“幸州大捷”。在幸州城失败的人侵日军被迫提出“和谈”，到4月中旬，从汉城败逃，直至南部海岸。但是，入侵日军并未渡海，他们停留在从蔚山西生浦到巨济的沿海地区，筑好军事设施，妄图卷土重来。

日方提出的“和平谈判”是个骗人的伎俩。

日本一方面进行谈判，一方面继续备战，企图再次发动战争。朝鲜政府也看出日本的意图，整编军队，制造武器，做好了抵抗入侵者的一切准备。三年的和谈终于破裂，1597年，日军再次侵入朝鲜。

五、日本侵略军的再次侵入和败退

1597年1月，日本侵略军以新编的十四万大军在朝鲜南海岸登陆，以数百艘战船向朝鲜水军发动进攻。入侵者企图首先牵制朝鲜海军，在海上发动总攻。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诬陷李舜臣将军，一度罢免了他的职务。继任的元均腐化堕落，防备松弛。7月15日，在漆川岛、固城海战中，元均竟使朝鲜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入侵日军乘机发动了总攻。

明朝政府又派邢玠为总督率兵援朝。朝明军联合作战，在忠清道稷山素砂坪、金乌坪截击北上的日军主力，经两天激战，消灭入侵军主力，取得了巨大胜利。

朝鲜政府重新起用李舜臣将军为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将军重整水军，迅速进入抗战。9月16日，日水军三百三十艘大船队闯进朝鲜水军阵地珍岛，妄图把刚刚整顿的朝鲜水军扼杀在摇篮里。李舜臣将军以卓越的战术，诱敌至鸣梁口，展开殊死战斗，击破三十余艘日本船，击退入侵日军，取得了胜利。这次海战的胜利，史称“鸣梁大捷”或“珍岛大捷”。

朝明两军英勇战斗，把入侵军压缩到蔚山、泗川、顺天三个地区。以顺天为据点的小西行长被朝明联军包围，海上，被朝明联合舰队切断退路，陷入困境。于是，小西行长调五百余艘兵船，妄图掩护其逃窜。得知这一消息的朝明两国水军，做好了歼灭敌人的准备。明军总兵陈璘率水师进入朝鲜南部海岸。朝鲜水军也集中兵力准备战斗。11月18日，在露梁发现了入侵军的大舰队，朝明两军并肩作战，和敌舰展开两天激战，击沉几百艘敌船，将万余敌兵葬于大海，取得了辉煌胜利。在这次战斗中，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和明朝将领邓子龙不幸中弹，壮烈牺牲。通过这次海战，日本入侵军彻底失败，朝明联合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经历七年艰苦卓绝的反入侵战争中，朝鲜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取得了伟大胜利。明朝军队为支援朝鲜人民，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也取得了光辉胜利。朝明两国军队联合抗战的胜利，不仅在朝鲜人民的历史上具有巨大意义，而且对保卫当时东方的安全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朝中人民在反入侵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在两国关系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第三节 十六世纪的思想和文化

一、哲学思想的发展

十六世纪是朝鲜封建社会哲学思想迅速发展的时期。十六世纪哲学思想能够得到发展，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即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大地主的代表勋旧大臣和中小地主的代表士林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这些矛盾必然反映

到思想领域里来，各阶级和阶层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哲学观点，在互相争论中，进一步发展了哲学思想。这一时期较突出的是士林的哲学思想，有代表性的，是徐敬德的主气论和李珥理气二元论。还有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客观唯心论，代表人物是李滉。

徐敬德（号花潭，1489～1546年）是卓越的主气论者。他刻苦钻研，批判地吸收前辈学者先进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十五世纪主气论者金时习的哲学思想，形成具有独创性的主气论哲学体系。他的著作有《太虚说》、《原理气》、《理气说》和《鬼神死生论》等，收录在《花潭集》中。他认为世界的始源是充满于空间的物质的气，气是无始无终，不可创造也不可消灭的；还认为，人的精神感觉是气的凝聚物。由此可见，他的思想是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徐敬德还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物质运动是阴阳对立的统一，是天地万物的基本规律。这种思想尽管是朴素的直观的，但在辩证地认识事物方面却前进了一步。徐敬德反对程朱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和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本质。因此，他的思想代表着中小地主阶级的先进思想。封建统治阶级把他的哲学思想看作是程朱理学的异端邪说，加以压制和打击。他的思想，对先进的朝鲜实学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和徐敬德的主气论对立的是李滉（1501～1570年）的客观唯心论。李滉是个彻底的客观唯心论者。他把程朱理学看成是完善的绝对的学说，丝毫不想逾越。他的著作有《朱子学节要》。他认为，理是先于事物的绝对的东西，是产生万物的根源。他主张：“理先气后”，“知先行后”。他用彻底的客观唯心论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提供理论根据，他宣扬三纲五常，要求人民顺从于封建统治阶级。

李珥（号栗谷，1536～1584年）是李滉的学生，他批判地吸收李滉的学说，确立了正统的理气二元论。他的著作是多方面的，都收录在《栗谷全书》中。他的哲学思想归根到底没有摆脱客观唯心论的圈子，但他的哲学思想中却包含着不少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他认为，形成天地万物的直接物质基础是元气，所有现象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有辩证的因素。他认为认识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外界事物作用于感觉器官所引起的，从而得出一切事物都可以认识的结论。他对封建社会的矛盾，采取揭露的态度，并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在他的思想中，贯穿着谋求封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思想显然代表着中小地主阶级的先进思想。他的这种思想对朝鲜实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十六世纪，除上述哲学家外，还有南溟曹植、河西金麟厚、高峰奇大升、牛溪成浑等。

二、医学和语言学的发展

十六世纪，在医学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其中较突出的是许浚的医学研究活动。他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在壬辰卫国战争时期和被流放的艰苦岁月里，依然坚持不懈地从事研究，阅读了五百多卷中国和朝鲜的各种医书，终于编写成《东医宝鉴》、《东医宝鉴简要》，系统地叙述了内科、外科和针灸以及其他东医学，并说明了朝鲜国产药材的用法。《东医宝鉴》是东医学的一部巨作，至今还有参考价值。许浚的著作还有《辟疫神方》、《新纂辟温方》、《痘疮集要谚解》和《胎产集要谚解》等。

十六世纪，在语言学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就。著名语言学家有崔世珍、权文海等。崔世珍编著了《四声通解》、《训蒙字会》、

《吏文辑览》、《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等。《四声通解》和《训蒙字会》都是朝鲜语言学著作，对普及《训民正音》，发展朝鲜语言和音韵学有重要意义。《吏文辑览》、《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等著作，是学习蒙古语和中国语的书籍，对后来学习和研究外国语有很大帮助。权文海编纂了朝鲜现存最古老的词典《大东韵府群玉》。这部书不仅是一部字典和韵书，而且是有关地理、姓氏、国号、风俗、方言、诗文、花木和禽兽等各种知识的词典。

三、文学艺术的发展

十六世纪是士林登上政治舞台，不断发生“士祸”和党争的时期。因此，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士林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处境。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用朝鲜语写的诗歌和汉字写的稗说文学。还有描绘美丽自然景色，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

在诗歌中，较突出的是松江郑澈的诗歌和俯仰亭宋纯的诗歌。尤其是郑澈，在《松江歌辞》中熟练地运用朝鲜语的丰富词汇，歌颂了朝鲜的美丽河山。这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女作家，如李玉峰、黄真伊、许兰雪轩、申师任堂等。特别是黄真伊，她即兴抒发自己的情感，客观地反映了人们内心世界，创作了很多人民群众喜爱的时调。郑澈的歌辞和黄真伊的时调，对十七世纪以后朝鲜诗歌文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

汉文稗说文学有很大发展。鱼叔权的《稗官杂记》揭露了门第制度和嫡庶有别的社会矛盾。他充分发挥高超的文学才能，创造了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他的作品达到了朝鲜稗说文学的高峰。林悌的《鼠狱说》无情地讽刺了士祸和党争，痛斥了当时统治阶级为满足私欲滥用国家权力和挥霍国家财富的丑恶行径。

十六世纪绘画的特点是描绘梅、兰、菊、竹等花木和虫、

鸟、猫、狗等动物的作品较多。代表性的有李岩的“花鸟猫狗图”，女画家申师任堂的“溪边野鸭图”。他们精巧地描绘了树木、花草和动物。还有黄执中、李继祐、李霆、鱼梦龙等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

第十章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扩大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十七世纪前半期的内外形势

一、战后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朝鲜人民在历时七年的壬辰战争中，发扬了为国捐躯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英勇地击退了凶恶的敌人，取得了无比辉煌的胜利。但是，战争的创伤十分严重，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当时，有名叫尹国馨的僧侣曾如下写照战后社会的情景：“战后，人们流离四方，就连大家世族也几乎失却生活的信念，……尸横遍野，白骨如山，父母卖儿女，丈夫卖妻子。……这次战争灾难之深重和残酷，实为我国有史以来之首次”。^①

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和瘟疫，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使无数人家骨肉分离，到处流浪。其结果是，人口惊人地减少，以至“自凤山至京城一带直路，荡无人烟，往来公差及商贾行旅，亦无过宿之地”。^② 战后，李朝当政集团为恢复汉城的繁荣景象，采取措施，强制流散各地的巨商富贾回归汉城。但是直至1606年，汉城的人口仍只有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五户^③，比1428年约少四千户。朝鲜全国的总人口，减少到战前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

由于人口的大量减少和严重离散，出现了“田野未尽辟，污

① 《闻韵漫录》。

② 《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一，33年11月，丁卯。

③ 《增补文献备考》卷一百六十一。

菜棒莽，满月萧然，畎亩阡陌，无迹可据”^①的荒凉景象，据1611年（光海君三年）户曹判书黄慎说，战后全国土地结数只等于战前全罗一道，而受害最甚的庆尚道耕地面积仅为战前的六分之一。^②人口稠密，经济集中的京畿以及三南等地，破坏同样严重。文献记载说：“经乱之后，八道物力一样残破，而京畿尤其。”^③

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给手工业生产造成很大困难。尤其在战乱期间，日本入侵者抢走大批印刷、造纸、矿业等许多工种的优秀技工，使战后手工业生产难于开展。

战争创伤如此深重，但广大劳动人民却冲破种种困难，积极恢复生产，在全国各地大量开垦荒地。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大部分荒地得到开垦，同时，他们也以多种形式展开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各地人民纷纷起来，要求撤销“京在所”，迫使政府于1603年下令将其撤销，斗争取得了胜利。1623年，广大农民掀起反对豪强两班以陈地名义掠夺农民土地和扩大农庄的斗争。

但李朝封建统治政权却把解决战后人民的各种痛苦和混乱不堪的社会问题，完全置之脑后。他们只加强封建统治，寻求更多的剥削来源和更新的剥削方法，以满足两班地主的无限贪欲。

李朝封建政权，首先于1601年开始进行量田。田籍^④经长期战乱几乎全部遗失，政府无法按田结征收田税和贡物。丈量土地实质上是围绕剥削权的再分配问题，是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中央官府与两班之间的大型较量，矛盾必然是尖锐的，它集中地表

① 《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九，36年2月，己亥。

② 《增补文献备考》卷一百四十九，田赋考八，租税。

③ 《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九，36年2月，己丑。

④ 亦称田案、量案，是封建政府据以征税的土地帐籍。—编者。

现为中央官府的量田与两班地主的反量田。在丈量田地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豪强两班威逼或收买量田官，使其免登或少登土地结数，随意编造田籍，有的甚至根本不丈量田地。曾任全罗道量田御史赵存诚，于1604年2月的驰启中说：各道官吏，平时并不量田，只在我到村边时，才随意编造量田帐籍，设法推托未曾量田的责任。^①到1604年，量田虽暂告一段落，但其结果与当初的期望相距甚远。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班地主的扩大田庄和田地兼并的无限发展。

此外，封建政权从1610年后准备重新实行号牌法，以便控制与扩大剥削对象，但在土地兼并日益猖獗，人民流离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号牌法于1625年和1626年两年，仅在个别地区的有限范围付诸实行，而马上就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它还是加强了对良人农民的控制和剥削，尤其是对壬辰战争中立军功而成为良人的奴婢，实行了很毒辣的“刷还”和“复户”等措施，强迫他们追缴几年的身贡与赋税。同时，找回在战争中摆脱约束、流浪全国各地的部分奴婢，对他们进行无限制的剥削。

十七世纪初以来，地主阶级集团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土地兼并空前剧烈。战后，各军营和中央官府以及部分官衙，经常以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数量过小或根本不拨为由，用自行解决经费的名义，纷纷设置屯田，剥削农民。到十七世纪中叶，屯田数目继续扩大，如在京畿道阳智县四个面的土地中，屯田就占一半。当时，宫房田的扩大也达到惊人的程度。每个宫的宫房田，少者数百结，多者千余结。两班、官僚和豪强们，积极参与土地兼并，以垦陈田名义进行的请陈，空前流行。地主的私人陈田，与日俱增。他们不仅兼并土地，还大量掠占渔箭、盐盆、森林、沼泽，

^① 《宣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一，37年2月辛卯。

不断扩大农庄。土地兼并的日益深化，使农民进一步破产，从而导致十七世纪时农民群众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这种情况必然造成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显著减少。据初步统计，到1625年全国实际交税土地不到六十万结，不交税的竟达四十万结之多。^①十六世纪，每年缴给户曹的田税约为二十万石，但到1630年却只有八万余石。

封建政府为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剥削。1602年以来，对农民课以三手米。最初，三手米只在京畿、忠清、全罗、江原四道范围内，按田一结米一斗标准收取，后来，则推行于全国，并扩增至田一结米二斗二斤。同时，还给广大农民强加上毛粮米、官隶米、五结收布、三结收布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不仅如此，战后贡物剥削也日益加深。因此，就连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滥征各种名目的贡物，其害甚钜^②。此外，广大农民还要担负繁重的兵役和徭役，每个兵役负担者，每年要缴纳布二尺。战后徭役负担更加繁重，封建政府和统治者大兴土木，重建宫殿、构筑陵墓、兴修庭园。这些劳役负担都落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就拿京城情况来看，1609年建昌德宫后，1613年又重建昌景宫。尤其是从1616年开始，进行了兴建仁庆宫、庆德宫等一系列大规模工程。

因此，经过长期战乱，遭受无情折磨，受到惨重损失的广大劳动人民，战后依然无法休养生息，继续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过着痛苦的生活。

^① 金世益：《朝鲜史》卷二，166页。

^② 《仁祖实录》卷十四，4年1月癸亥。

二、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党争

由于长期战争的严重冲击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快速发展，进入十七世纪后李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和斗争，使社会政治陷于混乱。

十六世纪末开始的东人与西人两派间的党争，到 1591 年又在东人派内部分裂成南人和北人两派。1601 年，北人派打败南人派后掌握了实权。不久，北人派又分裂为大北和小北两派。1609 年，大北派策划光海君登上王位后，在整个光海君执政的十五年间，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权。当时，摆在封建王朝面前的紧迫而繁重的任务，是对内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对外加强国防，抵御北方女真贵族的南下企图。但是掌权的大北派统治集团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热衷于党争，从而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西人趁此机会派金流玉、李贵等两班四处扬言，要求改变王室的现行政策、减轻人民的徭役、调整对明朝和女真的外交关系，又于 1623 年（仁祖元年）动用武力，驱逐了光海君和大北派人物，夺取政权，迎立仁祖，史称此为“仁祖反正”。在这次武装政变中，就连小北派也遭到镇压，北人派势力消灭殆尽。

可是，掌握了政权的西人派内部，又迅速出现矛盾。在武装政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李适，对新政权给自己的功劳所作的评价十分不满。恰在这时，他被任命为平安兵使兼副元帅，去平安道宁边赴任。于是他便在 1624 年 1 月，利用手中的军权动员宁边地区一万二千名士兵发动了武装叛乱，南下占领京城。但很快就被从平壤追来的平安兵使张晚部队击溃，叛乱终被平息。李适的叛乱，使国家军力消耗很大，首都亦遭战祸，李朝政府对内对外都更加陷入困境。此后，西人集团内部，又出现过多次分裂，到 1630 年分裂为老论和少论两派，一直持续到李朝末期。

这些党派之间的斗争，不管他们采取什么形式，标榜何种主张，喊出何种口号，其实质都是李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日益激化的表现。当时，有些官僚也承认：“其所争者宠利也，所贪者权势也，岂有协和徇公之理乎”。^① 党派斗争，就是他们之间夺取土地和劳力的斗争。1623年，西人派推翻大北派之后，就瓜分了大北派头领朴承宗等的“家舍田民”。

因此，。不管哪一派掌权，对内都没有进行过任何改革，反而助长了各种弊端；对外同样束手无策，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从而贻误了国事。激烈的党争不仅没有改变国家的困境，反而加深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

总之，十七世纪前期，朝鲜社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央集权统治日益衰弱，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国防力量不断下落，终于引起了外患。

三、人民群众抗击后金（清）的斗争

十六世纪下半叶到十七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这时，明王朝已无力继续维持东北地区的统治，而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势力却日益强大。他以赫图阿拉（今我国辽宁新宾）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势力，统一邻近女真各部，迅速壮大了力量。到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定都于赫图阿拉，称兴京，自封为汗，不断对外扩张。1618年，正式发动对明战争，当年攻陷抚顺城，成为严重威胁明朝和李朝的强大势力。

面对这种威胁，明朝政府通过辽东巡抚李维藩，向李朝政府

^① 《仁祖实录》卷三，元年闰10月，辛亥。

请求支援。1618年李朝政府经过一场激烈争论，辽东出兵派取胜，决定派遣以姜弘立为五都^①都元帅、金景瑞为副元帅的一万三千名支援部队。朝鲜援军于1619年1月末越过鸭绿江，与明辽东经略扬镐的十万大军协同作战。朝鲜援军作为东路军配合明辽东提督刘挺，承担北上攻打兴京的任务。3月4日，两军在深河富东进行了决战。结果，明、李两军大败，朝鲜援军陷入包围。这就是历史上的“深河之役”。

此时，后金按既定方针派遣使者向李朝提出“和亲”，称：朝鲜无须以我为敌，双方以不打为宜。李朝统治者面对现实采取了同后金缓和的政策，接受了双方休战的提议。

1621年3月，后金连破明军，攻克沈阳、辽阳，清明交替的形势基本形成。当时辽沈一带的许多汉人纷纷东迁避难，不少人越过鸭绿江移居朝鲜。明将毛文龙借此机会避入朝鲜境内。翌年，他又打起抗金的招牌，集合汉族难民，以铁山椴岛（皮岛）为根据地驻扎军队，一面向李朝求援，一面扬言进攻后金，这使朝鲜和后金的关系再趋紧张。

在这紧要时刻，李朝统治集团的党争继续激化。掌权的西人派扬言：“奴酋一小丑耳，我国数千里地方，岂无制敌之人”^②，过低估计后金的力量，采取“崇明排清”的对外政策，竟然断绝了同后金的一切关系。仁祖集团对后金的公开敌视态度和毛文龙军的驻扎椴岛，给后金统治者提供了入侵朝鲜的借口。

1626年努尔哈赤逝世后，后金统治集团根据“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尤，次犯山海关、宁城等”^③的战略方针，把攻击的

① 指平安、黄海、京畿、忠清、全罗道。

② 《仁祖实录》卷五，2年3月，戊辰。

③ 《仁祖实录》卷十四，4年1月，癸亥。

目标转向朝鲜。1627年1月13日夜晩，后金阿敏率兵三万，突然渡过鸭绿江，进犯朝鲜，围攻义州。他们在李朝仁祖统治集团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快攻克义州，并继续南下围攻郭山。定州、宣州、郭山等地朝鲜爱国军民奋起迎击后金的入侵，在凌寒山城展开英勇的战斗。后金军攻陷凌寒山城后，向清川江流域的要塞安州发动进攻。安州城军民在南以兴、金俊等人的指挥下，浴血奋战，抗击金军。

但是，面临危亡的李朝统治集团，却采取了可耻的逃跑主义和投降主义政策。平安监司尹暄、黄州兵事郑浩曙、体察使张晚等人，见到形势危急，便先后逃跑。于是，后金攻克安州、平壤，继续南下抵平山一带，形势相当严重。腐败的西人统治集团听到平壤失陷的消息，急忙离开汉城出奔。国王仁祖及其官僚集团，跑到早已预备好的江华岛，其他官僚们簇拥着王世子跑到全州。同时，派王族晋昌君向后金求和。

当时，后金入侵者已深入到朝鲜中部，军粮和饲料的供应异常困难，无法长期打下去，加上朝鲜人民义兵斗争日益高涨，使他们的后路受到严重威胁，他们担心陷在朝鲜战场上拔不出腿，影响对明作战的大局，同时又考虑到跟朝鲜达成和约，可以解决明的经济封锁给后金带来的困难，于是，后金统治者便同意了阿敏所提出的后金兵不再南进以待和约缔结的主张。

三月三日，李朝和后金之间达成和约，规定后金退师，不留在朝鲜，自今以后两国兵马不越鸭绿江一步，各守封疆，永世和好，两国建交，进行贸易，如明朝和后金交战，朝鲜严守中立。但是后金原本无意严守和约。和约缔结后，后金军开始撤退，但他们“虽退，而山路海郡四出杀掠子女财富”。^① 渡过清川江后，

^① 《仁祖实录》卷十五，5年3月，丁丑。

他们就更以攻打毛文龙军为借口，不再撤退。妄图等到青草长出，能够解决军马饲料时，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

后金对朝鲜的入侵，激发了朝鲜人民英勇抗敌的斗志。清川江以北地区的人民，早在一月末就掀起义兵斗争，威胁后金军的后路。此后，清川江以北各地很快开展激烈的反抗后金入侵的斗争。义州、龙州、铁山、宣州、郭山附近，出现了郑凤寿义兵部队、少为浦义兵部队、铁山义兵部队等强大的义兵队伍。其中最著名的是郑凤寿领导下的以龙骨山城为根据地的义兵斗争。

郑凤寿原为武官，曾在壬辰战争中立过战功。他于1627年2月入龙骨山城，“招谕龙、义、铁三邑人稍来集几至四千”^①，成立了义兵指挥部。他们受到清川江以北直到鸭绿江边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声援，迅速发展成强大的义兵队伍。他们到处奇袭后金军，并给予歼灭性的打击。惊慌失措的后金军，先以降诱之，企图瓦解义兵队伍。他们派降人张士俊等前去劝降“胁曰，如不降附非但于汝有害，百姓祸。”^②但郑凤寿率领义兵“斩士俊及其同谋者十余人”。^③诱降的失败，使得后金军不得不以军事进攻代替前者，于是三月中旬，他们动员在义州、昌城、郭山等地留阵之兵，五次围攻龙骨山城。守卫军民毫不畏惧，“城中男女以矢炮石三物，一时俱下，先锋数百余骑一时立死”^④，终于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后金将领刘海又使用了新的花招，派降者行使军官崔有率五十骑，“偕进龙骨城，谕以出城之意”，遭到城内人民的断然拒绝，遂退。于是自称后金名将的刘海，便亲率大军再

① 《仁祖实录》卷十五，5年3月，丁丑。

② 《仁祖实录》卷十六，5年4月，辛丑。

③ 《仁祖实录》卷十六，5年4月，辛丑。

④ 《仁祖实录》卷十六，5年4月，辛丑。

次攻城。时“城中寂无人声”，待敌四面登坂发动最后一次攻击时，“城中一时石车炮矢俱发”，后金军遭到可耻的失败，“死者甚众”，丢下众尸首向义州方向仓皇逃去。郑凤寿领导下的义兵斗争，一直持续到当年七月。

与此同时，义兵斗争在清川江以南地区也有发展，平壤、江西、龙冈等地都有强大的义兵队伍，给后金入侵者以沉重打击。

八月上旬，后金军暂时被迫撤离朝鲜。虽然后金入侵朝鲜北部为时仅几个月，但它造成了相当深重的灾难，尤其在清川江以北地区更为严重。因此，如何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休养民力，加强国防，防御后金的再次入侵，是当时摆在李朝政权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但是，以仁祖为首的统治集团不仅没有采取任何相应措施，反而以更加疯狂地榨取劳动人民来弥补战争中的损失。他们根本不吸取当年遭到后金入侵的沉痛教训，对后金的新的威胁完全丧失警惕，采取了放弃清川江以北地区，撤消清川江以南防务的“清北清野之计”。对此，清北人民纷纷表示：“避贼而出去死也，战而死亦死也，等死也，宁一战而死！”^①坚决反对统治集团退让逃跑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永柔县令郑麒寿上疏奏称：“清北乃祖宗之疆土也，非殿下抛弃之地也”。^②但是，仁祖统治集团却忙于准备一旦事发便逃奔江华岛和广州的事宜。1631年，仁祖下令江华岛储备十万石军粮。同时，动员大批劳动力在南汉山城修建工程，运进一万四千三百石军粮和大量武器，以备保全自己身家性命。

这时，后金集团全力进行了夺取全部东北和袭扰明朝腹地的

① 《仁祖实录》卷二十五，9后7月，辛巳。

② 《仁祖实录》卷二十五，9后7月，辛巳。

战斗。他们很快征服了辽西和鄂嫩河、尼布楚河一带的蒙古茂明安部以及贝加尔湖以东的使鹿部，势力日益强盛。这样一来，他们便又无视和约，再次公开地向朝鲜提出掠夺性要求。他们常常派兵越过鸭绿江，甚至到平壤索要粮食，指使士兵砸破郭山官库，闯进民家进行掠夺。他们乘仁烈王后国葬之机，又派户部承政马夫太、承政龙骨大等往朝鲜，强迫朝鲜称臣。这种傲慢无理的要求，激起朝鲜人民极大愤慨，迫使昏庸无能的仁祖统治集团，不得不同后金断交，并诏谕全国“忠义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从征，期于共济艰难，以报国恩”^①。

1636年3月，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改国号为清，要求李朝驻沈阳使节参加称皇典礼，表示祝贺，同时通谍仁祖：要求朝鲜称臣，不然便以兵戎相见。

在清朝的再次武装入侵已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李朝统治集团也只不过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抗清，并未作任何实际准备，事实上当时朝鲜也毫无防御能力。

1636年12月，清太宗率十二万大军突然侵入朝鲜，前锋马夫太军直扑京都。李朝封建统治集团连续接到元帅金自占关于安州失陷的报告和敌军前锋通过开城的急报。至此，以仁祖为首的统治集团再也不能大谈豪言壮语了。他们先将家室送往江都，然后逃离汉城避之南汉山城。清兵很快攻占汉城，并继续南下包围了南汉山城。当时，李朝封建政府在南汉山城集中了一定的兵力，除原负责京都防卫的一万三千八百多名士兵外，还有由都元帅率领的御营军五千余人，并储备了可用六、七十天的一万四千三百余石军粮。

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城内的爱国军民预见到粮食的困

^① 《仁祖实录》卷三十二，14年3月，丙午。

难，勒紧腰带节省口粮，冒着刺骨严寒英勇抗战。他们屡次出城袭击清兵，使敌不敢近前。同年12月18日，负责防守北门的御营大将元斗杓，率兵出城突击，重创清兵，大大鼓舞了艰难抗战中的爱国军民的斗志。其后，自募军也几次出城打击敌兵。尤其是24日，四百多名守军出城袭击，取得重大战果，歼灭了敌军一百余名。

但是，两班出身的大多数将领，却怕的要死，不敢出城抗战。对此情景，有些官僚也无可奈何地叹谓：士兵都愿出战，但将帅却一个也不敢出城，不知为何？1637年1月23日，江华岛被清军攻破，逃避在那里的王子、王族和大臣的家室被清兵俘获。消息传来，守在南汉山城的国王和大臣们急忙准备投降。主和派人物申景禧、具宏、具仁垢等与洪振道密谋，逮捕斥和派，逼迫国王议和。1月30日，国王出城投降清兵，承诺清方提出的朝鲜对大清事人臣之礼，送人质、贡岁币，与明断绝国交，助清攻明，派发援兵等无理要求。这样爱国军民四十五昼夜的浴血奋战，由于统治集团的背叛而付诸东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根据和约，清兵携俩王子和斥和派人物洪翼汉、吴达济、尹集以及成千上万的无辜被虏人民撤兵。这次入侵中，“京城居民受祸最酷，余存者只是未满十岁之儿，年过七十之老人，而举皆饥冻垂死”^①。

清兵的第二次入侵，促成了朝鲜各地爱国人民反清义兵斗争的第二次高潮。平山、海州、平壤等地爱国人民紧密配合南汉山城爱国军民的英勇防卫，积极展开义兵斗争。朴铁山领导下的义兵队伍，在赤山（今平安南道龙冈南六十里）与清兵主力进行战斗，沉重打击敌人，英勇地坚守了阵地。为纪念赤山勇士们的英

^① 《仁祖实录》卷三十四，15年2月，癸酉。

勇奋战，后人称赤山为义兵山。具有反征服、反侵略斗争传统的清川江以北地区的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义兵斗争。宣州义兵采取隐避埋伏突然袭击的战术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救出了敌人从京畿、西北地区虏走的一千多名俘民。少为浦人民自从1637年2月初奋起抗战后，直到敌人全部撤兵为止，先后坚持七个月的斗争。他们仅在三、四两个月，就进行了大小六十余次的战斗，杀伤很多敌人，俘敌一千三百余名。

尽管以国王为首的李朝统治集团采取投降主义政策，给义兵斗争的发展造成很多障碍，但是先后掀起的全国性两次义兵斗争高潮，却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捍卫民族与国家独立的斗争传统，有力地打击了入侵的清军，保卫了国家的疆土。

第二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十八世纪初 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壬辰卫国战争的严重创伤和女真的几次入侵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掠夺，使社会生产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战后由于劳动人民为早日医治战争创伤作出不懈的努力和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和平环境的持续不断，以及孝宗等人积极任用金堉及其他爱国者，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到十七世纪后半叶～十八世纪初，社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逐步扩大。载入田籍的耕地面积，1611年前后为五十四万一千多结，1719年，增加到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余结。其中纳税土地超过八十万结。据记载：“至今（1688年”，不仅人口增长为壬子年（1612）一倍，就连山区和

沿海的寸土之地亦全被开垦，没有一垄空闲土地”。^①这时，水田面积显著增加。1720年，全国旱田为八十五万五千结，水田为五十万九千结，水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尤其在南方各道，水田已占一半以上。

十七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水田面积的扩大和插秧法的进一步推广，李朝封建政府和广大劳动人民对水利灌溉事业给予更大注意，把它看成“民事之本”。封建政府于1662年设置堰堤司，由高级官员担任堰堤司官吏。1730年把堰堤司归属于最高权力机关备边司，并令八道调查道内水库，报告失修情况并进行维修。在全国范围内积极鼓励修复堰堤。全罗道全州地区农民兴修堰堤，灌溉了一千三百多结的田地，1714年他们又兴修了能灌一万余石落种之田的水利设施。水利灌溉事业在北方地区也有发展。端川地区农民行动起来，“凿山通渠，灌溉至土”兴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这些水利灌溉设施的恢复和扩建，对发展农业，尤其对水田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农业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这时出现了一些新农具，广泛地推广了水田插秧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量。到十七世纪后半叶—十八世纪初，插秧技术的推广超出三南地区，在京畿、江原、黄海等地广泛推广，并普及到平安、咸镜的部分地区。插秧技术的广泛普及，对节省劳动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时，大麦和小麦生产技术也有新的改进，一斗落种之田可得一石收获。年两熟的农作法也逐渐推广，在日照时间较长的南方，旱田的二茬耕种技术已经普及，水田也采用了插秧之前种大麦的二茬耕种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经济

^① 转引自《朝鲜全史》卷十，177页。

作物的种植更加扩大，尤其是种植棉花有了迅速发展。除南方外，黄海、平安等地也都全面普及，甚至咸镜道南部地区也种起了棉花。据《备边司腾录》1717年五个道的统计，棉花种植面积达一万五千八百结。可见当时全国种棉面积的扩大。这个时期出现棉花生产的专门化和区域化倾向。到十七世纪，忠清道沃川等地区，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种棉的棉农，成为全国种棉的中心地区，除棉花外其他商业性农业也得到发展。黄烟、辣椒、角瓜、人参等的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黄烟大约在十六世纪末传入朝鲜，到十七世纪已广泛种植，甚至成为对外输出品。朝鲜自古以来有名的人参生产，也有新的发展，开始采用人工种植法。到肃宗时期开城以及全罗道的许多地方，先后成为人参的主要产地。从此，开城人参大量加工成红参，输出到中国。黄烟、人参生产的发展，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给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很大刺激。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加。据《李朝实录》记载，全国人口1675年为四百七十万三千五百零五人，到1717年增加为六百八十万九千七百十一人。

二、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手工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官营手工业的衰弱和私营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兴盛。

十七世纪以来，官营手工业，由原来的身役制度变为雇役制，从而逐渐走向衰弱。曾在官营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的造纸业，由于手工业工人在壬辰战争中的流散，迄今未得到恢复，

“造纸署甚残敝”^①，后来不得不停产。做为国家出版机关的校书馆，也“自壬辰兵乱散失之后，更不能铸（字），只以木字印册”，处于“请工匠等粮料役”的情况。甚至掌管修建宫殿的宫都监也无法保证劳力，不得不雇地方手工工人。

由于手工工人从身役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了能够发展私营经济的自由；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衰弱，官府需要的手工业品只好求助于私人手工业；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民间手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尤其是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商品货币经济的兴盛，专业性手工业取得很大成就。原有的专业性手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出现了拥有数十名手工业者的铁匠炉，还形成了专门制针的针店等新兴手工业作坊。以至于“山峡则有水铁匠，磨造匠，浦泽则有柳器等匠”^②。

这时期，适应长期战争需要，鸟枪、大炮、地雷炮、佛狼机等武器制造业有显著发展。当时，鸟枪制造技术明显提高，制造出大量的效能极佳的鸟枪，组织特种兵“鸟枪部队”，在战斗中起了中坚作用。因此，清朝几次提出要求朝鲜输出鸟枪。1693年初朝鲜开始进行铸造一千七百门大炮的宏大工程。这时期大炮有效射程达840~960米。尤其孝宗时期就已出现射程2280米或2400米的大炮。^③各种兵车的制造技术也很发达，先后出现尹镐设计的“五十鸟铳，以次自放”的兵车^④和金万基设计的“一车载铳五十柄，一端动火，则十铳俱发”的火车。^⑤

① 《英祖实录》卷一百一，40年8月，癸丑。

② 《肃宗实录》卷十，元年9月，辛亥。

③ 《承政院日记》，肃宗19年2月13日、孝宗3年2月5日。

④ 《肃宗实录》卷二，元年2月，己酉。

⑤ 《英宗实录》卷二十二，5年4月，乙未。

输器手工业也有发展。当时，在家庭生活中，广泛使用了各种输器，如酒器、文具等，它促进了输器手工业的发展。开城、安城等地是全国输器手工业发达地区之一，出现了输器店。造纸业也有了发展。三南地区的造纸业，尤其是寺院经营的造纸业很兴盛。造纸业很快发展成为寺院的主要手工业，出现了全罗道顺天大广寺等专门纸所。造纸质量显著提高，生产了质量较高的各种纸，其中大好纸、小好纸和白绵纸很受国外的欢迎。

矿业也有了发展。金矿发展虽很缓慢，但银、铅矿却发展很快，尤其是银矿发展甚快。这与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需要大量的银货以及银矿盈利的增加有关。封建政府为解脱财政困境，对私营矿业采取了新的政策。改变原来严加封锁的政策，实行了“设店收税”措施。1651年，封建政府决定“官设店于坡川、交河、谷山、春川、公州等地，募民许采，使之收税”^①。设店收税的实施，意味着打破政府垄断矿业的局面，正式承认私营矿业的合法地位。从此，银矿迅速发展。到1687年，仅政府正式承认的银矿就有成川、高原、谷山、盈德、伊川、古阜、忠州、扬州等六十八所，“银店遍于诸道”。^②同时，金矿、铜矿和硫矿也有开采，但由于李朝封建政府对这些矿业严加控制，发展缓慢。1706年政府决定对金矿也实行“设店收税”的政策。

此外，纺织、瓷器、竹器、木器、扇子、笔、墨、砚台等手工业生产也都有发展。

三、商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商品生产有了提高，商品流通也得

^① 《万机要览》，财用编四。

^② 《万机要览》，财用编四。

到发展。当时，商业发展的突出表现是集市的广泛出现。迄至十六世纪末，集市大体上只在近畿以南地区开市，但到十七世纪，几乎全国各地普遍形成五日集市网。据《潘溪随录》，十七世纪时各州、郡、县的村庄，都有五日集市，农民经常到这里做买卖。

封建政府原来对集市实行禁止或控制政策。但到肃宗时期，考虑到征收集市税，补充财政来源，为开设官营店铺垄断集市利润，便全面废除了禁压政策，实施征收集市税的政策。从此，集市有了显著发展。肃宗时期，已普及到偏僻的山沟，如黄海道谷山等地都出现了集市。十八世纪时，全国集市已达千余处。

这些集市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府直接经营的；另一种是民间集市。前者一般开设于邑矿或驿站附近，所谓的“邑内场”，“官邑场”就属于这一类；后者避于官府的控制，一般开设在偏僻的地方，所谓“空场”就是这一类。集市一般五天开一次，每次集市不仅有邻近居民相互交换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日用品，而且有来往于各集市的裸负商从远地带来各地特产品进行交换。特别是在港口附近的大集市，还有船商。集市一般是综合市，也有专市，如大邱、清州、公州等地每年春秋两次开有药令市，买卖中药材。集市由监考直接管理。官营集市由政府直接派下级官吏充当监考，民间集市则由集市商人共同推荐产生监考。在集市上活动的还有客主、旅阁、居间、高利贷者。

当时，集市交易非常活跃，商品交易量也很大。1680年庆尚道丰基集市税额，一年竟达谷物300余石。

随着集市交易的发展，店铺商业也繁盛起来，它是集市交易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前由于封建政府的垄断和控制，开设店铺限于享受特权的封建御用商人，民间商人的店铺是罕见的。但这个时期，政府改变政策，允许民间开设店铺，征收店铺税。从此，

不仅京畿而且各邑、镇、驿站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民间店铺，店铺商业很快得到发展。它不仅为交易的经常化提供了方便条件，而且促进了商业中心地的形成。到十七世纪末，忠清道的恩津、江景和咸镜道的德源、元山等地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地。十七世纪后半期，京江商人和开城商人（松商）在商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京江商人在京都垄断谷物和鱼类，开城商人则在全国各地开设支店松房，积极进行商业活动。

十七世纪后半叶~十八世纪初对外贸易有了很大进展，尤其是私营外贸显著发展，压倒了官营外贸，在对外贸易中与中国的贸易更为活跃。当时，中朝贸易主要分两种形式进行：一是在两国边境定期开设的互市贸易；另一种是通过政府使臣进行的使行贸易。边疆贸易主要在鸭绿江沿岸和图们江沿岸边境城镇进行。鸭绿江沿岸的贸易称中江开市（因为贸易进行在鸭绿江中的岛屿上），图们江沿岸的贸易称北关开市。北关开市又有会宁开市和庆源开市。会宁开市是1638年“宁古塔（现今黑龙江省宁安）、鸟喇（现今吉林省吉林）两处人（指女真人）持户部票文，来贸农牛、农器、食盐，是为会宁开市，后以为例，逐年开市。”^①。会宁开市，有时每年开一次，谓之单开市，有时每年开两次，谓之双开市。其后，1646年“岩丘赖达湖户人（亦指女真人）来易牛、犁、釜于庆源，是为庆源开市，后以为例”。^②。从此，北关开市定期在会宁、庆源等地进行，其规模逐年扩大。“开市之初，人畜之来不过十五六，交易即去。其后，彼我之人互相贪贸，弊端滋兴，人畜近千，而驼、骡过之，留滞至八九十日，差

① 《万机要览》，财用编五，北关市。

② 《万机要览》，财用编五，北关市。

需供亿，几竭一道之力”。^① 仅 1651 年（孝宗二年）“清差到咸镜道开市，求买牛一百五十头，盐一千石，白纸一万卷，铁锅二千五百，釜二百五十，及绵布等物”。同年，“清人开市于会宁，贸取牛五十八头，木绵三十七匹，布四十五匹，白纸九百三十四卷，釜子一百六十坐，犁口二百三十一，盐四百二十六斛而还”。当时的主要交易品是：朝鲜进口以羊裘、鹿皮、小青布等皮类为主，出口有牛、马、铍、食盐、锅、白纸等。中江开市始于 1593 年（宣祖二十六年），当时“因国内饥荒，相臣柳成龙建议，移咨辽东于鸭绿中江开市交易，此中江开市之始”。^② 此后也曾罢市几次。到 1646 年（仁祖二十四年），“因彼咨复设，定以三、九月十五日两次交易，旋改以二、八月”^③ 李朝政府为准备中江开市，托汉城府、开城、黄海道、平安道等地 223 名商人准备贸易物，一般参加中江集市的包括义州商人约达三、四百名左右。中江开市，起初只进行公家贸易，但后来非正式的私人贸易越来越活跃，往往压倒公家贸易。随着对清贸易的发展，又出现了栅门后市。义州和开城等地商人，每当使臣赴清时，混入驿卒或奴仆中间带着人参和银子，渡过鸭绿江，到凤凰城栅门进行私人贸易，称此为栅门后市。栅门后市中，使行贸易占重要地位。当时，栅门后市很活跃，尤其到十七世纪七、八十年，发展非常快，也很兴盛。“后市之数，一年至为四五次，而每次银或至为十多万，合每次使行，应带八包，计之则一岁渡江之银几至五、六十万”^④。随着栅门后市的繁荣，中江后市便有名无实，

① 《万机要览》，财用编五，北关市。

② 《万机要览》，财用编五，中江开市。

③ 《万机要览》，财用编五，中江开市、栅门后市。

④ 《万机要览》，财用编五，中江开市、栅门后市。

遂于1700年“罢中江后市”^①。到十八世纪，栅门后市几乎成为中朝两国商人私人贸易的唯一中心据点。栅门后市的主要交易品，清朝为绸缎、白布、药材、宝石、眼镜和文具；李朝为人参、银子、纸张、丝绸、夏布和毛皮类等。对清贸易中，私人贸易占支配地位。商人中起重要作用的有开城、京畿、义州、平壤、安州等地商人。他们几乎掌握了对清贸易的实权，逐渐成为李朝封建国家的御用商人集团。这时，与日本的贸易也有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规模空前扩大，二是私营贸易占优势。当时，日本掌权的德川幕府执行和平外交政策，恳求朝鲜恢复和平关系。李朝政府为防止可能发生的日本海盗侵犯事件，并在对日贸易中得到必要的物品，遂于1609年（己酉）与日本缔结贸易协定，此称为《己酉约条》。该协定规定：朝鲜政府允许日本幕府每年以“国王使臣”的名义派遣两艘船和对马岛领主派遣的“岁遣船”二十艘。此后对日贸易转入正常化，得到迅速发展。每年有四十余艘日本大小贸易船只来到釜山倭馆进行贸易。当时对日公家贸易规模很大，到十七世纪中叶，朝鲜每年向日本输出的棉布竟达四万五千余尺，大米达一万九千五百余石。同时，从日本输入铜二万九千余斤，铅一万六千余斤。在对日贸易中，私营贸易也占重要地位。这些私营贸易主要通过东菜、釜山倭馆，由译官和商人进行。1673年（显宗十四年）住在倭馆的日本人竟达一千余名^②，其中大部分是从事贸易的商人。倭馆贸易之初，“只一个月三市，光海庚戌（1610）增加为六市”^③。李朝政府根据日益繁荣的朝鲜贸易的需要，1691年指定汉城和地方的富贾

① 《万机要览》，财用编五，中江开市、栅门后市。

② 《承政院日记》，显宗14年7月5日。

③ 《万机要览》，财用编五。

三十名，专门从事倭馆贸易。他们除公家贸易外，兼搞黑市，常常牟取很大的利润。日本商人回避李朝官吏的监视，到加德岛进行黑市贸易。1664年闰6月，东莱“商贾林之竹等以白金六千九百余两，换货石硫黄一万一千三百斤，黑角、长鸟铳长剑等物。”^①这充分反映当时黑市贸易的盛行。在对日贸易中，从日本进口铜、硫黄、铅、苏木、胡椒，朝鲜出口棉布、大米和人参等。

在对外贸易中，媒介贸易占很大比重。清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由于地理限制，必须以朝鲜商人为媒介进行。朝鲜商人一方面从清朝输入大量的棉丝，转卖给日本商人，另一方面又从日本输入金、银，转卖给清商。据文献记载，只1700年一年间，日本流入的银就达十二万两，^②这说明媒介贸易规模之大。

十七世纪后半叶～十八世纪初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私营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商业资本的积累，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给予积极影响。

第三节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扩大 大同法的实施

一、官房、衙门和官僚两班地主的土地兼并的盛行

十七世纪后半叶～十八世纪初，朝鲜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这时期，经过土地兼并，官房田、衙门屯田以及官僚两班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土地占有迅速扩大。与此相反，小农的土地占有则显著减少，对农民的剥削也更为苛刻。

① 《显宗实录》卷九，5年7月，戊申。

② 《肃宗实录》卷三十一，26年4月，壬辰。

宣祖时期出现的宫房田，最初是有具体限制的，大君和公主不得超过二百五十结，王子和翁主不得多于一百八十结。但他们依靠王权以各种非法手段，即以折受^①、立案^②等各种名目掠夺了大量土地、山场、渔场、盐釜等。于是，宫房田便迅猛增长起来。据黄海道监司姜柏年统计，1662年“本道内宫家设庄，合计九十二处”^③。甚至小邑信川一郡，“诸宫屯田”也“多至十二处”^④。

可见，宫房田已普及扩大到全国各地。宫房田的恶性膨胀，触犯了封建政府的利益，在封建官僚当中出现了必须控制宫房田无限扩大的舆论。在此种情况下，封建政权实行了“级价买土制”，即由政府支出相当于地价的银两贷给宫家，叫宫家购买自己所需的土地。然而级价买土制的实行，更加促进了宫家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宫房收买土地，实际是以合法买卖之名行公开掠夺之实。级价买土制是当时迅速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渗透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产物，它促进了土地的商品化，加速了宫房的土地集中。所以，到十七世纪末出现了不少占有五千—七千结土地的宫房，宫房田的剥削也更加残酷，一般比政府的剥削量高一倍，如“户曹之税，一结不满二十斗”^⑤，“而诸宫之税，为四十斗。”^⑥

这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也疯狂地兼并土地。到处

① 封建官吏或地主土豪获得国家分给的土地。

② 李朝为奖励开垦。凡愿开垦无主土地者，可向国家申请占有这块荒地，称为立案。

③ 《显宗改修实录》卷八，3年12月，丙午。

④ 《显宗改修实录》卷七，3年8月，甲辰。

⑤ 《肃宗实录》卷二十七，20年7月甲申、10月。

⑥ 《肃宗实录》卷二十七，20年7月甲申、10月。

设立和扩大衙门屯田。尽管在 1662 年官吏们就纷纷上疏“请罢各衙门屯田，并归户曹”^①，其后这些呼声越来越强烈，但衙门的土地兼并却日益发展，到十八世纪中叶，各衙门的屯田竟达二万二千余结^②。

官僚、两班地主的土地兼并也不次于官房和衙门。他们扩大土地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他们大多是靠特权强占的方法扩大土地面积。这些人不仅强占民田，甚至肆意吞掉国家的公田。可是，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十八世纪以来，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在农村中的渗透，利用经济手段即廉价收买破产农民土地的办法，逐步成为掠夺土地的主要方法。他们普遍利用养户、高利贷、退赌地买卖等手段大量掠夺了农民的良好田。他们还并占山场、盐釜、渔场等。这时，富商们的土地收买也很厉害。1718 年前后，开城商人收买了几乎整个长湍郡松西面的耕地和山场，并曾长期策划把这些土地划入开城府。此外，开城商人还在京畿道和黄海道收买很多土地。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大约自十七世纪后半期至十八世纪前半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官房、衙门、官僚两班地主以及富商的土地兼并，大地主土地私有化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在土地兼并过程中，以高利贷剥削及其它经济手段，掠夺土地的现象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在政治上反映了李朝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衰弱和封建统治体制的紊乱；在经济上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

大地主土地私有制迅速扩展，不仅对农民，而且对李朝封建政权也是一种沉重打击。同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封建依附关系

① 《显宗改修实录》卷六，3 年 9 月，癸巳。

② 《英宗实录》卷九十一，34 年 4 月，辛未。

也随之削弱，而两者间的经济关系却逐渐增多。这些变化不仅影响到封建的剥削方式，而且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瓦解准备了条件。

二、大同法的实施

进入十七世纪以后，李朝封建政权加强了对农民的贡物剥削，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和极大痛苦。贡物剥削的残酷性，主要表现在贡物品种繁多和数量之惊人。随着封建地主阶级豪华奢侈欲望的增长，统治阶级便对当地的土特产不感兴趣，而极力追求其它地方新奇物产。

当时较为稀少的人参、白银等几乎成了主要的必贡物，增加了贡物承担者的困难。不仅如此，上缴贡物如在运输途中变质，还要重新筹措；有些贡品即便已经运到京都，如不中意，也要退回、还得重纳。但是比这更为残酷的则是下级官吏的中间剥削和防纳。

京都的各官房和各司，从十七世纪以来，主要依靠防纳人征收贡物。防纳人是京都及其它城市的商人和官家或两班官僚地主的代理人。观察使、郡守和县令冒防纳人之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些人常从农民那里征收比实际应缴贡物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贡物。仅以1601年的情况为例，防纳人将一斤人参折价为十六匹棉布，一张豹皮为十七匹棉布，一张阿多介（虎皮做的垫子）为二百匹棉布，一斗银杏为八十斗米，几升大枣和栗子竟相当于几匹棉布。贡物剥削的日益残酷，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同时由于防纳人的从中作弊造成国库收入的显著减少。李朝封建政权痛切感到继续这种传统形式的贡物剥削不仅困难而且无利可图，为了缓和政治经济，有改变这种剥削形式的必要。大同法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当时，李朝封建社会已经具备了实施大同法的主客观条件。首先，从历史上看实行贡物地税

化的条件就已成熟。李朝封建政府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已曾实行按田亩征收贡物，摊派徭役的办法。尤其是曾多次实施过收米法。1569年，李栗谷就曾揭露过贡物制度的弊害，鉴于某些地方业已实施收米法的现实，主张采用每结土地征收大米一斗的收米法，但未被采纳。其后到1594年，李朝政府根据柳成龙的提议曾废除贡物制度，试行收米法。该法规定，每结土地征收大米二斗，不管路程远近，全国八道都要将米运至京都。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还不发展，不能随时用粮食购买所需物品，不久收米法就被废除。但是，上述这些情况却为后来实施大同法提供了很多经验。

其次，实行了土地丈量，掌握了土地面积。李朝封建政府为实施收米进行了土地丈量，原则上规定已丈量土地的地方实施收米法。尤其是1634年在下三道（全罗、庆尚、忠清）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丈量。通过这年开始的土地丈量，封建政府掌握了八十九万五千四百八十九结的田土，基本上统治了全国的土地，为实施大同法准备了条件。

再次，进入十七世纪，尤其是后半期以来，以民间手工业为中心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实施大同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李朝封建政府为控制防纳人的中间剥削，缓和农民的反抗斗争，保证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用征收大米的大同法代替了旧的贡物剥削制度。当时，大同法的实施遇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官吏和大地主们的反对。因此，根据领议政李元翼的积极主张，从1608年起，先只在京畿道试行，然后再逐渐扩大到其他道。

大同法是采纳韩百谦的建议而实行的新的收米法。它对原先的柳成龙的收米法作了若干修改。新的收米法规定：为了便于运

输，山区各邑以棉布代替大米，人们难以缴纳的进上品和杂役也一概以米代替。同时决定，在京畿地区从前向中央各司和各官房缴纳的常贡也一律改为征收大米，这种税米则称为大同米。大同米，每结田征收十六斗（分春、秋两季征收，每季各征八斗），其中十斗拨给宣惠厅用于官房和中央各司费用，其余六斗拨给地方官厅，用于地方官厅和接待外宾的经费。于是，原来征收土产的贡物制度一律改为征收大米或棉布的制度，正因为如此，才“统而名之曰大同（法）”^①。同年五月，李朝政府新设“宣惠厅”，专管有关大同法事宜。

京畿试行大同法，效果甚为显著。1623年吏曹正郎赵翼指出贡物制度的弊害，建议在更广泛的地区内推行大同法。李朝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便于是年设立三道大同厅，准备在江原道、忠清道和全罗道实行大同法。但是，大同法的推广速度非常缓慢，到1624年才只在江原道推广开来。而全国的经济中心忠清、全罗、庆尚等三南地区，在其后的很长时期仍未能实行。忠清道是到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初，全罗道是到六十年代末，庆尚道是到七十年代末，黄海道是到十八世纪初，才先后实行了大同法。各地大同法的税额，一般是十二斗至十六斗。

可见，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试行的大同法，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平安道和咸镜道除外）实行起来，前后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漫长岁月。大同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得如此缓慢，并不是偶然的。它遇到很多官吏和大地主们的极力反对和破坏，它的按结征税不利于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不利于进行中间剥削的防纳人。因此，各地富豪设种种障碍破坏大同法的实施。同时，土地丈量也不及时，进展情况也不一致，加上布匹的地区差价，也

^① 《万机要览》，财用编三，大同作贡。大同法，亦称收米法、作法或宣惠法。

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大同法的实施。不仅如此，大同法实施初期特别是十七世纪前半期，手工业和商品货币经济与商品流通的发展也并不迅速，这些都制约了大同法的实施。

大同米对贫困的农民来说，仍然是沉重的负担。虽然实施了大同法，但进上和别贡依然存在，以各种名目向人民掠夺实物的现象仍未消除。但大同法代替贡物制度，毕竟是朝鲜封建剥削方式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显著地减少了防纳的掠夺，农民也无须到远地去办贡物，因而对农民来说多少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由于大同法的实施，封建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财政危机。据《李朝实录》记载，1663年全罗道缴纳大同米为十四万七千一百三十四石，其中上交宣惠厅六万一千二百八十石，留置本道八万五千九百十六石。宣惠厅作为中央各部经费支出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九石，地方作为正常经费只支出三万七千七百三十二石，因此中央和地方都有一定的结余^①。大同法的实施，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当时大量的大同米流入商品流通市场，亦即各级衙门把大部分大同米转交给贡人，让他们用大同米到市场上购进宫房和政府大量需要的各种手工业品。1717年宣惠厅和户曹作为贡价支出的大同米，竟达十六万石之多，被动员的贡人达七百七十名。政府以大同米直接投入到商品交换市场，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大同法的实施对促进货币流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1651年根据金瑱的建议，政府采纳了中央各司征收大同米，其一部分可用铜钱代替的决定。于是，1653年中央京畿宣惠厅的春季大同米改收铜钱，其它各道也改收铜钱，并成为一种趋势，到十八世纪初

^① 《显宗改修实录》卷八，4年3月，庚辰。

京畿道部分县份的大同米甚至已全部用铜钱代收。

三、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农民的反抗斗争

李朝封建统治刚医治好长期战争创伤，随即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统治。1640年汉城府实行“五家作统法”，严格控制劳动人民的流动。甚至到1675年实施“纸牌法”，决定十六岁以上男子随身携带注明住所、身役、姓名、年龄、身分的纸牌。两年之后，又决定实行挂号牌，残酷地取缔流民。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工匠的统治也同样残酷。1668年刑曹颁布八项禁制条例，汉城也公布两项禁制条例，甚至对一般商人的活动也严厉控制。

进入十七世纪后半期，大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各官房、衙门和封建两班地主施展出全部伎俩扩大土地面积，迫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当时，迅速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加快了农民的破产。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而沦为佃农，遭受地主阶级的地租剥削，还要受封建政府的沉重剥夺。

封建政府对农民的田税剥削非常沉重，当时三手米、大同米、五结收布等名目繁多的田税，一股脑压在广大农民的身上。

贡物剥削仍然是农民的严重灾难。政府在大同法实施的地方继续以“供上”、“进上”等名义掠夺各地特产。地方官府也从农民身上掠夺现物，他们用“雉鸡柴炭费”（野鸡、鸡、烧柴、炭的费用）等名义，收回地方官吏的酒肉花消和官府的烧柴费用，甚至有一只鸡折收棉布一匹的惊人情况。

军布、身布、价布剥削也越发严重。据文献记载，当时不到十岁的儿童也得承担军布，称此为“黄口征布”；甚至出现“白骨征布”，即对早已死去的人也不给注销军籍。不仅如此，还强迫征收胎儿军布，1660年“儿弱逃故收布”的竟达一万九千余

名。于是，不少地方出现军征数超过当地男丁数的情况。1702年庆尚道高灵村庄的实际男丁数不过一千四百五十七名，但登入军籍的却达一千八百八十六名。当时，封建政府还进行“族征”、“邻征”。对当时农民的这种情况，洪启禧说：“他们（指应缴纳军布的人）没有从祖先那里得到土地，只好耕种地主的地。一年收获不过十石，还得将半数交给地主，剩下的那一点怎能够缴纳相当于二十两的军布？”^①

奴婢农民的情况比良人农民更为悲惨。据1655年一个官吏的报告，在奴婢案里仍然保存着百年前早已死去的奴婢，把幼儿婢和其它奴婢非法登入奴婢案的，仅京畿地方就达三百之多。在这些奴婢当中，内需司奴婢的处境更为残酷。

除“军布”等身役剥削外，广大劳动人民还要遭受“还谷”等残酷的高利贷剥削，这些剥削进入十七世纪后半期则更加加重。1665年平安道有一个地方，还谷米为三十五万二千五百八十石，但其耗谷竟达三万五千一百七十八石。地方土豪地主，利用封建国家的还谷对农民进行高利贷剥削，从中谋利。1668年抱川县监李知白“累以不饥甚急赈谷不是为言，前后划给米租多至七百余石，今闻饥民之受米者不过数斗，而县居杨姓人士素称饶富者，独得五十石，反为营利之资。”^② 还谷剥削在全罗道地区更为严重。

当时，不少农民不得不“以五、六斗米或三、四十两钱出卖自身”，到处出现“流亡相继，愁怒日深，端川内奴至有缢死于

^① 转引自《朝鲜通史》上卷，第三分册，第877页，197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② 《显宗改修实录》卷十九，9年6月，辛未。

道旁者”^①。甚至出现“平壤馆军康时益之族属六七人，谋免一族侵征之害，并杀时益及其妻子七口”^②等悲剧。

这种情况遇到荒年更为严重，到十七世纪末尤其严重。据1696年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庆尚道，饥民就达五十六万，死者达数万名。^③1670~1671年，遭灾饿死者竟达一百万。全国乡村普遍出现“十室九空”^④的严重情况。

封建剥削日益加重所造成的极端贫困和连年灾荒，迫使农民奋起暴动，进行反对封建剥削的英勇斗争。

十七世纪虽然没有发生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但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民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

十七世纪前半期，各地人民普遍进行起义，尤其在反倭战争期间遭受严重战争创伤的全罗、忠清、庆尚等三南地区人民首先进行了起义斗争。此后，京畿、黄海、平壤等很多地区的人民，也相继组织了起义斗争。这时候，广大奴婢也纷纷投入起义。据《李朝实录》所零星反映的事实来看，奴婢起义有二十多起。

十七世纪后半期，由于连续发生空前的灾荒，加深了劳动人民的痛苦，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对当时的情况，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闾里民无乐生之意，举怀思乱之心”。于是，劳动人民的起义更加昂扬。1660年爆发了忠清道忠州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安岳、信川等地人民的反抗斗争。1667年初冬，江原道狼川地区爆发了起义，起义农民乘夜放炮袭击县监官吏们的住宅。1668年春，黄海道平山地区农民由反对官房地主的量田而发展

① 《显宗改修实录》卷十九，9年6月，辛未。

② 《显宗改修实录》卷二，元年3月，辛酉。

③ 《肃宗实录》卷三十，22年3月。

④ 《肃宗实录》卷三十一，23年7月，甲辰。

成起义，“冲火乱射本宫下人或中矢重伤，或焦烂几死，官奴脱逃仅生”^①

在这种规模较小，行动分散的农民斗争的基础上，进入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初，爆发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农民起义。1671年以全罗道金山郡为中心，在李光成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李光成与弟弟一起率领五十余名农民揭竿而起，一方面打进全罗道龙潭，砸开武器库，武装了队伍；另一方面打开政府粮仓，解决了粮食问题。于是，迅速扩大了队伍。就在这时，起义队伍内部出现叛徒，以李光成为首的五十余名农民军被捕后壮烈牺牲。可是，起义军的剩余部队坚持开展顽强的斗争，在处决叛徒权立之后，对金山郡守发动了猛烈的反击，很快赶跑了他。金山起义军的斗争，其后又持续了几个月，严重地威胁着封建政府。

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京畿道、忠清道等地的农民斗争更加激烈。在1695~1697年之间发生了本世纪以来第二次饥馑和疫病，农民起义更加风起云涌，爆发了张吉山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支起义军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走遍几个道，坚持了十多年的斗争。1697年封建政府派兵进攻农民军，但遭到失败。

十八世纪初农民起义继续发展。1703年爆发了忠清道天安、京畿道抱川、黄海道端兴等地的农民起义。该年三月，天安的无辜囚犯砸开牢门，展开英勇斗争。这时，正好全州邑吏驮运税布，在赴京途中到达天安。起义群众打败护卫官兵，夺得税布。这时候，全罗地区农民起义更加活跃。在长兴、卢岭附近均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

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起义重新高涨。1721年在全国

^① 《显宗改修实录》卷十八，9年3月，戊申。

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尤其是有斗争传统的端兴、安岳郡人民起义军，进行了英勇斗争。1727年爆发了以全罗道边山半岛和灵岩月出山为根据地的流民武装起义。

1732年在全罗道沿海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在珍岛和罗州管辖的几个岛屿上起义军势力很大，他们不仅铸造了货币，而且同走私船只有密切联系，控制了南海的海上运输。李朝封建政府为镇压这支起义队伍，曾密派两名军官前去侦察，但被起义军逮捕。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末，朝鲜北部地区的农民起义有了发展。1738年爆发了以平安道三登县为中心的流民起义。1741年在平安道、江原道、黄海道等地爆发了农民起义，特别是平安道地区的起义军发展很快，活动范围扩大到咸镜道地区。同年四月以池龙骨为首的起义军势力得到迅速发展，他把兵力分成几个团：即攻进汉城的为后西江团；攻进平壤的为废四郡团；还有由艺人组成的彩团；由流民组成的流团等。他们紧密联系，密切配合，与敌展开英勇斗争，不断袭击官厅和富豪，给封建政府以沉重打击。

这时的农民起义，一般说来，规模较小，多数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但是劳动人民的这种英勇斗争，使李朝封建统治秩序大为混乱，给统治阶级和封建政权以极大打击，加快了它走下坡路的步伐。同时，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军布法和身布法，调整或废除一些各种恶刑和恶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第四节 文化

一、实学的产生及其发展

实学产生于十七世纪。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朝鲜遭受了多次战祸，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受到极大摧残，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凡此种种促使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日益发展。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医治战争创伤，重整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十六世纪后期开始，封建统治阶级也曾采取一些措施，试图解决矛盾。但是这些措施反倒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勾心斗角越来越激烈，统治思想更趋反动。李滉和李珥学派的争论，逐渐丧失原有意义，反而围绕“四七论”、“人物性同意论”、“礼讼”等展开了无谓的纷争。十七世纪李珥学派的代表人物宋时烈，早已抛弃李珥学说的进步的因素，他一面为党争的合理性竭力辩护，一面给哪怕对朱熹观点有“一字致疑”的人、就扣上“斯文乱贼”的大帽子，借以除掉政治上的异己。

“斯文乱贼”的大棒毕竟压不住所谓“异端”的出现。一些进步学者哀叹“东人之学，难免鲁莽”。面临这一形势，有些两班出身，尤其是未曾涉足政权的两班和新兴庶孽以及中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痛恨“固陋狭隘”的恶劣作风，主张在学风上“大变机枢”，建立“致用于世”的学风。

徐景德的唯物主义和以李珥为代表的主气论的进步思想，对实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十五世纪以来，语言、历史、地理、天文、数学、农学、医

学等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实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朝鲜通过中国吸收了西欧文明。前往北京的朝鲜使者通过译成汉语的西欧科学技术和宗教书籍，了解到欧州的一些情况。还通过漂流到朝鲜的欧州人，了解到欧州的科学技术。

中国考据学对当时朝鲜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实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芝峰李睟光（1563～1627年）是实学的先驱者。

他把学问的基点放在用上。他说：“以谓为学之方，惟在知行二字”。“我谓学者非知之难，真知为难；非行之难，实践为难。其或知而不能行者，由不能真知故也”。^①

他是一位政府官员，年青时曾经历过壬辰卫国战争，先后三次出使中国。他对封建政府的种种弊端亲眼目睹，颇有感触，对西方和南方的情况以及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结合自己的研究成就于1614年写出了《芝峰类说》。该书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天文、历法、地理、医学、动物、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哲学等，有三千四百三十五条。他把上述内容按一定的属性分门别类，因而题名为类说。

他在介绍外国情况时，阐明了流传过程，说明了中国人的看法和态度，使读者增长知识，扩大眼界。他用六经以及小说诸集等三百八十八家著作，考证其事，加上自己的观点。

他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憎恨统治阶级的党争，高度评价历史上的爱国英雄。他肯定了郭在祐、金沔、金千鎰、高敬命、赵宪等义兵将领在壬辰卫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歼灭倭夷，恢复国家，全靠义兵的力量，并且赞扬了李舜臣在战术上的功绩。

^① 《芝峰类说》卷五，学问。

李睟光的《芝峰类说》，对朝鲜实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曾借阅《芝峰类说》手稿的金玄成说：“使人读之，开发聪明，进益智虑。”

实学派久庵韩百谦（1552～1615年），在朝鲜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建立了许多功绩。他用实证的方法考证了许多史实，著有《东国地理志》。

礪溪柳馨远（1622年～1673年）是十七世纪中期的著名实学家。他生于汉城两班家庭，从小讨厌科举，中年由于祖父的强烈要求，应举为进士。但始终未涉足官场，安居于全罗道扶安郡愚礪洞，研究了实学。

他的著作有《纪行日记》、《輿地志》、《东史纲目条例》、《东国历史可考》、《正音指南》、《纪效新书节要》、《武经抄》、《理气总论》、《论学》、《物理》、《经说问答》、《人心道心》等。他的著作，批判了朱子学的空理空谈，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很多未能出版，传至现在的只有《礪溪随录》一书。

他在书中提出了改革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方案。他运用历代思想家对该问题的观点和资料，论证了自己观点的合理性。

他重视土地问题，认为朝鲜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由于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他说：“大概今之零散以居，非民之罪也。地田既是为人私有，则势使然”^①。为了解决矛盾，他主张实行公田制，把私有土地归于国家，对每个耕者给予一结土地，四结出一军人，国家只取收获的十分之一。

他还主张对不劳而食的两班官僚加以限制，实行精减。但为了使他们能够研究学问，治理国家，分别给予二结乃至十二结的土地，使役奴婢耕种。

^① 《礪溪随录》卷一。

他主张改进耕作方法，整修和扩大水利灌溉设施，广泛利用山林河湖，发展手工业和商业。

他的方案比较系统，范围较广泛，在朝鲜历史上还是首创的。因此，当代人给予很高评价。有人说柳馨远是能够“治国安民”的大政治家。朴址源说他是可以承担起国家军政要务的人物，可惜未能实现。

上述实学家的改革方案，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们仍然站在两班阶级的立场。李晬光讲：“夫民，愚而不可诈也，贱而不可胜也，人主得之则为天子，失败为匹夫。故曰民者，君之天也”。^①柳馨远讲：“治于人者食之，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故立之君师，承以乡上，使尊民居，以其生。耕者出米，仕者受禄，而出米者，无过于什一而害于耕，无轻于什一而不足于用。然后可以裕民生而给国用”^②。可见，他们设想的“改革”，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减轻封建剥削，改善人民生活，用来缓和阶级斗争。

星湖李瀼（1682～1764年），继承前人的实学成就，基本上完成实学学风。

他不仅对儒学，对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农学等进行了广泛研究，还特别注意研究了朝鲜历史、地理、语言、风俗、艺术。

他反对天圆地方说，相信地圆说，但未能理解地转说。他对地震、地壳变动、潮水涨落等自然现象的理解是比较科学的。

他认为“法久弊生，弊必有革，理之常也”。在他看来，现实的土地所有关系是产生弊病的根源。因此主张实行均田制，把

① 《芝峰类说》卷三，兵政部。

② 《濠溪随录》卷十九，禄制。

一定数量的土地分给农民作为永业田，地多者除按规定留下若干土地作永业田外，多余的必须出卖或转让，以此限制土地兼并。

他批判身分制度，认为没有老百姓国王就无法生存，而没有国王老百姓也照样能活下去。他指出，奴婢法、科举制、崇尚门阀、贵贱嫡庶差别政策、僧侣儒生游手好闲之辈的非生产者的存在，是国家衰退的病根。

二、哲学思想

十七世纪朱子学说的代表人物尤庵宋时烈（1607～1689年）是政府高官、西人老论派的头子，曾受业于李珥的学生金长生，著有《宋字大全》。

他关于理气先后问题的观点，是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他说：“一阴一阳者气也，生阴生阳者理也”。意思是说，理生阴阳、理先于气。因此他明确地表示，“未生阳而已有生阳之理，未生阴而已有生阴之理”。他说的这个“理”，就是“天理”、“天命”。

他在认识论上完全抛弃了李珥的唯物主义因素，转到了唯心主义立场上。他歪曲格物致知的合理的一面，主张格物致知的途径是“尊心”。他认为，只有人们放弃贪心和杂念，保存天理，顺应天命，国家才能太平无事。

宋时烈的思想出于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需要。他的哲学是完全与党派斗争密切联系着的。他公然宣称党派斗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说什么“粟谷虽在今日，必不复言调剂事也”。

白湖尹镌（1617～1680年）是汉学派。他广泛参照汉代古注，研究了古代儒家思想。尹镌在《经传注解》中提出与朱熹不同的观点，直接与宋时烈的官方哲学作对，理直气壮地说：“义理天子之公，岂朱子独知而希仲（尹镌）不知耶”，并说，如果

朱熹在，我的学说将得不到承认，如果孔子和孟子在，我的学说是会得到承认的。宋时烈把尹铸看成眼中钉，恨之入骨。

尹铸基本上站在唯物主义一边。他主张气、太极、两仪、四象。他说“气之始生曰太极，阴阳分曰两仪，气合构成曰四象”。四象既天、地、水、火。

他否认心（认识）、性（理性）、情（感觉）的先验性，主张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才能形成认识。

溪谷张维（1587～1638年），生于两班家庭。他借用东郭先生之名，阐述哲学观点。他认为世界起源是气。他把气的概念表述为“无极子”，或“公子”。他认为“无极子”是无始无终，无所谓有无、创造，又不会灭绝的永远处于运动中的物质实体。

实学派学者大都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努力阐明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李睟光认为世界的起源是物质性的气，说天地山川只有阴阳一气。他反对天道的不变性，说天道不可不变。在说明变因时，他认为静是动的基础，动是静的契机，互为依据。因此，观察动静的互相变化，就可明确万物之变。他承认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说静可以转为动，动也可以转为静，无可以转为有，有又可以转为无。这都是阴阳的规律。

李瀛完全同意李睟光的观点。他说，“凡盈天地间者，莫非气也，然其融结为物，即气之精英”^①。他认为人也是气的产物，其精神是赖于身体器官的机能。

他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精神、知觉，依存于身体器官。他承认脑是思维的器官，与事物接触就产生知觉。

^① 《星湖僊说》卷一，下。

李溪主张研究事物的规律，积累有关规律的认识，以求得进步。他说，“今日格一物，明天格一物，格多则知进”。

他主张物质不灭论，尽管这种主张还很朴素。他讥笑佛教、天主教，崇拜上帝为“幻妄”之极。

十七世纪，以宋时烈为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潮，作为官方哲学起了很坏的作用。与此相对立，产生了以李睟光、张维、尹鏼、李溪等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潮，并颇为发展。对后来进步哲学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文学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文学，突出地反映了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桎梏的斗争。《壬辰录》就是其中的一个优秀作品。它根据民间传说，描述了壬辰战争时期杰出的义兵将领。这部小说表现了朝鲜人民的同仇敌忾，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爱国精神。有朝文和汉文两种版本，朝文版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朝文小说。

此外还有《云英传》（柳泳），《周生传》（权躒）、《洪吉童传》（许筠），《朴氏夫人传》、《田禹治传》、《林将军传》等。《洪吉童传》揭露了歧视庶孽的无理和人民同官僚的矛盾，赞扬了人民的英勇斗争，描绘了人民渴望的理想王国。

十七世纪后期，朝文小说有很大发展。金万重虽系两班出身，但用朝鲜语创作小说，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喜欢使用朝文讥笑两班的诗赋，认为砍柴樵夫和打水妇女唱的歌虽不洗练，却胜于两班的诗赋。

金万重创作了《九云梦》和《谢氏南征记》，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如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摆脱封建桎梏的风情。继这两部小说后《玉麟梦》、《玉莲梦》、《玉楼梦》等相继问世。

十七世纪诗歌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其中，朴仁老的“太平词”，“船上叹”，“陋巷词”是代表性的作品。还有描写田园生活的“山中新曲”和“山中续新曲”（尹善道作）等。

芦溪朴仁老（1561～1642年），生于庆尚道两班家庭。壬辰卫国战争时参加了反侵略战争，立下战功。战后考中武科，历任万户、统舟使等职。“太平词”描写了壬辰卫国战争从战争开始到最后胜利的过程，表现了胜利的喜悦和感情以及向往幸福和平的愿望。他在“船上叹”一诗中慷慨激昂地写出不顾年老身病而毅然走向沙场的忧国丹心和杀敌气概。

胥吏出身的金天泽是位优秀诗人。他从1727年搜集了上千首高丽以后诗调和十七首歌辞汇成《青丘永言》。

此时期，“杂歌”也逐渐增多，附有曲调。作者多半是庶民阶层。

四、美术和建筑

这个时期绘画，摒弃了仿古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旧画风，创造了现实主义的新画风。自恭斋尹斗绪（1668年生）至谦斋郑歆（1676～1759年）时期的绘画，明显地表现了现实主义的特点。

莲潭金命国（1600年生）是当时出名的画家。申纬说他的画人物生动，笔墨雄浑，百年之内恐怕不会有人比得上他的。《地狱图》和《斗棋图》是他的代表作。据说一个和尚要求金命国画出人在地狱受酷刑的场面，金命国却画了掠夺财物的和尚在地狱受酷刑的场面。《斗棋图》画了两班下棋争吵，侍童一边苦笑一边收拾棋子的场面，揭露了封建两班的腐化堕落和无聊生活。

郑歆用富有民族特色的画法，描绘了山水和大自然，他游历朝鲜全国名胜，画出了《金刚山全面图》等山水画，时人誉为

“东方真景山水画家”。

楼亭建筑技术也有发展。代表性的有平壤浮碧楼（1616年）和练光亭（1670年），江界的仁风楼。

代表性的门楼有平壤大同门。大同门通向汉城的关门，初建的确切年代尚难肯定。据载，公元946年重修，十四世纪末再次重修。壬辰卫国战争时被毁。1635年按原样重建。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封建制度的危机

第一节 城乡阶级关系的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成长

一、城乡手工业的发展

进入十八世纪后半期，朝鲜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原有的手工业体系开始发生变化。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市场扩大，而官府手工业则逐渐衰退。官府手工业生产原是为满足封建政府的需要。但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封建政府已不单靠官府手工业，还从其他方面解决一部分需要，这种需要日益增多。十八世纪末，在中央管辖的三十所工场中，五所早已关闭，十所已无匠人。外工匠“成籍”（匠人登记）问题已变得毫无意义。中央各衙门所属的匠贡人虽有名额，但各郡却不把名单送到工曹和道（监营）。因此只有部分匠贡人在官府所属工场服劳役。匠贡人作无偿劳役的很少，大部分领取禄米或禄布。到十九世纪，封建政府更是依赖私工劳动制造自己所需的物品，掌握技术的匠人纷纷流入城市，或者经营私人工场，或者进入商人经营的手工工场做工。

城市手工业的中心是汉城。汉城的一些契和廛经营各种手工业。绵细廛购丝织绸，立廛用国家供应的唐丝织绸。这些廛商开办织布手工业时，雇用脱离匠籍的织布匠人。

官府手工业虽趋于衰退，但其中一些部门仍旧存在，并能生

产出优质产品。官府的尚衣院所属绫罗匠，用唐丝织出各种高级绸缎，也用乡丝（朝鲜丝）织出同样绸缎。司瓮院广州分院烧出各种陶瓷，供王宫所需。据载，它所生产的甲燔是朝鲜陶器的上品。一般群众固然不能使用，就连国王正祖也嫌过于奢侈而下令禁止生产。

农村家庭手工业得到发展。农民种植棉麻，织出布匹，不仅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上缴国家应付各种身役，有些还在市场出售。开城地方的松都木，咸镜地方的吉布，六镇地方的细布，京畿地方的高阳木，都是比较出名的产品，是农民为出售而生产的。上述事实说明了农村家庭手工产品的商品化过程。

十八世纪后期，手工业生产专门化过程越来越加强。三南地方的纸张，湖南地方的竹器、木器和细帘，龙宫的席子，求礼的输器，玉果的扇子，济州岛的笠，都曾受到顾客的称赞。统营生产的笠因优质而闻名。

总之，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手工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特点，这就是官府手工业的衰退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私匠逐渐集中于城市，并听从城市商人的指挥。

二、商业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成长

手工业的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金属货币的社会需要。十八世纪，常平通宝逐渐渗透到经济生活领域中来。金属货币开始流通之后，在朝廷屡起废除货币之议，但终未能制止住。^① 初期，封建政府规定，荒年粮棉收成不佳时，地税、大同米和军布等可以常平通宝上缴。在运输不便的山间各郡，用货币缴纳已成制度。1730年，货币在收

^① 参看《万机要览》，财用编四，钱货，铸钱始表。

税中仅占百分之十；到 1759 年，它在宣惠厅收税额中占百分之十三；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则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自十八世纪中期起，地租中的不少部分已变为货币地租。

随着需要的增加，封建政府逐年铸造大量的货币。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已铸造一千万两的常平通宝（一百枚为一两）。由于货币的大量流通，逐渐出现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鱼音”和“环”。它用于有特定经济联系的商人之间。“鱼音”是约定付款的证书，“环”则在远地送款时使用。

货币流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致使高利贷盛行，阶级分化空前激烈。据载：“春贷一两之钱，则以春市二斗米来论，到秋一两五十文计，捧米谷而秋市值五斗论，并息为七斗五升，租其本已过三倍，年事登熟则又不知几倍，甚者或奉贷一两而逐朔增息十分，则秋后至于一两六七十文，又或债主靳固不即出货，则急于连命以一两倍息请贷，则秋后二两之，直为十斗米或十五六斗”^①。因此，“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贫者日益难以得到货币，当时叫做“钱荒”。到十八世纪后半期，情况更为严重。钱荒的原因不在于货币量少，而在于货币愈为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贫者日趋贫困。

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商业资本的日益壮大，使封建商业系统——市廛制度遭到破坏。新兴商人置六矣廛等市廛商人特权于不顾，任意营商，这叫做乱廛。市廛的衰退和乱廛的盛行已成醒目之势。

乱廛的兴起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1791 年，蔡济恭上疏说：近来游手之辈，肆意林立店铺，建议当局不准乱廛，

^① 《增补文献备考》卷一百五十九，财用。

关闭新设店铺，以保证市廛制度。^①

下面引用的材料，可以说明十八世纪后期汉城的商业情况：“都下之民，本无农作之务，故各司吏隶外率皆贸贱贩贵，兴利资生者十之八九。盖四方之物辐凑都下，故方其贱也，人得以贸之，方其贵，人得次卖之。懋迁有无，朝夕食利者，此实都民生涯之本也”^②。可见汉城不只是政治中心，而且已成为商业中心。除官员之外的绝大多数居民，都以商业为生。这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蔡某痛恨商人，欲重振市廛特权，但已难于改变业已形成的上述局面，乱廛的经济力量日益雄厚。汉城已是富商大贾云集之处。

地方城市如开城、平壤、义州、安州、全州和大邱等地，其商业亦极兴旺。各地的集市贸易颇为活跃。十八世纪中期，全国有一千零六十一所集市。其中京畿道一〇二所，公忠道（忠清道）一五七所，江原道六八所，黄海道八二所，全罗道二一四所，庆尚道二七六所，平安道一三四所，咸镜道二八所。主要集市是：

京畿道：广州沙坪场，松坡场，安城邑内场，交河恭陵场。

公忠道：恩津江景场，稷山德坪场。

全罗道：全州邑内场，南原邑内场。

江原道：平昌大化场。

黄海道：免山飞川场，黄州邑内场，奉山银波场。

庆尚道：昌原马山浦场。

平安道：博川津头场。

① 参看《万机要览》，财用编五，各廛，乱廛。

② 《正祖实录》卷十二，5年，11月。

咸镜道：德源元山场。^①

有些京江商人即江商，活动在汉江流域，承包政府税米的漕运，从中牟利，变成米商，甚至发展到囤积居奇，操纵汉城米价的地步。

手工业者出身的吴汉周，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积累大批货币，竟挂起吴汉周兴昌处的牌号。1775年，封建政府在铸造货币时与他合同，要求供应三万零三百两的烧炭。兴昌处从中获取暴利。汉城商人不仅囤积粮食，还囤积绸缎和棉花，“使都下棉贵如金”。

此外，松商（开城商人）、柳商（平壤商人）和湾商（义州商人）也都很出名。他们在国内不断扩大商业网。北青、咸兴等地商人在三水、甲山等地购买鹿茸、麝香和貂皮而牟取暴利。这些商人都是新兴的私商，即乱庶中形成的潜商，他们是在冲破市廛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汉城、开城、平壤、义州等地的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居重要地位。他们南通日本、北通燕都。开城、平壤、安州、义州等地均位于通燕之路。此地商人在对华贸易中“辄致巨富”。1787年，封建政府废除栅门后市，禁止货物外流。栅门后市的废除，未能制止私商的来往。由于筹办燕使经费的困难，朝鲜政府于1795年重开栅门后市，定每年四万两的贸易税，由龙湾府受缴。朝鲜通过栅门后市，出口银、参、苧布、绸和皮类等物；进口的则有绸缎、药材、唐木、眼镜、宝石和文具等物。

私商与东莱口商的中继贸易从未中断。十八世纪中期，大帽缎一匹的市价，北京七两，朝鲜（汉城）九两，釜山十五两。其他绸缎亦有三地的市价差异。朝鲜商人从中牟利。这类贸易在中

^① 《万机要览》，财用编五，各廛，乡市。

日贸易发展后逐渐衰退。商人也在海上同日商贸易，主要出售人参。在朝鲜，人参一斤市价七十两，运到日本则为三百两。因此，日商想尽办法购进人参。

总之，商品和货币流通的发展，促进了封建市廛制度的瓦解。商业资本的发展过程，就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前提的过程。

三、城乡阶级关系的变化

十八世纪中期以来，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耕地面积迅速扩大。1726年登记的耕地面积为一百二十二万结，1767年猛增到一百四十五万六千结。广大农民纷纷开荒，改旱田为水田，水田在耕地面积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各地人民纷纷修筑堤堰和拦河坝。封建统治阶级也承认“水利最关农功”。1778年，制定有关堤堰的管理和修筑条例，以《堤堰节目》颁布全国八道，“禁其内冒耕者，犯者杖八十，追利没官”。^①十九世纪初，灌溉用堤堰为三千五百二十五处，拦河坝有二千二百六十五处。其中最大的是洪州合德池、咸昌恭俭池、金堤碧骨池、延安南大池等。

农业技术也有进一步发展。在十七世纪末的一段时期里，封建政府不谋抗旱措施，禁止移秧之法。英祖年间，“农桑盛”成为方针，堤堰恢复了，移秧法迅速而广泛地得到普及。

用于苗床的肥料已有十余种。农民在实践中培育了各种稻种。十五至十八世纪末有六十九样稻种，其中十八世纪培育的品种占多数。三南地方一年双收的面积继续扩大。收割大麦或青芋后接着种稻子，或者收割后即刻种黄豆或谷子。

1734年，《农事直说》重新出版。1766年，《增补山林经济》

^① 《万机要览》堤堰。

问世。此外，各地还出版了各种农书，介绍了先进的营农方法。

此时，引人注目的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十八世纪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家庭手工产品日益走向市场。专门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户增加，更多的农民把自己的农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

市郊农民根据城市居民的需求而多种早稻，牟取厚利。专门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民，集中于城市郊区和适宜工艺作物的地方。庆尚道安东、全罗道茂朱、锦山等地，忠清道沃川和永同等地，黄海道凤山和黄州等地，有不少农民专门以生产棉花为生。

早在1700年，湖南地方就已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烟草。据敬差官金龟休的叙述，到1730年情况更进一步。烟草都种于好地，长水和镇安郡内随处可见烟草地，全罗道沿岸有些岛屿全部种植烟草。为此，政府曾于1732年禁止在好地上种植烟草，但烟草已成两班官僚和一般群众的嗜好品，种烟比种粮获利更多，因而人们不顾政府的禁令仍广泛栽种。十八世纪末，平安道和黄海道人民普遍栽种烟草，成川、江东、三登等地是烟草的著名产地。

人参的人工栽培也很盛行。1770年以后，庆尚道山地农民开始小规模培植人参，后来逐渐普及到庆尚道和全罗道。之后，开城商人学会种参方法，在开城地区开始栽培。开城地区，土质适宜，资金方便，便成为养参的中心地区。人参商人炮制红参盈利颇厚。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业的专门化和专业化地区的形成。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动摇了自然经济的根基，使广大农民卷入小商品生产的漩涡中去，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提供了历史前提。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的商品化过程。“给价买

地”急剧增加。过去也有土地买卖的情况，但带有浓厚的强制性。两班官僚滥用职权，用各种诈骗手段把国家所有的土地据为私有。储钱的两班地主和商人付款买占土地，土地迅速集中于两班地主和庶民地主手中。汉城附近，京畿道江口以南以及江华岛地区，很多土地被汉城官僚、商人和地主占据。忠清道不少土地落入汉城官吏和地方两班之手。官房田、衙门屯田也继续扩大。这类土地扩大也是以“给价买地”的形式进行的。

土地的商品化带来深刻的社会变化。首先，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起了变化。属于给价买地的农民变成地主的佃农，向地主缴纳对半租、定额租或货币地租。这种条件下的地主与农民，不具有身分上的隶属关系，只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在庶民地主与农民之间更为明显。

农村的阶级分化过程极为显著。土地集中于两班地主和庶民地主手中。据史书记载，大官僚洪启禧所有的土地在南方，连接七百里，尽是好地。十八世纪末，中央官僚中收租千石以上者甚多。除部分富裕农民上升为地主外，很多农民丧失土地。少地和无地的农民急剧增加。他们变成佃农或半自耕农。据《天一录》记载，十八世纪末水原府附近农村百分之五十是无地农民，有的农民，即使务农，也因地少，家庭劳力的半数要从事其他劳动。这不仅仅是水原附近的情况，而且是全国普遍的情况。农民中，耕种自己土地的是少数，大半是租田耕种。

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部分背井离乡，形成众多的游民群。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游民问题非常严重。这不仅由于自然灾害或封建剥削的加强，也是由于商品货币关系渗透到农村。1790年，平安道二千三百五十名农民离开家乡，当年回乡的仅有百分之五十。咸镜道长津府原有五千户，1812年有四千二百户背井离乡，寻找活路，到处流浪。

大批游民群形成劳动后备军。十八世纪中期以后雇佣劳动的范围很广。小说《兴夫传》里的兴夫干过各式各样的雇佣劳动，不仅从事过农田劳动，甚至干过扫院子、扎扫帚和打水等活计。十八世纪后期，以出卖劳动力而糊口的人很多。十九世纪初，朔宁郡有二千三百户，十分之一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有长期和短期的，还有季节性的。十八世纪，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是季节性的短期雇佣劳动，这种劳动没带多少封建性。自耕农因缺乏劳力而短期雇工，不存在封建性质。1797年，被汉城木条麤商人雇佣的拉锯工人，为提高工钱与商人吵过架。这种雇佣劳动不带有隶属关系。十八世纪末，一般的日工收入是两角五分钱。

随着经济的发展，十八世纪后的朝鲜城市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只是政治上的中心，也是经济上的中心。由于手工匠人，流浪农民的涌进，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十五世纪和十八世纪相比，汉城和平壤的人口各增加二倍和三倍。汉城住户从一万八千七百多户增加到四万户，平壤则由八千一百多户增加到三万零九百多户。有些城市，人口的增加幅度更大，南原是八倍，义州是三十二倍。

城市居民的组成也有变化。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农村人口的减少为前提。遗弃土地的部分农民流入矿山，一部分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不仅流浪的农民进入城市，具有专长的手工业者也进入城市，开设手工作坊。因此，有的城市既是商业城市，又是手工业城市。私商打破市麤规矩，“坐而行货”，擅自立号，积累巨富。汉城、开城、平壤、义州和其他城市都有“富商大贾”，中小商人也日见增加，在城市人口中占相当的比重，比例各地不一，汉城是十之八、九。

总之，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城乡阶级关系的变化。

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

离开乡村的大批人群已摆脱了任何人身束缚。有的地方官员曾试图把流浪农民送回原地。封建政府规定，当雇工未滿五年者仍为良人，要回乡安居生产。这些措施并无多少成效。这些人完全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产工具。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是完全“自由”了。他们被抛向劳动市场。“乍散旋聚”到处成群的那些人，“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当时的雇佣劳动，有的带有劳役性质。尽管如此，还是从这些雇佣劳动中产生了朝鲜工人阶级的第一代人。

积累了货币的商人，有的买占土地，变成了庶民地主，有的投资经营各种企业，雇佣工人进行生产。拥有资本的商人和只有劳动力的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人身从属关系，而是自由合同关系。因此，货币变成了资本。十八世纪后期，最先在矿业部门和金属加工部门产生了这种关系。

封建统治阶级由于需要金属，实行了“设店收税”政策，动员农民服役，按人头赋税。十八世纪后期，官方“设店收税”的矿山逐年衰退。与此相反，商人的“潜采”兴起，而封建政府则以种种借口施加压力使它关闭，但未能制止得住。封建统治者内部也有对压制政策持不同意见者。有的官员说：“我国物力不足，徭役甚重，每以国力采之，则亦多劳费矣。令采银官得穴开凿，然后募民许给，使之输税，多少量宜定数，则官不费力，税人自多。坡州之银地，近而品好，封为官采。其他交河、谷山、春川、公州等地产银处，采银官皆已知之，使往察开穴，令民输税采用，则富商大贾必有乐趋者矣”^①。

① 《增补文献备考》，一百五十九卷，财用考。

1788年，禹禎圭在《经济野言》中说：如果政府容许开采银矿，商人出钱出物，招募工人，则无地农民肯定乐于当店民，一部分纳税，其余归物主所有，则公私均有利。《天一录》写道，鉴于开发矿山的情况，不一定由中央官厅筹备物力。故无物主则无法经营，物主既然消费财力，应减轻上税负担，先使物主得利，这无损于政。

前者是从建议的角度讲的，后者是从业已存在的事实讲的。两者都讲到在矿山部门应采用雇佣劳动问题。它同政府的关系是，政府不出任何物力，只取税款，其余全归物主处理。物力就是货币和劳动工具等。物主，则是出物力的巨富大贾；店军则是工人。物主出物力的目的，全在于牟利，即掠取剩余价值。

端川地区金矿和其他矿山，都是以这种关系建立起来的。据记载，每个矿山的工人都很多，有的几百人，甚至几千人。这些人不一定都在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作工。好几个资本家各占几个矿井，各自组织生产。

有一个地方开办矿山，将为数众多的店军（工人）聚于此地，形成矿山村。1799年，黄海道笏洞矿山有七百栋宿舍，夏天雨季大半工人回家，但该地仍有一千五百人。新建的矿山村吸引商人蜂拥而至，“坐贾行商，成市交易，日用百物，无不襁止”^①。

矿山工人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作工，处境悲惨。1740年，领议政俞拓基对“设店”作过如下叙述：“设店……深则十余丈，或数十丈，故民人辈采银入穴，往往多人压死，尸身亦不可掘

①：《日省录》，哲宗9年2月，转引自《朝鲜资产阶级民族形成问题讲座集》，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196页。

出”^①。这是设店收税矿即官管矿山的情况。潜采矿山不会比它好。

朝鲜输器工业的历史颇为悠久，李朝后半期有了更大发展。1777年，安城地区九山里店主都景春把店卖给金仲玉，其中有三十九间房舍，还有机器和原料。可见，它的规模很大。

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的部门有所扩大。据载，1806年，京畿、忠清、全罗、黄海、咸镜各道都有潜采。据当年户曹判书徐荣辅启：“近闻畿湖两西东北等六道金脉渐盛，潜采之类，殆乎无处无之。守令虽严加惩禁，而乍散旋聚，莫之可遏云。大抵民之趋利，如水就下，大利所在，虽日徙而禁之，其势未由。”^②

面对这种情况，封建政府于1816年决定对潜采铜矿实行设店收税政策。到这个时候设店收税已同过去的设店收税有所不同。潜采和设店收税实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政府所派监官或别将，只管收税，而矿山的管理及其他，则由物主负责。这说明物主在铜矿部门也取得了独立经营权。

有些砂金场也出现物主雇佣工人采金的现象。砂金，用比较简陋的工具如簸箕、袋子和十字稿，任何人都可淘出。砂金场附近的农民和游民也曾单独淘出一些砂金。因此到十八世纪末为止，这一行并未出现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进入十九世纪，有些人聚集了小生产者进行生产。

此外，许多金矿被开采了，如成川、熙川、遂安、谷山、端川和永兴等地的金矿。这些金矿由出资金、设备和器材的物主作主。

① 《增补文献备考》，一百五十九卷，财用考。

② 《备边司誊录》，第一百九十七册，纯祖6年，丙寅，12月。

洪川的铁质较好。有些铁匠在此加工铁器，一部分上税，其余上市。这些人大部分基础薄弱未能上升为资本家。都贾商人拿出资本，把那些匠人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于是产生了加工铁器的工场手工业。

平安道定州纳清、全罗道求礼、京畿道安城和开城，都以生产输器手工业同该地商业资本结合，经营形式有新的变化。1850年前后，纳清朴明照（地主兼商人）经营的输器手工工场，雇有十一名工人。原料铜是甲山古津洞矿出的，铅是从中国或日本进口的。一个月的原料消费量，铜和铅最多达三千斤。生产输器有三道工序：冶铸、轧制和切削。朴明照和工人之间只有自由合同，没有其他任何身分上的隶属关系。

纳清除朴明照作坊外，还有若干输器手工工场。定州纳清的输器工业对其他地区输器工业的发展颇有影响。

据《朝鲜窑业》记载，1801～1873年间，有二十三个窑业工场。

十八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的萌芽，首先发生于矿山部门。这是由朝鲜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到十九世纪，在规模、门类等方面资本主义萌芽都有发展。尽管如此，它只存在于极其有限的部门，速度之缓慢、经济力量之微弱，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节 朝鲜封建制度的危机

一、封建身分制度的瓦解

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作为阶级关系在法律关系上表现的身分关系，也随之发生

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同人民群众的斗争密切相连。这种变化的基本特点则是各种身分间的界限日趋模糊；阶级阶层与身分间的不一致日益扩大，从而给身分制度带来很大裂痕。

良人的地位也有所变化，良人的破产过程急速加快。占有一些土地的良人农民，由于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种种掠夺和高利贷盘剥而丧失土地，趋于破产。不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难以避免破产的遭遇。在一般情况下，破产的良人不变为奴婢，而变为佃农、游民或雇工，因为奴婢制度本身正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但就良人和奴婢而言，他们的实际区别则甚少。

就身分等级制度而言，身分反映着阶级关系；身分愈高，占有土地愈多，而身分愈低，则愈是无权的生产者。由于国家机构的膨胀和卖官鬻爵的盛行，以两班自居的人就多起来，这表明两班身分已丧失特权。部分良人上层和富商变为庶民地主，假编家谱，同两班结亲，装成两班；而有些过去的两班则遭破产，处于困境的虽为数不多，却也有陷于被剥削境地的。

在两统治阶级内部，要求打破嫡庶差别的呼声愈来愈高。1785年编纂的《大典通编》载有所谓“庶孽疏通”的条款。但这种条款从不付诸实施。1823年，京畿、忠清、全罗、庆尚、江原道的儒生，号称万人署名，提出《万人庶孽疏通疏》。有些人还提出“西北人收用”。庶孽差别和西北差别开始有所缓和。

公奴婢的解放是封建身分制度面临危机的必然结果。

奴婢是最下层群众，在历史上曾进行过坚持不懈斗争，形式各种各样，有的组织帮伙进行暴力斗争，有的殴打或杀掉官僚和地主，有的则逃亡转移到远方。十八世纪末，安东和其他郡的不少官奴悄悄隐匿，从而产生“假官奴”，即强迫良人替官奴劳役。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耍尽了花招。1755年，公私奴婢的身贡各减半匹；1774年废婢贡；1778年全面停止奴婢

制度。

奴婢们反身贡斗争的发展，使封建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维持奴婢的原有状况。于是，在 1801 年宣布公奴婢的“解放”。他们称此为“继承先王的遗志，实施善政”。是年 1 月在敦化门前烧毁公奴婢和官奴婢的奴婢案一千三百六十九卷。从此，奴婢们在身分上获得“解放”，六万六千多名公奴婢和官奴婢变成良人。

公奴婢的“解放”是人民群众通过斗争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明封建国家也认识到身分制度的重要环节——奴婢和良人的差别早已瓦解，无可收拾。公奴婢的解放大大促进了私奴婢的“解放”。

但是公奴婢的“解放”是不彻底的。得到“解放”的对象仅限于内需司和封建政府各衙所属奴婢。各道和郡的官奴与驿奴并未得到“解放”。可见，公奴婢的“解放”不是全部公奴婢的“解放”，并未触及私奴婢。公奴婢的“解放”未能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

二、势道政治和封建官吏的腐败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倾轧，封建集权的中央官僚体系紊乱，势道政治在这时形成。

势道政治始于正祖时期。正祖即位后便处理了他作王储时的反对派官僚，设立了宿卫所，任洪国荣为大将，掌管宿卫。从此洪氏干预政治。势道是朝鲜的一句俗语，即指掌握大权之意。有的人官虽不大，但掌握实权，宰相以下都得听从他的。洪国荣名义上只是掌管宿卫，实际上却主宰施政大权，军国大事不经过他就不行。纯祖开始改由后党掌权。可见势道政治是个别门第尤其是以后党为中心的专政。

李朝二十三代王纯祖于 1800 年即位，年仅十一岁。知事金

祖淳遵照正祖的嘱咐辅佐幼主，英祖王后垂帘听政。1802年，金祖淳之女册为王后，不久结束垂听，金祖淳以国丈而掌握势道。从此，以金祖淳为首的安东金氏一派掌握中央大权。以金达淳为吏曹判书，金羲淳为刑曹判书，金明淳任咸镜监司和吏曹判书，金履翼为兵曹判书，金履度为礼曹判书，其他部门和地方也都安插上了安东金氏一派。

安东金氏势道政治不能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把门阀斗争和党派斗争连在一起，反而使这种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金祖淳一派和权裕等洪国荣一派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权裕等人曾反对金祖淳女儿为王妃。安东金氏内部也彼此倾轧。金祖淳和金明淳是老论时派，金达淳是老论僻派。他们互相排斥，诬陷，甚至引起流血事件。

纯祖末年丰壤赵氏势力逐渐抬头，牵制安东金氏势力。纯祖即位二十七年，委太子昊治理国家。赵万永之女立为太子妃。从此丰壤赵氏势力和安东金氏势力互相对立。昊治理四年后病故。纯祖重新亲政。1834年纯祖死去，昊子继位，年仅八岁，即二十四代王宪宗。宪宗追认父昊为翼宗，母为王大妃。1839年赵万永之弟赵寅永任领议政。1840年以后，丰壤赵氏一派垄断了大权。

1849年宪宗病故，无嗣，迎立英祖孙全溪君扩的二子为王，即二十五代王哲宗。哲宗以金汶根为王妃。于是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重新建立。

六十年来的势道政治，给李朝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极大灾难。从中央到地方主要官职全由那些以门第或党派为背景的昏庸无能之辈来充当。掌握政权的官吏滥用职权，横征暴敛，贪得无厌，为了获取货币而随意卖官鬻爵。不仅势道官僚，甚至国家也公开卖官，出售“空名帖”（不写明官职）。仅在1809年

11月出售的“空名帖”就有：全罗道一千张，忠清道七百张，京畿道九百张，水原二百张。也有出售实职的情况：监司五、六万两；郡守二、三万两。据朴珪寿的报告，庆尚道大郡的吏房为七、八千两，小郡则一、二千两。

科举已徒有虚名。到考场的只是没有后门的乡下士人。科考录取的结果早已内定，高门子弟靠老子的权势和贿赂，不进试场也可考上。用钱买官，当上所谓“钱监司”、“钱郡守”，然后为了捞回本钱和发财致富，再用各种手段取财于民。

势道政治严重地侵蚀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政，使封建国家的政治危机空前加深。

三、天主教和欧美船只的进犯

十九世纪，天主教在朝鲜迅速传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武装船只频繁出没于朝鲜沿海地区。

十七世纪以后天主教同汉译的欧洲自然科学书籍一起传入朝鲜。当时，朝鲜人只关心自然科学知识，对天主教持反对态度，因为当时儒家思想还统治着人们的头脑。

1783年，朝鲜使者李承薰在北京接受洗礼，带回宗教书刊，秘密传播天主教，1786年政府定天主教为“无君无父之邪教”而严禁其传，并禁止从中国进口此类书籍。

十八世纪末，天主教传入部分阶层之中；进入十九世纪它作为一种思想潮流继续发展壮大。封建政府对此深为不安，于1801年1月对天主教进行镇压。国内教徒和华人教徒多被斩首，史称“辛酉邪狱”。教徒黄嗣永避居忠清道堤川山谷，写成“帛书”，企图交给法国驻北京主教。“帛书”被政府查收，黄嗣永于是年11月被捕处死。黄嗣永在信中汇报了教徒被镇压的大致情况，建议动员欧洲各国军舰、兵丁和教徒来征服朝鲜，取得传教

自由。黄嗣永事件说明天主教的传播同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势力是紧密勾结在一起的。

此后，李朝政府加强“五家作统法”，搜查教徒，烧毁天主教书刊，并制定“不告并坐法”：凡不举发天主教徒者，一律从严处治。但外国教徒仍继续潜入朝鲜。1835～1837年间，三名法国教徒潜入朝鲜，在地方秘密传教。这期间还有三名朝鲜少年被派到澳门学习教理。天主教势力不断扩大。于是，1839年朝鲜政府再次采取镇压措施，处死一百五十多名教徒，包括三名法国教徒在内，史称“己亥邪狱”。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下令全国禁止天主教，另一方面，为了扶植儒教，授意各地书院隆重举行祭祀活动。

法国侵略者以“己亥邪狱”为借口侵入朝鲜。1846年，法国三艘军舰窜到忠清道洪州外烟岛，送交追究责任的“问罪状”。次年，两艘军舰又来犯全罗道多岛海，要求会谈，未能如愿而返本国。

进步人士通过这次事件开始认识到天主教的实质。

第三节 1811年～1812年平安道农民战争

一、农民战争前夕的形势

进入十九世纪，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随着商品货币关系渗透到农村，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和高利贷剥削与日俱增。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激起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不满。

广大人民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进行了形式不同的斗争。

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编造预言李朝灭亡的秘记和讖说，谴责封建王朝和两班官僚。1804年，载荣和性西等人在汉城的四

大门上张贴名为“关西秘记”的讖说。

挂书、投书事件不断发生。1801年，有人在东大门和南大门向入值军官转交匿名信。是年8月，庆尚道河东斗峙场和昌原发生挂书事件。10月，在河东又发生挂书事件，用白色绸缎书写，挂在杆子上。内容是：“有文武才艺无势失业者，应我鼓吹，从我倡议，相者相之，将者将之，贫者丰之，畏者隐之”^①。它直接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对挂书极为不安。对有些挂书当局虽未透露内容，但从政府高级官员的言论中也可以推测出一些。他们说“其书至凶悖道”，“书辞则诚巨测”。可见挂书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他们说，挂书“专出于动摇朝廷疑乱人心，以为尝试之计”，“煽动人心之计”。可见挂书又富于煽动性。因此，他们无限哀鸣地说：“不胜警惧”，“徒有骚扰之叹”。这些，对人民群众都有一定的鼓舞作用。

人民群众积极开展的烽火斗争和山呼斗争终于发展为起义。

1808年1月3日，咸镜道端川人民在金亨大等人的指挥下举行起义，冲进官衙，驱逐府使及其心腹座首。1月5日，北青衙役金至贞等人聚众起义，冲入乡厅逮捕和殴打乡吏。端川和北青起义虽规模不大，但它是整个十九世纪接踵而起的大小起义的先驱。

1810年8月，庆尚道仁同人张时景纠集亲属和村民筹备起义，因泄密而被镇压。次年，爆发了规模较大的谷山农民起义。1811年2月，谷山农民在朴大成、沈洛化等人的指挥下手持棍棒冲进官衙，夺得府使朴宗臣的官印，将其装在草包里，扔到府外三十里的地方。谷山起义使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阶级惊恐不

^① 《纯祖实录》三卷，元年，10月。

安，鼓舞着人民群众奋起斗争。

二、农民战争的准备

1811年底，以平安道地区为中心的农民战争爆发了。李朝统治阶级历来实行地方差别政策，因此，西北地区遭受京畿道和三南地区两班的歧视。不用说一般下层群众，就连当地地主和土豪乡班也不免被歧视。该地商品货币关系显著发展，新兴的大商人、矿山主和金属加工业主对封建政府现行政策甚为不满，这就促使以平安道地方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乡班、土豪与人民群众的联合。

平安道农民战争的领导人洪景来，生于平安道龙风郡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十九岁起仔细观察汉城的形势和王宫内部的政治动向，遍游全国各地，了解情况，旨在起义。

他十多年来积极开展起义的准备工作，成功地联合了禹君则、李喜著、金昌始等人，以嘉山郡多福洞为根据地组成指挥部，同平安道、黄海道出身的三十多人取得联系，其中有泰川金士用，定州金履大和洪总角，介川李济初，龟城金奉秋，铁山郑复一等人。另外，在重要的城市里以土豪地主、商人、胥吏为中心成立了地方组织。于是，形成了西北地区（尤其清川江以北地区）两班、乡吏、土豪、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农民等的反政府大联合。据载，“自湾至松，富户大商，几入圈套，黄平两道，破产难当，皆为鹰犬，流民饥氓，亦多投属，拔其尤者，称为渠帅”。^①甚至“声势潜连于京洛”。他们身带银牌（刻有银字的，也有未刻的）或木牌（刻有真鱼、丁鱼、金鱼、苏鱼八字）相互联系。

^① 《阵中日记》，辛未，12月18日。

他们积极筹备军需给养。博川、安州、宣川、龙川、铁山、义州等地富豪供应了大量的现款、剑矛、鸟枪、军粮和军装等。

他们积极培养骨干，加强了队伍的建设。他们诡称开办矿山，招集青壮年，在多福洞和薪岛组织了农民军，进行军事训练。这支队伍是农民军的主力，共一千多人。他们中的一批人被派到平壤、义州等地进行筹谋，准备跟起义军相呼应。

起义前夕完成了组织布署：洪景来为平西大元帅，金士用为副元帅，禹君则为先生，李喜著为都总，金昌始为谋士，洪总角和李济初为先锋将，尹厚俭为后军将。

三、农民战争的开始和发展

1811年12月18日深夜，一千多农民穿上军装待命。大元帅庄严宣布农民纪律：不要杀害老百姓，没收官家和地主的粮款救济贫民，违令侵入民宅者就斩。农民战争的炮声打响了。农民军奇袭嘉山邑城，处决郡守，占领郡厅，接着又占领了郭山。次日，同洪景来早有联系的崔尔伦、郑振乔等人指挥群众在定州起义，砸开牢门。22日，金士用、洪总角率领部队进驻定州。

洪景来率领三百多人组成的南进部队占领博川津头，准备攻打安州，同时发出檄文。檄文摘要如下：

“平西大元帅为急急驰檄事，我关西父老子弟公私之贱，咸听此檄。盖关西……衣寇爰济，文物柄琅。……而朝庭之等弃西土不异粪土。甚至于权门奴婢，见西土之人则必曰平汉。其为西土者岂不冤抑哉，……见今冲毛在上，权奸日炽、如金祖淳、朴宗庆辈，窃弄国柄。仁天降灾，冬雪地震，慧孛风雹，殆无虚岁。由此，大无荐臻，饿莩载道，老弱填壑、生民尽刈，岂乎在即！何幸济世之圣人，诞生于清北宣川剑山日月峰下君王浦上伽倻洞红衣岛……。兹以檄文，先谕列府郡候，切勿挠动，洞开城

门，以迎我师。若有蠢尔顽拒者、当以铁骑五千，蹙之无遗矣。宜速请命奉行宜当者”。^①

檄文明确表明斗争的目的在于打倒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它虽然带有地方色彩，但由于斗争的对象和目的比较明确，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

农民军的胜利进军给汉城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有的官僚两班慌张地带着家眷避难去了。司宪府一官员咒骂这些人说，这伙人平时读书，究竟学到了什么呢？有些人则对农民军的胜利寄予很大希望。汉城的韩基朝写信给洪景来，祝贺大元帅成功，并说忠义勇军将得到日月上帝的保佑和人民的声援；最后说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方是上策。

金士用率领的农民军继续北上，到28日已占领宣川、清川、铁山、龙川等地。农民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占领了清川江以北的全部地区。

26日，洪景来率领的南进部队到达安州对岸松林洞，同洪总角部队会师。他们准备攻下安州，继续南进，以便占领平壤，直取京都汉城。

21日，封建政府得知平安道农民起义的消息后，便疯狂策划镇压措施，命令武官立即动员，一任武官取代平安道内文官出身的郡守和县令。23日，派慰抚使兼临賑使进行宣抚。24日，编成“讨伐队”，任李尧宪为两西巡抚使，任朴基丰为中军。

平安监司李海遇命令平安道各地军队立即在安州集结。29日虞候李海升，咸从府使尹郁烈、顺天郡守吴致寿等人率领九百多人的军队，试图攻打农民军。

是日，农民军同地方官军在松林展开激战。官军渡过清川

^① 《历代檄文选》，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132页。

江，从三面发动进攻。洪总角部队从正面反击，给敌人沉重打击。由于官军极力拚凑队伍，敌我力量发生变化。农民军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英勇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退却。农民军首战失利，对农民军的士气影响很大。

四、定州防御战和农民战争的失败

松林战斗后，农民军退到定州准备重整旗鼓、待北上军解放义州后南下会师，以便长驱南进。于是，农民军把粮食、军事器材运进城内。

一度持观望态度的不少土豪，在松林战斗后，为了获取功劳，组织所谓义军，参加镇压农民军的行列。宁边、泰川、宣川等地的土豪也组织了“义军”，公开支持官军作战。他们组织的“义军”有一千六百多人。29日和30日，博川和嘉山先后被敌人占据。

农民军确有南北被割断之忧，因而召回北进先锋李济初进驻郭山，以便保证南北的联系。为了打破农民军的作战计划，郭山前郡守李永植率领近三千人的军队向郭山进击。李济初部一千二百人的农民军，在郭山将台旷野迎击敌人。农民军在两次战斗中虽英勇作战，但因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农民军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系，终被击溃，李济初惨遭杀害。

进攻义州地区的农民军一直没有攻下义州。金士用看到义州难以攻克，便同金昌始部一起南下，在宣川和铁山打败敌人，1812年1月15日进入定州。于是南北军会师，兵力共三千多人。

巡抚中军朴基丰于1月10日来到定州。封建政府授与他极大的权限，各道兵马节度使至将卒官属违令者先斩后奏，并可随时征用任何公谷和公款。官兵沿途酗酒放荡，讨索民财。

朴基丰指挥八千官军从八方围攻定州。1月15日，朴基丰发动第一次进攻，妄图一举消灭农民军。但农民军士气高昂，英勇杀敌，击毙大量敌人。朴基丰连续几次发起攻势均遭失败。封建政府把失败归咎于朴基丰，令柳孝源接替。2月25日，朴基丰又一次发动攻势，妄图在离任之前扭转战局。官军在此次战斗中付了很大代价，百多名士兵死伤，但未能攻下城池。

3月以后，农民军四次主动出城杀伤敌人。3月22日，洪景来亲自率领部队从东、南、北三方出城，火烧柳孝源主力部队的木栅。农民军试图在战斗中突围，但终未成功。

农民军已经入城三个月，粮食愈来愈紧张，弹药也开始不足。洪景来和其他领导人毫不灰心，继续鼓励士兵坚持战斗。

凶恶的敌人最后炸毁了城墙。4月3日至18日挖通通往城内的地道，用一千八百斤火药炸毁城墙一角。定州终于失陷。洪景来在南门战斗中，中弹身死。农民军惨遭杀害。据载，“尽诛所捕之贱”（农民军），“士皆手刃杀戮，目致夥多”。

平安道农民战争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农民军的阶级组成复杂。就参加农民军的阶层而言，有贫民、富裕农民、矿山劳动者、富裕商人和商人企业者、土豪以及其他阶层。这是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平安道农民战争，是反对封建的农民战争。由于指导集团的阶级和社会的局限性，未能提出与农民利益密切关联的战斗口号，未能避免战斗指挥上的错误。另一方面，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尤其是松林战斗后，反农民军力量很快形成一大势力，压倒农民军。

平安道农民战争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不应忽视它的历史意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对以后的群众斗争有很大影响。1813年，济州岛的梁济海曾试图

效法洪景来组织起义。1816年，成川僧人学相自称洪景来余党，作过起义的准备工作。1817年，全州蔡寿永传布洪景来生存论，用来煽动起义。

第四节 1862年晋州农民起义

一、封建剥削的加强

1815年10月，全罗道观察使金启温在上疏中不得不承认封建统治阶级贪得无厌的掠夺。他说：1807年以来，沿海各郡年年歉收，加上军政、徭役等负担过重，邻征之弊愈甚，流离逃散者颇增，有的面住家不超过十户，耕地逐年减少，好地变成荒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是一个原因，但它毕竟不是重要原因。统治阶级造成的人为灾祸甚于自然灾祸。

封建统治阶级对现实熟视无睹，只顾加紧剥削人民。到十九世纪中期，三政剥削已登峰造极。时人气愤地称之为“三大弊”，或“三政弊”。

就田税而言，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而且名目繁多。附加税总额超过正税几十倍。十九世纪以来，都结钱（有关田结的各种杂税统在一起，以现款折算，称为都结钱）一直折磨着农民。

收税中弄虚作假严重。内需司、宫房、各衙门所属土地和两班土地变为免税地，隐结或陈结无计其数。这时，土地税由洞或面负担。这就是田政中的邻征。收税官擅自加额，纳入私囊，这叫作“乞卜”。甚至课税于虚结（实无土地的面积）。官员对既有土地擅自增加面积从而多征税收，这叫作“添卜”。

军政也异常残酷。军政的受害者是贫困的农民。军布逐年增加。稍有权势或较为富裕的人，以所谓乡任、儒任、校任而免除军布。黄口和白骨的征布在十九世纪已成普遍的现象。此外，还有“降内债”（降年令几年征收）和“摩勘债”（提前征收）。

还政是惨无人道、敲骨吸髓的剥削方法，这种高利贷盘剥，利息高达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有的甚至达百分之百。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还谷（原谷和耗谷）改为作钱（折合钱款）、作布（折合麻布）和作木（折合棉布）的现象与日俱增，官僚胥吏则从中营私舞弊。官员弄虚作假的方法甚多。反作（年末，未收的改为已收，次年再报告为已放，从中谋取一石一两利息）、加分（官员私自将应留部分放贷而谋取利息）、虚留（凭帐簿上的名目受取贿赂）等不一而足，甚至达十二种方法之多。

据载，1862年5月，丹城县有一千户，未还谷的有九万九千石；赤梁镇有一百户，未还谷的有一万八千九百余石。丹城县每户还谷债九十九石；赤梁镇则达一百八十石。当然有“未还谷”的。但绝大多数是官吏的弄虚作假，官吏把农民交的粮和钱化为已有，却在帐籍上记载“未收”。

可见，他们的欺诈行径是一言难尽的。人民更加陷入深渊。因此，丁茶山痛斥三政之弊，尤其是还政之害，他说：“法莫不良于还上，还上之法虽父子不能也”。^①

还政的剥削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成了李朝政治经济危机的首要因素。

二、晋州农民起义

1862年，三南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晋州农民起义揭开

^① 《丁茶山全集》上，第241页。

了三南地区起义的序幕。

庆尚右道兵马使白乐莘，任职不到一年，利用征收都结钱，还谷以及其他方法，搜刮了七万二千余两钱。晋州农民对此非常痛恨，在柳桂春、李启烈等人的倡导下，于2月6日在水谷召开乡会。参加会议的基本群众是农民，还有不少中小地主。他们也由于都结钱和还谷剥削而深受其害。会议决定提出反对都结钱和还谷剥削的抗议书，发到各郡县和监营。2月14日，柳桂春、李启烈、金守万、李贵才等人同各里的代表聚会，讨论起义事宜，会后就揭竿而起。起义群众众在德山烧毁了恶霸地主和官吏的房屋。三十多个里的农民很快参加了起义。

2月18日，起义农民气势高昂地向晋州进军。白巾裹头的起义军，手持棍棒，严惩留在邑内的恶霸两班地主，抓住白乐莘令他下跪，斥其罪恶，要求废除都结钱和统还（以五户为单位贷放还谷而进行剥削）。白乐莘一方面用甜言密语迷惑群众，一方面捆绑吏房权俊范和犯逋金希淳痛打一顿，以此怀柔群众。起义军对此置之不理，处决权俊范和金希淳，再次要白乐莘承认起义军提出的条件，明文保证。最后，终于迫使白乐莘作出明文，承认起义军提出的要求。于是，农民军认为大功告成。于23日各自回家。

封建政府得知晋州农民起义后，施展出软硬兼施的手法，发出《宣谕文》，表面上承认地方官的横征暴敛，罢免白乐莘和晋州牧使洪秉元，另任兵马使和牧使，同时派按核使镇压起义。按核使传达国王的“仁旨”，声言悔悟自首者、虽罪行严重，亦可宽大处理，并逮捕一百一十名起义者，杀害了柳桂春、李启烈、金万守、李贵才等起义领导人，其余许多农民也惨遭镇压。

晋州农民起义失败后，三南各地农民相继举行起义。1862年是起义之年。3月到4月，全罗道益山，咸平等地农民先后举

行起义。国王哲宗哀叹道：咸平起义比战争还厉害。4月到5月初在庆尚道丹城、咸阳、居昌、星州、善山、尚州、开宁、蔚山、军威、比安和仁同等十一个邑连续爆发起义。其中开宁起义的规模仅次于晋州起义。

农民起义的烈火也烧到忠清道公州、连山、文义、清州等地。

面临接连而起的起义，封建统治阶级惊恐万状，选派按核使、宣抚使、暗行御使到各地用怀柔政策镇住了激昂的群众。封建政府根据这一帮人的报告，于6月25日讨论改正收税事宜，决定设立厘正厅，6月制定“三政厘正节目”。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农民深恶痛绝的还谷制度，将从前以耗谷为名而征收的谷物改为按土地面积征收谷物（称之为罢还归结）。但它只是在名义上除掉还谷税制，实际上则移于田政，以维护原来的剥削方法。

“罢还归结”的实质尽管如此，但它毕竟是农民通过斗争所取得的一项成果。

封建统治阶级本来就毫无实行罢还归结的诚意，故迟迟不去执行。农民的情绪稍为平息后，统治者就抛弃了诺言。10月，他们作出决定，不执行“三政厘正节目”，于是还政制度重新得到恢复。

农民对此极为愤慨，再次举行了起义。10月，咸兴府农民头裹白巾，腰系青带，手持棍棒和农具冲进监司盘据的宣化堂，占领了该地。人民群众高唱“祸先落于宣化堂”之歌，处决了一些贪官污吏和胥吏。12月，黄州六面农民举行起义，提出“民瘼二十五条”。济州岛人民也为反对征收火田税掀起斗争。他们制定《矫弊节目》，要求付诸实行。

这种群众性的农民起义，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未能摆脱分散性，因此被统治阶级各个击破。但它沉重打击了趋于崩溃的封建

制度，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无止无休的贪欲。

第五节 文 化

一、实学的发展

到十八世纪后期实学进入了兴盛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北学派。此外，还有许多进步学者。北学派对现实社会的观察眼界更为广范，对封建制度持有更尖锐的批判态度，对社会发展有敏感的洞察力。他们主张学习北学，即主张学习中国以及通过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但他们对外国文化也持有批判态度。

北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曾随使者来中国，同中国的进步学者接触，了解到西方的进步文化。他们在同中国的进步学者接触中，把自然科学技术和天主教严格区别开来。

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丁茶山则是囊括北学派学说的实学之集大成者。

湛轩洪大容（1731—1783），在十八世纪实学派中对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有较深的造诣。1765年随使者到北京，回国后著有《筹解需用》，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和数学，他不单主张地圆说，还主张地转说。据朴趾源的说法，当时地圆说已介绍到朝鲜，可是地转说还没有介绍到朝鲜，但洪大容认为地球自转形成昼夜。

他主张均田制。设想全国每一成年男女耕种二结土地，国家则收税十分之一。耕种者死亡，三年后将土地转让他人。他还主张国民有受教育和保卫国家的义务。他追求“万民皆乐”“万民皆劳”的理想，主张废除封建身分等级制度。

北学派大师燕岩朴趾源（1737—1805）是十八世纪朝鲜卓越

的实学者和文学家。他致力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社会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

他和洪大容一样，从土地制度中找出封建制度的主要病症。他在《限民名田议》里主张，为杜绝土豪的土地兼并，防止农民的流离破产，应限制个人土地的所有量。他著有《课农小抄》，介绍营农方法，想要借以改革落后的农业技术。他认为货币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并主张合理地调整货币，控制铸币，以保证物价的稳定。

在洪大容、朴趾源的影响下，到十八世纪末出现了许多实学思想家，朴齐家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楚亭朴齐家（1750～1805），于1789年应正祖要求编写了《北学议》二卷。这部书是他的代表作。他强调吸收明末清初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成就以及传入中国的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主张即使外国的，只要有利于自己就应吸收。他指出废除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

他在《通江南浙江商船议》里强调商业和外贸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要求奖励商业，实行国际通商。他鉴于朝鲜被大海环绕，主张制造和使用船只，并介绍了造船技术。他说一百辆车不如一艘船。

实学由知识渊博的学者丁茶山的研究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茶山丁若鏞（1762～1836）继承和发展了先行实学的优秀传统，对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物理、技术、医学等各方面进行了研究，达到最高水平。因此，他被称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研究实学中所最关心的，是寻求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途径。

他在著作中尖锐地批判了旧的封建制度和政治制度。他曾在

一篇题为《奸吏论》的文章中，开头就说：“吏未必奸，其使之奸者法也”，^①分析了吏之变奸的原因，最后还是以“吏未必奸而使之奸者法也”作结束。他在《监司论》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指出他们是大盗贼，最后高呼“大盗不去民尽刘”。^②

他认为人民贫困和痛苦的原因在于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因此提出了公田均税制和闾田制。他的理想是实行闾田制。那就是以土地共有为基础，共同耕作，按劳动量进行分配。

他批判还上制度的种种弊病，主张废除强制贷放的强制掠夺，制定社仓制度，建立农民自治性的通融机关。

丁茶山认识到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主张用技术来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他应用滑车和辘轳之间的力学关系，设计了能吊起重物的起重机。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不少学者继承了实学，使它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得到发展。

李圭景是北学派李德懋的孙子，他继承了实学学说，著有《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六十卷。它是对一千四百多项题目作出证明并加上自己见解的小论文集。

金正喜是朝鲜考古学、金石学的创始者。他的《金石过眼录》是朝鲜金石文研究的代表作。在书艺方面也开创了新境界，获得秋史体之名。

金正浩在1861年绘制出版了《大东舆地图》，1864年再版时，一并出版了《大东地志》。

①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第十二卷，论，第10页。

②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第十二卷，论，第12页。

二、哲学思想

随着十八世纪李朝封建社会瓦解的进一步加剧，封建统治思想也日趋反动。与此相反，进步学者坚持了唯物主义哲学原理。

鹿门任圣周（1711～1780）在这一时期坚持了气一元论的中世纪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继承和发展了李珥的积极方面，在反对朱熹和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和佛教教理中，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著有《鹿门集》二十六卷。

他的自然观是气一元论。他认为：宇宙之间，直上直下，无内无外，无始无终，充塞弥漫者，只是一个气。他认为：理不过是气本身内在的必然结果，理在天地之间无立足之地。

他的认识论观点，富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认为：感觉、感情、只有依靠物才能产生。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则停留于唯心主义。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乃圣人之力，国家的富强由仁君所致。

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至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哲学史上居重要地位。它虽然未能从正面反对“天理”、“天命”等唯心主义观点。但它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承认了物质的第一性。

崔汉绮（1803—1873）是一位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不仅对哲学，而且对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数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政治、经济等，几乎无不通晓。他的代表性哲学著作有《气测体义》，还有《神气通》二卷、《推测论》三卷，还有《人政》等。

崔汉绮认为，世界的起源是气。他说：“充塞天地，溃洽物体，而聚而散者，不聚不散者，莫非气也。我生之前，惟有天地气，我生之始，方有形体之气，我没之后，还是天地气。天地之

气，大而长存，形体之气，小而暂灭，然形体之气质，赖乎天地之体而生长”。^①

他认为，事物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他说：动中自静，静中自有动，在动时而不失其静，在静时而察其攸动。

他在认识论方面，也有正确的主张。他承认感觉器官在认识事物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感觉器官接触客观事物才得以认识事物。他说：“舍此耳目口鼻手足者诸触，有一毫可得之理，可验之事乎。”^② 因此，他反对先验，强调经验。他说：钟今未撞，曾闻得见得，撞时声发，故知撞则有声。他承认，认识要经过由近及远，由浅及深的深化过程。

他从唯物主义观点，驳斥了死后灵魂不灭等谬论。他明确指出：“死后之灵魂者，外通之迷惑”。

崔汉绮的哲学思想，是朝鲜封建社会唯物主义哲学的顶峰，是朝鲜哲学史的宝贵财富。

三、文学艺术

这时期，来自人民的作家颇为活跃。进步的两班文化人和实学派的创造活动亦颇引人注目。

小说的主题是多样的，有揭露封建社会腐败无能和不合理的家庭制度的；有描写男女爱情的；有颂扬战场上立功事迹的。有朝文小说和汉文小说两种。不单有短篇小说，还有长篇小说。就小说的形象而言，即有富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也有富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还有“说唱台词”。说唱是深受朝鲜人喜爱的特殊艺术形式。这些台词不少都是杰作，有《兔子传》、《雄雉

① 《神气通》卷一，体通，天人之气。

② 《神气通》，序。

传》、《沈清传》、《春香传》等。十九世纪的被称为“故事书”的小说如《淑英娘子传》、《裴裨将传》、《彩凤感别曲》等都在人民中广为流传。

不少朝文小说是以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为题材而创作的，因此，不知作者，异本亦多。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人民熟悉的普通的人，提出问题也是人民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语言生动，描写逼真。

汉文小说也有新的发展。传为金铉作品集的《虞初续志》和《丹良稗史》，以及金在埜的《六美堂记》，金绍行的《三韩拾遗》等长篇小说，还有朴趾源的短篇小说集《放琼阁外传》等，都是这时期创作的。

诗歌也有发展。引人注目的是庶民和妇女以自身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活动。《辞说时调》，产生于十七世纪，到了十八世纪得到迅速发展。金寿长于1763年作《海东歌谣》，以补《青丘永言》，并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闺房妇女以歌辞的形式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力和感情。其主要内容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和抗议。

实学派人物朴趾源、李德懋、柳德恭，朴齐家和丁茶山等人，在自己的诗歌中反映了现实社会。朴趾源的《从楚亭观日出》、《山耕》、《田野》，李德懋、柳德恭、朴齐家和李书九合著的《四家诗选》都是汉诗中的杰作。

朴趾源《琼放阁外传》里的《马弹传》、《穆德先生传》、《闵翁传》、《两班传》和收在《热河日记》里的《许生传》、《虎叱》等，都是朝鲜文学史上的杰作。

十九世纪，因金笠而闻名的金炳渊汉诗，具有诙谐讽刺性内容，深受群众的欢迎。

四、美术、工艺、建筑

新兴的现实主义画风，到十八世纪后期发展到顶峰。随着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新变化，在十八世纪的画坛上出现了反映人民生活的内容。十八世纪后期，金弘道、申润福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人民生活，促进了人民风俗画的发展。

檀园金弘道（1760~?）同十五世纪的画家安坚是李朝绘画史上地位显著的大师。他描绘了人民朴素乐观的生活。他的绘画主题广泛，有铁匠场、房屋，有河边洗衣的妇女、撒网打鱼的渔夫，有跳农乐舞的农民，也有在二东家的监督下打场的农民，还有樵夫卸背架下棋等等。

惠园申润福（1758~?）在讽刺画中，揭露了两班阶级的腐朽和奸诈虚伪，又描绘了奴婢妓女等平民。

十九世纪的绘画，重新回到四君子、器皿、析枝和花鸟的世界。传统的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由于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申命衍、金秀哲、白殷培等人在描绘花鸟中表现了独具一格的画风。

司瓮院广州分院的瓷器，是李朝后半期瓷器的代表。十八世纪广为普及的是青花瓷器。无论在白瓷上用朱红和火红描绘采花的手法，或者是阳刻、阴刻、透刻和象形等雕饰手法，都曾广为发展。

十八世纪有代表性的建筑，是普贤寺大雄殿（1765年在妙香山）、佛国寺大雄殿（1765年，在庆州）、海印寺大寂光殿（1769年，在陕川）等。

在构筑城廓和楼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水原城是1779年筑成的，规模虽不大，但克服了朝鲜城廓的不足之处，齐备了有利于进攻和防御的设施。

这时期竣工的楼阁有晋州矗石楼（1752年）、安州百祥楼（1754年）。

五、图书出版和奎章阁

这一时期，既是实学的开花时期，又是以王廷为中心的复古主义文化的繁荣时期。英祖和正祖为避免封建统治的危机，标榜要回到十五世纪世宗统治的“太平盛世”，因此很注意图书的编纂事业。《续大典》、《国朝续五礼》、《续兵将图说》等政法、礼仪、兵学诸方面的书籍陆续编辑出版。

在编纂事业中应特别指出的是《东国文献备考》的出版。它共有一百卷，分类为象纬（天文）、輿地（地理）、礼、乐、兵、刑、田赋、财用、户口、榷余、选举、学校和职官等十三考，对朝鲜古今文物进行了考证，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这部文献曾多次补充再版。

从正祖开始编纂的《日省录》为研究十八世纪末以来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图书编辑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促使活字和印刷方面的改进。铸造了优秀的铜活字（壬辰字、韩构子）和木活字（生生字）。

1776年，正祖设立了庞大的王宫图书馆——奎章阁。有内阁（宫内）、外阁（设于校书馆）、江都外阁，收存国内外的各种图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进行分类和整理。

奎章阁的图书在1781年有三万部，李朝末达十八万部。奎章阁不仅是藏书的中心，而且是考证典故、编纂出版新书的中心。

第十二章 朝鲜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江华岛条约》的签订

第一节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国内外形势 大院君的“弊政革新”

一、欧美列强加紧侵略东方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发展到最高阶级。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加剧。欧美各国争先恐后地向亚洲国家伸出魔掌，“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在一个一个地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① 诸列强中，英国是侵略东方的急先锋，继英国之后是法国和美国。

鸦片战争后，欧美列强猛兽般地向中国扑来。1858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随之，英法美俄等国相继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璦琿条约》。

欧美国家的侵略行动又扩展到日本。1854年3月，美国侵略者用炮舰政策，与日本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1858年7月，又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迫使日本统治阶级开放日本港口。英法等国也相继侵入日本。

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民族运动”。受到欧美资本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掀起了反对侵略，维护独立的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页，1974年，人民出版社。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印度和越南也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反侵略起义。

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反侵略斗争继续高涨，各省的农民起义方兴未艾。分散而频繁的农民起义，于1851年汇合成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洪流。革命风暴激荡全国。太平天国革命军于1853年攻克南京，奠都于此，建立了太平天国革命政权。马克思高度评价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并预见它对欧洲可能发生影响。

地处东北亚的朝鲜，是当时尚未遭受侵略的唯一国家。朝鲜由于它的战略地位和丰富资源，引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垂涎。1860年以后，终于成了欧美各国侵略的直接对象。

十九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船只就出没于朝鲜沿海。1840年以后，出没于朝鲜沿海的异样船急剧增加，有的进行军事挑衅，有的强行要求通商，有的则测量航道。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朝鲜，确是面临着将被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征服的严重危险。封建统治阶级惊慌起来，在1860年派金景遂和申锡愚到中国调查第二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但是封建统治阶级不顾国家的安危，仍旧饱食终日，陶醉于“太平岁月”。他们为满足无尽无休的享乐，不断加强封建剥削和压迫，尤其利用“三政”进一步加强剥削。

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农民举行起义。晋州农民起义掀起了起义的新高潮。各地的农民起义揭示了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

二、大院君的“弊政革新”

大院君是在封建制度摇摇欲坠之时掌握政权的。他的统治延续了整整十年。

1863年12月，李朝二十五代王哲宗死，无嗣，迎王族兴宣君之子命福（熙）为新王。新王高宗即位时，年仅十二岁，封其父兴宣君为大院君，治理国事。

大院君掌权后立即提出“弊政刷新”，以图整顿封建制度的腐败混乱，挽救国家危机，巩固李朝封建统治。

他标榜“以才择官”，“四色平等”，决心驱逐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他曾对安东金氏的一个要人说：“吾欲引千里为咫尺，吾欲划泰山为平地，吾欲高南大门三层”。^①意思是说，提高李氏王族的地位，逐出安东金氏和老论派，提高南人的政治地位。

六十年来后党当权的势道政治，招致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混乱。黄铉愤慨地说，“外戚是亡国的祸根”，又说，人们只知世上有安东金氏，却不知有国。

大院君痛恨安东金氏的势道专政。1864年，他从领议政开刀。4月，免除领议政金左权；次年1月，免除金洪根。接着一个个地将安东金氏要人从国家的重要部门驱除出去。

同时，新设宗亲科，选拔王族亲属，置于国家重要部门。此外，还器重北人和南人，以及西北和开城地区的人，甚至庶子及其子弟或常人。大院君执政时期，掌管警务的千禧延、何正日等人都是常人和中人。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垮台后，对他们的一些人大院君也采取了留用政策。

书院原系“祭祀先贤，尊崇士气”的场所，后逐渐变成两班儒生终日闲谈，制造舆论，煽动派别斗争的巢穴。书院拥有庞大的土地，不向国家缴纳地税，把附近农民变成院奴，任意剥削。据载“书院弊多，儒生跋扈强梁，侵虐人民”。人民痛恨书院，把万东庙和华阳洞书院说成“南方之蠹”。大院君下令只留四十

^① 黄铉著：《梅泉野录》，第3页。

七个赐额书院，其余六百多所书院统统撤销。各地书院纷纷表示抗议，但大院君坚决果断，毫不动摇。他愤怒地说：“苟有害于斯民者，虽出于孔子，我不能恕。而况书院为祀先儒，而变为盗藪，重得罪于孔子，何可置之”。^①

大院君为加强封建统治，着手重建景福宫，修建各官厅。景福宫在壬辰卫国战争时被倭兵烧毁，三百年来始终未得到修复。大院君为此筹集庞大经费，他把“结头钱”增加一倍，又征收“愿纳钱”，名曰自愿，实则强征。因此，人民怨恨说：非为“愿纳”，实乃“怨纳”。在汉城，新设“门税钱”。在地方，则设按丁征收的税，民谓之肾囊钱；按田亩征的税，民谓之水用钱。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也未能满足财政的需要。因此，又铸造当百钱，以百倍的币值强行流通。

大院君不仅强行征收现款，还征收石料、木料和铁等建筑材料，甚者“敛民间鼎釜犁铧之破者，逐户上下定其斤两”。

大院君的这些措施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有些儒生和官吏上疏要求纠正。大院君置之不理，继续搞重建工程。他筹措钱款七百八十万两，又动员大量的“自愿赋役”。从1865年4月至1868年7月，历时两年三个月完成了庞大工事。在修建景福宫的同时，还修建了议政府、三军府、六曹和宗亲府等中央统治机关的官厅。

大院君对“三政”作了调整。1867年12月，规定新建宫房时，宫房地作为“无土”，祭祀人绝代则收回该地，租给其他人。1871年3月，决定两班一律缴纳军布；又确定“结田偿还”制度，如果一个人偿还不起“还资谷”，就得由屯子共同偿还，偿还时以土地面积为准。

^① 朴殷植：《韩国痛史》第二编，第4页。

大院君大力推行了加强国防的措施。首先，改革军事体制：取消备边司，恢复三军府；命令全国各地征募士兵，加紧训练；禁止武官乘轿，必须骑马。其次，加强军事装备：派人到日本购买刀和鸟铳，铸大炮；加强海防和边防，重修江华岛的文殊炮台和仁川的永宗炮台；加强南阳湾的防备；江华岛设镇抚营，广征健勇的青年，名曰“别饶士”，直属镇抚营。在茂山、厚州和庆源等地开拓屯田，加强东北边防。

大院君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是历代先王时期所少有的，带有一定的特色。他推行的政策旨在巩固封建王朝。他不懂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昧于时务，因此，他的政策不能反映朝鲜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只是在封建制度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只能是一种封建性质的改革。

尽管如此，他的改革却对调整封建制度、巩固国防力量、抵御外国侵略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瓦解。

在大院君看来，只有防止资本主义侵略，使朝鲜永远同资本主义国家隔绝，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他加强了闭关自守政策。当时称这种政策为“国禁”。

大院君把天主教看成是“贼寇之先导”，严厉镇压。1866年2月，大兴检举之风，在全国各地搜捕天主教徒，史称“丙寅邪狱”。大搜捕延续了几个月，致使人民群众胆战心惊。在汉城和各地方逮捕和处决了数以万计教徒，非法潜入的九名法国教徒也被处死。

封建政府坚决取缔同外国的贸易往来。自李朝建立以来，同外国的贸易就已大幅度减少，只与中国和日本保持有限的贸易关系。大院君进一步加强检查制度，无论中国或日本进口的货物，不得夹杂欧美商品，不准购进和使用此类商品，违者严厉制裁。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以恢复朝日关系为名向朝鲜政府致送了“王政复古通告”，“天皇之信”一类的文件。朝鲜政府则以外交文件格式与以前不同为由，予以拒绝。其原因则与大院君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有关。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的挑衅行为，也使朝鲜政府警觉起来，采取强硬措施。

大院君的封建改革和对外政策是在没有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国家面临资本主义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的。它虽对防止外来侵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毕竟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的破产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朝鲜军民击退美法军事侵略

一、“舍门号事件”

美国的侵朝阴谋由来已久。早在1845年，美国众议院议员、众议院海军委员会负责人富拉特就曾拟出了“开放朝鲜案”，提交众议院会议。他毫不掩饰地说：“刺激商人和海员的事业欲望的时机到了”要求议会为开放朝鲜采取必要措施。

法国驻华当局以教徒遇害为由，也准备侵略朝鲜。美国驻华当局不满意法国的抢先行为，便先发制人，炮制出“舍门号”军事侵略事件。

1866年8月，活动在中国天津的美国人普雷斯顿，率领他的武装集团，乘坐装有两门大炮和其他武器的“舍门号”商船，窜到大同江下游，对朝鲜地方官员的劝告和抗议置之不理，继续经万景台而上，8月22到达平壤城外。

朝鲜官员先后四次供给他们所需米、肉、蛋等物质以示关切，并劝其早日离开。美国人则对这些劝告置若罔闻，“小不退

去，掠夺商船”，“益肆猖狂，轰炮放铳”，^① 杀伤老百姓。8月28日，平壤监营代表在闲似亭会见普雷斯顿等人，严正抗议他们的罪行，并要求马上撤走。可是普雷斯顿却恬不知耻地要朝方供出一千石大米和大量的金银、人参作为撤离的条件。

朝鲜人民不能容忍他们的强盗行径。8月31日和9月1日，朝鲜军队在平壤人民的支持下向舍门号发起攻击。由于武器简陋，敌船坚固，未能达到预期目的。9月2日，平壤军民用小船以火攻战术烧毁了敌船。这是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第一次胜利。

二、“丙寅洋扰”

朝鲜人民击沉舍门号后，欧美侵略者又接踵而来。朝鲜军民承担了维护国家独立的神圣使命。

法国侵略者把“丙寅邪狱”看成是侵朝的最好借口。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狂叫什么，朝鲜王国杀害我国国民之日，就是王国的末日，朝鲜国王自己宣告了自己的下场，等等。

1866年9月21日，法国驻印度支那舰队司令罗兹率领三艘军舰侵入南阳湾，驶入江华海峡，进行军事挑衅。法国侵略者在同朝鲜官员的谈判中，恶狠狠地说：“主定征伐高丽不仁不义之邦”，“你杀我九人，故要杀你九千人”。^②

各地人民获悉法军入侵，纷纷要求组织义兵，抗拒侵略者。爱国儒生上疏，表明反侵略的立场。9月28日，封建政府张贴布告于汉城各门，号召忠于国家的军民奋起消灭侵略者。

法国侵略者意识到单靠三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难以征服朝

① 《备边司誊录》第二百五十一册，高宗3年，丙寅7月。

② 《高宗实录》卷三，丙寅，3年，7月。

鲜，便暂时退回芝罘。

朝鲜政府乘机维修船只，筹措军粮，加强了海岸警戒和炮手训练。另一方面，派出召募使，“纠合义旅，刻起赴京”。

法国侵略者集结驻扎在中国和日本的兵力，用七艘军舰运载二千五百名士兵，再次入侵朝鲜。10月16日，他们在江华岛登陆。江华留守和通津府使被法国侦察兵吓坏，弃城出逃。江华城被法军占领。侵略者在江华城干尽了坏事，许多文物被烧毁，宝贵的历史文献和贵重金属被劫走。

法国的侵略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地人民组织了义兵。仅在汉江下游地区就有四千多人动员起来。平安道云山郡安乐丰，正巧身病，不能赴义阵，就卖家房。捐款以助粮资。平壤朴时铨和权基国，“自闻沁都抢壤之后，忠义激发，相与图议，倾荡出财，办米百，船运来，愿助军需。”^①这一形势促使大院君采取坚决抗拒的政策。当时，政府决策人中意见不一致，有的主张议和，有的提议“奉御驾迁北汉”。大院君毅然反对这些主张，他说：“国无不亡之国，人无不死之人，死耳，亡耳，宁可向夷虏乞和，亦何闻警即窜乎。”^②

10月18日，法国侵略者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严惩杀害教徒的有关官员，缔结通商条约。对此，巡抚营发出复函，严厉谴责了法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

朝鲜军民在被占地区英勇作战。韩成根指挥的军民在文殊城打了一次阻击战，打退了企图从通津登陆后攻打汉城的敌人。千总梁宪洙率领由平安道猎手组成的五百多人部队，在深夜横渡江华岛，占领了鼎足山城。梁宪洙部在该城南门阻击敌人，粉碎了

① 《备边司誊录》第二百五十一册，高宗3年，丙寅，十月。

② 朴殷植：《韩国痛史》第二编，第11页。

敌人占领整个江华岛的计划。爱国军民在战斗中充分表现了爱国精神。有的“躬昌矢石”，勇以作战，有的“孤军对敌，不移一步”，有的“奋不顾身贾用作势”，有的“三人贼窟”，“悉探贼情”。^①

法国侵略者虽然占领了江华城，但在四十天的几次战斗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885年德国驻华公使说，十年前法船驶入汉江，“兵损其半”。法国侵略者感觉到，如果再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给养和兵力都将难以解决。于是，于11月初撤出江华岛。朝鲜海岸炮兵轰击了败退的敌舰。

三、“辛未洋扰”

美国始终不放弃侵略朝鲜的野心。1866年12月，美舰瓦秋塞特号侵入黄海道长渊地区，找当地官员追问舍门号的行踪。瓦秋塞特号返航后，美驻华当局进一步部署新的侵略计划，策划了世界近代史上空前卑鄙的盗墓事件。这一计划是由朝鲜逃到上海的法国教士和朝鲜教徒提出来的。他们建议挖掘大院君之父南延君的陵墓。他们说：“谁占有它，谁就获得绝对权利，其意义将不亚于占领京都”。^②

美国人詹金斯和德国投机商奥贝特，听取教徒意见后就着手策划。美国驻华代理公使完全同意他们的行动方案。1868年5月，美舰申南多阿号在南浦近海进行炮轰时，由詹金斯指挥的中国号船窜入忠清道牙山湾，换乘小火轮至德山郡九万浦登陆，诈称俄国士兵，赶到伽倻洞墓地，匆忙地开始盗掘。但是该墓庞大，又坚固，到翌日凌晨只挖掘了墓的一角。附近群众发现后，

① 参看《备边司誊录》第二百五十一册，高宗3年，丙寅，10月。

② 埃伦斯·奥贝特：《禁断国》（朝译本），第287页。

携带锹钁，赶到现场，连呼带喊，投掷石头。盗墓者感到“生命处于危急之中”，乃匆忙逃窜。

1868年后，美国政府重新考虑派遣远征舰队问题。1869年，增派四艘军舰以加强美国亚洲舰队，任命罗杰斯为该舰队司令官，同年底，任命倭裴迪为驻华公使，1870年4月，任命倭裴迪为全权代表与朝鲜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参照1854年《神奈川条约》和1858年《江户条约》的内容缔结条约。

1871年1月，倭裴迪通过中国礼部致函朝鲜政府。该信充满威胁词句，说什么：如拒绝签订条约，则朝鲜方面要负破坏“友好关系”的一切责任。又说：大约二十年前，日本人使美国水手致死，因而总统派提督率舰队至日本，缔结了条约，等等。美国侵略者在准备进攻过程中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

1871年5月8日，美舰队由上海启程，到日本长崎，最终完成进攻准备。远征舰队由五艘军舰组成，配有几十门大炮和一千二百名士兵。倭裴迪亲自坐阵旗舰，狂叫什么：对东方政府或人民若要宽大，就要犯政策上的错误。

1871年5月30日，美舰开到江华岛南边的勿溜岛。但他们却狡辩说，舰队来此只是准备与朝鲜政府协商、占据一定海域，等待缔结条约。他们擅自测量水域，非法闯入江华航道，向孙石项前进，靠近炮垒，进行无理挑衅。朝鲜沿岸炮兵向敌舰猛烈射击。这是维护主权的正当行为。美舰不仅不离开此地，反而一齐开炮，第一次战斗打响了。战斗是很激烈的。美舰的一个大校军官说：“从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火与铁的有害炮烟，集中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和时间内”。^① 朝鲜海岸炮兵在激烈的战火中击伤美两艘军舰。

^① 李熙一：《美国侵略史》（一），第34页。

美侵略者组成七百多人的登陆部队，于6月11日在草芝镇南侧登陆，试图打开通往汉城之路。由草芝镇金使李濂指挥的五百名军队利用夜幕，消灭一百多敌人。11日，美军从水陆三面包抄广城镇。鱼在渊指挥的朝鲜军队和义勇队，誓死战斗，寸土必争。鱼在渊、鱼在淳等许多官兵在同敌人的搏斗中英勇献身。甚至敌人也赞叹说：他们接触过的对手，就勇敢而言，很少有哪个民族能够如此坚决斗争的。

美国侵略者付出很大代价才占领了广城镇，但征服朝鲜的前景是渺茫的。于是，敌人弃城撤回勿溜岛。

朝鲜军民对侵略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不断加强抗击措施。在汉城街巷和全国各地，立起“斥和碑”。碑上刻上了“洋寇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的十二个大字，下首写着“戒我万年子孙”。朝鲜政府对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鱼在渊赠兵曹判书，谥忠壮。汉城上下人士夹道迎接鱼兵判灵柩，“车马延十里”。

朝鲜坚持抗战的形势使美国侵略者认识到，“示威，对朝鲜政府丝毫没有影响”。于是，变换手法，提出：“贵政府应迅速采取贤明政策，以免今后发生争议”的要求。但敌人始终看不到朝鲜政府在态度上有任何变化，终于在7月3日溜回芝罘。

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取得辉煌胜利。朝鲜人民在斗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勇敢精神和爱国热情。外国舆论也对此给予很高评价。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反侵略斗争，揭开了朝鲜人民近代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

第三节 开化思想的兴起和开化派的形成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朝鲜封建制度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这

种危机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

1860年，庆尚道地方出现了东学。创始人崔济愚出身于没落两班家庭，长期经商，走遍了各地。东学在教义上借用了儒、佛、道的理论。这个学说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崔济愚说，我们的“学”是“东学”，我们的“道”是“天道”。其基本思想是侍天，这个天就在人的心目中。于是提出了“人乃天”。

东学带有反侵略的因素。崔济愚的言论中可看出他对现行政治抱有不满意。在他看来，既然“人乃天”，则人心乃天心，如人人“守心正气”，则亿兆人的心可以天心一致，一切矛盾会得到解决。东学又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欺骗性大，因此，在以庆尚道为中心的边沿地区迅速传播。李朝政府对此感到不安，以“惑众”、“邪说”为名加以镇压，并于1864年，处死崔济愚。

西学（天主教）和东学的传播表明封建统治思想处于混乱之中，因此，封建儒生提出了“卫正斥邪”的口号。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内心欲望。但在持有“卫正斥邪论”者中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人提出应适应时代要求的主张。1864年7月，付司果李辉炳要求实行柳馨远提出的改革方案。

上述思想均不能代表朝鲜社会前进的方向。朝鲜社会的发展趋势，要求产生适应这种趋势的思想，这种新思想就是开化思想。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朝鲜封建社会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有一部分人试图在封建制度的框子内解决矛盾。与此相反，有一部分人则寻找另一条路子。朝鲜社会经济的发展揭示了这种道路。资本主义萌芽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它虽然微弱，却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欧美资本主义的侵略，促使一部分人觉醒起来。他们认识到

不触及封建制度的改革，不是长远之计，只有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国家经济才能好转，国防才能真正得到加强和巩固。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实学派思想对开化思想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实学派的著作在知识界中广泛流传。据载，丁茶山的著作“私相抄写”，“无不珍藏”。

中国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对朝鲜开化思想的兴起起了很大的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1852年以前传到朝鲜。这些书在朝鲜知识界中引起很大反响。有的称其为“奇书”，有的把它看成“必需之书”，赞它为“不守诂训空言，专以实事求是为主”的好书。

开化思想的先驱者是吴庆锡和刘鸿基（刘大致）。他们都是中人阶层家庭出身。吴庆锡在青年时期非常关注朝鲜的现状。他在燕京旅行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他深深感到朝鲜政局腐败，不进行改革，下场是可悲的，朝鲜好似“风前灯火”。他在中国旅行时买到不少新书，认真研究，又转给刘鸿基阅读，并把自己学到的新知识传授给刘鸿基。这使他们两人产生了共同语言。

在部分高级官员中，也出现倾向于开化的人，其代表者是朴珪寿。他是著名实学家朴趾源的孙子，从小就受到实学思想的熏陶。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出使中国，接触了资本主义文明。他们看到了朝鲜形势的严重性，认为应该在政策上来个大改变。他说：“顾今宇内情形日变，东西诸强并峙，与曩日春秋列国之时相同，会盟征伐将不胜纷纷矣。……内治外交不失宜，则犹可自保，不然则昧弱先亡，天之道矣”。^①

吴庆锡、刘鸿基等人在有为青年中宣传开化思想。1870年

^① 《璫斋集》卷之七，第25页。

前后，刘鸿基结识金玉均，交往中认识到金玉均是非凡之人。因此，把地理、历史和译本和其他书籍供金玉均阅读。从此金玉均拜刘鸿基为师勤奋学习，在政治上迅速成长。以金玉均为首的两班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人均聚集在刘鸿基门下。他们还同年纪稍大一些的鱼允中、金允植、金弘集等人，时常拜访朴珪寿。朴珪寿在自己的厢房接待青年，讲解时事，阐明挽回国运的途径。

他们认真探索“保国”之途，认识到朝鲜“非富强无以难保”，只有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吸收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工商业，才能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维护国家独立。

七十年代，开化思想在朝鲜思想界占有一定地位。本年代中期，金玉均编辑了《箕和近事》，朴泳孝编写了《地球图经》。这类书早已佚失，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据池锡永上疏《箕和近事》和《地球图经》“足以开发拘曲了解时务者”^①。两部书的问世，标志着开化思想作为一个思想潮流已经形成，日益被人接受。

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努力宣传开化思想，物色立志改革之人，不问身分贵贱，结成秘密组织“开化派”。据《甲申日记》，这一组织在七十年代中期业已形成。“开化派”的重要成员均在政府中任职，他们以合法身分著书立说，以各种方式宣传开化思想，努力扩大思想影响和政治力量。

^① 《高宗实录》卷十九，19年8月。

第四节 日本开始侵略朝鲜和商埠的开放

一、大院君的下台和“云扬号事件”

大院君一上台就搞垮了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但未能注意到闵妃后党势力的成长。1866年3月，闵妃养哥闵升镐窃取兵曹判书之职，从此闵妃一派在中央和地方占居主要地位。

大院君的政策未能解决社会矛盾。农民起义迄未停止，儒生和中小地主的不满情绪逐渐高涨。闵妃一派乘机怂恿这一局势。因此，儒生们纷纷上疏批判大院君的政策，并且日益尖锐。1873年10月，承政院同付承旨崔益铉连续两次上疏论及时政。实质上这是对大院君的一大挑战。闵升镐、赵宁夏支持崔益铉的上疏，在他们的压力下崔益铉被任命为户曹参判，这表明大院君在政府内不能作主的趋势已定。于是，大院君于1873年11月不得不放弃政权，隐居云岘宫，国王开始亲政。

从实质上讲，国王的亲政标志着闵妃后党政权的建立。闵妃后党掌权后，全面恢复书院。1874年5月，高宗表示不必禁止洋布。他们责备大院君的对日强硬政策。为了讨好日本，罢免了庆尚道观察使和东莱府使，甚至把朝日关系紧张的责任，推给倭学训导安东俊，将安斩首，枭首于倭馆前面。

他们的打算是，一方面引进日本势力，以改善朝日关系；同时引进欧美势力，以牵制日本侵略。从这种外交政策出发，赵宁夏于1874年8月，秘密致书驻倭馆的森山，表示朝鲜政局一旦变化，政府将努力改善对日关系。

日本政府得知朝鲜政局变化，便于1875年2月任命森山为理事官派往釜山，进行交涉。交涉遇到曲折，森山向日本国政府

汇报情况，并建议“派我军舰一或二艘到对马与朝鲜间的海域，时现时隐，测量海路，使其知我意之所有。朝廷则表示督促理事官迁就的姿态，以逼迫他们。”^①

日本政府采纳森山的意见，于1875年5月，派云扬号等三艘军舰到朝鲜海域。9月，云扬号又窜到朝鲜沿岸，对朝鲜南西沿岸进行调查和测量，继续北上，“来泊于沁都至近之地”^②。朝鲜政府不知异样船的国籍和来意而极为不安，决定派译官到该船问情。非法进入“国都之门户”的云扬号不肯离开，其陆战队乘小艇接近草芝镇炮楼进行挑衅。该地系“海港之隘口”。该炮台是为“防暴客之窥视”而设的。草芝镇炮台不能沉默。后来，朝方对此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说：“入境问禁，礼经所载，而初不以某国船某事来，即进防守处，边戍发炮，亦不得已之事也。”^③就事实的真相而言，朝方的发炮确是不得已的，被迫的。但这正是日本早就一直希冀的，以开启战端。但朝鲜炮兵勇敢顽强。日本侵略者无望占领草芝镇。于是，便改变方向，侵犯闲散岛，杀害和平居民，烧毁了住房。然后，炮轰永宗岛，摧毁炮楼，进犯永宗岛。由于日军的野蛮行径永宗岛变成一片废墟。这就是云扬号事件。

二、《江华岛条约》的签订

“云扬号事件”是日本政府有组织有步骤执行侵朝计划的一部分。日本政府挑起事端后，按既定方针行事。他们贼喊捉贼，说什么朝鲜“对我舰施加暴行，分明以我为敌”，“终与我断绝”

① 井上清著：《日本军国主义》，（日文版），1，第163页。

② 《承政院日记》，高宗12年，乙亥，8月22日。

③ 《日省录》高宗篇，十三，丙子，正月。

等等。11月，日本政府决定，于1876年1月中旬派全权大使赴江华岛，同时派先报使到釜山，通知这桩事。

日本政府很快做好作战部署，内定远征军的人事安排，并在有关远征军司令官的诏书中规定，“为赔偿战争损失”授予掠夺朝鲜的权力。1876年1月，日本政府委派军阀黑田为全权大使，井上馨为付大使，率领七艘船只和一千多名陆战队开赴朝鲜。

同时，日本政府又另行开展外交活动，通过驻华公使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质问中国与朝鲜关系的实质。目的在于使中国在朝日摩擦中保持中立。

日本还与欧美列强打交道。黑田所率征韩先遣队启程的当天，日本外交大臣在外交部召见欧美驻日使节，说明黑田的朝鲜之行。英美等国使节均赞许日本的行动。美国公使说“谈判成功，两国都有利”。他将美国人所著的《柏利远征日本小史》一书赠给井上，并说：只要你读好这本书，并照此行事，定能获得成功。日本外务大臣毫不掩饰地说，日本全权大使将在朝鲜从事柏利在日本作过的事。他们一唱一和，表明在对朝侵略上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日本谈判代表蛮横无理，竭尽威胁之能事。在谈判席上，他们以“侮辱国旗”为由，追究责任，同时又乱放舰炮，以显示强横。朝鲜政府代表未作任何抵抗。2月，在江华岛缔结了《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岛条约》，共十二条，主要内容如下：

条约的第一条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这条是针对第三国而言的。日本在这一词句的幌子下，用条文的形式规定了日本的权力和朝鲜的义务。

1、朝鲜除开放釜山外，于二十个月内，再开放两个通商口岸，同时给日本商人以各种方便条件。

2、日本有权擅自测量朝鲜沿海岛屿和暗礁，有权绘制海图。

3、日本有权在朝鲜指定的港口设立领事馆，日本人在朝鲜的犯罪行为，由日本领事处理。

条约名曰《朝日修好条规》，其实是单方的，只为日本商人开放朝鲜港口，而不为朝鲜商人开放日本港口。开港地点是按照日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强行选定的，在开放城市里划定租界由日本官员专管，朝鲜官员不得过问。显然，这是“国中的小国”。领事裁判权不适用于双方。日本外务大臣明确表示，该条款不适用于旅居日本的朝鲜人。这是弱肉强食，强国欺压弱国的最突出最露骨的表现。

当时，国际上都承认每一国家的领海权。日本却不承认朝鲜有领海权。日本自由测量朝鲜领海，绘制海图是侵犯领海权的表现。

总之，朝鲜根据条约规定，对日本负有许多屈辱性的义务，与此相反，日本则攫取了朝鲜的许多权利，而不承担任何义务。《江华岛条约》是朝鲜政府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朝鲜逐步变成半殖民地。

三、《通商章程》的签订和通商港口的开放

《江华岛条约》第十一条规定，在条约签订后的六个月内，另行签订通商章程“补添细目”。1876年6月，日本政府派外交官员为理事官前往朝鲜，与朝鲜进行谈判。当时日本政府所考虑的是，今后应采取何种办法把贸易搞上去，废除过去朝日贸易中对马岛的垄断地位后，其所受影响应如何处理等问题。

日本政府基于这种基本方针，对理事官作了两条指示：一是几年间免除关税，如朝方坚持设关收税也不得超过从价的百分之五；二是仿效对马宗氏公贸易的先例，以日本的铜和锡换取朝鲜的米和木棉，以解决对马需要。

朝日代表于8月23日，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这是有关《江华岛条约》的补充。附录规定：日本人可以用日币购买朝鲜人货物，朝鲜人可以用换取的日币购买日本人货物，换句话说，在通商港口可以任意流通日本货币。贸易规则规定：在朝鲜诸港口可以进出米和杂粮；进港商船要交港税，但日本政府所属船只不缴港税。

无关税通商贸易，是近代国与国间通商所罕见的。这是日本代表的狡猾奸诈和朝鲜代表的愚昧无知而造成的。日方在草案上未写进关税问题，朝方对此未提出任何意见。日方为了将来不给朝方以任何把柄，在给朝方谈判官员的信中拐弯抹角地提出这个问题。日方在信中说：日本政府对朝鲜输出的商品和从朝鲜进口的商品都免除关税，我们仅仅作了这么个宽裕的处理。朝鲜官员不仅不知受骗，还在回信中对此表示谢意。于是，日本便以换文的形式命令朝鲜代表承认了无关税贸易。

《贸易章程》的签订标志着釜山被开放了。釜山以外两个地方开放的都是由日本选定后强加于朝鲜政府的。1879年开咸镜道元山港。1880年开仁川港。朝鲜政府对开放这两个港都不同意，经过反复谈判，拖延时间，终于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釜山、元川、仁川三个地方，设置了日本专属居留地。

第十三章 开港后朝鲜的社会 经济状况和改革运动

第一节 开港后朝鲜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

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后，日本很快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这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日本当局的政治需要：即把日本“亿万人的眼睛”，尤其是没落士族和商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外方面。

日本通过《通商章程》的签定，获得无关税贸易权，又取得运回粮食的权利，从而可以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特别是对马的粮食问题。

日本政府对朝贸易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朝鲜贸易的基本性质。表 13—1，表 13—2 说明了朝鲜对日贸易的基本情况。

表 13—1 开港前朝鲜对日贸易情况^①

年度 \ 进出	出 口	进 口
1873 年	52,382 元	59,664 元
1874 年	55,935 元	57,522 元
1875 年	58,787 元	68,930 元
1876 年	82,572 元	81,374 元
计	251,676 元	267,490 元

^① 俄国大藏省编：《朝鲜志》（朝文版），第 283 页。

表 13-2 开港后朝鲜对日贸易情况^①

年度 \ 进出	出 口	进 口	计
1877年7月1日 1879年6月30日	228,554	119,539	348,092
1878年7月1日 1878年12月31日	142,618	154,707	297,325
1879	566,953	677,061	1,244,014
1880	978,013	1,373,672	2,351,684
1881	1,944,761	1,882,659	3,827,420
1882年1月1日 1882年6月30日	742,562	897,225	1,639,787
计	4,603,437	5,104,859	9,708,296

资料表明，开放以前对日贸易基本上维持平衡。开放以后进口就迅速增长。1877年至1879年的贸易，主要通过釜山进行。之后元山和仁川相继开放，因此，贸易额猛增。

日本的贸易带有转买性质，日本商品仅占百分之十一点七，欧洲商品占百分之八十七点三，但日本商品占的比重按品种而异，食品则占百分之百，与此相反，绵织品和染料则仅占百分之二，金属和其他制品占百分之三十四。这说明日本的纺织工业还很落后。进口的日本商品中金属和金属制品在比重上占第二位，但绝对额则占第一位，远远超过食品的进口额。

粮食和贵金属在朝鲜出口商品中占百分之九十。其中粮食尤其是大米则占首位，这是日本所迫切需要的。

^① 俄国大藏省编：《朝鲜志》（朝文版），第285页。

通过日本商人流入朝鲜的资本主义商品，对朝鲜经济起了破坏作用，但日本商人又不可能完全控制朝鲜工商业的发展，这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从日本方面来讲，它的经济力量还较薄弱，日本对外贸易热潮刚刚兴起，仍感“开辟朝鲜市场的资金不足”。初期来到朝鲜的日本商人，如按地方划分，则以对马为中心的九州一带和山口等地为多，如按阶层划分，则多为剧变中形成的没落商人或“不平士族”，他们的大多是“小本薄资乃至徒手空拳”，梦想一攫千金，致富归国。另一方面，从朝鲜来讲，封建政府也致力于保护朝鲜工商业者，抵制日本商人的活动。

上述情况都是发展朝鲜工商业的有利条件。日本商人和朝鲜工商业者竞争激烈，有的日商甚至破产回国，1883年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有些朝鲜工商业者在竞争中倒闭，但也有些在竞争中得到发展。

商业迅速发展。开城高人朴广叟购进商品的次数逐年增加。1877年四百三十四次，1886年六百三十七次；贸易额从1877年六万三千八百两增加到1886年的九十万六千二百多两。

有些部门，工场手工业日益发展。定州纳青地方有三十多家输器工场；京畿道的安城，全罗道的求礼、全州，黄海道的载宁，都是输器产地。

铁器加工工业也在发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介川有三、四个工场。朴某有三处作坊，八十多名工人，生产大小不同规模的锅。1887年，金某开办“釜铁工场”，生产农机，农机刻有“金”字。

通过日商进入朝鲜的英国棉布，细密漂亮，受到两班和富裕阶层的欢迎，因此大城市的土布生产受到打击。洋布不如土布耐用，故广大农村居民和城市劳动群众不爱用。因此土布生产尚有较大的市场。日本大阪、爱知、静岗等地的一些资本家，建立新

厂，专门为输出朝鲜而生产棉布，但不能一下子就抑制住朝鲜的土布生产。朝鲜的商人和富人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土布、在市场出售，甚至用船输送到很远的地方。

全罗道和京畿道的一些地方新建许多造纸工场，如马安造纸所、李汉周制纸所、金东元制纸工场、金文三制纸工场等。朝鲜生产的纸张，基本上用来满足国内需要，一部分也输出国外。

采掘工业也有所发展，其规模也较大。1889年富宁金矿有八百多名工人。1885年，永兴金矿有二千名工人，平康金矿有三千名工人。这些矿山工人都是由许多资本家用工资雇佣的。

1880年以后，会社、商会相继出现。1883年，汉城的平安道商人，建立大同商会，受到外衙门的保护。汉城中人，组织长通商会，受到内衙门的保护。据《汉城旬报》，1884年前，釜山、仁川和汉城有几十个会社和商会。这些会社、商会规模并不很大，就其性质而言，有民办，也有官办，有合资的，也有独资的（虽称会社，实则个人）。在这些地方朝日工商业者间，争夺商权的斗争颇为激烈。鉴于这种形势，朝鲜工商业者合资经营企业，壮大自己力量。这是工商业中的新现象。

1883年，元山商人组成元山商业会议所；1885年，釜山和仁川相继成立客主商会，以此对抗外商的竞争，保护自己的利益。

第二节 “壬午兵变”

一、兵变前夕的政治形势

《江华条约》签订之后，朝鲜社会矛盾有了新的内容。不仅存在封建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还存在朝鲜人民与外

国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壬午兵变”就是这些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闵妃为中心的执政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继续加强剥削和压迫。“三政”恢复原来面貌，折磨着广大农民群众。从中央到地方，官纪松弛，掠夺欲望日益膨胀，贪污盛行。1877年，在几个地方被揭露出来的贪污现象是骇人听闻的。卖官鬻爵是攫取钱财的公开渠道，科举变成生意。

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堕落，宫中“每夜曲宴淫戏，保佑、巫祝、工瞽歌吹媒媾，殿廷灯烛如画、连曙不休。”^①大搞迷信活动，祝福国王、后妃以及王子的长寿。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枯竭，而宫中费用还必须按时筹措。1881年12月，国王拟筹十二万两宫宴经费，由各部门分担，宣惠厅九万两，禁卫营和御营厅各六千两，兵曹五千两，总戎厅四千两，司仆寺三千两。由此，各衙门的财政也同归枯竭。

封建政府的腐败堕落加剧了社会矛盾。朝鲜人民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不断兴起。农村各地不断爆发起义。1878年至1880年，全罗道、京畿道、庆尚道、黄海道等地的农民相继暴动。

封建儒生纷纷上疏，强烈要求抵制日本侵略。1881年2月，庆尚道儒生李晚孙等上“万人疏”，揭露日、俄、美国的侵略野心，要求提防列强。

在大城市，向日本官员投掷石头的事件经常发生。1879年3月，东莱人民以投掷石块同无理取闹的两名日本官员和三十九名日本海军士兵展开斗争。第二天，日本官兵再次窜来，朝鲜炮兵气愤已极，准备“发炮剿除”，几乎酿成武装冲突。

流民的斗争也很活跃。他们是“聚党持械”的武装队伍。

^① 黄铉：《梅泉野录》，第40页。

1881年，活动在庆尚道和全罗山间地带的武装队伍，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斗争口号。他们对“富村饶户、传檄征索，称曰义兵而伐倭”。可见，游民斗争具有反封建反侵略的性质。

长期以来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给汉城市民和军队以很大影响。他们的生活处境促使他们起来反抗。1877年8月，训练都监军人因为不按时发饷酝酿起义，但被镇压。1881年5月和8月，江华岛的军队和汉城的军队，相继制订起义计划，也均遭失败。虽然如此，它却表明了汉城军人的反抗精神。

二、“壬午兵变”的爆发

封建统治阶级的弄虚作假激发了汉城士兵的起义。1881年以来，封建统治阶级连续十三个月未发军饷。到1882年7月，只发了一个月的饷米。这一点米也被闵氏一派“弄奸牟利”，“和糠换米”，已“不堪食用”。对此士兵激愤异常，拒绝领米。

炮手金春永、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等，率领士兵质问库直，气愤至极，欧打了他。宣惠厅堂上兼兵曹判书闵谦镐得知此事，令军官逮捕金春永等几人，关押于捕盗厅，宣称处以死刑。金春永的父亲金长孙伙同柳卜万弟弟柳春万，“独有救子之心而发通文”，^①号召士兵们开展运动救出金春永等被捕人员。接到通文的士兵愤怒地说：“饿死，法死，死等耳，宁杀当杀者，以一雪耳。”^②士兵在柳万春、金长孙的带领下，于1882年7月23日举行了起义。

起义士兵杀向闵谦镐家、捣毁其房屋，冲进军械库，夺得武器，又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捕入狱的士兵和无辜群众。

^① 《推案及鞠案》，30，高宗2年，第419页。

^② 黄铉：《梅泉野录》，第57页。

士兵到云岫宫找大院君诉冤。大院君阳一套阴一套，镇抚起义士兵；另一方面又拐弯抹角地说，发放饷米由政府主管，力图把斗争锋芒引到当权人物身上。

于是，士兵分成两队：一队奔赴京畿监营，打开武器库，夺取武器，奔向日本公使馆；另一队袭击闵泰镐为首的政府高官的住处，然后直奔下都监。留在兵营的另技军士兵也参加了士兵起义。他们处决了仓皇出逃的日本教练堀本。

起义士兵聚集于日本公使馆，高喊“赶走日本侵略者”“砸碎日本公使馆”等口号。许多汉城贫民也参加了起义队伍的行列。起义军重重包围了日本公使馆，向公使馆投掷石块，进行射击，斗争一直延续到深夜。日本公使花房趁夜率其馆员，“自焚其舍，冒刃突出”，逃到仁川。

第二天，起义军处死了领议政李最应，从敦化门冲入昌德宫，处决了闵谦镐和金辅铉，搜索王宫，寻找闵妃。闵妃巧妙地扮成宫女，在洪启薰的护卫下，逃出王宫，到忠清道长湖院躲避。

起义军民经过两天斗争，取得巨大胜利。闵妃后党的显赫人物和民愤极大的大官被处死。“城内外凡诸闵作恶者、卿宰武断者”，“一切焚毁其家，不可胜记”。幸存者均弃官逃命，不敢露面。封建中央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在此形式下，高宗不得已召大院君入宫，委托他处理军国大事。

大院君第二次掌握政权。他恢复了原有的行政机构和军队编制，削去闵氏家庭的政府要职，起用那些拥护自己的两班，重新组织以他为中心的封建统治机构。同时，发放军饷，宣布大赦，以怀柔士兵，又下令士兵退出王宫。

但他对士兵和贫民的迫切要求置之不理，急于筹备闵妃的国葬。有人反对这种作法，认为闵妃的死活尚不清楚，如说闵妃已

死，尸身何在？大院君之所以如此，目的不外两条。一是为镇抚起义士兵。士兵担心闵妃不死，必然要屠杀他们。因此，大院君企图以国葬闵妃使士兵相信闵妃确已不在人世，不必再闹下去。二是防止闵妃东山再起。闵妃是大院君的政敌。在大院君看来，如果闵妃真正死掉，国葬一事就搞对了。即使她没有死，也可以宣布国葬的形式使其不能再度窜入王宫。对大院君说来，国葬闵妃活动既能镇抚士兵，又可对抗闵妃，真是一举两得。

三、“壬午兵变”的失败

1882年的士兵起义，具有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这次起义，对内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外反对了外来侵略者，显示了坚决反对侵略的爱国精神和斗争意志，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

但士兵的起义却因半途而废，终归失败。

当时朝鲜有三派政治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中心的集团，国家大权掌握在他们手里，是起义军的死对头。一派是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派，他们在政府各部门占有一定地位，对朝鲜的政局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以大院君为首的一派，他们是失去权力的一派，是有一定政治能量的潜在势力。

兵变时，开化派的重要成员正在国外。他们没有预料事态的发展会这么迅猛。虽然朴泳孝、洪英植等人也在国内，但还没有拿定处理善后事宜的主意。

大院君是彻头彻尾的卫正斥邪论者。起义士兵也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此，士兵和大院君之间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士兵很快倾向于大院君，把希望寄托在大院君身上。结果，起义为大院君掌握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逃到忠州的闵妃，指示其亲信同在天津的金允植取得联系。

金允植要求清朝“派出船只当陆军千名戒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派丁汝昌、吴长庆和袁世凯等率三千多士兵开赴朝鲜。他们到朝鲜后，就拘捕了大院君，押送天津，进攻王增里和利泰院等地，“分别捕治”。

兵变失败，短命的大院君政权仅存在一个多月。闵妃仍然作为王后返回王宫。从此，闵妃后党政权重新建立起来。

第三节 日本加强对朝鲜的侵略 欧美列强的渗透

一、日本加强对朝鲜的侵略

日本政府获悉“壬午兵变”，便加紧策划侵略阴谋。日本首先派领事近藤率领一百五十名陆军到仁川，将公使的来意通知朝鲜政府。随后公使花房率领一百多名陆海军士兵抵仁川并直趋汉城。四艘日本军舰和两艘运输船停泊在仁川。日本外务大臣专程到马关指挥这场侵略行动。日本政府尚未打算进行战争，因此，他们的名义是谈判善后事宜，护卫公使和日本侨民。日本政府也考虑过谈判破裂的可能性。因此，制定了谈判方针，这就是立足于“和平处理”，但也不排除“强偿处理”，就是说，一旦谈判破裂，就占领开港地区或要冲岛屿，迫使朝鲜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

花房抵京后，立即要求会见国王。他以威胁的口吻说什么“理应兴师追问”，但为了保持和平局面，暂不“兴师”。同时提出七条无理要求，限定三天之内给予答复。他在汉城只住两天就返回仁川，以此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

在谈判中，花房傲慢地说：我们提出的要求，都是你们应作

的事。李裕元对日本提出的条款并未提出多少意见，只是改动些字句便同意了。1882年8月，正式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1. 朝鲜政府在二十天内捕获凶徒，严惩魁首。
2. 朝鲜政府拨支日本遭害者家属五万元抚慰金。
3. 日本所受损失和护卫公使的水陆兵费内的五十万元由朝鲜政府填补。
4. 日本公使馆置兵若干。
5. 朝鲜特派大官到日本向日本政府认罪。

另有《续约》，《续约》规定：日本商人在元山、釜山、仁川的活动范围扩大为五十里，二年后扩大为一百里；日本外交官员及其家眷有权在朝鲜自由旅行。

条约内容，从日本方面来讲，是掠夺性条约；从朝鲜方面来讲，是十足的屈辱性条约。日本不仅提出与兵变直接有关的条款，而且以此为借口提出了其他方面的条款，续约实质上是《江华岛条约》的扩大。

二、欧美列强的渗透

1871年以后，美国曾试图建立在美国指挥下的美、法、英、德等国的十字军远征队，对朝鲜进行统一的军事行动。但未得逞，美国又寻找与朝鲜谈判的路子。1880年4月，美国提督薛斐尔奉美国政府之命来到日本，通过日本政府试探同朝鲜签订通商条约的可能性。同年7月，李鸿章在同薛斐尔的谈话中表示愿意充当中介人。1881年，李朝政府通知李鸿章表示愿同美国进行谈判。在天津的金允植和统理机务衙门参议官李东仁同李鸿章商谈《朝美通商条约》事宜，李鸿章又同薛斐尔会谈。至此，谈判的基础大致形成。1882年，薛斐尔到仁川，同朝鲜全权大官

申晄、全权付官金弘集进行谈判，5月22日签字，并规定一年之后交换条约的批准书。《朝美通商条约》是朝鲜同欧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条约共有14条。主要内容如下：

1. 互派外交使节，在通商口岸设领事馆等。
2. 美国船只在朝鲜沿海遇台风或缺粮、煤、水等，朝鲜地方官员应予援助。
3. 在朝美人的犯罪行为应由美国领事或指派官处理。
4. 美国商船前往朝鲜贸易时，进出口货物应缴税。
5. 朝鲜有惠政、恩典和益施给予他国的，亦准美国官员均沾。

条约的内容显然是不平等的，但同《江华岛条约》相比还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点：一、规定了活动在朝鲜沿海的美国船只的保护问题；二、规定了低率关税；三、规定最惠待遇。这与当时美国政府的总政策有关。美国在准备谈判时，不仅考虑到朝美条约将要带来的直接利益，还考虑了东方政治关系的一般情况。国务卿给薛斐尔的信说；朝美条约的第一个目的，是保护和协助在朝鲜沿海遭难的美军舰和船只，同时要估计朝鲜政府的气氛和倾向，取得通商上的权益。朝鲜位于中国和日本的中间，寻找一个海军活动的立脚点，对美国来讲颇为重要。美国关于通商问题十分谨慎，“估计朝鲜气氛”，同意交关税，又规定了最惠待遇，借他人之手以享受权益。

《朝美条约》的签订，促使欧洲国家驻华使节扑向朝鲜。1882年5月，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威尔士率领两艘军舰驶进仁川，与朝鲜签订了《朝英条约》。6月，德驻华公使来到朝鲜，签订了《朝德条约》。这些条约都是参照《朝美条约》的内容签订的。

英德两国政府对以上条约均不予批准，并施展出种种手段，终于签订了改正的新条约，获得了更多的特权。比如：降低原定

关税率；其外交官可在朝鲜自由旅行；商人身带护照可在内地行商；增加通商口岸；其军舰可在朝鲜海域自由行驶，船上人员可随便上岸等。

《朝德条约》、《朝英条约》是朝鲜同其他欧洲国家签订条约的“范本”。随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同朝鲜签订了条约。

第四节 开化派的改革活动和“甲申政变”

一、开化派的改革活动

开港以前，朝鲜进步人士通过中国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开港以后则情况不同了。朝鲜直接与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日本发生交往。朝鲜进步人士从中辨别“循新泥古之利害”，看到“日则能革古效新”而更张振作，文明富张。^①于是促进了开化思想的传播。

1876年，朝鲜政府派金绮秀为修信使到日本。金绮秀一行到日本参观了工厂、学校以及政府机关。回国后写了《日本见闻书》和《东游记》。他强调仿效日本进行改革，实行富国强兵之策。他说：日本“要以尽其技而利其器，亦自遣各国，以尽学未尽学之术，处处造火轮船、火轮车；教人远贩贾，要以尽其力，而利其货；君臣上下，孜孜为利，以富国强兵为急先务。盖其政令，似出于衙鞅遗法”。^②他在与高宗的谈话中也讲过这些问题。

1879年，金玉均等人筹款送李东仁到日本实地考察。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等一行到日本，参观各种设施，又与日本政界

^① 《尹致昊日记》卷一，1884年7月22日。

^② 金绮秀等：《修信使记录》，第108页。

人物接触，回国后撰写了《日本纪行》。

1881年8月，朴定阳、洪英植、鱼允中等人与随员共六十人赴日详探日本期间，又去中国上海和天津等地，了解中国形势，写出《中东记》。鱼允中深感富国强兵之必要，他说，“顾今局势非富强无以保国”，又说“我虽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必有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难保无他事矣。”^①他强调富强的必要性，认为即使日本对朝鲜有所图谋，如朝鲜富强，它就不会轻易惹朝。

各种见闻和报告书引起了知识阶层和一部分官吏的深刻反响。1880年以后，不少保守儒生掀起“卫正斥邪”运动的高潮，“儒章便成风俗”。“岭南、两湖、畿甸、关东接踵而起”的社会舆论中，有些知识分子和官员挺身而出，敢于上疏，提倡开化，抨击卫正斥邪的错误论点。

1881年6月，郭基洛上疏，批驳“儒章谈阔无补实用”之谬论，并主张“急切之务”是“内修政化，外攘寇敌，而若其器械之艺，农树之书，苟可以利益，亦必择而行之，不必以其人而并斥其良法。”^②在他看来，要“外攘寇敌，必须内修政化，发展新器械之艺，即使外攘寇敌，寇敌之长处也应吸收过来。

1882年，池锡永上疏，首先说明朝鲜实际情况和卫正斥邪的不当。他说：“见稍用意于外务者，则动辄目之以染邪”，其原因在于“见闻不广，昧于时局”，“不识时势”。他又说：“各国人士所著万国公法、朝鲜策略、普法战争、博物新编、格物入门、格致汇编等书，及我国校理臣金玉均所辑箕和近事，前承旨臣朴泳教所撰地球图经，进士臣安宗洙所译农政新编，前县令金景遂

^① 鱼允中：《从政年表》，第108页。

^② 《高宗实录》卷十八，辛巳，18年6月。

所录公报抄录等，皆足以开发拘曲，了解时务者也。”^① 他要求政府设院，培养能解“机械之理，深究进局之宜”的人材，对“能仿样造器，尽其奥妙者”则录用，对“造器”者予以专卖权，“刊书者”予以版权。他说，上述措施均系“自强御侮之策”。1882年8月至9月，主张开化的上疏竟达十七件。

1880年代，开化派的力量继续成长壮大。高宗很喜欢听外国新闻，曾几次召见金绮秀和李东仁，详问日本情况。他设立了别人寺。朴泳孝、金玉均等人以别人侍的特别名义很容易见到高宗。开化派对朝鲜封建政府的内外施政，有一定的影响。开化派和守旧派的差别，明显地表现出来。

他们认为必须来一番大更张，“扫尽危君权贪势苟息之辈”。其方法有二策。“一是得君密敕而平和行事也。一是赖君密意而以力从事也”^② 在他们看来和平的方法朝鲜人也可以用上。

因此，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积极开展活动。1882年7月，政府内新设机务处，金弘集、金允植、洪英植、鱼允中等人在机务处任职。它是协议机关，对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由议政府执行。

1882年2月至1883年4月期间，金玉均先后三次去日本，仔细考察日本的形势，接触在野政界人物。改革需要很多资金，国内一时又不易筹款而设想在日贷款。金玉均明知从外国借款进行改革不是长远之计，但为了改革，还是走了这步棋。1882年夏他从日本正金银行借得十七万元贷款。

开化派非常重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1881年7月，派了38名进修生到天津机械局学习技术。1883年3月，选拔六十一

^① 《高宗实录》卷十九，壬午，19年8月。

^② 《金玉均全集》，第117页。

名青年到日本。他们中的一半以上是学习军事和财政的。7月又派去十七名。这些留学生，出身各自不同。

1883年，朴泳孝任汉城府尹时，设治道局，着手筹备汉城的修路事宜。这是朴泳孝和金玉均在日本时就曾议论过的。他们把修路问题同发展工农业和文化卫生联系起来，视为改革和富国的一个重要措施。金玉均则亲自写成修路工程规划草案，委朴泳孝为主事。

朴泳孝还设立了巡警局，以改革旧的警察制度。

朴泳孝调任广州留守期间，建立了特别军营，以后营的一部分人为骨干，队员有一千多人。启用留学回国的青年任教练，使军营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1883年底举行新军检阅仪式，国王亲自参加。《汉城旬报》赞扬新军的成长，说“比之于日本技艺，殆不相上下。”

1884年4月，设立邮政总局，洪英植任邮政总办。他决定首先经营沿海各地的来往信件，将内地邮政逐渐扩大。

任何社会改革必须先造舆论。开化派非常重视这项工作。金玉均和朴泳孝等商议办报问题。朴泳孝以汉城府尹的职权，承办了这项事宜。1883年10月，《汉城旬报》终于问世。

《汉城旬报》在发刊词中明确地阐明了办报的目的：“今，风气渐辟，智巧日长”的世界情况，乃“留心时局者，所不可不知”。为此，旬报“广译外报，并在内事”，“以之广闻见，辨众惑。”可见，办《汉城旬报》的目的，在于启蒙广大群众。

《汉城旬报》转载官报，经常发表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国际报道占很大比重，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越南遭受法国侵略的情况和英军驻扎埃及的消息。报道文章不仅介绍情况，而且按照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应该吸取的教训。它还介绍各国富国强兵的经验，宣传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批判封建主义的落后性。

《汉城旬报》成了为改革造舆论的工具。

二、“甲申政变”的爆发和新政府的建立

开化派的改革活动是在上层搞的，是不彻底的，但斗争是很尖锐的。以闵泳翊为首的后党独揽大权，对改革运动设置种种障碍。国王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形势很感兴趣，常常召见开化派询问当前形势和各国政治制度、并对某些问题表示共鸣。因此，后党不敢轻易打击开化派。他们一方面在国王面前摆出自己是适应形势、顺乎潮流的样子，另一方面则利用手中大权想尽办法把开化派调离汉城，以此阻碍开化派的活动。1883年，朴泳孝被调到广州，金玉均被安排为东南诸道开拓使兼捕鲸使。尽管如此，开化派继续进行工作，朴泳孝在广州培养新军，金玉均对东南诸道进行调查，处理了郁陵岛的恶霸官吏。后党又施出种种花招解散新军。

1883年，金玉均为解决财政问题再访日本，与日本各方人士交涉。日方曾表示过，如有国王的亲笔委任证书，可解决三百万日元贷款。而当金玉均办妥手续再度赴日时，日本当局却以种种借口不予办理。这说明日本也是反对朝鲜改革的。

1882年12月，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李朝政府聘请德国驻天津领事穆麟德管理财政和海关事务。朝鲜政府根据穆的建议，设当五钱鼓铸所，从1883年5月起，大量铸造当五钱。金玉均坚决反对当五钱的流通，曾与穆麟德进行争论。金玉均于1883年7月赴日，1884年4月回国。回国后得知当五钱业已流通，气愤地指责穆麟德说：“若既为欧洲人，于财政上应有所见闻”，简直是“不学无术”。穆麟德对合理意见置若罔闻，反而胡诌什么不仅可用当五钱，还可铸造当十钱、当百钱使用。仇视开化派的闵泳翊、闵泰镐、闵泳穆、闵应植等人，全力支持穆麟德。李祖

渊、韩圭稷、尹泰骏等也附和于他们。当五钱的流通使市场混乱，“民情日困”。

围绕当五钱的铸造和流通，开化派和守旧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穆麟德趁机煽动两派对立。他对闵党说：“今为朝鲜除害，不在于当五之钱，宜急先除去金玉均”，“诸君何故不思为害之本，欲治其未耶”等等。从此，守旧派“外作攻斥”开化派，内则诬陷开化派，日甚一日，造成“两党不相能之势”。因此，金玉均辞去官职，前往东边别墅。他在辞职时，向国王明确说明自己的看法，“余察内势政令，一无所成、只有分党之渐”，“暂退田舍，以弛其祸，以图展后之策。”^①

开化派几年来的工作和事业全归泡影，反而引起守旧派的更大仇恨。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人看到这一点。形势逼迫他们采取先发制人之策，就是要采取“流血手段”，从此，他们秘密准备政变。他们重新召集因后党的反对而一时隐居的同志，组成骨干队伍。这些人都是决心投身改革的人。他们积极筹措政变所需的武器，加快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开化派在公开场合并不进行任何明显活动，同闵氏一派的接触也未表现出任何疏远和敌视的态度。

当时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中法关系开始紧张。清朝政府召回一部分驻派部队。1884年5月，吴长庆率一千五百名士兵回国。同时朝鲜国内政治谣言流传，说什么日本联法反华，大院君即将回国组阁等等。形势的变化使守旧派极为不安。

在此形势下，开化派加紧行动，在10月底前基本完成采取“流血手段”的诸项准备。

10月底，日驻朝公使竹添重新返任，给开化派带来很大的

^① 《金玉均全集》，第29～30页。

不安。他们曾领教过日本当权者的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的手法，因而担心竹添有可能勾结穆麟德施展手段，阻挠政变计划的进展。

开化派的“一举之计”早已确定，但尚有一个棘手问题难于解决，那就是袁世凯等人的干涉。他们估计政变以后可以掌握汉城的军队，但汉城军队是清军军官训练出来的，若清军出兵干涉，这些军队能不能顶得住？没有把握。鉴于这种情况，开化派试图动用护卫公使馆的日本军队，以牵制清军的干涉。

开化派在11月初频频往来于日本使馆，探听竹添的意向。11月4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人在朴泳孝住宅会见日本公使馆秘书岛村。他们第一次向岛村说明自己的行动计划，并要求日本军队给予援助，请岛村把他们的要求转告公使。

日本公使对开化派的要求给了肯定的答复，同时在同闵党要人的接触中，大放厥词，弄得他们惶惶不安。11月12日凌晨，日本军队突然在汉城市内进行军事训练，任意鸣枪，使汉城空气甚为紧张。金玉均立即找到日本公使，严厉批评他们所干的“蠢事”。汉城形势的如此变化，使闵泳翊感到不祥之兆。他说“我国自此三十日之内必有变事”。他们极力图谋对付之策，并策划把开化派处以流刑或死刑。

11月30日，开化派主要成员在金玉均家开碰头会，拟定行动细节。决定在举行邮政局落成宴会时，放火别宫，趁混乱之机，处决几名反对派。12月1日，金玉均召集李寅钟、李圭焕、黄龙泽、申重模、林殷明、金凤均、尹景完等人，部署了具体任务。12月3日，准备停当，等待行动。12月4日，金玉均又召集行动队员，再次部署具体任务，要求同志们按照分工，谨慎行事。

宴会于12月4日晚准时举行。外宾和被邀请者均出席，只有尹泰骏因王宫值班未到。

宴会业已开始，行动的预定时间已到，但不见放火的举动。当金玉均得知放火别宫计划失败的消息时，马上指示在附近的草房放火。夜十时许，忽闻失火的喊声，邮局咫尺，火焰冲天。闵泳翊急忙出屋，即遭刀劈，遍身是血，进屋倒地。客人、邮局职员和厨师均惊慌失措，一齐冲出，因李祖渊、韩圭稷等与这些人混在一起，行动队员不便下手，开化派的第一步计划失败。

金玉均、朴泳孝等人急驰日本公使馆探听公使的动静后，又转到昌德宫，将邮政局事件告知国王，侍候国王迁移景祐宫，是因为昌德宫比较庞大，不便守卫。金玉均劝国王请求日军来护。闵妃却说，“若请日兵护卫，则清兵将奈何。”金玉均答曰，“清兵亦可来护。”于是，金玉均派朴泳孝手持“日本公使来卫联”的国王亲笔字条，转告日本公使。日本公使带领一百多名军人进入景祐宫。金玉均把日本军队安排在宫外警戒，又选拔十名武监把守四门，宫内的警备由五十名前营军队承担。

虽然邮政局的第一步计划失败了，但开化派终究掌握了国王，日军的护卫问题也已办理停当。于是，他们毫不迟疑地处置了守旧党的头面人物。见韩圭稷、李祖渊、尹泰骏等在宫中交耳密谈，金玉均、朴泳孝严厉训斥他们说，你们身为营使，掌握兵权，当此急变，不想引兵守卫，却鸱首嗜咕，是何原因？三营使无可奈何走了出去，被行动队员在门外一一处决。接着，赵宁夏、闵泳穆、闵泰镐等在当晚被杀戮。

除掉守旧派主要成员之后，开化派马上组成新的政府。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朴泳教等人都参加了新政府。新政府还吸收了一些王族，甚至反对闵妃一派的保守人也被包括进来。但实权掌握在开化派手中。李载元是王族，被委任

领议政，洪英植任左议政。军警、外交、财政等主要大权都由开化派掌握。

12月5日，新政府讨论并制定出新政纲，发表于6日朝报，张贴于街巷各处。政纲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大院君不日陪还事。
2. 闭止门阙，以制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事。
3. 革改通国地租之法，杜吏奸，而叙（纾）民困，兼国用事。
4. 内侍府革罢，其中如有优才通同登用事。
5. 前后奸贪病国最著人定罪事。
6. 各道还上永永卧还事。
7. 奎章阁革罢事。
8. 急设巡查以防盗窃事。
9. 惠商工局革罢事。
10. 前后流配禁锢之人酌放事。
11. 四营合为一营……急设近卫事（陆军大将首拟世子官）。
12. 凡属国内财总由户曹管辖，其余一切财薄衙门革罢事。
13. 大臣与参赞课日会议于阁门内议政所，以为稟定而布行政令事。
14. 政府六曹外，凡属冗官，尽行革罢，令大臣参赞酌议以辟事^①。

据载，开化派掌权后的几天内，曾频繁开会研究急待解决的问题，先后发表了八十多条施政措施。除上述十四条外，还有如下一些内容：另设宫内省，以区别府中和宫中事务；国王称陛

^① 《金玉均全集》，第95~96页。

下，王命称敕，国王自称朕，以示与各国同等；设八省；废除科举；发行内外公债；充实教育、运输和军备等。

他们提出的各项经济措施，有利于朝鲜经济的发展。朝鲜地稅制度极其混乱，名目繁多，人民深受其害，有人说它是“生民切骨之瘼”，毫不过分。因此，开化派在经济方面首先提出地稅的改革。其目的是杜绝官吏的无理榨取，减轻人民负担，充实国家財源。还上制度是朝鲜封建社会三大弊病之一。“还上”中弄虚作假达到惊人程度。开化派在政纲中郑重宣布永远废除它。

政纲提出发展工商业的措施。惠商工局是控制和偏袒裸负商的政府机构。它专门保护裸负商的头头和官商，给予他们种种特权，而对一般工商业者和小商则极尽歧视和打击之能事。开化派非常重视商业的自由发展。开化派认为“富国在商、强兵在商，雪耻湔侮亦在于商。”废除惠商工局，便为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財政的统一管理具有深远意义。朝鲜政府原来没有统一的財政制度，国家財政变成宫中財政。宫中挥霍无度，从中央到地方，官吏的贪污盛行，导致了国家財政的枯竭。要进行改革，就需要大量资金，筹款不易，依靠贷款也不是良策。这是开化派亲身体验过的。所以他们很重视財政问题，由金玉均直接任戶曹判书，掌握財政大权，財政高度集中于戶曹。开化派一方面建立財政的统一管理，节约財政开支，堵塞贪污的渠道，同时广泛发行公債，挖掘財政潜力，筹集个人的多余资金。

他们在用人方面，注意人材，提出“人权平等”的口号。政纲第二条专门讲述这个问题，第三条也讲了这个问题，表示决不排斥人材。开化派反对一部分人员因为家世高贵而享受世袭特权的制度。他们主张“自主权利”，“君民团结”。在他们看来，有了“自主权利”，就可“上下协励，大以谋一国之富强，小以保

一身之权利。”^① 他们提倡平等，任人为贤，不管出身贵贱，有能力者则起用。反之，即使家世再高贵，不肖者就不能用。

行政机构改革，涉及面较广。其中重要的是最高权力机构的改革。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国王和闵妃成了主宰朝鲜的最高掌权者。政纲十三条和十四条否定了国王的最高权利，规定大臣和参赞会议为最高权利机构，大臣会议下边设有执行决策的六曹。六曹以外的繁冗机构无存在的必要。他们精简机构。“亦精简冗官”，政纲还规定府中事务和宫中事务相区别，以防宫中行政的干涉。政纲虽无内阁字样，但实质上决定大臣和参赞会议掌握政权，独揽大权，也就等于内阁会议。

总之，开化派新政府提出的政纲虽不彻底，却反映了朝鲜社会发展的方向。

三、“甲申政变”的失败和历史意义

“甲申政变”给闵妃后党以沉重打击。新政府名单发表后，闵妃觉察到后党的垮台，便开始活动起来。她怂恿高宗要求回宫，说景祐宫狭窄不便，不舒服等等。开化派不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昌德宫不便守卫。高宗却坚持还宫，说什么在中宫时常感冒，并以不吃饭逼迫开化派，甚至同日本公使也提出这种要求。日本公使不询问新政府的意见便擅自表示同意。开化派无可奈何，便把国王从景祐宫迁移到桂洞宫，对回到昌德宫的要求仍不予采纳。

反对派散布各种谣言，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反对开化派。形势不利于开化派。金玉均先派朴泳孝到昌德宫进行调查，之

^① 《汉城旬报》，2号。转引自《金玉均》，第347页，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4年版。

后，高宗一行返回昌德宫，暂居便于防卫的观物轩。

吴兆有、袁世凯得知政变一事，觉得“此情形不能坐视”，应该派遣队伍，但“日人在内，畏生边衅，迟疑未派。”^① 闵妃一派通过沈舜泽正式要求清营派兵镇压。沈相薰潜入王宫，转告王妃，让她在清军进宫之机，促使国王带领大王大妃、王大妃和王太子等转到清军方面来。

12月6日下午，吴兆有和袁世凯率领军队从宣化门和北门开进来。朝鲜前营军应战。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受过申福模的军事训练，支持过开化派，可他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装备亦不充足，真正有战斗力的仅仅只有一百多名。两军力量对比悬殊，不少朝鲜士兵反戈，与清军合流，战斗不利于开化派。

战斗一打响，王妃、王太子等均到清军驻地北庙避难，只剩国王一人。大势已定。开化派看到在王宫不能持久，便决心转到仁川或江华，重整队伍，坚持斗争，并说服国王。国王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硬要去北庙。日本公使见势不妙，便下令撤退日军。日军退到使馆，又急忙赶赴仁川。跟随国王的洪英植、朴泳教等人被杀害。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逃出王宫，赶奔仁川，亡命日本。“甲申政变”终于失败，政权重新落到守旧派手中。

就“甲申政变”的失败而言，有很多原因。其内部原因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政变是迫于形势而发动的，因此，没有充分的准备。他们把政变看得过于简单。金玉均很有把握地说：“结盟士三十人，虽数少，却都胆大，为我们的事业是充足的。”^② 又说“已准备了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第17页。

② 伊藤博文：《朝鲜交涉资料》，上，第272页。

日本刀五十柄，并准备从日本请刺客来。”在他们看来，有了这些就足以除掉保守派的几个人，很容易取胜。

开化派引进日本军队，令其护卫王宫是开化派活动的致命弱点。有些谣言也就由此而来，汉城群众冷眼看待开化派也是由此而造成的。但是，这件事并不说明开化派的政变是日本操纵、准备和发起的。政变是开化派自己计划、自己准备和自己发动的。

开化派的初期活动是和平改革，力图在自己的职权和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某些改革，以例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高宗也表示支持。他们在日活动也看不出准备政变的迹象，从日本政界要人与开化派的谈话中也看不到煽动政变的内容。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是谨防中日在朝的直接冲突。日本支持开化派，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它尚不敢引起中日纠纷，不能说开化派建立新军是为了政变而搞的。他们要富国强兵。军队的改革、警察制度的改革都是志在富国强兵的步骤。

开化派的和平改革步步碰壁，守旧派的迫害日甚一日。开化派被逼上梁山才发动了政变。金玉均在政变一个月以前曾讲过这些问题。1884年11月4日，金玉均讲：“我们近几年来以和平手段刻苦努力，但未达到予期的目的，至今已陷入绝境，不能坐以待毙，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之策”，我们“早已觉得只有决心走这条路。”^① 洪英植讲：“国际紧迫不能坐等灭亡。”^② 朴泳孝讲，“有顽固党几人，每每沮止，事未谐矣，为先除去此辈，然后可以做事。”^③ 面临这种局势，先除之顽固党，尤其左、右、前、后营使，这是他们共同的意见。

① 伊藤博文：《朝鲜交涉资料》，上，第271页。

② 伊藤博文：《朝鲜交涉资料》，上，第289页。

③ 《推案及鞫案》，30，高宗二，第589页。

他们形势逼人，准备武力行事，终未想到朝鲜下层群众。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他们认为朝鲜人是“蠢蠕之物，实无以与图大事”，只能利用日本人，但“欲改革己国之事，何用他国之人，此固有说焉”。^①金玉均与日本人的接触中觉察到日本人不可信。于是，他们自己动手准备。这一点在金玉均的言论中可以看到。

金玉均于11月16日说：“在我国局势，今几至于背水无粮，其迫切之状，固不待日廷之举功”。^②11月25日金玉均又说：“日本之助援与否本非所望”。因此，他们的初期政变计划，从未告诉日本人。1884年4月以来，金玉均并未同日本公使馆外交人员接触。十月底，竹添返回朝鲜。11月1日，金玉均说，“吾辈一举之记已决，以竹添适来，深以为忧”。

金玉均在与竹添的接触中，发觉竹添的言行有所变化，可以利用。因此，才告知政变之事。但他对日本政府和竹添本人十分警惕。11月1日，金玉均与竹添会见时，痛斥“日本政府变政略如儿戏”。之后，在与竹添的谈话中，也反复指责日本政府“变幻无状”，“政略之顿变”，“政略之变如反掌”。同时，面对竹添，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所干的一些蠢事。金玉均在与自己同事的谈话中说，竹添行为过激，会“导致速祸于吾辈之难”。

开化派认为除掉守旧派并非难事，难以对付的是清营的干涉。他们认为，如果日军守卫王宫，清营就不会调兵。开化派利用日本的主要目的在于这儿。利用第三者的力量是可以的。可是，弱者利用强国，小国利用大国，既欲达到目的，又欲排除趁起而来的干涉，则确实不易。开化派要利用日本，日本也要利用开化派。结果给日本造成可乘之机，招来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这

^① 《金玉均全集》，117页。

^② 《金玉均全集》，第50页。

就是开化派的悲剧所在。

开化派中的有些人，后来变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但不能把前后时期的变化混为一谈。洪英植、朴泳教和一些青年在政变中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刀下之鬼。金玉均亡命于日本，尽管经历了种种不幸遭遇，但他想的终究还是朝鲜的进步，最后被日本反动当局和朝鲜封建政府的阴谋所害。

“甲申政变”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在朝鲜近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甲申政变”是把封建的朝鲜改为近代朝鲜的第一个尝试。开化派的活动内容，他们提出的政纲，都程度不同地反映着朝鲜社会的发展方向。朝鲜历史发展的进程，证明开化派的主张和措施符合朝鲜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

“甲申政变”和开化思想推动了朝鲜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由于“甲申政变”的失败，不少参与者和株连者惨遭杀害。可是他们的进步思想却不会消失。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领域内，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甲午农民战争时，农民军提出的一些政治经济要求，同开化派的一些主张是一致的。“甲午改革”和独立协会的活动，直接与开化派相联。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开化派是近代朝鲜改革运动的先驱者。

“甲申政变”和开化派的活动，开辟了朝鲜近代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既有文化内容，也有政治内容，后者则更为重要。启蒙运动由于政变的失败而处于低潮，不久逐渐兴起。金允植等人所致力的1886年创刊的《汉城周报》，可以说是《汉城旬报》的继续。它以朝汉文混合体为主，以纯朝文或纯汉文为辅的方针编辑出版。朝汉文混合体的报纸，群众易懂，可以扩大读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兴起了国文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第五节 《汉城条约》和《天津条约》

日本侵略者力图介入“甲申政变”，捞取一把，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甲申政变”失败后成立的朝鲜政府多次照会日本公使，揭露他们介入政变之事，并追究责任。日本公使一再狡辩，终未能驳倒朝鲜政府的据理指责。

12月13日，日本政府获悉“甲申政变”的消息以及竹添同朝鲜政府交涉的基本情况后，以为这是加紧侵略的好机会。他们惟恐错过时机，马上指示竹添：不谈有关政变问题，只讲即将进行的政府之间的谈判问题。

不久，日本政府决定派外交大臣井上去朝鲜。12月30日井上率领两营陆军抵仁川。他派人到汉城指示竹添停止同朝鲜政府的接触，而等待命令。1885年1月3日，井上进京，硬要会见国王。他会见国王后，说什么“我不顾工作繁忙，使命而来”，只提出两条要求：其一，朝鲜政府和竹添之间迄今的来往信件，不作即将进行的两国政府间谈判的基础；其二，国王听取日本政府的要求后，或亲自裁决，或派大臣谈判，由国王决定、必择其一。井上蛮横地说：如果不接受我的意见，就撤回仁川，以此威胁朝鲜。

1月5日，谈判一开始。朝鲜政府代表就明确表示了原则立场，要从“甲申政变”的起因谈起。朝鲜政府在代表证书中写进这一原则，即日本公使“误听其谋，进退失误”。这样可使朝鲜政府在谈判中争取主动。井上明知竹添介入政变，如果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必然陷于被动。于是，井上回避了这个问题，要求只谈政变的善后处理问题，这样，日本可推卸责任，嫁祸于人。

井上基于这一原则，狡辩证书中写进的“误听其谋，进退失

误”不妥，而否定证书。朝鲜使节一再论理，但终于屈服，删去证书中的上述词句，这等于抛弃了自己谈判的基本出发点。井上以“商办兹举”为由，追究“日本公使馆烧毁”，“日本人被杀害”的责任，并以自己拟出的条约草案付议。在井上的压力下，朝鲜代表未能谈及根本性问题，稍加修改一些字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是，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汉城条约》，其内容如下：

1. 朝鲜政府致国书向日本政府道歉。
2. 朝鲜支付十一万元作为日本被害者家属的抚恤费和损失财产的赔款。
3. 重建日本公使馆和兵营，由朝鲜政府支付建筑费二万元。
4. 二十天内逮捕和严惩杀害日本人的凶手。

谈判后，井上又向朝鲜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两国政府撤回从甲申政变发生至井上来到汉城这段时间朝鲜政府同竹添之间的有关政变的外交信件。朝鲜政府表示同意。日本根据条约，把井上带来的一个营留驻朝鲜。

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但它在国际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为应付这种局面，日本于1885年3月，同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其内容如下：

1. 签订条约之日起，四个月内，中日两国军队撤出朝鲜。
2. 将来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派兵，先照会通知一国，事办妥，即撤回，不再留防。

《天津条约》表明：在朝鲜问题上清朝有所退让，而日本则取得与清朝相等的权利。据天津条约的规定，两国军队撤出了朝鲜。

第十四章 “甲申政变”后朝鲜社会 经济的变化 甲午农民战争 和“甲午改革”

第一节 “甲申政变”后朝鲜社会经济的变化

一、“甲申政变”后的朝鲜政局

“甲申政变”后，重掌政权的守旧派血腥镇压了开化派。1884年12月6日、1885年1月和年底，洪英植、朴泳教等二十五人以“大逆不道罪人”的罪名先后被处死。金玉均、洪英植等人的直系亲属几乎全被杀害。

他们不仅镇压开化派，对其它反对党也全不放过。1885年8月，处死壬午兵变的两名参与者。这一天，正值大院君从天津抵仁川进汉城，这是守旧派对大院君及其支持者的公开挑战。

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在短短的两年内，经历了极大的政治风波，经受了很大的政治冲击。中日两国军队撤退后，封建政府理应采取措施，努力争取自主，使国家向前发展。但他们却在资本主义列强激烈矛盾的漩涡中，徘徊、动摇、无所适从。

沙俄很早就想在朝鲜取得立足点。日本对此异常敏感，深感沙俄将成为自己的主要对手。英国也想在朝鲜沿海占有军事基地。英俄围绕阿富汗问题矛盾尖锐，这个矛盾在朝鲜也有所反映。

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在上述矛盾中，试图以俄国势力抵制他国，尤其对付日本。俄国的对朝政策同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亲

俄倾向相吻合。朝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促使英俄关系的恶化。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奉本国海军大臣之命，于1885年3月占领了全罗道兴阳县巨文岛。

朝鲜政府考虑，一旦允许英国的占领，势必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俄国的反应，因此，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英国舰队立即全部撤出巨文岛，并呼吁各国干予英国的挑衅行为，促使它早日撤离。英国对此置之不理，在巨文岛挂起英国国旗，筑起永久性炮台。

美国利用英俄矛盾，加紧对朝渗透。高宗和一些大臣这时又倾向于美国。朝鲜政府照会美国政府聘请政治、农业、小学教师和军事教练事宜。从此，美国的医生、教员、顾问相继而来。1885年9月，美国人迈立尔接替穆麟德掌管了海关总税务司。1886年3月，德尼任协办，管内务府事务，兼管外交。迈立尔和德尼都为美国和日本侵略利益卖命。继德尼接任外交顾问的的李仙德，是以亲日而出名的美国人。1885年，大伊少将等三名美国高级军官任朝鲜军队教练。

综上所述，朝鲜政局极端混乱，来自外国的压力无法对付。日本趁火打劫，进一步攫取权利。日本连自己签字的条款也不履行，反嫁祸于人。1889年，咸镜道由于歉收而通知外商禁止出口粮食，黄海道也采取了同样措施。这是朝鲜政府的自主权利，是朝日双方在条文上规定了的。修订的《通商章程》曾明文规定：因自然灾害或变乱等原因而缺少粮食时，朝鲜政府有权禁止粮食出口。咸镜道和黄海道地方官的措施是合理的。日本当局却指责朝鲜政府无理，胡说咸镜道本来丰收，要求几十万元赔款和调走咸镜道观察使。事实表明，牵涉日本的一系列事情，如无日本公使的同意朝鲜政府连一件也办不成。

二、朝鲜经济的崩溃

日本在朝鲜取得的各种政治特权，保证了它的经济侵略。1884年后，日对朝输出迅速增加，1892年比1885年增加将近二倍。日本对朝输出的大部分产品是日本产品。1885年日本产品占百分之五十，1892年竟达百分之八十七。仁川、釜山、元山等地外国商馆中，日本商馆占百分之八十。日本几乎垄断朝鲜海运。日本船只约占来往于朝鲜口岸的外国船只总吨位的百分之八十。

日本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日本商人的活动。在朝鲜一些开放城市开设银行分行，对日船予以贷款，给他们保管运到朝鲜的日商商品；对日驻朝商人从日本订购商品时，代为办理寄货者与轮船公司之间的结帐。在日本政府帮助下设立的日本保险公司分公司，对使用日船运来的商品办理保险手续。日本政府的多方扶植，保证了日商的优势，助长了日商的掠夺行径。

朝鲜的出口贸易是以农产品为主。1884年，朝鲜对外贸易总额是一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三十三元。1890年和1891年分别增加到八百二十七万零三百一十七元和八百八十二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元。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粮食出口的增加。1889年至1891年间，粮食出口的增长说明了这一点。1889年出口的粮食只有三万四千五百一十七担，1890年为八十七万四千六百六十五担，1891年为九十二万八千零二十担。1890年比1889年增长二十五倍多。有人讲1890年和1891年连续两年丰收，所以出口增长。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即使丰收也不会幅度那么大的！

出口粮食的猛增，来自日本的需要。这时期日本歉收，需要更多的朝鲜米。贫困的朝鲜农民廉价出售粮食，日本商人从中牟取暴利。日商春耕之前来到农村，以平年收成的一半卖给日商为

条件，向朝鲜农民贷款。朝鲜农民变成日商的“债务奴隶”。歉收对日商来说无所谓，粮食照样落入日商手中。朝鲜农民不是把剩余粮卖给日商，而是把生活必需的粮食卖出去。对农民来说粮食出口乃是“饥饿输出”。随着粮食出口的增加，日商在通商口岸开办了使用动力的粮食加工厂，把稻子加工成大米，输送到日本。

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掠夺，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的主要方面。日本在朝鲜掠夺的黄金，比日本国内生产的黄金要多得多。1890年，日本军阀山县在国会讲话中说，朝鲜是日本的“主战线”，即“生命线”。虽然他主要是从政治军事角度讲的，但朝鲜对日本经济的意义不亚于政治军事意义。

朝鲜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基地、资本输出地和商品倾销地。朝鲜民族经济遭受破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受到极大挫折。由于市场关系的发展而形成的巨商，未能结合产业，不少人购买官职变成封建官吏，或购买土地变成封建地主。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促进了城乡手工业的瓦解和农民的破产，造成人口过剩。由于朝鲜资本主义发展微弱，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遏制，不可能把过剩人口吸收到企业中来。这些人口有的仍留在农村受着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不少背井离乡，到处流浪，有的涌入城市当苦力，或流落到金矿变成掏金者，也有的飘洋过海，流亡国外。

三、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

封建统治阶级不顾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死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拜倒在外国入侵者脚下，并勾结外国势力，对人民加紧盘剥。这就愈发促进社会经济的崩溃和封建中央集权物质基础的破坏。封建政府力求增加财政收入，而国家财政来源却越来越缩

小。这是因为：第一，大官僚地主的免税地和漏税地增加（1893年，朝鲜耕地总面积为一百四十四万五千二百二十七结，缴税地仅有一半），第二，由于农民不再务农，使荒地增多。

为了充实财政，封建政府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直接和间接剥削。不仅旧税加重，又添了许多新税。据金允植的计算，“一结平年年收率不过二、三十石租，而税租为四五石，然则什税三四矣，又赁田而出税者，什税七八石，其余有几？”^① 封建统治阶级还不满足，制造了名目繁多的杂税，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吴知泳在《东学史》里列举了山税、海税、烟草税、盐税等十七种税目。^② 地方官吏以不孝罪、不敬罪、相避罪等莫须有的罪名捉捕无辜百姓，掠取罚款。甚至对耍杂技的也可以罚款。

封建统治阶级和两班官僚的腐化堕落，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喝的、抽的都求之于外国商品。有个外国人说，同朝鲜国力的日趋削弱相反，在宫廷和两班住宅里资本主义文明却日益兴旺。这句话出于讽刺，却反映了实际情况。朴殷植写道：宫中“长夜之宴，无日或辍，倡优妓女，演呈百戏，酒地肉林，糜费钜万。”^③

统治阶级为筹集巨款，公开进行卖官鬻爵，如同市场交易，大官大价，小官小价，有的官价竟达几十万两。买来的官，有的有实职，有的是所谓借衔官。吴知泳列举了品官、委员、派员等日常出售的官名三十七种，当然这只是一部分。金昌锡是全罗道数一数二的富豪，拿出十万两白银，买中科举，进入官场，一步登天当上承旨官。平壤监司闵丙爽中将三十万两送到宫中，换得

① 金允植：《续阴晴史》，上，第153页。

② 吴知泳：《东学史》，第99页。

③ 朴殷植：《韩国通史》，第二编，第46页。

外甥李吉夏的“科第”。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有的人不想买官，而当朝官吏却随意给他扣上官衔，向他攫取钱款，当时称此为“雪笠”。郑乔写了一则黄狗被封“同知官”的故事。黄铉也写过类似的故事。看来，黄狗做官并非笑话，而是实话。说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到何等地步。

人们都看出封建统治阶级洗劫农民的严重性。有的官员讲：“八道方伯，列邑守宰，贪墨狙习，法纲坠弛，全无顾忌，虐民滋甚，民生不堪。”^① 统治阶级把农民看成一块肥肉，老百姓不得不把统治阶级视为仇敌。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

四、反对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人民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885年到1893年间，爆发了四十六次起义，平均每年五次。起义的规模不很大，多数局限于一郡范围。

1889年以后，起义次数迅速增加，封建统治阶级惊恐万状。据议政府文件，1889年“聚党起闹，视同茶饭”^②，确是“无前之变”。1892年，高级官员郑范朝说：“近来窃发之搔扰，愈往愈甚”，“第今西北之民扰未息，湖南之匪类继起声势，屯聚於甸服不远之地，道路绎骚”。^③ 高宗也说：“近日民习动辄起闹，殆若寻常”。^④ 可见，民扰空前，已成“民乱”时代，统治阶级难以对付。1893年，全罗道罗州、康津、井邑等地的起义，不仅

① 《东学乱记录》上，第1页。

② 《高宗实录》卷二十六，26年，10月。

③ 《高宗实录》卷二十六，30年3月。

④ 《高宗实录》卷二十六，30年11月。

谴责封建统治阶级的罪行，而且提出“洋夷击攘”的口号。

游民的斗争也空前激烈。他们是游离农村的农民和得罪统治阶级而失却安身之所的下层群众。1885年，活动于湖南地方的游民集团“称以活贫党，下路市场揭榜”^①开展活动。据记载，他们“聚党持械”，“聚徒党而持刀棒”。可见，他们是搞长期斗争的武装队伍。

游民的斗争遍及全国。国王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哀叹“近日窃发之患，京外同然”，“民心骚扰，道路梗塞”。他们的斗争扩展到汉城市内。封建统治阶级觉察到事非寻常，深思其因，但他们始终困惑不解。1890年，金允植说：“丰年贼患，殊可惊怪”。又说：“今年年事丰登，可惊可叹。”^②游民曾提出“起义伐倭”，又自称活贫党。可见，他们的斗争具有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因此丰年也不会减弱斗争，只要政治制度不变，斗争自然不会消失。

朝鲜处于动荡之中，东学也开展活动。截至当时，东学尚未得到合法地位。曾参加晋州起义的李弼济等人加入东学，向教主崔海月提出开展教祖“伸冤运动”的建议，遭到拒绝。但他并不灰心，1870年和1871年在庆尚道地区多次准备起义，均未成功。这是东学和农民斗争结合的尝试。之后，东学在地方上扩大了组织，却未见任何公开活动。

1890年代初，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东学领导集团开展了教祖伸冤运动。1892年在参礼举行了第一次伸冤运动。教祖伸冤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恢复教祖名誉和自由传教。1893年1月，东学领导四十多人进京请愿，在光华门再次要求为教祖伸冤。

^① 《高宗实录》卷二十二，22年3月。

^② 《续阴晴史》（上），第142页。

东学领导集团发起第三次伸冤运动时，认识到只提纯粹的宗教要求是得不到广大群众支持的。于是，他们提出“斥倭洋”的口号。东学提出“斥倭洋”口号后，不仅东学，还有不少农民和其他群众也来到报恩参加聚会。但他们并未将群众组织起来。有人提议，宣抚使来时要有誓戒，哪怕准备一根木棍也好，以防被突然袭击。东学领导不准提出这种意见，认为宣扬“弓乙之道”就是“可斥之道”。

报恩聚会使封建统治阶级感到畏惧。但东学领导集团却根本没有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决心。宣抚使的甜言蜜语和恫吓威胁使他们慌作一团，竞相逃掉，无人作主，群众只得稀里糊涂地四处逃散。东学的一个领导成员徐炳学，一再向宣抚使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说湖南“情形极异常”，要求宣抚使“详查勘探”，要有“玉石之别”。意思是说要把湖南的农民运动和湖北的伸冤运动区别开来。至此，东学的独立运动结束了。事实证明，东学下层群众是反侵略反压迫的，“斥倭洋”也是他们的愿望，如果有人进行组织，东学教徒是可以参加斗争行列的。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一场极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第二节 农民战争的爆发

一、古阜农民起义

甲午农民战争是从全罗道古阜郡开始的。1892年，新任古阜郡守赵秉甲就任后，依仗权势肆意掠夺。

赵秉甲曾向农民宣布，开垦荒地者均予免税。但到秋收时却背弃诺言，强行征缴地税。他为修缮自己父亲的碑亭，向农民征收千两以上的钱款。他征收大同米时，索取现款，却以低价买进

发霉的粮食上交国库，剩下的钱款揣进自己腰包。他对无辜百姓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强行罚款，仅此一项就达两万余两。他以维修万石淤为名，动员农民新修拦河坝，以此借口征收水税，私吞七百余石大米。

赵秉甲的无理掠夺激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于是，1893年12月，古阜郡四十多名农民到郡厅抗议论理。赵秉甲把农民说成“乱民”，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数日后才放回。1894年1月，全臻准的父亲全彰赫带领六十多名农民又到郡厅，要求停止征收水税，改除弊政。赵秉甲置农民的正当要求于不理，反把全彰赫等农民代表关进牢房。全彰赫惨遭鞭笞，死在狱中。

古阜农民气忿至极。1894年2月15日数以千计的农民奋起造反，攻占武器库，将非法征收的税米发给农民，烧毁了土地和奴婢文书，打开牢门释放被关押的无辜人民，赵秉甲目睹此景，畏罪出逃，连夜跑到全州，向监司金文铉报告古阜情况，要求监司派他率领监营士兵前往惩讨。全罗监司不理赵秉甲的要求。封建政府得知古阜的情况就任长兴府使李容泰为古阜按核使，派往该地。

古阜起义后十余天，部分农民解散归家，大部分人并未回家。古阜农民在两次抗议和起义中，已形成领导核心。这就是以全臻准为首的郑景瑞、金道三三人。

全臻准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六口人，土地很少，过着“朝饭夕粥”的贫困生活。他本人“以学究为业”，是“训导若干童蒙”的乡村知识分子。全臻准不是以“一身之利害”而参加起义的，他是“为民除害”才参加起义的。他具有这种决心，深受群众的信赖。郑景瑞和金道三均为地方武官出身。起义的一切决策都由他们研究决定。他们还争取村长，通过村长作群众工作。起义的组织体系便这样形成。

按核使李容泰比之赵秉甲有过之而无不及，干尽了坏事。他带领士兵闯进古阜，以抓起义领导者为名，横行各村，抢掠财物，强奸妇女，乱抓男丁，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古阜全郡。

全琫准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见事态至此，只好组织农民军开展武装斗争。5月4日，组织起来的农民头裹白布高举义旗，阐明起义宗旨：“一曰不杀人，不伤物；二曰忠孝双全，济击安民；三曰逐灭倭夷，澄清圣道；四曰驱兵入京，尽灭权贵，大振纪纲，立定名分，以从圣训”。^①

全琫准率领队伍开进白山。金开男、孙和中等人率领高敞、茂长、兴德、井邑、金沟等地农民也开赴白山，与全琫准农民军会合。农民军已达八千多人。他们重编队伍，组织湖南倡义大军，全琫准任大将，孙和中和金开男任付大管和总管领。农民军以湖南倡义大将的名义发表檄文，檄文写道：

“吾辈举义至此，决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盘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举凡苦于两班、富豪之民众，与夫受辱方伯、守令之小吏，皆与吾辈同其怨恨，勿少踌躇，勿失良机。”^② 全琫准在檄文中重新阐明了斗争目的，明确了打击的对象。

初期农民军的武器很是简陋，大多是从民间筹集的，只有破旧的鸟铳三十余支，长矛几百支，其余都是竹矛。但农民军的意志是坚定的。农民军分成两队，一队经金沟，于5月7日到扶安与当地农民汇合，很快攻占了郡厅，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官吏，打开武器库，拿到武器。另一队在同一天占领了泰仁。

5月8日，农民军将通文送给法圣寺小官，说明起义的目

①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71页。

② 吴知泳：《东学史》第112页。

的，并号召清除顾虑，协助和参加农民军。通文写道：“乱极则治，晦则变明，理之常也。今吾侪为民为国之地，岂有吏民之别乎。究其本，则吏亦民也。”它列举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弊端，如转运使、均田使、收税官的掠夺罪行，最后号召“凡吾士农工贾，四业之民，同心协力，上辅国家，下安涂死民生，岂非辛也哉！”^①

李朝封建政府任命前营使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领用新式武器装备的一千多士兵，前往该地镇压农民军。并指示金文铉派监营士兵围剿农民军。

全州监营士兵和一千多名行商奉命开到古阜。这群官军毫无纪律，惯于掠夺。据载：“盖完营校卒，籍捕东党，剽掠村闾，鸡犬一空，至行辱妇女，号泣载路。”^② 带队的军官胡扯什么，只要把好隘口，切断粮道，不几日即可消灭农民军。但事与愿违。

5月11日，农民军在黄土岬组织一次大反击。官军惊惶失措，虽然几番冲杀，妄图突击，但终未扭转败局。从惨败中逃生的行商回忆说：他们的同僚在惨败中几乎全部丧命。新任古阜郡守也在报告中说：监营士兵遭到失败，伤亡很多。全罗监司得悉死亡几百人后，感到为难。

农民军的首战大捷，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开辟了农民军胜利发展的征途。农民军在战斗中缴获了枪枝弹药以及两门大炮和百石大米，加强了装备。农民军给予敌人的沉重打击，大灭了官军的反动气焰。军司马哀叹道：黄土岬战斗后，农民军日益发展，官军萎靡不振。

^① 伊藤博文：《朝鲜交涉资料》第330-333页。

^② 金允植：《续阴晴史》上，第311页

二、农民军的发展和全州的占领

黄土岬大捷，使农民军乘胜前进。全璘准为扩大战果而挥师南下，于5月11日进故井邑，12日占领兴德，直取高敞，打开牢房，释放被押群众，打开武器库，充实了自己的装备。

5月13日，农民军占领茂长，处决民愤极大的官吏，并张贴布告，布告写道：“内无辅国之材，外多虐民之官，人民之心，日益渝变；入无乐生之业，出无保躯之策，虐政日肆……自公卿以下，以至方伯守令，不念国家之危殆，徒切肥己润家之计。途选之门，视作生货之路，应开试之场，举作交易之市。许多货路，不纳王库，反立私藏。国有积累之债，不念图报，骄侈淫昵，无所畏忌，八路鱼肉，万民涂炭。”^①

5月17日，农民军攻占灵光。此时农民军已发展到一万多名，装备也有所改善。5月20日高举大旗进攻咸平。咸平郡守动员官吏，驿卒等一百五十多人，紧闭城门，负隅顽抗。农民军砸开城门，奋勇攻入。在强大攻势面前，敌人死伤无数，活着的仓惶逃命。农民军很快占领了咸平。农民军负责人向居民说明斗争目的和来到咸平之意。他说：“一以惩创贪官污吏，一以矫正邑弊民瘼，保国安民，编行各邑，路由本县”。^②

前营使洪启薰被农民军的声势吓倒，不敢同农民军较量，进入全州，不想出战，士兵也不断逃亡。洪启薰得知汉城援军业已启程，便离开全州，于25日到达灵光，28日与增援部队会师。此时，农民军已越过罗州北上，到达长城。在此之前，洪启薰派军官到罗州和长城地区，以国王诏书来宣谕农民。军官李学承率

① 《东学乱记录》上，第142页。

② 《东学乱记录》上，第170页。

领三百多士兵前往长城一带，侦察农民军的情况。他们到月坪得知农民军在黄龙村，便向农民军开炮轰击。由于敌人的突然炮轰，农民军受到一些损失。但农民军立即赶往月坪，英勇作战，击毙李学承等许多敌人，缴获两门炮和许多弹药。

农民军在长城提出十三条要求，主要内容是：废除转运使；废除均田使；严惩贪官污吏；各地贪官其污款达千金以上者处死本人，不惩处家属；各国商人能在港口买卖，不得进城设市，不准行商；行裸商弊病颇甚，应废除；惩治卖官；驱逐倭洋等。

长城战斗之后，农民军离开长城，直驱北上，30日抵泰仁，处决携带国王诏书进行宣谕的五名官员，并去信给尾随的洪启薰，开门见山地指出：“汝来此何干？依恃天宠，专仗兵威，只纵兵杀掠平民，是何将兵之道！……汝今有两道，走则生，不走则死，审两段而处之”。^①

5月31日，农民军全面包围全州，立即发动攻势。监司、中军、营将等急忙部署，防御四门，企图击退农民军的进攻。农民军的猛烈轰击使敌人陷于混乱。农民军从四门突破，攻入城内，城内部分小吏和贱民皆纷纷内应。

农民军当天在南门张贴榜文，沉痛指出：“方今事势不可坐以待死”，愤怒揭露闵党的罪恶行径，重申起义的目的。檄文特别指出，沙俄乃潜在危险，并说：“大抵以国势言之，执权大臣皆是外戚，终夜经营只知肥己，以其党羽派有各邑，害民为事，民何以堪。”^②

洪启薰尾随农民军来到全州，陈兵于南面的黄鹤山。官军在城外纵火烧毁很多民房，之后立即发动进攻。农民军在不利的条

^① 金允植：《续阴晴史》上，第311页。

^②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75页。

件下紧闭城门，坚守阵地。随后，主动出城，组织较大规模的战斗。6月5日，又出北门展开攻势，击毙一批敌人。此次战斗中，农民军也受到损失，年仅十四岁的少年李福龙，英勇战斗，至死如一，壮烈献身。

封建政府军队一连数日包围全州，竭尽全力试图夺回该城，但未能成功。农民军主力攻克全州后，附近的农民军陆续向全州方面转移。包围全州的官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

迄至6月初，农民军活动地区扩大到朝鲜大半部。全罗道、忠清道的几乎所有地区，庆尚道、京畿道、黄海道、江原道、忠清道的几乎所有地区，庆尚道、京畿道、黄海道大部分地区，都有农民军。

农民军纪律严明，不违犯群众利益。他们有如下戒令：“降者所待，困者救济，贪者逐之，顺者警服，走者勿追，饥者馈之，奸猾息之，贫者赈恤，不忠除之，逆者晓谕，病者给药，不孝杀之”。^①若违令者则严肃处分。因此，农民军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许多群众送丈夫和子弟参加农民军队伍。农民军的严格纪律保证了农民军的迅速发展。

第三节 “全州协议”和执纲所的建立

一、“全州协议”

农民战争爆发以来，封建政府为镇压农民军费尽了心机，但未能挽回败局。李朝政府为了得到喘息机会，另寻镇压方法，摆出新的姿态，采取了怀柔政策，并通过洪启薰试探农民军态度，

^① 金允植：《续明暗史》上，第311页。

宣称“尔等所取军器，及今来纳，以开门迎师，以服朝家好生之德，则列邑弊瘼之可存者存，可革者革”。^①又通过两湖巡边使李元会，要求全琫准解散农民军，如其不然，则中日两国出兵，势必导致朝中日三国的外交纠纷。之后，官军正式提出和解，扬言弊政之中，要改者一定进行改革，提出条件，亦可就办。

全琫准面临新的情况，重新研究了对策。他估计到外国军队出兵所产生的后果，还考虑到农民军的自身情况。农民军在全州受到一些损失，如继续坚守全州将会遭到更大损失。他认为，撤离全州，保存主力，等待时机，准备新的攻势，方为上策。

于是，农民军接受和解的建议，致信洪启薰提出二十七条要求。这二十七条是农民要求的基本概括。

6月11日，全琫准同全罗道观察使进行谈判。据记载，“全琫准以峨冠麻衣，昂然而入，少无忌惮，与观察使相议官民相和之策”。以全琫准为首的农民代表，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使对方接受下来。达成协议的内容共十二条：

1. 扫除过去道人与政府间的隔阂，协助庶政。
2. 查清贪官污吏的罪状，从严惩处。
3. 严肃处理残暴的富豪。
4. 惩罚不良的两班和儒林。
5. 烧毁奴婢文书。
6. 改善七般贱人的待遇，摘掉白丁头上的平壤笠。
7. 允许青年寡妇改嫁。
8. 废除一切无名杂税。
9. 打破门阀，登用官吏应选择有能力的人。
10. 严惩与日本侵略者相通之人。

^① 田保桥浩：《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下，第263页。

11. 过去的公私债务一律取消。

12. 平分耕地。^①

双方还一致同意建立执纲所，贯彻各项协议。协议达成之后，农民军撤离全州。

“全州协议”的内容，实质上具有三层意思：一是，规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是，进行政治改革，农民军称之为“厘正”；三是，建立承担改革的机构。

协议首先提出农民协助庶政。协助庶政是有前提的。一是改善道人和政府的关系，即“官民相和”；二是有协助庶政的组织机构。若无此种组织机构，将无法执行协议规定的条款。从字面上看，农民军只是在承认封建政权机构的条件下，干预某些政府事务，但在农民军控制的地方，情况却大不相同，农民军不是协助政治，而是独揽大权。

协议的第二、三、四条，自然不是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制度。各地的官吏、富豪、儒林和两班，是朝鲜封建统治的牢固的社会基础。如果这几条得到贯彻，将势必动摇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在农民起义的地方，处理了不少贪官污吏和两班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家产。特别在建立执纲所的地方，解决得更好。下边的材料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农民军“去益无法，富户举皆离散，贱民并皆跳梁，不独讨财，图报宿怨，湖南一带混沌世界也。”^②作者站在统治阶级立场恶毒诬蔑农民军，但从反面却能看出问题的实质。“富户举皆离散，贱民并皆跳梁”，是个鲜明的对照。“贱民并皆跳梁”是从政治上讲的，意味着农民从政治上造了地主两班阶级的反。被压迫的农民反对特权阶级的斗争，是农村的阶级斗

^① 吴知沐：《东学史》，第126—127页。

^② 《东学乱记录》上，第65页。

争。只有通过农村的这种阶级斗争，才能把无权的农民从地主阶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反过来它又促进斗争的扩大和发展。

第五、六、七、九条的目的，在于把农民从封建等级制度枷锁下解放出来。封建等级制度严重地束缚着人民群众。这几条必然与解决前边提出的几条有关。李朝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三纲五常的影响根深蒂固，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谬论毒害人民。中国虽有这种理论，却没有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而朝鲜的统治阶级明文规定禁止寡妇改嫁。1408年“再嫁禁法”发布以来，直到1894年还未废除。这种谬论和法令不知夺去了多少朝鲜妇女的生命。第七条规定允许寡妇改嫁，反映了朝鲜人民的心愿。

列宁曾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农奴制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①对身分等级制度的挑战，反映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愿望。

第八、十一、十二条，如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朝鲜的历代农民战争从未提出过对土地的要求。中世纪进步思想家实学派，虽然提出过经济改革方案，包括土地问题，但只是提出限制土地。平分土地，就是要把地主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土地日益集中到地主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增加。不改变这种状况，绝大多数农民只好继续贫穷挨饿。农民在斗争中提出平分土地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是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

“全州协议”是农民军要求改革的纲目。它的内容反映了农

^① 《东学乱记录》上，第65页。

民的基本要求，必定极大地鼓舞农民的斗争。农民军曾反复号召人民勿须惊扰，迎接即将来临的“厘正”。十二条的形成，说明了“厘正”业已来临。

二、执纲所的建立和诸般改革

达成协议仅是事情的开始，它本身还不是现实的东西。要使其变成现实，必须有组织的保证。执纲所正是出于这种需要而建立的。执纲所在农民军控制的地方，不是什么协助机关，而是唯一的行政机关。

郑硕谟对农民军控制的全罗道地方作过记载：“设执纲所于公廨，置书记、省察、执事、童蒙之名色，宛成一官厅。所谓邑宰，只存名位，不得行政，甚至逐送邑宰，吏胥辈皆尽为人籍于东徒，以保姓名。全璘准拥数千之众，据金沟院坪，行号令于右道。金开男拥数万之众，据南原城；统辖左道。其余金德明、孙和中、崔景善辈，各据一方。”^①由此可见，农民军在执纲所管辖之内，不承认统治阶级的政权机关，占领各郡衙门，在那里处理公务。农民军严惩了反抗执纲所指挥的旧政权机关人员，接纳了要求加入农民军的一般公务人员，并吸收一部分前公务人员在执纲所执事。

执纲所是与旧政权完全不同的机构。它的事务由执纲总管；省察主管社会秩序；童蒙承担对青少年的教育；书记承担执纲所的记录和内部事务；执事管理有关财政方面的事宜。

执纲所是农民军在同统治阶级的武装斗争中产生的。由于强大的农民武装的存在，封建统治阶级才在全州接受农民军提出的要求，同意建立执纲所。有了执纲所这样的机构，农民“协助庶

① 《列宁全集》13，第211页。

政”才不至于流为一句空话。

“全州协议”后，全罗道各郡都建立了执纲所。只有罗州、云峰、南原三郡尚未建立，因为那里的统治阶级负隅顽抗，南原尤其猖狂。金开南直接率领农民军攻克南原，并回到全州，杀掉逃往全州的南原郡守。郑硕谟说，这件事震动很大。不久，全凤得占领云峰，崔景善占领罗州。于此，全罗道五十三郡都建立了执纲所。

“全州协议”后，全琫准仍不放弃武器。一部分农民丢下武器回家了。全琫准组织农民军收集散在各地的武器，整顿队伍，维护秩序，协助各郡以防意外之变。

执纲所以农民武装为后盾走上了实现改革弊政的道路。他们从比较容易实行的项目入手，开始工作；检查官吏的文书，处理人民的诉讼。他们对民众的诉冤处理得坚决果断，因而深得人心。他们勒令土豪劣绅，从霸占百姓的墓地上迁出坟墓，退还强占夺去的民财，释放被拘捕关押的老百姓，解放奴婢，废除两班和常民的等级差别。

执纲所于6月至9月之间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它遇到很多困难。它仅在小块土地上，即在全罗一道存在。统治阶级虽停止了军事行动，却仍进行了对农民军的瓦解工作。大院君为怀柔农民军，派亲信郑硕谟到南原，说服金开男放弃斗争，归农安居，妄图对农民军各个击破。全琫准得知此事后，写信给金开男，坚定地说：“吾辈之举，有进无退，若顺国太公之命，万事去矣。不若杀郑某一行，以绝国太公之望”。^①金开男严厉谴责郑硕谟，并将其逮捕下狱。可见，全琫准、金开男等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但统治阶级也并不放弃破坏活动。

^① 《东学乱记录》上，第68页。

执纲所的成员比较复杂。有农民出身的代表，也有一些东学教徒和暂时投奔农民的投机分子、胥吏和地痞等。他们表面上装出积极的样子，暗地里却消极怠工。他们身为执纲所的办事员，却终日闲坐清谈，消磨时日。这些人包庇郑硕谟，为他逃离南原开了绿灯。

执纲所虽系农民及其他下层群众在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具有与封建政府对立的政权性质，但由于成员的复杂和阶级的局限性，未能起到真正代表农民和贱民利益的作用，未能巩固和发展农民军业已取得的成果。

第四节 农民军的再起和失败

一、清日两军出兵朝鲜 中日战争的爆发

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在同农民军正面较量之前，5月23日于灵光提出“借外兵以助之”的意见。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对此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他们担心，如果清兵出动，日军也必定出兵，汉城将变成外国军队的角逐场所。因而统治阶级对此犹豫不决。5月31日，全州被农民军包围，接着被占领。封建统治阶级惊慌失措，于6月3日，正式要求清朝派兵。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派遣叶志超、聂士成率领一千五百名军队，于6月8日抵达牙山湾，次日登陆，驻扎牙山和公州一带。

日本政府得知清兵赴朝，就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出动大批陆海军，非法闯入朝鲜。日本政府命令回国休假的日本驻朝公使率领四百多名军人先返回朝鲜。驻朝公使大岛于6月9日抵仁川，不顾朝鲜政府不准带兵进京的要求，强行率兵进京。

此时，朝鲜形势已恢复平静，颇出大岛之意料。朝鲜政府声

明农民暴动业已平息，要求两国军队同时撤军。对此，清政府表示同意，敦促日本急速扶择。身处窘境的大鸟只好表示同意，并向本国政府请示。日本政府挑起战争的准备早已就绪，决不肯撤回军队，严厉责备大鸟同意撤兵的意见，并指示想尽办法寻找借口。

日本政府为执行既定方针，提出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改革”的方案，它明知清政府不会同意这一招。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他们就单独进行，以此留驻军队，觅寻挑起战争的借口，加强对朝鲜的控制。鉴于形势极其严重，朝鲜政府呼吁各国驻汉城外交使节出面予以斡旋，敦促日军撤走。朝鲜政府特别把希望寄托于美国，但美国公使却认为日本出兵是“合乎情理”的，仅出面表示一下就缩回了去，其他国家命名节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于是，日本政府继续增派部队。日本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率领几乎全部海军力量集中于朝鲜西海面上，陆军少将大岛率领的一万多陆军布置于汉城至仁川地区。7月17日，日本公使通告朝鲜政府准备单独进行改革。7月20日又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政府废除同清朝政府签定的一切条约，促使中国军队撤出朝鲜，以示朝鲜是“自主独立国家”。答复日期限定于7月22日夜十二时。

日本按照自己的行动计划，于7月23日，动员一团兵和若干炮兵开进王宫。朝鲜军队立即反击，因寡不敌众，而溃散。另一支日军包围云岬宫，诱骗大院君进宫。7月24日，高宗在日军的威逼下，降旨宣布一切政务由大院君主管。7月25日，日本为制造立即开战的借口，迫使朝鲜政府废除同清朝签订的一切条约，宣布将驱逐中国军队的一切权限委托给日本。26日，日驻朝公使将此事通知给大岛。大岛接到通知便率领军队离汉城南

下。但战争早已开始。日本海军于 25 日晨，突然袭击停泊在丰岛的中国舰艇，于是中日战争爆发。

事实表明，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日本提出的“内政改革”是对付共同撤军这一合理提案的反案，是制造战争借口的一桩诡计。

这场战争又是对朝鲜的战争。日本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并占领了王宫，颠覆了朝鲜政府。朝鲜军队过于软弱，一击即溃。日军解除了汉城朝鲜军队的武装。朝鲜遭受日军铁蹄的蹂躏。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朝鲜近代史上是一件大事件。从此，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农民战争的再起和公州战斗

日本侵朝野心已暴露无遗。朝鲜人民对此无比愤慨。全璘准于 9 月底在全罗道参礼讨论了“起众击日之事”。他决心组织反日义兵，直驱汉城，追究日本的所作所为，惩罚倭寇。

全璘准在参礼发出号召，作好准备，直接北上。各地群众积极响应全璘准的号召，纷纷聚集于参礼，义兵达四千多人。全罗道全州、高敞、泰仁、南原、金沟、茂长、灵光、井邑、古阜等地农民军部队，均向参礼转移。清州、舒山、通州、陵州、公州、报恩、槐山、黄涧、安城、水原、砥平、伊川、通川、原州、横城等地农民军，聚集于忠清道青山。

参加反日斗争的阶层进一步扩大，包括部分爱国两班、儒生、地方小吏、政府军队的士兵等。

10 月 15 日，全璘准率领农民开进论山，打败官军。论山地处忠清南部，是谷物的聚散地，便于陈兵。农民军砸开附近富户仓库，将粮食集中于此，一部分救济贫困农民，其余充作军粮储备。

全瑛准于10月16日致宣抚使的信中，痛斥日本侵略者和封建统治阶级。他说：“日寇之构衅动兵，逼我君父，扰我民黎，宁忍说乎？在昔壬辰之祸，夷凌寝焚阙庙，辱君亲，戮黎庶，臣民之共愤，而千古未亡之恨也……目今朝廷大臣，妄生苟全之心，上胁君父，下罔黎民，连肠于东夷，致怨于南民。妄动亲兵，欲害先王之赤子，诚何意哉？竟欲何意？今，生之所为，固办其极难，然一片丹心，营死不易，扫除天下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以谢先朝王五百年遗育之恩。伏愿阁下猛省，同死以义，千万幸甚”。^①

全瑛准在信中明确说明重新起义的目的，就是抵御日本的侵略，惩处投靠日本的卖国贼。他又表示，官吏即使作过错事，如悔改共事，则一概不究既往，表示欢迎。

日本增强了对农民作战的军事力量，企图在论山农民军采取新行动之前消灭其主力。

朝鲜政府也部署了军事镇压措施，任命壮卫营领官李斗璜为竹山府使，任命经理厅领官成夏永为安城郡守，责令镇压京畿管内的农民军。又任命申正熙为巡抚使，设巡抚营，授与镇压全罗道、忠清道、江原道、京畿道、黄海道地方农民军的全权。动员的兵力达三千余名。

各地农民军痛击政府军。十月忠清道西部地区的一支农民军在转战中取得很大胜利。10月26日，在洪州与政府军展开一次激战，消灭一百多官军，又在德山打了一仗后转移到海美。10月29日，另一支农民军进攻礼山官军，消灭不少敌人。

全瑛准在论山整顿队伍，积极准备公州之战。他又一次发表檄文，着重讲明反日的目的，呼吁忠君忧国之士，回到义理上

^① 《东学乱记录》上，第383—384页。

来，共议斥倭斥和，同心协力，提防朝鲜变成倭国。

农民军于23日抵达距公州三十里的敬川。由于日本从南路增兵，孙和中部未与全琫准一道北上，留在光州地区加强部署，牵制日军。金开男从南原启程，路过锦山、镇岭、怀德抵公州北面清州。沃川农民军进驻距公州东三十里的大桥。有的农民军从正川赶到孝浦，有的则进驻木川，占领细城山。木川地处公州与清州之间，是战略要地。聚集于公州地区的农民军达五万之多。难怪公州官员哀呼“万分遑急”。

农民军从熊峙地区连续数日与官军展开激战，取得一些胜利。25日，农民军分三路发动攻势，战局处于僵持状态。农民军的损失也不轻，只好暂时退到论山，重整旗鼓。

11月8日，农民军经敬川、分两路再次进攻，一队经板峙后峰进驻凤凰山后麓的三十——四十里的地段。另一队占领金鹤、熊峙、孝浦等高峰。

农民军在牛金山、熊峙、凤凰山等地出击。战斗颇为激烈。日本大尉率领日军绕道牛金山，从农民军背后开炮轰击。农民军处境不利，难于抵挡，只得后退。日军趁机加强进攻和追击。农民军退到论山，整顿队伍，准备反击。但未能挡住日军的进攻。

11月25日，全琫准率领队伍到金沟泰仁地区，占领城煌山、间加山等九峰，进行整顿。官军和日军从东西两面攻上来。农民军顾不得整顿立即应战。因力量对比悬殊而退却。农民军从此瓦解，未能重振。全琫准为了重新起义，路过淳昌寻找金开男时，被叛徒密告，于12月20日被捕。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农民军失去统一领导，分散的队伍只好在各地“游击不定，避强侵弱”继续战斗。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就此结束。

三、农民战争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甲午农民战争是以农民为主的，有各种贱民、小官吏和东学教徒参加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后期，一部分儒生和两班也参加了斗争。

农民战争一爆发，东学下层群众就纷纷参加农民军，因其多数是贫究的农民，同起义军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崔海月对此恼怒不已，竟发布通文制止教徒参加农民军，并要求全琇准“勿为妄动，益究真理，不违天命”。^①

他又公函于官厅，揭书于街巷，说什么“凡乱递蔑法之教人，法以依律惩勘”，一再致书于忠州驻扎日兵站“声明全琇准之不规。”^②

崔海月的谩骂不能制止农民的发展，崔海月不得不起来行动，发布通文命教徒聚集，6月12日，率教徒袭击怀仁县，接着进攻镇岭。但被忠清道观察使赵秉镐的征讨架势所吓坏，不数日便解散。

综上所述，甲午农民战争是从古阜农民起义开始。农民起来了，东学下层群众才参加了农民战争。与此相反东学上层领导集团则始终站在农民军的对立面。

甲午农民战争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战争过程表明，各阶段的打击重点是有变化的。初期和中期，是以反封建为主。日本在此时虽加强了侵略，但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到后期，就不同了，日本直接诉诸武力，因此农民军举起义旗，进行了反侵略斗争。战争是以反侵略为主的。

① 崔疏铉：《侍天教历史》，第77页。

② 崔疏铉：《侍天教历史》，第80页。

农民军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从它的内容来讲，有些条款带有整顿的性质，有些条款带有新的内容。从十二条中可以看出农民军提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要求，封建统治阶级曾炮制农民军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农民军“假称平等，毁坏名分”，这从反面证明农民军确是提出过平等的口号。平分土地一条，是经济上的平等要求。农民军又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要求，它反映了争商权，争市场的朝鲜工商业者的愿望。

以全璘准为首的农民军，留下了很多文字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他们恨的是各级官吏的压榨。他们提出过“尽灭权贵”，矛头指向官僚，却不包括国王。他们把自己说成“食君之土，服君之衣”的“仁孝慈爱”的圣上的赤子。他希望皇上除奸臣，建立“升平圣世”。因此，他们主张“澄清圣道”，“忠教双全”。在他们的文件中，常常暴露出比较浓厚的三纲五常的色彩。

全璘准的思想在斗争中有了一大进步，达到了君主立宪制的水平。

甲午农民战争曾席卷朝鲜大半地区，延续了将近一年，但终归失败，其主要原因是：

1. 参加战争的农民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农民的分散性在战争中如实地表现出来。参加战争的农民虽数以万计，使朝鲜中南部地区处于战争漩涡之中，但受统一指挥的、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极少。由全璘准直接指挥的主力部队只占少数，大部分农民军是在自己的家乡附近进行分散活动。这些部队之间也缺乏联系。

2. 战略战术上的失策，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农民军往往在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错过时机，使战争的继续发展受到极大影响。农民军发动战争以来，发展异常迅猛，很快占领了要地。应按原计划驱军入京，不给统治阶级以喘息机会。

休战期间没有作好准备。因此，在日军打进王宫，缴械朝鲜军队武装的严重时刻，未能及时行动起来。农民军重新起义时，日本军队早已占领平壤。日本可随意调遣军力镇压农民军。

3. 农民军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封建社会末期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只有新兴的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其后的农民起义，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同广大工农群众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而当时朝鲜资产阶级还只开始形成，政治能力很弱，没有能力领导农民战争那样规模大的战争。

4. 日本的武装镇压是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在挑起中日战争以前，希望农民战争继续下去。战争爆发后，农民军的发展使日本的对华作战不利，对朝政策也不利。日本从九月以后直接动用军队围剿农民军。日本军队是用近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它还控制着朝鲜军队，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加强反农民军的军事力量。当日军围剿日益加紧时，仇视农民军的地方官吏、民包军（土豪组织的）、守城军等，协助官日军。袭击农民军。一度参加农民军的投机分子也纷纷反水，成为农民军的敌人。这样一来，力量对比相差悬殊。

尽管如此，甲午农民战争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甲午农民战争是反侵略反封建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它给日本侵略者和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显示了朝鲜人民的爱国情操，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在一年的时间里，各阶层群众以共同愿望为基础，形成了强大的战斗队伍，显示出无比的团结力量。他们为打倒阶级敌人，前仆后继，继承和发扬了反侵略反封建的爱国传统。

甲午农民战争进一步促进了朝鲜社会的发展。农民军在战争中提出了许多迫切要求。有的要求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它虽然失败了，但促使统治阶级进行了甲午改革。

甲午农民战争揭开了朝鲜近代群众性武装斗争的序幕，它为之后的几次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甲午改革

一、改革的酝酿

甲午农民战争揭露了李朝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冲击了统治阶级。封建统治阶级深感“危急存亡之秋”已经到来，担心“不施以止火回生之方”则必将灭亡。他们认识到农民战争的根子，在于各级封建官吏的种种弊政，残酷剥削使农民“不得糊口，穷窘莫甚”，不得安生乐业。因此，他们主张以新政求得“保国安民之策”，“以矫积久之弊，振萎靡之风”。1894年4、5月间，朝鲜政府几次召开大臣会议，商讨急需解决的问题。就连比较保守的郑范朝，也认为“矫瘼怀保之政，万可不少忽”，赵秉世也说，“若非大更张，大施措施，竟无实效”。

虽然保守人物也在议论大更张，但他们所说的更张同开化派所说的更张是有差距的。赵秉世虽讲究更张，却认为“凡事外务都是茫昧”，“悚闷而已”。郑范朝却说：“一经骚扰，第择其切急于民者，除一害减一弊渐次就绪，则此为不立更张之目而自然更张”。^①意思是说，吸取农民军提出的要求，改则就是更张。金弘集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说：“大抵更张之者即就其政治之有病弊，变而通之，以合其宜，即时措之义”。^②他主张仿效各国的先进制度，改革旧制度，使之适合于时宜，而后进行各方面的

① 《高宗实录》卷三十一，31年5月。

② 《高宗实录》卷三十一，31年5月。

改革。这是改革的方向性问题。

持有改革思想的官僚，在政府中的作用逐渐大起来。中日战争爆发后，闵妃后党的人物退隐。大院君虽受日方诱骗，进入王宫，但他仍不甘心于日本的侵略。他入宫前，只是得到日本公使馆秘书代表公使作出“断不割朝鲜国之寸土”的保证才进宫的。小小公使的空头保票自然无济于事，但它说明大院君对日本的侵略倒是有所警惕的。中日战争爆发，金炳始出任领议政，不久辞去，由金弘集接任。由此，志向于改革的力量增强，并逐渐掌握实权。

日本的武力干涉促进改革的进程。日本炮制的协助朝鲜内政改革，是在日方出兵后外交处于被动时提出的。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毫不掩饰它的真意。他说：内政改革是调整中日两国间错综复杂、悬而未决的困难局面的一种策略，它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无任何意义。

日本公使大岛于6月26日谒见国王时，第一次提出内政改革问题，并要求任命调查委员与日本公使协议改革事宜。国王对此很不满意，说：“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①

日本公使依着本国政府的命令，于7月3日向朝鲜政府提出五条内政改革方案。7月10日，大岛会见三名调查委员，提出改革纲目五条二十七款，各款都规定了实现日期，期有三种，有十天、半年和二年的。他们也知道有些条款在限期内根本无法完成，朝鲜政府不能接受此种无理要求。

在几次的会谈中，朝鲜政府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对朝鲜内政的无理干涉。另一方面，朝鲜政府于7月11日设立校正厅，

^① 《高宗实录》卷三十一，31年5月。

任命校正厅委员。委员聚集在一起研究改革事宜。7月16日，三名委员联名给大岛写信，重申了原来的立场。这就是要日本先撤兵，并撤回改革案，由朝鲜自主改革。同日，朝鲜外务督办将内容基本相同的公函送至日馆。

日本的“内政改革”遭到朝鲜政府的拒绝后，7月17日公使通告朝鲜政府，日本准备单方进行改革，置朝鲜政府的抗议于不顾，动员野战军电信部队，开始京釜一线架设电信的工程。

日本提出内政改革问题时，日本国内的舆论界纷纷提出各种意见，其共同点是要夺取更多的权益。1894年6月17日日本《时事新闻》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将帮助朝鲜的文明事业》。它直截了当地提出，首先将汉城釜山之间的电信管理置于日本的监督之下，取得京釜铁路的修筑权，等等。

可见，他们所说的内政改革，实质上就是掠夺。当时，金允植曾说，如果依从他们的要求，则我们将失去一切。他不幸而言中，朝鲜政府拒绝日本的要求是维护自主的表现。总之，日本的帮助内政改革十足是假，掠夺各种经济特权则是真意。日本对朝鲜的自主改革起了破坏作用。

二、军国机务处和诸般改革

朝鲜为了搞好改革，设立了军国机务处。军国机务处是改革事业的决策机构。它虽属于议政府，实则是个权力机构。军国机务和一切事务的改革，均由机务处讨论决定，颁布诏书以便实行。

军国机务处由总理大臣金弘集兼任军国机务处总裁。金允植、鱼允中、俞吉浚等任军国机务处委员。金弘集曾几次辞谢总

裁的职务，但他终于横下心来，准备“卧薪尝胆，以雪今日之耻”。^①

日本刚刚挑起战争，对战争结局尚无把握，战争正在朝鲜境内进行，无暇顾及其它。

日本对朝鲜内政改革不感兴趣，并且怀疑朝鲜这样国家能否进行什么改革。日本政府炮制“内政改革”，挑起对华战争后，对朝政策尚未作出明确的定论。因此，改革本身并未引起多大注意。

这些事实，对朝鲜的改革是个有利因素。军国机务处利用这种局势推进改革事业，史称“甲午更张”。甲午更张不仅仅是一两个法令的公布，而是将近三个月内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方案的总称。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中央及地方的官制和州县的职能，有关行政和司法的规定，有关田赋和财政的规定，教育行政，学校，军事，产业和经商等规定。

首先改革中央行政机构，设议政府和宫内府。议政府下设内务、度支、法务、学务、工务、军务和农商等。议政府首脑为总理大臣，总管各部事务；左赞成和右赞成协助总理大臣。议政府的直属机关有军国机务处、都察院、中枢院。都察院检查中央以及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主管他们的功过。中枢院由并无实职的高级文武官员组成，是咨询机关。

经济方面：规定货币上税；改革度量仪器；改革和整理国家财政，建立新的货币制，实行银本位制；严惩贪官污吏等。

对土地问题也作了规定，有两个内容：第一，近十年内，田地、山林、家产被地方官吏以及土豪强占或减价勒索者，本人上诉于军国机务处，经调查核实，责令退还原主；第二，非朝鲜国

^① 《金总理遗稿集》第224页。

籍者不得占有或买卖国内土地、山林以及矿山。

培养人材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另定选材方法。要求官吏熟悉朝文、汉文、写字、算术、国内政事、外国事情。学务部首先编纂小学教材；并派遣留学生。

废除封建等级制度：破除门阀班常等级，不拘贵贱，选用人才；废除公私奴婢制度；废绝人口贩卖；禁止缘座法；废除嫡庶差别制度。

加强社会治安和国防建设措施：建立新的警察制度；加强军队建设，特别强调对军队要进行卫国护民思想教育。军国机务处指出，朝鲜军队缺乏教育，“不知体操担铳之为何职分，不知卫国护民为何事”。因此，要求用朝文编写士兵教材，每日在指定时间内上课。

对外政策方面：国内外一切文件，使用开国纪元；向各国派遣特命全权公使，重大外交活动、签订条约、聘请外国人等事，由外务大臣和协办共同协议，得到总理大臣的批准方能实行。

改变风俗：废除大臣路过时人民起立和下马制度；简便服装；禁止早婚，规定结婚年令，男二十岁，女十六岁；寡妇改嫁无论贵贱任其自由。

军国机务处提倡群众提出有利于国家的意见。此后，向军国机务处提出意见者就有十几个人。池锡永在上书中指出：“我民之心痛者有二，曰冤心，曰忿心。困于掎克，困生冤心，冤积无解，故生忿心”要求“为民雪忿”，^①并揭露闵泳骏的非法行为，要求以法惩办。军国机务处依“百姓请函，施当律”。

军国机务处自7月至10月间共发表二百多项改革方案。

改革是在斗争中进行的。一部分人对改革有抵触思想，表示

^① 《高宗实录》卷三十一，31年7月。

不满。警务使金基鸿诬陷金弘集。金弘集先后三次提出辞呈，国王不予批准，理由是，正值大更张时期，重任在身。便撤换了警务使。

改革的内容虽然不彻底，但很多部分符合朝鲜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横下心来“自修自强”的愿望。

改革的条文能否实现，取决于很多因素。甲午改革触犯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意图，表现了朝鲜不愿按日本的指挥转动的自主心理。日本驻朝官员在报告中说：若放任军国机务处，不知将带来何种后果，日本苦心经营的一切，就会变成画饼。这种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其后发展表明，改革对朝鲜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地方上收买土地的日本人，长时期担心自己买下的土地能否完全为自己占有。日本人觉察到收买土地是最好的事业，但不少日本人不愿意投资买土地，这便是甲午改革的作用所致。

三、改革的失败

甲午改革加速了朝鲜近代化的步伐。就日本来讲，这种局势的发展是不能容忍的，也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于是，日本公使成为日本政界的非难对象。1894年11月，日本政府以不适宜为由撤回大岛公使，派内务大臣井上馨为新任驻朝公使。井上馨就任后，提出二十条意见书，即所谓“二十条改革案”。并对军国机务处的“无益”条文给予取消。

井上提出的二十条，是全面破坏甲午改革的宣言书。其中，有的已由军国机务处作出决定，有的是将要作出决定的内容。这是日本为假装改革而不可缺少的，从加强侵略的角度来看也是有用的。井上的那几条，明显暴露出侵略野心。下面试举几条。

第一条规定，政权总出一门；第二条规定，大君主有亲裁政

务之权，又有立法之义务。制定这一条的目的是要恢复国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实行改革，国王的专制权力确实受到很大限制，国家的重大问题和法令，由机务处作出决定，由政府执行，国王只起名义上发布命令的作用。日本企图权力集中于国王，以便利用无能的国王加强侵略，为日本开方便之门。

与此相关，井上在第十七条中规定了军国机务处的权限。军国机务处的存在，阻碍着国王总揽一切。井上考虑到骤然取消也不大适宜，因此他要求削弱它的权限。

第十六条规定，不必设工务衙门。江华岛条约以来，朝鲜民族工商业者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民族工商业。扶植、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必将巩固自修自强的物质基础。为此，军国机务处有鉴及此，在行政改革中曾单独设立了工务部，主管民族工业。朝鲜民族工业的发展，必然威胁日本资本在朝鲜的地位。因此，日本力图取消工务部，以阻挡朝鲜民族工业的发展。

井上是当时日本的内务大臣，派井上为驻朝鲜公使，说明日本政府是非常重视破坏朝鲜改革的。井上以国王“顾问”自居，以大院君曾与平壤的中国军队秘密联系为借口，把他赶下了台。井上又借口朝鲜政府任命四名协办一事，无理刁难，提出所谓“觉书”，狂叫什么违背“改革案”，无视“顾问”，以撤回“改革案”相威胁，他在同高宗的面谈中，还曾叫嚷什么，“动武问罪”。井上终于强迫高宗和大臣同意实行二十条改革案。军国机务处变成咨问机关，几次会议后便无声无息了。

12月，井上迫使高宗发表所谓“洪范十四条”。这是根据大岛的“改革案”和井上的“二十条改革案”拟成的。过去有些人把它看成甲午改革的基本内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甲午改革是在朝鲜政府内有志改革的当权官僚的推动下进行的，旨在使朝鲜走向近代化。“洪范十四条”是日本侵略者直接参与后拟成

的，旨在彻底推翻朝鲜的改革。

甲午改革的失败，表明日本极端敌视朝鲜的近代化。他们对任何改革都加以镇压，即使上层的、不彻底的改革也不放过。日本口口声声说保障朝鲜独立、协助朝鲜改革，只不过是侵略的花招。其实，他们所需要的绝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有利于他们侵略活动的改编。

在日本侵略势力盘据的国度里，缺少群众基础的改革是行不通的。改革的承担者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也不是在农民战争的烽火中涌现出来的农民阶级代表，只是一些有志于改革和实现近代化的封建两班出身的官僚。他们虽同其他官僚有所区别，但他们却只把农民看成统治的对象，从未想过动员农民进行反侵略斗争，他们不可能想到这一点。边镇压人民，边改革国政，这就是他们的行动方针。他们是缺乏群众基础的软弱无能的改革派。他们确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并作了努力，但没有顶风恶战的能耐，宁死不屈的毅力，因而改革以半途而废告终。

第十五章 甲午农民战争后的朝鲜社会经济状况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吞并朝鲜的斗争

第一节 甲午农民战争后的朝鲜形势 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一、甲午农民战争后的朝鲜形势

日本以武力威胁，将甲午改革压了下去。但它并不满足于此，又网罗一些人，塞进朝鲜政府，使他们成为反对派。1894年8月，朴泳孝从日本归国。井上操纵高宗起用朴泳孝为内务大臣，徐光范为法务大臣。1895年4月，朴泳孝任内阁总理大臣署理。朴泳孝同金弘集一直存在着摩擦，争权分党，相互夺权。

日本公使井上严格控制朝鲜政府。金弘集内阁已经丧失自主性，按井上指挥办事。为了装璜门面，也曾进行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如改定公私服装，改革军制，制定军衔，编训练队等，但均由日本军官指挥训练。5月底，金弘集被免，朴定阳接替。8月初，金弘集又出任总理大臣。内阁的频繁更替，说明朝鲜政局不稳，尽管日本控制朝鲜政府。这种局面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中日战争后，沙俄伙同德法，对日施加压力，迫使日本退还辽东。随后加强了对辽东的侵略。朝鲜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认为沙俄确实强大，以闵妃为中心的一派便企图投靠沙俄，以牵制

日本的侵略。日本操纵朴泳孝等，想要除掉闵妃，但未能得逞。

日本公使三浦一直注视着闵妃在政治上的干预，认为这种局面发展起来将威胁日本的利益，便着手策划除掉闵妃的阴谋。这就是拥戴大院君进宫，再乘机杀掉闵妃，同时又提防大院君。

闵妃怂勇国王下决心解散训练队。三浦趁机指挥刺客和守备队，于10月8日凌晨进攻王宫，砍杀闵妃烧毁尸体，史称“乙未事变”。另一群日人护卫大院君进宫坐阵。

日本为掩盖罪行，照会朝鲜外交部，狡辩说日人并未参与10月8日事变。但内外舆论哗然，日本政府只得召回四十多名参与者，在广岛裁判所演了一出假裁判的丑剧。裁判所最后宣布：无确凿证据，就地释放。后来，日本政府指派其中的某些人重新到朝鲜任职。

朝鲜政府在日本的授意下，于1895年12月底发布“断发令”，制定有关衣冠的若干规定。警务使指示警官率领巡检手持剃刀和剃具串街行巷，挨户威胁剪发，无论老少，均不得免。目睹者写道，是日，终日风沙，哭声满城，有的不忍羞念，乃至自决。

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野蛮行径激起了人民的极大不满，因而在“京城市中到处发生小暴动，杀害官吏”。^①

二、反日义兵斗争的兴起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都是民族的起义。”^② 1895~1896年的义兵斗争便是朝鲜人民的又一次民族起义。

① 巴多·比肖夫：《三十年前的朝鲜》，第2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5页。

乙未事变和断发令的实施，是掀起义兵斗争的导火线。骇人听闻的事件，引起朝鲜人民的极大愤懑。部分地区人民组织义兵，声称：“吾侪奋起，将此等日人攘出国境之外。”^①侍从院侍从林最洙与下级军官联系商定讨奸。由于无充分准备，一举而溃。

李弼熙、李春永、安承禹等人在江原道原州郡举行起义，李弼熙任队长，李春永任中军，安承禹任都军务。李弼熙率队南下，先后捕捉了堤川郡守金益珍、丹阳郡守权潇、清风郡守徐相燮等。日本出动守备队。义兵在长汇与日军交锋，首战告捷，声威大振，他们商定，推柳麟锡为队长，加强队伍。申芝秀、李范稷等人相继起义，来到堤川请柳麟锡来领导自己队伍。

柳麟锡自幼受李恒老的政治影响。他在1894年写道：“时变，言之痛苦，思之痛心，”迫切希望“揭义明理，激动四方，忠知之士，义勇之民，扫荡贼氛，廓清乾坤。”^②他同意李弼熙等人的意见，承担队长重任。参谋长朱庸圭替队长执笔写了《檄告八道列邑》和《檄告内外百官》，揭露日本的野蛮行径，并号召说：“上自公卿，下至士庶，孰京恻迫切之志，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各自寝苦枕戈，赤皆赴汤蹈海，期区宇之再造，见天日之复明，奚孰为功于一袂，实是有辞于万世。”^③

柳麟锡义兵队伍，在江原道、忠清道、京畿道和庆尚道地区展开活动。他回顾初期斗争时说，“杀几个逆党几百倭。”^④

1896年初，义兵进攻忠州。封建军队紧关城门。晚间，先

① 蔡尔康：《中土战纪本末》，朝警新记一，转引自《中日战争》七，第561页。

② 柳麟锡：《毅庵集》，第七卷。

③ 柳麟锡：《毅庵集》，第四十五卷。

④ 柳麟锡：《昭义新编》，卷一。

锋将金百先越墙进入，刺杀哨兵，打开城门。义兵冲进城内。敌人被义兵的强大攻势所压倒，从北门逃走。朱庸圭指挥战斗，不幸中弹身死。占领忠州后，金百先建议北上，攻打汉城，未被采纳。金百先从忠州回堤川。封建政府军队企图夺回忠州，便反扑过来，进驻佳兴。金百先率三百多义兵重回忠州，经过几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1896年4月，李朝政府派张基濂围攻义兵。中军安承禹指挥忠州防御战。敌人兵力占优势。安承禹严肃地下令说：“今日之事，可谓沉船破甑之秋，决一死战，有先退者斩”^①。义兵的主力在南城，一部兵力在西城，牵制敌人。义兵猛烈反击击退敌人的几次进攻。敌人重整旗鼓，再度发动进攻。此刻，义兵已用尽子弹。西城义兵寡不敌众，开始退散，南城义兵也支持不住，开始退却。安承禹毫不畏惧，登城指挥，不幸中弹，负伤被捕。安承禹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痛斥张基濂，最后从容就义，壮烈牺牲。

柳麟锡义兵部队的招募将徐相烈，在庆尚道地方与荣川、安东等七郡义兵决定协同作战，制定不叛变，不自私等为内容的“盟辞”五条。

形势不利于义兵。柳麟锡决定转移至平安道地方。徐相烈为先遣队路过狼川。狼川郡守隆重接待，供膳挽留。徐相烈弄清阴谋后，部署战斗，但为时已晚，义兵已被包围，四面受敌。徐相烈在弹雨中指挥战斗，中弹数次，壮烈牺牲。

李康年在闻庆响应柳麟锡的号召举行起义，处死安东府使，加入柳麟锡义兵部队，任游击将，在庆尚道地方开展活动。

柳麟锡义兵尽管遭受极大损失，终于转移到平安道地区，以

^① 宋相焘：《骑驴随笔》，第32页。

介川为据点，与当地人民取得联系，开展活动。

李昭应于1896年1月起义于京畿道砥平。他率领三百多名队伍转战于江原道原州和春川地区，处决春川观察使曹寅承。封建政府派亲卫队一个连前去镇压，义兵迎头痛击了敌人。封建政府增派三个连，又增派了炮兵。但都遭到回击，官军哀叹道：“众寡太不敌，可闷！”

1896年1月中旬，李昭应率部队经扬根抵广州，登南汉山与朴周荣部会师。3月初，义兵占据有利地形与封建政府军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击败敌人，缴获了一门大炮和其它武器，使封建政府惊恐不安，哀叹“官军寡弱”，义兵“转盛”。

3月下旬，封建政府调派江华岛军队，加强驻南汉山城的兵力，并于3月22日发动攻势。由于城内投敌分子的内应，义兵受到很大损失。投敌分子金贵姓原形尚未暴露，义兵误认为队长朴周荣通敌，处死朴周荣父子。义兵抵不住官军的进攻终于失败。

除上述两支义兵队伍外，各地还有许多队伍在活动。主要义兵队伍，有李麟荣、黄在显、金福满、权世渊、金道和、卢应泰、朴周庠、李中麟、李都明、琴锡祚、许芬、奇宇满等领导的义兵。

此外，以吕国安为首的三十多名中国人也参加了义兵斗争。安承禹曾与他们商讨“共举义讨贼以明大义”。^① 吕国安等人曾几次同官军作战，消灭不少敌人，大长了义兵的志气。

义兵斗争是随着日本加强对朝鲜侵略而兴起的，它具有反侵略的性质。义兵明确阐述了起义的目的是反日，但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官吏却站在义兵的对立面。义兵不得不把那些官吏视为斗争

^① 宋相焘：《骑驴随笔》，第33页。

对象。斗争又必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义兵队伍阶层较广泛，儒生、各种贱民、农民、官吏，其中最少的官吏。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柳麟锡分析这些人不能参加义兵斗争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是钱，第二是爵，第三是权。这是很有道理的。义兵的基本群众仍然是农民。从这种意义上，义兵斗争是反侵略反封建的农民战争。

反日义兵斗争给封建统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义兵称投靠日本的官吏为逆党，起名为“倭观察使”、“倭郡守”。义兵对倭字号是毫不客气的。据记载，自1895年12月至1896年2月，各地义兵处决了二十三名观察使和郡守，这是仅见于官报的数字，“漏于官报者颇有之”。

由于义兵斗争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几近瘫痪。不少官吏被处决，无人敢于接任。畿内、关东、海西等地之幸存者，“大半弃官逃避”。

日本公使三浦杀害闵妃后，得意忘形地说：至此，朝鲜已为日本所有，现在可以放心了。但事与愿违，它却促进了反日义兵斗争的兴起，掀起了一个反日斗争的高潮。驻朝日本外交官员在对本国政府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说：一般朝鲜官民自不必说，就连驻朝外国人中也盛行排日风潮，因此，权利的扩张只能局限于维持势力范围，顾不得其他，日本力量的衰退是空前的。这是就政治上而言。日本驻朝领事馆的一个官员又说：下到各地的官军到处挨打，看来难于达到镇压的目的，如果照此继续下去，在港口恢复商业是没有希望的，确有失去日本在朝商权的危险。这是就经济上而言。

义兵斗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因为没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终于失败了。

封建统治阶级阴险狡猾的手法，对义兵斗争的失败起了很大

作用。他们派遣奸细潜入义兵队伍，从内部进行破坏。李春永、朴周荣的队伍，都由于奸细的活动而遭受很大损失。另外，统治阶级的欺骗活动也很猖獗。他们迎合义兵要报君父之仇和国母之仇的心理，一再晓谕什么“一则朕过，二则朕过”。1896年2月，金弘集内阁被推翻，金弘集等人被害后，大讲什么已昭雪“神人之愤”，“快报国仇”，“快雪昔愤”等等。于是很多义兵认为目的达到，便放下武器，解散归家。只有柳麟锡认为“母仇未报”，坚持斗争。

三、日俄在朝鲜矛盾的加剧 列强加紧掠夺经济权益

乙未事变后，事与愿违，日本的地位并未巩固。高宗暗地接近亲俄派。日俄矛盾突出起来。由于义兵斗争的昂扬，日本侵略者受到很大打击，处于不利地位。沙俄不放过这种局面，以保护公使馆为名调进一些军队。俄国公使韦贝勾结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官员，诱骗高宗，于1896年2月成功地把高宗迁到俄国公使馆。高宗的“俄馆播迁”，使金弘集内阁垮台，成立了以金炳始为首的新内阁。俄国在朝的地位得到提高，日本的地位却急剧下降。

政局的突变。迫使日本在政治上退却。日驻朝公使小村和俄驻朝公使韦贝，于1896年5月签订关于朝鲜问题的日俄协约。6月，又在俄都签订第二次日俄协约。这两份条约都是侵犯朝鲜主权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条约。通过条约，日俄两国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矛盾得到缓和。

日本虽在政治上暂时退却，但在经济上仍占优势。日本在朝鲜的对外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对日贸易继续增长，比例是1894年百分之六十九点九，1895年百分之七十七点六，1896年百分之七十七点二，1897年百分之七十六点三。同一时期，俄国在

朝鲜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日趋下降、比例为百分之二点七，百分之一点五，百分之一点三，百分之一点三。

不仅如此，日本在朝鲜建立的工厂也迅速增加。1904年，日本人经营的工厂已达二百二十二个。日本资本迅速渗透到朝鲜金融中去。1878年6月，日本国立第一银行支行设在釜山。战争以后在南浦、木浦、群山相继设立支行。1906年，日本在朝鲜设立支一办事处的，就有第一银行十三所，第十七银行六所，第五十八银行五所。1905年，朝鲜流通的货币为一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二百零七元，其中日本各种货币和日本第一银行钞票达九百四十二万五千二百六十七元，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八。

帝国主义国家趁政局混乱之机，争先恐后地向朝鲜政府要求各种经济权益。朝鲜政府屈服于压力，把矿山和铁路等权益一个个地让给帝国主义国家。

1896年3月，把铺设京仁铁路权让给美国，后来转让给日本。随之，英国、德国、法国也取得了相应的权利。

俄国利用政治上的地位，也攫取了各种权益。1896年4月，咸镜北道庆源和钟城的金矿采掘权让给俄国。朝鲜建立了俄语学校，俄国军官充当教员。同年7月，俄国获得钟城煤炭采掘权。9月，俄国又获得图们江和鸭绿江上游以及郁陵岛的森林采伐权。

参加俄皇加冕典礼的朝鲜政府代表同俄方秘密谈判决定朝鲜聘请俄国军事教练和财政顾问。尔后，俄国少校军官一名、士官三名、士兵十名来朝，负责朝鲜军队的训练。1897年2月，高宗还宫，由俄国军官和士兵负责宫廷守卫。8月，又有俄国十三名士官来朝。10月俄国提出在釜山建立煤炭贮藏基地的要求。俄国亚历薛也携带秘书来朝任财政顾问，列马诺夫任朝鲜兵工厂顾问。1898年3月，朝俄银行在汉城成立。

由于外资的渗透，朝鲜资本破产。1899年，汉城四名资本家合资创办“汉城纺织股份公司”。之后，又相继成立了几家工厂。这些工厂虽都利用新的机器，但在外资的竞争中，仍不免破产。

让给外国资本的矿山，原系朝鲜资本家早已投资经营的。外国资本根据协定占领矿山，对原有投资不予偿还。

铁路部门也是如此。1900年成立的大韩铁路公司，于1902年开工修筑汉城开城之间的铁路。由于日本的蛮横阻碍，而被迫中断。

四、自主民权运动

国家不仅要有政治上的自主权，还要有经济上的自主权。没有经济上的权利，则政治上的自主权也是不完整的，不巩固的。由于外国侵略者热衷于夺取朝鲜的经济权益，朝鲜人民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维护经济权益上。这种斗争必然发展成维护独立和自主的斗争。“独立协会”则在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独立协会于1896年7月成立。独立协会主持了建立“独立门”和“独立馆”等的事务。它召开经常性的讨论会，探讨学术和启蒙问题，不涉及政府的施政问题。

但协会的一般群众和中坚人物深深感到，“国之为国”就在于自立，国家的经济权益“让之于人”就不能说是独立了。因此，协会在这些人的推动下，不仅讨论了学术问题，而且谈及了政府的施政方针。因此，引起汉城群众的关注。关心国家命运的群众积极参加讨论，并加入协会。协会的活动很快走向社会，唤起社会舆论。郑乔、李商宰、南宫臆等人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于是，独立协会发展成为政治团体。独立协会组织逐渐扩大。平壤、义州、江界、北青、大邱、木浦、仁川等地先后成立

了支会。独立协会成立后，又在汉城成立了群众性的各阶层组织。即总商会、协成会、光武协会、缙绅会、亲睦会、教育会、国民协会、进明会、大韩帝国民力会、顺成会等。这些组织支持独立协会的活动。

1897年，俄国向朝鲜政府提出租借绝影岛。独立协会会员极为愤慨，5月2日在独立馆召开了会议。到会会员一百二十九人，旁听者数百人。与会者强烈要求坚持“自主独立之权”，一致表示朝鲜的“寸土尺地”不能相让，谴责同意让给绝影岛的副大臣闵钟默为“逆臣”，负“二千万同胞兄弟之仇”。同时，对设立朝俄银行，聘请财政顾问等事，表示反对，他们在致度支部大臣的信中指出：“全国财权让与于他国人，本国度支部不蛮但为名存实无，而自失独立自主权利”^①的行为，强烈要求详细公布让与外人的“实迹实数”。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朝鲜政府不得不放弃延长俄国军官聘请期限的计划，不久就关闭了朝俄银行。

独立协会对政府的当权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闵钟默是第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协会强烈要求免其官职，“查核正法”。闵钟默被迫认罪，被解除外交副大臣职务。协会还对一些官员的非法行为向法院起诉，要求以法惩办。为了使要求得到实施，协会会员曾冲到有关衙门，彻夜静坐。

他们认为，国家到如此地步，实因奸臣弄权，践踏民意的缘故。因此，他们提倡扩大民权，广开言路。他们要求“一用一去”，“必遵国人议之者”，仿效欧洲各国“大小政令，上下百僚，下至庶民，广询博采，措诸施为”^②。他们说，东西列强之所以日益强大，都因实行“协询民意”。因此要求“更选贤良，“博采

^①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181页。

^②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204页。

民意”。他们要求民众代表参与立法，象欧洲国家的国会那样。他们在实践中感到，只派几个代表到衙门提几条意见和抗议，远不够有力。于是，他们开始广泛动员群众。

独立协会于1898年10月26日决定，翌日在钟路召开群众集会，称作万民共同会，并发出请贴。这天参加会议的人非常多，有学生、工人、贱民等各阶层群众。一些高级官员也被迫参加。会上，人们相继发言。白丁朴成春也发了言。会议通过六条要求：反对同外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①；整顿国家财政；公开审判重大罪犯；实行言论自由等。此后，每当重大政治事件，汉城市民均走向街头，集会，谴责封建政府和侵略者的罪行。

封建统治阶级把独立协会看成眼中钉，暗中进行破坏，同时，一面晓谕，一面拉拢，并怂勇负商组织皇国协会，与独立协会直接对阵。这些破坏活动均未成功。11月5日，政府竟然命令独立协会解散，并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十七名协会领导和骨干。

汉城居民得知消息，便自发召开万民共同会。11月6日，数以万计的群众涌向警务厅门前。与会者纷纷演说，揭露政府的无能。该日，天气阴冷，群众却毫无退散之意，一连几天风餐露宿，进行静坐斗争。各阶层群众积极声援，送汤饭、饼干、茶酒等。中国人也献出捐款，“买韩国糖数千百个送于民会中”。他们说“忠爱之目的一般也”。^②

惊惶不安的国王竟严命警务使，不管彼会此会一律禁止，为首者逮捕法办。群众情绪高昂，把国王比之于殷纣王，宣称我们

^①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285页。

^②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311页。

早已不是国王的臣民。士兵和巡检也表示同情，警务使不敢冲散。有的官员担心“万心守阙，必有法国革命之乱”^①。政府迫于群众斗争的压力，释放了被捕人员。

汉城市民不放弃斗争，于11月15日，在仁化门外召开万民共同会。参加的人很多。会议强烈要求“诛群奸，施六条，任贤能，允民会”。共同选举出总会长，确定活动据点。于是，万民共同会成为近乎群众性的组织，随后以万民共同会的名义将活动继续开展起来。

封建政府始终不罢休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进一步采取毒辣手段。11月21日，二千多名皇国协会会员，分成两队袭击万民共同会。负商持棒乱打，受伤群众甚多，市民无比气愤，就拿石块应战，但抵挡不住镇压，万民共同会虽然开展过很多活动，但终未形成有力的核心，而告失败了。

五、活贫党的武装斗争

1895~1896年的反日义兵斗争虽然基本上平息下来，但小规模武装斗争仍在继续。1897年以后，由于“守令及御史观察，贪虐日甚”，“抑夺民田”，湖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又日趋活跃。1897年10月，古阜、洪川地区的农民部队与名叫“英学党”的武装队伍联合，在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接壤地区开展活动。

1899年以后，活贫党的武装队伍在忠清道和庆尚道地区进行活动，逐渐扩大到全罗道地区。活贫党举起了辅国安民的义旗，于1900年4月，发表宣言指出，狡猾的倭寇伙同朝廷奸臣进犯王宫，招致变乱，却无人讲究救国之策。开港以来，港市利益均由侵略者攫取而朝廷则弊端百出。于是，他们在辅国安民的

^①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329~330页。

目标下，提出三十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

1. 粮食的大量出口，使粮价昂贵，贫民饥饿至死，应采取
措施，禁止粮食出口，实行济民之法。

2. 开港城市以外地区，外国商品同样泛滥，城市居民和农
村居民日益贫困，应禁止外商设市营商，以图复兴之策。

3. 规定粮食的便宜价格，解救民生。

4. 不准将修建铁路的权益让给外国人。

5. 因征税行商，乡村小商便无法在各地市场营商，应废除
对民间的征税制度。

6. 地主收取的地租十倍于国家的规定，应废除私田，实行
均田和救田的拯民之法。

可见，活贫党对日本侵略者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非常痛恨的，对封建统治阶级同侵略者勾结的罪恶行径也是极其愤慨的。活贫党的宣言和十三条要求，突出表现了救济贫民的愿望，表现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

活贫党武装队伍在各地袭击两班住宅，救济贫民。1900年11月，在庆尚道活动的一百多人队伍，袭击财主，“散施贫民”1901年5月，在庆尚道活动的另一支队伍，切断日本军用电线，打败了朝鲜地方部队的进攻。1903年11月，一支队伍抵高阳郡，将大队长签署的条子送给金成甲，令其限期缴纳钱款。金成甲不肯听从。四十多人的队伍袭击了他的住宅并纵火烧了宅院。

1900年5月，进驻忠清道论山的队伍，召集小商，说明该队并非以害人掠夺为业，希望他们放心营业。对资金不足而难以营业的小商给以资助，资助款达千两。

活动在全罗道地方的活跃贫党队伍，于1902年7月袭击了住在木浦的日本谷商，没收了他们的钱款和粮食。

活贫党的矛头一直指向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官吏，对群众则秋

毫无犯，反而救济，因而得到群众的支持。据载，群众为感谢活贫党而立起的木牌，随处可见。

活贫党的活动延续到 1904 年。之后，同义兵联合，走向共同反日斗争之途。

第二节 日本加紧吞并朝鲜 义兵斗争的再起

一、日本加紧吞并朝鲜

变独立的朝鲜为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政府早已确定的方针。只因围绕着朝鲜而形成的国际关系比较复杂，才使日本不得不慎重其事。

二十世纪初，日本准备发动对俄战争。因为俄国是日本的最大对手。1902 年，日本同英国缔结了同盟条约。英日同盟促进日本对俄战争的准备。英日同盟签订的第二年，即 1903 年，日本政府确定对俄战争的方针，一边积极地从事战争准备，一边频繁地同俄国开展外交活动，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权益。俄国对日本的要求不予理采。

日本的当权者担心朝鲜落入俄国手中，认为这是直接关系到日本生死存亡的大事，感到谈判不会达到目的。桂太郎说需要下“最后的决心”，这就是战争，即“决一死战”。

1903 年 12 月 30 日，内阁确定了“对俄交涉破裂时，日本对中、朝采取的方针”，认为能缔结攻守同盟或其他保护性条约，那就便宜。

1904 年 2 月 8 日，日本终于发动战争。五万大军进驻朝鲜。日军到处攫取战争所需物质，强占民房、学校，甚至强占王室的

一些房屋，作兵营或马棚，又以治安为由，肆意逮捕无辜人民。俄国军队也进驻朝鲜北部地区，杀人掠物，奸污妇女，干尽坏事，朝鲜遭到日俄两国兵马蹂躏，“居民不堪其虐”。

1904年2月23日，日本同朝鲜签订了《韩日议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1. 为保持韩日间永恒的友谊，确立东洋和平，朝鲜政府应确信日本政府，采纳日本关于改善施政的劝告。

2. 日本保证朝鲜皇室的安全。

3. 日本保证朝鲜的独立和安全。

4. 由于第三国的侵犯或内乱，皇室的安宁或领土保全受到危险时，日本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朝鲜政府对日本的行动创造方便条件。日本随时可以收用军事上必要的地点。

签订韩日议定书的第二天，日本外务大臣指示驻朝公使说，对朝鲜要进行“整顿”。可见，“施证劝告”是假。强行整顿是真，“永恒友谊”、“保证领土完整”是假，军事占领是真。就日本来说议定书的签订仅仅出于出于日俄战争和镇压朝鲜人民反日斗争的需要。

1904年4月，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对朝鲜确立保护权”的问题，用他们的话说，“一切对外关系掌握在我们手中”。5月，日本政府又规定建立“保护的实权”。

随后，至8日，日本又同朝鲜政府签订《外国人雇佣协定》，规定朝鲜政府雇佣日本人为财政顾问，雇佣由日本推荐的外国人为外交顾问；朝鲜同外国签订条约、处理重要外交事务，要事先同日本政府进行协定。朝鲜政府根据协定，以日本政府推荐的美国人须知分逊为外交顾问；以日本人日贺田为财政顾问。日本政府给日贺田规定了七条对朝鲜施政纲领；监督外交；完整国防；监督财政；整顿交通机关；订出移民计划；扩大警察权等。可

见，目贺田的权限远远超出财政顾问范围。当时，日本人也认为目贺田相当于“统监”。

10月，日本陆军大将长谷川作为日本驻朝司令到达汉城，扩大日本军事警察权限范围，不仅汉城和京畿道，甚至全罗道也都实行了军事警察制度，1905年1月，发表布告，宣布严厉控制集会和政治团体的活动。2月，丸山重俊和十几名警察来到朝鲜，丸山任警察顾问，其他警察派到各道，掌握朝鲜警察行政实权。4月，缔结“朝鲜通讯机关委任条约”，把朝鲜的通讯事业完全并入日本的通讯机关。至此日本所追求的“保护实权”已全部建立起来。

日本借战争之机，企图“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美英帝国主义支持日本的这一步骤。战败的俄国也只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总之，美英俄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准许日本对朝鲜实行保护和监督等措施。

战争结束后，日本急于炮制对朝鲜的保护条约。1905年11月，伊藤博文窜到朝鲜。日本军警严格把守汉城的要害和宫廷，人民“不得寸步自由”，官吏“出人战栗”。在严密的军事部署下，伊藤在长谷川和林权助陪同下闯入王宫，在一片惶恐的气氛中提出要缔结韩日新条约，即“乙巳保护条约”。伊藤叫嚷什么日本在中日战争中丧失了无数的人命和钱款，此次日俄战争中又丧失了十几万人命和一十亿巨款，以此威胁朝鲜。高宗回答说，“以许此条，则与亡国一般无异”^①，表示不同意。11月17日，高宗大不耐烦，称病不见，令大臣再议。伊藤勒令大臣开会，要各大臣只表示可或否。李完用争先写“可”字，朴齐纯、李址镛、李根泽、权重显等也都写了“可”字。保护条约就这样通过

^①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170页。

了。历史上称同意保护条约的五大臣为“乙巳五贼”。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日本政府通过东京的外务省指挥朝鲜对外关系和事务，日本的外交代表和领事保护在外国的朝鲜国民及其利益。

2. 朝鲜政府不经过日本政府，不得签订任何国际性条约和协定。

3. 日本政府在朝鲜国王之下安排一名统监，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管理有关外交事宜。

条约的签订激起朝鲜人民的极大愤慨。朝鲜政府各部官吏流涕叹息，全废事务。《皇城新闻》发表张志渊《是日也，放声大器》的文章，揭露了签订条约的内幕和原委。

连日来，学校罢课、商人罢市，一齐涌上街头。气愤的群众冲到李完用家，烧毁了他的住宅。李相高、李愚冕、宋秉瓚、闵泳焕、赵秉世等人纷纷上疏，阐明条约的实质，要求国王处死卖国奸贼，否决条约。赵秉世、闵泳焕、洪万植、金奉学、李命宰等，均以自绝表示抗议。中国旅日学生潘宗礼在回国途中抵达仁川，得知保护条约和闵泳焕之死，痛恨已极，投海自杀，以示抗议日本的侵略。

17日以后，汉城居民连续举行集会，声讨国贼，反对条约。22日，一名年青妇女在集会上揭露条约的实质，“其辞意慷慨，义理森严，听者无不感泣”^①。30日，李相高在集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不能自力，而归于他国保护，则不仅国家灭亡，而且全国人民也将灭亡。数千男女耶稣教徒集合于崇礼门内教堂，为国家祈祷十多天。

国家已面临危亡之机，朝鲜人民谴责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

^① 郑乔：《韩国季年史》下，第187页。

《皇城新闻》形象地写道：“舌刺之，笔刺之，目刺之，千刺万刺，刺之不已”。^①

二、反日义兵斗争的再起

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南部地区以农民为首的义兵队伍频繁活动。规模不大，七、八十人或一、二百人。1904年9月洪川一些人发表起义檄文，号召广大人民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义兵，抗拒日本侵略者。义兵在警备薄弱的地方活动，袭击官衙，夺得武器和弹药，征收粮食。在江原道原州起义的元容八率领一百多人队伍，开进忠清永川郡，同年8月到丹阳郡梅浦，向群众宣传起义的目的：“处决逆党，击攘倭夷”^②。并向丹阳郡守发出严重警告：我们起义的目的，在于“歼尽逆党仇夷”，若在宣布这种目的后，仍对义兵采取敌对态度，我们就将毫不客气，后果由本人负责^③。元容八义兵部队返回永川，扩大队伍，进驻宁越，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官吏。

随着义兵斗争的发展，忠清道和江原道接壤地方变成义兵的主要活动地区，并逐渐扩展到庆尚道北部。忠清道永川郡、丹阳郡、堤川郡周围有小白山、儿山、月岳山、大林山、绀岳山和龙头山。江原道宁越地方乃“乱山四塞”，南有栗岾耸立。义兵利用有利条件，转战各处，积极开展活动。封建统治阶级对此不安，发出哀鸣：义兵在庆尚北道、江原道等地时出时没，“闪息踪迹，聚散无常”，“转益炽盛”。1905年底，元容八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他坚贞不屈，豪迈地说：“吾死，为霹雷鬼，打碎

① 《皇城新闻》1906年2月20日。

②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204页。

③ 郑乔：《韩国季年史》上，第285页。

仇夷乱贼，无遗种”。^① 他于1906年3月含怨就义。

1906年，义兵继续发展。1906年2月，内部致军部的信中描述义兵斗争的情况说：义兵“去益猖獗，官兵被残酷杀害，器械未修，军队未练，彼强我弱，剿除没策”。^② 同年3月，义兵在金沟郡一商店墙壁上贴出檄文，呼吁：“国事致此，不容多言，义愤所激，方向义举”^③。并提出了军规，不遵律者，通敌泄密者，当敌畏缩逃亡者，掠夺民财劫夺妇女者，就斩。军规又规定不问身分，只有智勇，则推队长，受其指挥。

义兵斗争在南部地区首先开展起来。这些地方有反侵略反封建武装斗争的传统。因此，封建统治阶级常说，南道“素称难治”。在那里，小规模武装斗争终未中断。由于存在这种基础，义兵斗争能很快地掀起。

第三节 统监统治下的朝鲜义兵斗争的昂扬

一、日本统监统治下的朝鲜

日本对朝鲜实行“保护”是政治兼并的一大步骤。乙巳保护条约规定统监只管外事方面事务，但实际上总管朝鲜的一切事务。1906年2月1日，设立统监府，占据朝鲜外交部。地方设置理事厅和理事厅支厅。统监府有总务、农商工部、警务部等机构。其机构本身就说明统监府不仅管理外事，还管理其他部门。它享有监督、监理的权利，还享有不经过朝鲜政府直接向朝鲜官吏下达指示的权利。“统监府和理事厅官制”第五条规定：为执

① 柳麟锡：《毅庵集》第九十四卷。

② 《皇城新闻》1906年3月1日。

③ 《皇城新闻》，1906年4月6日。

行条约规定的义务，有关内政问题，统监有权向朝鲜政府要求执行，紧急事宜则直接指示朝鲜有关当局执行，事后通报朝鲜政府。地方的理事厅也享有同样的权利。

1906年3月，伊藤到汉城任统监。他一到任，就向朝鲜政府提出要进行施政改善。主要内容是：1、整理国家财政；2、整理宫中财产；3、改正从来的教育制度；4、改善治安卫生；5、开发工农矿业以及交通部门；6、外国及外人关系由统监掌握；7、整理地方行政。

伊藤为贯彻上述政纲，直接掌握了朝鲜内阁。他胡说什么，“现在是讲究维新的最后时期”，决心“全力以赴指导帮助朝鲜政府”^①一切政策都同朝鲜政府协商后才能执行等等。说是这样，实则不然。1906年3月13日至1909年12月23日共开了九十七次“关于朝鲜施政改善协议会”。会议只在统监参加时才能开成。他是太上皇，居于朝鲜内阁之上。朝鲜大臣没有实际权利，只能接受他们制定的方针。

伊藤为了严密控制国王，规定王宫的警卫由顾问警察承担，实行了门卫制度，无门票者，不得进宫。接着组织了以李完用为总理大臣的内阁。

1907年7月8日，伊藤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推进吞并政策。7月发生海牙密使事件。日本趁火打劫，追究责任。7月16日以李完用为首的卖国内阁按伊藤的授意逼高宗让位。高宗无可奈何于7月20日退位，推举李拓为新王。

24日，签订了《韩日协约》。主要内容如下：

1. 朝鲜政府在进行施政改善中接受统监的指导。
2. 朝鲜政府制定法令和处理主要问题须得统监承认。

^① 市川正明：《韩国并合史料》1，第123页。

3. 朝鲜高级官吏的任免得统监同意方可执行。
4. 朝鲜务须任命统监推荐的日本人为朝鲜政府官吏。
5. 没经统监同意朝鲜政府不得聘请外国人。

日本以条约的形式把统监指挥朝鲜的至高权利固定下来。日本依据条约把日本人安插到朝鲜政府各部，担任各部次长。1907年12月，“改革”朝鲜政府官制和地方官制，各道安排日本人书记官一名，警视、警辅、主事若干名。1908年4月，召开日本人书记官会议，6月，观察使大换班，把亲日派安插在观察使一级，日本人官员逐渐增多。1909年1月在朝鲜政府官吏中，日本人高等官、判任官就达二千四百八十名，从此，确立了统监直接指挥朝鲜政府的完整体系。

伊藤始终不放朝鲜军队的动向，便火同李完用决定解散朝鲜军队。1907年8月1日，以“军制刷新”为由宣布解散军队。

1909年7月，统监同李完用签署照会，规定朝鲜司法和监狱事务由日本来管理。之后，废除了军部和法部，幸存的几个部也由日本人掌握实权。日本实际上掌握了朝鲜的一切权利，朝鲜政府只在名义上存在。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渗透，而且在经济上也执行了并吞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要进行经济并吞，首先要整顿财政和货币。日本曾在对朝施政纲领中提出过“监督财政”事宜。其内容则是改良征税法 and 改革货币制度。他们说“朝鲜的国防财政实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①，为了扩大日本的权利，要在日本政府管理之下兴办食盐和烟草的专卖。

日本以整顿为幌子，将朝鲜货币本位跟日本统一起来，强迫

^① 市川正明：《韩国并合史料》1，第3页。

朝鲜政府承认日本货币在朝流通，朝鲜本位货币和兑换券改用日本的兑换券。朝鲜辅助货币由朝鲜政府发行，废除朝鲜典圜局，朝鲜新货币由日本大阪造币局制做。整顿朝鲜的货币事务由日本第一银行朝鲜支行来承担，日本第一银行券在朝鲜自由流通。于是，朝鲜货币完全变成了日本的货币单位。

土地掠夺是日本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日本政策非常关注日人占有土地的合法化。1906年2月，日本开始整顿耕地。11月，通过朝鲜政府发表“土地建筑物证明规则”。规则规定：以买卖、赠与或交换等形式得到土地的日本人，向理事厅申请，并领到该厅证件者，则承认其土地的所有权。12月，发表了“土地、建筑物抵当规则”。规则规定：通过土地和住房的抵押以及因此而进行的拍卖，可以占有土地和住房。

1906年10月，日本取得鸭绿江和图们江沿岸的森林开发权。1907年，制定“国有未垦地利用法”。1908年，以“殖产兴业”为名，成立东洋拓殖会社。日本认为将资本投于土地乃“成功之路”。因此，用各种手段强占朝鲜土地。到了1909年，日本所占的土地，包括森林和草地在内，竟达十五万二千多垧。

日本的资本输出激增。1910年，设在朝鲜的日人公司有一百零二个，资本有四百七十万。日本人在工业中占绝对优势。1911年，朝鲜有二百五十一个工厂，其中朝鲜人办的工厂仅六十六个，占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日本人办的工厂则为一百八十五个，占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七。就产值来说，前者只占百分之十。可见，朝鲜人开办的工厂数量很少，规模也很小。

1906年，发布了“矿业法”，1908年修订了该法。该法规定对矿山实行转让权和抵当权制度。矿业法废除了限制外国人的规定，促进了外国资本和技艺的输入；还规定对办矿所占用的土

地，可强迫土地所有者出卖，以便于日本人占有矿业权。1908年一年间，得到矿业权许可的总数为一百五十，朝鲜人占二十一，日本人占一百二十九。

从1905年起，日本准备改编朝鲜学校教科书，妄图抹杀朝鲜人民的文化传统，消除他们的反日意识。1906年发表各级“学校令”，强行关闭了很多学校，压缩了学生的学习年限。又发布了“私立学校令”，极力压缩私立学校。

1907年，发表“保安法”，授权内部大臣强制解散群众团体，警察以维持治安为理由，限制、禁止或解散群众集会。又发表“出版法”，对著作的出版实行“许可主义”，制定了“新闻法”，严格控制新闻的发行，不仅对朝鲜国内发行的新闻，而且对从外国进入的新闻也进行严格检查，一旦发现“不稳”则没收烧毁。

总之，统监府的统治，为全面“吞并”朝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作了准备。

二、义兵斗争的昂扬

1906年以来，三南地区的义兵斗争接连不断地兴起。前参判闵宗植率领的队伍于1906年3月起义。5月19日，进攻洪州城。该城被称为忠南的中原，地处交通要冲，直通礼山、青阳、保宁、舒山、康津等地。日本宪兵动员该地邮局的日本人疯狂抵御。义兵用步枪和旧式炮猛烈进攻，日宪兵抵挡不住，从北门仓皇逃走。义兵便占领了洪州城。义兵整顿队伍，选定领导。闵宗植任队长，中军、先锋将、游击将、参谋等亦皆安排妥当。忠清道各地人民闻风而动，纷纷奔来洪州，参加队伍，义兵人数竟达一千五百人，装备得到加强，持枪的六百多人，持戟之七二百多。义兵加强射击练习和军事训练。据皇城新闻报道，“军纪严

肃”，“听从指挥”。

从5月20日起，日本向洪州派遣宪警。5月26日，土方率领的日警抵达洪州，靠近城根，妄图一举歼灭义兵。但义兵出其不意，冲出城门，包围了土方。土方妄图突围逃跑，义兵紧追猛打消灭敌人。

日本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对此极为恼怒。警务顾问丸山急趋洪州，视察战地，部署剿灭之计。日本少校田中指挥的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四百多名军队赶来洪州。日军于6月10日以大炮和炸药摧毁了南门和东门，涌进城内。义兵浴血奋战，冲了城门，不少人潜伏于附近村庄。日军明知此情，却不敢追击搜索。闵宗植率领部分队伍转到结城，重整旗鼓，但不久被捕。

洪州城战斗结束后不久，由崔益铉和林炳赞指挥的义兵在定山起事。崔益铉乘起义之机致书日本政府，揭露日本的罪行，指出日本“肆凶行暴於敝国者，日甚月剧，弃信背义，无所不至”，^①列举了十六大罪状。他发表题为“告全国士民”的檄文，开头就尖锐指出国亡人亡的严重局势，说明古代的亡国只是宗社之灭，而今的亡国则为人种之灭，最后严肃地号召二千万人民要投入赶走逆贼恢复国权的斗争。崔益铉率义兵转辗各地，边战斗，边宣传起义目的，号召群众踊跃参加斗争。

起义兵于6月中旬，在淳昌被南原镇卫队包围，终遭失败。崔益铉、林炳赞等人被捕。

1907年的7月，朝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高宗被迫退位，签订丁未条约，朝鲜军队被解散等等。由此掀起的汉城军民起义，促使义兵斗争日趋高涨。

汉城居民于7月18日得知高宗被迫让位，杀向街头，召开

^① 黄铉：《梅泉野录》第379页。

集会。自强会、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的二千多名会员参加了会议。他们高呼，现今内阁诸贼，“欲废帝卖国，我等不以死争之乎？”。而后分成两队，一队冲入亲日党一进会机关报社，破坏机器，殴打其会员，并把他们赶出了门；一队静坐于大汉门前，组织演说，大声疾呼：内阁诸贼为虎作伥，甘心卖国家，我等誓诛此贼！

19日，人心愈变，云集阙外，杀气弥漫。日警企图驱散人群，人们投瓦抛砾，致伤日巡。同友会等团体组织决死队，冲上李完用家。还有人在钟路各处张贴字块，上写“请看壬辰之乱，乙未事变如何！日本的虐待无止境，我们的涂炭在眼前！”

日本警务辅佐官壹歧率领三十多名警官企图强行驱散，起义队伍群众不示弱而进逼。典洞兵营侍卫第一团第三营一百多名朝鲜军队冲破军官的制止，杀向钟路，放炮击毙数名警察。侍卫第二团同宫廷内的反让位派取得联系，拟趁让位仪式之机，处决让位派大臣，以制止让位。

被强行解散的军队，以暴动回答伊藤的残暴干涉。8月1日，汉城市民涌上街头，指责被解散回家的军人：“身为军人，徒饱国禄，无一分报效”。侍卫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朴胜焕平时把“军不能守国，臣不能尽忠，万死无惜”作为座右铭。8月1日，他叹息未能守国而开枪自杀。正在站队的军人听到枪声，困惑不解。参尉南相德慷慨地向士兵们说：“上将为国义死，吾安得独生，当与彼贼决一死战，上报国仇”。^①于是侍卫第一团第一营举行暴动。第二团第二营也跟着举行暴动。起义军人打开武器库，携带枪枝和子弹，作好战斗准备。

日本司令动员大批日兵包围了朝鲜军兵营，围剿朝鲜军队。

^① 宋相焘：《骑驴随笔》第121页。

朝鲜军队依靠营房抗拒日军的进攻，击毙日本大尉梶原为首的几十名士兵。汉城市民声援朝鲜军队，朝鲜军队伤亡很重。妇女动员起来救护伤员。一位妇女冒着弹雨而来，大呼吾同胞，吾不救，谁救之？说罢奔向战地，寻找伤员。护送医院。又有一位护士亲自上战场，救护了伤兵，乃至“血痕遍身”。有些中学女学生也到医院热情护理伤员。

汉城军队起义消息很快传到地方，地方的镇卫队也相继起义。他们与义兵联合，长期坚持了斗争。

8月2日，水原镇卫队江华岛分遣队士兵，在池洪允的倡导下举行起义。联合自强会会员和岛民袭击警察所，杀死日警和郡守。闵卓越指挥的义兵分为数队，活动于春川、平昌、堤川、永川、安东等地。他直接指挥的队伍，翻山越岭开进江陵悬仓里，袭击日守备队。封建统治阶级派出宣谕使，玩弄欺骗把戏。闵肯镐对此据理驳斥，他说：“义兵解散则国灭，在则我民不受困于日本人，而可享太平。”^①

8月以来，义兵斗争发展迅猛。黄铉概括了当时义兵斗争的基本面貌。他写道：“关东、湖西、岭南义兵大起，京东诸郡亦一时响应。倭连派精锐兵赴之，而昧于地形，进退失宜。义兵因新锋之锐，妇人运木石，老弱馈酒浆，千里连环，据险出没。故倭疲于奔命，往往败没。原州镇卫队特务正校，闵卓越说服代理金德济和士兵，于8月5日起义。”^②

1907年下半年后，为数众多的义兵队伍继续活动，如许为、金福奎、罗寿景、全龙山、朴钟汉、郑汉汝、金云老、李康年、李殷赞、金泰元、全海山、金秀敏、延其羽等的队伍。义兵为了

① 朴殷植：《韩国痛史》第二编，第148页。

② 黄铉：《梅泉野录》第429页。

有成交地对付日寇的频繁围剿，壮大自身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便开始联合起来了。江原道、忠清道与庆尚道北部接壤地区和京畿道东部地区，出现了不少大部队。义兵将领李麟荣在骊州起义。他带领队伍前往江原道原州地区，高举关东倡义大将之旗，向全国发出檄文，号召全国义兵同心协力攻打汉城。各地义兵纷纷响应。聚集于原州的义兵已达一万之多。原州交通闭塞，不利于图谋大事，义兵遂向杨州转移，重编队伍。李麟荣任十三道义兵总大将，许为任军师，以下按地方编队，如关东、湖南、京畿、黄海两道、关西、关北等队。

义兵订出计划，于年底攻打汉城，摧毁统监府，废除保护条约。义兵派人进京致函各国领事馆，控诉因日本侵略而带来的痛苦，声明义兵纯系“忧国血团”，列国应把它看作国际公法上的战争团体，予以承认，并呼吁主持公道的国家给予声援。

攻打汉城的准备就绪。军师许为率领三百多名先遣队先行一步，抵汉城东大门外三十里处。在与大军会师之前受到日军的攻击。义兵经过一次激战，寡不敌众而退。于是攻打汉城计划遂归失败。全国性规模的大联合也开始瓦解。但个别义兵队伍仍坚持斗争。

李殷赞重整旗鼓，转战于京畿道各地。他宣称，在四十多次的战斗中，消灭了四百七十多个日寇和卖国贼。农民出身的金秀民，力壮善战，在长湍起义。1908年5月，李康年率领二百多人的队伍在奉化进行了两次战斗，之后转战于永川、麒麟、金城等地。延基羽原系军人，他率领三百多人的队伍在黄海道、京畿道和江原道地区开展活动。该队伍战斗力强，“日军也不敢应战”。全海山活动于光州、长城、灵光、咸平、茂长等地。1909年4月，进攻全罗道茂长，同月中旬在咸平附近与日军展开了七小时的战斗。

咸镜北道北青郡厚峙岭以洪范图的战迹地而扬名全国。1907年底，洪范图率领义兵在厚峙岭消灭日军一个连。1909年，他将义兵分成四队，开进三水、甲山、黄水原、长津等地，捣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设施。

据不完全统计，1904~1910年间全国各处的义兵队伍有六百多个。仅日本军警收集到的檄文有几百张。1907年底，义兵与日军警展开了三百二十次战斗，义兵人数达四万四千，1908年战斗次数有一千四百五十次，义兵达七万。可见，义兵斗争是何等激烈！

朝鲜人民的反日义兵斗争，是全民性的武装斗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朝鲜历史上是罕见的。义兵庄严提出“出攘倭夷”，“歼灭国贼”，“恢复国权”的口号，有的提出争取“自由”，“平等”，“打破门阀”等要求。

日本动员了军警宪探和自卫团，动员了可以动员的力量，到处“放火烧其村落，炮杀人民”。曾访问过义兵一个外国记者写道：“至今，我没见过如此彻底的破坏。一个月以前还是繁华幸福的村庄，如今完全变了样。已被烧毁的黑黑的房架竖立着，窗户和墙壁没有了，一根针也没剩下，漏瓮破罐全不存在。人们在毁灭中寻找些什么，但那是徒劳的。”^①作者写的是堤川的惨景。象堤川这样的惨景随处可见。用近代技术装备的日军，于1909年下半年，从水陆两路大举围剿，终使义兵活动处于低潮。

义兵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朝鲜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义兵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朝鲜人民的全民性武装斗争，推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步骤，日本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把武装斗争基本上平息下来。

^① F·A·麦肯基：《朝鲜的独立运动》（朝文译本）第112页。

朝鲜人民通过斗争显示了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数百张檄文和义兵的豪言壮语，充分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为祖国的命运担忧的赤诚。崔益铉、李殷赞、李麟荣、李康年、金泰元、郑汉直、全海山等义兵将领，留下的绝命诗，表达了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敌人的憎恨心情。义兵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朝鲜人民提高了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爱国文化运动

反日义兵斗争的昂扬，给爱国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影响，促使他们开展恢复国权的斗争。他们认为，时代的趋势是生存竞争，这是天演之理，知识开明，则势力必然膨胀，知识愚昧，则势力必然缩小，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必须启蒙群众，开发民智，以期衰劣势者为优势者。要启蒙群众，不可能以少数人的热忱而奏效，必须动员为数众多的一大批人员，掀起一大运动。运动要取得预期目的，就要组织团体，形成运动的中枢，便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保证运动的发展。

于是，他们开始组织团体。团体有二种，一是政治团体，一是学会。

李儁等爱国知识分子于1906年5月组织宪政研究会。他们认为：当今的世界大势，趋向于立宪政治，采取它则国家将发展，否定它则国家将亡。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对宪政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立宪是君主立宪。他们研究并规定了国家和王室的分离，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君主和政府的权限，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事宜。宪政研究会举办演讲会或集会，讲解了该会的宗旨，宣传了“宪政要义”。它对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只有上层组织，没有基层单位，他们所

开展的促进国家近代化的活动，没有跟群众斗争结合起来，仅仅停留在政治启蒙地步。

日本侵略者处处监督宪政研究的活动，终于强制解散了这个组织。宪政研究会被解散后，张志渊等人另行组织了大韩自强会。他们认为，国家遭受侵略的原因是它过于衰弱，应发奋图强，夺回国权。他们大声疾呼：“二千万口之自强，则国家之政治可以改善，世界之羈絆可以出脱”。^① 在他们看来，达到自强的途径有二：一是发展教育；二是发展产业。发展教育和产业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恢复国权。

大韩自强会，于1906年4月28日召开第一次总会，讨论了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充实和扩大学校，编纂教科书等有关发展教育的问题。又讨论了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的问题。

大韩自强会定期发行《大韩自强会月报》，动员会员和广大群众认真阅读，使人们认识：“欲求自强之道”，“当图今日之自强”。

它定期召开演讲会，讲解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和物理学等，结合各课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亲日走狗的卖国罪行。从表面上看，它带有启蒙的性质；就其活动的内容来讲，则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宣传运动。它的活动促使群众参加政治斗争。因此，统监府于1907年8月以阻碍治安的罪名强行解散了它。

以张志渊为首的知识分子，于同年11月又组织了大韩协会。它考虑到日本侵略者的镇压，就标榜政治和文化的启蒙，提出了普及教育、发展产业、保护生命财产、改革行政制度、灌输服从于民族利益的思想等主张。

^① 《海鹤遗书》：第122页。

大韩协会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活动也很有成效。1908年7月，已有三十多个支会，一万多名会员；1909年2月，支会增加到六十多个，会员增加到几万人，“居于朝鲜政党之冠”。

爱国知识分子从事公开的政治斗争越来越难，因此，他们于1907年9月组成秘密的政治团体——新民会，其主要成员有梁起铎、李东辉、李甲、李升熏等。过不久，朴殷植、申采浩、李商宰等也相继加入。

新民会直接提出恢复国权的实践性问题，即宣传民族意识和独立思想；发现志同道合之人，争取吸收进来，以此加强国民运动的力量。此外，它还提出发展教育和产业问题。这些都是合法团体的主要成员，与新闻界有密切联系，不少人是《大韩每日申报》和《皇城新闻》的中坚人物。他们利用舆论阵地致力于宣传和揭露敌人的各种活动，对日帝的阴谋，揭得尖锐，批得有理。

新民会分别在平壤、汉城和大邱创办了“太极书馆”。书馆从事出版普及读物、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活动，也是会员进行联系的地方。

新民会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在平壤建立了陶瓷公司，由李升熏负责。

当时公开的政治活动随时要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干涉和野蛮镇压，因此，政治团体避开正面的政治斗争和口号，努力从政治生活上进行启蒙。

另一方面，朴殷植、李甲等入于1906年10月，组织西友学会。西友学会是朝鲜近代学的嚆矢。同年11月，李东辉、李佛等人组织“汉北兴学会”。1908年1月，两个学会并成“西北学会”。之后，又相继出现“岭南学会”、“湖南学会”、“关东学会”，各学会创办了学报。学报是学会的理论阵地，是教育会员和群众一种教科书。

学会的活动内容有二：一是普及和发展教育；二是致力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他们认为教育应有两类：一是学校教育；一是社会教育。他们把社会教育看成急务中的急务，认为“生人非聋而不能听，非盲而不能见”，则必然害家庭，害子女。

他们认为，学校是获得文化的一大途径，与国家存亡关联至密。于是爱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积极出资自办学校，他们认为办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教育目的。教育的目的不可能“出于政府之施为”，而应出于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迫切愿望。他们基于“失祖国”的现实，简要地提出四个字：“恢复独立”。他们认为这是问题的根本，有了这条，才有教育可言，否则，“虽家皆大学校，人皆大学生，不过虚名而已”。

他们在学校教育中，把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课程摆在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历史课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一课。讲授本国历史的目的在于“唤起祖国之精神”，培养“爱国之血性”。因此，他们直接承担了《本国历史》、《大韩新地志》和其他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把“祖国之精神”倾注于这些书，并多方筹资出版。

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深为忧惧，竟强行删去教科书中带有政治观点和激发人民情绪的词句。文化启蒙活动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批评这样的处理不当。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教员在上课时以国家观念和爱国之心讲授课程是理所当然的事，教科书的文字可以删去，教员的嘴巴却是封不住的。

由于各学会、爱国知名人士和许多教员们的努力，学校办得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富有成效。学生们演讲会和运动会使群众叫好，深受欢迎。这些活动具有浓厚的政治内容，因而《大韩每

日申报》、《皇城新闻》对学校的活动给予重视，详细报导。与此相反，日本侵略者和卖国政府却非常讨厌它，说运动会是什么吹喇叭，敲大鼓，很象武装示威呀，不符合教育宗旨呀，邪人放荡轻佻等等。这反而说明运动会做得好，做得出色。

在文化启蒙活动家和学会的倡导下，各地群众相继创办了学校。全国的私立学校竟达三千多所，其中女子学校有八十四所。汉城的普成学校，微文义塾，平壤的大成学校，安州的安兴学校，定州的五山学校，江华岛的安昌学校，是全国出名的。平壤大成学校是新民会倡导创办的。创建学校的同事们为把它办成样板学校而倾注了心血。因此，该校得到了很高的声誉。不仅平安道各地的学生，甚至庆尚道的学生也抱着书包求学于该校。

爱国知识分子把书刊的发行，看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各学会为办好学报尽到最大的努力。学报是教育会员和群众的一种很好的教科书。各学报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如《教育不兴无法生活》、《旧习改良论》、《以人民生活的自立实现国家的自主》、《爱国论》等。这些文章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一代，对促使人们探求新的学问起了很大作用。

他们认为，即使国家灭亡，而本民族的历史不毁，则民族还未尽亡而大有希望。因此，朴殷植、申采浩、张志渊、玄采和其他人，致力于研究朝鲜历史和外国历史，特别注重研究朝鲜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外国独立史及亡国史，从中发现爱国教育的素材。他们不仅研究古代人物，即便近代人物也列入研究对象。他们写了很多传记，如乙支文德、姜甘赞、李舜臣，如当代的崔益铉、李儁、安重根等，有长篇，也有短篇。他们撰写过去英雄传记的目的在于呼唤当代英雄的出现。申采浩恳切希望无形的乙支文德弥漫于全国，第二个李舜臣下凡于二十世纪的太平洋上。他们还撰写或译述外国的革命史、独立史、建国史、亡国史之类的

史书，以供借鉴，避免覆辙，争得独立。这些书都是朝汉本，汉文词汇很多，汉文水平差的难以理解，影响“下等社会”的启蒙活动。于是，启蒙活动家们把《乙支文德传》、《李舜臣传》、《越南亡国史》等书译成朝文出版了。

国文运动是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方面。朝鲜文字问世以来，一直受到歧视，被称为谚文。只是由于启蒙活动家的倡导，它才得到应有的重视，占有国文的地位。国文运动的先驱者周时经，把国文运动同恢复国权运动联系起来。他大声疾呼：“要保卫自己国家，兴旺自己国家，途径在于奖励国性；奖励国性的重要途径在于崇用自己国家的语文”。^①在语文工作者的推动下国文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07年成立“国文研究所”，隶属于学部。周时经、池锡永等人在研究所任职，研究朝文的整理和演变、现在的通用和将来的发展等问题。

由于语言工作者的努力，朝语专著问世。1897年，李风云出版《国文整理》一书。尽管它有不足点，但这是近代朝语研究的头一个成果。之后，《大韩文典》、《初等国语语典》、《国语文典音学》、《国语文法》等书，先后问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朝鲜语研究的成果奠定了近代朝鲜语语音学的基础，对朝鲜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文学也得到发展。小说是感人极深。因此受到启蒙活动家的格外重视。他们直接译述了各种《政治小说》。还有不少作家创作了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小说，当时叫作新小说。新小说也是启蒙群众教育的阵地。新小说以现实生活的各种侧面为题，宣传“内修外学”、“独立自主”、“拥护民权”、“文明开化”等近代开化思想。

^① 《周时经遗稿集》第16页。

此外，爱国知识分子还撰述了各种科技书籍和通俗读物。

《大韩每日申报》(简称《申报》)、《皇城新闻》是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有力喉舌。不少文化界巨匠直接任职于这几家报馆，把报纸办成开发民智的启蒙报纸，开导和灌输爱国思想的宣传报纸，而尽了自己的心血。几家报纸中，《申报》颇有光彩。《申报》的所有权，属于英国记者裴说，日本不便无理干涉。梁起铎、朴殷植、申采浩等人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标榜“正论直笔”，正面批判了日本的侵略政策，揭露了一批卖国小丑们的丑恶面目，歌颂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极为恼火，一方面加强镇压措施，另一方面指示日本人创刊《大韩日报》、《大同日报》等朝文报纸，扶持朝鲜卖国团体一进会的《国民报》，企图扼杀爱国报纸的政治影响。日本侵略者的御用报纸，按照主子的授意，疯狂地向爱国报纸挑衅，无耻毁谤，说什么“真排日者”，“眩乱国民精神”等等。《申报》不畏强暴，逆风迎战，挥笔诛讨“魔报”和“附日报”。《申报》锋芒特指向《大韩日报》和《国民报》。申采浩在《国民、大韩两魔头上各一棒》一文中，尖锐地揭露了两报的奇谈怪论，揭穿它的卖国实质。他还写了《日本三大忠奴》、《与友人绝交书》、《学生界的特色》、《仇视爱国二字的教育家》、《灭亡国家的学部》等许多文章，发表于该报，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挑战。

总之，文化启蒙运动包含如下三项内容。

第一，它广泛地传授了新知识。启蒙活动家们关心的知识领域，犹如百科全书那样广泛。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这些新知识，宣传学习的必要性，并要求认真学习。他们说，每个人要按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学几门课程。有的讲家庭学、国家学、兵学是“通共之学”。这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提出来的。

第二，大力宣传反对侵略、热爱国家和恢复国权的思想。在

他们看来，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建立学校，出版新书，归根结底是为了激发爱国主义思想和夺回国权，他们大谈特谈焕发新思想和新知识，刷新政治，更新事业，发展教育和产业等问题都是为了恢复独立。“祖国”、“爱国”、“民族”、“同胞”、“独立”成了当时朝鲜人民最响亮的口号。

第三，他们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行，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批判朝鲜官吏只知“奴隶其人民，牛马其人民”，“以贵压贱，以强凌弱”。他们把恢复国权同平等自由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要恢复国权须国民团结一致，没有各阶层群众的平等和自由，就读不上什么团结。因此，他们热情歌颂自由：“自由乃天赋之官职，人生之粮食。有自由之国则国活，失自由之民则民亡。故文明国民以血争自由，以泪争自由。神圣哉自由！英勇哉自由”。^①

上述三方面，说明文化启蒙运动反映朝鲜社会近代发展的要求，封建文化日益衰退，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正在兴起。

第五节 日本吞并朝鲜

乙巳保护条约签订后，实际上日本把朝鲜看成自己的殖民地，只因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才在“保护”的幌子下留“独立”国家的空壳。1909年后，义兵斗争大为削弱。日本加快了吞并朝鲜的最后步骤。是年4月，日本政府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完全占领朝鲜的计划。7月，日本内阁通过《对韩政策规定事宜》，决定“断行朝鲜合并”，“以便名符其实地把半岛置于吾人（日本）的统治之下”。他们说这是日本的百年大计。

^① 《大韩协会月报》：1909年第2号第3页。

在此严重时刻，朝鲜青年纷纷起来暗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1909年10月，朝鲜爱国青年安重根在哈尔滨击毙侵略朝鲜的主凶伊藤博文。日本利用这次事件进一步掀起排外浪潮。朝鲜的亲日走狗们获悉日本政府合并政策的内幕后，争先恐后地演出卖国求荣的丑剧。卖国团体一进会的副会长以参加伊藤葬礼仪式为由亲赴日本，伙同宋秉俊准备演出韩日合并之丑剧。1909年12月，一进会炮制合并宣言书，发给朝鲜政府各部、十三道、各郡以及各学校。又向朝鲜政府和统监府提出合并请愿书，无耻地说什么，为了尊重皇室和人民的福利，要实现法律上的政治合并。可见，这些卖国求荣的小丑是朝鲜历史上遗臭万年的卖国罪人。

1910年7月，就任的统监寺内，执行了杀气腾腾的宪兵警察制度，把朝鲜全境置于武断统治之下，残酷镇压反日斗争，强行解散爱国启蒙团体，禁止各种刊物的出版，凡带有反抗精神的书籍一律取缔。十四种报刊和三十余种书籍被封被毁，许多学校被关闭，幸存者遭受严密监视。教师的言论和学生的行动都受到密探的监视，从此“韩人遂堕于黑闇地狱”之中。

寺内在周密准备之后，同李完用编造合并计划，于1910年8月22日召开御前会议，签订了《韩日合并条约》，28日正式公布。条约规定：将朝鲜的全部统治永久地让给日本，日本对朝鲜王室的尊称、威严和名誉给予尊重。就这样用条文把日本吞并朝鲜固定下来了。从此，独立的朝鲜彻底变成了日本垄断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学者们极力歌颂合并，甚至“欢喜如狂”。“卖国立功”的民族败类，得到“荣爵和恩赐金”。而朝鲜人民的政治权利则完全被剥夺，在日本殖民者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第十六章 日本殖民统治初期的宪警 武断统治和“三·一” 人民起义

第一节 日本殖民统治初期的宪警武断统治

一、宪警武断统治和愚民政策

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把统监府改为总督府，加强宪兵警察制度。总督由陆海军现役大将充任，直接隶属天皇，统辖驻朝陆海军，总揽朝鲜行政、司法、立法一切大权。总督实际上是“专制暴虐之君主”。总督府是统治朝鲜的殖民机构，它设置各部把持朝鲜的各部门。

日本帝国主义独霸朝鲜政权，从不与任何阶级分掌。自总督府官员至地方官吏，几乎都由日本人担任。日本为了装璜朝鲜人也参与政治的假象，设立中枢院，网罗了亲日派，但议长还要由总督府政务总监来担任，李完用担任了付议长。看来，日本对其忠实走狗也是不放心的。中枢院只是总督的咨询机关，而且是无咨可询的虚设机构。从成立以来到“三一”运动，未开过一次会。

总督寺内露骨地叫嚷说：朝鲜人要么服从日本的法律，要么就掉脑袋。这就是日本对朝鲜的施政方针。日本把宪兵和警察合为一体，日本驻朝宪兵司令兼任总督府警务总监，各道宪兵队长兼任警务部长。宪兵承担军事警察任务，又承担“维持治安”的民事警察任务，保留军籍，充任警察。

日本极力扩大警察机构。总督府成立后，宪兵警察机关达一千六百二十四个，宪兵和警察有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八人。1918年，宪兵警察机关增加到一千八百二十五个，每府和郡平均八点七个。日本“在乡军人会”“日本居留民团”“消防队”充当宪兵警察的别动队，甚至教员也佩剑上课。日本的两个师分驻于龙山、罗南、平壤、威兴、会宁、大邱、大田和马山等地，海军常驻扎在镇海湾和永兴湾。日本炮制“朝鲜监狱令”，扩建汉城西大门监狱，全国建立了二十四所监狱。根据“裁判所法”，设立高等裁判所、复审裁判所和地方裁判所。

总督府于1910年12月，制定“犯罪即决令”。规定警察署长或宪兵分遣队长在自己管区内有权处分拘留、笞刑，百元以下罚款和三个月以内的服刑而不经任何手续。1912年3月，又规定“警察法令”，扩大宪兵警察的即决权。只要看一下它的几条内容，就可以知道残暴到何等程度。其惩罚对象是：无一定住所及职业而到处徘徊的人；“无故强请面会”，“有强谈威胁行为者”，“强请加入团体者”；“集会多众”，“请愿官署又擅行陈请者”；“作不稳之演说，写不稳之文章、图画、诗歌、朗读又放吟者”，等等。诸如此类的规定，共有八十七条。

日本又巧立名目，以所谓“扰乱治安”、“破坏安宁秩序”、“暴行”等，把无辜的朝鲜人民逮捕入狱。据日方的统计，逮捕案逐年增加，1912年为五万二千余件，1918年为十四万二千余件。日本帝国主义把自己管区处刑的多寡作为一个警察“勤务成果”的一个标志。1911年至1918年即决件数从一万二千零九十九件猛增到七万一千二百七十九件，受刑人数二万一千三百八十八人增加到九万四千六百四十人。整个朝鲜变成日本陆军部直辖的一个大牢房。有些外国旅行者说，“连修造监狱都来不及了”，朝鲜人甚至“伸手抬足都使不得”。日本扬言：毒辣的拷问，是

得知秘密的钥匙。

日本沿袭中世纪的刑法，制定“笞刑令”。1918年，笞刑执行人员为七千八百九十一人。日本为掩盖自己的野蛮罪行，制定“防止笞刑中出现弊病的措施”，恬不知耻地说，虽然继续实行笞刑，但行刑方法得到了改善，施以更大的博爱，在可能范围内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纯属欺人之谈，实际上受过笞刑的人，多数死亡或致残。

朝鲜人民根本谈不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信仰的自由。1910年8月25日，“韩日合并条约”签字的第三天，日方便下令解散一切团体。大韩协会、西北学会等团体一律被勒令解散，就连亲日团体一进会也不得幸免。日本严禁一切带有政治性的集会，甚至宗教集会或学校运动会也必须事前得到警察署的许可。

朝鲜人民被剥夺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日本宣称日语是国语，宣布日语为官厅、裁判所和学校的官用语。他们把学校看成普及日语的据点。加强日语教学，各地建立日语讲习所，普及日语。甚至警察和宪兵都承担普及日语的任务。他们说，非常时期，就得如此。可见，日语的普及是在屠刀下的强行普及。

日本殖民当局非常讨厌朝鲜人民爱好学问，认为这是招致祸害的一个因素。他们把有学问、无地位的很多人材看成“不平之徒”，严格监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严加控制，1910年8月总督府发表“朝鲜教育令”。该令规定，教育是以“培养忠诚善良的国民”，“养成国民的性格”，普及日语为目的。“善良国民”、“国民的性格”，其实不过是懂得一点日语的百依百顺的殖民奴隶的代名词罢了。

日本为了扼杀朝鲜民族教育，于1911年10月，制定“私立学校规则”，1915年，加以修订。规则规定：私立学校必须得到

总督的许可；必须采用总督府编写的或由它审定的教科书；日语熟练的并由总督府指定学校毕业的学生方能任教，这无非是镇压私立学校的一根棍子。日本当局以不成其“理由”的各种“借口”关闭了学校，有反日情绪的教员赶出了校门。1910年“合并”当时，全国私立学校有二千一百所，1919年6月被削减到七百六十所。

日本对书堂也不放过。书堂是封建教育机构。“合并”初期，日本只注意私立学校，尚未注意到书堂。不少爱国知识分子利用书堂这一阵地进行反日教育。日本当局逐渐觉察到这一点。于是，在1918年2月，制定“书堂规则”，实行申请制度，授权普通学校日人校长指导书堂。他们以不符合规则为由关闭了大量书堂。

日本还破坏和掠夺了朝鲜的历史文物。这是扼杀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则动员御用学者编写《朝鲜半岛史》，炮制“日朝同祖论”，企图用来抹杀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为同化政策作理论根据。

日本奖励佛教、基督教，在各地建立“神社”，要求崇拜天皇，强行群众参拜。

综上所述，日本一方面以武力镇压反日斗争，另一方面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削弱朝鲜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日本殖民经济体制的建立

日本对朝鲜在政治上建立军事独裁体系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强行建立殖民经济体系以便掌握朝鲜的主要经济命脉，使朝鲜彻底沦为殖民地。日本要建立的殖民经济体系，从实质上讲，就是经济掠夺体系。

日本首先执行了掠夺土地和巩固封建剥削的政策。1910年3

月，日本指使李完用制定“临时土地调查局官制”，以日本人为头头，组成调查局，开始进行土地测量。日本为了加快土地掠夺的步伐，8月23日公布了“土地调查法”，1912年8月，公布了“土地调查令”和“施行规则”。“土地调查令”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土地调查的目的在于合理负担地税，明确土地面积，保护所有权，简便买卖转让手续，便于土地改良、自由利用，发展生产。其实不然。土地调查的真正目的，是掠夺土地，保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促进土地的商品化，从而为掠夺土地大开方便之门，增加地税来源。

在历经八年多的土地调查过程中，日本以国有土地为名，直接掌握了全部驿田、官田、未垦地。有些祖祖辈辈直接向国家缴税的农民土地，也被划成国有地或地主所有地。

土地调查的结果，总督府和以东洋拓殖会社为首的殖民土地公司以及日人地主成为最大的地主。在1910年以后的七八年间，东洋拓殖会社的土地面积从一万一千町步剧增到七万七千町步。日人地主的土地从八万七千町步剧增到二十万町步。1921年，一百五十町步以上的朝鲜人地主有一百六十名，而日人大地主则为二百二十七名。

日本又掠夺了山林。1908年，日本指使朝鲜政府发布“山林法”，1911年改为“山林令”，1918年又颁布“林地调查令”。他们采取用在土地调查时所采取的手法，将公有林化为国有林。一千六百万町步林地中的一千三百万町步划归国有，民有林仅剩三百万町步，其中的很大部分又归日人所有。

日本为了压制朝鲜民族资本的发展，于1912年发布“公司令”，规定公司的成立必须得到总督的许可，公司如果违背公司令或公司令有关的命令，违反公共秩序和顺良风俗，总督有权停止营业、禁止和封闭支店，解散公司。公司令的目的十分清楚，

旨在限制朝人企业的资本，即使已经开办的，也要勒令封闭和解散。朴殷植说，公司令是“抑压韩人之企业”的手段，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1911年～1917年间，朝鲜人公司资本仅三百一十万元，而日人公司资本则多达三千二百九十万元，同期，朝鲜人公司资本在总公司资本中所居比重从百分之十七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十二点三。

1913年，朝鲜共有五百三十二家工厂。其中，日人工厂为三百八十五家，朝鲜人工厂仅有一百三十九家。比例是，前者占百分之七十二点二，后者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一。使用动力的工厂比例是，前者为百分之八十一·一，后者为百分之一十六·五；资本的比例是，前者百分之八十九·四，后者百分之五·八。可见，朝鲜人开办的多半是规模小，技术差，资本小的工厂。朝鲜资本家的工厂，除几家工厂外，大部分是棉花、碾米、制粉、酿酒等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工厂。

总督府于1915年公布“矿业令”，实行许可制度，优先权归于日人申请者。1915～1919年的许可数是，日本人自二百五增加到三百二十八，朝鲜人自一百五十七减少到一百三十四。随着日本重工业的发展，矿石的需要也相应地增加。日本三井、三菱、久原矿业公司等垄断资本积极渗入朝鲜，开掘矿山，建立冶炼厂和钢铁厂。1915年10月，久原矿业公司在南浦建立了冶炼厂，1918年5月，三菱钢铁公司建立了兼二浦（现松林）钢铁厂。日本由于制定了“矿业令”，垄断了朝鲜的矿业。掠夺更多的矿产。“矿业令”公布前，日本从朝鲜掠夺的地下资源总额为一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七元，到1916年总额增加了二倍多。

日本对铁路、公路、港湾、邮政等部门也进行了整顿和扩充。这是建立殖民地产业体系的基础，是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

动脉，对侵略中国具有战略意义。

1910年以后，平壤煤矿线、平南线、湖南线和平原线相继通车。1919年，铁路总长达二千一百七十七公里。1911年鸭绿江铁桥竣工。日本早就把铁路看成“受益的企业”。1910年，日本在铁路部门获取了三十三万八千三百八十元的盈利。此后，盈利逐年增加。1916年猛增到三百六十三万六千元。

日本继续扩充航线，整顿海运公司，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又极力追求军事目的。日本当局扬言、一旦有事，就可下令征用或收买船只，以便输送军队和武器。

1911年，日本把以前的韩国银行改为朝鲜银行，作为殖民地的中央银行，隶属于日本政府。此外，还建立了朝鲜殖产银行，扩大了一般的商业银行。1914年，制定“地方金融组合令”建立金融组合，名曰提供经济上所需资本，实则对中小农民施放高利贷。于是，殖民地的体贴币金融体系建立起来了。

日本的经济政策，使殖民贸易前提成熟。十年间（1910～1919），对外贸易额增加八倍，1916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达百分之六十乃至七十。

粮食、原料、原料制品是朝鲜的主要出口品。1912年，粮食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点九，1919年则为五十九点四。其中对日出口从百分之四十四点九增长到百分之五十七点七。朝鲜进口的物品则是完成品、纺织品及其他轻工业品。由于日本的掠夺性贸易，民族工业面临着销路难和原材料难的困境，加速了它的破产。

三、朝鲜人民的生活处境

随着殖民地工业的发展，朝鲜工人阶级队伍逐渐增大。1911年，朝鲜的工厂工人为一万二千一百多人；1919年增加到四万

一千八百多人。加上矿山、铁路、海运、土木和建筑部门工人，共达十四万人。

朝鲜工人在毫无劳动保健的情况下，每天要作十二小时以上的重活，得不到适当的休息时间。与此相反，工资则极其低下。在一般情况下，朝鲜工人的工资比同工种日本工人的工资低一半或三分之二。冶炼、铁路及其他工厂的工资比其他工厂相对的高一些，但碾米、棉花加工、制材等部门的工资则很低。

朝鲜工人的名义工资本来就很低，而实际上工资又不断下降。1910~1919年，物价指数不断上升，幅度很大。名义工资的指数虽有时增加，但幅度甚微，1916年和1917年还都下降了。因此，实际工资指数大幅度下降。1917年比1910年降百分之四十九点一，1918年则降了百分之五十。

朝鲜女工工资是同工种男工工资的一半。少年工的工资是成年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

朝鲜的多数农民日益丧失土地，从而促进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其基本趋势是自耕农、自耕兼佃农逐渐减少，佃农则急剧增加。除自耕农中极少数上升为地主外，百分之九十几的农家程度不同地变穷，一部分由于丧失土地而流入城市寻找工作，破产农民年年增加。因此，农村中出现“土地奇缺”的现象。许多农民一面佃种小块土地，一面出卖劳动力。1912年，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为三十四万，1917年增加到四十五万。

农民要缴高额的佃租，不管是定租还是执租或打租，地主都要夺取收获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此外，还要收斗税、场地税等。名目繁多的国税和地方税，日夜折磨着广大农民。1914~1917年，因欠地税和地方税而被查封的农家达三万六千户。再加上歉收和债务，使许多农民破产。

朝鲜青少年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1910年，适令儿童入学

率仅有百分之三点九。这些少年即便上了学，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也非常差。因交不出入学费、学费、后援会费、捐款，不少学生被迫退学。1912年入学的朝鲜学生中毕业的占百分之四十，1916年入学生中，能够坚持到毕业的仅占百分之二十六。

很多朝鲜知识份子找不到工作。有的侥幸能当上公司或金融组合的一般职员，或者任教，但他们工资很低，稍不顺从，便被赶出。

1910年以后，日本商品遍布朝鲜各地，朝鲜商人丧失销路，只好倒闭。由于过重的税款和其它掠夺，手工业者和小市民日益破产。民族资产阶级也难以幸免。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孕育着极大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

第二节 日本殖民统治初期的反日斗争

一、反日武装斗争

朝鲜被吞并后，反日义兵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部分地区坚持小规模斗争。

金相泰、郑景泰率领的义兵以小白山地区为中心在醴泉、永春、奉化等地区开展活动。李镇龙、金贞焕、韩贞满等人的部队在黄海道谷山、遂安，平安南道成川、阳德，江原道伊川和安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自1910年8~11月，义兵至少同日本军警战斗了七次。

日本军队自1910年11月下旬至1911年3月中旬，历时四个月，动员七个步兵连、若干骑兵和工兵，对开城南川店以西的瑞兴、载宁、海州、延安、白川的多角形地区进行包围搜查。义

兵占据载宁长寿山的有利地形，严阵以待。义兵给爬上来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尔后，勇敢机智地突围，转移。

日本自1911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又策划了大规模的围剿。由一个旅级少将直接指挥。动员了有十六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和八十多人的宪兵警察的兵力。他们把兴水院、栗里、大永口、谷山、市边里、金川和新幕划为东区，开城、金川、风山、新幕、载宁、信中川和苔滩划为西区，进行逐地包围搜查，“每一至三日突进一次，逐渐将搜索网压缩到内线”，“对主要地区多次反复搜索，夜以继日，严格警戒”^①，但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说：黄海道地区的儒生仍有“执迷不悟之徒”，具有排日思想，对义兵暗中保护；一般老百姓决不将义兵所在地报告给日军。可见，义兵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能够挫败日军的反复围剿，“隐现出没”，“极为巧妙”，使日军的搜索毫不见效。

蔡应彦部队于1911年初出击安边，袭击了驻扎在释王寺的日军守备队。1914年3月金贞满部队在长寿山与日军交战，杀伤不少日军，冲出包围，转移到瑞兴地区。

1910年以后，朝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认识到义兵斗争或启蒙运动不能取得民族独立，便开始组织了独立军。在朝鲜国内，日本的军事力量过大，无法开展独立军运动。于是，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地区便成为独立军的活动舞台。就独立军运动的领导人来讲，一是从事义兵斗争的领导人，二是曾从事文化启蒙运动的活动家，尤其是新民会系统的爱国知识分子较多。独立军也是一种武装队伍，但比义兵更明确地提出夺回国权的口号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他们提出，为了有准备，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军事行动，独立军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军事干部，提高民族意识。

①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上编，第42页。

新民会的部分成员在柳河组织了“耕学社”，开垦荒地，筹措独立军的运动资金。另一方面，创办新兴讲习所，招募青年进行军事教育和民族主义教育。新兴讲习所搬到通化县哈尼河，于1919年改为新兴武官学校。义兵将领洪范图组织了捕兽团，徐一组织了重光团，在自己的活动地区内修建兵营，招募爱国青年，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

独立军运动对朝鲜的反日独立运动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它比较分散，各立山头，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未能冲出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小圈子。

二、反日政治斗争

文化启蒙运动系统的知识分子和义兵运动系统的爱国人士，组织了秘密的政治团体，开展夺回国权的斗争。

林炳赞于1912年10月建立独立义军府。爱国儒生、从前的官吏、从前的义兵将领和他们的亲属。参加了该组织。它把夺回国权、处决倭夷及其走狗，作为主要斗争任务。独立义军府没有重视广大的基本群众，因而未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1913年8月，林炳赞等主要成员被捕，组织也随之解散。

1914年以来，一些进步人士筹备了国民会。在张仁焕、裴敏洙、金亨稷等人的倡导下，1917年3月成立了国民会。国民会的斗争目的是争取朝鲜的独立和自由。

1912年，由申采浩、李东辉、李甲等人倡导，于海参崴成立了光复会。光复会在布告中阐明了创立目的：“复我祖国，斥我世仇，救我同胞，是我民族之天职，吾人之义务。此即本会不顾成败和利创，冒死创立的目的所在”。^① 光复会号召各阶层人

^① 姜德相：《现代史资料》25，第34页。

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力量，开展有助于夺回国权的斗争。

初期，光复会曾在中国东北和海参崴建立武官学校和其他学校，对青年进行反日爱国思想教育，培养军事人材。后期，组织扩大到国内三南地区。据日本官方透露，1917年光复会会员有二万余人。光复会的活动大长了人民群众反日斗争的志气。

三、爱国文化运动

1910年以后的文化运动，主要是教育运动。教育运动有三种形式，即书堂教育、学校教育和各种夜校教育。

书堂原是一种旧的教育形式。日本当局认为它“实效甚小”。合并以后，书堂迅速增加。当然，这不是封建旧制的恢复，是对日本镇压私立学校的一种反抗。朝鲜人民鉴于私立学校遭受镇压的现实，便认为“建立汉文书堂胜于建立学校”。现在的书堂不同于过去的书堂，招牌未改，而内容却全变了。不少书堂同学校一样，分学年、学期和班级，不仅传授汉文还传授朝鲜历史、地理、朝鲜语文、数学和理科等。爱国知识分子到处建立书堂，把它作为宣传爱国思想的阵地。

私立学校有两种。一是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学校，约占整个私立学校的三分之二，目的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一种是宗教人士建立的学校，不少这类学校由于教员的努力变成了爱国的民族教育机关，平壤的神学校和崇实学校就是突出的例证。朝鲜总督府警务总监对此非常关注。他说崇实学校站在反日学校的前头，竟变成反日人士的“避风港”。

不少学校以普及爱国歌曲的形式进行教育。1914年，汉城韩英书院的教员搜集各地流传的歌曲，编成一、二册，秘密印刷发行。编者在说明出版歌曲集的目的时讲，“国家的兴亡盛衰基

于国民精神，而振作国民精神则以普及歌曲为首位。”^①“英雄的模范”、“善竹桥”、“欧洲战乱”等歌曲，富有“振作国民精神”的内容。“英雄的模范”热情歌颂了李舜臣、郭在祐、崔益铉、安重根等人的英雄气概。

不少学校的教员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时常教唱爱国歌曲。咸镜北道钟城郡朱乙面私立温泉学校教员，教学生唱“思念祖国歌”和“安重根歌”。咸镜南道永川郡洪仁面私立文明学校教员，在每周六教唱歌曲，并编辑歌曲集。他们把流传的十六首歌编进歌曲集中，其中“独立军歌”的最后一段是：“独立军的凯歌和万岁声震撼大地”。

爱国教员通过教授朝鲜历史、地理和朝鲜语文等课程，进行反日爱国教育。他们把日本吞并以前被禁止的《初等本国史略》、《初等本国地理》等书当做课本在课堂讲授。

这些爱国反日活动使学生深受教育。1918年2月18日崇实学校三、四年级的作文课颇有针对性，题目是“半岛与我们的关系”。一名学生写道：“半岛三千里江山是我们的身躯，是我们的家”，“我们所爱的半岛为何陷入此种遭遇？现在是该觉醒的时候了，明亮的太阳升起在天空了”。^②该学生最后写道：应“高举独立旗，夺回国权”。

定州五山学校、安州安兴学校、平壤大同学校等不少学校和书堂，每年召开运动会，不仅学生参加，众多家长和群众也参加，进行了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

^① 姜德相：《现代史资料》25，第10页。

^② 姜德相：《现代史资料》25，第39页。

四、工人农民的斗争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是朝鲜工人阶级正在形成的时期，当时既没有革命政党，也没有统一的阶级组织。尽管如此，朝鲜工人由自己的困苦处境，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工人的罢工日益频繁。1915年后罢工比往年更为频繁，1918年以后急剧增加。据统计，1915年为九起，1916年和1917年各八起，1918年为五十起，1919年则为八十四起。在日本的武断统治下，罢工被定为刑事犯罪。尽管如此，罢工斗争此起彼伏，表明工人阶级的斗争正在显著发展。

工人的斗争基本上是经済斗争。在1912年至1918年间的一百七十次罢工中，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占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工人的斗争是很坚决的，许多罢工迫使资本家接受工人的要求。据统计，一百七十次罢工中取得成功的有五十次，占百分之三十，取得部分成功的有五十七次，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五，二者共为一百零七次，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五。罢工的胜利来之不易，表现了罢工工人的顽强性和一致性。

这一时期，工人或知识分子组织了工人团体。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有二十一个。工人组织的发展情况与罢工的发展情况似乎是相应的。1910年至1914年期间工人组织有五个。1915年至1919年十六个。会员一百名以上者八个。

工人阶级的组织都带有和亲会和或共济会的性质。它对加强工人之间的团结和联系，对启蒙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农民来说，土地和山林是基本生活资料。剥夺了土地和山林，就意味着剥夺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由于实行山地调查而丧失土地的农民，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斗争，先后发生了三万二千

九百三十九起土地纠纷事件和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五起山林纠纷事件。

农民为了抵制土地调查和山林调查，在各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拔掉界标，烧毁土地测量文件和山林调查器材，袭击测量人员的宿舍和守卫的警察，甚至痛打或处死他们。农民的积极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极大不安，迫使调查人员拒绝外勤，调查效率减低，工作遇到极大阻力。

总之，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朝鲜各阶层群众用各种不同形式进行了反对殖民地统治，反对经济掠夺，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它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斗争。

第三节 “三·一”人民起义

一、“三·一”人民起义的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的十年宪警武断统治，酿成了朝鲜人民的“三·一”起义。1910年后，朝鲜人民夺回国权的斗争连续不断。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斗争。朴殷植在《改造世界之新文化促我独立运动》一文中写道：“于是，俄国革党，首举红旗，推翻专制，宣布广义许各族以自由自治，向之极端侵略主义者一变而为极端共和。此改造世界之最先动机也。”德国“社会党起而逐帝，改建共和，主张和平，而奥人亦随之。向之鹰扬四海者忽焉蛾伏，而标榜正义人道者方鸣得胜，此改造世界之曙光

也。”^①

青年学生是有觉悟的阶层。他们在“改造世界之曙光”的激励下，又通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面教育，开始重新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认识到“春雷一震，龙蛇起陆，吾亦可以活跃猛进”。

1918年底，学生利用送旧迎新之机，集聚于教堂或荒山，讨论恢复国权运动。1919年，学生运动更加发展。汉城各专科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互相联系，志向联合行动。1919年1月6日，专科学校学生代表集聚于大观园，吸收社会人士，交换意见。高宗死去的第三天，即1月25日，又集合于大观园。于是，学生运动活跃起来。汉城的一名日本教师透露说，学生的学习态度很不稳定，处于随时都能应声附和，异常兴奋的状态之下。

留日学生运动也开展起来。1918年12月28日，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演讲会。会上有人提出自治论。与会的五百多人尖锐驳斥。次日，留学生继续开会。日警冲进会议厅，辱骂学生，逮捕十二人，会议竟被冲散。留学生派代表回汉城，与国内学生代表取得联系。

1919年2月8日，留日学生召开学生大会，连续开了三天，以朝鲜青年党的名义发表宣言书和决议文，宣布朝鲜独立。宣言书理直气壮地说，“朝鲜当为吾族之朝鲜”。决议文表明他们为独立誓死而战的决心。决议指出：若日本不承认朝鲜的独立，“吾族惟有对日永远血战，因此而有惨祸之发生，吾族亦不负其责。”^② 会开完后，留学生代表返回国内，与国内学生代表接触。汉城的学生代表于2月10日确定了运动的步骤，并决定起草独立宣言书。

^① 《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下编，第5、13页。

^② 《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下编，第5、13页。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孙秉熙、权东镇、吴世昌、崔麟等人得知学生的动向，认为“学生乱搞运动不会成功”。他们在1月20日左右，讨论了此事。孙秉熙说：“学生少年即使搞运动也事必不成，反而只能扰乱社会安宁。现在若有出众的同志，我们正式向政府提出意见书为好。”^①不难看出，孙秉熙把学生运动看成一桩胡闹，鄙视他们，责备他们，企图把青年学生的运动压下去，取“出众的同志”而代之。他所言的“出众的同志”就是前朝鲜政府的高官。为此，孙派人劝诱旧大臣金允植、尹用求、韩圭高、朴泳孝等人。甚至他亲自出马走访头号卖国贼李完用和宋秉峻。他们的交涉却遭到拒绝。李完用直言不讳地说如果独立实现了，我的脑袋就没了。即使如此，我不反对独立。这难道不是对孙秉熙的讽刺吗！

孙秉熙等一帮人感觉到单靠天主教人士搞独立运动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获悉耶苏教派的动向后，就倾向于两派联合而搞。

学生们认为对孙秉熙等人的运动不能置之不理。学生代表在2月20日的会议上决定给予协助，但弄不清他们所进行的独立运动的归宿，因而决定，在同他们一起从事活动之后，于3月5日再另组织活动。他们又决定，孙秉熙等人既然在写《独立宣言书》，学生就不再另写《独立宣言书》。

汉城学生按照原定计划，于3月1日下午二时在塔洞公园举行集会。学生和市民齐集在塔洞公园。二时三十分，学生代表高声宣读了《独立宣言书》。顿时万岁声回响全市。集会群众振臂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和日本军队滚出去！”“成立朝鲜独立政府！”“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自由平等万岁！”等口号。集会群众惊涛骇浪般地涌向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① 李炳宪：《三一运动秘史》，第71页。

“三·一”人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示威群众分成三队，一队走向外国领事馆驻地，一队走向德寿宫，另一队走向日军司令部。《独立新闻》、《觉醒号回报》、《雷民报》等新闻，《警告二千万同胞》、《同胞们团结起来》等传单满天飞舞。示威群众冲破日本军警的阻挠，滚滚向前。由几十万人组成的队伍，淹没了整个汉城。市内交通断绝，统治秩序陷入瘫痪状态。所谓“朝鲜民族代表们”怕集会将发展成群众性的“骚乱”，不敢与群众一起行动，悄悄地集结于泰华馆。学生对此极为气愤。学生代表赶到泰和馆责备他们自食其言的行为。他们不接受学生的要求，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和你们不能共事”。一语道破所谓“民族代表”的真面目。

3月1日12时的时钟一响，平壤市民涌到崇德学校操场，下午一点，庄严宣布朝鲜独立。数以千计的群众以学生为前导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群众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等口号。游行队伍唱起了“独立运动歌”。示威群众到南门分三路前进。一队向警察所前进；一队经平安南道道厅和裁判所前，走向平壤站；另一队围绕着平壤监狱，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爱国者。日宪警全员出动肆意逮捕示威群众，还指使消防队用水龙驱散示威队伍。当晚，倭兵把守要道，消防队手持铁钩乱刺民众。学生们全然不顾，集会于西门外，以乐队为前导，游行示威。高呼万岁，另一队学生在南门外响应。

3月1日，除汉城和平壤外，南浦、安州、宣川、义州、元山、松禾等地，都爆发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独立示威的巨浪很快扩大到各地。初期，示威游行主要发生于西北地区。3月1日至5日，在二十八个府郡都举行了示威游行，其中平安南道十一处，平安北道五处、黄海道五处、京畿道三处。

汉城的学生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了第二次示威运动。3月5日

上午8点群众从四方涌进会场。据载，向南大门前纷至沓来的群众足有几万。可见，汉城众多的群众参加了学生的运动。示威运动一开始群众高呼独立万岁，乘风破浪，走向街头。学生代表康基德和金元壁乘着人力车，高举大书独立万岁的大旗指挥了游行队伍。不少学生向周围群众发表演说，宣传独立思想。青年学生在斗争中发挥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女学生右手执国旗，高呼万岁，倭以剑砍，右手堕地，女学生例以左手举旗高呼万岁，倭兵复砍之，犹连呼不已”。

平壤学生于3月1日举行示威游行后，乘火车前往汉城参加了汉城学生3月5日的示威运动。据载，“来京的平壤学生指责汉城学生的行动太迟缓，并且说从各道组织决死队鞭策汉城学生，大大地推动运动以达到最初提出的目的”。^①

学生在示威中散发了不少红布片，有的学生持之挥舞，有的学生作为袖章带上。日本殖民当局极为重视红布，把它作为3·1运动的物证之一，在审问三十三人时提过这个问题。

三月中旬以后，运动扩展到中部和南部地区，由城市扩展到农村，由铁路沿线扩展到偏僻山区。自3月1日至5月31日，二百零三个府、郡爆发了一千四百九十一起示威游行，参加的群众达二百万以上。斗争到4月中旬达到高潮。

“三·一”起义始于群众的和平示威，面对日本的血腥镇压，发展成为暴力斗争。3月1日至3月15日，南浦、祥原、安州、成川、阳德、江西、宁远、铁山、肃川、孟山、端川、明川、吉州、定坪、开城、遂安等地群众，以斧头、棍棒、刀剑、石头为武器，袭击了警察所。开城、遂安、成川等地群众，先后三次奋起斗争。江西郡砂川群众袭击警察所，消灭了四个日本警察。据

^① 《现代史资料》25，第291页。

日军当局的密电，警察受群众的袭击，“抵抗到用尽子弹，终于全员被杀”。确实经过了一场战斗。3月中旬以后，中南部地区也相继发生暴动。暴力斗争到4月中旬达到高潮。

朝鲜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斗争。3月1日，汉城许多工人参加了示威游行。3月7日，汉城东亚卷烟厂五百多名工人和职员进行罢工、游行示威。总督府经营的印刷厂，二百多名工人停止夜班，冲出工厂，举行示威，高呼独立万岁。铁路工厂工人，电车售票员和司机也举行了罢工。9日和10日，汉城交通陷于瘫痪。平壤、兼二浦、忠清道槐山等地工人，也投入了斗争。

农民是“三·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主力军。朴殷植称其为农民独立团。“三·一”运动的持续不断和发展为暴力斗争，与广大农民的参加很有关系。

其他阶层也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开展了斗争。这场全国性的反日起义并不限于国内。

朝鲜3·1运动对中国人民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的报刊广泛报道了3·1运动的原因、过程及其结果。中国进步人士对日本在朝鲜的罪行极为愤慨，写道：“顾亡国惨状，已足令人瞻悸心惊。嗟彼三韩民族，如何堪此。”^① 3·1运动是日本的这种残酷压迫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进步人士热情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每周评论》述评3·1运动，写道：“生气和杀气的冲突，公理和强占的苦战”，“打三月一日起，有好几天，各地活动的情形，真是叫人家不能不佩服”。^② 陈独秀写道：“朝鲜的独立运动是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因此，我们对之赞美、兴奋、希望。

^① 《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九号，第70页。

^② 《每周评论》1919年3月23日。

他继续写道：“我们希望朝鲜人民的自由思想，从此继续发展。我们相信朝鲜民族独立自主的光荣，不久就可以发现”。^①

中国报纸以实事来尖锐地批判了日本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朝鲜人民的滔天罪行，日本当局对此恼火，反驳中国新闻的“夸大诬妄记事”，不知羞耻地说什么“绝无一人即死者，重伤而致死者仅有二人”。^②但日本当局驳不倒有理有据的报道，掩盖不住活生生的实事。

二、“三·一”人民起义的失败意义和教训

日本帝国主义为镇压反日人民起义，动员了朝鲜的所有宪警和军队，又调动了日本的部分军队和警察，在朝鲜各地进行血腥镇压。他们肆无忌惮地打死打伤群众，任意逮捕示威群众。日军在汉城、水原、定州、孟山、江西、大邱、密阳、陕川、南原、义州、江界、郭山、平壤等地犯下的罪行，真可谓惨绝人寰。

水原郡提岩里的屠杀事件，是具有代表性的。4月15日，日军窜到提岩里，不分男女老少，统统赶到教堂，全部予以枪杀。有位妇女把独生子推到窗外，想留下一条命，也被倭兵砍了头。日军仅在水原郡就屠杀了九百九十六人，打伤了八百八十九人，逮捕监禁了一千三百六十五人，烧毁了许多房屋。日本帝国主义仅在3月1日至5月31日三个月间，几乎不间断地“枪刺剑击，若刈草菅”，死者达三千七百五十多人，受重伤不久后死去者达四千六百多人，伤者达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一人，被捕入狱者达四万六千九百四十八人，被烧民房达七百一十五间，被烧的

^① 《每周评论》1919年3月23日。

^② 《现代史资料》26，第700页。

私立学校和教堂达四十九所。他们对被捕人员进行野蛮的拷打。据被捕受审的群众揭露，日本人在监狱的野蛮拷打方法有二十五种。

“三·一”运动由于日本的武装镇压，最终宣告失败。

此外，运动本身也存在一系列弱点。朝鲜工人阶级没有成长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没有登上政治舞台，对运动未能进行领导，使运动停留在无组织的自发状态。“三·一”运动除提出朝鲜独立口号外，并未提出土地问题等反映以农民为首的各阶层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革命纲领。运动的这些弱点是难以避免的，是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三·一”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三·一”起义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斗争意志。二百万各阶层人民群众，前赴后继，坚持了一个半月的激烈斗争，男女老少奋起参加。3月5日，有位八十岁的老翁参加了男女学生的游行队伍，高呼独立万岁，从大汉门一直走至钟路。安岳、慈城、博川等地还有八岁至下五岁以下儿童的单独游行队伍。表明独立是全体朝鲜人民的迫切愿望。数以万计的爱国人民为此而奋斗不已，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朝鲜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意志，是任何侵略者都无法阻挡的。

“三·一”起义给日本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朝鲜人民到处捣毁宪兵警察机关和面事务所。据日本发表的统计资料，一百六十余所日本殖民统治机关被破坏和烧毁，许多日本官吏被处决。日本统治者惊慌失措，终将宪警武断统治改为“文化政治”，妄图挽救殖民统治的危机。

“三·一”起义进一步促进了朝鲜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朝鲜人民通过起义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本性，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军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渗透到

人民群众的主要前提之一。日本驻朝宪兵头头哀叹道：现在，民心似乎平静，可是很难估计到何时发生何种变化。席卷世界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朝鲜传播得愈发旺盛。这是人民思想变化的新动向。

“三·一”起义推动了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朝鲜人民通过“三·一”起义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这与朝鲜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关。他们的经济力量甚为脆弱，政治能力很差。1860年开始，民族主义者提出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要求，开展过民族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一面旗帜曾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三·一”起义准备时期，群众尤其是学生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玩弄的独立词句将信将疑。运动一爆发，他们的真面目被暴露出来了。事实表明，这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已不能担负起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使命，其思想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了。

朝鲜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由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来领导，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日力量团结起来。民族解放运动不能采取请愿的方法，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开展革命斗争，只有将反帝斗争与土地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把广大群众组成一股浩浩荡荡、无比强大的革命队伍。

第十七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和 民族解放运动 “八一五” 解放和国土的分裂

第一节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三一”运动后，朝鲜各界认为应有一个组织作为领导民族运动的中心，统一国内外相互孤立和分散的独立运动。在几个月内出现了六个临时政府（国内4个，国外2个），即以天道教为中心的“大韩民间政府”、“朝鲜民国临时政府”、平安道的“新韩民国临时政府”、“汉城临时政府”，以及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俄罗斯沿海州的“大韩国民议会政府”。其中前三者处于酝酿筹备和印发传单的水平，后三个临时政府各有自己的宪章、根据地和政府办公场所，并参与统一政府的实际工作。

最早筹备临时政府的地区是俄罗斯沿海州。1919年3月初，居住在俄罗斯沿海州的朝鲜人以“全俄韩族人中央总会”为中心实现了大联合，组成了“大韩国民议会”。该议会仿效苏维埃制度，不仅具有议会职能，而且还具有行政、司法机能。3月17日议会组织数万韩人举行宣布“独立宣言”的仪式，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得到美法两国领事的承认和俄国人民的支持。3月27日公布了推举原“韩族会中央总会”会长文昌范为国民议会议长的决议和政府阁员名单。

其次是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三一”运动后在中国境内的朝鲜独立运动者1000多人纷纷来到上海，于1919年4月10日—11日在上海的法租界组成临时议政府，选举李东宁为议

长，定国号为“大韩民国”，通过了临时宪章十条和政纲六条。该议政院通过选举组成了国务院。临时政府采用民主共和制，选举李承晚为国务总理，任命了六部总长、副总长和秘书长。4月13日正式向国内外公布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第三个临时政府是“汉城临时政府”。1919年3月中旬汉城的韩南洙等人开始秘密进行“汉城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他们准备于4月23日召开由13个道的国民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宣布成立汉城政府。国民大会没开成。13道的24名代表趁学生游行示威之机，以国民大会的名义发布了“临时政府布告”。汉城政府也采用民主共和体制，选举李承晚为执政官总裁，李东辉为国务总理，国务院下设七部一局。同时公布了“约法六条”。

各地都认为，几乎同时成立的这几个临时政府需要统一。但意见不一致。俄罗斯境内的大韩国民议会向上海临时政府建议，上海方面只留外交部和交通部，其余政府各部和议政院均迁到韩人集中居住的“间岛”（吉林省延边）或俄罗斯境内。上海方面则以日本正要侵略西伯利亚为由，反对迁到俄罗斯，主张继续留在活动比较自由的国际城市上海，并提议临时议政院和国民议会合并组成新的议政院。在美国的李承晚强调汉城政府的正统性，并以汉城政府执政官总裁的名义开展活动。为促成上海临时政府、大韩国民议会和汉城政府这三个政府早日统一，上海方面于7月初提出了建立单一政府的五项原则：第一，取消上海和俄罗斯境内所设的临时政府，继承国内13道代表创设的汉城政府，承认国内13道代表为全民族的代表；第二，政府住所设在联络方便的上海；第三，承认在上海设立政府以后所实施的行政事务是有效的；第四，政府的名称仍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五，现任政府阁员一律辞退，由汉城政府选定的阁员接收政府。根据这个原则自8月18日至9月17日在上海召开了临时议政院会议，

修改了宪法。9月6日通过了由八章五十八条组成的宪法，政府体制改为总统制，选举李承晚为总统，组成了新内阁，定9月15日为施政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彻底否定中世纪的君主政治，成了韩民族史上第一个共和体制的政府。

临时政府阁员名单

总 统：李承晚

国务总理：李东辉

内务总长：李东宁

外务总长：朴容万

军务总长：卢伯麟

财务总长：李始荣

法务总长：申圭植

学务总长：金奎植

交通总长：文昌范

劳动局总办：安昌浩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初期活动主要有两项。第一，在国内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联通制，即联系国内外，指挥监督各地方行政制度，由内务部主管。汉城设总办、各道设督办、郡（府）设郡监（府长），面设面监。联通制形式上是地方行政制度，实际上被用作传达临时政府和国外独立运动情报，征集独立运动经费，组织指挥反日运动的联络网。实施联通制的地方有平安道、黄海道、咸镜道全域和京畿道、忠清道的部分地区，还有中国的“间岛”地方。这些地区都设有完备的组织体系。该组织于1921年被日警发现后全面取缔。第二，广泛开展外交活动。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就把争取独立的工作重点放在外交上。朝鲜人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失败以后，李承晚在美国华盛顿成立“欧美委员部”，徐载弼在费城成立“韩国通信部”，金奎植在巴黎成立“巴黎委员部”，他们分别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当时临时政府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是从巴黎和会（1919. 1）、华盛顿会议（1921. 11）和国际联盟得到独立的保障，并加入国际联盟（1920. 1成立），但均遭失败。此后，临时政府仍把外交重点放在取得中、

美、英、苏等大国的承认上，同时，展开广泛的外交宣传，积极同各国政府和知名人士交涉，以图取得支援。

临时政府初期活动的致命弱点是没有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也不能对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沿海州已有的独立军团体行使直接的统辖权。临时政府的领导者在指导思想上把独立战争只看作外交活动的一种辅助手段而没有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犯了路线错误。

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临时政府的外交努力连遭挫折，内部出现了种种矛盾，引起了无休止的纷争。对列宁拨给的支援独立运动资金，国务总理李东辉主张留用，而李承晚则主张委托国际联盟管理。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是导致纷争的主要原因。由于畿湖派和西北派的对立严重，加上因对临时政府的外交路线不满而退出临时政府的北京派的不断攻击，临时政府陷入困境。主张独立战争论的申肃、申采浩等北京派成员提议召开国民代表会议重新确立独立运动的方向。1923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来自70多个团体的140多名代表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前阶段独立运动的过程，评价了临时政府的作用。会上出现了两派：主张解散临时政府，重建新政府的创造派和主张改造临时政府的改造派，两派相持不下。结果改造派退出大会，创造派随即组成新政府，欲移址俄罗斯沿海州，但因未获苏联政府准许而解散。因这次国民大会而受到重大打击的临时政府于1925年弹劾李承晚，修改宪法，把总统制改为国务领制，试图用集体领导制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政府。这时已有很多独立运动家退出政府，致使组阁艰难。这时的临时政府与其说是统辖独立运动全局的政府，还不如说是一个独立运动团体。

第二节 二十世纪 20~3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政治”

“三一”运动以后，新任朝鲜总督斋藤实改变了以前的暴力政策，在加强军警机构的同时，表面上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作法，鼓吹“发展文化”、“充实民力”、“地方自治”、“民意畅达”，标榜所谓的“文化政治”。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原来只许陆海军大将担任的总督职务，可由文官充任；废除宪兵警察制度，实行普通警察制度；一般官吏和教师不再佩剑；允许发行朝鲜人办的报刊杂志；提高朝鲜人的文化水平；总督府任用朝鲜人官吏等。但是这种“文化政治”实际上是为日帝的殖民统治服务的政治骗局，只是改变了统治形式而已。

文官担任总督是十足的骗局。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无一文官担任过总督职务。有时只把现役军官改成预备役，脱掉军装，披上“民服”来掩人耳目。普通警察制代替宪兵警察制后，急剧增加普通警察人数。1918 年警察官署有 751 所，到 1921 年增至 2 960 所。警察人数由 5 402 人增至 20 750 人。日本帝国主义还炮制了“特别高等警察”制度，这是区别于普通警察的独立体系，专门负责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另外，总督斋藤实要求增加驻朝日军编制，1920 年和 1921 年两年间，每年增加 2 400 名军人。

日帝允许各地选举议员，组织协议会，作为地方统治机关的咨询机构。但它不能反映朝鲜人的意志。因为只有缴纳规定数额以上的府税或面税者方有资格当选议员，这样，参加地方议会的都是日本人及部分朝鲜地主和资本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和工人都被排除在外。

1920年代初，朝鲜人被准许用朝鲜文出版《东亚日报》、《朝鲜日报》、《时代日报》等报纸和《开辟》、《新生活》、《朝鲜之光》等杂志。但这些刊物须经严格的审阅，在不妨碍日本殖民统治秩序的条件下出版，随时可能被勒令停刊和取缔。日本帝国主义允许发行朝鲜文报刊杂志的目的是为了“注视百姓的动向，早先探知暗流”，显然是一种控制手段。

1922年2月，总督府修改了朝鲜教育会，其宗旨是向朝鲜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根据此令在教育课程中取消了朝鲜历史、朝鲜地理两门学科，增加了日语、日本历史、日本地理的学时。日帝大肆宣扬“三面一校”政策，扩大教育设施，目的是取消作为民族主义教育园地的朝鲜人办的私立学校和书堂。1921年~1931年间，私立学校和书堂从24 193所减至9 208所，学生从298 067名减至146 901名。到1930年底朝鲜儿童的就学率只有18.5%。日帝还注重实业教育，抑制中学数量的增加，新设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和商业学校等中等专科学校，目的是让朝鲜人掌握殖民地生产所必需的最低的实务基础，加强对朝鲜的殖民掠夺。

日本实行“文化政治”，丝毫没有改变殖民统治的手段。在经济上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朝鲜的物产资源。1918年7月，在日本国内由于政府收购军粮，米商囤积居奇，米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愤怒的群众到处捣毁大米批发行和交易所，公开抢米，有些地区发展成矿工暴动和农民暴动，史称“米骚动”。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的粮食危机，制定了“产米增殖计划”，欲将朝鲜变成自己的粮食供应基地。最初计划是从1920年开始15年内改良427 500町步土地，改进耕作法，增产920万石粮食，其中500万石输往日本。但此计划因不现实而根本无法实现。1926年欲下调计划指标，但又因遇1920年代末世界性的经

济危机而中断。据日方统计，1912～1916年朝鲜粮食年平均产量为1230万石，1922～1926年为1450万石，1932～1936年为1700万石，而同期对日本的输出量分别为106万石、434万石和876万石，粮食产量增加不到1.5倍，而出口量却超过8倍。可见，日本在产米增殖计划的美名下，不论实际增产多少，都照样掠夺自己所需要的粮食，受害的是朝鲜农民。粮食虽有增产，但朝鲜国内粮食消费却逐年减少。当日本人一人的年粮食消费为12斗时，朝鲜人只有4斗，只相当于日本人的三分之一。不足部分从中国输入小米、高粱米等杂粮来补充。朝鲜农民不得不以比他们卖给日本的大米价更高的价格买入中国的杂粮。另外，在实施产米增殖计划过程中向朝鲜农民摊派水利设施的费用，使朝鲜农民进一步陷入贫困之中。农民无法忍受日本殖民者和地主的残酷掠夺，纷纷起来反抗。这种反抗往往以“土地争议”形式表现出来，从土地争议的发生次数可以看出这种斗争的不断扩大。1921年发生争议27次、1923年176次、1925年204次、1927年275次、1929年423次。到1930年达到高潮。这种斗争逐渐带有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

日本把朝鲜不仅当作自己的粮食基地，而且还当作主要的商品市场。1920年取消了朝日之间的关税制度，使日本完全垄断朝鲜市场成为可能。朝鲜输出入对日本的依赖程度曾达80%～90%。日本向朝鲜倾销成品商品（日用品），朝鲜则向日本输出原料、食品等。1921年日本对朝鲜的输出总额中有75.6%是成品，而朝鲜对日本出口总额中食品、原料及原料制品的比例竟达95%。

朝鲜是日本的主要商品市场，同时也是主要投资市场。1920年日本取消了“公司令”，从此设立企业只需申报，不必经过总督的许可。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朝鲜大地主开办制造业，日本方

面为了分裂朝鲜民族，给这些企业少许补助。取消公司令为日本资本进入朝鲜开了绿灯。三井、三菱、野口等大财阀纷纷进入朝鲜。日本人在朝鲜的经济活动也由轻工业和商业逐步转向重工业。1926年赴战江水力发电厂建设完工，翌年日本利用该厂电力在兴南建设了朝鲜氮肥工厂。这是一所连日本也没有的大型化工厂。此后，日本继续发展重化工业，致使朝鲜变成侵略中国的兵站基地。

二、凤梧洞战役和青山里大捷

韩日合并以后，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许多仁人志士和义兵将领纷纷移居国外，其中包括从事独立运动的活动家。由于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沿海州朝鲜人人数最多（分别为36万和20万），而且在地理上与朝鲜接壤，这些地区首先被开辟为独立运动的根据地。朝鲜人在这里组织了“耕学社”、“扶民团”等反日自治团体，创办“新兴武官学校”等军事机关，培养独立运动力量。“三一”运动以后，各地的独立运动更加高涨，转为武装斗争。在中国东北的通化地区出现了以“西路军政署”为代表的十余支武装团体。在延边地区建立了大韩国民会的独立军，由洪范图成立的大韩独立军，大倥教系统的正义团等近20个武装团体（后来大韩国民会军和洪范图的大韩独立军合并成“国民会军”，正义团和金佐镇的队伍合并成“北路军政署”）。当时，苏联红军内的朝鲜人部队“自由大队”（吴夏默领导）和“萨哈林部队”（朴允文领导）已与入侵西伯利亚的日军开战。

从1919年开始，中国东北地区的各支武装部队不仅在当地与日军作战，还频繁进入朝鲜国内袭击日军警机关，惩治亲日分子，破坏交通设施。据统计，这些独立军部队到1923年为止在东北地区与日军交战132次，进入国内作战980次。其中规模较

大的是凤梧洞战役和青山里战役。

凤梧洞战役的导火线是1920年6月6日的三屯子战斗。是年6月4日，约30人组成的独立军小分队越江到咸镜北道钟城郡江阳洞攻打日宪军曹福江三太郎所指挥的一股巡查队后返回中国境内。接此消息的日方稳城郡南阳守备队长新美中尉率一个中队兵力和10余名宪警越过图们江追击独立军小分队。6月6日，大韩军北路督军府府长崔振东率部在三屯子西南方占据有利地形摆开阵势，将日军引入埋伏圈内，进行歼灭性的打击。这是日军第一次越江到中国境内与朝鲜独立军交战。日军为挽回在三屯子的败局，组成由安川少佐率领的越江追击大队，将其派往中国境内攻打独立军。

6月7日，日军越江追击大队从稳城郡下滩洞渡江，向洪范图所在的独立军根据地凤梧洞袭来。凤梧洞为四面环山，长达10公里的狭谷，是一座天然要塞，易于防守。谷内有上村、中村、下村三个朝鲜人部落，约有200户人家。洪范图等接到日军要来袭击的报告后，立即疏散村民，命800多名独立军在四面高坡上。当日军完全进入包围圈以后，独立军开始射击。日军一片慌乱，无法组织有效反击。激战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下午4时又遇大暴雨，日军败退，折兵150多人。战斗以独立军的胜利而结束。独立军把这次战斗称为“独立战争的序曲”或“独立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它极大地鼓舞了朝鲜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走武装斗争道路的决心。

凤梧洞战斗以后，日军为了维持朝鲜国内统治和国境警备，加紧讨伐独立军，制定了“间岛地方不逞鲜人（独立军）剿讨计划”，动员中国东北龙井领事馆所属警察组织和总督府警务局增派警察兵力，到处搜查、杀害独立军。同时，要求东北军阀张作霖联合剿灭朝鲜独立军，张作霖也同意此举。日军就以奉天督军

军事顾问的名义，或以中日联合军的名义在东北各地肆无忌惮地讨伐朝鲜独立军。这实际上是日军入侵中国大陆的长期战略的前奏曲。

日军为了向中国东北正式派兵制造了“珲春事件”。1920年10月2日，被日本人收买的张江好（原名张鬼武）土匪团攻打珲春城，焚毁驻珲春日本领事分馆，杀死若干日本人。日本以此为借口，当日开始向东北派兵，最先到东北的是以日本19师团为核心的浦潮军和关东军的混合部队。日军在延边地区到处杀人放火，妄图一举消灭东北境内的朝鲜独立运动团体及其武装力量。

由于日军的血腥镇压，独立军部队不得不采取新的战略，拟将队伍转移到长白山深山老林或北部中苏边境密山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时，中国军队担心会引起与日本的外交冲突，便通告朝鲜独立军离开延边地区。朝鲜独立军各部队按既定计划实行战略大转移，离开了汪清、安图等地。独立军队伍转移到和龙县青山里一带时，日军讨伐队约5000名士兵由东正彦少将亲自指挥，倾巢出动，试图一举歼灭独立军。

青山里战役的第一仗是1920年10月21日的白云坪战斗。独立军占据有利地形，给进入包围圈的日军以毁灭性打击。经过30分钟的激战，歼灭日军200余人。此后六天内，双方分别在泉水坪、渔郎村、高丽沟、天宝山、古洞河交战，独立军部队处处打胜仗，歼敌近千人。参加青山里战役的独立军有金佐镇指挥的北路军政署军，洪范图指挥的大韩独立军，安武所领导的国民军，兵力近2000名。

在青山里未达目的反遭惨败的日军，便向无辜居民挥舞屠刀，残酷报复。他们在和龙县獐岩洞，延吉县依兰沟，八道沟等地袭击朝鲜人村落，杀人放火，在两个多月里杀死1万多人，焚

烧 2500 多幢民房和 30 多所学校，到当地采访的朝鲜《东亚日报》记者张德俊也未免于难。这就是历史上的“庚申惨案”（1920 年）。日本人的暴行从反而更加激发了朝中两国人民的抗日意识。

青山里战役后，独立军各部分路向密山方向转移。金佐镇所辖北路军政署经安图县三岔口最先到达密山。安武所辖大韩国民会军、崔振东所辖都督府军、义军府、光复团等随之到达。洪范图的大韩独立军与西路军政署（李相龙领导）联合以后，也到密山集结。在密山，各路独立军合编为“大韩独立军团”，拥有 3500 名将士。1920 年底，他们冲破日帝浦潮军的警戒越过乌苏里江进入俄罗斯境内，然后大部分转移到黑龙江北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中文名海兰泡、朝鲜人称自由市）。去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在十月革命后支持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所以想得到俄罗斯的支援，准备长期与日抗战。但在这时，日俄在北京签署渔业协定，日本要求俄罗斯取缔俄境内的朝鲜独立军，俄同意解除朝鲜独立军的武装。同时，在推进独立军与原苏红军内的自由大队和萨哈林部队合并过程中，围绕指挥权问题俄朝内部发生冲突。结果独立军遭到俄罗斯红军的武装镇压。1921 年 6 月 28 日，俄红军动用大炮，装甲车重重包围独立军。独立军冲出包围圈，部分士兵跳入黑龙江，渡江潜入中国深山密林。独立军损失巨大，打死 272 名，被捕 917 名，溺死 31 名，250 名下落不明。独立军司令官高丽军官革命学校校长李青天（一名池青天）也被捕入狱。后来上海临时政府和各爱国团体向俄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致电列宁敦促释放李青天等人。苏俄政府依照不得任意处置外国革命家的国际法惯例释放了李青天。这就是“自由市事变”（或称黑河事变）。至此，苏俄境内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暂告终结。转入中国境内的独立军成员重新开辟根据地，组织新队伍，继续

进行独立斗争。

三、国民府

东北各地的独立运动团体和侨民在 1920 年末的“庚申惨案”中遭到残酷的迫害，但抗日群众和团体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武装斗争，并积极开展统一运动。

1922 年 8 月，以西路军政署和大韩独立军为核心的东北地区南部各抗日团体在桓仁县马圈子召开“南满朝鲜人统一会议”，组成统义府。参加会议的还有宽甸东路侨民团、大韩光复军营、大韩正义军营、大韩光复军总营、平安北道督办府等团体的代表。统义府建立中央机构，统辖了 3000 余人的义勇军部队。统义府成立以后不久，围绕独立运动的方向等问题产生分歧，致使内部出现了分裂。一派主张共和体制，一派主张复辟朝鲜王朝。以全德元为首的复辟论者于 1923 年 2 月在桓仁县大荒沟会合，宣布退出统义府，成立大韩义军府。义军府便与统义府相对立，他们发表声明责难对方，或为增加自己管辖的韩人户数而竞争，甚至发生互相绑架或杀害对方成员的事件。为了克服这种不光彩的局面，统义府义勇军第一、二、三、五中队 500 余名成员于 1923 年 6 月退出统义府，另建军团，并派代表到上海临时政府报告此间东北的独立运动状况，要求组建临时政府管辖下的南满军政府。临时政府表示同意，并派《独立新闻》社长金承学和李裕弼前往东北，协助组建军政府。8 月，南满军政府改名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驻满参议会（府）”。

义勇军第一、二、三、五中队退出后，统义府剩下的第四中队处境很艰难。他们以第四中队为核心组织了第五、六、七、八中队，坚持抗战。为了克服东北独立运动武装的分散状态，根据统义府的提议于 1924 年 7 月在吉林召开了全满统一会议。参加

会议的除统义府的代表之外，还有大韩军政署、光复团、义成团、劳动亲睦会、辩论自治会、固本契、大韩独立团和学友会的代表。会议选举统义府代表金东三为议长，决议实现大联合，定名正义府。

此外，“庚申惨案”和“黑河事变”以后，许多独立运动家分散在我国东北各地继续开展抗日活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有李范允、金佐镇所属大韩独立军团和玄天默、罗仲昭为中心的大韩军政署（北路军政署）。1925年3月，大韩独立军团、大韩军政署等几个团体代表和各地民选代表36人在宁安县召开联合大会，建立了新民府。

这样，在东北境内出现了参议、正义、新民三府，统领除延边以外的所有朝侨及其武装团体。三府都具有执行朝鲜人社会自治的行政机关和负责所属独立军训练和作战的军事机关两大职能。三个军政府的最高目标均为祖国独立。

三府各自划分势力范围负责朝鲜人自治。参议府以奉天省辑安县和宽甸县为中心，把鸭绿江两岸作为势力范围；正义府把哈尔滨以南，通化、兴京以北横跨奉天、吉林两省的广阔地域作为势力范围；新民府以宁安县为中心，把势力范围从北满中东线延伸到延边的一部分地区。在三府的成立过程都采用了民主制，实行立法议会、行政委员会、司法三权分立制。三府都制定并施行了相当于基本法的宪章，形式上已具备了立宪共和制的框架。

三府建立以后，虽然没有象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斗那样辉煌的战果，但各自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开展反日斗争。参议府的武装力量曾多次与鸭绿江南岸日军交战，1924年5月19日曾袭击出现在中朝边境的日总督斋藤实。以李青天为司令的正义府所属武装部队和以金佐镇为司令的新民府所属武装部队经常进入国内袭击日本军政机关。各府都在当地从事爱国教育

运动，设立许多小学、中学、出版各种刊物，宣传反日独立思想。参议府创办的《战友》、《大同民报》等在当地朝侨中深有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镇压和取缔在东北鼎立的这三个朝鲜人自治政府。1925年6月11日，日总督府警务局长三矢宫松胁迫奉天省警察厅长于珍制定“在满朝鲜人取缔法”（即三矢协定）。协定规定中日两国警察加强合作，防止奉天以东的朝鲜人独立运动，中国当局抓到朝鲜人独立运动者立即引渡给日本当局，日本当局向中国当局通报朝鲜人独立运动者的名单等。根据这个协定，中国东北三省当局有义务镇压朝鲜人独立运动，有责任逮捕独立运动者并交给日本。日帝还实行奖赏制，赏金的一部分支付给直接逮捕者，这对当时愚昧的中国下级官吏具有强大的诱惑力，甚至发生过乱砍无辜居民首级换取奖赏的悲剧。从此，在东北境内的抗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日帝和东北军阀勾结起来镇压独立运动的情况下，三府鼎立各据一方，互不合作，不利于开展有效的斗争。于是三府开始了促进统一的活动。它是同国内外正在酝酿的创建民族唯一党的运动同步进行的。1927年末，正义府提出三府联合和促成唯一党的创议。1928年和1929年在吉林、磐石等地召开了多次三府联合和成立唯一党会议，但会上分成两派，互相对立。“协和会”派主张唯一党的组织应以团体本位或团体为中心；“促成会”派则主张党的组织应是个人本位，应解散所有带地方性和派性的团体。最后“协议会”派于1929年4月1日统一参议、正义、新民三府，成立了“国民府”。国民府中央机关设在辽宁省新宾县兴京，同年12月成立了“朝鲜革命党”及其所属部队“朝鲜革命军”。而“促成会”派则在北部通过革新议会组成韩族总联合会，并成立“韩国独立党”及其所属部队“韩国独立军”，在宁

安、五常一带进行活动。

国民府致力于当地朝侨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兴京设立南满学校，讲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创办机关刊物《烽火》，宣传反日独立思想，并就东北地区朝侨租佃土地问题，多次与中国东北地方当局进行交涉。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广大朝侨及其独立运动团体遭到日本的残酷镇压。1932年1月国民府在兴京与朝鲜革命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加强抗日斗争。在会议结束的1月6日，会场不幸遭到日警袭击，大多数干部被捕，其势力大受挫折，但朝鲜革命军继续坚持斗争。该军梁基瑕所部于2月在宽甸全部战死。革命军党代表高而虚，总司令梁世奉率余部继续抗战。后与中国一支义勇军组成中朝联军，于3月在永陵街消灭驻当地的大部日军。5月7日，中朝联军再次在永陵街击毙日军100余名。后来朝鲜革命军的一部分成员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与中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游击斗争。1934年9月20日，朝鲜革命军总司令梁世奉在游击斗争中被叛徒暗害，此后东北独立军活动逐渐转入低潮。

第三节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一、临时政府的活动

在本世纪20年代，领导层的派系斗争和财政困难使上海临时政府面临危机。但到30年代，随着日本向中国大陆的侵略，临时政府的活动又趋活跃。国务委员会委托金九向日本展开特殊工作，即搞暗杀日本军政要人的恐怖活动。1932年1月8日，独立志士李奉昌奉金九之命到东京，向参加阅兵式回去的日本裕

仁天皇投掷手榴弹，但因距离过远未击中。1932年4月29日，年仅23岁的热血青年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向举行天长节（天皇生日）纪念活动的日本人主席台投掷炸弹，炸死了侵华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和日本居留民团河端米作团长，炸伤多人。此举大大鼓舞了朝中两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使国内外重新意识到临时政府的存在，中华民国蒋介石政府开始资助临时政府的活动。1933年5月，金九到南京约见蒋介石，商议在洛阳军官学校设朝鲜人训练班和在南京军官学校招收朝鲜青年学员问题。

由于尹奉吉等人的暗杀活动，日方加紧对临时政府的迫害。临时政府离开安全渡过了13年的上海法租界迁之杭州、嘉兴、镇江、长沙、广州、柳州等地。安昌浩被日警逮捕，其他独立运动家被迫四处隐藏。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临时政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 下，不懈地进行对日作战的各种准备。7月15日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在军务部下设军事委员会，成立韩国光复阵线，使临时政府进入战时体制。1938年设军事学编修委员会。翌年，组织军事特派团到西安等地征募军队，同时成立宣传委员会开展多方外交活动。

1938年10月，在武汉从事活动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为开展反日武装斗争，创建了朝鲜义勇队。同年11月，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革命者联盟等四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成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将朝鲜义勇队归属于该联盟。朝鲜义勇队总队长为朝鲜民族革命党书记金元凤（一名金若山），下辖三个支队。朝鲜义勇队主要是配合中国国民党军队做些政治宣传和战俘工作。第一支队在东南地区活动；第二支队在华中地区活动；第三支队在华北地区活动。

1940年，中国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亦

随之迁址重庆。同年5月，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韩国国民党联合组成新党——韩国独立党。该党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党，由中央执行委员长金九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9月，临时政府在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重庆建立韩国光复军，由李青天任总司令。光复军的活动同义勇队的活动相同。经蒋介石仲裁，韩国光复阵线和朝鲜民族战线联盟联合，并发表共同声明。义勇队的第一、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的部分成员编入光复军，成为光复军的第一支队（光复军共有六个支队）。原义勇队总队长金元凤任光复军副总司令。光复军在西安开办干部训练班，先后训练了数百名干部。1943年曾有少数成员赴印缅前线，协助英军作战。第三支队的部分成员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解放区活动的朝鲜革命者于1941年1月在山西组织朝鲜青年联合会。联合会以义勇队第三支队部分成员为骨干，建立了朝鲜义勇军，与中国八路军、新四军一起活跃在抗日战场上。

1941年11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认为，日本对美作战，肯定以日本的战败告终。所以动员一切力量组织最后的反日抗争。首先，临时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罗斯福和邱吉尔的联合声明，支持美英正式向日本、德国法西斯宣战；其次，一边加强外交阵营，一边全力培育光复军，准备与同盟军联合作战。临时政府专设欧美外交委员会，任命李承晚为委员长，开展新的外交攻势，要求美英等国家承认朝鲜政府。临时政府还同中国政府签署一项协定，将光复军的作战指挥权交给中国军队，同时从中方得到武器和其他军需品。中国政府到1944的8月才把光复军的作战指挥权交还给朝方。1943年以后有600名在美朝侨加入美国陆海空各兵种，显示了朝鲜军人的威武。

临时政府自1919年成立26年来，先后五次修改宪法，政府

的领导体制也变更了五次，即总统制（1919年）、内阁责任制（1925年）、国务委员集体领导制（1927年）、主席制（1940年）、主席、副主席联席责任制（1944年）。根据第五次修改的宪法，组成了以金九为主席、金奎植为副主席的新内阁。金元凤任军务委员。政府组织比以前更趋充实。经过改组的政府更加致力于培育光复军，加强外交攻势，续办政府机关报《独立新闻》，活动空前活跃。光复军认定日本即将战败，组织了一支“国内挺进军”，准备于1945年9月开进本土而加强特殊训练。但因日本于同年8月投降，此计划未能实现。临时政府成员于1945年11月29日以个人名义乘美国和中国的飞机回国，因接管汉城的美军政府不许他们以政府名义归国。临时政府随之自动宣告解体。

二、维护民族文化的运动

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以后，不仅日本全国进入战时体制，而且对殖民地朝鲜实行了更加残酷的法西斯政策。日本把朝鲜当作兵站基地，把金属、机械、化学等工业部门都改编为军需工业体制，掠夺铁、煤炭、钨矿等资源。在农村强征粮食和耕牛以充军用。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在朝鲜可掠夺的战备物资减少，最后连废铁、铜碗、铜筷也被搜罗去。日军侵入中国山海关以南地区后，由于作战规模不断扩大，兵力和劳力不足，便从朝鲜征募。日本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制定了“陆军特别志愿兵令”和“国民征用令”，强制征募朝鲜青年编入日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又实行“学徒志愿兵制度”（1943年）和“征募制度”，强迫朝鲜青年为日军义务服役。数十万朝鲜人被征集到煤矿、军工厂和前线，进行强制劳动。还强迫许多朝鲜妇女当从军慰安妇。自1939年到1945年被日本征用的朝鲜人超过100万。

日本帝国主义在肆意强迫朝鲜人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时，实行

“皇民化”政策，扼杀朝鲜人的民族意志。他们鼓吹“日鲜一体”、“日鲜同祖论”，禁止使用朝鲜语，解散朝鲜语和朝鲜史研究机构，停止发行《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所有朝文报刊杂志。甚至强迫朝鲜人创氏改名，使用日本人名，强制参拜神社，宣诵“皇国臣民誓词”，妄图根除朝鲜人的民族意识，以至从地球上消灭朝鲜民族。

朝鲜人不愿当亡国奴。具有“三一”运动光荣传统的朝鲜人民以各种斗争方式反抗日本法西斯统治。“文化守护运动”就是一种斗争形式。广大爱国志士在教育、语言、历史、文艺等领域执着地维护朝鲜文化。1931年1月，原来的朝鲜语研究会扩大改编为朝鲜语学会，发行月刊《朝鲜语》。1933年，李熙升、崔铉培、权德奎等学者完成了朝鲜语语法的整理工作，利用《东亚日报》等报纸广泛普及该语法。同时继续推进《朝鲜语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因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语学会视为独立运动团体，逮捕其11名骨干，勒令学会解散（1942年）而未能付梓。被捕的学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才被释放。

民族史学家们坚决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史观，积极开展澄清朝鲜民族起源，强调民族优越性的国史研究事业。朴殷植、申采浩等人流亡到上海仍坚持朝鲜史的研究。朴殷植著述《韩国痛史》，抨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在《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中强调“民族之魂”。申采浩编写《朝鲜上古史》、《朝鲜史研究草》等著作，奠定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础，唤起朝鲜民族为争取独立自主而斗争。在国内，南宫轸编写《东史略》、《朝鲜史话》等供学校作教材，李能和编写《朝鲜基督教及外交史》、《朝鲜道教史》，为整理朝鲜宗教史做出贡献。1934年由李丙焘等主张实证主义史学的学者组织了“震檀学会”，发行了《震檀学报》。同时

出现了立足于唯物主义史观，按世界史发展规律系统整理朝鲜史的社会经济史学，其代表者是白南云。

朝鲜的“新文学”运动兴起于“三一”运动前后。在此运动中，先后创办了《创造》、《废墟》、《白潮》、《金星》等文学期刊，这些期刊到40年代初都被勒令停刊。但它们为朝鲜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廉想涉在作品《三代》中揭露了朝鲜从传统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韩龙云、沈熏、李相和等人用诗歌讴歌人民对祖国的热爱，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新文学思潮受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发展为无产阶级文学。李箕永的《故乡》用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了30年代朝鲜农村的悲惨情景。洪命熹的《林巨正》描写李朝中期农民起义军同腐败的政府官僚的斗争，以激发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绪。到30年代末由于日帝的无情镇压，文学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部分作家主张“纯粹文学”，以图回避现实。但因不许用国语发表文章，纯粹文学也夭折了。从此，朝鲜文学进入黑暗时代。但进步作家的反抗的呼声从未中断，年轻诗人尹东柱在他的诗《天、风、星和诗》中表现了对祖国和人民“毫无愧色”的民族正气。

三、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抗日武装斗争

早在1918年6月旅居中国、俄罗斯远东地区等地从事独立运动的朝侨李东辉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建立了韩人社会党，这是朝鲜第一个共产主义思想团体。1921年1月，该党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把党的名称改为高丽共产党，即后来于1925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上海派的前身。

1919年9月，以伊尔库次克的俄共（布）朝鲜人支部为基础，建立了以金哲勋为委员长的全俄朝鲜人共产党。为了与李东

辉等上海高丽共产党抗衡，该党于1921年改名为高丽共产党，即后来的朝鲜共产党伊尔库次克派的前身。该党与上海的高丽共产党相互争斗，自封正统，都想争取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于1923年决定解散这两个高丽共产党，在莫斯科另组共产国际高丽部，直至国内建立共产党。

1925年4月，国内的北风会、火曜会等四个共产主义思想团体在汉城组建朝鲜共产党，由金在凤任责任书记。其后，又在海外设立日本总局、中国满洲总局和上海总部，并于1926年加入共产国际。朝鲜共产党成立后，在宣传马列主义、唤醒民众，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如组织1926年的“六十”万岁斗争，与民族主义者联合组成“新干会”（1931年5月解散）等。但是由于领导成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是激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致使党内宗派斗争十分严重。最初，党的领导权掌握在火曜派和北风派手中，从1926年起由ML派控制。1927年12月，党外的汉城派和党内的上海派联合另组共产党。宗派斗争严重地危害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削弱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于1925年11月、1926年5月、1927年12月、1928年8月先后对朝鲜共产党进行过四次大逮捕，使党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12月，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原则决定解散朝鲜共产党。此后虽然朝鲜共产党各派建立了一些带有共产党色彩的组织，但始终未能建立统一的组织。

“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多数独立运动团体和民族主义者纷纷进入中国关内的朝鲜青年共产主义者编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展开武装斗争。1932年4月金日成在安图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1934年3月反日人民游击队扩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1936年5月祖国光复会成立。祖国光

复会的 10 大纲领为：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实现朝、中民族的亲密联合，推翻满洲国；建立革命军队；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亲日分子占有的一切土地、企业、财产；发展民族工、农、商业；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实行男女平等；废除奴化教育，实行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免费义务教育；实行 8 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同平等对待朝鲜民族的国家实行亲密联合。光复会办的机关刊物《三一》月刊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光复会的主要活动地区是中国东北长白县一带和国内威镜道地方，绝大多数成员是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天道教徒，也有民族主义者和反日地主。

1937 年 6 月 4 日，金日成率领一支人民革命军队伍，突破国境警备线回到国内，袭击普天堡，迅速捣毁并焚烧了警察驻在所等日本统治机关，向当地群众散发祖国光复会 10 大纲领，震慑敌人、鼓舞人民，扩大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和光复会的影响。1939 年 9 月，日帝在吉林设立直辖于关东军司令部的讨伐司令部，动员关东军新编部队和伪满军队的大批兵力，对抗日游击部队进行大扫荡。朝鲜人民革命军便采取大部队迂回的作战方式，在安图、和龙、延吉、敦化一带不断粉碎日军的扫荡。从 1940 年的下半年开始，他们变换斗争方式，实行小分队活动，而将部队的主力转移到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整训。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金日成率领队伍，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于当年 9 月中旬回到平壤。

第四节 “八一五”解放和国土的分裂

一、“八一五”解放和“三八”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民从此摆脱了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获得了解放。长期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一直为争取独立而进行英勇的斗争，因此，在日本投降后，无一不盼望尽早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因美苏等大国的干预未能如愿以偿。

1943年9月，作为“二战”法西斯元凶之一的意大利首先向同盟国投降，轴心国的败局已定。而取得战争主动权的同盟国首脑们一方面积极筹划彻底战胜轴心国的方略，另一方面开始设想战后世界秩序。1943年11月，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发表了一个包括日后处理朝鲜问题等内容的《开罗宣言》。宣言说：“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的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苏联当日在美、苏、英三国参加的“德黑兰会议”上表示完全同意《开罗宣言》的内容。1945年2月，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美、苏、英首脑再次聚会于雅尔塔，商讨对德政策和组建联合国的问题，该会议敦促苏联对日宣战，也论及对朝鲜实行托管问题，并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该协定对战后亚洲局势具有重大影响，但也为朝鲜的分裂埋下了隐患，致使朝鲜问题复杂化。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公告重申了履行《开罗宣言》中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8月8日苏联也加入了该协约。

1945年8月9日，苏联远东军出兵朝鲜，以摧枯拉朽之势

击败日本关东军的抵抗，并继续向南挺进。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投降。当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兵力驻在远离朝鲜的冲绳、菲律宾等基地，未能迅速进驻朝鲜。美国害怕苏军单方面占领朝鲜全境，急忙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接受日军投降。三八线便作为苏美两国军队在朝鲜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被确定下来。苏军第25集团军为遵守协议，从已占领的南部地区撤离到三八线以北地区。1945年9月8日和9月9日，美军从仁川和釜山登陆，占领了朝鲜南部地区，并于9月11日在汉城设立军政厅，任命美军少将阿诺德为军政长官。从此，三八线两侧的交通、电讯被中断，人员、物资禁止迁移，三八线便成为分割朝鲜国土的界线，朝鲜也就成为“二战”后又一个被分裂的国家。

二、美军政和反托管运动

在美苏军队进驻朝鲜之前，朝鲜各地出现了很多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这些团体为建立新政府做了不少准备工作。1945年9月6日，吕运亨组建的建国准备委员会在汉城市京畿女子高中的礼堂主持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并组成由李承晚任主席、吕运亨任副主席、许宪任国务总理，以及金九、金奎植等各界人士参加的“政府”。因当时李承晚、金九、金奎植等人均在海外，在宣布该政府任职名单时，并未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实际上由吕运亨派掌权。但由于美军政当局不予承认，该政府随即解散。同一时期民族主义系头面人物宋镇禹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归国委员会”与吕运亨的建国准备委员会相抗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美军进驻朝鲜开始实行军政统治。归国委员会于1945年9月改建为“韩国民主党”。到1945年10月注册登记的政党和社会团体有50多个。李承晚从

美国回来后，组织“独立促成中央协议会”，暂时统一了右翼政党。但左翼政党拒绝参加协议会。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对立从此开始表面化。

当时美国几乎没有掌握关于朝鲜的任何情报，而且也没有任何具体的政治构想。美国进驻汉城后，连续发布了《美国太平洋方面总司令部布告》第一、第二、第三号。第一号布告宣布美国军队“对北纬 38 度线以南的朝鲜领土和人民实行统治权”；第二号布告宣布朝鲜人犯法要接受隶属于美国军政厅的法庭审判；继续留任政府、公共团体及公共事业部门任职的日本雇员；第三号布告宣布军政厅发行的补助军用钞票和朝鲜银行券为通用货币。在很多领域维持日本总督府的统治体制，起用了不少朝鲜人中的亲日分子。广大朝鲜人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美军政厅才于 9 月 12 日解除了朝鲜总督阿部信行的职务，同月 14 日解除了总督府政务总监以下各局长的职务，改称行政顾问，并任命一大批美军将领为军政厅的各局局长。为便于统治，起用了吕运亨等 11 名朝鲜人为军政长官的顾问，还实行了美国人和朝鲜人同时担任局长的两局长制度。1945 年 10 月 9 日；美军政厅宣布废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一切法令，以美军政厅发布的新法令代之。据统计，在美军政统治期间，曾制定和公布 219 个法令。此外还有许多部门法令和一般告示。这些法令都是维护美军政厅统治的。

1945 年 12 月，美、苏、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战后事宜。12 月 29 日发表了《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决定》。决定表示将朝鲜重新建为独立国家，先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四国对朝鲜实行以 5 年为限的信托统治。并规定已进驻南北的美苏二司令部在两个星期内组成联合委员会，准备各项建议。翌年 3 月由美苏双方各出 5 名成员组成美苏联合委员会并开始工作，但因双方在哪些当地政党有资格参予咨询问题上发生分

歧，会议陷入僵局于5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在朝鲜北半部得到了热烈拥护，但在南半部却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李承晚成立了反对信托统治的“国民总动员委员会”，动员汉城市民起来罢市示威，美军政厅的朝鲜人职员也一齐参加罢工。反托管运动迅速遍及南半部。面对南半部人民强烈反对信托统治，坚决要求民族独立的情况，美军政厅于1946年8月发布第18号法令，宣布建立韩国过渡政府立法议院，由90名议员组成，金奎植任议长。立法议院可向军政厅提出政治、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建议，而美军政长官仍有否决权。因而，立法院在其存在的一年半时间里，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

解放初期，朝鲜南部不仅在政治上无秩序，在经济上也出现了混乱局面。日本统治时期，朝鲜的经济以军需工业为主畸形发展，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很大。断绝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无疑是对朝鲜经济的沉重打击。已有工厂也因缺少技术人员难以开动。国土也被人为地在三八线割裂，形成了南半部轻工业、农业地带和北半部重工业地带相分离的经济格局。日本败走时发行的50亿圆货币的流通又导致了通货膨胀。另外，近200万从日本、中国等地归国和由北部南移的人口，更加重了经济的混乱。

在这个时期，南半部各地反美运动此起彼伏。以朝鲜共产党为代表的爱国民主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美军政当局对此感到十分恼火，于1946年5月18日以地下工厂印刷伪钞为名，出动大批军警，搜查朝鲜共产党中央本部、朝鲜共产党汉城市委员会、朝鲜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所在地精版社大夏，杀害和拘押了许多共产党人，左翼势力大受挫折。这就是“精版社伪币事件”。1946年9月，釜山地区的铁路工人7000余人举行大罢工。翌日组成了“南朝鲜总罢工斗争委员会”。他们向美军政当局严

正要求增加粮食配给量，增加工资，反对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释放被捕的民主运动家等。铁路工人的罢工浪潮很快波及邮电、粮食、电器、建筑、海运等部门，有30万名工人加入了罢工行列。接着银行、医院、学校也罢工罢课，甚至部分下级官吏和警察也参加到斗争行列中来。1946年10月1日大邱市民众袭击警察署，处死了民愤极大的警官。美军政当局立即出动军警和“西北青年会”等右翼组织的成员进行无情镇压，打死300余人，打伤2万余人。反对美军政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48年1月，其中以济州岛人民的斗争为最，持续时间达一年之久。

三、北半部地区的民主改革和政权建设

日本投降后，朝鲜北半部各地都自动组织起人民委员会，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人民生活。1945年10月8日，平南、平北、黄海、咸南、咸北人民委员会在平壤召开北朝鲜五道人民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了农业、粮食、工业、金融、财政等问题，根据北半部形势需要，决定健全和统一各地方机构，并成立五道临时人民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北半部各道的统一领导和加强各道间的经济联系，同年11月19日成立北朝鲜五道行政局，内设产业、交通、农村、商业、邮政、财政、教育、保健、司法、保安等十个局。

1946年2月8日，在北半部各政党社会团体共同倡议下，由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北朝鲜五道行政局、各道郡人民委员会代表参加，在平壤召开“北朝鲜各道郡人民委员会和反日民主政党社会团体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广大反帝反封建民主力量，依靠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行使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政权机关。它下设十四个局、

部、对北朝鲜各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进行有计划的统一领导。它领导北朝鲜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如发表二十条政纲、发布土地改革法令及产业国有化法令、劳动法令、男女平等法令、实施农业实物税制等，在民主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在北朝鲜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北半部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普选，选举各级人民委员会委员。1947年2月17日至20日间，当选的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委员中每三个选出一名代表，到平壤参加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即“北朝鲜道、市、郡人民委员会大会”。北朝鲜劳动党等5个大政党社会团体也派出5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北朝鲜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从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中选出237名代议员组成北朝鲜人民会议。北朝鲜人民会议的职权是：选举其常任委员会、选举北朝鲜最高法院院长和任命北朝鲜最高检察所所长，决定对外贸易，保卫国家安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审查国家预算，决定行政区划，决定大赦等。

1947年2月21日至22日间，北朝鲜人民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金日成关于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成立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从而产生了北朝鲜人民委员会，以取代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由正、副委员长和十八个局的局长组成。金日成当选为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制定并领导北半部人民执行了1947年和1948年两个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对农业实物税制进行了修改，发行了新货币，对北半部地下资源、森林、水域实行国有化，建立了朝鲜人民军，降低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提高了人民生活，巩固和发展了北半部的各项民主改革。

四、南北单独政府的成立

1947年2月，美军政当局推举朝鲜人安在鸿任军政厅的民政长官，并于1947年6月3日宣布将军政厅改称南朝鲜过渡政府。同年7月1日，又任命朝鲜人徐载弼为最高议政官，在形式上承认由朝鲜人自主治理国家。

1947年5月，休会一年之久的美苏联合委员会复会，但双方在咨询对象问题上仍无法取得一致，会议再度陷入僵局。此时，由于杜鲁门否定罗斯福政府战时制定的同苏联协商的路线，改行“遏制政策”，双方开始形成两极格局。美国对联合委员会失去兴趣，借会议陷入僵局之机，于1947年10月将朝鲜问题提交第二届联合国大会讨论。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拒绝苏联的撤军及邀请南北朝鲜代表参加讨论的提案，操纵表决机器，于同年11月14日通过了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派往朝鲜。该委员会有权在朝鲜全境旅行、观察及咨询，并监督在朝鲜实行普选，成立朝鲜全国政府。委员会于1948年1月进驻朝鲜。由于它被拒绝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所以仅在南半部同李承晚等人进行会谈后，向联合国提交在南半部单独进行选举的报告。同年2月26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实施“单选”计划，使朝鲜的分裂面临永久化的危险。南部的金九、金奎植等民族领袖发表声明表示不参加单独选举，主张南北协商，建立南北统一政府。此时金日成也提议召开南北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金九等人前往平壤参加于1948年4月20日召开的会议，与会者有56个南北政党和社会团体的695名代表。会议反对“单选单政”，要求苏美两国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主张通过全境普选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但美国不理睬北方的主张，一心要在朝鲜成立反共政

府。美军政厅和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共同策划 1948 年 5 月 10 日进行单独选举，组成国会事宜。同年 7 月 20 日国会选举李承晚为总统，组织了政府。1948 年 8 月 15 日宣布成立“大韩民国”。同月，北半部开始选举地方议员，9 月组成最高人民会议，9 月 9 日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任内阁首相。开始了南北对峙和民族分裂的局面。

在南北各自建立政府以后，苏美占领军开始撤走。1948 年 9 月 10 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致函苏美两国政府，要求他们撤军。苏联同意朝鲜的意见，决定在第二年元旦前撤走苏军，并于当年 12 月 16 日按计划将军队全部撤走。美国军队则留下一个近 500 人的军事顾问团以后，于 1949 年 6 月 29 日宣布撤离韩国。

附录一：高句丽、百济、新罗、 高丽、李朝世系表

高 句 丽

序号	年 代	王 名	备 注
1	公元前 37~前 19 年	东明王 (高朱蒙)	
2	前 19--公元 18 年	琉璃明王	
3	公元 18~44 年	大武神王	
4	44~48	闵中王	
5	48~53	慕本王	
6	53~146	太祖大王	在位时间为 94 年
7	146~165	次大王	
8	165~179	新大王	
9	179~197	故国川王	
10	197--227	山上王	
11	227~248	东川王	
12	248~270	中川王	

13	270~292	西川王	
14	292~300	烽上王	
15	300~331	美川王	
16	331~371	故国原王	
17	371~384	小兽林王	
18	384~392	故国壤王	
19	392~413	广开土王	又称好太王
20	413~491	长寿王	在位时间为 79 年
21	491~519	文咨王	
22	519~531	安藏王	
23	531~545	安原王	
24	545~559	阳原王	
25	559~590	平原王	
26	590~618	婴阳王	
27	618~642	荣留王	
28	642~668	宝藏王	

百 济

序号	年 代	王 名	备 注
1	公元前 8~公元 28 年	温祚王	
2	28~77	多娄王	在位时间为 50 年
3	77~128	己娄王	
4	128~166	盖娄王	
5	166~214	肖古王	
6	214~234	仇首王	
7	234~234	沙伴王	在位时间为 1 年
8	234~286	古尔王	在位时间为 53 年
9	286~298	责稽王	
10	298~304	汾西王	
11	304~344	比流王	
12	344~346	契 王	
13	346~375	近肖古王	
14	375~384	近仇首王	

15	384~385	枕流王	
16	385~392	辰斯王	
17	392~405	阿辛王	
18	405~420	腆支王	
19	420~427	久尔辛王	
20	427~455	毗有王	
21	455~475	盖鹵王	
22	475~477	文周王	
23	477~479	三斤王	
24	479~501	东城王	
25	501~523	武宁王	
26	523~554	圣 王	
27	554~598	威德王	
28	598~599	惠 王	
29	599~600	法 王	
30	600~641	武 王	
31	642~660	义慈王	

新 罗

序号	年 代	王 名	备 注
1	公元前57~公元4年	赫居世居西干	在位时间为 61 年
2	4~24	南海次次雄	
3	24~57	儒理尼师今	
4	57~80	脱解尼师今	
5	80~112	婆沙尼师今	
6	112~134	祇摩尼师今	
7	134~154	逸圣尼师今	
8	154~184	阿达罗尼师今	
9	184~196	伐休尼师今	
10	196~230	奈解尼师今	
11	230~247	助贲尼师今	
12	247~261	沾解尼师今	
13	262~284	味邹尼师今	
14	284~298	儒礼尼师今	
15	298~310	基临尼师今	

16	310~356	讫解尼师今	
17	356~402	奈勿尼师今	
18	402~417	实圣尼师今	
19	417~458	讷祇麻立干	
20	458~479	慈悲麻立干	
21	479~500	炤智麻立干	
22	500~514	智 证 王	
23	514~540	法 兴 王	
24	540~576	真 兴 王	
25	576~579	真 智 王	
26	579~632	真 平 王	在位时间为 54 年
27	632~647	善 德 王	女 王
28	647~654	真 德 王	女 王
29	654~661	大宗武烈王	
30	661~681	文 武 王	
31	681~692	神 文 王	
32	692~702	孝 昭 王	
33	702~737	圣 德 王	
34	737~742	孝 成 王	
35	742~765	景 德 王	
36	765~780	惠 恭 王	
37	780~785	宣 德 王	
38	785~798	元 圣 王	

39	799~800	昭 圣 王	
40	800~809	哀 庄 王	
41	809~826	宪 德 王	
42	826~836	兴 德 王	
43	836~838	僖 康 王	
44	838~839	闵 哀 王	
45	839~839	神 武 王	在位时间为一年
46	839~857	文 圣 王	
47	857~861	宪 安 王	
48	861~875	景 文 王	
49	875~885	宪 康 王	
50	886~887	定 康 王	
51	887~897	真 圣 王	女 王
52	897~912	孝 恭 王	
53	912~917	神 德 王	
54	917~924	景 明 王	
55	924~927	景 哀 王	
56	927~935	敬 顺 王	

高 丽

序号	年 代	王 名	备 注
1	公元 918~943	太 祖	王 建
2	944~945	惠 宗	
3	946~949	定 宗	
4	950~975	光 宗	
5	976~981	景 宗	
6	982~997	成 宗	
7	998~1009	穆 宗	
8	1010~1031	显 宗	
9	1032~1034	德 宗	
10	1035~1046	靖 宗	
11	1047~1083	文 宗	
12	1083~1083	顺 宗	在位时间为一年
13	1084~1094	宣 宗	
14	1095~1095	献 宗	在位时间为一年
15	1096~1105	肃 宗	
16	1106~1122	睿 宗	

17	1123~1146	仁 宗	
18	1147~1170	毅 宗	
19	1171~1197	明 宗	
20	1198~1204	神 宗	
21	1205~1211	熙 宗	
22	1212~1213	康 宗	
23	1214~1259	高 宗	
24	1260~1274	元 宗	
25	1275~1308	忠 烈 王	
26	1309~1313	忠 宣 王	
27	1314~1330 1332~1339	忠 肃 王	先后二次即位
28	1331~1331 1340~1344	忠 惠 王	先后二次即位
29	1345~1348	忠 穆 王	
30	1349~1351	忠 定 王	
31	1352~1374	恭 愍 王	
32	1375~1388	禑 王	
33	1389~1389	昌 王	在位时间为一年
34	1389~1392	恭 让 王	

李 朝

序号	年 代	王 名	备 注
1	公元 1392~1398	太 祖	李成桂
2	1399~1400	定 宗	
3	1401~1418	太 宗	
4	1419~1450	世 宗	
5	1451~1452	文 宗	
6	1453~1455	端 宗	
7	1456~1468	世 祖	
8	1469~1469	睿 宗	在位时间为一年
9	1470~1494	成 宗	
10	1495~1506	燕山 君	
11	1506~1544	中 宗	
12	1545~1545	仁 宗	在位时间为一年
13	1546~1567	明 宗	
14	1568~1608	宣 祖	
15	1609~1623	光海 君	
16	1623~1649	仁 祖	
17	1650~1659	孝 宗	
18	1660~1674	显 宗	
19	1675~1720	肃 宗	
20	1721~1724	景 宗	
21	1725~1776	英 祖	在位时间为 52 年
22	1777~1800	正 祖	
23	1801~1834	纯 祖	
24	1835~1849	宪 宗	
25	1850~1863	哲 宗	
26	1864~1907	高 宗	
27	1907~1910	纯 宗	

附录二：朝鲜史大事年表

60 万至 40 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开始。
公元前五千纪	新石器时代开始。
公元前二千纪前期	青铜时代开始。
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	铁器时代开始。
公元前一千纪中期	古朝鲜国建立。
公元前三世纪	辰国建立。
公元前 194 年	卫满朝鲜开始。
公元前 18~17 年	古朝鲜灭亡，汉设四郡。
公元前一世纪后半期	高句丽封建国家建立。
公元 3 年	高句丽国迁都国内城。
公元一世纪中叶	百济封建国家建立。
公元二世纪前半期	新罗封建国家建立。
427 年	高句丽国迁都平壤。
475 年	百济迁都熊津。
505 年	新罗实行州郡县制。
598 年 6 月	隋文帝侵入高句丽。
612 年 1 月	隋炀帝侵入高句丽。
613 年 4 月	隋炀帝侵入高句丽。
660 年 7 月	百济国灭亡。
668 年 9 月	高句丽国灭亡。
676 年	新罗统一三国。
889 年	沙伐州农民起义。

- 891年 北原农民军进攻溟州一带。
- 896年 “赤裤军”农民起义。
- 900年至911年 新罗分裂为后三国（后百济、泰封、新罗）
- 918年6月 泰封国侍中王建发动政变，建立高丽王朝。
- 935年11月 新罗敬顺王投降高丽，新罗王朝灭亡。
- 936年9月 后百济国灭亡，高丽统一朝鲜半岛。
- 976年11月 高丽实行田柴科土地制度。
- 993年10月 契丹入侵高丽，高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开始。
- 1010年11月 契丹第二次入侵高丽。
- 1018年12月 契丹第三次入侵高丽。
- 1126年1月 李资谦叛乱。
- 1135年1月 妙清叛乱。
- 1170年8月 武臣政变。
- 1174年9月 赵位宠在西京发动政变。
- 1176年1月 亡伊、亡所伊领导的农民起义。十二世纪后半期农民战争开始。
- 1176年至1178年 十二世纪农民战争的第一次高潮。
- 1193年至1194年 十二世纪农民战争的第二次高潮。
- 1200年4月 晋州官私奴婢起义。
- 1231年8月 蒙古军侵入高丽。
- 1232年至1259年 高丽人民反对蒙古统治阶级继续入侵的斗争。

- 1270年6月 三别抄军起义。
- 1388年6月 李成桂从威化岛回师，发动政变，掌握政权。
- 1391年5月 实行科田法土地制度。
- 1392年7月 高丽灭亡，李朝建立。
- 1394年10月 迁都汉阳。
- 1444年 创制《训民正音》
- 1467年5月 咸镜道农民战争爆发。
- 1592年 日本侵略军入侵釜山，壬辰卫国战争开始。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军在唐项浦和闲山岛大败日本水军。义兵部队在各地活动。12月，明朝派兵支持朝鲜。
- 1593年 1月，朝明联军收复平壤。2月，幸州大捷。
- 1597年1月 日军再次入侵。鸣梁大捷。
- 1598年 壬辰卫国战争胜利结束。
- 1608年 开始实行大同法。
- 1627年1月 后金（清）侵入李朝。
- 1636年12月 清军第二次侵入李朝。
- 1811年12月 平安道农民战争爆发。
- 1862年2月 晋州农民起义。
- 1863年12月 大院君执政。
- 1866年 平壤军民粉碎侵入朝鲜的美国舍门号武装商船。击退法国侵略军。（丙寅洋扰）
- 1871年4月 朝鲜军民击退侵入江华海峡的美国

- 1875年5月 船队（辛未洋扰）。
日本军舰云扬号侵入江华海峡。
- 1876年2月 签订不平等条约——《朝日修好条约》（江华岛条约）。
- 1882年6月 壬午兵变。
- 1884年10月 甲申政变。
- 1894年1月 甲午农民战争爆发。
- 1905年11月 签订《乙巳五条约》。
- 1906年2月 日本在朝鲜设置统监府。
- 1907年7月 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丁未七条约》
8月，日本强制解散朝鲜军队。
- 1909年10月 安重根击毙日本侵略者头目伊藤博文。
- 1910年8月 日本强迫朝鲜签定《日韩并合条约》，完全吞并朝鲜。
- 1919年3月 “三一”人民起义。
- 1919年4月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上海）。
- 1922年10月 共产国际远东总局设高丽局。
- 1926年6月 “六·十”万岁运动（纯宗国葬日）。
- 1928年12月 共产国际决定取消朝鲜共产党（12月提纲）。
- 1930年5月 间岛“五卅”反日暴动。
- 1932年4月 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向日军投掷炸弹。
- 1932年4月 金日成在安图组建反日人民游击队。
- 1936年5月 发表“祖国光复会10大纲领”。

- | | |
|-----------------|----------------|
| 1941 年 12 月 | 临时政府正式向日军宣战。 |
| 1943 年 11 月 | 《开罗宣言》。 |
| 1945 年 8 月 15 日 | 解放。 |
| 1948 年 8 月 15 日 | 大韩民国成立。 |
| 1948 年 9 月 9 日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